
日瓦戈医生（下）帕斯捷尔纳克卷
日瓦戈医生（上）帕斯捷尔纳克卷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日瓦戈医生（上）
·帕斯捷尔纳克卷·
【苏联】B·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慕娟◎译
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二十世纪俄苏文学最重要的伟大作品之一
其出版境遇坎坷，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也使作家饱受时代带来的窒息和屈辱。
小说涉及20世纪苏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触及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各方面的问题，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瓦戈医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著；谢幕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1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ISBN 978-7-5133-0555-6

Ⅰ．①日…　Ⅱ．①帕…②谢…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2324号

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著　谢幕娟　译

责任编辑：汪　欣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35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555-6

定　　价：64.00元（全二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主要人物关系简介

尤里·安德雷维奇·日瓦戈是放纵不羁的安德雷·日瓦戈和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日瓦戈的儿子。艾夫格拉夫·安德雷维奇·日瓦戈是尤里·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哥哥，为安德雷·日瓦戈与斯特巴诺娃·爱丽丝公主所生。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韦德尼亚皮是其舅舅即科里亚舅舅。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格罗梅科即冬妮娅，是化学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和安娜·伊娃诺夫娜之女，而安娜的父亲是伊万·俄奈斯托维奇·克鲁埃戈尔，伊万既是地主，又是钢铁厂厂长。少年时，尤里·安德雷维奇·日瓦戈与一个律师的儿子米沙·戈登同住在格罗梅科家里。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古伊沙尔即拉拉，是寡

妇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古伊沙尔之女，阿玛莉亚来自法国，但在俄国生活多年。罗迪奥恩即罗迪亚，是其弟弟。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洛夫斯基是安德雷·日瓦戈的律师，同时也是古伊沙尔夫人的情人和顾问。

拉夫雷恩提·米克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塞拉菲玛·菲利普夫娜是其妻子，两人育有女儿娜迪亚和莉帕。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提波夫即帕沙或帕什卡，是铁路工人帕维尔·菲拉波托维奇·安提波夫的儿子。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帕维尔与另一个铁路工人革命家庭提瓦辛斯住到了一起，即库普里安·萨维里维奇与其母亲玛法·加夫里洛夫纳。

基马塞特蒂恩的儿子奥塞普·基马塞特蒂诺维奇·加利乌林即尤苏普卡，是提瓦辛斯一家人所住公寓的守门人，信奉穆斯林教。

伊诺克提·杜多罗夫即尼卡，是革命恐怖分子迪梅恩提·杜多罗夫和一个格鲁吉亚公主的儿子。马克尔·什查波夫是格罗梅科家的门房，玛丽娜即玛丽恩卡，是其女儿。

目　录

Contents

本书主要人物关系简介

日瓦戈医生（上）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第二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儿

第三章　斯万提斯凯斯的圣诞派对

第四章　命中注定

第五章　告别过去

第六章　莫斯科营地

第七章　开往乌拉尔的火车

日瓦戈医生（下）

第八章　抵达

第九章　瓦利吉诺

第十章　公路

第十一章　森林兄弟

第十二章　花楸树

第十三章　带雕塑房子的对面

第十四章　回到瓦利吉诺

第十五章　结局

第十六章　后记

附诗

日瓦戈医生（上）

·帕斯捷尔纳克卷·

【苏联】B·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幕娟◎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1

人群一边走，一边唱着《安魂曲》[(1)]。无论歌声何时停下，行走的双足，嘶叫的马群，还有阵阵呼啸的狂风似乎都会把这悼歌接下去。

路过的人自觉自发地为送葬的队伍让路，不动声色地默数花圈，然后在胸前画十字架。有人好奇地问：“这是给谁送葬呢？”旁人答：“日瓦戈。”“哦，原来是他，那我就明白了。”“不是日瓦戈先生，是他的妻子，日瓦戈夫人。”“咳，这是一回事。愿她的灵魂安息。这可真是场隆重的葬礼。”

逝者如斯，最后的时刻终将过去，无可挽回。

“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2)]神父一边默念经文一边在胸前画一个十字架，将土撒到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身上。接着，众人齐唱《正义的灵魂》，然后便是一阵肃穆的忙乱。棺材被盖上了，钉了钉子，让人抬着放进坟墓里。四个人用铁锹匆忙地往坟墓里填土，像凝结的土块雨一样落在棺材盖上。很快，棺材上就顶起了一座小土丘。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儿爬了上去。过于隆重的葬礼容易让人恍惚麻木，而现在这恍惚与麻木逐渐消去，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个小男孩儿的感同身受——他定是想去母亲坟头说最后几句话吧。

孩子扬起头，看了看秋日的萧条景色和修道院的圆顶，眼神略显空洞。他的鼻子微微上翘，脸庞

显得有些扭曲，只见他往外伸了伸脖子。如果一只小狼崽做这个动作，人们肯定会认为它马上就会开始嚎叫了。但小男孩儿只是把脸埋进双掌中，低声地啜泣起来。寒风卷着冷雨打在他的手上、脸上、身上，毫无怜意。这时，一个穿紧身黑衣的男人走上前去。那是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韦德尼亚皮，是下葬的玛利亚的哥哥，也是哭泣的小男孩儿的舅舅。尼古拉伊以前是个神父，后来主动请求解除神职。他走到男孩儿身边，牵着他走下坟头。

2

尼古拉伊决定和小尤拉[3]在修道院过一夜，因为过去有点交情，修道院便给尼古拉伊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其时正值圣母节的前夕。第二天，他们就要去南方，去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城镇，尼古拉伊舅舅在那儿为当地的一家进步报社工作。他们买好了票，东西也都收拾妥当，放在房间里头。车站离修道院不远，在屋里甚至能听到火车汽笛的哀鸣声。

当晚天气变得很冷。小房间的两个窗户都是落地而开，朝向一个荒废果菜园的角落。透过窗子可以看见果菜园主道上结冰的水洼，还看得见稍早时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下葬的墓地一角。果菜园只有靠墙处长着一丛金合欢和几棵卷心菜，甘蓝卷心菜的蓝色叶子一层紧裹一层，似乎连它也怕了这寒冷的天气。每当有风吹过，无叶的金合欢就会随风摆动，好似着了魔一样，之后又静静趴到地上。

深夜，睡着的尤拉却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原本漆黑的小房间诡异地亮成了一片白。尤拉不顾身上只穿了内衣，他急切地跑到窗子边，脸紧贴着冰冷的玻璃。

外头看不见小路，看不见墓地，也看不见果菜园，外头只有漫天的风雪。暴风雪好似是发现了尤拉，并意识到它对这样一个小男孩儿的恐吓力，于是它咆哮，怒吼，千方百计要把这小男孩儿吓住。雪花在天空中飘舞翻卷，大地白茫茫的一片。世界仿佛只剩下这暴风雪，再无其他。

当狂风卷着暴雪扑到窗台，尤拉的第一反应是穿衣服，并跑到外面做点什么事。他担心那片卷心菜地会被雪埋住，再没人能挖得出来；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妈妈会在地下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小尤拉又哭了，泪流满面。尼古拉伊舅舅被哭

声惊醒，走过来安慰他。尼古拉伊打了个哈欠，倚靠在窗边，若有所思。

天光破晓，两个人开始穿衣洗漱。

3

母亲还活着时，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抛弃了他们母子，而自己在西伯利亚过着放纵不羁的生活，大肆挥霍着上百万的家产。母亲总是跟他说，父亲去彼得堡做生意了，或者说他去了伊尔比特的某个大集市。

尤拉的母亲一直都被病魔缠身。发现患有肺痨之后，她开始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治病。有两次母亲虽然带着尤拉一起去，可是却总留他单独和一群陌生人待在一起，并且每次在一起的人都不同。尤拉渐渐习惯了这种不断变化的人和事，再加上复杂的背景和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古怪事情，他也就认为父亲不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了。

尤拉依稀还记得小时候很多事物都是以他的家族姓氏命名的。比如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

瓦戈大楼、日瓦戈领带别针，甚至还有一种小面点被称作日瓦戈蛋糕。那时如果你在莫斯科对拉雪橇的人说“日瓦戈”三个字，那就等同于说：“拉我去廷巴克图！”接着，你便会被带到一个童话王国，那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安静花园。乌鸦在枞树的枝头停下，抖落一地白霜，凄清的叫声在天地间回响，好似木头碎裂的咔嚓声。纯种犬穿过一片空地，从大路那边新建的房子里奔过来。再往前走，你会看到暮色映衬下的华灯初上。

可是，突然间，所有这些都不见了。他们一无所有了。

4

1903年的一个夏日，尤拉同尼古拉伊舅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穿过田野离开。他们要去拜访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这个人住在杜普兰卡。他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本畅销教科书的作者，还是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主人，是生产丝绸的工厂主，又是一名了不起的艺术品赞助人。

时值圣母节前夕，到处都是一片丰收景象。不知是因为人们都在家准备过节还是因为日头太大，总之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收割了一半的土地在似火骄阳的炙烤下，好似被剃了一半的犯人脑袋。鸟儿在头顶盘旋，阳光下的麦子一根根挺得笔直。远处，一捆捆整齐的麦子排在麦茬上，盯得久了，那麦垛仿佛能动，跟一个个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的土地测量员一样。

“这些地是谁的？”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问帕维尔。帕维尔是尼古拉伊舅舅雇用的勤杂工，此时他正坐在大箱子的一边，肩背拱起，双腿交叉，显然他不擅长驾车：“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些是地主的。”抽着烟的帕维尔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转向另一边：“那些才是农民的土地！过去——”他朝马大吼一声，眼睛直直地盯着马尾，身体拱起好似一个正检查压力计的工程师。这两匹马和世界上其他拉车的马一样——辕马忠诚而老实地拉车，而另一匹马则跟天鹅一样弯着脑袋，看似费力实则偷懒。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身边带着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书，书里有一些关于土地问题的见解。考虑到越来越严格的出版审查，这位出版人想让作者对书适当做些修订。

“这儿的人都疯了。”他对帕维尔说，“听说附近村子有个商人被割喉了，郡里的养马场也被人放火烧了。这事你怎么看？你们村里有人讨论这事吗？”

帕维尔显然对这事抱着更悲观的态度。尼古拉伊此行的目的是让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软化他在耕地问题上的激进观点。

“谈论？农民们都被宠坏了——日子过得太好了。这对我们这种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扔一根绳子给农民，上帝知道我们会立刻勒住对方的喉咙——过去，那边！”

这是尤拉第二次跟舅舅到杜普兰卡来。他本以为自己记得路，每次穿过一片田野来到森林边上，他似乎都知道要转左还是转右。绵延六英里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似乎就在眼前，远处的河流和铁轨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可每次他都弄错了。穿过一片田野又是另一片田野，一眨眼又钻进了很容易迷路的森林。这种广袤无垠让他的心中生出一种自由和喜悦的感觉。而这感觉让他开始畅想未来。

当时，让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名扬四海的书都还未写就。尽管思想已经成形，但他还不知道如何表达。不过那之后不久，他便在当代作家、大学教授和革命哲学家中赢得一席之地，这是因为他和这些人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不过除了使用相同的术语之外，其余并无相似。那些人无一例外地死守着这样或那样的教条，并满足于浮夸而肤浅的言辞，但尼古拉伊神父对托尔斯泰和革命理想主义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还在不断地深化。他满怀热情地寻找着一种思想，激发它，吸收它，他相信这会指出变革的方向，闪电或雷鸣一样的思想能同任何一个人对话，哪怕是小孩儿或者文盲。他急切

地渴望某些新东西。

尤拉喜欢跟舅舅待在一块儿，因为尼古拉伊舅舅总能让他想起母亲。和母亲一样，尼古拉伊舅舅崇尚自由，并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两个人都相信世间万物生来平等，都拥有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天赋，并且能在激情退却之前将心中所想表达出来。

尼古拉伊舅舅带他一块儿去杜普兰卡，这让尤拉很是高兴。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并且那个地方也能让他找到与母亲相关的记忆。母亲喜欢大自然，经常带他去乡间漫步。

尤拉还渴望再次跟尼卡·杜多罗夫见面，尽管尼卡比他大两岁，可能不怎么看得起他。还在上学的尼卡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跟尤拉握手时，他会使劲儿把手往下拉，并且头垂得很低，头发把额头和半边脸挡住。

5

“最大的问题在于贫困。”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在读修订后的手稿。

“我想，用‘本质问题’更好。”伊万·伊万诺维奇对排版毛条提出修正。

他们在暮色半掩的玻璃长廊中讨论。花洒和各种园艺用具随意摆在地上，一把破椅子的椅背上挂着件雨衣，沾满污泥的靴子靠在墙角，靴子的长筒耷拉到地上。

“另一方面，出生和死亡数据表明……”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又读。

“这儿要插入‘截至目前’四个字。”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做了个标记。他面前摆着一本草稿，几块小的花岗岩石头压在上面，充当镇纸。

修订工作完成之后，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想即刻离开。

“看这天气，会有一场大暴雨，我们得赶紧走。”

“没有那回事。怎么能让您这么匆匆忙忙地走呢！我们先过去喝杯茶。”

“可天黑前我必须得回到镇上。”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可不会听。”

这时，一股煮茶的清香气息从花园里飘过来，混着烟叶和天芥菜的味道。一位女仆端着放满奶油炼乳、浆果和奶酪蛋糕的托盘走过来，并说帕维尔去河里洗澡了，连马也一起牵了过去。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便也不得不暂作逗留。

“趁下人们泡茶的工夫，我们也到河边去走走吧。”伊万·伊万诺维奇建议道。

尼古拉伊跟科洛格里沃夫早有交情，所以受到了盛情款待，庄园主给他安排了两间上等好房。庄园的一个僻静角落处有一所小木屋，带有一个小花园，木屋离一条废弃的车马道很近。不过木屋如今已是草长莺飞，荆棘满地，成了堆放杂物和垃圾的地方。科洛格里沃夫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家财万贯，却十分理解革命斗争，与妻子旅居国外。庄园里只住着他的两个女儿娜迪亚和莉帕同她们的家庭教师以及几个下人。

安排给尼古拉伊住的上房同庄园间隔着一丛茂密的黑刺李，房前有一块草地，主屋四周还围着一个人工湖。当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抄近道从荆棘丛中穿过时，几只麻雀被吓得

四散奔逃。黑刺李随着人的走动而左右摆动，窸窸窣窣的声音恍如清水流过水管。

他们绕过温室和园艺工人住的小屋，途中还经过了一片石雕废墟。一路上两个人谈论着科学界和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是的，那都是些有才华的人。”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说，“不过如今的潮流是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群体。信索罗维耶夫也好，康德也好，或马克思也好，团体始终都是平庸之辈的避难所。只有独自追寻才能找到真理，而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付出忠诚？很少，真的很少。在我看来，一个人需得忠诚于不朽，这‘不朽’算是‘生命’的另一种说法，一种更强烈的表达。一个人得忠实于不朽，忠实于上帝！啊，你肯定对此嗤之以鼻，可怜的人。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不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应了一声。伊万身材单薄，头发花白，跟条鳗鱼一样经常扭动身子，他还留着一撇滑稽的胡子，这让他看上去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总喜欢用手抓胡子，还把胡子修得尖尖的。

“没错，我不表态。你知道的，我看这些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不过既然说到这儿来了，你能告诉我，你被解除神职时是怎样的感受吗？我敢打赌，你当时肯定害怕。他们没有开除你的教籍，是吗？”

“你可别想转移话题。不过，为什么不……开除我的教籍？没有，他们现在不做那样的事了。那么做对谁都不好，还可能引起某些很严重的后果。其实这就跟一个被长时间禁止参军的人一样，他们

只是不准我再到莫斯科或彼得堡去。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说了，人得对上帝忠诚。我会解释给你听。你不理解人如何能成为无神论者，也不明白人如何能不管上帝存在与否或上帝为何存在，却相信人的存在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历史状态，而这段历史正是始于耶稣，耶稣的福音教义正是其基础。说到这儿，究竟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上千年来对死亡之谜的系统性探索，目的就是要战胜死亡。这也是人们发现数学无穷性和电磁波的缘由，是他们谱写交响曲的原因。到如今，若没有明确的信仰，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没有精神的力量，人类是不可能有这种重大发现的。而这种精神力量恰是植根于福音教义。这是怎么说呢？首先，爱护友邻，这是生命力的高级形式。一旦一个人的内心充满这种力量，它就会自发地溢出来，影响他人。而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两个理想是——没有这两个理想，人无法称之为人——解放个性和不畏牺

牲。注意，所有这些都是最新潮的观点。古往今来，历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历史上从来不缺残暴无人性的卡利古拉[(4)]，他们从未想过奴役者只是一群缺乏才能的人。他们用青铜做碑，用大理石做柱，为自己歌功颂德，以求死后永垂不朽。一直到耶稣诞生之后，人才得以自由呼吸。直到我们有了耶稣，人才能面朝未来而生。人类不再如狗一样死在沟渠中，历史里的人至少可以死得其所，并且征服死亡的工作也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耶稣自己的死，就是这一工作的一部分。哦，我说了很多，对吗？不过我很可能是在对牛弹琴。”

“这是形而上学，我亲爱的伙计。我的医生不许我谈论这些，我吃不消。”

“哦，好吧，你真是无药可救了。那我们就不说了。上帝啊，多么伟大的观点，你可真是幸运。

不过我想，哪怕你每天都和这些真理生活在一起，你也未必能看得见。”

波光粼粼的河面好似一块打磨了的铁块，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没看一会儿眼睛就被耀花了。突然，几股波浪击碎河面，只见一艘拉着马车、马、农夫和农妇过河的大船驶过河中。

“瞧，现在才五点过几分，”伊万·伊万诺维奇说，“还有快车从塞兹兰[5]过来。通常车都是五点过五分经过这儿。”

远处，一辆黄蓝相间的火车自右向左穿过平原，因为隔着很远的距离，火车看上去成了一个小点儿。可突然，他们注意到那火车停下了。白色的蒸气不断喷出来，紧接着又响起一声长长的汽笛。

“这可真奇怪。”伊万说，“肯定是出事儿

了，不然车怎么会无缘无故停在沼泽地中央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走吧，我们喝茶去。”

6

尼卡没在花园里，也没在房间里头。尤拉猜他可能是躲起来了，因为尼卡烦他们了，并且他相对尼卡而言太小了。当舅舅和伊万在长廊上讨论书本修订工作时，尤拉就一个人在园子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这个地方可真迷人啊！小黄鹂叫得清脆，每次都是叫三声就停下，停顿的时间刚好够这雾朦长笛一样的声音消散，直至最后一丝振动停止。空气中飘着花香，一阵阵扑鼻而来，仿佛那花香是迷路了，一动不动，固定在花丛的上方。这让尤拉想起昂底布[6]和波狄吉拉。尤拉这边看看，那边瞧瞧，草地上仿佛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可凝神细听，那不过是鸟儿的欢叫和蜜蜂的嗡鸣。时不时地，尤拉恍如听见母亲在唤他，唤他跟她一起走，去别的地方。

尤拉走到水沟旁，并沿着沟边的矮丛走到一处赤杨林。

赤杨树的下面散落着黑而潮湿的断枝，花开得很少，带切口茎的马尾看着好似《圣经》上画着的戴埃及头饰的人。

尤拉越来越觉得孤独。他想哭。双膝一软，他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上帝的天使，我神圣的保护神啊，”他祈祷，“请让我坚定地走在真理大道上，告诉妈妈我一切都很好，她不需要担心我。如果泉下还能有知，哦，上帝，请您把妈妈接到您的天堂，让她和圣人一同闪耀。妈妈那么善良，她纯洁无罪，请您对她仁慈，上帝啊，请您一定不要让她受苦。哦，妈妈！”尤拉肝肠寸断，他大声唤着母亲，好似母亲是他的另一个保护神。他太过伤心，以至于再也

无法承受，突然就晕了过去。

不过，尤拉并没有失去意识太久。醒来时，他听到舅舅正在大声叫他的名字。尤拉应了一声，然后便开始往上面走。突然，他想起自己还未为失踪的父亲祷告，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曾教过他。

不过刚才的晕厥让他的身体轻飘飘的，那种感觉很美妙，他不愿意失去这种感觉。尤拉心想下次再为父亲祷告应该也没事，他自言自语道："让他先等等吧。"其实，尤拉压根就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了。

7

米沙·戈登坐在火车的二等车厢里，他跟父亲一起出行。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来自格雷博格。米沙年约十一岁，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刚上二年级。父亲格里格瑞·奥斯帕维奇·戈登日前被调往莫斯科担任新职务，母亲和几个姐妹前几日就已出发，提前过去打扫房子。

两父子已经在旅途中渡过了三天。

白晃晃的阳光洒满俄国的田野、草原、村庄和城镇，火车轰隆隆驶过，扬起一片带着热气的灰尘。马车在公路上成队前行，偶尔也会有马车从队伍中退出，抄近路走。坐在飞速行驶的火车上看那些匀速前行的马车，马车就跟静止了似的。

每每抵达大一点的车站，乘客们就会跳下车，一窝蜂地涌进小卖部。此时，阳光照着车站的小花园，照着人们的后脚跟，也照着火车静止的车轮。

世间的任一单独行为都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可一旦放到一起，这些行为便融进生活的河流中，让人自然而然地沉醉。人们做着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行为机制背后的关切都不尽相同。可要是没有一种超脱于个人关切的更高层次的绝对自由感进行引导，这种机制就无法正常工作。这种自由源自一种感受——所有人都是互相联系的，并且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快乐的感受，感受到世间的万事万物并不只限于土地之上，或土地之下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它们同时也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有些人把那个地方称作上帝之国，有些人将其称为历史，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叫法。

可米沙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关切的感觉始终主导着他的身心，并且这种感觉丝毫不会因安全感的增加而削弱。米沙知道自己身上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他甚至还会有些病态地去刻意观察这种特质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结果让他很沮丧。这种关切感的存在对他而言无异于一种羞辱。

自打记事起，他就不停地问，为什么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长两只手两只脚，说同样的语言，过同样的生活，可又跟他们如此不同？为什么他只能得到这么少的爱——甚至，根本就得不到爱？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比其他人都要差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来提升自我？成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它的目的何在？这种徒劳挑战的好处或者公道又在哪里？除了带来悲伤，它又还能带来什么呢？

当米沙带着这个问题去找父亲时，父亲说他这个问题的前提就很荒唐，所以这种推理是错的。父亲没能给他一个信服的答案。

除了父母之外，米沙渐渐变得看不起成年人。他觉得是这些成年人造成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却又无力收拾。他相信，等他长大后，他肯定能解决这些问题。

譬如，现在没有人有勇气对父亲说——他不应该冲进站台去追那个疯子，也不应该把格里格瑞·奥斯帕维奇撇到一边自顾自地去拦那辆火车，更不应该拉开车门飞身跃出车厢。

父亲拉响了火车上的警报，看上去，火车诡异地停了那么长时间似乎就是为了等这一声警报。

没有人知道火车逗留的确切原因。有人说是突

然的急刹车让气闸发生了故障，也有人说是因为路的坡度太大，火车的发动机带不动。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个重要人物在火车上自杀了，而陪同在侧的律师坚持要让火车在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火车站停下，以便发布声明。而这也是助理工程师爬上电报杆的原因——检查手摇车是否准备就绪。

厕所里传来一股难闻的气息，即便是古龙水和炸鸡腿的香味也无法将其掩盖住，那味道仿佛是用脏的蜡纸裹着的。来自彼得堡的女人们跟没事人一样，一个个提着尖细的嗓子讨论别人的八卦情事和化妆衣帽，或者往脸上涂粉，并用手帕抹掉手指上多余的粉。经过戈登两父子所在的车厢时，女人们连忙整理披肩，生怕自己形象不佳。隔着窄窄的过道，她们努起嘴唇，在米沙看来，那好像是在说：“我们敏感吧！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聪明人。那种事可做不来。”

自杀者的尸体就放在路堤的草地上。他的前额有一道细细的血印，看起来就跟脸上画了一个休止符一样。血确实是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的，可看着并不像，那更像是后来添上去的，像是一块塑料或一块污泥又或者一片湿湿的桦树叶子。

或好奇或同情的看客来来去去，将尸体团团围住，而死者的旅伴兼朋友——一个五短身材，举止傲慢的律师，上身着一件汗衫，表情阴郁地站在一旁。天气很热，只见他取下帽子不停地扇风。面对人们七嘴八舌的提问，他只是耸肩，头也不回且语带愠怒地说：“他是个酒鬼。你们看不出来吗？他是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

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妇人在尸体旁来来回回看了几次，她穿一件羊毛呢的裙子，头上包一块蕾丝头巾。这个老妇人是寡妇提沃兹娜，她有两个当工程

师的儿子，当时正跟两个女婿一块儿，坐在火车的三等车厢。两个修女样的女人跟在提沃兹娜老妇人身后，她们不说一句话，头巾直把额头也包住。每次靠近，人群都会自发地为她们让路。

提沃兹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站的地方离尸体稍远，不过还是能看清周围的人群。她叹息一声，好似是在比较这两次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哟，”她似乎在说，“有些人的死是命中注定，看看这个人吧，定是生活优渥，可惜精神出了问题。”

火车上所有的乘客都走了出来，瞧几眼平躺在地上的尸体，又匆忙回到车厢里，生怕有人趁这个间隙偷了自己的东西。

当乘客们从火车上跳下，采几朵花或绕远一点儿路来活动筋骨时，他们感觉这整个地方就是为这

场意外而存在的。若没有这意外，那绿油油的草地，那宽阔的河流，那漂亮的房子，还有陡坡对岸的教堂或许都不会存在。夕阳小心翼翼地窥视着这一切，而附近的一只栖鸦也凑热闹似的飞了过来，望着人群。

米沙被这一场景惊住了，他又难过又害怕，不由得哭了出来。这一路上，自杀的那个人曾好几次跑到他们所在的车厢，每次都跟他父亲连续聊好几个小时。他说父亲的道德感、宁静平和和理解让他感到欣慰，他还就汇票、协议契据、破产和诈骗等问题不住地向父亲提问。

“真是这样吗？”戈登的答案让他惊叹，“法律可以如此宽大仁慈吗？我的律师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每当这个情绪紧张的男人平静下来，他那个旅

伴就会从一等车厢跑过来，将他拉到餐车喝酒。哦，他的旅伴就是那个身材矮胖，表情骄矜，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并且衣服穿得很讲究的律师，此时他就站在死者的身旁，但脸上看不出一丝惊讶的神情。这让人忍不住想，这个男人的死对他是否有好处？

米沙的父亲说死者是一位人尽皆知的百万富翁——日瓦戈先生。这位先生脾气温和，但生活放纵，对自己的行为不太负责任。日瓦戈先生到他们车厢来一看到米沙，就会情不自禁地谈起他那跟米沙差不多年纪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然后他又会谈自己的第二个家庭，不过跟第一个家庭一样，他最后还是抛家弃子了。每当谈到这儿，他似乎就会想起其他的什么事，脸色因惊恐而变得苍白，话也开始讲得漫无边际。

日瓦戈先生对米沙有一种说不出的怜爱，他或许是把对另一个人的感情投射在了米沙身上。日瓦戈送了很多礼物给米沙，每到一个大站他就会跳下车去挑选礼物，另外，一等车厢的小书摊也会卖一些玩具和当地纪念品。

日瓦戈先生总是酒不离身，他还抱怨说自己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睡过觉了。他说只要稍稍清醒一点儿，他就得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折磨。

最后，日瓦戈先生冲进了戈登两父子所在的车厢。他抓住戈登先生的手，似乎是想告诉他什么，但又无法说出口。沉默了一会儿，他就突然地冲出站台，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此时，米沙注视着手上的乌拉尔小木盒，那是日瓦戈先生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突然，火车上起了一阵骚动。只见一辆手摇车开了过来。一个医

生，两个警察，还有一个头戴帽徽的当地执事从车上下来。来人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冷冷地问了一些问题，还做了笔记。两个警察和火车站的警卫则把尸体笨拙地拖上路堤。一个农妇忽然放声哭了出来。乘客们都被要求回到座位上。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吹响口哨，火车开动了。

8

“哦，天啊。”尼卡在心里叫唤。他环视屋子一圈，想找地方逃出去。宾客们说话的声音不时从门外传来，而后门已经被堵死。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他的，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可他无心睡觉。

尼卡听见其他房间里有人在找他。那些人最后走进了卧室。

“我爱莫能助，”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说，“去吧，尤拉。也许你的朋友待会儿会露面，到时你就可以跟他玩儿。”他们都在谈论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学生运动，而尼卡就静静地听了二十分钟。最后，他们去了走廊。这时尼卡轻轻地推开窗子，跳了出去。

尼卡整晚未睡，而是想了一晚的心事。他已经十四岁，已然厌倦了当小孩子。他在床上辗转了一夜，天刚破晓便迫不及待地跑了出去。阳光在沾着露珠的树叶上，在地上投下影子。那影子并非全黑，而是跟湿毡布一样的深灰色。清晨扑鼻而来的清香似乎就来自地上的影子，阴影在一束束阳光的间隔下，看着好似女孩儿的手指。

突然，一束水银似的光闪过草地，那游动的身影跟在他身后，只隔了几步远。它往前游移着，不动声色。紧接着，一个突然的急转弯，它转到了旁边，消失不见。那是一条青草蛇。尼卡不由得耸了耸肩。

尼卡是个古怪的孩子。当他兴奋的时候，他就会模仿母亲的声音大声地跟自己说话。

“活着真好啊。”他想，“可为什么人总会受

伤呢？这世间自然是存在上帝的。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我。”想着，他上下打量一棵被风吹得摇晃的山杨，山杨树被雨水打湿的叶子看着好似一片片锡箔纸。“我要命令它停下。”尼卡突然蹦出这个想法，于是他用尽全身所有的力量想要用意念控制那山杨树：“静止。”而那树真的立刻停止了摆动。尼卡开心大笑，呼喊着跑向河边。

尼卡的父亲是恐怖分子迪梅恩提·杜多罗夫，原被判处以绞刑，后被沙皇赦免改成服苦役。而尼卡的母亲则是埃利斯托夫家族的格鲁吉亚公主，她是一个漂亮而骄纵的女人，仍然年轻，仍迷恋各种事物——叛乱，谋反，极端主义理论，著名演员，不幸的失败。

格鲁吉亚公主对尼卡甚是疼爱。尼卡的大名本

是伊诺克提，但格鲁吉亚公主却总喜欢温柔地叫他伊诺切克或诺奇卡，还将他带到第比利斯[7]向王室亲人炫耀。第比利斯王宫让尼卡印象最深刻的是庭院里一棵枝叶蔓延的树。那棵树很大，叶子像是大象的耳朵，挡住南方的烈日在院子里洒下一片荫凉。尼卡总觉得那是有生命的动物，而不是一棵静止的树。

对尼卡而言，继续姓父亲的姓无疑是一件危险的事。伊万·伊万诺维奇希望他能改跟母亲姓，并由格鲁吉亚公主向沙皇提出请求。反正一躺到床上，尼卡就会想着这样或那样的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凭什么肆意干涉他的生活？得给他一点教训，让他学乖点。

还有那个娜迪亚！就因为她有十五岁，就能趾高气昂地跟他说话，把他当小屁孩儿吗？要给她一

点颜色瞧瞧才行！“我讨厌她。”好几次他都跟自己说，“我要杀了她。我要把她推进水里淹死。”

不过母亲还是很好的。自然，她离开的时候还是对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撒了谎。高加索[8]附近的地区她没去过，她只不过是在最近的关口转了转，之后就往北去了彼得堡。现在她应该跟警校里的年轻学生们玩得正开心吧，可他却得待在这个该死的地方。不过他比他们都聪明。他会杀了娜迪亚，退学，去西伯利亚看望父亲，然后开始逃亡。

水塘边开满了睡莲。船只挤进去，形成一道阻隔。水塘里的水也荡漾开来，好似一把勺子插进西瓜舀动汁水一样。

尼卡和娜迪亚在采摘睡莲。两个人抓住了同一棵睡莲的茎干，他们一起用力，两个人的头撞到了一起，船被钩竿钩回了岸边。睡莲的茎干已然被拔

掉了一截，扭在一起，白色的花瓣围着红黄相间的花蕊，浮在水中。

娜迪亚和尼卡继续采花，船儿也越来越晃荡。

“我讨厌上学。”尼卡说，“是时候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我得出去闯世界。”

“我本来还想问你一些平方根的公式呢。我的代数太差了，差点要重考。”

尼卡觉得娜迪亚话里有话。显然，她是想提醒尼卡，他还是个孩子。平方根公式！哼，他压根儿就没开始学。

尼卡假装无动于衷，问道：“长大后你要嫁给谁？”可一问出口，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傻了。

“那还远着呢。可能谁也不嫁。我还没想过那样的事。”

“但愿你不要误会，我这么问可不是对你有兴趣。”

“那你为什么问？”

“你是个笨蛋。”

于是乎，两个人吵了起来。尼卡还能清晰记得那天早上他有多讨厌女人。他威胁说要是娜迪亚不停止叫骂，就要把她推入水中。“你试试看呀。”娜迪亚叫嚷着。尼卡气得一把抓住了娜迪亚的手腕，于是两个人打了起来，船失去平衡，两个人全部跌落水中。

尼卡和娜迪亚原本都会游泳，可是睡莲缠住了他们的胳膊和腿，两个人被拉着往下沉。幸好，他

们最后还是摆脱了污泥的束缚，爬了上来，只是两个人都成了落汤鸡。相比而言，尼卡还更狼狈一些。

两个人紧挨着坐下，身上都是水。要是放在以前，经过这样一次冒险，他们肯定会大吼怒骂，然后一起放声大笑。可现在他们都沉默了，只是喘息，两个人都觉得整件事很荒唐。娜迪亚憋着一肚子火，而尼卡则是浑身疼痛，好似有人用棍子狠狠打了他一顿似的。

最后，还是娜迪亚先开口，她用大人的口吻说：

“你简直是个疯子。”而尼卡也用同样的口吻回答：“对不起。”

说完，变成落汤鸡的两个人便往家走。他们走

到了一个山坡，那儿有许多的蛇，离尼卡那天早上看到草蛇的地方很近。

尼卡回忆起那天晚上他心里涌动的激情，想起了破晓时他曾用意志的力量让一棵树静止。他在心里暗想，现在该用意志做什么呢？此时此刻，他最想跟娜迪亚再回到刚刚落水的水塘，不知这是否会发生？

---

(1) 《安魂曲》又作《安魂弥撒》，追思曲，是一种特殊弥撒，用于基督教悼念死者仪式中演唱的合唱套曲。

(2) 《圣经·赞美诗》24：1，意为天地万物都属耶和华，他是宇宙并万物的主宰。

(3) 尤拉是其小名，尤诺奇卡是其爱称。

(4) 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以残忍著称。

(5) Syzran，俄罗斯欧洲部分东部城市。

(6) Antibes，法国东南部海港。

(7)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Tbilisi的旧称。

(8) Caucasus，俄罗斯南部地区，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

第二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儿

1

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未曾想新的麻烦事又纷至沓来。革命的浪潮冲击着俄国的大地，一浪高过一浪。

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古伊沙尔就是这个时候带着儿子罗迪奥恩和女儿拉丽莎从乌拉尔到莫斯科来的。这是一个法国女人，丈夫生前是比利时的一个工程师。阿玛莉亚把儿子送进军队当兵，女儿则送进了女子学校，巧的是，女儿拉丽莎跟娜迪亚·科洛格里沃夫恰好是同班同学。

古伊沙尔夫人的亡夫把所有存款都留给了她，

那些资产的价值先前有所上升，如今却日渐贬值。为了避免资产的持续贬值，也为了有点事做，古伊沙尔夫人在凯旋门附近盘下了一家做衣服的店——莱维斯卡伊制衣店。这家店是从莱维斯卡伊继承人那儿接手过来的，制衣店的信誉很好，客户、女裁缝师和学徒资源都很不错。

这其实是科马洛夫斯基律师的建议，科马洛夫斯基是古伊沙尔夫人亡夫的好友，如今成了她的军师，专门给她出谋划策。科马洛夫斯基深谙俄国的经商之道，是一个道地的冷血商人。古伊沙尔夫人的每一步棋都可以说是在科马洛夫斯基的安排下走的。科马洛夫斯基亲自到火车站接古伊沙尔夫人和她的孩子们，然后将他们带到了莫斯科的另一端——位于奥鲁瓦尼·佩鲁洛克的蒙特尼格鲁旅馆——他在那儿订了房间。科马洛夫斯基还说服古伊沙尔夫人将罗迪亚送去参军，并送拉拉到他选定的

学校读书。有时候，科马洛夫斯基会一边漫不经心地跟罗迪亚说着玩笑话，一边又紧盯着拉拉不放，直把拉拉看得脸红心跳。

2

古伊沙尔一家人在蒙特尼格鲁旅馆足足住了一个月，之后才搬进制衣店附近的一座三层公寓。

这是莫斯科最声名狼藉的地方之一——破烂不堪，许多车夫都喜欢这儿的便宜酒馆，街上到处都是“堕落的女人”。

孩子们对落满灰尘的房间，有臭虫的床和破烂的家具并不意外。自从父亲死后，他们的母亲就一直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中。罗迪亚和拉拉已经被告知无数遍，他们现在已经生活在毁灭的边缘。他们意识到自己跟街上其他孩子是不同的，可跟那些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们一样，他们对富人也生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种恐惧的活例子。古伊沙尔

夫人年约三十五岁，身材丰满，年轻时也是个金发美人，只是一直缠绵病榻，身体时好时坏。她很胆小，尤其害怕男人。出于这个原因，也出于恐惧和迷惑，她游离在一个又一个情人中间。

古伊沙尔一家人住在蒙特尼格鲁旅馆的23号房间，而自打蒙特尼格鲁旅馆落成以来，24号房间就一直被大提琴演奏家提什凯维奇住着。提什凯维奇是一个光头，汗总是冒个不停。当要说服谁的时候，他就会双手合十虔诚地按在胸前；而当在时尚派对和音乐厅演奏时，他就会昂首挺胸，眼里闪烁狂喜的光芒。他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波尔肖剧场或修道院度过。作为邻居，两家人互帮互助，而这也让他们变得亲密。

由于科马洛夫斯基前来拜访古伊沙尔夫人时，有孩子们在终归会不方便，提什凯维奇干脆把自己

的家门钥匙留给了古伊沙尔夫人，这样她就能在他家接待客人。渐渐的，古伊沙尔夫人就把提什凯维奇的这种无私慷慨当作理所当然，好几次她都叩响提什凯维奇的家门，泪流满面地请求他将自己从“赞助人”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3

制衣店开在一楼，离提瓦斯凯亚街道的中心区不远。制衣店临近布雷斯特铁路，旁边就是仓库和员工宿舍。

奥莉娅·德米纳就住在其中一间宿舍里，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在古伊沙尔夫人手下干活，而她的叔叔则在货场工作。

奥莉娅心灵手巧，颇得前雇主的喜爱，现在的新主人也逐渐对她青睐有加。而奥莉娅很喜欢拉拉·古伊沙尔。

缝纫机在疲倦的女裁缝手下一刻不停地轰鸣着，只见满屋子都是翩飞的丝线。一个女人坐在桌子前，埋首缝着手中的衣服，针一进一出，拉得飞快。而地板上胡乱扔着些垃圾。在缝纫机的轰鸣声

和窗前金丝雀（名叫克里尔·莫德斯托维奇，至于这个奇怪名字的来由，前主人到死都未公开）的啼叫声中，只有大声讲话才能让别人听得见。

接待室里，客人们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上堆满了时尚杂志。客人们或站或坐，姿势不一，热烈地讨论着杂志上的模特和衣服样式。菲娜·西兰提耶夫娜·费提索瓦坐在另一张桌子前的老板椅上，她是古伊沙尔夫人的助手也是首席裁缝。费提索瓦骨瘦如柴，松弛的脸上长了许多的疣。她的黄牙齿中间咬着一根烟，一双泛黄光的眼睛斜翘着，一股黄烟自鼻间呼出。费提索瓦在一个笔记本上快速写下测量数据、地址以及客户们各种不同的要求。

古伊沙尔夫人没有打理店铺的经验。她感觉自己并不像一个老板，幸好员工都很诚实，费提索瓦也很可靠。不过现在的日子还是很难熬，至于未

来，她根本不敢想——古伊沙尔夫人经常会感到绝望。

科马洛夫斯基经常来看他们。在从制衣店去公寓的路上，他总是会故意吓那些衣着时尚的女人们，以至于那些女人都躲到屏风后面来避开他那模棱两可的玩笑，而女裁缝们通常会不满地叫上几句：“哦，尊贵的先生来了。”又或是：“好色之徒！”“妇女杀手！”

更让人讨厌的是科马洛夫斯基的斗牛犬杰克。有时他牵着狗出来，可那只狗会猛的一拉，科马洛夫斯基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跟在狗的身后，好似被导盲的盲人一样。

一个春日，杰克在拉拉的腿上咬了一口，还撕烂了她的长腿袜。

“我要把那只该死的狗宰了。”奥莉娅在拉拉耳边轻声叫着。

“没错，那只狗真的好讨厌，不过你怎么能那样做呢？傻瓜！”

“嘘，别讲这么大声。那些复活节彩蛋你知道吧——就是放在你妈妈梳妆台上的那些……”

“嗯，我知道，那是玻璃和大理石做的。”

“就是那个。你靠过来，我小声跟你说。你把那些彩蛋拿过来，然后涂上一点猪油——那只贪婪的狗肯定会将它们一口吞进嘴里，到时看噎不噎死它。可恶的狗，看我怎么收拾它。”

拉拉听着笑了起来。她有些羡慕奥莉娅，尽管奥莉娅打小过着贫穷的生活，只能替别人干活，但这样的孩子会早熟一些。可她自己，哎，既没有人

宠爱，又这么天真！杰克，彩蛋，哦，她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拉拉在心里想，“难道我的命运就是要在一旁看着，还要将这些事都藏在心里？”

4

“妈妈是他的——该怎么说呢……他是妈妈的……总之是不好的词，我说不出口。可他为什么要那样看我？毕竟，我也是妈妈的女儿呀。”

拉拉才十六岁多一点，但她发育得很好。大家都以为她至少有十八岁了。拉拉很善良，容易与人相处，长得也漂亮。

拉拉跟罗迪亚早已明白，天上是不会掉馅儿饼的，想要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争取。跟其他养尊处优懒散成性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没有工夫当不成熟的好奇宝宝，也不关心那些跟实际生活不相关的问题。拉拉是这世界上最纯洁的姑娘。

这两兄妹明白每件事自有其价值，并且也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你不断努力做到最好，别人

自然不能轻视你。拉拉在学校的成绩很好，这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爱念书，而是因为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有机会拿奖学金。她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还时不时地去制衣店帮工，替她母亲打打下手。拉拉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某种低调的优雅，而她所有的特征——声音、体态、姿势、灰色的眼睛和金黄的头发——都自成一体，相得益彰。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节假日的时候，你总能在床上睡久一点儿。拉拉当时就平躺在床上，双手自然地托在脑后。

制衣店里一片寂静。临街的窗子是打开的。拉拉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车轮的响动，那声音由远至近，又由近拉远。“我要再睡一会儿。”她在心里暗忖。城市的喧哗好似摇篮曲，伴她入眠。

拉拉感觉躺在床上的自己成了两个点——突出

的左肩和右边的大脚趾。其他的东西似乎也和自己融为了一体，灵魂与躯干相融相合，飘向未来。

“我得睡着。”拉拉想。她在脑海中想象科齐马科大街的美好——漂亮精致的马车，玻璃做的灯笼，还有许许多多的毛绒熊。沿着街再往前走，就能看到骑兵在明纳斯基军营表演，他们围成一个圈，时而阔步，时而慢跑，被保姆牵着的孩子们则透过栏杆目不转睛地看着。

拉拉想，再过去一点应该就是派特福卡大街。

“天啊，拉拉，我只不过想带你看看我的公寓。我们住得这么近。”

科马洛夫斯基有个朋友住在科齐马科大街，那天刚好是那个朋友的小女儿的命名日。大人们跳舞喝酒，以示庆祝。科马洛夫斯基邀请了母亲，但母

亲由于身体不适，不能过去。母亲说：“带拉拉去吧。你总是让我照顾好拉拉。那现在也换你照顾一下。”这可真是开玩笑！

宴会在一曲华尔兹中开始。太疯狂了！不停地旋转，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音乐响起的时候，仿佛到了书里描写的天堂世界。可音乐一结束，你就仿佛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或者被人看到你赤身裸体的样子，惊恐不已。当然，你允许别人亲近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显示你的成熟。

拉拉没想到科马洛夫斯基跳舞竟然跳得这样好。他的双手是那么地敏捷，放在腰上时让你感到无比放松和依赖！不过，她再也不会允许别人那样子吻她了。他吻了那么久，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她必须阻止这荒唐的一切。一劳永逸。不再害

羞，假笑，然后垂下双眼——或者这样就能结束灾难。不过两人之间始终拦着一条看不见的线。再往前一步，就会掉入万丈深渊，不能再想那支舞。那是罪恶的根源。她应当勇敢地拒绝，假装从没学过跳舞或者脚断了。

5

那个秋天，莫斯科的铁路工人们变得骚动。莫斯科—喀山线路上的工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罢工，莫斯科—布雷斯特线上的工人也打算加入。罢工的决定已经做出，只是罢工委员会对于罢工的日期还争执不下。铁路上的每个人都知道罢工是迟早的事，只是需要一根导火索。

十月上旬一个寒意森森的早晨，那天也刚好是发工资的日子。出纳部迟迟没有动静，过了许久，一个小伙子拿着张扣了罚款的工资单和一摞工资册走进办公室。出纳员开始按数给钱。人们排着长队，其中有售票员、扳道工、机械工人和他们的助手、仓库的清洁女工等。人群在出纳部的木屋子和带车间、仓库、发动机棚、车轨在内的火车站中间缓缓移动。

空气中洋溢着初冬的气息——凋零的枫叶，融化的雪，引擎留下的烟灰和刚出炉的热黑麦面包[(1)]。一列列火车来来去去。它们不断被分流，之后又聚集，然后又被分开。火车头鸣着汽笛，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吹响号角，扳道工也跟着吹响口哨。轰鸣着的引擎里飘出股股蒸气，为寒冷的冬日增加了一些温度。

部门主管弗莱根和车站督察员菲拉波托维奇·安提波夫在轨道边走来走去。安提波夫正为修铁轨的零件质量烦心。钢的张力不够，铁轨也过不了受压测试，安提波夫担心铁轨碰到结冰的天气会裂开。最糟糕的是，管理层不把他的反映当一回事，肯定是有人在承包合同方面收受了贿赂。

弗莱根身着昂贵的皮毛外套，上面绣有铁路工作人员的标志；他将外套敞开，以展示自己的新

装。弗莱根在路堤上小心翼翼地走着，眼角扫到西服笔挺的翻领，裤子上笔直的褶皱和光可鉴人的皮靴，他内心一阵喜悦。他对安提波夫的话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完全没当一回事。弗莱根有自己的考虑，他不停地掏表出来看，显然是想快点离开。

“没错，你说得对极了，我亲爱的伙计，”他不耐烦地打断安提波夫的话，“可只有在交通特别繁忙的时候，主道才有可能面临那种危险。而在这儿，交通明显不会那么繁忙。你还想怎么样？你一定是疯了！还说什么钢轨，这儿就是用木轨都行得通！”

弗莱根又看了一眼表，盖上表盖，目光投向远方的铁路。路的转弯处出现了一辆马车，那是弗莱根的车，他的妻子过来接他了。车夫将马赶到铁轨

边上，就跟责怪调皮孩子的保姆一样女人似的尖声叫嚷着——他们害怕火车。转角处的马车里坐着一个漂亮女人，她惬意地斜靠在垫子上。

“哦，我的好伙计，我们改天再谈。”部门主管弗莱根对安提波夫挥一挥手，意思是说，“我现在有比铁轨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

之后，弗莱根夫妇驾车扬长而去。

6

约莫过了三四个小时，天也黑了下来。离铁轨有一段距离的田野里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田野里伸手不见五指，这两个人却不住地回头，同时加快脚步往前奔。

“我们再走快点。”提沃兹恩说，“我倒不是担心后面跟着的间谍，可现在这个时间估计会有许多老鼠从地里钻出来。我可受不了那个。你把事情搞成那样子，再设委员会又有什么意义？你自己玩儿火，出事了就找地方躲。你自己是没事，可其他人怎么办呢？”

“我的达莉亚得了斑疹伤寒症，我得带她去医院。完成这件事之前，我没有心思考虑别的。”

“他们说今天会发工资。我待会儿到办公室去

瞧瞧。要是今天工资没发，我就不等你了，我向上帝发誓真的会这样。我要一个人来结束这一切，一秒钟也等不了了。”

“那我倒想问问，你打算怎么做呢？”

“很简单，我摸到锅炉房去，然后吹响哨子。就这么干。”

之后两人道别，分道扬镳。

提沃兹恩穿过铁轨，朝街区走去。路上遇见了不少刚从办公室出来领了工资的人。看上去火车站的所有工人都拿到了工钱。

夜幕已经降临，办公室也亮起了灯。闲散的工人们围在办公室外头的广场上。弗莱根的马车就停在车道上，他的妻子坐在里头，还是之前的那个姿势，好似从早上起她就没动过。她在等弗莱根拿钱

回来。

突然，天上下起了冰雹。车夫连忙从座椅上下来，把皮盖撑起。他用手扶住扶手，一只脚抵住马车的后面，弗莱根夫人则坐在马车里头欣赏被灯光映射得五彩斑斓的冰雹粒子。她的眼睛眨也不眨，定定地望着工人们的头顶，仿佛她的眼神能穿透冰雹或迷雾。

这一切都落在提沃兹恩的眼里。这让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快速从马车前走过，假装没看到弗莱根夫人，并决定晚点再去支工资，以免在办公室里撞见弗莱根先生。提沃兹恩绕到了广场没有光的一边，朝工作间走去；而转车台的黑色影子则呈扇形倒向仓库。

“提沃兹恩！库普力克！”黑暗中突然有几个声音在叫。提沃兹恩听到工作间外头聚集了几个

人，而工作间里头有个人在叫喊，还有一个小男孩儿在哭。

“进去帮帮那个小孩子，库普里安·萨维里维奇。”外头有个女人说。

老领班皮奥拓·库多雷耶夫跟往常一样，捶打着他的年轻徒弟尤苏普卡。

库多雷耶夫以前并不这样折磨徒弟，也并非终日酗酒说胡话。年轻的时候，他也曾辉煌过一段时期，那时莫斯科许多商人和神父的女儿都曾倾心于他。可他却偏偏爱上了玛尔法，玛尔法当时刚从主教管区的教会学校毕业，拒绝了他的求爱并嫁给了他的好友，也就是提沃兹恩的父亲萨瓦里·尼克提奇。

五年后，萨瓦里凄惨死去（他在1888年的一

场火车事故中被烧死），库多雷耶夫再次向玛法·加夫里洛夫纳示爱，但玛法还是拒绝了他。自此，库多雷耶夫终日借酒浇愁，怨天尤人。

尤苏普卡是基马塞特蒂诺维奇的儿子，而基马塞特蒂诺维奇是提沃兹恩所住公寓的守门人。提沃兹恩经常对尤苏普卡出手相助，这更是让库多雷耶夫怀恨在心。

“锉刀是那么拿的吗？你个笨蛋。”库多雷耶夫大声吼着，他揪着尤苏普卡的头发，用拳头连续击打尤苏普卡的后脖颈，“铸件是那么取的吗？你个野蛮人。”

“哎哟，我不会再做错了，先生。哦，我不会再错了，哎哟，好痛！”

“我已经说了一千遍——先调整心轴的位置，

然后拧上螺丝，可你偏偏不这么做！差点把我的轴都弄坏了，你这个浑蛋。”

“我没碰那根轴，真的，我没有。”

“你为什么要虐待这个孩子？”提沃兹恩挤过人群，开口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库多雷耶夫反唇相讥。

“我在问你，你为什么要虐待这个孩子？”

“你也给我听清楚，趁我没找你麻烦前给我滚开，你个多管闲事的。像这种蠢蛋，死了最好，他差点弄断我的轴。我还让他活着，这已经是便宜他了，这个该死的斜眼儿——我不过是揪了下他的耳朵，扯了下他的头发而已。”

“所以，你认为他就该为此而被送上断头台。

像你这样的师傅，真该为自己感到汗颜——都已经一把年纪头发花白了，还这么不会做人。”

“你继续说，说啊，趁我还没把你打得稀巴烂之前。看我待会儿不打得你找不着北，你个狗娘养的。你个软骨头，窝囊废，跟你那没用的爹如出一辙。你母亲我也认识，那是个贱人，是个骚货！”

一分钟的沉默，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一分钟后，两个人都从摆满铁器和工具的车床上顺手抓起一件东西，要不是周围的人冲过来拦着，两个人恐怕就同归于尽了。库多雷耶夫和提沃兹恩低着头，额头几乎要碰到一起，眼睛充血。两个人都愤怒到极点，以至于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的手臂被人从后面反抓住，两个人都试图挣脱，扭动身体，甩开压着他们的人。他们的衣扣被挤掉了，夹克和衬衫脱了开来，露出光膀子。剩下的人则在一

旁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那个凿子！快点拿开那个凿子，他会敲破提沃兹恩脑袋的。冷静点，冷静，皮奥拓，不然我们可就把你手给拧断了！哎哟，这算怎么一回事嘛！把他们两个人拉开，用锁锁上。”

可提沃兹恩突然一使劲，甩开了箍住他手的人，笔直朝门口冲去。众人连忙追过去，不过见他改变了主意，便也随他去了。提沃兹恩出了门，重重关上身后的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夜深露重，他的身后独留秋夜的寒意。“你去帮人，人家却反捅你一刀。”提沃兹恩嗫嚅着，昏昏沉沉地往前走。

这个世界充满了丑陋和欺骗，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敢目不转睛地注视一群男人，而一个醉鬼竟能靠折磨自己的徒弟取乐——提沃兹恩觉得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让人讨厌。他飞快地往前走，仿佛他的

脚步能带他去到那个万物共荣共生，人和人和谐相处的美丽世界。他知道前几日众人的挣扎，铁路线上的麻烦，会议上的演讲和罢工的决定——尽管还未实施，但也没有取消——是通往未来大道的几个步骤。

可是此时此刻，他只想一直往前奔跑，一刻也不要停下。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但他的脚似乎会自己做决定。

许久之后，提沃兹恩才知道在他和安提波夫离开地下室的当晚，罢工委员会就决定开始罢工。委员会商议决定了哪些人去哪里，以及要号召哪些人。当引擎修理铺的哨子吹响时，那声音仿佛是从提沃兹恩的灵魂深处飘出来的，一开始深沉而模糊，之后逐渐变得嘹亮。伴随着哨声，人群从仓库和货场聚拢起来。很快，锅炉房的工人也加入了队

伍，而他们之前在提沃兹恩的指示下已经放下了工具。

多年来，提沃兹恩始终认为当晚是他以一己之力停止了铁路线上的工作和交通。直到许久之后，在他被控罢工同谋的审判席上，他才知道真相。

人们都在问：“大家要走到哪儿去？那个信号是什么意思？”“你们没有聋！”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那是枪声。听着和警报很像。他们想让我们把火扑灭。”

“火在哪里？”

“肯定是起火了，不然不会有这种警报声。”

一扇扇门被敲开，绝大多人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说：“起火？听他胡诌呢！那是罢工的信号，明白了吗？让那些傻瓜忙活去吧。我们

走，伙计们。”

越来越多的人加进了队伍。铁路工人们的罢工开始了。

7

两天后，提沃兹恩蓬头垢面地回家，一看就知道是睡眠不足，并且被冻得不行。因为前一晚上起了霜降，这个时节打霜并不寻常，而提沃兹恩身上的衣服很单薄。守门人基马赛特迪恩刚好在大门口碰见他。

“谢谢您，提沃兹恩先生。”基马赛特迪恩用不标准的俄语不迭地说，“您保护尤苏普卡不受伤害，我会永远为您祈祷。”

“你疯了，基马赛特迪恩，你在叫谁‘先生’呢？赶紧别这么叫了，想说什么就快说，没瞧见外面冷成什么样了吗？”

“您怎么会这么冷？哦，库普里安·萨维里维奇先生，您很快就会暖和起来的。我和您的妈妈玛尔

法昨天从火车站给您带来了许多烧火用的木头——全都是桦木——上好的干木，用来烧火再好不过了。”

“感谢，基马赛特迪恩。还有其他事吗？赶紧说。我要被冻僵了。”

“我想跟您说，今晚最好不要在家里过夜，萨维里维奇。您得躲起来。警察之前来打听过谁到您家里来过。我说没人来，我说除了铁路上工作的同事没有陌生人来过。”

提沃兹恩还未结婚，跟他母亲和已经结婚的弟弟住在一块儿。他们住的房子属于临近的一个教堂。里头还住着几个神父和两个街头小贩——一个是卖猪肉的，还有一个是卖杂货的——不过绝大多数住户都在莫斯科—布雷斯特铁路线上工作。

那是一栋石头砌的房子。一条木板路横过满地垃圾和高低不平的院子。房子外面落满灰尘，放置着几架滑楼梯，还有几只臭气熏天的猫和一片卷心菜地。上头就是私人住处和上了锁的储存室。

提沃兹恩的弟弟曾应征入伍，不幸在瓦方口战役中受伤。如今他在克拉斯诺雅斯科的军区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已经去医院接他了（提沃兹恩家祖祖辈辈都在铁路上工作，足迹踏遍俄国的每一寸土地）。公寓里头静悄悄的，当前只有提沃兹恩和他的母亲在里头住。

提沃兹恩家住在二楼。阳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水桶，里头通常都是装满水的。提沃兹恩一回来就注意到水桶的盖子被掀开了，结了冰的水面上赫然放着一个锡杯。“肯定是普洛夫来了。”他想，不由咧嘴一笑。“瞧他喝水的这个架势，肯定是胃里

着火了。”普洛夫·艾梵阿斯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专门为教堂创作赞美诗的作者，也是提沃兹恩母亲这边的亲戚。

提沃兹恩将马克杯从冰面上拉出来，并随即拉响了门铃。他感觉到厨房里飘过来一阵暖气，混着让人食指大动的食物香味儿。

“你肯定烧了一堆好火，妈妈。家里好暖和。”

提沃兹恩的母亲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泣不成声。提沃兹恩轻抚母亲的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将母亲轻轻推开。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妈妈。”他轻声说，“莫斯科到华沙那条线已经开始罢工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他们肯定会来抓你

的，库普里安，你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妈妈，你的那个好朋友皮奥拓差点打破我的头！”他本想逗母亲开心一下，可母亲却一本正经地说：“库普里安，嘲笑他是不对的。你应该同情他，那个可怜的人，那个醉鬼。”

“安提波夫已经被抓了。警察是晚上去的，将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今天早上便把他带走了。他的妻子达莉亚现在还因为伤寒在医院里住着，家里现在只剩他们的儿子帕沙和聋哑的姑姑。而他们还将被驱逐。我想我们应该把那个孩子接过来——普洛夫来是为何事？”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

“我看到水桶盖被掀开了，结冰的水面上还有一个大马克杯——我想，那肯定是爱喝水的普洛夫

来了。”

“库普里安，你的观察力还真敏锐。没错，他在这儿。普洛夫——普洛夫·艾梵阿斯耶维奇过来跟我们借点圆木，我给了他一些。哦，我在说什么，真是头脑不清醒了。知道吗，普洛夫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他说沙皇已经签署了宣言，我们的生活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人都将得到公正的对待，农民将会有自己的土地，我们将和那些贵族人士平等相处！他说宣言确实已经签下了，只是还没公开发布而已。教会法院要求在教堂礼拜中加个东西，好像是感恩祈祷什么的。他跟我说得很清楚，不过我现在有点忘了。”

8

帕沙·安提波夫的父亲被当作罢工组织者之一给抓起来了，不得不寄住在提沃兹恩家里。帕沙是个爱干净的小孩儿，模样普通，一头红色的头发从中间梳开——他总是用梳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总是会把外衣扯得笔挺，腰带也扣得整整齐齐。帕沙很有幽默感，并且有着不同寻常的观察力，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听到和看到的所有人和事。

10月17日宣言发表之后，几个革命组织号召进行更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从提沃大门——直绵延到位于城市另一头的卡鲁瓜大门。人多尽管势众，但也容易出问题。组织者内部起了争吵，之后便有人接二连三地退出了队伍。后来听说队伍还是在指定的时间集结，组织者便急忙派代表去领导游行。

尽管提沃兹恩百般阻拦，但他的母亲决意要参

加游行，还带上帕沙跟她一起去。

那是一个干冷的十一月早晨，天空中满是阴霾，几片雪花纷扬落下。他们缓慢地转着，就跟飘扬的灰尘一样，迟疑着要不要踏上大道。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街道——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厚重的冬大衣和瓜皮帽，男女老少纷纷聚集。其中有学生，也有穿着制服的铁路工人，有仓库工人，也有穿着及膝长靴和皮夹克的电报员。

人群齐声大唱《马赛曲》《华沙曲》和《受难者》等曲子。突然一个走在队伍前头的男人开始朝后退着走，他一边唱一边把帽子当指挥棒进行指挥，之后又掉过头把帽子戴上，凝神细听周围其他领导者的话。歌声被打断了。只剩下无数人踏过冰道的脚步声。

领导者收到消息，说哥萨克人就在不远处埋伏，等着破坏他们的游行。警告是由电报发过来的。

“现在怎么办？”组织者说，“我们得保持冷静，一定不能自乱阵脚，这点至关重要。待会儿一看到公共建筑我们就去占领，给大家提个醒，同时也可以疏散群众。”

可是大家就占领哪栋建筑又吵了起来。有人提议说工商协会大楼，也有人说占领技术学院最好，还有人认为外交学院是最佳选择。

就在他们还争执不下的时候，队伍走到了一栋学校建筑的拐角。这栋建筑刚好能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

走到入口处，领导者转到一边，爬上半圆形礼

堂的台阶，示意队伍领头人停下。学校的大门被推开了，队伍一拥而入，纷纷爬上阶梯。

“礼堂，去礼堂。”后排传出几个声音，但人群置若罔闻，还是拼命往前面挤，占领过道和教室。当领导者最后终于将众人聚拢到礼堂时，他们好几次都尝试警告众人前头有敌人埋伏，但没有人理会他们。停下前进的步伐闯入建筑，这无疑是混乱的开始。

走累了也唱累了的人很高兴能在一个地方安静地休息会儿，看其他人忙活，并冲他们大喊大叫。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也不再管各自观点的不同，只求在关键的点上取得表面上的一致。到最后，最糟糕的演讲人反倒得到了最多的掌声。人们不加分辨地支持他所有的观点，不管他说什么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失去耐心的众人只想用这种方式来获

得某种成就感。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开始有人大喊“可耻”，有人还拟好了抗议的词。人群突然又对演讲者故意拖长的声音产生了莫名的厌倦，他们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走下阶梯，走到街上。游行继续。

集会仍在继续，天突然飘起了大雪。没过一会儿，街上就成了冰雪的世界。雪越下越大，越积越厚。

龙骑兵[(2)]过来时，一开始走在后排的人完全没发觉。过了一会儿，队伍才发现异样。人们大喊“乌啦！”也有人喊“救命！”“杀人啦！”但这些声音都淹没在一片喧嚣中。人群一呼而散，狭窄的过道顿时挤满了人，而龙骑兵则驾着高头大马迅速而沉默地驰来。

一个排的骑兵奔了过来，切断游行队伍的后

路。大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后，主街道几乎空无一人。人们都四散跑进了小道。雪渐渐小了，午后的天气仿佛木炭条一样干。之后连太阳都出来了，沉在房屋的后面，如同一根手指指着街上鲜红的一切——骑兵队员的鲜红帽子，散落一地的红旗，雪地上鲜红的血迹。

一个头被打破的男人呻吟着往旁边挪移。此时，从街道那头又过来一队龙骑兵，队伍整齐而有序。玛尔法·提沃兹恩差点就摔倒在马蹄脚下，她的披肩散在背上。玛尔法也顾不得这许多，她只是发了疯一样地边跑边喊：“帕沙！帕沙！”

帕沙之前一直同她在一块儿，模仿集会上最后一个演讲者的神情逗她开心。可龙骑兵过来时，人群一乱，帕沙就被挤得不见了踪影。

玛尔法感觉背上突然挨了一棍，尽管她穿的衣服很厚不怎么痛，但她还是对那骑在马上的人挥动拳头。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些骑兵竟然敢当众殴打像她这么老的老人。

玛尔法焦急地寻找着，还算幸运，她终于在街的对面看到了帕沙。那个孩子站在一个杂货铺和一栋私人建筑的中间，一个骑兵过去，将路过的人都吓得退到了一边。骑兵被众人的惊恐逗乐了，他得意扬扬地让自己的马表演马步，并退到人群中间，慢悠悠地转动身子。突然他看到其他骑兵又骑马回来了，便策马向前，跟了上去。

人群立刻作鸟兽散，而帕沙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他只是快速跑到玛尔法身边。

老玛尔法一路上都在嘟囔：“该死的杀人犯！人们都为沙皇给的自由而高兴，可这些该死的凶手

却偏偏不让我们好过。他们非得毁了所有东西才甘心。”

“那些笨蛋究竟想怎么样？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己，所以才这么胡作非为。亲爱的帕沙，为我表演一下那个人是怎么演讲的，表演给我看——哦，亲爱的，笑死我了。你真是模仿得太像了。嗡嗡，嗡嗡——真像只叫个不停的大黄蜂。”

回到家，玛尔法开始责骂自己的儿子。像她这种年纪的人，难道还要让一个骑在马上的卷毛臭小子从后面打吗？

“哦，妈妈，你以为我是谁？难道你以为我是哥萨克队长或警察局局长吗？”

9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透过窗子看到了四散奔逃的游行民众。他知道那是些什么人，只是担心尤拉是否在其中。不过他没有看到认识的朋友，尽管有个小伙子看着很像杜多罗夫家的小孩儿——他不太记得名字了——就是那个最近从肩上取出一颗子弹的亡命之徒，现在又在这儿晃荡。

当年秋天，尼古拉伊抵达彼得堡。他在莫斯科没有固定住处，又不想住旅馆，所以就寄宿在一个远亲斯维提斯凯家里。斯维提斯凯安排了二楼角落处的一间房给尼古拉伊住。

斯维提斯凯夫妇膝下没有子女，两层楼的房子对他们而言显得有些大了。房子是他们已过世的父母从多尔戈鲁奇公爵那儿租下来的，周围的建筑物风格不一，旁边围着三个院子和一个花园。那都是

多尔戈鲁奇公爵的财产，由三条窄道隔开，古时候被称作“面粉城”。尽管开了四个窗户，但书房里还是黑漆漆的。房间里堆满了书、文件、地毯和印刷品。屋角有一个小阳台，围出一片半圆形的空间。阳台的双层玻璃门能完全阻隔冬日的寒冷气息。

阳台门和两扇窗户刚好对着一条通往远方的巷子，巷子还隔出了一条雪橇道，周围是房屋和栅栏不规则的边界。

园子里反射出紫色的光，映进房间里头。树枝被冰雹压得低下了头，好似一捆捆上了蜡的烟熏肉。树枝一直往下垂，好似想把身上的重担卸到地上一样。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沉默地注视远方。他想起了去年在彼得堡渡过的冬天——加蓬[(3)]、高尔

基、对维特总理的拜访，还有许多走在时代潮流前端的现代作家。他从混乱中挣脱出来，本想去到那个古老而宁静的地方写作，写下在脑海萦绕不去的所有东西。未曾想，刚出刀山，又跳进了火海。他得每天开讲座——女子大学课程，宗教哲学社团，红十字和罢工基金委员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只想离开，去瑞士寻一方净土，去到某个远离尘世的森林，感受湖水、山峰和天空的宁静，聆听空气的回响。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离开窗边。他好想走出去拜访谁，或者就在街上走走也是好的。可他又想起，一个名为瓦沃洛车诺夫的信仰托尔斯泰的人待会儿要为什么事情来找他。尼古拉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绪突然转到了外甥身上。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从伏尔加河沿岸辗转到

了彼得堡，但把尤拉留在了莫斯科，毕竟莫斯科还有许多亲戚——韦德尼亚皮恩家族，奥斯托米斯莱恩斯基家族，塞利韦恩斯家族，斯维提斯凯家族，还有格罗梅科家族。一开始尤拉被寄放在老奥斯托米斯莱恩斯基家，亲戚们都称其为费德卡。费德卡总是把自己看作已有秩序的破坏者和激进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并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亲戚，甚至还把尤拉的生活费占为己有。不得已尤拉只好转到格罗梅科家住，现在仍住在那儿。

格罗梅科家的气氛应该会好很多，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想。格罗梅科家的女儿冬妮娅跟尤拉差不多年纪，并且既是尤拉朋友又是同班同学的米沙·戈登也住在那儿。

“三个孩子在一起肯定好玩儿。”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暗想。三个人都为《爱的意义》和《克

莱采奏鸣曲》而着迷，并且对基督教义有着无限狂热。青春期孩子有这样一种对纯洁事物的狂热也是无可厚非，不过他们有点太过了，几乎是不加节制地疯狂推崇。

多么天真啊！出于某些原因，他们把令其困扰不已的情欲问题称为“低俗下流”，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用。这个词太不恰当了！“低俗下流”曾用来形容人的本能、色情描写、女人的索取，甚至是整个物质世界。当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定会羞得满面通红或脸色惨白。

“要是我在莫斯科，”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想，“我肯定不会让事情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含蓄是必要的，不过在某些界限之内……啊，尼尔·菲奥科提斯托维奇，进来！”尼古拉伊叫道，走上前去迎接客人。

10

一个穿灰色衣服的胖男人走了进来，对方腰间扎一根宽皮带，脚蹬毡靴，裤袋开到了膝上。这个人看着挺忠厚，不过有点糊涂的样子。他戴了一副夹鼻眼镜，黑色的眼镜带在鼻子左右剧烈晃动。这个男人的大衣在大厅就已经脱掉了，不过围巾还是系着的，手里抓着自己的圆顶毡帽。所以，他也就不好跟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握手，甚至连说句“你好吗”都有些困难。

“嗯——那个——”男人无助地嘤咛着，在房间里左顾右盼。

“东西随便放到哪儿都行。”尼古拉伊说，他似乎重拾了之前做演讲时的力量和沉着。

这个男人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追随者之一，托尔

斯泰是个不知疲倦的人，而在托尔斯泰主义的发展却遇到了瓶颈。他是来邀请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到一个集会上做演讲的，集会暂定在学校举行，是为了帮助一些被驱逐出境的人。

“我已经到那个学校演讲过了。”

“为了帮助我们的被驱逐者？”

“是的。”

“那还是麻烦您再演讲一次吧。”

尼古拉伊推辞了一会儿，不过最后还是让步了。

既然正事已经商妥，尼古拉伊也无心再留客人久待。尼尔·菲奥科提斯托维奇本可以即刻走的，但他显然觉得这样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就没话找话地

打了一阵哈哈。谈话变得很是尴尬。

“所以你已经成了一个颓废者？信奉神秘主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可真是浪费了。你还记得县委员会吗？”

“当然。我们不是还一起给它拉过票吗？”

“我们还为乡村学校和教师大学做了不少抗争工作，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那可真是一场辉煌的斗争。”

“后来你的兴趣转移到了公共健康卫生和社会福利上面，对吗？”

“有段时间是那样。”

“嗯。现在其实还是这些事情，不管什么人都叫嚣着‘让我们成为太阳吧’。我简直无法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幽默又博学，竟然……我的话是否冒犯到你了？”

“怎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是在争论什么？你都没弄明白我的观点。”

“俄国需要学校和医院，而不是农牧神或传说中的神仙。”

“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农民正在挨饿受冻……”

谈话不断延伸。尼古拉伊知道这种争论没有用，但他还是试图跟象征学派的作家解释自己的观点。过了一会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的支持者说：“有一点我跟你的观点一致，但托尔斯泰说一

个人对美的追求越多，他就离善越远……”

“你觉得不是这样的，应该反过来，是不？世界将被美拯救，对吗？陀思妥耶夫斯基[(4)]，罗曼诺夫[(5)]，神秘派戏剧，还是别的什么？”

“等等，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人心里睡着的野兽能被某种威胁束缚住——任何一种威胁，无论是进监狱还是死后受惩罚——那么人性的最高象征就是马戏团拿着鞭子的驯狮员，而不是为人间大义牺牲自己的先知们。可你难道不明白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千百年来人之所以能凌驾于动物之上，并不是因为人能使用武力，而是因为内心的音乐——那是真理无法抵抗的力量，是追求真理的人散发出来的永恒魅力。人们总以为福音中最重要的是道德格言和告诫，可我认为基督耶稣说的最重要的话来自生活，是耶稣用日常现实解释真

理的话。其中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永恒的，并且生活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拥有意义。”

“你说的话我不明白。你最好还是就此写本书出来吧！”

瓦沃洛车诺夫离开之后，尼古拉伊觉得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他在生自己的气，因为他竟然跟那样一个傻瓜说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并且还被对方嗤之以鼻。不过有时候他的恼怒会突然改变对象，这次也是一样。尼古拉伊想起了另一件事。

尼古拉伊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过一年中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在厚厚的笔记本上记录下脑海里突然蹦出的想法。于是，尼古拉伊拿出笔记本，在上面龙飞凤舞起来。他写下了这些话：

“那个愚蠢的叫舒拉·史勒辛格的女人让我郁闷了一整天。她一大早就来了，一直待到中午，对着我说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废话——某个象征主义者的剧本——又或者某个作曲家的交响乐——而且讲得唾沫横飞，激情澎湃。我的耐心都要被她耗尽了，最后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了，便请求她停下。

“突然间我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我明白这个东西为何会如此死气沉沉，为何会错得如此离谱，即便它出现在《浮士德》中。因为整件事都是捏造出来的，没有人真正对它感兴趣。现代人已经不需要它。当一个人为宇宙的神奇而倾倒，他就会转投物理学的怀抱，而不是赫西奥德——希腊诗人的六步格诗。

“不仅形式是个错误，这些所谓的精神或思想跟科学揭示出的世界更是不吻合。事实是，这种艺

术完全是出于适应精神、本质和当代艺术推动力的需要。

“这些宇宙进化论在古老世界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因为那是一个大自然还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世界。那时的地球还有猛犸在行走，人们还清晰记得恐龙和鳄鱼。大自然看着稀松平常，却又紧紧抓住你的心，钳住你的脖子，让你觉得这世间或许真的存在上帝。那是人类纪年史的第一篇章，可那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古老世界终究还是结束于罗马时代，因为人口实在太多了。

“罗马充斥着舶来的上帝和被征服的人，好似一个跳蚤市场。天堂和地狱仿佛是这市场的两层，无数的人在其中上蹿下跳。比如，达契亚人——生活在今罗马尼亚中北部和西部的人和鲁里亚人、塞

西亚人、萨尔马提亚人——古时生活在东欧地区欧维斯杜拉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人，还有住在极北地区的人。再如，没有辐条的沉重车轮，被肥肉掩住的双眼，双下巴，无知愚昧的国王，以受过教育的奴隶为食的鱼等。自开天辟地以来，这世界从未有过那么多的人，可所有人都挤在竞技场的过道里，无助又绝望。

“后来，上帝耶稣来到了人间，来到了那充斥金子和大理石却了无生气的地方。光环在他的头顶闪烁，香气将他围绕，他特意强调自己是普通人，并故意装得粗俗，那一刻所有上帝和民族都不再存在，只剩下了人——做木工的人，锄地的人，日落牧羊而归的人，最平凡普通的人，世界上所有写进摇篮曲被歌颂和画进画中被赞美的人。”

11

佩特罗夫卡位于彼得堡的一角，对称的房屋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房子大门口多见雅致雕刻。城中有书店、图书馆、制图室、典雅的香烟店，还有上好的饭店，饭店前门的两侧放着两盏煤气灯，在支柱的寒冷阴影里氤氲。

冬日的街道总带有某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肃穆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内心坚定，自尊自爱，从事各种自由职业。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洛夫斯基就是在这个地方租了一幢三层楼的豪华公寓，走过一段带精致橡木扶杆的宽阔阶梯路就到了。维克托的女管家，或者说孤单日子里和他做伴解闷的人，艾玛·俄奈斯托夫娜能在不打扰他私人生活的前提下料理好所有的事情。艾玛的手脚很轻，尽管她要料理整个

房子的事，却不易让人察觉她的存在。艾玛终身未婚，但维克托对艾玛始终以礼相待，并且不允许任何人的到访打扰到艾玛平静的生活。家里始终为一种修道院似的寂静所环绕，百叶帘从未被拉开过，所有东西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一间陈列室。

星期天的早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带着自己的猎犬和往常一样沿着佩特罗夫卡大街和库兹内特斯基大街散步，在街的转角处恰巧碰上了演员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迪。康斯坦丁嗜赌成性，之后两人便一起走。

他们沿着库兹内特斯基大道往前走，一路上讲着各种下流故事，对某些事表示共同的嗤之以鼻，或者是不顾形象地大笑。空气里回荡着他们的说话声和笑声，而这声音并不会比一只狗的叫声更重要。

12

天气逐渐好转，水滴在水管上和屋檐上跳舞，从这个屋顶滴落到那个屋顶，一派万物复苏的春天景象。冬天结下的冰开始解冻了。

拉拉在一片雾霭中摸索前行，走到家，她才完全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所有人都在睡梦中。拉拉神情恍惚地在母亲的制衣台前坐下，脸色苍白，蕾丝缀边的裙子和从作坊特意借来的长纱巾看着好似一套戏服。拉拉定定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又什么都没看见。发了一会儿呆，她叠起双臂压在台子上，把头埋进双臂之间。

要是母亲知晓了，一定会杀了她的。母亲会先把她杀了，然后再自我了断。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可现在想这些已经太晚了，她早该想到的。

现在她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她俨然就是一个法国小说里的女人，而明天她还要去上学，跟其他那些小女孩儿坐在一起。哦，天啊，天啊，怎么会这样呢？

等许多年后，如果可能的话，拉拉会把这一切告诉奥莉娅·德米纳，奥莉娅肯定会哭着抱住她的。

水滴仍敲打着窗沿，冰雪不断融化。路的那头，有一个男人正拍着邻居家的门。拉拉并没有抬起头，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她哭了。

13

“啊，艾玛·俄奈斯托夫娜，那不重要。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科马洛夫斯基不断地拉开又合上抽屉，翻箱倒柜，将护腕和衣领扔到地毯和沙发上，可是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他需要她，极其地需要，可那个星期天他却没有办法见到她。他就跟被关进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狂乱地走来走去。

这世间再没有什么能与她那美丽的心灵媲美。她的双手闪烁着崇高理想的光芒，映在酒店墙上的影子看得出天真纯洁的轮廓。剪裁得体的衣服将她的胸部完美展现，使得那原本普通的布料也跟高级的亚麻布一样吸引目光。

科马洛夫斯基用手指敲击着窗檐，应和着大道

上传来的马蹄声。

“拉拉。”他低声唤了一句，不由得闭上了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拉拉将头放到他双掌间的情景。拉拉双眼紧闭，她睡着了，丝毫没有察觉他已经盯着她的睡脸看了四个小时。拉拉的头发自然地散开，美丽不可方物，好似轻烟一样缠绕他的心。

科马洛夫斯基想出去散心，可惜于事无补。跟杰克还没走几步，他就停住了，想起了库兹内特斯基大街，想起了萨塔尼迪的玩笑，以及他在大街上碰到的熟人们——不，他受不了了。科马洛夫斯基快速掉转头，受惊的猎犬则是不满地仰起头，不情不愿地跟在他身后。

“这是怎么了？”科马洛夫斯基在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如此着迷？是良心发现，怜悯同情，抑或后悔？又或者只是因为担心她？不，自己

明明知道她现在在家很安全。可为什么就是不能将她从脑海里拂去呢？”

科马洛夫斯基沿着原路往回走，他拖着步子上了阶梯，走过第一个露台。窗户上的彩色玻璃在他的脚边映下一块块彩色的光影，第二层的阶梯上了一半，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不能屈服于这种让人不安让人筋疲力尽的心情。毕竟，他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他得认真想清楚，要是对这个小女孩儿——一个孩子，已故好友的女儿——要是对她的宠溺变成了一种迷恋，那会发生什么？他得保持理智。他得对自己诚实，坚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否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科马洛夫斯基的手不自觉地抓着橡木栏杆，直到一阵痛感自掌间袭来。他闭上眼睛，然后坚决地掉转头，拾级而下。猎犬还在露台的彩色光影间等

他。它仰着头，好似一个流着口水的小老头儿，崇拜地望着他。

猎犬讨厌那个女孩儿，它撕烂了她的长筒袜，并且对着她龇牙咧嘴。它嫉妒她，似乎是害怕女孩会让他的主人沾惹上某种人类常有的感情。

“啊，我明白了！你决定还像往日一样——萨塔尼迪，不厚道的小诡计，下流笑话？好的，带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可科马洛夫斯基却用手杖抽了猎犬一棍，还对着它踢了一脚。杰克哀嚎一声，不住地吠起来，然后一拐一拐地下了楼梯，用脚掌抓门以向艾玛·俄奈斯托夫娜告状。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

14

真是让人无法抵挡的魅力。如果科马洛夫斯基闯入拉拉的生活，只是让她感觉厌恶，那她肯定会反抗并且挣脱出来。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对拉拉而言，那样一个头发即将变白的英俊男人，一个年纪大得足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一个走到哪儿都有掌声并登在报纸上的男人，如果愿意在她身上花费时间和金钱，愿意带她去看音乐会和戏剧，并对她说他崇拜她，或者像别人所说的“充实她的内心”，她其实会觉得很高兴。

毕竟，现在的她仍只是一个穿棕色校服的姑娘，喜欢学校里不伤大雅的恶作剧和玩笑。科马洛夫斯基当着马车夫或剧院里成百上千的人跟她调情，让她觉得既羞愧又兴奋，甚至唤醒了她身体里某种恶魔般的东西，让她想去效仿去回应。

可这种小女孩儿的坏和迷恋并不能长久。她心里更多的是沮丧和惊慌。这一段时间她拼命地想睡着——因为——她告诉自己，她晚上没有足够的睡眠，因为她哭得太多了，因为她经常头痛，因为她在学校读书很用功，因为她已经身心俱疲。

15

科马洛夫斯基就是她的噩梦，她讨厌他。每一天，拉拉都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

拉拉成了他的奴隶。他是怎样征服她的？他如何能强迫她服从，为什么她会妥协？为什么她要满足他的愿望，并不顾羞耻地讨他欢心？因为他比自己年长，因为母亲在经济问题上完全仰仗于他，因为他的聪明睿智唬住了自己，拉拉，是吗？不，不，不是的！根本不是这样。

她是真的喜欢上他了。难道她看不出他有多需要她吗？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她问心无愧。该感到羞耻的是他，该恐惧的也应该是他。可她不会这么做。因为她太过善良，做不出这种残忍的事——而科马洛夫斯基的主要资产就来自对弱者的巧取豪夺。

这正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生活才如此让人恐惧。让一个人崩溃的是电闪雷鸣吗？不，让人崩溃的是别人暧昧的眼神和背后的闲言碎语。模棱两可的话，当面一套背面一套。把任何一团丝线单拎出来，都跟蛛网一样脆弱，可你试试把自己单拉出来吧，那只会让你被捆得更紧。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坚强的人往往是被弱者和卑鄙者所主宰。

16

要是她结婚了，会怎么样呢？拉拉问自己，要是结婚了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拉拉开始诡辩，不过她仍时不时地会感到一种让人绝望的痛苦。

他对她俯首称臣，拜倒在她的脚下，他如何能不感到羞耻呢？“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想想我对你做的事情！总有一天你会被千夫所指的。我们必须要告诉你的母亲。我要娶你。”科马洛夫斯基在她面前哭，坚持要这么做，好似她一直在抗拒似的。可这些只不过是口头上的话，拉拉对那些悲剧而空洞的异议甚至是置若罔闻。

科马洛夫斯基还是带着她去饭店的包厢里用晚餐，而当她走进去的时候，侍者和其他客人的目光仿佛能把她的衣服扒光。拉拉只是想：

“人总是要羞辱他们所爱的人吗？”

拉拉曾做过一个梦。她梦见自己被埋进了土里，除了自己的左肩和右脚外什么都没剩下。一丛青草从她的左胸上长出来，而土地之上的人们在唱“黑溜溜的眼睛哟，白花花的胸”还有“玛莎不应该去河边”。

17

拉拉并不是宗教信徒。她不相信宗教仪式。可有时候为了应对生活，她确实需要内心音乐的陪伴。她不能一直独自创作这样的音乐。上帝的箴言便是音乐，当去教堂的时候，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哭泣。

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拉拉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教堂祈祷，她感觉世界随时会在脚边崩塌，教堂拱形的天花板随时可能凹陷。那样也好，一了百了。拉拉只是后悔自己把爱唠叨的奥莉娅·德米纳也带在了身边。

“普洛夫·艾梵阿斯耶维奇在那边。”奥莉娅轻声说道。

“嘘，别说话。什么普洛夫·艾梵阿斯耶维

奇？”

“普洛夫·艾梵阿斯耶维奇·索科洛夫。就是在唱赞美诗的那个人。他是我们的表亲，不过搬了两次家。”

“哦，就是那个专门写赞美诗的人。提沃兹恩的亲戚。嘘，安静。别打扰我，求你了。”

她们走在祈祷队伍的最前面，唱着：“上帝保佑：所有都在我的内心，以上帝之名。”

教堂是半空着的，里头的任何声响都会有空灵的回声。只有在教堂的最前头，一大群朝圣者站得很靠拢。教堂是新建的，窗户里嵌着的玻璃并不能给外头灰白且繁忙的积雪街道增添任何一抹颜色，更不用说对街上穿行的人们有任何实际好处。站在窗子边的看守人对礼拜仪式并不感兴趣，他大声责

备一个又聋又哑的傻子乞丐，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就跟静止的窗户和街道一样。

与此同时，拉拉紧紧攥着手中的硬币，蹑手蹑脚地穿过做礼拜的人群，朝门口走去。她买了两根蜡烛，一根给奥莉娅，一根给她自己。普洛夫·艾梵阿斯耶维奇快速说完了九段福音，显然大家对这些话都很熟悉，无须过多解释。

愿上帝保佑那些精神贫乏的人……愿上帝保佑忧伤痛苦的人……愿上帝保佑挨饿受冻的人……

拉拉被惊着了，她愣在原地。这说的不就是她吗？艾梵阿斯耶维奇又说——愿那些受蹂躏的人幸福安康。他们心中藏了许多事，他们还有机会改变。这就是上帝的所想。这就是耶稣的判决。

18

其时正逢波斯动乱。古伊沙尔的房子刚好位于动乱地区。提沃尔大街上，一个路障就设在离她的房子几码远的地方。当地居民从院子里提了一桶又一桶的水来拌和水泥，还用冰块擦洗铁板。

相邻的院子被工人队伍当成了集结地，一个介于红十字场所和流动厨房之间的地方。

拉拉认识其中的两个男孩子。一个是尼卡·杜多罗夫——娜迪亚的朋友——娜迪亚在学校里跟她玩得很好。尼卡骄傲，耿直且沉默寡言。他的性格跟拉拉差不多，所以对她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另一个是帕沙·安提波夫，一个体育学校的学生，跟奥莉娅·德米纳的外祖母提沃兹娜老夫人住在一块儿。拉拉知道，帕沙第一次在提沃兹恩家看到

她时就心动了。他是一个简单纯朴的人，毫不掩饰见到她的快乐，仿佛她就是夏日的风景——桦树，草地，流云。并且，他能够自如地表达对她的热情，丝毫不用担心会受到他人讪笑。

拉拉意识到帕沙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后便开始有意无意地利用帕沙的这种感情。不过，这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并且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深了许多。拉拉很看重帕沙那种可塑性强又平易近人的性格。而帕沙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拉拉，矢志不渝。

两个男孩儿参加的是最残酷的成人游戏——战争。并且，参加这场战争很可能会面临被放逐或被处以绞刑的惩罚。他们还戴着羊皮帽，这表明他们还是孩子，还有父母的照顾。拉拉看他们就跟成年人看小孩子一样。他们危险的玩笑带有一种无知的

以为，他们与一切相连——夜晚，因积得太厚而泛黑的白霜，院子里的蓝色阴影，对面街道男孩子们藏身的房子，最重要的是，不断传出的枪声。“他们在交火。”拉拉想。拉拉不仅是这么想尼卡和帕沙的，她对整座交战的城市都是这种想法。“很好，勇敢的小伙子们。”她想，“他们之所以开枪，是因为他们良善且勇敢。”

19

他们知道，路障很可能会被摧毁，他们所在的房子也危在旦夕。现在再去想跟朋友去到莫斯科的其他地方已经太迟了，集结地已经被包围了。他们必须要在附近寻找新的避难所。于是，他们想到了蒙特尼格鲁旅馆。

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蒙特尼格鲁旅馆的人。整间旅馆都住满了。还有很多的人面临同样的窘境。旅馆老板看在旧日交情上，最后答应让他们在被褥保管室暂避风头。

他们担心提着箱子会引人注目，于是将日常必备物品收进三个包袱，开始了奔波之路。

制衣店的裁缝平时都像家人一般相处，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受罢工运动多大的影响，而是继续工

作。可一个寒冷阴沉的午后，有人按响了门铃。来人声称要见老板。费提索瓦不想麻烦古伊沙尔夫人，便自己去迎客。过了一会儿，她把女裁缝都叫到大厅里头，并一一介绍给来人认识。来人情绪激昂，手舞足蹈地说了一大通话，然后才离开，显然他是跟费提索瓦达成了某种协议。

女裁缝们回到工作间，纷纷开始往身上裹披肩，并穿上破旧的冬大衣。

“发生什么事了？”古伊沙尔夫人匆忙走进来，问道。

“夫人，有人叫我们参加罢工。”

“可是……难道我亏待了你们吗？”古伊沙尔夫人急得直掉眼泪。

“您别生气，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夫人。我们

并不是针对您，相反对您还充满感激之情。可这并不只是关乎您和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全世界都在这么做。您总不能和所有人作对，对吧？”

说完，工人们便全都走了，就连奥莉娅·德米纳和费提索瓦也走了。费提索瓦临走时轻声跟古伊沙尔夫人说，她同意参加罢工其实是为了主人家和制衣店好。可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对此仍是无法释怀，伤心欲绝。

“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算我看错了她们！我的好心都算肉包子打狗了！哦，奥莉娅还算是个孩子不懂事，可费提索瓦那个老妖婆呢！”

“母亲，他们不可能为您一个人搞特殊的，难道您还不明白吗？”拉拉试图安慰母亲，“您不应该这样怨恨她们，相反，她们这么做正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是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

子的利益。是的，千真万确。您就别半信半疑地摇脑袋了。总有一天您会明白，将来我们都会因这罢工而受益。”

可古伊沙尔夫人还是无法理解。“总是这样，”她抽泣着说，“每当我想不通的时候，你就跑过来说些奇谈怪论。那些人摆了我一道，可你却说那是为了我好。不，我一定是疯了。”

罗迪亚当时还在上学。拉拉和母亲神情恍惚地在空房子里走着。漆黑的街道直直地看着房间，而房间也以直视作为回应。

“我们先回旅馆吧，母亲，趁着天还没黑。”拉拉请求道，“走吧，妈妈。别多想了，我们现在就走。”

“费莱特，费莱特！”她们大声叫守门人过

来，“拉我们到蒙特尼格鲁旅馆去，好孩子。”

“没问题，女士。”

“把那些包袱拿过来。费莱特，你得帮我们看着屋子，直到局势稳定下来。别忘了给克里尔·莫德斯托维奇喂植物种子，还要给它换水。另外，屋里的东西都要锁好。我想，暂时要交待的就这些了。对了，要跟我们保持联系。”

“没问题，女士。”

“谢谢你，费莱特。上帝与你同在。哦，我们坐一会儿然后就得出发了[(6)]。”

走出房门，一切都让她们感觉陌生，仿佛是久病的人第一次走出房门。周围一片喧嚣，仿佛是车床的轰鸣声穿过清冽的天空直扑而来。枪声、打杂声、脚步声不绝于耳。

不管费莱特怎么说，拉拉和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还是坚持认为放的是空枪。

“别傻了，费莱特。想想吧，你都看不到人开枪，那除了放空枪还能有什么呢？你认为谁在开枪？是魔鬼还是什么？显然那是空枪。”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们被一队狞笑的哥萨克士兵拦下了。士兵粗鲁地搜她们的身，将她们从头摸到脚。士兵的护甲带子滑稽地挂在一只耳朵上，这让他们看上去都成了独眼龙。

“很好。”拉拉一边走一边想。只要这一片地区跟城中其他地方切断联系，她就不用再看见科马洛夫斯基了。由于母亲的缘故，她是不可能永远摆脱他的。她不能说：“妈妈，请您别再和他见面了。”如果她真这么做的话，那她跟科马洛夫斯基的事也很可能会被抖出来。真做了会怎样呢？为什

么她要这么害怕？哦，天啊！只要能跟他一刀两断，让她做什么都可以！上帝啊！再这样下去，她会被万人唾弃的。她刚记起了什么？那幅让人害怕的画叫什么名字？上面画的是一个胖罗马人。那幅画就挂在第一个私人房间里，她和科马洛夫斯基就是在那个房间里开始的。

“《女人花瓶》”，是的，就是这个名字。当然没错。那是一幅名画。《女人花瓶》。第一次见到那幅画时她还不是一个女人，她还无法与名贵艺术品相媲美。那都是之后的事。餐桌已经摆好了，只待开席。

“你觉得这样子走下去会走到哪儿？我快跟不上你了。”古伊沙尔夫人气喘吁吁地说。拉拉走得很快，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她的身体里游走，她好像是踩在空中，被这力量推着往前走。

“真神奇。”拉拉听着枪声，在心里想，“愿上帝保佑被蹂躏的人。愿上帝保佑被欺骗的人。子弹啊，上帝也会让你飞得更快的。你和我是一样的心思。”

20

格罗梅科兄弟在乌拉卓克大街和另一条小街的转角交界处有一所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尼古拉伊·亚历山洛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一个在彼得学院教书，一个在大学教书。尼古拉伊还未成婚，而亚历山大已和安娜·伊娃诺夫娜结婚。安娜的父亲是一个钢铁工厂主，在乌拉尔靠近尤里安提的地方拥有一个大型庄园，庄园里头已经弃置了几个不能赚钱的铁矿。

格罗梅科的房子是两层楼。卧室、教室、亚历山大的书房和图书馆、安娜的化妆室以及冬妮娅和尤拉的房间都在二楼。一楼是接待客人的地方，里头铺着淡草绿色的地毯，钢琴盖闪闪发光，水族箱里的鱼自由游弋，配上橄榄绿的内饰和常青植物，整个房间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格罗梅科家的人很有教养，热情好客，对音乐都有很强的鉴赏能力。他们经常举办音乐聚会，表演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以及弦乐四重奏等。

1906年1月的一个晚上，格罗梅科家举办了一个音乐盛会。按照安排，首先是由一个年轻作曲家演奏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该作曲家是塔涅耶夫的学生。

表演的准备工作在前一天就开始了。房间里的家具都被搬进了宴会厅。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钢琴调音师一遍又一遍地调着琴弦，琴音清脆响亮，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厨房里，鸡已经拔了毛备用，蔬菜——清洗干净，混有芥末的橄榄油是特意用来做调味汁和沙拉酱的。

安娜的闺中密友舒拉·史勒辛格一大早就来了，这难免有点讨人嫌。

舒拉又高又瘦，相貌普通，事实上她那男性化的脸总让人想起国王，尤其是在她斜戴一个灰色羊羔皮帽时——哪怕在房间里头她也始终戴着，只是帽巾稍微抬高一点。

在伤心和痛苦的时候，这一对好友总能给对方以抚慰。可平常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却总是相互指责，甚至一度发展到彼此谩骂，直到情绪崩溃，最后以眼泪与和解而告终。这种定期的争吵对于两个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抚慰效果，就跟水蛭吸血有助于缓解高血压一样。

舒拉·史勒辛格结过几次婚，但她只要一离婚就会把之前的丈夫忘得一干二净。尽管她感情经历丰富，但她就像一只母蜘蛛，带有某种雌性特有的冷漠。

舒拉是一个神智学者，同时也是东正教宗教仪

式的专家，即便是在极度疯狂的状态，也抑制不住提示神职人员的心情。“听着，哦，上帝”，“直到永恒”，“伟大的智天使”，舒拉用沙哑的声音不停得念叨着。

舒拉·史勒辛格通晓数学，了解深奥的印第安人学说，知道莫斯科修道院最有名的老师的地址，甚至连谁跟谁一块儿住都知道。也正是由于此，她在别人人生的所有重大时刻都会被邀请担当仲裁人和主持者。

宾客们按照约定时间络绎到来。其中有阿德莱德·菲利普夫娜，基恩特，福柯夫一家人，巴塞尔曼夫妇，沃兹斯基一家人，卡夫卡兹塞夫上校。外头雪花纷飞，前门一推开你就能看到一阵旋转的雾气快速闪过，好似被飘扬的雪花打了一千个结。人们穿着笨重的高筒雪地靴在冰天雪地里进进出出，每

个男人看起来都像胖南瓜，而他们的妻子却恰恰相反——脸庞泛着一层白霜的冷光，大衣解开，披肩拢到了身后，头发随意地散开，看起来好像一个个花结。“那是崔的侄子。”当那个面生的钢琴师走进来时，屋子里顿时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宴会厅的一侧摆满了光可鉴人的白色餐桌，好似一条冬日雪道。灯光映在红色的酒瓶上，格外吸引目光。银制台架上的水晶调味瓶与屋内其他摆设相得益彰，让人遐想无限。餐巾纸仔细地叠成了金字塔状，一篮篮淡紫色瓜叶菊散发出杏仁的味道，让人不禁食指大动。

宾客们为了不耽误享受美食的时间，迅速在餐桌前就坐。“那是崔的侄子。”年轻人在钢琴旁坐下时，众人又低声嘀咕了一会儿。音乐会开始了。

众所周知，奏鸣曲难度很大，却又不怎么讨人

喜欢。而年轻人的表演更是验证了这一点，很快大家就对他的表演有些不耐烦了。

中场休息期间，爱挑剔的克里姆贝克夫和亚历山大·格罗梅科就此起了一点争执，两人对表演的看法不一。围坐在他们旁边的一些人则是边抽烟边交谈，有些还移了移椅子，直到隔壁房间那亮眼的桌布再次抓住他们的眼球。所有人都要求音乐会继续，不要再耽搁。

钢琴师瞥了一眼满堂宾客，打手势示意搭档开始演奏。接下去的音乐变得哀怨起来。

尤拉、冬妮娅和米沙·戈登都坐在第三排。

“在对你打手势。”尤拉轻声对坐在他正前方的亚历山大说。

艾格罗夫娜是格罗梅科家的老仆人，已是头发

花白。她站在门口，焦急地看着尤拉并同时对着亚历山大点头，示意尤拉她有急事要跟主人说。

亚历山大转过身，责备地看了艾格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但艾格罗夫娜还是站在原地。于是他们便用手势隔空对话，就跟一对聋哑人似的。而其他人则在一旁看热闹。安娜·伊娃诺夫娜恶狠狠地看了丈夫一眼，这时亚历山大才起身，他知道必须得做点什么了。亚历山大红着脸，踮着脚尖绕道屋子的一边。

“艾格罗夫娜，你怎么能这样做！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快点说。”

艾格罗夫娜小声耳语。

“什么蒙特尼格鲁？”

“那个旅馆。”

“我知道，那又怎么样？”

“他们要他立马回去。他的一个亲戚快死了。”

“所以有人要死了！我无法想象……不能这样，艾格罗夫娜。等宴会散场，我会跟他们说的。可现在我做不到。”

“他们派旅馆的伙计专程来送信。伙计还在等回信。真的有人要死了，难道你不明白吗？是位夫人。”

“我告诉你，那不可能。早几分钟迟几分钟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完，亚历山大便又踮着脚尖回到了座位，只是眉头紧皱，并不住地摁自己的鼻梁。

一曲结束，趁掌声还未停之前，他走到提施凯

维奇旁边说家里发生了意外，需要他马上回去，演奏必须得提前结束。然后，亚历山大又转过身面朝宾客，示意大家安静：

“女士们，先生们，恐怕表演要被打断了。我们的小提琴手刚刚收到一个坏消息。让我们大家为他祈祷。他不得不先走了。这种时刻，我也不想让他独自离开，或许他需要帮助，所以我打算跟他一起过去。尤诺察科，好孩子，去叫西蒙把马车拉过来。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夜路难行，于是亚历山大又叫了几个年轻小伙子一同前去。

21

进入十二月以来，尽管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但枪声仍不时在人们耳边回响，房屋被焚毁的事也时有发生，连同那些在动乱期间丧生的人的遗骸。

几个年轻人之前从未赶过这么远的路。事实上，蒙特尼格鲁旅馆离得并不远——沿着斯莫尔斯基大道走，再转到诺维斯基大道，然后走到撒多瓦大街——可霜和雾将这片空间隔离开来，仿佛它已经不属于世界。篝火的滚滚浓烟，雪地上的脚步声以及乘雪橇的人的口哨声，更让他们觉得路途遥远，似乎怎样都走不到尽头。

旅馆大门外面停着一驾窄小但十分好看的雪橇，拉雪橇的马身上盖了一块布，并且距毛——马蹄后方的丛毛那一块有包扎的痕迹。车夫弓着背坐在客座上，头埋在戴了手套的掌间，试图以此来取

暖。

旅馆大厅里头很暖和。脚夫躲在衣帽间后面，伴着通风机的嗡嗡声和炉火的啪啪声以及茶壶的嗡鸣声打盹儿，只是偶尔被自己的鼾声惊醒。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靠在左边的镜子处站着，她的脸看着好似一个饺子。女人的皮夹克似乎有些薄了，跟这样寒冷的天气不甚相宜。她应该是在等人，只见她背对镜子，左右回头审视镜中的自己，以确定自己从后面看上去也是风姿绰约的。

这时，快被冻僵的马车车夫走了进来。车夫穿着一件十分宽大的外套，这让他看起来像是面包师手中的面团，而口中呼出的热气更增加了几分相似。“您还要等多久，女士？”他问站在镜子前的女人，“真不知道我怎么会来蹚这一趟浑水。我可不想我的马在外面被活活冻死。”

23号的事情让旅馆里做事的人更加烦恼。刺耳的按铃声几乎就没停过，墙上透明投影箱上的数字不断变换，清晰显示出哪间房的哪位旅客又发狂了。他们不住纠缠服务人员，可又说不清楚究竟想要什么。

与此同时，医生给老古伊沙尔注射了一针催吐剂，替她洗肠。女帮工格拉莎在一旁拖地板，把脏桶拿出去又换干净的桶进来。可在此之前，在提拉沙卡去找医生之前，在科马洛夫斯基还没来，走廊上还没聚集那么多人的时候，屋子里的暴风雨就已经开始了。

一切得从那天午后说起，一个人在穿过连接餐具室和露台的狭窄过道时，不小心推了男侍者撒索伊一下，当时撒索伊刚好要出去，右手托着一个放满了碗的托盘。经这一推，他手中的托盘哗啦掉到

了地上，里头的汤洒了出来，两个汤盘和一个装肉的盘子摔了个粉碎。

撒索伊坚称应该让洗盘子的女侍者负责，赔偿损失。而当时已经快十一点钟，一半的服务员都快要交接下班了。

“是他自己没站稳，左摇右晃的。就跟个大爷似的，神气得很，大声叫嚣着谁推了他，谁洒了他的汤，谁打烂了他的盘子。你个浑球儿，你个可怜虫，你个不要脸的，你以为是谁推了你啊？”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马特奥纳·斯泰帕诺夫娜，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问你，你觉得这个烂摊子是谁造成的？你还以为自己多聪明呢。我告诉你，是那个荡妇，那个趾高气扬的女人，愚蠢的女人。当然，住在蒙特

尼格鲁，她连一只猫都不认识。”

米沙和尤拉在古伊沙尔夫人房间外头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所有的事都跟亚历山大想的不一样。他以为当了音乐家，哪怕是悲剧也会是纯粹而庄严的。可事实上，它却是肮脏而丑陋的，并且完全不是为了孩子。

小伙子们都在过道上等。

“小伙子们，现在到夫人房间里去吧。”贴身男仆第二次走过来对他们说，声音和缓，“你们进去就行，别担心。夫人很好，你们不用害怕。她已经康复一点儿了。你们不能老站在这儿。下午发生了意外，几个珍贵的瓷器都被摔碎了。你们也看到了，侍者们都得跑上跑下送菜，可这个过道有点儿窄。你们还是进去吧。”

小伙子们同意了。

房间里头，一盏原本挂在桌子上方亮着的煤油灯被人从支架上取了下来，放在了木制风屏的后面，散发出一股臭虫的味道。这是一间睡觉的卧室，中间隔了一块脏兮兮的帘子，用来挡住他人的视线。不过此时帘子是掀开的，混乱的人群中也没有谁想去将它放下来。煤油灯放在台子上，如同一盏脚灯，从下面将卧室照亮。

洗碗工觉得，古伊沙尔夫人原本不是想服砒霜自杀的，她是想喝碘酒。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青核桃的酸涩味道。

女侍者在屏风后面拖地，一个半裸的女人躺在地上，眼泪和汗水让她全身湿透，头发也结在了一起。女人把头靠在一个水桶上，号啕大哭。

年轻的小伙子们见此情景立马掉过了头，他们觉得这样看着是很尴尬并且很不礼貌的事。可尤拉却愣住了，那样笨拙又扭曲的姿势——那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雕像，一个肌肉发达的摔跤手，脱得只剩短裤，随时准备与人搏斗。

最后，终于有人反应过来，将帘子给拉上了。

“法戴·卡兹米洛维奇，亲爱的，你的手在哪儿？帮我一把。”女人抽泣着说，“哦，我受够了这种惊惧，我严重怀疑……法戴·卡兹米洛维奇……我想……一切都是虚妄，一切只是我的想象……真是太好了……这是命中注定……我还活着……”

“平静一下，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我求你……我得说，这一切真是太傻了。”

“我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粗声对孩子们

说。孩子们尴尬极了，他们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只好站在主房间的阴影中——那儿的灯已经被人拿走了。墙上挂着许多的画，屋子里有一个放满乐谱的书架和一个堆满报纸和音乐专辑的书桌，餐桌的上面盖着一张钩花布。一个女孩儿在扶手椅中睡觉，她的头压在手臂上，睡得正酣——她一定是累坏了，才能在这样吵的环境下睡着。

“我们现在就走。”亚历山大再次大叫道。他们根本就不该来，再待下去也毫无意义，“等法戴·卡兹米洛维奇一出来，我们就告别。”

可从风屏后面出来的并不是提施凯维奇，而是一个矮胖而自信满满的男人。他将煤油灯举到头顶，走到桌子旁，再将煤油灯安到支架上。灯光照醒了睡着的女孩儿。她对着男人笑了下，斜着眼睛伸懒腰。

看到陌生人进来，米沙惊了一跳，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来人。米沙拉了拉尤拉的袖子，想跟他耳语几句，可尤拉却不予理会。

“你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窃窃私语，别人会怎么想你？”

与此同时，女孩儿和男人也陷入了沉默。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目光相接。可两人的默契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仿佛他是木偶表演的提木偶人，而她就是被他操控的木偶。

女孩儿的眼神透着疲惫，她张了张嘴唇，男人责怪似的看了她一眼，女孩儿则狡黠地朝男人眨了眨眼睛。两个人都很高兴事情有这种结局——秘密并没有泄露，古伊沙尔夫人的自杀也没有成功。

尤拉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两个人看。他躲在黑暗

中，别人看不见他，而他却能清晰地看到灯光之下的事物。年轻姑娘和老男人之间的情事昭然若揭。他的心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所撕扯。

这不就是他，冬妮娅还有米沙讨论过无数次的“粗俗”吗？那种力量慑人无比，却又吸引着他们，而他们只能用言语来建立一道安全屏障。而现在它就在这儿，就在尤拉的眼前，完全真实，挥之不去。它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却又似乎在请求他的帮助——他们那幼稚的哲学到底算什么，而尤拉现在又该怎么办？

“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走到街上后，米沙问。

陷入沉思中的尤拉并没有回答。

“他就是让你父亲喝酒并导致你父亲死亡的

人。在火车上，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的。”

尤拉还在想那个女孩儿和他自己的未来，并非父亲和过去的事情。一开始，他甚至都不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外头太冷了，冷得人无法开口。

“你肯定要冻僵了，西蒙。”亚历山大对马车夫说。之后，一行人便乘马车回了家。

---

(1) 那是在车站小卖部的地下室里头烤出来的。

(2) Dragoons，在欧洲历史上泛指装备火枪的骑兵，因短身管燧发枪被称作火龙而得名。

(3) 神父，被认为是革命领导者，不过也有人怀疑他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

(4) Dostoievskv，俄国小说家，著有《罪与罚》。

(5) Rozanoy，作者注，当时一个具有非凡个性的作

家。

(6) 俄国习俗，动身之前先坐一会儿，以求好运。

第三章　斯万提斯凯斯的圣诞派对

1

一年冬天，亚历山大送给了安娜·伊娃诺夫娜一个古董衣柜，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搞来的。古董衣柜是用黑檀木制成，体积十分庞大，只能拆开搬进屋子。可搬进屋后又有了一个问题，究竟放哪儿呢？因为是衣柜所以肯定不能放客厅，但卧室又摆不下。最后，只得在主人卧室外的露台上清出一块地方来摆它。

门房马克尔负责拼装衣柜。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玛丽恩卡带在身边，并给了她一根大麦糖。小玛丽恩卡一边吃糖果，一边默默地注视父亲。

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安娜·伊娃诺夫娜看着衣柜一点点立了起来，只剩衣柜的顶还没有装上去，她便自作主张要帮马克尔一把。安娜爬上衣柜，没曾想脚下一滑，刚好摔倒在连接衣柜侧门的凸榫上。马克尔系在上头的绳子经这一摔就松了，导致安娜·伊娃诺夫娜连同整个拼起来的衣柜倒在了地上，安娜被摔得鼻青脸肿。

马克尔连忙跑过去："哦，夫人！"他嚷着，"你这是做什么呢，亲爱的夫人？没伤着骨头吧？感觉一下。要伤到骨头就麻烦了，外伤倒没什么要紧，过一段时间就能好。老话说得好，人的肉身不过是用来取乐的——别哭了，你个捣蛋鬼！"马克尔厉声呵斥一旁哭泣的玛丽恩卡，"擦掉眼泪，去找你妈妈——啊，夫人，难道你不相信我能把那个衣柜装起来吗？当然，你可能以为我不过是一个门房，可我跟你说，我还会造房子呢。是

的，我以前是专门给人做家具的。你是不知道我做过多少橱柜、碗柜、衣柜，经我手的涂漆、胡桃木和红木更是数不胜数。许多年轻姑娘也因此而从我身边溜走。”

马克尔拉开一张扶手椅，把呻吟着的安娜·伊娃诺夫娜扶过去坐下。然后开始重新拼装衣柜。装完衣柜顶之后，他说：“这种门，用来展览都行。”

安娜·伊娃诺夫娜并不喜欢那个衣柜。因为它的样子和尺寸都让她想到某种灵柩台或坟墓，感觉十分恐怖。安娜给它取了个名，叫“阿斯科尔德”[(1)]，这说的是奥莱格王子的马[(2)]，最后会给主人带来厄运。安娜读了很多相关的东西，但读得十分杂乱，所以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印象。

那件事之后，安娜·伊娃诺夫娜患上了肺病。

2

由于患了肺炎，1911年的11月，安娜·伊娃诺夫娜整个是在床上渡过的。尤拉、米沙·戈登和冬妮娅第二年春天便要毕业，尤拉念的是医学，冬妮娅读的是法律，而米沙主修语言学中的哲学功用课程。

尤拉的心里仍充满恐惧，但他的想法、习惯和爱好都有了更多个人色彩。尤拉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他对事物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尽管尤拉十分喜欢艺术和历史，但他在职业选择上却从未犹豫过。他认为艺术只适合陶冶情操，并不能当作工作。尤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认为人这一生总得为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所以，他就学了医。

大学一年级，他在学校的地下室解剖房待了整整一学期。走下螺旋式阶梯，你就会看到一群蓬头垢面的学生，他们或是在骷髅的包围中研究快被翻烂的教科书，或是在某个角落不发一言地解剖尸体，也有一些人在旁嬉笑打闹，或追逐石地板上的耗子。终年见不到日光的太平间里有许多因自杀或溺水而亡的年轻女人的全裸尸体，那些尸体保存得很好，并未腐烂，散发着磷光。尸体里注入了明矾溶液，这样尸体就不会腐烂。尸体被切开，分成几块——即便是从部分看，人体仍保有一种魅力。尤拉有时还能从一只断手中感受到仿如女神一样的魅力。地下室里弥漫着石炭酸和甲醛的味道，从不知名尸体的命运到生死本身，一切事物似乎都蒙上了一种神秘气息——无疑，死神是这地下室的主人。

尤拉头脑灵活，擅长写作。从上学以来，他就梦想能写一本关于生命的书，记录他见过或想过的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事。但尤拉还太年轻，人生阅历不足以写书，所以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写诗。尤拉就像一个画家，为了头脑中那幅巨大油画而每天在草稿上练习。

那些不成熟的作品充满活力和生命力，让他十分着迷。而他认为正是这两种特质——活力和生命力为艺术带去了现实的力量，如果艺术不能表现现实，他就觉得艺术不过是无用之物。

尤拉深知，舅舅在他性格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如今生活在瑞士的洛桑。他在新出版的书中延伸之前关于“历史”的观点，称“历史”为另一个宇宙，是人类在时间和记忆的帮助下所创，用来对抗死亡的挑战。这些想法是受到基督教教义新解的启发，并直接形成一种新

的艺术概念。

同尤拉相比，米沙·戈登受这些想法的影响更大。也正由于此，他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哲学。米沙修读神学课程，后来还一度想转到神学院。

尤拉不断成长，在舅舅理论的影响下，他的内心变得更加自由，可米沙却被它束缚住了手脚。尤拉意识到米沙的这种热情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出身。尤拉是个谨慎的人，所以他并没有贸然劝说米沙修正这些想法。不过很多时候，他都希望米沙能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能更加脚踏实地。

3

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尤拉从学校回来得很晚，他筋疲力尽，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那天下午，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安娜·伊娃诺夫娜晕了过去。好几个医生都来瞧过了，还是无计可施，他们还曾一度建议亚历山大派人去请神父来，不过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现在安娜好了一点，恢复了意识，还交待说等尤拉回来就让他到她床前去。

尤拉知道后，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去。

房间里没有忙乱的痕迹。一个护士在整理桌子上的东西，几乎没发出什么声响。已经擦过身子的毛巾湿漉漉地扔在一旁。盆里的水泛出一种粉红色，里头有咳血，打碎的小瓶子和羊毛毛巾漂在上面。

安娜·伊娃诺夫娜躺在那儿，全身汗湿，嘴唇却显得十分干燥。从早上发病以来，她显得特别形容憔悴。

“会不会是诊断错误？”尤拉在心里想，“大叶性肺炎的典型症状她都有，看来情况真的很危急。”在一番问候和安慰之后，尤拉让护士先出去，然后拿起伊娃诺夫娜的手腕替她把脉，并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听诊器。安娜·伊娃诺夫娜别过头，意思是这没必要。尤拉意识到，安娜想要他过来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她挣扎着想说什么。

“他们想替我准备最后的圣礼[(3)]……我已经是半只脚踏进棺材里了……随时都可能走……知道自己马上要拔一颗牙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十分恐惧，因为你知道它会很痛，所以你不断做准备……但这并不是拔牙，这一次是全部的身体，全部的生

活……全部被拔出来……接下去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真的很害怕。”

说完，安娜陷入了沉默。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下来。尤拉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安娜·伊娃诺夫娜又说：“你天资聪颖，很有才华……你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你肯定知道什么东西能给我安慰……”

“可我能说什么呢？”尤拉回答。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只好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然后又坐下。

“你明天就会好很多的！很多迹象都显示出这一点——我敢用我的命打赌——你一定会安然渡过这次危机的。另外，也还需要你保持清醒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你想知道我作为一个从事医学研究的人的观点吗？或者我改天再告诉你？或者现在？

咳，这由你决定。不过突然发生这种事，我知道很难接受。”尤拉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死而复生。尽管这种话是用来抚慰弱者的，但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种良药。我总能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上帝耶稣关于生死的言谈。千百年来，还有人找到更好的空间吗？宇宙没有那么大，装不下那么多人。所以，上帝和好人，还有其他善良且美好的东西被挤了出去，被那些贪婪而野蛮的人击碎。

“不过自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生命就不断地繁衍进化，宇宙不断得以重生。你为自己是否会经历死亡而焦虑，可你不知道的是，早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就已经和死亡紧密相连了。

“你会感觉疼痛吗？你的身体是否跟散了架一

样？换言之，你的意识将会面临什么？可意识又究竟是什么？我跟你这样说吧——刻意地想要睡着一定会失眠，有意识地消化某种食物一定会让你的胃不舒服。意识若用在自己身上，就会是一种毒药。意识是一种通向外面的光，它照亮前方的路，防止我们摔倒。它就像火车头的车头灯——如果你把它移到里头，就会是一场灾难。

“那么，你的意识会经历什么？你的意识，是你的意识，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那么，你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来探索一下。关于自己你了解哪些东西？你内心意识到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你的肾？你的肝？你的血管？不是这些。无论你把回忆推到多远，你意识到的自己总是某种外在的表现——通过你做过的事，或者家人或其他人来表现。不过，现在请你听清楚。表现在别人那儿的你才是真正的你——那是你的灵魂。那是你的意识赖以为

生并且给其快乐的东西——你的灵魂、不朽心灵和生命都与之相系。所以呢，你过去是，并且会继续是由别人来表现你。如果后来这就成了你的回忆，又会怎样呢？这就会是你，拥抱未来的那个你。

“现在说最后一点。其实，这世间没有什么好恐惧的。世上并没有死亡这一回事，死亡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过你说到了天赋异禀这回事——它让一个人变得不同。我得说，那才是与我们有关的东西。从最广义上来说，才华或天才就意味着生活的才能。

“圣·约翰说过，世间没有死亡。他的论证十分简单。世间不会有死亡，是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这就好比说世间不会有死亡，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死亡，是因为死亡已经是很老的事物，而我们已经厌倦它了。我们需要的是某种新的事物，而

那种新事物就是永生。”

尤拉一边说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走到安娜·伊娃诺夫娜床前，把手放到安娜额头上，说：“睡吧。”没过多久，安娜便真的睡着了。

尤拉轻声离开了房间，并让安排一个护士进来守着。

“我怎么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样跟庸医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安娜·伊娃诺夫娜真的好一些了。

4

安娜·伊娃诺夫娜的身体情况不断好转。到十二月中旬，她尝试下床走动，但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医生交待她尽量不要下床，好好躺着休息。

安娜经常找尤拉和冬妮娅陪她说话，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安娜讲自己的童年，讲她在外祖父家生活的那段日子，那是在乌拉尔的雷恩瓦河畔。尤拉和冬妮娅都没去过那儿，不过从安娜的描述中，尤拉很容易就能在脑海中想象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大树古木遮天蔽日，仿佛一把尖刀插进天空；还有那多岩石的湍急河流，库鲁尔格的悬崖峭壁。

尤拉和冬妮娅也因此第一次得到了他们的晚礼服。尤拉的是一件晚宴夹克，冬妮娅的是一件淡白色的绸缎裙，配一条围巾。

他们打算在二十七号斯万提斯凯斯家的传统圣诞派对上穿上新晚礼服。裁缝把衣服送过来后，尤拉和冬妮娅进行了试穿。他们十分高兴，都舍不得脱下来，直到过来通知他们到安娜·伊娃诺夫娜那儿去。

他们穿着新衣服去到安娜房间。一看到他们，安娜就抬起手，上下打量他们，并示意他们转过身。

“好极了。”她说，“非常迷人。我都不知道衣服已经做好了。冬妮娅，让我再仔细看看。真不错，就是缎子压得太过了一点。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尤拉，我想先跟你说几句。”

“我知道，安娜，我知道你已经看到那封信了，那是我亲手给你的。我知道你同意尼古拉伊的想法。你们都认为我不应该拒绝那份遗产。可你先

别急，你现在不能说太多话。我再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尽管你已经大概都知道了。

“首先，日瓦戈家如果打起官司，最高兴的当属那些律师了，因为父亲庄园里头剩的钱还足以支付律师费。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值钱的东西了——除了债务和一堆麻烦事。如果真还有能换钱的东西，你觉得我会平白将它送给法院吗？可关键是，整件事就是一个陷阱。所以与其搞得我自己一身臊，不如主动放弃，就让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争去吧。还有那个现在跟孩子住在巴黎的爱丽丝夫人，她自称是日瓦戈家的人——以前我就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人。可现在又有了新的说法——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此有所耳闻，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这些事。

“貌似是母亲还活着的时候，父亲迷上了一个古怪的女人——斯特巴诺娃公主。这个女人身边跟

着一个十岁的儿子，名叫艾夫格拉夫。

“这个斯特巴诺娃公主过着隐居生活。她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好像是在奥姆斯克那边，几乎足不出户。我曾见过那个房子的照片。房子很美，有五个落地窗和浮雕屋檐。不知怎么回事，最近我总感觉那所房子在某个地方看着我，透过那五个窗户，穿越西伯利亚和莫斯科之间几千里的距离，并且我感觉它迟早会对我发难。莫须有的财产、冒牌的遗产继承人、仇恨、嫉妒——难道我会想要这些东西吗？更何况，还有那些律师。”

“虽说如此，你也不能放弃遗产继承呀。”安娜·伊娃诺夫娜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她再次问道，没等尤拉回答，她又接着说道，“他的魂来找我了。你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个森林看守人吗？他叫巴克斯[(4)]。很狂妄，对

吧！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跟魔鬼一样黑，胡子都跟眉毛长到一块儿去了，并且自称巴克斯！他已经毁容了，一只大熊攻击了他，但他跟大熊进行了生死搏斗，把大熊赶跑了。那儿住的都是这样的人，名字也都让人印象深刻！巴克斯或卢普斯（天狼座）或浮士德[(5)]。时不时地会有这样的人蹦出来——也许是奥克塔斯或弗洛拉斯——就好像是从你祖父的枪里射出来的一样，名字都很古老。你想象不到，有时是一个养着小熊仔的卖炭翁，或者来自另一个省的矿工。而你祖父总是给他们一些盘缠，有些是直接给钱，有些是给面包，有一些给的是弹药。那森林仿佛就在我眼前。我都能看到纷纷扬扬落下的雪花！比屋顶还高！”安娜·伊娃诺夫娜说到这儿咳了起来。

“够了，说这么多话对你身体不好。”冬妮娅和尤拉关切地说道。

“胡说，我好得很。你提醒我了。告诉我，你们两个正担心后天参加排队的事。可别让我再听到这种傻话了，你们真该为自己脸红！不过说到巴克斯，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铁匠。后来跟人打架，被人开了膛，所以他就给自己做了一副铁脏。尤拉，你可别犯傻——我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你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那儿的人都这么说。”

说着，安娜又咳了一阵，这次咳得比上次要长很多。她不断咳呀咳，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尤拉和冬妮娅同时跑过去，他们并排站在安娜床前，抓住安娜的手。可安娜·伊娃诺夫娜还是咳个不停，她把尤拉和冬妮娅的手放到一起。好一会儿她才缓过来，说：“哪怕我死了，你们也一定要在一起。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定要在一起。现在，你们就算订婚了。”说完，安娜不禁流出了眼

泪。

5

早在1906年的春天——再有一年零几个月拉拉就要中学毕业——拉拉跟科马洛夫斯基相处的六个月就已经让她无法承受了。科马洛夫斯基始终狡黠地占据着主导地位，总是会不经意地提起让拉拉觉得最羞耻的事，以此来牵制她。这种提醒让拉拉陷入了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而这正是唤醒女人情欲所需要的。结果，拉拉觉得自己在情欲的噩梦里越陷越深，以至于常常在黑夜里惊醒。拉拉夜间的疯狂跟黑魔力一样，说不清道不明。所有的想法都被颠覆，银铃般的笑声表现的其实是尖锐的疼痛，抗拒反倒意味着同意，就连温柔的亲吻也变成了折磨。

这一切似乎不会有尽头。就在那个春天，在一节历史课上，拉拉想到哪怕是学校也无法让她逃离科马洛夫斯基的控制。于是她突然就做了一个决

定，而那个决定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那是一个闷热的早晨，暴风雨就要来临。镇上教堂的钟声从窗外传来，嗡鸣一样单调，其中还夹杂着院子里孩子们的打闹声。土地和青草的气息让拉拉头痛欲裂，她就跟喝了伏特加一样。

那节课讲的是拿破仑的埃及运动。当老师走到讲台上时，天空突然黑了下来，一道闪电迅速劈过，乌云和沙暴混着雨水的气息扑面而来。两个学生自告奋勇要去叫校工来关窗户，推开门时，一阵大风将桌子上所有的书和纸都吹了起来。

窗子关上了。窗外大雨滂沱。拉拉撕了一页练习纸，给她的邻桌娜迪亚写了一张字条：

娜迪亚，我要离开家。你帮我找一份家教的工作，钱越多越好。你认识的有钱

人多。

娜迪亚回：

我们正在给莉帕找家庭教师。你刚好可以来我家呀！我父母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

6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待了三年，她把那儿当成了避风港。没有人能打扰她，甚至包括她的母亲和弟兄，而这也导致她日益和亲人疏远起来。

拉夫雷恩提·米克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大商人，聪明睿智，熟练掌握绝大多数的现代经商方法。作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同时也作为声名显赫的下议院议员，科洛格里沃夫十分讨厌腐朽的旧制度。他收留被警察追捕的革命者，并掏腰包请律师替革命者辩护。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为了资助革命行动，甚至不惜亲自参与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运动。科洛格里沃夫还是一个神枪手，对狩猎十分痴迷。1905年的冬天，他去到塞雷布里尼森林和罗辛岛，并在那儿帮助工人革命队伍进行秘密射击训练。

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他的妻子塞拉菲玛同样出身名门，与他可谓门当户对。拉拉十分尊敬科洛格里沃夫夫妇，而科洛格里沃夫家上上下下也对拉拉照顾有加，把她当家人看待。

拉拉过了三年多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天，拉拉的弟弟罗迪亚过来看她。罗迪亚晃着腿，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告诉拉拉，他们小队本打算凑钱给军政委买一份礼物，后来战友们把那钱交给了他，让他去挑选礼物。可他却揣着那笔钱去赌博，两天前就输得一分不剩了。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罗迪亚瘫倒在扶手椅中，竟放声大哭起来。

拉拉一动不动，而罗迪亚还在抽泣着说：

“昨晚我去拜访了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他不肯跟我谈这件事，但他说要是你能替我说句话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爱我们任何一个人了，但

他仍把你看得很重。亲爱的拉拉，你只要开口说句话就行了。你应该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要是被发现了，那我该多么丢脸啊，我恐怕还会被赶出军队。求你去见见他，也不用特别说什么，就跟他叙叙旧……你总不想我为此丢了性命吧。”

“你的性命……你作为军人的荣誉。”拉拉愤慨地重复着罗迪亚的话，在屋子里踱步，“我不是军人，我没有荣誉。你想做什么，随便你。可你现在知道自己在要我做什么吗？难道你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可现在你却跑过来，要把我的生活打破。去死吧，你哪怕自杀我也不管。我有什么好在乎的？你现在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罗迪亚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就算七百卢布吧，凑个整数。”

“罗迪亚！你疯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已经赌掉了七百卢布！罗迪亚！罗迪亚！你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诚实劳动需要多久才能赚到这么些钱吗？”

拉拉气得说不出话来，短暂沉默了一阵，她冷冷地说：“好吧，我争取一下。你明天再来。记得把你的左轮手枪带来——你得用它来结束你自己的性命。最好你把枪给我，记得，还要多带点儿子弹。”

后来，科洛格里沃夫给了拉拉一笔钱。

7

尽管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工作，但她还是顺利从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拉拉的功课很好，并在1912年获得了大学学位。

1911年的春天，拉拉教的学生莉帕中学毕业。莉帕同一个年轻工程师傅里艾森丹科订了婚，傅里艾森丹科家世良好，所以莉帕的父母也不反对他们的婚事，只是不希望莉帕太早结婚，要她再等两年。而这就惹了祸了。莉帕打小娇生惯养，任性骄蛮，一听父母不让她马上结婚，就对着父母大呼小叫起来。

之前已经说过，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已把拉拉看作自己的家人，所以也没人提她欠的钱，甚至都没人记得这回事。其实，要不是她还有一项不能让人知道的支出，那笔钱也是早就能还清的。

拉拉瞒着帕沙，给帕沙远在西伯利亚的父亲寄钱，资助他那脾气暴躁又体弱多病的母亲。帕沙每个月只支付房东一部分房租和生活费，以此节省开支。拉拉偶然在艺术剧院附近的卡莫格大街的一幢新楼房里发现了帕沙的住处。

帕沙的年纪比拉拉小一点儿，他疯狂地爱着拉拉，对她言听计从。从里尔中学毕业之后，帕沙便在拉拉的建议下，修读希腊语和拉丁语。拉拉的心愿是，在他们双双通过国家考试后，两个人马上结婚，并到乌拉尔的省会城市当中学老师。

1911年的夏天，拉拉最后一次陪同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去杜普兰卡。拉拉很喜欢那个地方，她的喜欢甚至超过杜普兰卡的主人。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带拉拉去一趟，这俨然已成了某种不成文的约定。从闷热的

火车上下来，拉拉被乡村那种无边的宁静和让人发晕的香气所折服。她心潮澎湃，却不发一言。科洛格里沃夫允许她独自从火车站走到庄园去。与此同时，行李已经装上了马车，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也相继坐上马车，听他们的车夫讲当地的新鲜事。马车夫那天穿的是一件大红色汗衫，外头套一件无袖外套。

拉拉沿着一条朝圣队伍踩出来的小路往前走，然后转进田野。她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带着花香的空气。对她而言，这样子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比身体都更亲近，比恋人都好，比书都有用。一瞬间，拉拉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她活在这人世间，就是要感受大自然的美丽，明白它的意义，叫出每一样东西的名字。如果这件事她自己不能完成的话，也要通过爱的力量让另一个人来替代她完成。

那个夏天，拉拉有很多的事要做，可以说是身心俱疲，所以很容易生气。尽管拉拉天生具有宽容和理解之心，但她还是变得疑神疑鬼，怨气也逐渐在她的心里聚集。

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跟以往一样对拉拉疼爱有加，并希望她能一直留在他们家。可现在莉帕已经长大成人，她感觉自己的价值已经不大。所以，她拒绝再领薪水，但科洛格里沃夫执意要给。而拉拉也确实需要钱，可她要是再去别处挣钱也有点儿说不过去。

拉拉感觉她的处境十分尴尬，简直难以忍受。她开始胡思乱想，觉得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肯定已经把她当成一个负担，只不过是表面对她客气。她甚至成了自己的负担。拉拉想要逃离，逃离自己，逃离科洛格里沃夫家，随便到哪儿都行。可她又是

一个有原则的人，她觉得一定要先偿还自己的欠债才能离开，但当下她又到哪儿弄钱呢？拉拉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人质——都是因为罗迪亚犯下的愚蠢的错误——无力逃脱。

拉拉变得疑神疑鬼。要是来科洛格里沃夫家做客的朋友们对她献殷勤，她就觉得那些人是把她当成了温顺的小绵羊，当成了容易到手的猎物。要是他们不理会她，那就说明她根本就是被忽视的，没有一点价值。

不过，拉拉的情绪化并不妨碍她跟来客谈笑风生。她去游泳，划船，参加河边篝火晚会，跟其他人一起跳舞，放烟花。拉拉还参加业余戏剧表演，并以很大的热情参加射击比赛。射击比赛使用的是短毛瑟枪，但她更喜欢用罗迪亚的轻便左轮手枪，渐渐地拉拉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可惜我是个女的。”她大笑着说，“不然，我肯定会是一个很厉害的角斗士。”不过拉拉越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内心就感觉越痛苦，也越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回城之后，她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她跟帕沙之间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她尽量避免跟帕沙吵架，她把帕沙看作自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帕沙渐渐变得有点儿自我，说话也带了一点儿说教的味道，这既让拉拉觉得好笑又觉得生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家的人，钱——所有这些人和事都在她脑海里打转。拉拉开始讨厌生活，甚至有些失去理智。拉拉生出了一种想法，她想要跟自己知道的或过往经历过的一切斩断联系，开始某种新的生活。1911年的圣诞节，拉拉在这样的心境下做了一个让她后悔莫及的决定。拉拉打

算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她要独立，并打算从科马洛夫斯基那儿要一笔钱。拉拉认为，他们过去毕竟是有感情的，并且她又独自生活了这么些年，科马洛夫斯基应该会无条件地绅士地帮她一把，不至于再为难她。

27日的晚上，拉拉揣着这种想法来到了佩特罗夫卡大街。她的皮手筒里揣着罗迪亚的左轮手枪，子弹已经上满了膛。如果科马洛夫斯基敢拒绝她的要求或以任何形式侮辱她，她就立马开枪。

拉拉心情激动地穿过大街，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走了一段，原本预想好的开枪被拉拉抛在了脑后——枪口对准的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她脑中只剩下那把枪。走在佩特罗夫卡大街上，她一路仿佛都能听见枪声。那枪对准的是科马洛夫斯基，是她自己，是她的命运，对准的是杜普兰卡庄园里挂在橡

树上的木头靶子。

8

“别碰我的皮手筒！”

艾玛·俄奈斯托夫娜伸手帮拉拉脱下大衣外套，口里不住喊着“啊”、“哦”等惊呼。她告诉拉拉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出去了，所以她得在家里等他回来。

“我等不及。我的时间很赶。他去哪儿了？”

俄奈斯托夫娜说维克托去参加圣诞派对了，她把派对的地址写给了拉拉。拉拉拿着写有地址的纸条，一路跑下熟悉的阶梯，往弗拉尔城的斯万提斯凯斯家奔去。

直到这时，当她再次从科马洛夫斯基家奔出来时，她才回头看了一圈。仍然是冬天。仍然是这个城市。仍然是晚上。

外头寒冷刺骨。厚厚的玻璃一般的冰块覆满整条大街，好似啤酒瓶的瓶底。拉拉感觉，就连呼吸都变得艰难。天空阴沉无比，雨夹雪打在她的脸上，弄得她又疼又痒。拉拉带着一颗狂跳的心穿过空无一人的大街，走过廉价茶馆和饭店的门前。冰天雪地中，人的脸冻得和红肠一样红，马和狗的头上挂着结晶的冰柱。窗子上落满晶莹的冰雪，好似一块魔力屏，映出圣诞树的璀璨灯光和狂欢人群的影子，给寒夜行人一点安慰。

走到卡莫格大街，拉拉停住了脚步。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受不了了。”拉拉几乎是脱口而出，“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拉拉鼓起勇气，推开了重重的大门。

9

帕沙的脸憋得通红，舌头顶着脸颊站在镜子前，整理衣领和领带。他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而拉拉就在这个时候闯了进来，连门都没敲，一进门就看到他如此衣衫不整地站在镜子前。帕沙立刻察觉到了拉拉内心的烦乱。她撩起裙子往前走，好似涉水走过一条河流。

帕沙连忙走向她。“怎么了？”他敏锐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在我旁边坐下。坐下，先别管你的衣服了。我很急，我马上就要走。别碰我的皮手筒。等下，你先把头别过去。”

帕沙照拉拉说的办了。拉拉那天穿的是一套剪裁合体的套装，她把脱下的大衣挂起来，接着把罗

迪亚的左轮手枪从皮手筒换到口袋，然后走到沙发边。

“现在你可以看了。”她说，“点一根蜡烛来，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烛光，所以帕沙总会在家备下几根蜡烛。帕沙于是换了一根新的蜡烛到烛台上，并将蜡烛台放到窗棱上，点燃。烛光摇曳，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焦油味道，柔和的烛光溢满整个房间。在烛光的照耀下，窗台上的冰块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洞。

“听着，帕沙，”拉拉说，“我现在有麻烦，你得帮我。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问我究竟是什么麻烦。不过你可别不上心，你要认真对待。我一直都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如果你不想我被毁掉，那我们一定不能取消婚礼。”

“可我从没想过取消婚礼呀！”帕沙插道，“你只需告诉我结婚的日期就行了。只要你点头，我立刻娶你。现在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事让你这么焦虑，你别让我猜，太折磨人了。”

但拉拉却避过了这个问题，快速转移话题。他们就其他的事情谈了很久，却始终没有说到正题。

10

那个冬天，尤拉正在为大学金奖比赛准备一篇关于视网膜刺激源的科学论文。尽管尤拉学的是基础医学，但他掌握了许多有关眼睛的专业知识。尤拉对视觉生理学的兴趣也是跟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拥有创新天赋且爱好艺术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人。

冬妮娅和尤拉租了一驾雪橇，两个人乘雪橇去参加斯万提斯凯斯家的圣诞派对。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从童年一直走到青春，可谓青梅竹马，对彼此都了如指掌。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对于对方的玩笑有自己独特的反应方式。此刻，两人安静地驾着雪橇，双唇紧闭以抵抗寒冷，只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头。

尤拉在想比赛的日期，他觉得自己应当更努力

地写论文。不过节日的热闹和年末的喧嚣还是让他分了心，思绪也多了起来。他想起自己答应戈登写一篇关于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对布洛克十分着迷，尤拉和戈登更是如此。不过这些想法也只是在尤拉的脑中一闪而过。尤拉跟冬妮娅继续往前赶路，两个人的下巴都缩到了衣领里面，各自搓着自己快被冻僵的耳朵，想着自己的心事。不过，有一件事他们是心意相通的。

前不久在安娜·伊娃诺夫娜床前发生的那一幕让他们都有了些许变化。好似两个人的眼界被拓宽了，都开始以新的目光审视彼此。

对尤拉而言，冬妮娅是老朋友，以前他把对方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解释，而现在她却成了他无法抗拒的人。冬妮娅成了一个女人。有时候他会想象自己成了一个国王，一个英

雄，一个先知，一个征服者，但从来没想过冬妮娅会长成一个女人。

现在冬妮娅把这个最崇高也最艰巨的任务担在了瘦弱的肩上——尽管冬妮娅身体十分健康，但在他看来，冬妮娅始终是瘦小脆弱的，这让他生出了一种热切的同情心，而他担心这会是迷恋的开始。

冬妮娅对尤拉的态度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

尤拉觉得，或许他们根本不应该一同出来。他担心安娜·伊娃诺夫娜的身体状况。就在他们出门的时候，就听到说安娜有些不舒服，所以他们去了安娜的房间探望，但安娜跟以前一样强烈要求他们去参加派对。他们走到窗子边，察看了外面的天气。出门时，冬妮娅的新裙子上加盖了一块帘子，看起来好似婚纱。两个人都是这么觉得，不由相视大笑。

尤拉循着冬妮娅的视线，也往周围看了一圈。前行的雪橇发出巨大的噪音，在空旷的雪地上回响。窗子里面结了冰，在灯光的映衬下，恍如黄金做的珍贵宝盒。他们的身后，是沉浸在圣诞气息中的莫斯科。树上挂着亮晶晶的蜡烛，宾客们觥筹交错，尽情玩乐。

尤拉突然想到，布洛克代表的是俄国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圣诞精神——在这个北方城市，在最新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在星空照耀下的现代街道，在二十世纪摆着圣诞树的客厅里。他想，其实没有必要再去写一篇关于布洛克的文章，他需要做的就是画一幅俄国版的《三博士来朝》，就像荷兰人画的那样，画上雪，画上狼群，画上漆黑的枞树林。

穿过卡莫格大街时，尤拉注意到有个屋子的窗前的冰块被烛火融化了。那烛光似乎是有意对着街

道，似乎在窥视过往的马车，等待某个人的到来。

“桌子上点了一根蜡烛，一根蜡烛……”尤拉轻声对自己说。他的思绪有点混乱了，他希望自己能很快把思绪理清楚。但之后并没有新的东西出现。

11

斯万提斯凯斯家的圣诞派对依循过去的传统。十点钟，在年纪小的孩子们归家之后，圣诞树会再次为其他人点亮，派对一直持续到天亮。很多人都在客厅里玩儿牌，能玩儿一夜到通宵。破晓前，他们会一起吃个夜宵。

“你们怎么这么晚？”斯万提斯凯斯的侄子佐治亚问，他当时正穿过过道要到叔叔婶婶的房间去。尤拉和冬妮娅脱下身上的外套，跟主人家打招呼前，他们先凝视了一眼舞厅的门。

舞池中的人裙裾飞扬，舞步翩翩。而那些没有跳舞的人，也在走来走去，四处交谈。

人们在舞池中间旋转，旋转。他们或成双成对，或站成一排，由柯卡·考纳克夫的儿子领舞。柯

卡是一名副审判长，他的儿子在法律学校读书。“快步轮舞！”年轻的法律学生大声喊着，或者喊“连成一排！”——其他人都跟着他的口令。“请注意，先奏华尔兹。”柯卡的儿子领着舞伴跳到第一排时对钢琴师大喊。他带着舞伴旋转，越转越快，直到一曲华尔兹终了。所有人都拍手鼓掌，喧闹拥挤的人群取过一杯又一杯冷饮。红着脸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或大叫或大笑，贪婪地喝着手中的蜜橘汁或柠檬汁。而当他们放下杯子时，喧闹声仿佛在耳边放大了十倍，好似他们刚喝下去的是兴奋剂。

冬妮娅和尤拉没有在舞厅停留，他们直接往后头的主人房走去。

12

斯万提斯凯斯家的客厅里摆满了从舞厅和会客室里移出来的家具，而厨房就成了圣诞工场。房子里飘着油漆和胶水的味道，还有一堆堆的彩色包装纸、一箱箱的黑白条粗纺毛料和一盒盒蜡烛。

斯万提斯凯斯正忙着写礼物卡片，安排晚餐的座位以及抽奖号码等事情。佐治亚在一旁帮忙，不过他总是算错数，惹得旁人气恼不已。冬妮娅和尤拉的到来让屋子里的人喜出望外，斯万提斯凯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亲热地让他们加入到准备工作中来。

“费里茨娅缇·塞蒙诺夫娜不明白，这些事是应该提早准备的，而不是等派对开始宾客们都来了才手忙脚乱地准备。佐治亚，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沙发上的空盒子和装了甜杏仁的盒子弄错了

——你真是什么事都要搞砸。”

“比起来安奈特还是要好一点，这总算让我觉得欣慰一点。皮埃尔和我都很担心。”

“她做得更差，亲爱的——更差，你明白吗？你总是颠倒是非黑白。”

尤拉和冬妮娅那大半个晚上都是跟佐治亚以及斯万提斯凯斯夫妇在后面的房间里渡过的。

13

期间，拉拉一直待在舞厅里头。她没有穿晚礼服，也不认识几个人，但她还是留在那儿。要么是梦游一样跟柯卡·考纳克夫跳舞，要么就是漫无目的地满屋子乱转。

有那么一两次她停住乱转的脚步，在客厅外面犹豫要不要进去，只希望背对门口而坐的科马洛夫斯基能看到她。但科马洛夫斯基始终盯着手中的牌，也许他是真的没有看到拉拉，也许他只是假装没有看到。拉拉感觉十分屈辱。这时，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儿从舞厅进到客厅。而科马洛夫斯基看那个女孩儿的眼神，她却十分熟悉。那个女孩儿娇羞不已，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拉拉气愤不已，差点叫出声来。“又是一个牺牲品。”她在心里想。拉拉看着那个女孩儿，犹如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拉拉还是想跟科马洛夫斯基谈一次，不过决定迟一点再

谈。她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回到舞厅。

科马洛夫斯基跟其他几个男人在玩牌。坐在他左手边的，这是拉拉在跟年轻人的交谈中得知的。年轻人的母亲就是那个着一身黑衣的高女人，她的眼神十分锐利，好似蛇一样在舞厅和客厅间来回扫视，注视着她跳舞的儿子和打牌的丈夫。后来，拉拉还知道了刚跟科马洛夫斯基调笑的女孩子正是年轻人的妹妹，并且她刚才的怀疑并非没有理由。

柯卡的儿子第一次介绍自己时，拉拉并没有留心他的姓氏，直到他又重复一遍——当时拉拉正滑着舞步坐到一张椅子上。“考纳克夫，考纳克夫。”拉拉好像想起了什么，想起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终于，拉拉记起来了。考纳克夫就是莫斯科中央法庭的那个副审判长，就是他宣布处死包括提沃兹恩在内的铁路工人的。当时科洛格里沃夫还应

拉拉的请求去找过他，但遭到了拒绝。“所以……有意思……考纳克夫……”

14

凌晨两点，尤拉感觉耳朵里嗡嗡直响。期间，舞会曾停过一次，众人喝茶吃点心补充体力，现在舞会再次开始。圣诞树上的蜡烛灭了，大家也懒得再去换。

尤拉不安地站在舞厅中央，看着冬妮娅跟一个陌生人跳舞。冬妮娅滑向陌生男人，裙子的荷叶边一颤一颤的——好似拍动的鱼鳍——然后隐入人群。

冬妮娅非常兴奋。中场休息时，她没有接别人递过来的茶，却吃了很多的橘子。冬妮娅剥掉橘子的果皮，然后用一块橘子瓣大小的手帕擦掉手指和嘴角上的橘子汁。她不停地大笑、说话，不时地将手帕拿出来，似乎根本就没有将手帕扎回腰带或藏进袖子的打算。

此刻，当冬妮娅和陌生的舞伴旋转着滑过皱眉的尤拉身旁时，她快速按了按尤拉的手，并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冬妮娅把之前紧攥在手中的手帕塞进了尤拉手中。尤拉将手帕压到嘴唇上，迷醉地闭上了眼睛。手帕上残留着迷人的橘子味和冬妮娅手的味道。这对尤拉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是一种能将他刺穿的锐利情绪。这股天真而纯稚的味道让他感觉亲密，他懂冬妮娅的意思，仿佛是她在黑暗中跟他耳语。尤拉将手帕按在自己的眼睛上，然后掠过嘴唇，呼吸上面的属于冬妮娅的味道。可就在这时，从里屋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盯着隔开舞厅和客厅的垂帘。有那么一瞬，屋子里连掉一根针都听得见。之后，人们反应了过来，屋子里顿时一片骚动。有人尖叫着仓皇奔跑，有人跟着柯卡跑进传来枪声的客厅，还有一些人从另一个方向跑过来，大

家哭着，喊着，说着。

“她怎么能这样，她怎么能这样！”科马洛夫斯基绝望地说着。

“波利亚，波利亚，告诉我你还活着。”考纳克夫夫人歇斯底里地大叫，“杜科夫医生在哪儿？有人说他在这儿。哦，他在哪儿，在哪儿？你怎么能说没什么，这只是外伤？哦，可怜的人儿，你就不该接近那些罪恶的人！她在那儿，那个贱人，就在那儿。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你个死贱人，你逃不掉的！科马洛夫斯基，你刚刚说什么？你？她本是要对你开枪？不，我接受不了，科马洛夫斯基，这种时刻太悲伤了，我没有时间听你开玩笑。柯卡，柯科察卡！你能相信吗，她是要杀你的父亲……哦……这是天意……柯卡！柯卡！”

客厅里的人潮水般涌进舞厅。考纳克夫走在最

前面，他笑着安慰大家说，他很好，只不过左手被擦伤了而已，所以用餐巾纸盖着。此时拉拉跟另一些人站在另一边，她站在最前头。

尤拉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又是这个女孩儿！又是这种情形！又是那个白头发男人。不过这次尤拉知道他是谁——一个享有盛名的律师，科马洛夫斯基，并且跟他父亲的庄园有些关系。他觉得没有必要跟他问好。两个人都假装不认识彼此。而那个女孩儿……所以就是那个女孩儿开的枪？肯定是因为某些政治原因。可怜的人。她的处境肯定很糟糕。她长得那么美！可那些愚蠢的人扭着她的手臂，好似她是个罪不可赦的人一样！

可尤拉很快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只见拉拉在那个女孩儿脚下一绊，趁女孩儿站不稳之际，其他人一哄而上将她拖到离得最近的一张扶手椅旁，将她

摁下。

尤拉想跑过去扶她，但就当时的情形，他还是得先过去问候一下中枪的考纳克夫才说得通。

“我是医生。”他说，“让我看看您的手。哦，您很幸运。伤口不碍事，都用不着包扎，不过为保险起见还是滴几滴碘酒上去消消毒。费里茨娅缇·塞蒙诺夫娜就在那边，我们过去问问她。”

这时，斯万提斯凯斯夫人和冬妮娅齐奔过来，两人都是脸色苍白。他们让尤拉赶紧拿衣服离开。有人送信来说他们家出了事儿，得让尤拉和冬妮娅马上回去。

尤拉心里顿时一沉，飞快地拿起自己的东西，将一切都置之脑后。

15

待尤拉和冬妮娅赶回家，安娜·伊娃诺夫娜已经死了。他们飞一般地奔上楼梯，可还是晚了十分钟。安娜是由于肺水肿造成的窒息，而这一病情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治。冬妮娅哭喊了几个小时，她尖叫，抽泣，泪眼模糊。第二天冬妮娅稍微平复了些，但无论尤拉和她父亲对她说什么，她都只是点头。每次一想开口，悲伤就会占据她的心，结果也就成了放声哭喊。

冬妮娅在安娜的遗体前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棺材放在平台上，覆满了花圈，而冬妮娅始终用手紧紧抓住棺材一角。她忘记了周围所有人的存在。但无论何时遇到朋友们的眼神，她都会快速起身，奔上楼梯，拼命压抑自己的哭泣，直到终于忍不住而倒在床上用枕头压住头绝望地哭喊。

悲伤，连续几小时地站立，失眠，大声唱悼歌，白天黑夜晃得人眼花头晕的蜡烛，再加上染上了风寒，尤拉的心里洋溢出一种甜蜜的混乱感，一种混杂悲伤和喜悦的激情。

十多年前母亲过世时，尤拉还是个孩子。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是怎样地哭泣，怎样地难过和恐惧。那时候，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自己的存在是否有价值。那时候，最重要的是除自己之外的人和事。外面的世界从各个方向压过来，好似一个郁郁葱葱的森林，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压得他找不到方向。而母亲的死之所以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他当时就迷失在那片森林里，突然间又发现母亲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那片森林里什么都有——有云朵，有商店，有着火的金球，还有奋力奔跑的光头男人。那儿有殿堂，有拱廊，有摸不到的星

空，还有上帝和天使。

那片高高的天空曾就在他的摇篮床前，母亲给他讲上帝的故事，那时候感觉天空那么那么近，仿佛伸手就能抓到。天空仿佛垂到了摇篮床上，沐浴着火光和金光，当他跟着保姆走进那个小教堂做晨祷或弥撒时，那片天空再次重现。天堂的星辰变成了圣像前的灯光，而上帝成了仁善的天父，一切都是那么地完美。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和在他身边若隐若现的城市就好似一个森林。那时的尤拉怀着某种本能的信仰，认为上帝就是那片森林的守护者。

可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同。在十二年的求学生涯中，尤拉学习了古典文学和雕塑，知道了各种传说，认识了不同时期的诗人，掌握了历史和自然科学，而这些成了他的成长史，他的家族史。现在的

他无所畏惧，不害怕生命也不畏惧死亡。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认识范围内，都是他那本人生字典中的词。尤拉觉得自己和宇宙是平等的。而安娜·伊娃诺夫娜的葬礼对他的影响跟母亲的葬礼对他的影响不一样，以前的他带着混乱、恐惧和痛苦祈祷，而现在的他会安静地聆听祷告，仿佛那些话直接是说给他听的。尤拉认真地听着每一句话，希望从中听出清晰的意思。他对天堂和人间的敬畏不带一丝宗教性，那完全是对人类祖先的一种原始崇拜。

16

“圣洁的上帝，万能的主，请宽恕我们。”那是什么声音？他在哪儿？他们肯定是想把棺材抬出去。他一定要醒来。凌晨六点，尤拉和衣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现在他们正满屋子地找他，但没有人想到要到书架后头的书房一角找找看。

“尤拉！尤拉！”马克尔在叫他。他们正把棺材抬出去。马克尔要举花圈，尤拉又不见踪影，更糟糕的是，由于露台上大衣柜打开的门堵住了卧室的门，他竟被堵在堆花圈的卧室里进退两难。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楼下传来一阵阵呼喊声。马克尔用力踢开门，扛了几个花圈下楼。

“圣洁的上帝，万能的主。”声音飘到大街上，仿佛一个鸡毛掸子挥过天空，一切都在摇摆

——花圈，过往的行人，驮马的头，神父手中的锁链，以及脚下白色的土地。

“尤拉！我的天啊！你总算出现了！”舒拉·史勒辛格晃着肩膀说，“你是怎么了？大家正忙着把棺材抬出去呢。你跟我们一道吗？”

“当然。”

17

葬礼结束了。乞丐们在寒冷中跺着脚，挤成两排。棺材上摆满了花圈，克鲁格的马车轻轻地摇摆。一行人离教堂越来越近。舒拉·史勒辛格从马车上下来，号啕大哭。她掀开面纱，露出挂满泪水的脸庞，扫视人群一眼。舒拉找到几个护柩者，冲他们招手，然后走进教堂。越来越多的人从车上下来。“那么，现在轮到安娜·伊娃诺夫娜了。她把最好的祝愿送给大家。她拿着票去了另一个地方，可怜的人儿。”

“是的，她的生命之舞结束了，可怜人，她去天堂了。”

“你是坐车去还是走路去？”

“站了这么久，我得舒展下筋骨。我们先走一

段，然后再坐车。”

“你看到福柯夫有多难过了吗？看着安娜的遗体，他都哭成了泪人，不停地擤鼻子。而且，他就站在安娜丈夫旁边。”

“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安娜。”

一行人缓缓向位于另一端的墓地走去。那天，就连坚霜都裂了开来。风停了，冬日的寒冷走了，连着带走了鲜活的生命——那一天似乎是专为送葬而准备。脏兮兮的雪看着像是蒙了一层纱，苍黑的枞树在教堂栏杆的后面摆动，湿湿的，好似也在为离人哀悼。

尤拉的母亲也埋葬在这块墓地中。近些年来，他没有再去母亲的坟前祭拜。尤拉向母亲坟墓的方向投去一瞥，轻声喊了一句：“妈妈。”

人群肃穆地分散开来，他们沿着清理好的小径站成几排，而小径的曲折其实跟他们带着悲伤的脚步并不相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牵着冬妮娅的手。克鲁格一家人紧随其后。冬妮娅穿黑色很好看。

白霜好似一道道胡子，从教堂的圆顶及粉色的墙壁上挂下来。在教堂庭院的另一端，洗好的衣服一排排挂在墙上——袖子湿透的汗衫，桃色的桌布，满是皱褶的床单。尤拉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同样是那个雷雨夜的一部分，尽管它的样子或许有所改变。

尤拉一个人走在最前头，他偶尔会停下脚步，好让其他人赶上来。大家理解尤拉心中的难过，知道他想独处，所以也就故意放慢脚步。尤拉一往无前，好似奔流而下的水一样无可阻挡，他做梦，思

考，寻找新的方式，创造美丽。他突然想明白了，艺术有两种不变的永恒的关切——它永远都在思考死亡，所以它永远都在创造生命。所有伟大的真实的艺术都有其相似之处，并且会继续证明圣·约翰的启示。

尤拉的心中生出一种愉快的期许，他想到或许一两天后他就能退到一旁，暂时离开宇宙离开家，专心写一首诗来纪念安娜·伊娃诺夫娜。他会把生命的无常写进来，把安娜·伊娃诺夫娜的高尚品德写进来，把冬妮娅的悼念，送葬回来后在街上发生的事情，教堂庭院里挂着的衣服写进来，把多年前的那场暴风雨，把那个哭泣的孩子写进来。

---

(1) Askold，俄国的开国者之一，葬于凯耶夫。

(2)　凯耶夫的另一个王子，传说被他最心爱的马的头盖骨中的毒蛇咬死。——作者注

(3)　正教会和天主教会有七件圣礼，分别是：洗礼、坚信礼、圣餐、神职受洗礼、忏悔礼、病者涂油礼和婚礼。新教只有两件即洗礼和圣餐。——译注

(4)　酒神，狄奥尼索斯与罗马人信奉的巴克斯是同一位神祇，推动了古代社会的文明并确立法则。

(5)　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译注

第四章　命中注定

1

拉拉发着烧，意识模糊地躺在费里茨娅缇·塞蒙诺夫娜的床上。斯万提斯凯斯和仆人们还有杜科夫医生在她旁边小声地说话。

屋子的其他地方是黑漆漆空荡荡的一片。只有在小小的客厅里点了一盏灯，灯光昏暗地照着一溜房间。

科马洛夫斯基愤怒地踱来踱去，他步子很重，仿佛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根本不拿自己当外人。科马洛夫斯基不时地往卧室里张望，然后走到屋子的另一头，经过挂着金属箔的树，走进放满各

式餐盘和锃亮酒杯的餐厅。每当有马车经过或有老鼠在放满瓷器的桌布上快速爬过，那淡绿色的水晶酒杯就会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科马洛夫斯基一肚子火气。他的胸腔仿佛燃烧着一团火，真是耻辱，真是丢人！他无法冷静。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的名声肯定会因此而受损。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想办法阻止流言。就算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也要把流言消灭在萌芽中。

他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再次不可阻挡地被那个疯狂而绝望的女孩儿吸引住了。他一直都知道，拉拉是与众不同的，她身上有一种其他女孩儿没有的东西。但他不知道自己竟如此深地伤害了她，让她如此伤心，他也没想到拉拉会这么坚决地要改变命运，让一切重新开始！

毫无疑问，他得想办法帮帮拉拉。也许，首先

得给她一些空间。不过他一定不能靠近她，相反，他还得跟拉拉保持距离，不挡她的路。不然，以拉拉的强悍个性，还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一堆麻烦事等在前面！并且这可不是什么往头上吐口水的小争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事情发生还不到两个小时，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洛夫斯基必须得到厨房里去，跟警官商谈，把事情摆平。

而这件事拖得越久就会变得越复杂。他们肯定会千方百计地给拉拉定罪，证明她是有意射杀他，而不是考纳克夫。即便如此，事情也不会如此轻易地了结，拉拉或许能逃脱部分指控，但她最后还是得背上一个谋杀的罪名。

毋庸置疑，科马洛夫斯基愿意做任何事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如果这件事闹上了法庭，他打算从

法医那儿找证据，证明拉拉只要没有开枪伤到人，就不需要为此事负责。

想到这些，科马洛夫斯基渐渐平静下来。夜晚结束了。一束束灯光从这个房间照到那个房间，贼一样躲在桌椅之下。

科马洛夫斯基最后看了一眼卧室，他知道拉拉现在情绪不太好。他打算去见一个朋友——拉菲娜·奥尼辛莫弗纳·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基——一名女律师，而她的丈夫是一位有名的政客。沃伊特科夫斯基现在住的房子对她而言有些过大了，并且要打理那么大一所房子需要不少钱，所以她便空出了两间房。其中一间最近没人住，科马洛夫斯基打算让拉拉住到那儿去。就这样，几个小时之后，发着烧的拉拉便意识不清地住进了科马洛夫斯基为她找的房子里。

2

拉菲娜·奥尼辛莫弗纳是一位目光远大公平公正并且对一切她称之为“积极而重要”的人和事心存好感的人。

拉菲娜衣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份作者亲自献词的《爱尔福特纲领》。墙上挂着一幅她丈夫的照片，还有一幅她跟普列汉诺夫在瑞士某条巷子里的合影，两人当时都身穿羊驼呢夹克，头戴巴拿马帽。

拉菲娜·奥尼辛莫弗纳一看到她那病怏怏的房客就不甚喜欢。她认为拉拉是故意装病。在拉菲娜看来，拉拉的发烧都是装出来的。她甚至还认为拉拉是想效仿在地牢里装疯的格雷琴。

拉拉来了之后，拉菲娜变得格外活跃，以此表

达对拉拉的轻蔑。她重重地关门，大声唱歌，在房间里风风火火地做事，并且窗子整天都开着。

公寓位于安柏特一栋房子的顶楼。冬至过后，在房间里透过窗户便能望见蓝蓝的天空，好似涨水的河流。冬天即将过去，四处都是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

和煦的南风刮过窗扉，远处火车站的火车头海狮一样咆哮轰鸣。而缠绵病榻之上的拉拉，只能用回忆来打发时光。

她时常想起离开乌拉尔抵达莫斯科的那个夜晚，那已经是七八年前了，也是她童年时最难忘的日子之一。那时候的她，跟家人一道从火车站坐一辆马车穿过阴沉的巷子去位于城市另一端的旅馆。路旁的街灯将马车夫的影子投射在墙上，随着马车的前行，墙上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大，一直延伸到屋

顶，然后被切断。接着，又会有新的影子出现，一切从头开始。教堂的钟声从黑暗的前方传来，静寂中还能听见手推车穿过街道的声响，但让拉拉震耳欲聋的却是街道两旁华丽的窗子和闪亮的灯光——它们好似能发出声音，就跟那教堂的钟和推车的轮子一样。

在旅馆的房间里，拉拉看见了一个大得不可思议的西瓜。那是科马洛夫斯基为迎接他们准备的礼物，而在拉拉看来，那就是科马洛夫斯基权力和富有的象征。当科马洛夫斯基用一把水果刀将那硕大无比的深绿色西瓜一切为二，露出红红的瓜瓤，拉拉竟感觉到害怕。科马洛夫斯基递给拉拉一块西瓜，而她不敢拒绝。香甜的瓜瓤堵在她的喉咙里，但她却强迫自己把那西瓜吞下去。

拉拉一开始是被那昂贵的西瓜和莫斯科的夜生

活所震慑，而之后她更是被科马洛夫斯基本人唬住——这是解释一切的真实原因。

可现在科马洛夫斯基却不可思议地变了。他不再提要求，也不揭她的伤疤，甚至都不来看她。一段时间以来，他始终跟她保持距离，只是礼貌地给予她各种帮助。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却带给她完全不同的感觉。每次他来，拉拉都欣喜不已。这不仅是因为科洛格里沃夫的高大英俊，也不只是他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他那闪亮的双眸和聪明的笑容每次都能给她带来无限阳光。

科洛格里沃夫坐在拉拉的床前，摩挲着自己的手。平时哪怕是被邀请参加在彼得堡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科洛格里沃夫都能对着那些达官显贵侃侃而谈，可现在他坐在这个年轻的姑娘床前，却感觉不

知所措。科洛格里沃夫一直把拉拉看作他的家人，甚至就跟女儿一样，尽管他只是偶尔才会跟她有眼神或语言交流——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家人对此也非常了解。他始终把拉拉当成一个孩子，所以对她就没有对成年人的那种严肃和冷漠。他不知道要怎样说话才能不冒犯她："你有什么想法？"科洛格里沃夫微笑着说，好似她是一个孩子，"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戏剧化的事呢？"

科洛格里沃夫顿了顿，目光转向墙上和天花板上潮湿的污点。接着，他责备地摇了摇头，继续说：

"杜塞尔多夫（联邦德国城市）有一个关于绘画、雕塑和园艺的国际展览开幕。我打算过去看看。你这儿有点潮湿，这你也是知道的。所以，你打算在这个又小又潮湿的地方住多久呢？那个叫沃

伊特的女人，实不相瞒，并不是什么好人，我先前就认识她。你为什么不搬出去呢？你已经在病床上躺得够久，现在也应该起身了。换个地方，学点什么东西，完成你的学业。我有一个画家朋友，打算去土耳其斯坦待两年。他的工作室里有个隔间，其实跟小公寓差不多。他想把工作室翻新一下，顺便也把工作室交给对方照看。如果我去接下这个事，你觉得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这也是我早就该做的……自从莉帕……这儿有一笔小钱，就当作你辅导莉帕顺利毕业的奖金吧。不，我请求你，你不要固执……真的，你一定要收下这笔钱……”

尽管拉拉百般拒绝，她哭，她推让，但科洛格里沃夫临走前还是强迫她接受了一张一万卢布的支票。

拉拉康复之后，搬去了科洛格里沃夫跟她提到的地方，那儿离斯莫莱恩斯基市场很近。房子位于一栋老式两层楼的二楼，另外还有几个卡车驾驶员住在另一个房间，一楼是一个仓库。铺满鹅卵石的院子散落着燕麦条和干草。鸽子在其间飞来飞去，每当有老鼠从石沟里窜过，鸽子就会一窝蜂地飞起来，跃过拉拉的窗前。

3

拉拉十分挂虑帕沙。从她病重起，帕沙就没办法来看她，这样难免她不会多想。帕沙原以为那个男人只是拉拉的旧识而已，可拉拉竟将枪口对准了他，那个男人之后还想方设法帮她脱罪。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圣诞节依偎着烛光的难忘对话之后。要不是这个男人，拉拉恐怕会被警察抓捕并被送上法庭。他帮助拉拉摆脱了惩罚。也多亏他的帮助，拉拉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不再受伤害。帕沙对此感到十分迷惑，同时又备受折磨。

拉拉身体状况好一些之后，她让人带话给帕沙：“我是个坏女人。你对我不了解，有一天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但我现在还不能说，每次一提起那些事我就会忍不住哭。忘了我吧，我不值得你的感情。”

接下来的一幕幕更是让人心碎，让人无法承受。拉拉仍住在安柏特大街，一日她和形容憔悴的帕沙在路上迎面相遇。拉拉飞快跑回家，瘫坐在沙发上，苦笑着对自己说：“哦，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她大叫着，“他是个英雄，真的！哈！哈哈！”

为了让帕沙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也为了让他对自己彻底死心，拉拉对帕沙说，她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不再爱他了。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拉拉多次泣不成声，所以这些话根本没有说服力。帕沙也曾对拉拉有过最恶毒的猜忌，不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也曾下定决心要恨她一辈子，可是他太爱她了，爱到不能自已。他甚至会嫉妒存在于拉拉脑中的想法，嫉妒她喝酒的马克杯，嫉妒她睡觉时用的枕头——只因它们离拉拉那么近。所以为了避免两个人都被感情逼疯，他们必须迅速而果决地行动。

两个人决定马上结婚，不再拖到毕业之后。最初的想法是把婚礼定在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一。不过，婚礼后来还是按照拉拉的意思延期了。

他们最终是在圣灵降临节[(1)]举办结婚仪式，而在此之前两人都已顺利通过结业考试。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由拉拉同学图斯娅的母亲柳德米拉一手操办。柳德米拉模样俊俏，身材丰满，声音也很是好听，但她的脑袋里尽是一些迷信想法——有些是她从别处得来的，有些则是她自创的。

拉拉走向圣坛的那一天，天气十分炎热。教堂的金色圆顶和花园新铺好的沙道反射着黄色的光芒。青翠的桦树沿着教堂的栏杆排排而立，叶子卷曲，好似被火烧焦了一样。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耀眼的阳光更是让人眼冒金星。那天好似有一千场婚礼要举行似的，因为所有年轻姑娘都不约而同地

穿上了白色的裙子，绾起一头秀发，小伙子们也都穿上了紧身的黑色礼服。所有人都很兴奋，所有人都感到燥热难耐。

当拉拉踏上通往圣坛的地毯时，她另一个朋友的母亲拉格戴娜扔了一把银币在她脚旁，寓意一对新人未来生活幸福。出于同样的好意，在拉拉戴上新娘头冠时，柳德米拉告诉她绝对不能用裸露出来的手指画十字，一定要用头纱或蕾丝边包裹住手指才行。她还告诉拉拉要尽可能高举蜡烛，这样她日后就能在家里有话语权。拉拉对帕沙仍是心存愧疚，所以她尽可能地压低蜡烛，但这还是没用，因为无论她把蜡烛压得多低，帕沙总会比她压得更低。

从教堂出来，一行人直接驱车去到作为他们新房的工作室用早餐。宾客们大喊，“太没劲

了！”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亲一个，亲一个，让我们分享点甜蜜！”新娘和新郎羞涩地相视而笑，然后亲吻。柳德米拉应景地唱起《葡萄园》，其他人也随之跟着唱起来，以表示对新人的祝福。

待到宾客散尽，只留一对新人单独相处，屋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帕沙感觉有些不自在。这时，突然从街上射过来一道亮光，尽管拉拉用力拉上窗帘，那光还是从窗帘缝中漏了进来。这道光让帕沙更加不安，他感觉跟被监视了一样。帕沙惊慌地发现，此刻他想的更多的是那盏街灯，而不是拉拉或他自己或他对拉拉的爱。

这天晚上，安提波夫的心情跌宕起伏。拉拉对他坦诚了一切。他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而拉拉每回答一个问题，他的心就更沉一些，沉进深渊。拉拉说的实情，是任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那天晚上，两人促膝长谈，直到破晓。在帕沙的生命历程里，从未有什么事情让他产生那样迅速又突然的变化。他变了，彻底地变了，变得一点都不像帕沙·安提波夫。

4

九天之后，帕沙和拉拉的朋友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送别派对，还是在那个房间。帕沙和拉拉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在乌拉尔的同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两人打算第二天便动身离开。

一群人再次喝得酩酊大醉，不过这次都是些年轻人。

拉拉的工作室和卧室由一块隔板隔开，隔板后面放着一个很大的柳编食篮，一个稍微小点的行李箱，一箱子陶器还有几个麻布袋。两个人的行李加起来还真不少，他们打算第二天把部分行李先寄过去。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不过大箱子和柳编篮子里还余一点空间。拉拉一下子想到这个一下子想到那个，把东西都塞进去并整理好。

拉拉去学校办公室拿出生证明和其他材料，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帕沙正在家里招待宾客。一个行李托运工跟在拉拉后头，肩上挑着几个麻袋，准备把东西送到码头上去。托运工走后，拉拉也连忙过去招呼宾客，或握手或吻面，过了一会儿才到隔板后头换衣服。待她换好衣服出来，众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的出场，跟前几天一样，一个热闹的派对开始了。人们不停地往旁边的人的酒杯里倒伏特加，手上的餐叉忙不迭地伸向摆满面包、甜点和主菜的桌子中央。有人演说，有人祝酒，有人不停地开玩笑，也有人喝醉了。

“我累死了。”拉拉对坐在身旁的丈夫说，“你能把这些事情搞定吗？”

“可以。”

“那就好，感觉真好。我好开心，你呢？”

“我也很开心。感觉很棒。不过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好好谈谈。”

来参加派对的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科马洛夫斯基是唯一一个例外。酒过三巡之后，科马洛夫斯基说，两个年轻朋友的离开让他好生难过——他们走后，整座城市会变成沙漠，没有一点生气。科马洛夫斯基显得十分激动，好几次都泣不成声，然后又从头开始说。

科马洛夫斯基请求安提波夫到时候给他写信，如果忍不住想念，一定要到尤瑞尔坦看他。

“没那必要。”拉拉冷冷地说，“你说的写信、撒哈拉什么的统统都是胡说，没有意义。至于来拜访，更是想都别想了。没有我们，你也一定能过得很好，反正我们对你没那么重要。帕沙，你觉得呢？我敢打赌，你很快就会找到其他朋友的。”

可说着说着，拉拉似乎就忘了她在跟谁说话，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待回过神来，她慌忙跑去厨房。拉拉把放在厨房的绞肉机拆开，然后将机器的零件塞进陶罐的角落，并用麦秆封好口。可一个不小心，她的手被陶罐刮了一道口子。

这时，隔板的另一边传来一阵响亮的笑声，拉拉想起那边还有好多的宾客。她想到，人们喝醉的时候，总是试图模仿那些酒鬼；喝得越醉，就越爱模仿。

拉拉突然又听到，院子里有古怪的声音透过打开的窗户传进来。她拉开窗帘，探出身往外张望。

只见一匹跛脚的马正一瘸一拐地奔过院子。拉拉不知道那是谁的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进到院子里的。当时天光已经大亮，尽管太阳还没升起来，城市也还在沉睡。一切都沐浴在清晨灰蓝色的寒光

中。拉拉闭上眼睛。跛脚马的马蹄声一下一下传到她的耳朵里，将她的思绪带到某个遥远的小村庄。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拉拉连忙捂住耳朵。桌子旁有人起身去应门。是娜迪亚来了！拉拉跑过去迎接她。娜迪亚是直接坐火车过来的，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清新气息，仿佛她同时也带来了杜普兰卡山谷百合的香气。好友见面两人相顾无言，只是紧紧地拥抱彼此，低声啜泣。

娜迪亚向拉拉转达了他们全家人的祝福，并送上她父母准备的礼物。娜迪亚从她的行李箱中拿出一个珠宝盒，旋即打开，里面是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

周围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有人喜悦，有人惊讶。一个喝醉酒的客人说：“那是粉锆石。是的，粉色锆石，随你们信不信。我绝对没看错。跟钻石

一样名贵。”

但娜迪亚说项链是黄色蓝宝石。

拉拉把娜迪亚安排在她旁边的位置，夹菜倒酒，好不热情。她把宝石项链放在手边，总会情不自禁地看上两眼。宝石项链嵌在珠宝盒淡紫色的镶垫上，时而像晶莹的露珠，时而像一小串紫色的葡萄。

与此同时，那些清醒过来的宾客再次上场，说是要陪娜迪亚喝酒，娜迪亚也被灌醉了。

很快，公寓里的人都醉得不省人事。他们大多数人都打算第二天一早送拉拉和帕沙到火车站去，所以便都留下来过夜。早在娜迪亚过来之前，很多人就已是鼾声连天，拉拉也不知道她后来是怎么和衣倒在沙发上睡着的，她旁边躺着的是伊拉·拉格戴

娜。

拉拉是被一阵说话声吵醒的。那声音很陌生，拉拉意识模糊地以为是马主人找来了。拉拉睁开眼睛，见屋子中央站着一个男人，她在心里想：“帕沙一大早在那儿干什么呢？”可当那个男人转过头来，她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脸——一张满是雀斑的脸，上面还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眉毛一直延伸到下巴处。拉拉猛然反应过来有窃贼闯进来了，她想大声叫喊，却叫不出声。她想起自己的宝石项链，于是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向她放项链的地方。

项链还在那儿，被一堆面包屑和没吃完的糖果包围。桌子上一片狼藉，所以窃贼没有发现项链。那些人只是在拉拉精心打包的箱子里头翻找，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当时半睡半醒且微醺的拉拉只能想到这些。她感觉心里压着一股火气，想大叫，但

她还是叫不出声来。于是，她用膝盖狠狠地撞了下伊拉的肚子，伊拉痛得尖叫起来，拉拉也跟着叫起来。窃贼连忙丢下东西，飞一般地逃走了。有些男宾客跳起身，下意识地要去追那窃贼，不过等他们追到门口时，那个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这阵骚动把所有人都弄醒了，拉拉感觉头脑突然清醒了许多，她让大家干脆都别睡了。然后，拉拉给众人泡了咖啡，打发他们各自回家，等要去火车站的时候再过来。

接着，拉拉火急火燎地把一些床上用品塞进行李箱，用粗绳子捆好行李，并不让帕沙和门房的妻子帮忙。

一切都收拾妥当。安提波夫和拉拉及时赶上了火车。火车顺利启动，朋友们在后头纷纷挥帽致意，向他们告别。火车渐渐加速，大家不再挥帽，

而是齐声喊了三次“呜啦！”

5

离开的第三天，天气糟糕得不得了。这已经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秋天。失败紧随第一年的胜利而来。布鲁希洛夫领导的第八军原打算在喀尔巴阡山集结，并顺势而下进入匈牙利，可现在却节节败退。俄国人在战争的一开始便占领了加利西亚——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是西班牙干白葡萄酒最出众的产区，可现在却不得不撤出该地区。

日瓦戈医生——也就是我们的尤拉——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称为尤里·安德雷维奇，站在医院妇产科的过道上。他刚把妻子冬妮娅——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送进产房。他跟妻子深情告别，然后静静等待助产妇的到来，以告诉助产妇需要时能在哪儿找到他，并询问如何才能跟她联系上。

日瓦戈心急如焚，因为有两位病人正等着他，

他得尽快赶回医院。可现在他却任这宝贵的时间浪费，出神地望着窗外被秋风吹斜的雨。

天还未完全黑下。日瓦戈还能看见医院的后院和德维奇私人住宅区的落地窗阳台，还有那条通往医院某个楼群的小路。

外头大雨滂沱，并且始终保持同样的雨势。尽管风吹得很急，但那雨既没有加大的趋势，也没有小下来的可能，风似乎被雨水的无动于衷所惹怒，呼号不止。一阵阵狂风吹动屋前的爬行植物，好似要把它们连根拔起，扔到空中，再重重地摔下。

一辆送病人的推车经过露台往医院入口驶去。里头是受伤的病人。

莫斯科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尤其是卢茨克战役打响之后。不得已只好把伤员安置在过道和露台

上，渐渐地就连女性病房也受到影响。

尤里·安德雷维奇收回眼神，疲倦地打了个哈欠。他没有其他事情可想。突然他想起在他工作的圣十字医院发生的一件事情。几天前，一个女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尤里·安德雷维奇诊断她患的是肝胞虫病但其他医生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将会对那个女人进行身体解剖，但这个案子的审判官是个酒鬼，所以根本不知道这次他会怎么判。

夜幕突然就降临了。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恍如魔法一般，千家万户的窗前同时亮起了灯。

主妇产科医师穿过狭窄的隔间，从冬妮娅的产房出来。主医师体格健硕，不管你问什么，他总是以耸肩和盯着天花板看作为回应。这些沉默姿态的意思是说，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达，这世间总有科

学无法企及的东西存在。

他从尤里·安德雷维奇身旁经过，笑着点了点头，并连着好几次甩动自己短粗的手，意思是说现在只有耐心地等待，然后就走到过道那头的休息室里抽烟去了。

接着，主医师的助手出来了，这位女助手很喜欢唠叨，跟她的顶头上司形成鲜明对比。

“换作我是你，我现在肯定先回家。”她对尤里·安德雷维奇说，“明天我会去圣十字医院找你的。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不太可能再生出变故。现在看来自然分娩是完全可能的，无须借助手术剖腹。当然，由于你妻子的骨盆较小，小孩子的脑袋刚好处于枕后位，所以不会有太大的痛苦，收缩也不会很厉害。因此，你真的无须担心。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定论，具体情况得看分娩开始之后你妻子的

疼痛情况。”

第二天，尤里给医院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让他稍等一会儿，并马上会替他询问情况。尤里心急如焚地等了十几分钟，接线员才回来，并含糊其词地说：“他们说，你妻子送来得太早了，让你先把她接回去。”

闻言，尤里·安德雷维奇不禁火冒三丈，他要求让护士马上来听电话。“可能是搞错了症状。”护士说，“再过一两天，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第三天，医院通知尤里说前一天晚上冬妮娅就开始分娩，破晓时羊水破了，从清早开始，冬妮娅就间歇性地出现强烈刺痛。

尤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医院。他穿过走廊，

走到产房外，产房的门是半开着的，他听见冬妮娅心碎欲裂的尖叫声。冬妮娅又喊又叫，好似被火车轮子碾碎了双腿一般痛苦。

这时，一个护士从产房出来，瞬间，他听到了一个新生儿的嘤咛声。“她安全了，她安全了。”尤里·安德雷维奇高兴地自言自语道。

“是个男孩儿。恭喜你，母子平安。”护士也很高兴同，“不过你现在还不能进去，等一切都弄妥当了，我们会让你进去看的。现在，你最好给你妻子精心准备一份礼物，她为了生这个孩子可是受了不少罪。因为这是头生子，生头生子一般会比较麻烦。”

“她平安了，她平安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十分开心。他不明白护士在说什么，也不明白护士为何要向他道喜，好似那个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一

样。现在他该怎么办？父亲——儿子。他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因为初为人父而感到骄傲，他感觉儿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下子发生太多事情了，尤里还没太反应过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冬妮娅——一度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冬妮娅——现在安然渡过难关。

身材高大的妇科医生身穿白外套，突然就出现在尤里面前，好似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

“你打算去哪儿？”他屏住呼吸轻声问道，这样母亲就不会被吵醒。“你是疯了吗？她失了这么多血，还冒着败血症的危险，你可千万不能再影响她的情绪！你以为自己是医生呢！”

“我不是……就让我看一眼。我就站在这儿透过门缝看一眼。”

“哦，那样子还能接受，如果你坚持要看的话，那就看一眼吧。不过你可别让我抓到……要是让她看到你，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产房里头，两个穿白色制服的女人背对门而站，那是助产妇和护士。只见一个柔软的颤抖的小人儿在护士手心蠕动，好似一块深红色的橡胶不断伸缩着。助产妇剪断脐带之前，先在冬妮娅肚脐上扎了一条绷带。一张可调节高度的手术床放在屋子中央，冬妮娅就躺在那上面，躺的位置十分高。处于狂喜中的尤里·安德雷维奇就更加夸张，他觉得那高度有供人站着写字的书桌那么高。

冬妮娅躺着的手术床升得很高，比普通产床更靠近天花板，加上身体的余痛未消，她只感觉筋疲力尽。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看来，冬妮娅好似一条于卸货之后在港口里休息的小船，一条满载新生命在

未知地方穿梭并渡过死亡之海的小船。其中一条生命落地了，所以船也就抛锚休息，船板也顿时空了许多。冬妮娅的整个身心都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她忘记了彼岸，忘记了穿越过的海峡，也忘记了途中的搁浅。

由于没有人去过她的那个国度，所以没有人知道要用什么语言同她交谈。

尤里·安德雷维奇所在医院的每一个人都对他表示祝贺。消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让他倍感诧异。

尤里走进职工房，也就是很多人说的“垃圾堆”。因为医院实在是人满为患，所以那个小地方就被用作衣帽间。而穿着雪地靴从外面进来的人常常会忘记清理，所以地板上到处都是纸屑和烟蒂。

胖胖的解剖医师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个装有

透明液体的罐子，他高举罐子对着光观察里头的液体。

“恭喜你。”他说，不过没有回头。

“谢谢您。您真好。”

“别谢我。我没做什么。是皮丘西金做的解剖。不过每个人都被震住了，确实有水胞虫。他们都说你简直是神了。所有人都那么说。”

就在这时，医院主任走进来，跟他们两个打招呼，然后说：“这个地方究竟是怎么了？看看那乱七八糟的样子！对了，日瓦戈，确实是！我们都错了。祝贺你，你的坚持是对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有点麻烦，他们又在修订那份豁免名单。这次我也是无能为力。目前我们急缺医务人员。用不了多久，你就等着闻火药味儿吧。”

6

安提波夫两口子在尤里安提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古伊沙尔一家人也没被忘记。还帮助拉拉克服重重困难，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建了一栋房子。

拉拉有着做不完的事，想不完的事。她既要料理家务，又要照顾三岁的女儿凯特恩卡。尽管他们雇用的红头发女仆马尔福卡竭尽全力帮忙，可还是有些事情会做不完。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和丈夫可谓志趣相投。她在一所女子学校教书，可谓不知疲倦，不过她教得很开心。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拉拉喜欢尤里安提。这是属于她的地方。尤里安提坐落在雷恩瓦大河旁，除上游外其他水域均可通行，并且乌拉尔的一条铁路从中穿行而过。

在尤里安提，冬天到来的消息总是由船主带来的。他们从外头回来，带回来满船的货物，储在后院中。那些东西就露天放在院中，直到春天的来临。在尤里安提，如果船灯朝上，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的鹳开始迁徙或者开始下第一场雪。安提波夫的院子里头也停着这样一艘船。凯特恩卡经常在上面玩，把那白色的船体当作凉亭。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喜欢尤里安提人简单朴实的生活方式，喜欢拖着长元音的北方口音，喜欢当地穿毡靴和灰色法兰绒无袖大衣的知识分子。她被这块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深深吸引住了。

矛盾的是，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作为一个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竟然摆起了城里人的架子。他对尤里安提的居民百般挑剔，认为他们粗鲁又愚昧。

帕维尔拥有一种快速阅读和储存知识的特殊能力，而这种能力现在全部凸显了出来。受拉拉的一部分影响，帕维尔从前就读过许多的书。到尤里安提之后，由于他不屑与其他乡野村民交往，看书便成了他的主要乐趣，渐渐地他的学识甚至超过了拉拉。帕维尔的学识远超其他教师，身处那些教师中间，他感觉到知悉一切。身处战时，其他人的为人标准、意见常识和某些陈腐的爱国主义论调与帕维尔格格不入，他对祖国的感情也是又爱又恨，颇为复杂。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大学时主修古典文学，所以他在学校主授拉丁语和古代史。不过从念文科中学开始，他就始终对精密科学、物理学和数学保留着兴趣，而这种热情此时突然在他心中重新点燃了。帕维尔在家自学这些科目，水平可与本专业大学生比肩。他渴望能拿到相关专业的学位证书，专心研

究数学的某个分支，并和家人一同搬去彼得堡。帕维尔经常研究到深夜，这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渐渐的，他患上了失眠症。

帕维尔与妻子拉拉的关系很好，但他们之间缺少一种温情。拉拉的善良又暴躁的个性让帕维尔倍感压抑，但他不敢说出来，因为他怕拉拉会把他无心的话当成责怪——也许是因为拉拉天生就敏感多疑，也许因为拉拉曾跟其他人在一起过。帕维尔担心拉拉怀疑自己有什么想法，以至于两人从此以后只能虚伪相待。两个人都想表现得比对方更有风度，而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一天晚上，他们家来了几个客人，其中一个是拉拉所在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其他几个女老师及其丈夫，当地仲裁法庭的法官，以及其他几个人。在帕维尔看来，那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笨蛋。但让他

大跌眼镜的是，拉拉却对那些客人热情有加，他不相信拉拉会真的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

客人走后，拉拉花了很长的时间打扫屋子，并跟马尔福卡一块儿在厨房里洗碗。然后，在确认凯特恩卡盖好了被子并且帕沙也睡着了之后，拉拉迅速脱掉衣服，关上灯，好似孩子依偎着母亲一般自然而然地在帕维尔身旁躺下。

但安提波夫其实只是假装睡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深受失眠的折磨。帕维尔知道自己接下去会在床上翻来覆去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于是他决定起身，暂时离开仍有烟味弥漫的房间，去外面透口气。他悄悄地爬起来，穿好皮毛大衣，并往头上罩了个帽子，走出门去。

那是一个清冷的秋日夜晚。每走一步，脚下的薄冰都会碎裂开来。星星在天空闪烁，洒下一片淡

蓝色的光芒，好似在黑色大地上煮酒燃烧起来的火焰。

安提波夫家住在河港的尽头，远处有一条铁路交叉道和一个岗哨。

安提波夫在倒转的船舷边坐下，抬头仰望星空。一想到过去几年中他已经适应的那些想法，帕维尔就感觉身体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力量。他觉得，人总有一天会走向死亡，所以哪怕现在死了也没有关系。

不过帕维尔对自己说，不能再这么想下去。早在他和拉拉结婚之前，他其实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只是当时也已经太晚。早在少年时期，他就迷上了拉拉，他愿意为拉拉做任何事。结婚前的那个冬天，当拉拉坚持要结婚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及时拒绝？拉拉爱的并不是他，只不过她为自己定下

的那个宏伟目标与他有关系而已，这点并不难看出来，难道说他只是拉拉英雄主义的一个象征？不管她的梦想多么值得称赞或多么发人深省，那跟真实的家庭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最糟糕的是，尽管这样，他还是跟以往一样爱着她。拉拉太美了，简直美得炫目。可到了现在，他真的确定自己对拉拉的感情就是纯粹的爱吗？里面是否有对她的美和她的慷慨的感恩？谁能给出一个答案？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

那么，他接下来要怎么做？他一定要将妻子和女儿从这虚伪的生活中解脱出去。这甚至比解放他自己还来得重要。这个没错，可他要怎么解救呢？离婚？投河自尽？太让人恶心了！这种想法让他觉得无法接受。

“我可从来没干过那样的事，所以为什么要一

遍遍在脑海里上演这种悲剧情节呢？”

帕维尔抬头仰望星空，似乎想从中寻找答案。星星一闪一闪，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散发出蓝色的光，有的则折射出彩虹的光彩。突然间，那些星星被遮盖住了，连同房子、院子、安提波夫屁股下坐着的船，这一切都被一道刺目的闪电掩盖住了，好似有人举着火把从田野跑向城门。这时，一辆军用火车喷吐着黄色的烟雾，跟过去一年中夜以继日奔波的那些火车一样，穿过铁路交叉道往西走去。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站起身，脱衣上床睡觉。终于，他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摆脱困境的办法。

7

当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知道他的决定之后，她惊呆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太荒唐了！”她想，“简直是异想天开。我不会把它当真，过段时间他自己也会忘却的。”

但看起来，帕维尔似乎已为此做了两星期的准备。他已经把辞职材料递交给了招聘办公室，学校也紧急找了一个代课老师，另外帕维尔被奥姆斯克军校录取帕沙的通知书也已经到了。

拉拉听闻这些消息，跟个乡妇一样放声痛哭，她抓着帕沙的手，抱住帕沙的大腿。“帕沙，帕维尔！”拉拉大叫，“不要离开我们。不要这么残忍，不要。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会把一切事都处理好。你都还没有正式进行身体检查，而且你的心脏……你觉得现在反悔会很丢脸，是不是？可你为

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而牺牲自己的家庭，难道这就不可耻吗？你，竟然当了义务兵！一直以来，你都嘲笑罗迪亚，可现在你竟然嫉妒起他来了。将来你也得穿着军队制服大摇大摆地走路，你也得佩带军刀去巡逻。帕沙，你是怎么了？现在的这个你，我都不认识了。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你老实告诉我，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你告诉我实话，俄国真的需要你这样做吗？”

说到这儿，拉拉突然想到了什么。尽管她不明白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她知道了最重要的导火索。帕沙肯定是误会她对他的态度了。帕沙讨厌她的那种母爱的感觉，好似她的生命就是对他的爱的一部分，他不明白这种爱并不比普通的男女之爱少，反而爱得更多。

拉拉紧咬自己的嘴唇，身体好似被人抽了一鞭

似的抽搐，她努力把眼泪吞回肚里，然后开始沉默地替帕沙收拾东西。

帕沙走后，整座城市似乎都安静了下来，甚至连外头的乌鸦都少了。“夫人，夫人！”马尔福卡语带责备地叫着，想让拉拉回过神来。“妈妈，妈妈。”凯特恩卡也边奶声奶气地喊着，边扯拉拉的袖子。这是她这一生最大的挫败。她编织的最美好的梦破碎了。

帕沙从西伯利亚寄来了信，告诉拉拉他的心情。他说现在已经明白自己的错误，他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后，帕沙被任命为中尉，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就被派往了前线。帕沙这一走，离尤里安提就是十万八千里地的远，并且他在莫斯科待的时间也很短，根本来不及见任何老朋友。

帕沙从前线写来的信比在奥姆斯克学校写的信

要积极一些，似乎情绪也好了许多。帕沙说，如果他能在军事行动中表现突出或身受轻伤，他就能请假回家看望家人。很快，帕沙的机会就来了。布鲁希洛夫的军队一路高歌，不断进攻。渐渐的，拉拉就收不到帕沙写来的信了。一开始，拉拉还不怎么着急，以为是受军队急行军所致。可进入秋天以来，进攻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军队在战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而帕沙还是没有消息。这让拉拉担心起来，她四处打听，一开始是在尤里安提当地打听消息，之后就按照原先的地址寄信到莫斯科。可是信寄出去了却一直没有回应，似乎大家对此都是一无所知。

跟其他留在家里的女人一样，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也在镇属的军区医院帮忙。她严格地训练自己，如今成了一个合格的护士。拉拉跟学校请了六个月的假，把房子交给马尔福卡看管，然后带着凯

特恩卡到莫斯科去。她跟莉帕一道走，莉帕的丈夫傅里艾森丹科被德国人抓住了，跟其他人一起被关押在乌法。

拉拉知道，写信是不会再有任何回应的，所以她决心亲自去寻找帕沙。抱着这个目的，拉拉在一家军区医院找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并随军去到俄匈边界上的麦哲-拉勃齐——帕沙的最后一封信就是从那儿寄过来的。

8

一辆贴有红十字标志且载有许多由塔提亚娜伤兵救助委员会所募物资的火车，抵达分区总部。那辆火车其实是由许多破烂的小货厢组成，独设的一等座位坐的是从莫斯科来的重要人物，说是要给军队送上珍贵礼物。戈登就是其中一位贵宾。他知道自己的童年伙伴日瓦戈跟这家军区医院有所联系，听说就在临近的一个村庄里。来之前，戈登已经获得了在封锁线后面自由行动的许可，于是他选择搭乘一辆马车去那个村子。

驾车的车夫不知是白俄罗斯人还是立陶宛人，反正俄语讲得不怎么好。因为周围随时可能出现间谍，车夫也就不怎么开口说话。这让戈登很是郁闷，一路就是这样闷不作声地行去。

军队总部的人告诉戈登，他要去的那个村子很

近——最多不超过十五英里——可事实上，至少有五十英里。

一路上，左边一直有某种让人不安的响声传来。戈登从未经历过地震，不过他觉得敌人火炮那沉闷的几不可辨且遥远的声音完全能跟火山爆发时的颤动相比。临近晚上，天际出现一道粉红色的光，并且那道光芒一直闪耀直到夜幕降临。

一路上经过了很多被战火摧毁的村庄。有些已是空无一人，有些村庄还有几个人在地下室坚守。石块散乱地铺在地上满目疮痍，隐约映照出房子之前的模样。这片废墟犹如一块贫瘠的沙漠地，一眼便能扫尽。一些老妇在尘土间拨拉，她们时不时地会从自己房子的废墟里头挖出什么东西，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那眼神好似周围还有墙保护着她们一样。戈登从旁经过时，那些老妇人纷纷抬起头

盯着戈登看，似乎在问这个世界还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的秩序才能重建。

入夜之后，马车驶入一个有巡逻队的地方，把小路和主道隔离开来。除了那条路之外，马车夫也不知道其他的道路。于是连着几个小时，他们就绕着原地打转，哪儿都没去成。直到破晓，他们才绕到要找的那个村子，可是那儿的人却都不知道戈登说的那个医院。原来，那儿有两个名字一模一样的村庄。最后一直到了早上，他们才找到正确的地方。行驶到村子的大道上，迎面扑来一阵浓郁的甘菊和碘仿味道，戈登暗自决定当晚不在此处过夜，只逗留一个白天和日瓦戈相聚，晚上再回到火车站和其他朋友相聚。可人算不如天算，哪知他这一逗留，就留了一个多星期。

9

那些天，前线动作不断。戈登发现，驻扎在村子南部的军队成功突破敌方封锁，支援部队随即跟上，并不断加宽战壕。可惜他们后来还是掉队了，先遣部队被敌军从中拦断，全部不幸被抓。其中就有安提波夫中尉，当他所在的那个团投降时，他不得不挺身而出。

关于安提波夫，坊间有许多的流言蜚语。有人说他不幸被炸身亡，并且这还是由他的朋友加利乌林中尉亲口所说。加利乌林说，安提波夫发动攻击时，他刚好在瞭望台上通过望远镜看到了那悲惨的一幕。

加利乌林看到的场景是发动攻击时最寻常的一幕。士兵几乎是以奔跑的速度快速向前，穿过无人地带。前面是一片秋天的田野，麦穗在风中摇摆。

把奥地利人赶走，用刺刀或手榴弹将敌人消灭是他们的目标。在冲锋向前的士兵看来，那一片片田野是无边无际的。脚下的土地似乎变成了泥沼，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一开始中尉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后来又转到了队伍的一侧，他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嘴里高喊着谁也听不懂的口号。有时士兵们会集体趴倒，待危险过去，再次吼叫着前行。每一次发起冲锋，都会有一两个人倒下，就跟森林里的一棵树被砍下了一样，从此再也无法起来。

“这一波攻击很猛烈！加油啊。”加利乌林焦急地对身旁的炮兵团长说，“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能胜利的。”

就在前线士兵准备冲锋之际，炮兵部队却突然停止了攻击。在那一片突如其来的寂静中，加利乌林感觉自己的心如同打鼓一般，怦怦直跳。好似他

处在安提波夫的位置，带领着自己的士兵冲到了敌人的战壕，期待在接下去短短几分钟内以勇气和智慧创造奇迹。就在那一瞬间，两颗德国造十六英寸的炮弹在攻击者面前爆炸。炮火的黑烟顿时吞没一切。

“天啊，完了。他们肯定完蛋了。”加利乌林嘴唇都吓白了，他认为中尉和他的士兵肯定是全军覆没。这时，一颗炮弹落在了观察哨的附近，吓得加利乌林赶紧退到更远更安全的地方。

加利乌林和安提波夫住在同一个防空壕里，两人是很好的朋友。战友们听说安提波夫的死讯之后，他们一致同意把安提波夫的遗物交给加利乌林保管，并由他转交给安提波夫的遗孀——在安提波夫的遗物中，找到了一个女人的照片。

没过多久，一个士兵被提拔成中尉，而这个士

兵正是加利乌林。他是基马塞特蒂恩的儿子，小名尤苏普卡，是提瓦辛斯所住公寓的守门人。加利乌林感觉自己的升迁有点对不起朋友安提波夫的意思，这也成了他的心病。

加利乌林得到了任命，不知为什么他总感觉心中别扭。他带领一队伤残兵，每天早上机械地练兵。加利乌林只是麻木地行使他的职责，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的期待。就在加利乌林心灰意懒的时候，上级将莫斯科退下来的一批伤残老兵安排在他的队伍里，皮奥拓·库多雷耶夫就在其中。

“哦，哦，这不是我的老朋友嘛。”加利乌林不无讥讽地笑道。

“是的，先生。”库多雷耶夫向加利乌林立正行礼。

故事肯定没这么简单。加利乌林中尉在训练中一看到库多雷耶夫的错误，就把他收拾了一顿。加利乌林以作为下属的库多雷耶夫斜视他为名，重重打了他一拳，而这一拳足足让库多雷耶夫在床上躺了两天。

从那之后，加利乌林开始了自己的疯狂报复。不过作为军事长官的加利乌林这样做，无疑也让他落下了心胸狭隘的名声。这该怎么办呢？两个人根本无法同处一室。但士兵要是没有犯下原则性的错误，长官该如何把他调离出自己的部队呢？另一方面，加利乌林又该想个什么样的理由让自己调离呢？最后，加利乌林以军队卫戍不力为由，要求上级派他到前线打仗。这给军政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加上他担任中尉期间显露出来的其他良好特质，很快他就被提拔为第一上尉。

加利乌林和安提波夫是相识于1905年，当时帕沙·安提波夫在提沃兹恩家住了半年，两个人经常在星期天一起出去玩。所以，他也曾见过拉拉一两次。不过自那之后，加利乌林就没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当安提波夫在尤里安提入伍，并随军来到前线时，加利乌林对这位老朋友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惊。小时候那个害羞、调皮、有点女孩子气的安提波夫竟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愤世嫉俗的人。安提波夫十分聪明，也很勇敢，但他却变得沉默寡言，个性刻薄。有时候，加利乌林觉着透过安提波夫那双忧郁的眼睛，他仿佛能看到某种更高远的东西，看到一种将他紧紧攫住的情绪——对女儿或妻子的想念。安提波夫好似童话里某个被施了魔法的人。而现在安提波夫死了，他的信件、照片，还有秘密全都留给了加利乌林。

仿佛是天注定一般，拉拉寻找丈夫的消息终于

传到了加利乌林这儿。加利乌林本打算给拉拉写信，但他那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写封信，不过他希望能让拉拉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写信的事一拖再拖，直到加利乌林听说拉拉在前线某个地方当了护士。这样一来，就算他写了信，也不知道要寄到哪儿。

10

“今天会有马吗？”日瓦戈医生每次回家吃中饭，戈登都会这么问。他们一起住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一间农房里。

“没有。不过，你又想到哪儿去呢？你哪儿都去不了。现在形势那么混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走。现在确实可以从南边的几个地方迂回出去或者突破德国人的防线，不过我听说我们有几个重镇又被包围了。说到北边，德国人已经穿过了思文塔，眼看已经是无可阻挡。他们的骑兵部队已经先行出发，一场灾难在所难免。德国人毁坏铁路、破坏食物供给线，在我看来，他们很可能正试图包围我们，来一个瓮中捉鳖。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竟然还在说什么马。醒醒吧，卡尔皮克。”接着，他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把桌子摆好，动作麻利点。我们晚上吃什么呢？牛脚？很好！”

医疗站散布在村庄各处，并且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损害。屋子的墙上开着西式的格子窗，让人惊讶的是，就连窗子的玻璃都毫发无损。

尽管临近秋末，但天气却热得不行。白天，医生和工作人员尽量打开窗子，不住拍打窗舷和低矮白色天花板上的黑色飞虫，他们解开束腰外衣和外套，一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啜饮烫嘴的汤或茶。晚上，他们蹲在露天的炉灶前面，因为烧火的木头是潮的，炉火时不时地灭掉，只能让人守着。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被熏得眼泪直流，只能责骂看火人不会生火。

一个无风的夜晚。戈登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两块木板上，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张餐桌和开满整面墙的矮窗。屋子被白天的日光晒得滚烫，再加上弥漫的烟味，两个人只得推开两扇格子小窗，呼吸一点

秋夜的新鲜空气——让窗子都流汗的热气。两个人跟往常一样聊着天，前方的地平线一如既往地闪烁着粉红色的光。就在这时远方传来了枪火声，间有摇天撼地的炮声，犹如许多重型卡车被横拖前行的响动。日瓦戈仿佛是出于对这声音的敬畏，他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那是伯沙，是德国造十六英寸炮弹，重约两千四百磅。”之后，两人又继续之前的话题，仿佛刚才的一切没有发生过。

“弥漫整个村子的是什么味道？”戈登问，“我一到这儿就察觉到了，是一种令人恶心的甜腻味，跟老鼠肉的味道很像。”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是大麻味儿，这儿种了许多的大麻。大麻植物会散发出那种久散不去的腐肉味道。并且我们现在是在战区，尸体被扔在大麻地里头，很久都没人发现，于是就会腐烂。当然，

现在尸体的味道到处都是。这很正常——你听到了吗？伯沙大炮又在轰击了。”

过去的几天里，戈登和日瓦戈谈论着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戈登也因此而清楚了日瓦戈对于战争的看法，以及它对人们想法的影响。日瓦戈对戈登说，让他接受“同归于尽”这种残忍逻辑是非常困难的，更别说习惯满目疮痍，浮尸遍野的景象，另外还有对某些新的伤痛的恐惧。日瓦戈认为，哪怕幸存下来，现代战争也有可能把人炸成一堆肉泥。

戈登每天跟着日瓦戈转，亲眼看到了许多恐怖的场景。毋庸置疑，这也让他开始意识到旁观他人的勇敢和努力，旁观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做过的牺牲和冒下的风险，自己却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不过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仅仅感慨一番并

不会让他的不道德减少一些。戈登的人生信条是，根据生活的具体情境，简单而诚实地生活。

一次，戈登跟日瓦戈去到前线的一个红十字急救站，当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伤口，他感觉自己简直要当场晕厥。

他们乘车去到森林里的一块空地，那儿已经被炮火夷平。扭曲的炮架七零八落地散在地上，一匹被绳子拴在树上的马使劲挣扎。再往森林里进一点儿，能看见守林人的房子已经被炸成了个空架子，一半的屋顶都被掀翻。急救站就设在屋子里头，外头还横搭了两个很大的灰色帐篷。

“我真不应该带你来。”日瓦戈说，“战地离这儿不足半英里，我们的补给装备也在那边的森林后面。你在这儿就能听到前线的情况。所以别搞英雄主义，我相信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肯定被吓坏

了，这很正常。战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炮弹甚至可能落到这儿。”

疲惫的士兵脚上套着过大的靴子和脏兮兮的外套，胸前、肩上、背上、腹部因汗水的长时间侵蚀已开始发黑。他们连续打了四天的硬仗，刚从前线退下来做短暂休息，其所在的队伍很多人都已牺牲。士兵们石头一般躺着，连微笑或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这时，路上有几辆马车飞速奔过来，可是没有人回头。那些马车原本是运弹药的，可现在上面装的都是受伤的士兵，马车飞速朝医疗站驶来，本就受伤的士兵估计被颠得骨头都要散了。通常把受伤的士兵从车上抬下来之后，救疗人员会迅速对其进行包扎，并根据情况进行紧急手术。半个小时前趁着炮火暂时消停，这些在前线战壕里的伤兵被拖了出来。其中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意识。

当马车在前廊停下时，看护人抬着担架奔下楼梯，并将车上的病人抬上担架。值班的一个护士掀开帐篷的帘子，往外张望。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男人在大声争吵着什么，他们的声音在高高的大树间回荡，不过具体说的话听不清楚。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中尉，他正对移动救疗站的负责人大声叫喊——他想知道某个野炮营搬去了哪儿。医生表示不知情，说那不关他的事，他让上尉不要打扰他，也不要再那么大喊大叫的——这儿还有许多的伤兵，有许多的事要忙。但上尉还是不停地对着红十字、炮兵营长官以及其他一些人骂骂咧咧。这时，日瓦戈走到那名医生面前，两人热烈地打了招呼，一道走回屋子。而那个中尉还是操着一口带鞑靼口音的俄语大声叫骂着，他解开自己的马，然后跨身上马，扬尘而去。而那个护士还在张望。

突然，护士的脸因恐慌而变得扭曲。

“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一定是疯了！”他对两个受轻伤的士兵吼道，那两个士兵在没有其他人搀扶的情况下，挪着步子。护士慌忙跑向了他们。

其中一个担架上躺着一个四肢已经被炸得不健全的男人，看上去十分的恐怖。一块弹片飞到那个人脸上，穿过舌头和嘴唇，插在下颌上，以至于一边脸颊撕裂开来。男人低声呻吟着，那声音听着都不像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没有人注意他的呻吟，大家只是想尽快将他送进去，结束他的痛苦。

护士以为，那两个走在担架旁的受轻伤的士兵是受不了男人的叫喊，所以自作主张要把男人脸上的弹片扯下来。

“你有毛病吗？你不能那样做。那个弹片得由医生取出来，用特殊的医疗器具。”

过了一会儿，当那个男人被抬着上了阶梯，他突然尖叫一声，只见他的身子一抖，便咽了气。

死的这个男人正是二等兵基马塞特蒂恩，而那个在树林里大喊大叫的上尉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上尉，值班的护士就是拉拉。戈登和日瓦戈是见证人。所有这些人都聚到了一块儿。不过他们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而其他一些人暂时还没有认出彼此。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有些事也只能等到以后才能有一个答案。

11

神奇的是，那个地方有个村庄竟然毫发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几个小村庄在一片废墟中，不可思议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岛屿。一个黄昏，戈登和日瓦戈驾车回家。途经一个村庄，他们看到一个哥萨克人被一群人围着。哥萨克人将一枚铜币抛向空中，并逼迫一个穿阿拉伯长式上衣的白胡子老人接住铜币，周围的人笑得前俯后仰。老人尝试了很多次，可每次都抓不住。很多次铜币都是从老人的手心滑过，最后掉在了泥地上。当老人弯下腰将铜币捡起来时，哥萨克人便会拍老人的屁股，旁观的人笑得就更加开心了——周围的人都以此为乐。事情至此本也无伤大雅，但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情况不会发生逆转。每隔一会儿，老人的妻子就会从路对面的屋里跑出来，尖叫着对着自己的丈夫张开双臂，然后又惊恐地跑回屋。两个小女孩儿趴在窗前，注视着

自己的祖父，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驾车的车夫认为这幕情景很有意思，特意慢下步子，好让车上的乘客好好欣赏一番。但日瓦戈却叫住了那个哥萨克人，他冲他大嚷，要求他停止对老人的戏谑。

“好的，先生。”哥萨克人马上说，“我们没有恶意，只不过跟他开个玩笑而已。”

于是，戈登和日瓦戈沉默地继续往前赶路。

“情况真糟糕。”当尤里·安德雷维奇看到自己所住的村庄后，他不由发出一声感慨，“你想象不到悲惨的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痛苦。战争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好似上天觉得繁重的纳税，贫穷的冲击还不够似的，他们还不得不承受屠杀和凌辱以及关于缺少爱国主义的指控。而他们为什么要爱

国？在敌人的统治下，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可我们却只是一味迫害他们。憎恨犹太人的基础本就是不合理且站不住脚的。犹太人的贫穷、人口爆炸、软弱、无力反抗——这些东西本应该引起我们的同情，可结果却成了我们憎恨的理由。我无法理解。那似乎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

闻言，戈登没有说话。

12

到了晚上，日瓦戈和戈登再一次分躺于长窗户两边的铺板上，两人像往常一样聊着天。

日瓦戈告诉戈登，有一次他曾在前线见过鞑靼人。接着，日瓦戈详细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那是他到前线后的第一个春天。当时他所在军团的总部位于喀尔巴阡，那是在一个很深的山谷里头，而他们的军队也把由匈牙利平原进入该地区的路完全堵死。

山谷的底部是一个火车站。日瓦戈详细描述了那儿的风景，他说那儿漫山遍野都是高大的枞树和松树，树顶是一簇簇茂盛的枝叶，乌云一般浮在上面。而矗立着灰蓝色悬崖和石墨矿的森林，就好像一块有几处被磨破了的厚毛毯。那是一个潮湿且阴

沉的四月早晨，天空灰朦朦的，在四周苍黑群峰的环绕下，更显静寂和闷热。山谷上空飘浮着晨雾，一切都在升腾，一切都在缓缓上升——火车的引擎飘起一股股灰烟，飘过田野，飘过山峰，飘过黑色的森林，飘过一片片乌云。

那时，正逢沙皇巡回视察加利西亚。一天，日瓦戈突然收到消息，沙皇即将视察他所在的部队，而他将以上校的身份光荣地被沙皇接见。沙皇随时都可能到达。一队礼兵在火车站台上整齐列队，随时准备迎接元首。列兵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两辆载有皇家随从人员的火车相继进入车站。没过一会儿，沙皇的火车也缓缓驶入站台。

在尼古拉斯公爵的陪同下，沙皇开始视察掷弹兵队列。沙皇每次的问候，都引得底下雷鸣般的欢呼，有如排山倒海而来，气势逼人。

沙皇脸上尽管挂着微笑，但神情似乎有点不自在。真实的沙皇看着比卢布和奖章上头像更老一些，样子没那么精神。沙皇显得有点无精打采，脸庞微微有些水肿。他总是用歉意的眼神来回看着公爵，似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应；而公爵则是恭敬地弯着腰，并不发话，只是偶尔抬抬眉毛或耸耸肩膀示意，以解沙皇的尴尬。

在山间的那个灰色早晨，日瓦戈突然为沙皇感到遗憾。他的思绪翻腾，诧异于一个统治者竟然会是这种谦虚又含蓄的性格，诧异于这样一个看上去软弱的人竟然能肆意关押、惩罚或赦免他的子民。

“他应该发表个演讲的——‘我，我的剑，我的子民’——类似于恺撒发表过的那种演讲。作为统治者，有时‘民众’是不得不提的话题。不过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沙皇是位性情中人，是位悲剧的传

统俄国人，他不喜这些表面功夫，不屑说这些陈词滥调。毕竟，那种夸张的表现在俄国是不可想象的。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那确实是很夸张，不是吗？我想恺撒统治下的‘民众’其实就包括高卢人[(2)]或塞西亚人或伊利里亚人等。不过自那之后，这些‘人’就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只是国王和政客演说中的主角：‘哦，人民啊，我的人民。’

“现如今，前线到处都是新闻记者。他们记录自己的所看所思，记录普通人的智慧，他们看望灾民，并就认得灵魂建立新的理论。那是一种新的达尔[(3)]语言，是虚伪的语言——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缩略语，也就是为证明而证明，断章取义，言语中充斥着愤世嫉俗的气息。某天我曾读过那样一篇文章‘一个灰朦朦的日子，天气跟昨天一样。从早晨开始，便是大雨如注。我透过窗子看向外

面。犯人们排成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尽头。其中有很多受伤的人。枪响了。和昨天一样，枪响了——明天也会和今天一样，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会是这样。’ 这种文字读来是否会觉得有些微妙有些诙谐？他拿什么去反对枪响呢？枪支之下，又如何还能求得不一样的结果！何不看看他自己，每日画下一样的标点，用看到的事实去填满文章，可他那媒体人的善良怎么只是如同飞虫一跃，便消失了呢？他怎么不明白，如果不停止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只是在笔记本上不断添加所看到的荒唐事实，就永远写不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有当事实深入内心，将其从某种人类自以为是的东西中解脱出来，事实才能成其为事实。”

“那你会碰钉子的。”戈登插嘴道，“我想跟你说说，我对于今天看到的那件事的看法。哥萨克人在折磨那个可怜的老人——可能每天有无数这样

的事情发生——当然这很可耻——但你用哲学的思维去想它是没有用的，反倒会过犹不及。不过整体来看犹太人的这些问题——同样考虑到哲学——我们会发现某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我并非要跟你说什么新东西——我们俩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你舅舅的影响。

“你刚刚说，什么成其为民族？谁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了事——是那些对此小题大做的人，还是那些不经脑子就由表面上的高尚行为将其抬高到全人类都应奉行的高度，并为此歌功颂德？那么，答案是显然的。进入基督纪元以来，究竟什么才是国家？其实很多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那只不过是几个改头换面的民族凑到了一块儿，而在这个改头换面的过程中，它们并不奉行古老的原则。福音书对此是怎么描述的？首先，它并没有把话说死：‘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那是一个天

真而胆小的建议：‘你是否想用全新的方式去生活？你是否想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于是，所有人都接受了，他们被这种思想带着走了几千年……

“当福音书上说，上帝之国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异教徒，这是否只是意味着在上帝的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福音书被需要的原因并不在此——希腊的哲学家，罗马的道德家，希伯来的先知很早之前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不过上面又说——在那种全新的生活和新形式的社会中，没有民族，只有个人。

“你刚刚说光描述事实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让事实本身显露出意义。好吧，我觉得基督教义，人性的神秘正是需要放入这些事实从而使其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也曾讨论过那些平庸的作家，他们从来

不会从宏观的角度去描写生活展现世界，只热衷于讨论某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弱小的饱受磨难的国家——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炫耀自身能力和聪明的机会，同时他们还能从对被迫害人表示同情这件事中得到某种自我认同。说到现在，你还能找到比犹太人更合适的例子吗？数百年来，犹太人关于国家的意识决定了犹太民族只能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当全世界其他民族都基于一种内在的力量想从中跳离时，犹太民族却始终固守这种意识，而这是致命的。这难道不让人震惊吗？你能对此做出解释吗？认真想想，伟大的节日，从日常琐事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超越平凡的存在思考更加有意义的东西——这一切最开始都是在犹太人的土地上，用犹太人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这一切其实都属于犹太民族！而他们确实看到了，听到了，并且放手了！他们如何能允许这样一种具有绝对震慑力，无比美丽的精神溜走？他们如何能想到，在这种精神取得胜利并建

立领国之后，他们却成了一个空壳，承载那曾被否定的奇迹？这种心甘情愿的牺牲，对人类究竟有什么用呢？是谁从中受益？那些无辜的男女老少，那些脆弱，善良，充满人性的人，是如何在嘲笑和折磨中走过千年的？为什么国家元首们喊的那些‘民众’朋友那么愚蠢？为什么犹太民族曾经的智者能超越悲观主义和愤世嫉俗的智慧？为什么他们没有解散那支坚持作战的精神部队——即便是冒着被压力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他们要被毫无理由地屠杀？他们怎么不对自己说：清醒一点吧，停下来。不要再坚持你的同一性。不要再紧抱在一起，分散吧。和其他民族一样，分离。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初的也是最好的基督教徒。你们已经成了你们当中最坏最软弱的那些人反对的东西。”

13

第二天，日瓦戈回家吃晚餐，他说：“你不是一直都急着离开吗？现在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不过我不觉得‘这是你的运气好’，因为我们又将陷入困境。通往西边的路已经被打通了，压力主要来自西边。所有医疗机构都接到命令要从这儿撤离出去。我们明天或最迟后天就要离开。至于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想，卡皮克·米克哈伊·格里戈利艾维奇的衣服肯定还没洗，事情一直是这样。卡皮克会告诉你，他把衣服交给了女儿去洗，可你要是问他女儿是谁，女儿在哪里，他却不知道，那个傻瓜。”

日瓦戈不介意卡皮克的借口，也不关心戈登因为借了主人的汗衫而道歉。

“这就是军队生活。”日瓦戈继续说道，“每

当你刚开始习惯一个地方，你就不得不离开，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刚来的时候，我们讨厌死这儿了。又脏又臭，总是让人感觉闷闷的，炉子放错了地方，天花板又太矮。可是现在，即便你威胁说要杀了我，我也记不起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我感觉现在哪怕让我在这儿渡过余生，终日注视阳光下的火炉和移动的树影，我也会愿意。”

日瓦戈和戈登马上收拾了行李。

到了晚上，他们突然被呼喊声、枪声和奔跑的脚步声惊醒。只见村子那头火光满天，光影在窗子前来回摇晃。房主和他的妻子躲在隔墙后面。尤里·安德雷维奇便打发勤务兵去问发生了什么事。

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德国人已经打过来了。日瓦戈连忙向医院跑去，发现勤务兵所言非虚。村子已经被点着了。现在已经等不及上级的撤退命令，

医院必须得马上转移，刻不容缓。

“我们所有人都得在天亮之前转移。”日瓦戈对戈登说，“你随第一部队走，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我吩咐他们等你一块儿走。一路顺风。我会送你上车。”

两个人沿着马路往马车停靠的地方跑去，不时地弯腰低头，以躲避突如其来的子弹。子弹在他们耳边飕飕地飞，随着一声巨响传来，不远的十字路口也被炮火吞噬。

“那你怎么办呢？”戈登边跑边问。

“我随第二部队走。我还得回去一趟，收拾东西。”

于是，日瓦戈和戈登在村头分了手。马车出发了，颠簸一会儿之后，逐渐加速。尤里·安德雷维奇

朝他的朋友招手，借着火光注视戈登远去的背影。

然后，尤里·安德雷维奇又急匆匆地往回赶。眼看就要到屋门口了，他却被炸弹的余波震得摔在地上，身体被弹片击中。日瓦戈倒在马路中间，流血不止，人也失去了意识。

14

日瓦戈所在的医院转移到了近G．H．Q铁路线的一个小镇上。那是二月底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应日瓦戈的要求，靠床的窗户被打开了。

用晚餐前，病人们百无聊赖，所以想尽办法打发时间。他们听说医院来了一个新护士，那天刚好是新护士值班。住在日瓦戈病床对面的加利乌林一边翻看最新的报纸，一边义愤填膺地责骂审查制度。尤里·安德雷维奇则是在读冬妮娅的信，信加起来已经有一捆之多。微风拂过信纸，掠动报纸，窸窸窣窣地响。这时，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随后，拉拉走进了病房。

日瓦戈和加利乌林都认出了拉拉，但他们并不知道对方认出了。拉拉却不认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拉拉说：“你们好，窗户怎么是打开的呢？你

们不冷吗？”然后，拉拉走到加利乌林床前，问他感觉怎么样，并轻拿起加利乌林的手腕把脉，不过她马上又松开了手并在加利乌林床边坐下，脸上满是困惑的表情。

“这可真是让人没想到，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加利乌林说，“我认识你的丈夫。我们在同一个兵团服役。他的东西还在我这儿呢。”

“不可能，这不可能！”拉拉不断重复道，“这不可能。你认识他！哦，这真是太巧了。请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中流弹死的，葬身炮火中，是吗？我已经知道这个噩耗，所以你不用担心，请把实情告诉我。”

加利乌林却没有勇气说出实情。他决定编个谎话，好让拉拉没那么伤心。

“安提波夫其实是被敌人抓走了。”他说，“他带的队伍走得太靠前了。敌人把他们包围了，后路也被切断了。所以，安提波夫被迫投降。”

但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拉拉被这突如其来的偶遇给震住了，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同时她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失态，所以匆忙就出了病房。

过了一会儿，拉拉又回到病房，表面看上去镇定了不少。拉拉担心自己跟加利乌林说话会再次控制不了情绪，哭出来，于是她故意不去看加利乌林，而是走到尤里·安德雷维奇旁边。

“你好！”她恍惚地打了个招呼，“你是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雷维奇以前就见过拉拉的眼泪。他想

问她，为什么之前她会那么难过？想告诉拉拉他已经见过她两次，一次是还在念初中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念了大学之后，不过他突然想到，这么说拉拉很可能会不相信，兴许还会生出误会来。突然，尤里记起了躺在棺材里的安娜·伊娃诺夫娜和痛哭的冬妮娅，于是，他转口说：

“谢谢，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没什么需要的。”

“难道是我冒犯他了吗？”拉拉暗想。她惊讶地看着面前这个神情冷漠的英俊的陌生人。

阴晴不定的天气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到了晚上经常刮风，吹起一阵阵湿润的泥土气息。

就在这个时候，从大本营传来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一时间谣言四起。听说跟彼得堡的电讯联

系再次被切断。那段时间，不管走到哪儿，人们总是在谈论政治。

护士拉拉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活，询问每个病人的情况，其中也包括加利乌林和日瓦戈。

“真是个怪人。”她心想，“那么年轻，脾气却那么暴躁。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原本英俊的相貌都不那么让人喜欢了。不过他倒真的是很聪明，这从他说话就看得出来，思想活跃且迷人。不过，那并不重要。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快完成这儿的工作，争取早日调到莫斯科去，这样也能离女儿凯特恩卡更近一些。然后再申请离职，回尤里安提当老师。现在我也弄清了可怜的帕沙遭遇了什么，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我越早停下这种逞英雄的行为越好。要不是为了寻找帕沙，怎么说我也不会到这儿来。”

凯特恩卡现在过得怎么样？一想到这儿，拉拉就特别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

最近，拉拉察觉到自己起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义务，神圣的职责——对祖国、军队和社会的职责。可现在战争输了，所以也就没什么神圣的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每个人说话的口吻，道德至高无上的社会氛围。现在，你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仿佛以前的你就是一个被人牵着走的小孩子，而现在你突然间长大了，得学着自己走路了。身边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家人也没有你尊敬的人。这种时候，你感觉迫切需要某种能让自己绝对信仰的东西——生活或真理或美丽——让它控制自己，替代过去那种“人治”的东西。你需要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某个纯粹的目

标，过往相信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不过具体到拉拉自己，她对自己说，她还有凯特恩卡来满足这种对终极目标的需要。既然已经失去了帕沙，她就只剩下了女儿凯特恩卡，所以她要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奉献给她那可怜的孩子。

尤里·安德雷维奇得到消息说，戈登和杜多罗夫在没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就出版了书作，并且受到广泛赞誉。而莫斯科现在正经历暴风雨来临前的骚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愈来愈浓，政治革命一触即发。

入夜，尤里·安德雷维奇已经困极了。他时不时地低头打盹儿，只有想到过往日子的快乐才能让他清醒一些。窗外，轻柔的风吹着更让人昏昏欲睡。那风儿好似在说，“冬妮娅，萨沙，我想你们，我想回家，我想回去工作。”和着风儿的轻拂，尤里·

安德雷维奇逐渐进入梦乡，然后又醒了。就这样醒了睡，睡了醒，折腾了好多次，最后终于在一种混杂着快乐与痛苦的复杂情绪中入睡。天气瞬息万变，一如世事。

拉拉突然想到，加利乌林不辞辛苦替帕沙保管遗物，她竟没问过他是谁，从哪儿来。

为了弥补这个疏忽，也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忘恩负义，第二天早上她特意去跟加利乌林套近乎，询问他的境况。

“天啊！”拉拉在心里大叫。布雷斯特大街28号，提沃兹恩家，1905年的革命，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她记不起曾见过他，这必须得请求他的原谅。不过那一年，那所房子！没错，确实有过那么回事！突然间，那些事全浮上心头，好似还在昨天！炮火——还有，那个是怎么说的了？

——“上帝的惩罚”！当你还是孩童的时候，遇到那样的事情，你知道感觉会有多强烈吗？“请原谅我，请你原谅我，上尉，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是的，是的，你曾告诉过我一次。谢谢你，奥塞普·基马塞特蒂诺维奇，是你让我想起了这些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拉拉那一整天都在想“那所房子”，自言自语。

布雷斯特大街28号的房子！现在又在打仗了，比那一次战争更让人害怕！这次你可不能说“那些小伙子们又开枪了”。现在那些孩子都长大了，那些小伙子们都在这儿，参军入伍，所有生活在那种房子里和那种村庄里的普通人都在这儿。太神奇了，这真是太神奇了！

除了卧床不起的病人外，其他人都骚动起来

了，他们或叫喊或奔跑，或拄着拐杖走，一个接一个地大喊：

“爆炸消息！彼得堡暴乱了！彼得堡军队也参加了暴乱！革命开始了！”

---

(1) Whit Monday，也称五旬节，既是犹太人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五十天，也是耶稣复活后的第五十天和耶稣升天节后十天。

(2) 约在公元前280年前后，有数万北欧人南迁，占据此地区北部。他们本是游牧民族，性情浪漫、热心、勇敢而善变。——译注

(3) Dahl，《俄语词典》的作者。

第五章　告别过去

1

那是一个名叫梅流赛艾沃的小镇，在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上。黑灰如同黑色蝗虫一样挂在屋顶上。镇上居民的生活全仰仗来往的军人和旅客。当兵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些赶往前线，有些离开前线，谁也说不清战争究竟是会继续，还是会停止。

每天，新的房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日瓦戈、加利乌林上尉、拉拉护士，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都是来自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经验丰富。

这些人就组成了临时镇委会，以及军队和医疗

机构的政治委员会。他们把这些任务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业余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回归正常的生活。

由于工作的原因，日瓦戈和安提波娃经常在一块儿。

2

一场大雨将黑色的尘土搅成了咖啡色的污泥，经人一踩，满大街都是污泥。

这是一个小镇。无论你站在哪条街的尽头，都能看到灰色天空下的大草原。战争似乎没有尽头，革命似乎也没有尽头。

尤里·安德雷维奇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采取了一些改善纪律和提升军心的措施，军队里仍是四分五裂，官僚主义风行。邻近的几个军事驻扎点我也都去看过了。

对了，有件事我早该跟你说了，我现在跟一个叫安提波娃的女人共事。她是护士，来自莫斯科，出生在乌拉尔。

你还记得你母亲过世那晚，对检察官开枪的那个女学生吗？我本以为她会被判刑的。我记得我还跟你说过，米沙和我曾见过她，是你父亲带我们去一个旅馆里时见到的，那时她还在学校读书。我不记得我们去那儿是为什么了，只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我想就是暴乱爆发的那个时候。那个开枪的女孩儿就是安提波娃。

我尝试过好几次要回家去，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并不仅仅是工作的原因——现在移交工作还挺简单——关键是路途遥远。要么是不通铁路，要么就是太多人坐火车，根本没有位置坐。

当然，肯定不能永远这样拖下去的，

我们中也有人辞职了或被开除了，其中包括安提波娃、加利乌林还有我自己，我们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下周一定要动身离开。我们会分开走，这样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可能随时会出现在你面前，当然我会尽可能提前给你发电报。

可就在日瓦戈准备动身的时候，他接到了妻子的来信。信上还不时能看到被泪水染糊了的字，她请求日瓦戈不要回家，干脆直接跟那个护士到乌拉尔去。她说那个护士的生命那么精彩，充满了奇迹，而她冬妮娅的生活根本无法与她相比。

“至于萨沙的未来，你不要担心。”冬妮娅写道，“他永远都不可能让你蒙羞。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定会对他严加管教，就像你小时候受到的教

育一样。”尤里·安德雷维奇立马回了信：

你一定是疯了，冬妮娅！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难道你不知道，要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我那么想念你想念我们的家，我早就死在战火中了！我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们很快就会见面，我们会开始新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在信里说的话有点吓到我了。如果你真生我的气以至于要跟我说这种话，那肯定是因为我的态度失于暧昧，而这很可能也会让另一个女人误会。等她一回来，我就会跟她说清楚，向她道歉。她现在去市政委员会了——以前只有省会城市才会设立这种机构，可现在我所在的村子就有——去那儿协助一个朋友处理工作。

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会感兴趣，尽管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我直到今天都还不知道安提波娃住在哪一间房。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这回事。

3

两条主道横穿梅流赛艾沃，一条向东，一条向西。一条是泥巴路，穿过一片森林便到达扎布希诺——梅流赛艾沃镇主要的粮食区——尽管扎布希诺隶属于梅流赛艾沃镇管辖，但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在梅流赛艾沃之上。另一条路铺了石子儿，穿田野而过，冬天的时候与沼泽地无异，夏天又被太阳晒得很干。这条路通往最近的铁路枢纽——比利乌齐。

六月份，扎布希诺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共和国由当地一个磨坊主布拉扎克成立，并受到从前线回来的第212步兵团支持。暴乱发生时，第212步兵团趁乱出走，穿过比利乌齐来到了扎布希诺。

共和国不承认俄国临时政府的领导，并宣布脱离俄国独立。布拉扎克这个异教徒曾跟托尔斯泰通过信，他标榜要成立一个全新的王国。他的新王国

将实行工作和财产集体所有制，并交给当地管理者管理。

扎布希诺这个地方从来都不缺少传奇。早从“动荡时代”[(1)]起，这个地方就被载入了历史。那之后不久，大量的强盗就汇集到了这儿，藏身于茂密的森林里头。这个源于扎布希诺又靠近前线的西方式地区曾出现在许多民间故事里头。

这儿就有一个关于布拉扎克第一助手的传奇故事。听说这个助手又聋又哑，但他一旦受到神的启示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话，可过后就又变成了哑巴。

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星期。七月，一队效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来到镇上。落逃的第212步兵团被打得退回了比利乌齐。火车线路两边绵延几英里的森林都被夷为平地，以至于古老的树桩上都长出了树莓。成堆的木材被窃贼偷走，伐木

人用来短暂居住的木屋也被逃兵们掀翻了，并在上面拉起了营帐。

4

日瓦戈后来成了他养病的那家医院的医生，所以他也就不急着离开，而是在扎布林斯卡亚女伯爵的旧宅里住了下来。战争一打响，女伯爵就把房子捐给了红十字会。

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位于主街道和普拉扎广场交界处，地理位置是全镇最好的。以前，士兵们就是在那儿进行操练，现在那儿成了召开集会的地方。

由于地势较高，女伯爵的宅子能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除了广场和街道外，在房子里还能俯瞰附近的一座农场（属于当地一户没落的贵族，现如今过的生活跟农民无异）和女伯爵的一个旧花园。

女伯爵在当地拥有一个很大的庄园——拉兹多

尔诺伊庄园。而那庄园里头的房间只是偶尔供镇上的访客住，或者当作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夏天避暑的场所。

现在那所房子成了红十字会医院，而它的主人却在彼得堡沦为了阶下囚。

现在宅子里只留了两个女仆，一个是主厨乌斯提尼亚，还有一个是曾给女伯爵的女儿们当家庭教师的玛德莫伊塞勒·弗莱乌利，如今已经嫁人。

玛德莫伊塞勒头发花白，但双颊还是红扑扑的，她穿着拖鞋和松垮垮的家居服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显然是把这所临时医院当成了家。她用很烂的俄语讲很长的故事，还学法国人的样吞掉话的尾音，做出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动不动就大笑，结果经常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玛德莫伊塞勒认为自己对安提波娃了如指掌，并坚信安提波娃护士和日瓦戈医生彼此吸引。出于拉丁人根深蒂固的对于做媒的热情，每当看到拉拉和日瓦戈在一起她就特别高兴，并或对着他们两个人摆动手指或狡黠地眨眼。这经常让安提波娃不明所以，也让日瓦戈大为光火。这就跟所有偏执的怪人一样，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玛德莫伊塞勒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幻想。

乌斯提尼亚的性格就更加古怪了。她是梨形身材，加上动作笨拙，所以看着很像一只母鸡。乌斯提尼亚不通情理，有时甚至可以说固执过了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她的固执还跟迷信搅到了一块儿。乌斯提尼亚出生在扎布希诺，据说还是当地一个男巫师的女儿。她知道许多的咒语，并且每次出门前都会对着炉子和钥匙孔念念有词，说是这样在她离家的时候，就不会发生火灾或有坏人闯入。乌

斯提尼亚可以好几年安安静静地生活，可一旦她开始闹腾，就没有什么能阻挡她。在对抗真理方面，她有着不灭的热情。

扎布希诺共和国覆灭之后，梅流赛艾沃镇执行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反官僚主义倾向的运动。每天晚上，普拉扎广场都会聚集大量人，进行和平集会。其中有些人完全是因为无聊，没有其他事情好做才去参加。要知道打仗之前，人们可都是聚集在消防站的外面谈邻里坊间的趣事。梅流赛艾沃镇的苏维埃文化团体鼓励并邀请当地的人和一些访客在集会上讲话，主持讨论。客人们认为聋哑助手的故事是无稽之谈，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这个观点。但当地的小工匠，士兵的妻子，梅流赛艾沃镇的前官员们都相信故事是真的，并就此据理力争。

其中争得最厉害的就是乌斯提尼亚。一开始她

还会顾忌女人的身份，说得比较含蓄，可渐渐地她放得越来越开，并大声质问那些不相信的人。最后，她完全摆出了一副演讲者的架势。

广场上叽叽喳喳的声音经常能透过医院打开的窗户飘进去，有时碰上特别宁静的夜晚，还听得见片段的演说。当乌斯提尼亚起立发言的时候，玛德莫伊塞勒经常会冲进别人家里，催促大家凝神细听，并用她那一口烂俄语叫道："混乱……混乱……俄国沙皇，强盗……扎布希……聋哑……叛徒！叛徒！"

玛德莫伊塞勒心里很为她那牙尖嘴利的主厨感到骄傲。尽管这两个女人从来都没断过争吵，但她们内心却是彼此欣赏。

5

尤里·安德雷维奇打算离开，打算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并为此准备所需的文件。

就在那时，当地军队的新长官刚好在去军队的路上，并在梅流赛艾沃做短暂停留。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那个长官毫无经验，完全是个愣头儿青。

军队内部打算采取新一轮措施来提高士气。革命军事法庭被制度化，新近被取缔的死刑也恢复使用。

要想离开，日瓦戈医生必须要得到当地司令部的证明文件。

往常司令部办公室都是人满为患，队伍都排到了街上。要想挤进去比登天还难，几百个人吵吵嚷嚷，根本就听不清别人说的话。

不过这一天并不是开放的接待日。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说士兵们对他们的工作越发不满，他们很是恼火，彼此交换讥讽的眼神。突然，司令官的房间里传来欢呼的声音，好似那儿有人解开了衣扣，以表庆祝。

加利乌林从里头的房间出来，看到日瓦戈，便热情地招手，示意他过去。

反正迟早是要面见司令官的，日瓦戈也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走进门才发现，屋子里很乱，不过乱得比较有艺术感。

只见新上任的军政委也坐在屋子中央，他是军队的英雄，也是镇上的风云人物。而此时他没有在军营里处理军务，而是在这儿做这些跟军队执行事务毫无关系的文书工作是怎么回事呢？

“又来一个精英。”见日瓦戈进来，司令官便向军政委介绍起他来。而军政委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并没有抬起头。司令官于是转过去在日瓦戈医生递给他的文书上签字，并礼貌地招呼他到屋子中央的矮脚凳坐下。

日瓦戈医生是屋子里唯一一个以正常姿态坐着的人。其他人的姿势看着都很古怪，似乎故意要做出轻松的样子。司令官的身子都快扑到写字桌上了，他用手撑着脸颊，摆出拜伦式思考的姿势。而他的那个身材粗壮的男助手则是高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双腿架在座位上，好似在骑马。加利乌林跨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叠在背后，头则是垂在手臂上；而那个军队政委用手腕撑着床沿，并不时地在屋子里走动，从不安静一会儿。他不停地说话，而话题无外乎比利乌齐那伙逃兵给他制造的难题。

真实的军政委跟日瓦戈听到的有关他的描述丝毫不差。他个头很高，很绅士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热血满怀的青年。听说这位军政委出身很好——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参议员，并且是第一批带领部队前往杜马——俄帝时代的国会的人。军政委名叫基恩特或基恩特斯——日瓦戈不是很记得清名字——说话明显带有彼得堡口音，还掺杂一点波罗的海的转音，很是特别。

军政委穿着一条紧身上衣。也许是因为他也意识到自己太年轻了，所以为了显成熟一点儿，就故意装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来。他肩上的海军蓝肩章随着拱起的背往上拱，双手则是插在裤袋里头。但事实上，这并未让他显得成熟，相反看着倒像是一个年轻的骑兵。

“铁路那头驻扎了一个哥萨克军团。”司令官

对军政委说，“是红军，他们很忠诚。不过我们会向他们喊话，只要把那些作乱叛上的人揪出来，我们就了结此事。军长希望能让他们立马放下武器。”

“哥萨克？不可能！”军政委怒斥道，“现在不是1905年了，我们不可能再用革命前的办法取胜。在这点上，我们的意见可能不怎么一致。你的将军们是在自作聪明。”

“我们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只是一个计划，一个建议而已。”

“我们跟最高指挥部有过协议，不插手执行方面的事务。我并非要取消向哥萨克军团喊话的命令。让他们来吧。不过就我而言，我觉得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常识。我想他们肯定扎了营在那儿吧？”

“我想也是。他们应该拉起了一个军营，以防我们发动进攻。”

“这样就更好了。我想去那儿，我想去看看那个土匪窝。先生们，他们可能是叛乱者，甚至可能是逃兵，不过请你们记住，他们同样也是人。而人就跟孩子一样，你需要去了解他们，你得了解他们的心理。要让他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你就得用正确的办法，你得触动他们最敏感的那根心弦。

“我要过去，我要跟他们来一场真心的交谈。等着瞧吧，他们肯定能迷途知返。你不相信我？要不要赌一下？”

“我不知道。不过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会对他们说，‘拿我自己来说，我是独子，是父母的希望，但我从没有逃避应付的责任。

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姓氏、家庭、社会地位。我放弃这些是为了你们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享受不到的自由。我是这么做的，另外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也是这么做的，更不用说那些守护光荣历史的先辈们，那些因维护人权而被送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或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的人们。难道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我们自己？难道我们都是别无选择？你们，你们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大兵，现在你们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军队的战士。诚实地问问你们自己：你是否响应了那最让人骄傲的号召？此时此刻我们的国家流血漂橹，所有人都在为消灭敌人而努力，你们却让自己被一群乌合之众糊弄，成了一伙强盗。你们抛弃了政治意识，舍弃了自由。这样的你们就跟猪圈里的猪一样，每天只等晚餐时间跳上桌。’ 哦，我会用我的话击中他们的心，我会让他们为自己感到羞愧。”

“不，那样子做很冒险。”司令官表示反对，同时跟自己的副官快速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加利乌林竭尽全力想劝说军政委放弃他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他知道第212步兵部队的疯狂，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曾在他的麾下。可军政委却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尤里·安德雷维奇几次都想起身走人。军政委的天真让他感到窘迫，同时司令官及其副官这两个伪君子的狡猾更让他感觉不舒服。军政委有多愚蠢，司令官就有多奸诈。而这些从刚才那番话中就体现得出来。

哦，有时候真想逃离这种空洞的冠冕堂皇的话，摆脱这些故作高尚的说辞，去自然界中寻找庇护和安慰——大自然显然没有这么多话。或者干脆

沉默而痛快地干一场活，又或者香甜地睡一觉，或者在无言中传递对彼此的理解。

日瓦戈医生想起来路上跟安提波娃的对话。尽管那场对话注定会以不愉快告终，但他其实很高兴能再见到她——即便要以一场不愉快的对话作为代价。拉拉现在应该还没回来。又过了一会儿，日瓦戈实在受不了便趁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

6

拉拉回来了。玛德莫伊塞勒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日瓦戈，还说拉拉看起来很累，她胡乱吃了几口东西就回了房间，还说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但换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肯定会上去敲门，看看是怎么回事。”玛德莫伊塞勒建议道，“我敢说，她现在肯定还没睡着。”

“她住在哪一间房？”日瓦戈医生问道。玛德莫伊塞勒被日瓦戈的这个问题问得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安提波娃就住在二楼最后面的那个房间，经过女伯爵放家具的几个杂物房就是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在夕阳的掩映下，房子和篱笆仿佛拥抱在了一起。大树的枝条直往外伸，似乎要钻进窗前的灯光一样。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即

便坐着不动，人也很容易满身大汗。一束束煤油灯灯光顺着大树的枝干映在院子里，好似蒙上了一层雾。

日瓦戈医生上到最后一级楼梯，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他突然想到，即便拉拉不是长途跋涉回来，即便她一点也不累，他这样去敲门也是不礼貌并且会让双方尴尬的。最好还是等到明天再说吧。跟所有突然间改变主意的人一样，日瓦戈医生感到心里一阵失落。他走到过道的尽头，而尽头的窗子刚好对着下面的院子。

已是入夜，世界万籁俱寂。旁边的一个洗衣盆规律而缓慢地滴着水，滴答，滴答。窗外某个地方似乎有人在轻声低语，黄瓜地里有人在浇水，站在楼上依稀还能听见从井里一桶接一桶打水的动静。

所有的花似乎在同一瞬间散发出花香，懵了一

天的大地到这时才清醒过来。而女伯爵古老花园如今已疏于管理，里头到处都是细小的断枝。古老菩提树的芳香蔓延开来，让人无所遁形。

篱笆墙靠右的街上传来喧闹声，似乎是一个喝醉酒的士兵在吼歌，很快又传来一阵敲门的砰砰声。

巨大的红色月亮从花园里的乌鸦巢后面升起来。一开始，月亮跟扎布希诺红砖厂里头的红砖一个颜色，之后又变成了比利乌齐水塔一样的黄色。

窗户下面新打的干草似乎带有茉莉花茶的气息，混着颠茄的味道。一头奶牛被拴在里头——那头牛是从很远的村子里带来的，赶了一整天的路，十分的累，再加上思念以前的同伴，根本不愿意接受新主人给的食物。

“嘿，嘿，牛儿，这儿有好吃的。”女主人轻声哄着奶牛，但奶牛只是倔强地晃动脑袋，缩起脖子，有气无力地叫着。星星在梅流赛艾沃黑色谷仓的上空闪烁，仿佛也是在表达对奶牛的同情。

一切都在生长，随着生命的神奇酵母而发酵。生命的喜悦宛如一阵轻柔的风，吹过田野和城镇，吹过围墙和篱笆，吹过森林和平原。尤里·安德雷维奇不想被这种浪潮扑倒，便索性走到广场上听演讲。

7

月亮已升得老高，洒下一片皎洁的月光，照亮大地。政府大楼的影子形成一个半圆形，好似一块深色地毯，将前面的广场围住。

集会就在广场那头举行。若竖起耳朵仔细听的话，基本上那边说什么都能听见。可日瓦戈医生被当前的月光美景迷住了，他在防火站外头的长凳上坐下，不是凝神细听那边的演讲，而是注视着面前的人和景。

狭窄的单向街道横穿广场，街上泥泞得好似乡间小道，街道两旁歪歪扭扭地分布着一些小房子。柳条篱笆好似池塘里的渔网，从一片泥泞中插出来。你还可以看到从打开的窗户里透出来的微弱灯光。菜园子里头的玉米束纷纷往外探头，一根根细高的蜀葵俯视整个篱笆，好似在夜里被热得把头探

出屋子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女人。

被月光照亮的夜晚格外神奇，简直可以同悲悯情怀或千里眼的天赋相媲美。突然，一阵熟悉且十分规律的声响穿过宁静的黑夜，直抵日瓦戈耳畔。那声音十分热切，并且给人一种言之凿凿的确定感。日瓦戈医生凝神一听，立马就认出了那声音。原来是基恩特军政委在广场上发表演讲。

显然，市民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基恩特政委责骂梅流赛艾沃的人做事不讲究方法，并且屈服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才是真正制造扎布希诺混乱的罪魁祸首。广场上的基恩特军政委跟在司令官办公室里一样，激烈控诉敌人的残暴和强大，说国家目前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听到这儿，人群开始骚动，一个个大声诘问起基恩特来。

抗议的声音此起彼伏，期间也不时听到有人大喊安静。民众不满的叫喊越来越大，也叫得越来越频繁。基恩特的一个随行人员是此次演讲的主持人，他大声说不允许下面的人插话，要求听众保持秩序，但有人坚持认为，人民应当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时，一个女人挤过人群，走到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她没有爬上舞台，而是站在舞台一侧。底下的群众全都认识这个女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了。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站在舞台旁的女人就是乌斯提尼亚。

“军官先生，对于你刚刚说的有关扎布希诺的事，”她说，“还有要分清是非的问题——你告诉我们要辨明是非，不要被人欺骗——事实上，我刚这一通听下

来，我发现真正玩文字游戏的是你自己，像什么‘布尔什维克啦，孟什维克啦’，那都是你的说辞——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如果真能结束战争，让所有民众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和平相处，我觉得那是‘上帝的仁慈’，而不是什么‘孟什维克’；另外说到让穷人有工作有饭吃，那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只不过是做人的品格而已。再说到那个聋哑副官，我们已经厌烦了他的故事。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谈论他，他究竟碍了你们什么事呢？难道就因为他平时聋哑而突然间又能说话且没有经过你的批准？好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似的！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比这奇怪的事呢。就说那头有名的母驴吧。‘巴兰，巴兰，’母驴说，‘听我的，别走那边，我请求你，不然你会后悔的。’自然，那个

人没把母驴的话当一回事，他还是一意孤行地往那边走了。那个人心说，‘哼，一头母驴而已，愚蠢的东西，干吗要听它的。’他对母驴的话嗤之以鼻，可后来发生的事简直让他悔得肠子都青了。故事的结局你们是都知道的。”

“结局是什么？”有人好奇地问。

“够了，别问了！”乌斯提尼亚喝道，“你要是问题太多，会很快变老的。”

“那也没关系。你就告诉我们吧。”底下的人还是不死心。

“好吧，好吧，我告诉你们也行，你个烦人鬼。最后那个男人变成了一袋盐。”

“你搞错了，那是劳特。是劳特的妻子。”有

人大叫。底下的人顿时哄笑起来。主持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遵守集会纪律。

看够了热闹的日瓦戈医生觉得没什么意思，便回家睡觉去了。

8

第二天晚上，日瓦戈见到了安提波娃。当时安提波娃抱着一堆亚麻衣服在餐具室里头，在那儿烫衣服。

餐具室位于二楼比较靠后的一间屋子，窗子刚好对着下面的花园。茶饮已经弄好了，食物也都装盘妥当，用过的脏盘子堆在一边，打算过会儿搬到厨房去。餐具室里头陈列着各式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那时候的人喜欢在餐具室里头打发时光，还经常把那儿当作会客室。

餐具室的窗子是打开的。房间里传来一阵菩提树花的味道，让人恍惚觉得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公园。屋子里还有几根散发出葛缕子味道的干枝，混着安提波娃经常使用的两个平底锅的木炭香味，格外让人陶醉。

“嘿，你昨晚怎么没有来敲门呢？玛德莫伊塞勒跟我说你本来要上去瞧的。不过幸好你没去。当时我已经睡下了，所以也不方便让你进去。你怎么样？小心这些木炭，可别搞到衣服上去了。”

“你这架势，好似是把全医院的衣服都洗了似的。”

“没呢，有很多都是我自己的衣服。看到了没？你老是笑话我，说我被梅流赛艾沃拴住了。不过这次我很认真地告诉你，我要离开了。我现在正在收拾东西。等我把东西收拾妥当，我就马上离开。我会回乌拉尔去，我知道你肯定是回莫斯科。或许有天会有人问你：‘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梅流赛艾沃的小镇？’你会回答：‘我记不清了。’——‘你知道安提波娃是谁吗？’——‘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不可能。你这一趟出去还顺利吗？去乡下感觉怎么样？”

“这要说起来可就长了。哎，这些烫衣服的铁块冷得可还真是快！你方便把那块烫铁递给我吗？就在那儿，看，在烟道里头。再帮我把这一块放过去，多谢。其实，每个村子都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住在村子里的人。有些地方的人勤快肯干，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有些地方的人整天只是想着喝酒，光景自然惨淡了。哎，看了简直让人难受。”

“胡说！因为喝酒？你以为自己了解多少？那些村子根本没人，所有青壮年男人都参军去了。新议会怎么样？”

“是你错了，在这点上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不一致。地方议会？问题一大把呢。新的法律条例没能

通过实施，也没有人为此而努力。所有农民当前只关心土地问题，对了，我还在拉兹多尔诺伊短暂停留了一段。那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去年春天，那儿被烧杀抢掠了一番，谷仓被烧成灰烬，果园也成了一片废墟，有几所房子现在还有火烧的痕迹。扎布希诺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去那儿。不过他们都说聋哑副官的故事是真的，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他们还给我描述他的长相，说他很年轻，并且受过良好教育。”

“昨晚乌斯提尼亚在广场上还在替他说话来着。”

“我一回来，就看到多了许多从拉孜多尔诺伊运来的旧家具。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一百遍，不要这么干了，但他们就是不听。好像我们自己的家具还不够用似的。对了，今天早上司令官办公室派人来

送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需要一套银质茶具和水晶酒杯，说这是件关乎生死的大事，还说只需要借用一晚，用完就派人送回来。不过我知道，到时候能送回来一半就很不错了。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儿，先说跟你借，可是借了就不还。他们好像是要举行一个派对，为了欢迎某个贵客还是什么的。”

“我猜得到是谁。是新任军政委到了，掌管前线军队事宜。他们想解决逃兵的问题，打算包围逃兵并令其放下武器投降。新政委还是个愣头儿青，根本不懂打仗。当地政府想用武力攻打哥萨克军人，可我们这位新任政委却不这么想——他说要跟对方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他说那些人就跟孩子一样，需要耐心且真诚的沟通；他根本就把这当成了一个游戏。加利乌林试图跟他争论，但他却说只要不惹怒野兽就好，放弃一片森林没有什么关

系。‘让我们去解决这件事。’他是这样说的。可像他那样的一个人，一旦他决定了什么事，你就没有办法再使其改变。我希望你能认真听我说，先把衣服放下，待会儿再烫，可以吗？等着瞧吧，这儿很快就会有大麻烦了，并且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麻烦。我很希望你能趁早离开。”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是你夸张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我也打算离开了。不过我不能就这样甩手不干，说走就走。我得先把事情安排妥当，我可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挟带私逃。不过，该把工作转交给谁呢？这可真是个问题。你是不知道我这一番整理清点下来，费了多大的劲，关键是还费力不讨好。根据法院的判决，我把扎布林斯卡亚的全部物品都归到了医院名下。可现在他们却说我这是故意替女伯爵保管财物！真是不可理喻！”

“你不用担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爱怎样怎样。现在这种节骨眼儿，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要是我昨天晚上去找你就好了，因为我昨天的状态还算不错，有那个心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跟你解释天体力学的理论，或者回答你的任何问题。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想把这些压在心头的事情说出来。我想跟你谈谈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我自己。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就不能简单纯粹地聊会儿天呢？为什么非得搞得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去他妈的，都是扯淡。

“哎，你还是继续烫衣服吧，把这些亚麻衣服烫平烫好。不要管我，我说我的，你做你自己的事就行。

“想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吧！哪怕世道艰难，你我还是得活下去。这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现在，俄国的屋顶被掀翻了，你，我，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来到了外面！并且，没有人监视我们。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自由，这是从天而降的自由，是超乎我们期待的自由，是偶然得到的自由。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伟大，却又都感到茫然！你注意到了吗？好似被自己，被这突如其来的自由惊到了。

“你继续烫衣服，不用说话，听我说就行。你不会厌烦的。来，让我给你换一块烫铁。

“昨晚我在广场上，亲眼看到了集会的一幕幕场景。那可真是让人难以忘记！我们的俄国母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动，她没有办法再跟以前一样站着不动，现在的俄国充满了不安和动荡，无法得到安宁。她在说话，无法停止。你以为会说话的只

有人吗？告诉你，星星和大树会彼此倾谈，花儿会在晚上谈论哲学，石头屋子也会进行集会。这让你想起福音，对吗？你还记得圣·保尔吗？你可以用嘴说话，用心倾听。我们真应该为这种彼此理解的天赋感恩。”

“我知道你说的星星和大树对话是什么意思。我能理解。我身上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部分是因为战争，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革命。因为战争的缘故，生命似乎都能就此停歇——好似生命能延迟一些——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革命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就像一声被压抑了太久的叹息，终将会发出来。所有人都因此而重生，而改变。你可能会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社会革命，还有一次便是个人革命。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就像大海，所有这些支流，这些

独立的单一的革命都将汇流入海——汇入生命的大海。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被天才改造的，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得到了丰富。只有现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决心亲自去体验革命，而不是在书本里在图画中感受。这一次他们会亲身去实践，不再只是抽象地想象。”

日瓦戈声音的突然颤抖泄露了他的真实情绪，此刻他的内心愈发地悸动。安提波娃停下手中的事情，严肃而讶异地看了日瓦戈一眼。这个眼神让他感到十分困惑，突然他忘了自己在说什么。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日瓦戈继续他的演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些天来，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我想诚实地活着，想要活得有意义。我多么想成为这些苏醒人群中的一员。然后，就在我为此而喜悦的时

候，我却看到了你那神秘又悲伤的眼神，好似你的天堂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多么希望你的天堂能近一点！我多么希望从你脸上看到快乐而满足的神情，让我知道你满意你的生活，你不需要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要是这世上能有一个和你真正亲近的人，你的朋友或你的丈夫——如果他是个军人，就再好不过了——能够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不要再担心你的命运，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你的身上就好了。但我会抽出我的手，啊，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请原谅我。”

可日瓦戈医生颤抖的声音再次出卖了他。他不再挣扎，感觉很是无助，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子旁。日瓦戈倚着窗沿，手掌捧着双颊，眼神空洞地注视着下面的花园，试图调整自己的情绪。

安提波娃绕着烫衣板来回走，并将烫衣台推到

桌子和另一个窗子中间，然后在日瓦戈身后停下。

“那就是我一直恐惧的东西。”安提波娃轻声地说，好似在自言自语，“我不应该……不行，尤里·安德雷维奇，你不能这样做——哦，看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吧！”安提波娃叹道。紧接着，她匆忙跑回烫衣台旁，只见一件女式衬衣已经被烫出了一个洞，冒出股股青烟。

安提波娃生气地把烫衣板放到台子上。“尤里·安德雷维奇，”她说，“请你理智一点，现在你先去找玛德莫伊塞勒待一会儿，喝杯水冷静一下再回来。以前的你一直都很冷静克制，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听到了吗，尤里·安德雷维奇？我知道你做得到。去吧，求你了。”

自那之后，日瓦戈医生和拉拉再没有过这种对话。

一周后，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便离开了那个地方。

9

几天之后，日瓦戈也启程回家。临行前一晚，一场暴风雨不期而至。呼啸的狂风夹着滂沱的大雨，猛烈敲打着屋顶；间或风雨也会停歇一会儿，仿佛是要慢慢冲刷出一条路。

轰隆隆的雷声不绝于耳，震耳欲聋。电闪雷鸣中，街道仿佛也消失在光的无垠中，被风吹得弯了腰的树似乎都要往同一个方向奔跑。

深夜，熟睡中的玛德莫伊塞勒被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惊醒。她惊坐起身，凝神听了一会儿。敲门声还在继续。

玛德莫伊塞勒在心里寻思，这医院里还有其他人可以过去应门吗？哎，可怜的老太婆，难道就因为自己天性善良，诚实可靠，又富有责任感，所以

就得一个人把什么事都做了吗？

众所周知，这所房子之前是有钱的贵族的财产，但现在已经捐做了医院——那么现在算作人民群众的财产，还是贵族的呢？该由谁来打理它？比如，她很想知道，男护士都去哪儿了。所有人都逃走了——看护人走了，护士走了，医生也走了，这儿已经没有可以做主的人。可这儿还住着伤员，仍有两个截肢的伤兵住在卧室改成的病房里，楼下洗衣房隔壁的储物间里则挤满了患痢疾的人。这种时候，该死的乌斯提尼亚还走亲访友去了。她明知道马上就会有大暴雨，难道这也阻挡不了她的脚步？现在她更是有理由不回来过夜了。

哦，谢谢上帝，敲门声终于停了。门外的人应该也意识到屋里不会有人去应门，所以就放弃了。这种鬼天气，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外头呢……难道外

头敲门的是乌斯提尼亚？不对，她有钥匙。哦，天啊，太可怕了，外头的人又开始敲门了。

一个个睡得跟猪一样！别指望日瓦戈医生能听见什么，他明天就要走了，这会儿的心思肯定都飞到莫斯科了。可加利乌林呢？外头这么吵，他怎么还能睡得这么死这么安稳？在这样恐怖的夜晚，这样恐怖的地方，难道就放心让她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人摸黑下去开门吗？

加利乌林！她突然记起来了。哦，她真是睡得头脑不清醒了，加利乌林早就走了，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走了很远。之前还是她和日瓦戈医生帮着把他乔装成一个普通市民，并把这个地区所有的小路和村子都告诉他，帮助他摆脱追兵。这一切还得从火车站那可怕的一幕说起，基恩特政委被人在火车站杀死，加利乌林被当成凶手，然后追兵就一路从比

利乌齐追到梅流赛艾沃，定要将他置之死地。

要不是因为恰好有一支军队打镇上经过，制止了那些凶残极恶的人，这个镇上恐怕连一块石头都剩不下。

风暴渐渐停歇了，雷声也小了，逐渐远去。雨水落落停停，依稀还能听见雨水轻柔拍打树叶的声音。无声的闪电划亮玛德莫伊塞勒的房间，持续了有几秒钟，好似在寻找什么东西。

突然，前门停了很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急需帮助，才会这么绝望地一次又一次地敲门。风再次刮了起来，雨也下大了。

“进来。”也不再管门外面的人是谁，玛德莫伊塞勒大声喊道，回喊的声音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玛德莫伊塞勒突然想到了外头的人可能是谁。她迅速翻身下床穿上鞋子，把一件睡袍裹到身上，打算去叫醒日瓦戈——如果日瓦戈能和她一道下楼的话，她至少没那么害怕。不过日瓦戈其实也听到了那急促的敲门声，并且已经点着蜡烛下楼来了。两个人是一样的想法。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在敲大门，我不敢一个人下去。”玛德莫伊塞勒用法语喊道，然后又用俄语补充道，“你看吧，门外头的要么是拉拉，要么就是加利乌林上尉。”

被敲门声惊醒的尤里·安德雷维奇也同样确定门外站着的是他认识的人——要么就是逃亡中被逼无路可走的加利乌林，回来寻找帮助；要么就是因为某种原因中途折返的安提波娃护士。

走到过道上，日瓦戈医生把蜡烛递给了玛德莫

伊塞勒，然后拉开门闩，转动钥匙。一阵风呼地吹开了门，吹灭了蜡烛，还带来了一阵冷雨。

“是谁？谁在外面？有人吗？”

玛德莫伊塞勒和日瓦戈医生轮流朝外头喊，可外头只是黑乎乎的一片，没有人回应。突然，他们听到另一个地方又响起了敲门声——是在后门，还是在通往花园的法式窗户？

“肯定是风吹的。”日瓦戈医生说，“不过以防万一，你还是去后门看一下。我就留在这儿再瞧瞧，以免外头真的有人。”

于是，玛德莫伊塞勒返身进了屋，日瓦戈医生则走出门，走到门廊底下。他的眼睛逐渐也习惯了黑暗，看见了远处的第一缕曙光。

天空中的乌云似乎玩起了追赶的游戏，压得低

低的，仿佛云边都要触到树顶。乌云和大树都朝同一个方向倾斜，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扫把在清扫天空。雨水冲刷着房子的木墙，把灰色冲成了黑色。

过了一会儿，玛德莫伊塞勒回来了。“怎么样？”医生问。

“你猜得对。还真是风吹的。”她已经把屋子左右都看了一遍，原来是一根树枝在拍打餐具室的窗户，还拍碎了其中一块玻璃，地板上一片泥泞，拉拉房间的窗户也被拍烂了，进了水，里头跟洪涝了似的。

“你看，屋子这边有一个断掉的窗板被风吹得不断敲击地板，看到了吗？事情就是这样。”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然后锁好门，各自回到

房间，感叹虚惊一场。

他们原本都确定地以为，只要一开门，被雨淋得湿透了的安提波娃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安提波娃会忙不迭地脱下身上的湿衣服，他们则问她很多个问题，安提波娃也许会径直去到楼上换衣服，然后下来在厨房的炉火前烤火，直到身体暖和过来。安提波娃会把头发甩到背后，然后以一种谈笑风生的姿态将自己这一路惊险的经历告诉他们。

即便是在锁上了门之后，他们还是想象被淋成落汤鸡的拉拉就在门外头站着，这种想象在他们脑海里挥之不去。

10

听说，比利乌齐的电报员科里亚·弗洛莱克间接为火车站的事情负责。

科里亚是梅流赛艾沃一个有名钟表匠的儿子，打小儿便在梅流赛艾沃地区为人熟知。童年时，他曾带着几个下人在拉兹多尔诺伊家住过一段时间，并跟女伯爵的女儿玩得挺热络。他也是那个时候学会法语的。玛德莫伊塞勒跟他很熟。

不管是什么天气，科里亚总是骑在自行车上，不穿外套，也不戴帽子，一年四季都穿着一双帆布凉鞋——梅流赛艾沃的人对这些已是见怪不怪。科里亚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靠着单车的惯性往下滑行，抬头看电线杆子，检查电网的工作情况。

梅流赛艾沃有些人家的电报机是通过支线从火

车站接出来的，而这些人家的电话都是科里亚通过火车站的接线总机进行处理。所以，他工作的时候必须得全神贯注，因为他不仅要负责电话和电报，碰上站长帕瓦里克罕不在的时候，他还得负责铁路线上的信号，因为那些信号也是同一个控制室进行操控的。

由于科里亚得同时关注好几个仪器，渐渐地他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模糊、突兀、让人不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免回答他人喋喋不休的问题或者被人纠缠着说话。听说出事的那天，他就是这样故技重施，才间接导致了事情的发生。

其实事情发生之前，加利乌林跟科里亚联系过，只是科里亚故意挡了下来，从而铸成了大错。

当时加利乌林从镇上打电话到火车站，要求跟

在火车站附近的军政委基恩特通话，目的是为了告诉基恩特，他打算马上上路，希望基恩特一行人等等他，并且在他到达之前暂时不要有所行动。但忙于给马上进站的一辆火车打信号的科里亚，为了避免麻烦，却拒绝呼叫军政委。与此同时，他又尽可能地拖延火车进站的时间——火车上载的是哥萨克士兵。

哥萨克军队抵达之后，科里亚毫不掩饰自己的郁闷。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在控制室前方的大窗户前停下。科里亚掀开印有火车公司名字的绿色帘子，拿起放在窗沿上托盘里的一个大水壶，倒了一些水在杯子里，喝了几口，这才悠悠地看向外面。

车厢里的车长透过车窗看到了科里亚，并冲他友好地点头。

“都是些讨厌的家伙。”科里亚在心里鄙夷地想。他伸出舌头，对着外面挥了挥拳头。车长不明白他的意思，不过还是耸了耸肩，并对着火车的方向点头，意思是说：“我接下来怎么做？我想知道，换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反正，你也是个可恶的浑蛋。”科里亚打着手势回应道。

货运车厢上下来一大群马，马蹄踩在木头过道上格外响亮，然后车上的士兵也一个接一个地下来，踏上石头铺成的站台。队伍声势浩荡地沿着轨道前行。

轨道的尽头摆着两排没人要的木头马车。马车的油漆被雨水冲掉了，湿木头里面也长出了许多的虫子，长久以来那些木制马车就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而不远处就是一片森林，里头长满了茂盛的树木，地上是一片片青绿的地衣，云朵在森林上空飘

浮。

在长官的号令下，哥萨克士兵纷纷跨身上马，朝不远处的空地大步而去。

第212叛军部队被包围了。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士兵在森林里头显得更高了，比在开阔的空地上更加慑人。那群哥萨克士兵甚至都把正统的骑兵部队给震住了，尽管骑兵部队身后的小屋里还藏着火枪。哥萨克士兵拔出了剑。

在马匹形成的包围圈里，还堆着几堆木头。基恩特爬到木头堆上，开始对着被包围的哥萨克士兵讲话。

和往常一样，他讲的还是诸如士兵的责任感，祖国荣誉以及其他很多崇高的话题。但他讲的这些东西并不能让哥萨克士兵产生共鸣。那些士兵中有

太多人饱受战争的苦楚，他们的心已经磨硬了，也累了。基恩特说的那些话他们已经听了太多遍，早已厌倦。连续四个月的左右夹击已经让这些质朴的士兵濒临崩溃的边缘，并且，讲话者的外国名字和波罗的海口音更让他们觉得距离被拉远。

基恩特也意识到自己的演讲太长了，心中难免自我懊恼。尽管下面围着的这些人只是用冷漠的表情甚至是带着敌意的厌倦回应他的演讲，他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说着说着，基恩特也没了耐心，他决定开门见山，直接威胁堆放。基恩特不顾底下人的骚动，警告这些叛乱的哥萨克士兵说军事法庭已经设立，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并交出主犯。他还说，要是哥萨克士兵拒绝的话，他们将会被当作叛国者和反动派被处以重刑。而在那样的情境下，本就彪悍血性的哥萨克士兵哪儿能受得了有人这样对他们说话？

几百个声音同时响起，现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些人的声音还算冷静：“好吧，好吧。安静。够了。”但最多的还是充满愤怒的歇斯底里的叫喊：

“神经病！跟过去一样！这些当官的还是把我们当成垃圾。所以，你们就认定我们是叛国者了，对吧？那你自己呢，尊敬的先生？这个人一看就是德国人，是打进我们军队内部的奸细。让我们看你的身份证明，尊敬的贵族先生。还有，你们又在看什么呢？想来调停吗？”说着，他们转向了哥萨克士兵那一边，“你们会重建秩序，对吧？加油，好好干。”

而那些哥萨克士兵也愈来愈不喜欢基恩特冠冕堂皇的演讲。

“在他看来，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些贱命。”士兵们低声说着，“而他自己就是上

帝！”一开始只是几个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拔剑出鞘。一个接一个的哥萨克士兵翻身下马，待到绝大部分的人都从马上下来，一群人集结着朝着空地的中央逼去。

“您得赶紧溜走。”身边的军官不无担心地对基恩特说，“您的车就在火车站，我们会安排车过来。赶紧走。”

基恩特也看出了情况不妙，不过他感觉偷偷摸摸地溜走实在有失身份，所以他选择明目张胆地掉头，往火车站赶。尽管基恩特的内心十分不安害怕，但出于自尊，他还是尽量走得平静，装作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眼看就要到火车站了。一直走到森林的边缘，前头便是铁轨，基恩特才第一次回头看。一队拿着枪的士兵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想干什么？”基恩特暗忖。心中一紧，他不由加快步伐。

而身后跟着的人也加快了脚步。基恩特和那群士兵之间始终保持不变的距离。基恩特看到了废弃马车堆成的那堵墙，于是他绕到马车堆的后面，撒开脚跑了起来。载哥萨克士兵过来的那辆火车已经分流出去了，轨道上是空荡荡的一片。基恩特奔跑着穿过轨道，跳上高高的站台。与此同时，身后的士兵也从马车堆后面绕了出来。帕瓦里克罕和科里亚大声呼喊，朝基恩特挥手，让他到火车站的办公楼里来，以帮助他躲过一劫。

可是基恩特的自尊心这时再次作祟，城里人固有的那种荣誉感让他生出一种大义凛然的自我牺牲感，而这种感情用在当时明显不合适，并且也最终让他丧了命。基恩特的心怦怦直响，他努力想要控

制自己。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对他们喊，‘清醒一点吧，你们知道我不是间谍。’”或许一两句真心的话语能让他们清醒过来。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不知怎么只要站在舞台上的讲桌前，或者一把能跳上去的椅子上，基恩特就会想要演讲，想对着人群发出热烈的呼喊。

火车站的门边，刚好是在钟的下面，放了一个大水桶——那是为防火灾准备的。水桶的盖子盖得很严实。基恩特跳到水桶的盖子上，尽管话已经说得不甚连贯，他还是转过头对不断靠近的士兵演说。他那不自然的声音和大胆的手势显得格外疯狂，只消再走两步，他就能进到屋里头，躲过危险。士兵们被他这种疯狂惊住了，他们停在了轨道上，放下了手中的枪。

可站在水桶边上的基恩特突然晃了一下，他的

一只脚滑进了水里，另一只脚则挂在水桶的边上。

看到基恩特如此狼狈地跨坐在水桶的边上，士兵们大笑起来，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士兵开枪击中了基恩特的脖子。

疯狂又天真的基恩特已经死了——在其他人跑过去用刺刀将他的身体刺得千疮百孔之前。

11

玛德莫伊塞勒打电话给科里亚，让他帮日瓦戈医生在火车上安排一个好位置坐到莫斯科，并威胁说要是不照办的话，就把他的事情说出去。

科里亚一如既往岔开话题，直到说第三遍时才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

“帕斯科夫，帕斯科夫，能听到吗？什么叛乱？有什么用？玛德莫伊塞勒，你在说什么？还是请你挂电话吧。帕斯科夫，帕斯科夫，三十六点零一五，哦，天啊，断线了。喂，喂，我听不见。玛德莫伊塞勒，还是你吗？我告诉过你了，我办不到。你去问帕瓦里克罕吧。谎话连篇。三十六……哦……玛德莫伊塞勒，你快挂断电话。”

而玛德莫伊塞勒只是说：

“你别想蒙我，帕斯科夫，帕斯科夫，你个骗子，我看透你了。告诉你，明天你必须要安排日瓦戈医生上火车，我不想再听你废话。”

12

尤里·安德雷维奇走的那一天，天气十分闷热，似乎又在酝酿一场风暴。火车站附近郊区的地上到处都是瓜子壳，黏土小屋和白鹅在阴黑的天空下看着让人觉得恐惧。

火车站前头和两边的野草地已经被踏平了，草地上满满的都是人，有些人甚至已经等了好几个星期，所有人都在等一辆货车带他们离开。

穿着灰色羊毛外套的老人在大太阳底下溜达，这里站站，那里钻钻，四处打听新闻和流言；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枕臂躺在地上，手里挥着脱了皮的柳枝，好似在牧牛一样；而他们的弟弟妹妹们四处乱窜，玩得很欢。男孩子们伸直双腿，母亲就坐在旁边，怀里抱着还在喝奶的小婴儿，棕色的外套下母亲的乳房已经不成形状。

“只要有人开枪，这些人就会作鸟兽状散。他们不喜欢枪声。”火车站站长和日瓦戈医生从火车站前头一排排的尸体间穿过，站长毫无怜悯地说，“一眨眼的时间，所有人都会从草地上消失。那时候你就能再次看到大地了。这些吉普赛人络绎不绝地过来，我们已经有四个月没有见过空旷的大地，我们都忘了没有人的大地是什么样啦。他之前就躺在这儿。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在战争中见过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你可能会以为看到任何事我都不会再大惊小怪了。可我竟为此感到遗憾和伤心。这真是说不通。他对他们做了什么？那些人根本不是人。他们说，他是父亲最喜欢的儿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先进到我的办公室去。恐怕这趟火车是上不去了，那些人可能会把你压死。我安排你到一辆本地的火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在踏上火车之前，你一个字都不能说出去，不然那些人会起哄闹事的。你今晚在苏克哈尼奇换车。”

13

“秘密”火车进站时，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拥上铁轨。只见一个又一个的人就跟大理石一样滚下山，爬上站台，彼此推搡，跳上阶梯或者直接从车窗里爬进去，有的还爬到火车顶上。火车一下子就被填满了，而自始至终火车都没有停下。当火车终于在站台停下，车厢里已经被乘客挤得水泄不通，连针都插不进去。幸运的是，日瓦戈医生得以从站台的后门上车，尽管诸多不便，但他还是挤上了火车的过道。

日瓦戈就这样坐在行李上，一路到了苏克哈尼奇。

天上的乌云逐渐消散。明媚阳光照耀下的土地里，成群的蟋蟀叫得响亮，以至于部分掩盖了火车的轰隆声。

站在窗前的乘客把光全挡住了，两个甚至三个影子彼此重叠，映在地板和座椅上。这些影子甚至映射到了车子的外面。带着火车的阳光倒影，乘客们拥着挤着往另一个窗子走。

车上的人纷纷攘攘，有大喊的，有唱歌的，有吵架的，还有玩牌的。不管火车何时停下，车外头人群的吵嚷声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吵嚷的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好似海上起了大风浪一样，跟在海上一样，这吵嚷声有时又会突然地停止，静默那么几秒。在那莫名的静默中，你能听到匆忙跑下站台的脚步声，听到货运车厢外头的争吵声和喧闹声，听到远处的道别声，听到母鸡的咯咯声，还有那树叶的沙沙声。

仿佛是火车上收到了电报，又或者是梅流赛艾沃的人给尤里·安德雷维奇送来了问候，窗子外面突

然飘进来一股熟悉的香味。那香味似乎是从旁边某个地方传来，来自野花之上，悄无声息地掩盖其他所有的味道。

因为车厢里实在太挤了，日瓦戈医生看不到外头的树，不过他能想象到那些树就生长在不远的地方。它们不动声色地伸展茂盛的枝丫，直伸到火车车厢的上头，而大树的绿叶被来往火车扬起的灰尘覆盖了厚厚的一层，中间钻出一些小小的闪亮的柔软花朵。

一路上，这种情景发生了很多次。每个车站都是喧闹拥挤的人群。到处都是花开正浓的菩提树。

那无所不在的香味似乎要随着行进的火车去到北方，如同一个流言，想尽办法地要传到最小最远的角落，而等待上车的乘客总能在火车到达的时候获知这一切。

14

在苏克哈尼奇待的那个晚上，一个仍保留着战前责任意识的门房带着日瓦戈医生绕过没有亮灯的轨道，去到一辆刚到站的火车的后面，并给他在二等车厢找了一个位置。

门房用的是售票员的钥匙，差点就没能打开火车车厢的门。门房把日瓦戈医生的行李先从窗子里扔了进去，险些就被里头的售票员给扔了出来。不过，售票员最后还是被尤里·安德雷维奇打动了，退了一步，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那辆神秘的火车十分特别，行驶得很快，只在很少的几个站才会停车，并且有不少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车厢里几乎是空的。

日瓦戈所在车厢的桌子上点了一根蜡烛，从半

开窗户吹进来的微风将蜡烛的火焰吹得摇曳不定。

除日瓦戈之外，车厢里只坐着一个人，蜡烛就是那个人点的。那是一个金发的年轻人，从手臂和腿的长度来看，应该个头很高。年轻人的四肢看着简直快和关节脱节了。他冷漠地坐在窗边角落的一个位置上，不过日瓦戈进来的时候，年轻人礼貌地起了身，坐下的时候也显得很有绅士风范。

年轻人的座位下面有一块地毯样的东西。只见那地毯的一个角突然有点耸动，紧接着便从里头钻出一条爱尔兰蹲猎犬。那只狗来回将尤里·安德雷维奇嗅了一通，接着又撒开腿在车厢里跑动。跟他那架着腿的主人一样，狗的爪子似乎也是和关节脱节的。过了一会儿，在年轻人的呼喝下，蹲猎犬又回到了位置下面，还是之前的那个姿势，看着就跟一块皱皱的地毯一样。

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才注意到离年轻人不远的地方放着一把带枪套的双管枪，另外还有子弹带，车厢的挂钩上是一个鼓鼓囊囊的猎人袋。

看来，年轻人是出门打猎去的。

年轻人十分健谈，笑起来也很亲切，日瓦戈医生很快就跟他聊了起来。交谈的时候，日瓦戈医生总会盯着他的嘴看。

年轻人的声音很尖，听着让人略微有些不舒服，有时候年轻人的尖音甚至会突然变成假音。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在于，年轻人看上去像一个普通的俄国人，但他发“u”这个元音的时候却很像外国人的腔调，尤其像法国人的“u”。发这个“u”音似乎让他很费劲，反正这个音比其他音都要高，并且每次都会伴有一声小小的尖叫。有时候他也会反应过来，试图克服这个不足，但说着说着他又会犯

同样的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暗忖，“我敢肯定，我曾看过类似的东西。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可我现在想不起来。这一定是由某种脑疾造成的语言障碍。”年轻人的尖叫声让他显得有点滑稽，所以他很难保持严肃的面孔，“我还是去睡觉吧。”日瓦戈对自己说。

于是，日瓦戈爬上几根铁架组成的卧铺。年轻人主动提出把蜡烛吹灭，以免日瓦戈医生睡不着。日瓦戈接受了年轻人的好意，并对他表示感谢。蜡烛熄灭以后，车厢瞬时陷入了黑暗。

“我能把窗子关上吗？”尤里·安德雷维奇问道，“你不怕有贼进来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日瓦戈医生又提高声音问了

一遍，但还是没有听到人应声。

日瓦戈医生于是划燃一根火柴，想看看年轻人是否在中途停车的时候下车了。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全睡死了，似乎更加不可能。

然而，年轻人还在车厢里头，并未睡着。他对日瓦戈医生微微一笑，从他的卧铺床上探下头来。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又划燃了一根，第三次重复了自己的问题。

“您想关就关吧。”年轻人这次回答得挺干脆，“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小偷惦记。不过，还是打开一点吧，车里太闷热了。”

“真是个怪人！”日瓦戈在心里想，“没有光就不愿意出声。而且他现在说话的口音也更奇怪了，我都听不懂。”

15

日瓦戈医生本就被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搞得筋疲力尽，再加上收拾行李、起早赶车等琐碎事务，所以他想着应该一躺下就能睡着的，奈何事与愿违。身体的极度疲倦反倒让他睡不着了。一直到天破晓，日瓦戈才渐渐入睡。

日瓦戈一夜辗转，思绪万千。不过总的来说，日瓦戈想的事情可以分成两部分，两边相互纠缠，理不出个头绪。

一部分是围绕着冬妮娅，日瓦戈想到他们的家，他们以前的生活始终贯穿着一种诗意，爱和温暖。日瓦戈想念这种生活，整整分开了两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

与此相关的还有日瓦戈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

这是一次被广大中层阶级接受的革命，在1905年的暴动之后，它也被越来越多的学生理解。

这些熟悉的长久以来的想法还包括战争爆发之前对新生活的期待和承诺。1912～1914年，这种想法开始影响俄国的思想领域，艺术领域，生活方式，并对整个俄国的现状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待战争结束，如果能回到那种生活状态，能看到革命的传承和继续，那种快乐无异于回家。

但日瓦戈的脑海中同时又蹦出了许多新的想法，这些想法跟以往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并不熟悉这种新的事物，一切都根植于无法避免的现实，他无可选择。这些想法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犹如一场思想地震。

这些新想法包括，战争会带来流血杀戮，会让

人无比恐慌；它让不计其数的人无家可归，受尽苦难；同时它也能教会人类一些真理和智慧。同样，也是战争将你推到那个偏远的小镇，让你遇到那些人。这些新想法新事物中同时也还包括革命本身——不是1905年知识分子理想的革命，而是现如今这种由战争催生的血腥的，残忍的，彻底的武力革命，它是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些彻底的革命主义者领导。

安提波娃护士也在日瓦戈的这些新思绪中，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对于安提波娃的过去，日瓦戈知之甚少。安提波娃从来不责怪任何人，但她的沉默恰恰是最好的控诉。她是那样的含蓄，又那样的坚强，让人捉摸不透。尤里·安德雷维奇努力不去爱安提波娃，正如他努力去爱生命中其他的人一样，其中包括他的家人朋友，也包括其他任何人。

火车全速前进。顶头风透过打开的窗子吹进来，拂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头发。每到一个站，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会有人群的喧嚣和菩提树的窸窣。

有时候，四轮马车或轻便双轮马车会穿过黑暗朝火车站驶来，于是乎，人声马蹄声同树叶的沙沙声会交织成一首奏鸣曲。

每当这种时刻，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自己似乎能明白让那些树影婆娑的是什么，能听见树叶彼此的耳语——风好似舌头，在沉睡的树木旁喋喋说着话。日瓦戈医生在卧铺床上翻来覆去，他的脑海里始终盘桓着这些想法——俄国正经历的暴动革命浪潮，革命的艰难及其未卜的前程。

16

第二天，日瓦戈医生十一点钟才醒。“普林斯，普林斯。”同车厢的年轻人低声唤着他的狗。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惊讶的是，他所在的车厢仍然只有年轻人和他两个人，竟然没有其他乘客上到这节车厢。

终于到站了，车站的名字早已烂熟于心。他们出了卡鲁加省，已经进入莫斯科境内。

日瓦戈医生洗漱完毕，返回车厢同年轻人共用早餐——是年轻人邀请的他。这下，日瓦戈医生得以仔细打量年轻人。

让日瓦戈意外的是，年轻人的话特别的多，并且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年轻人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但他这样并不是想要交流或传达思想，倒更像

是为说话而说话，完全是出于一种生理的本能发出声音。年轻人说话的时候总喜欢跳起来，脚下跟安了弹簧似的。他会毫无理由地大笑，或表情满足地搓弄自己的手。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表达喜悦的话，他还会用力地拍击膝盖，一直大笑，直到笑出眼泪。

跟前一晚一样，年轻人说话仍然显得很古怪。他说话很不连贯，有时显得特别自信，有时又会问一些很幼稚的问题。年轻人断断续续说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让人无法置信的事，也许他撒了一点小谎。显然他是想用极端思想或者以及对所有被广泛接受的反对意见，来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不由让日瓦戈想起一些往事。上个世纪有许多的虚无主义者持同样极端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一些英雄人物也拥有这种特质，之后又

被他们的直系亲属继承——多半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经常是走在莫斯科前头的人，因为他们仍保留一种刨根问底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住在莫斯科的人认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

年轻人告诉日瓦戈，他是一个著名革命家的侄子，不过他的父母却是无可救药的反动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顽固。年轻人说他们家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庄园，他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还说自己的父母跟舅舅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但舅舅对此并不计较，现在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想方设法地帮他们。

年轻人告诉日瓦戈说，他的想法跟舅舅差不多。他是一个彻底的极端主义论者，无论是在生活、政治还是艺术方面。这又让日瓦戈医生想起皮奥托·沃克霍文斯基[(2)]——当然思想没有那么左，也

没有那么狭隘。

“接下来，他就会告诉我他是一个未来主义者。”尤里·安德雷维奇心想。果不其然，他们接着就聊起了现代艺术：“现在该谈运动了——赛马、溜冰或法式摔跤。”紧接着，年轻人就跟日瓦戈谈起了打猎。

年轻人在老家的时候经常打猎。他吹嘘自己是一个神枪手，说要不是因为身体有缺陷，没有办法参军入伍，他肯定能在军队里有一番大作为。看到日瓦戈流露出的怀疑眼神，年轻人叫起来：“怎么？难道你都没注意到吗？我以为你早就猜到我的问题了。”

接着，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卡片，递给尤里·安德雷维奇。其中一张是年轻人的名片，上面的名字很拗口，叫作马克斯·阿里斯塔科霍维奇·克林

特索维·帕格雷夫什克。年轻人请求日瓦戈称呼他帕格雷夫什克，因为他舅舅也叫这个名字，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

另一张卡片上画着一张正方形桌子，每个角上又都挂着各不相同的小画，上面画的是两只紧握的手，只不过手指弯曲的形态不一样。原来，这是聋哑人的字母表。一下子，所有事情都能得到解释了。帕格雷夫什克上的是聋哑人学校，可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小孩儿。通过观察老师喉部肌肉的变化他竟然学会了说话，并且还能听懂别人说的话。

结合帕格雷夫什克之前说的话，以及他的打猎经历，日瓦戈医生说：

“请恕我冒昧，不过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跟曾经的扎布希诺共和国有什么关系？”

“你是怎么猜到的……你认识布拉扎克吗？我跟它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帕格雷夫什克高兴地叫起来，身子因为兴奋而不住摇晃，疯狂地拍着自己的膝盖。接着，他再一次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叙述。

他说布拉扎克提供了那个机会，希望能在扎布希诺那个地方践行他自己的理论。尤里·安德雷维奇发现帕格雷夫什克讲话天马行空，有时候让人相当费解。帕格雷夫什克的人生观既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受到那些让人无法置信的神奇猎人故事的影响。

帕格雷夫什克以一种先知的论调笃信地说，他预测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动乱。尤里·安德雷维奇对此暗自同意，不过这个年轻人平静而像煞有介事的口吻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打住！”日瓦戈医生略显犹豫地打断道，“没错，这不是没可能。不过在我看来，要是这种混乱、分裂、敌人的施压等继续下去，那就不适合开始一场危险的运动。俄国不能是刚摆脱这场动乱，立马又被拖入另一场动乱中。我们得等待合适的时机，至少得等国家恢复了一定的秩序，人民能过上相对和平的生活。”

“太天真了！”帕格雷夫什克说，“你所说的秩序，其实是跟你热切追求的秩序同样正常的社会状态。所有这些破坏和动乱，都不过是一个更宏大计划的自然和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全瓦解分裂。必须要让旧的秩序分崩离析，然后再由一个彻底革命的政府领导重建，建立全新的国家秩序。”

尤里·安德雷维奇混乱了。他出了车厢，走到过

道里头。

不断加速的火车离莫斯科已经不远。火车从桦树林中穿过，桦树林间依稀可见几座避暑的房子。火车驶过没有顶棚的乡下火车站，驶过迫切等待的人群身旁，在扬起的灰尘中将这一切远远甩在了后头，仿佛旋转木马一样转起圈来。火车的引擎发出轰隆隆的巨响，那声音穿过周围的树林，从远处带来一声声回响。

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猛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在哪里，遭遇了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三年的巨变、动乱、不确定，先是战争，然后是革命，随处可见的崩塌、死亡、爆炸、断桥、火光、废墟——突然间，所有这些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的，没有意义的空间。身处快速行进的

火车上，马上就要到家了——好在他的家还在，没有被炮火吞噬——此时在日瓦戈看来，每一块石头都显得那么亲切。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经历，是所有追求真正的彼岸，是艺术的意义所在——回家，回到家人身边，回归自我，回归真实的生活。

行进的火车将森林留在了身后，穿过一条枝叶横生的隧道，进入一片开阔地带。一个陡坡往前逐渐延伸，拓展，形成一个宽阔的高地。高地同深绿色的土豆地床平行，而高地上面有许多保护土豆幼苗的玻璃罩。田野的另一边，深紫色的云覆盖了半边天空，也吞噬了火车喷出的白色尾气。阳光穿过云层，如同轮辐一样洒在大地上，在玻璃罩的反射下，更显璀璨夺目。

突然间，一场带着热气的大雨从天而降。雨水

哗哗啦啦，同火车的轰轰隆隆相应和，仿佛那雨水害怕自己被火车甩下，所以奋力追赶。

当基督教堂出现在山的另一边时，日瓦戈医生差点没反应过来。紧接着，教堂的穹顶、烟囱、屋顶、房屋——出现在眼前。

“莫斯科！”日瓦戈医生低喊一声，转身回到车厢，“我们该准备下车了。”

帕格雷夫什克闻言跳了起来，他在猎袋里翻找了一会儿，取出一只肥鸭：“拿着。”他说，“当作一个纪念。一路上有你同行，我很开心。”

尽管日瓦戈医生婉言谢绝，但帕格雷夫什克坚持要塞给他，最后他说：“好吧，我收下了，当作你送给我妻子的一份礼物。”

“太好了，太好了，给你妻子的礼物。”帕格

雷夫什克高兴地大叫起来，仿佛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大笑声让猎犬普林斯也不由跳起来，与他一道狂欢。

火车缓缓进站。车厢陷入了黑暗。帕格雷夫什克将野鸭子用一张报纸包好，热情地递给日瓦戈医生。

---

(1) 指十七世纪的过渡期和内战期。

(2) Piotr Verkhovensky，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一书中的人物。

第六章　莫斯科营地

1

坐在火车上的日瓦戈觉得，时间静止了，世界静止了，只剩下火车在动。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以为还没到中午。

不过太阳已经开始落下，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在斯摩棱斯克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间艰难前行。

后来，每当日瓦戈医生回忆起这一天，他都认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他最初的印象还是受到了后来经历的影响——人们只是出于习惯才会流连于集市之间，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因为

商摊店铺都关门了，散市上也买不到什么卖不出的东西。

日瓦戈医生看到高高瘦瘦，穿着体面的老人对着墙高声尖叫，无言地出售没有人买也没有人需要的东西——假花、带玻璃盖的圆咖啡壶、黑色晚礼服、华丽制服，心里是无言地责备。

穷人出售的反倒是更实际更有用的东西——黑面包屑，潮湿且脏乎乎的白糖，从中间切断的烟草。

市场上交易着各种各样稀松平常的小物件，每换一次手，价格就要抬高一点儿。

出租马车转进广场侧面的一条窄道。身后，落日将日瓦戈的背照得温热。前头还有一辆马车，是一匹驮马拉着一辆空车。马车扬起一地灰尘，在落

日余晖的反射下发出金光。终于，日瓦戈乘坐的马车越过了前面挡道的马车，行驶得更快了。日瓦戈医生看到地上到处散落着从墙上和篱笆上撕下来的报纸，他惊住了。突然间刮起了大风，风吹得马左右摇晃，马车颠簸前行。

又过了几个路口，很快，街的转角处出现了日瓦戈医生的房子。马车停下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深吸了几口气，走下马车时，他的心跟打鼓一样，怦怦直响。他朝前门走去，按响了门铃。没有人来应门。日瓦戈又按了一次，但里头还是没有回应，他焦急地又等了一会儿。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日瓦戈的手还在按着门铃。突如其来的见面让两个人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冬妮娅将门更往两边推开，看着就跟欢迎甚至拥抱的姿势一样，两个人才回过神

来，快步冲向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抱了一会儿，两个人又同时开口说话。

“所有人都还好吗？”

“都好，都好，你不要担心。一切都很好。给你写的信上我写了很多傻话，请你原谅我。这些我们待会儿再谈。不过，你为什么不提前给我发封电报呢？不然马克尔也可以过去帮你提点东西呀。我想，艾格罗夫娜要是不让你进来，你肯定会急死的！她去乡下了。”

“你瘦了。不过看着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等等，我先付钱给车夫。”

“艾格罗夫娜去取面粉了。其他的下人全都走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叫纽莎的姑娘在照顾萨沙，当然你不认识她。戈登、杜多罗夫他们知道你要回

来，都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见面。”

“萨沙还好吗？”

“感谢上帝，他很好。萨沙刚刚醒来。如果你不是这样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去看他。”

“父亲在家吗？”

“难道没有人写信告诉你吗？父亲一天到晚都待在自治市议会，现在他是主席。是的，你没听错，父亲当了议会主席！车夫的钱给了吗？——马克尔！马克尔！”

日瓦戈和冬妮娅站在马路中央，行李箱挡住了一半的去路，以至于过路的人都停下来打量他们，等着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这时，马克尔从大门口迎了出来，他穿一件棉布汗衫，外头套着个马甲，手里抓着门房常戴的那种帽子，边跑边叫：

“天啊，真是您回来了，尤诺奇卡！我们可都是盼星星盼月亮地在盼着您回来呀，您没忘了我们吧？您总算回家了！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马克尔兴奋万分地嚷着“——去去去，你们看什么热闹！”

“马克尔，你还好吗？来，过来抱一下。把你的帽子戴上，你个怪人。对了，最近有什么新闻？你的妻子怎么样？女儿们还好吗？”

“她们还能怎样呢？感谢上帝，日渐日地大了。至于新闻，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您在前线忙着打仗，我们在家也没有闲着哟。战争留下的烂摊子，那些个魔鬼可不会帮我们解决！街道上一片狼

藉，屋顶急需修理，房子没有上漆，肚子也是空空如也。这所谓的真正的和平——用其他人的话说，就是战争的烂摊子，没有一点补偿。”

“你这么说，小心我去告发你，马克尔。他总是那样，尤诺奇卡。我受不了这种愚蠢。他那样说话，只是因为他以为你会喜欢这样，马克尔狡猾得很呢。好了，马克尔，你不要争辩，我了解你。你城府很深，马克尔。以前你就有点小聪明。不管怎么说，你知道我们是哪种人。”

接着，几个人拥着进了屋。马克尔把日瓦戈医生的行李都搬了进去，关了前门，像煞有介事地说：

“安东尼娜生气了，您听见她说的话了。她总是那样。她说，马克尔，你从里到外都是黑的；马克尔，你就跟那黑烟囱一样。现如今，她又说，所

有孩子，甚至所有西班牙猎犬或者任何一只狗都分得清什么是什么。当然，她说得没错，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尤诺奇卡，不管您信不信，《共济会预言》那本书在石头底下埋藏了一百四十年，现如今我可以信手拈来里面的东西。尤诺奇卡，我们这些人的命不值钱。可我能说什么吗？您要照顾好自己，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讨厌我，她想让我离开。”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够了，马克尔，把东西放下，就这样，谢谢你。尤里·安德雷维奇先生要是需要什么，他会叫你的。”

2

“我们终于摆脱他了！哦，这下好了，你要相信他说的话当然也可以，不过我要告诉你，那全是他自以为是的想法。你跟他说话，会觉得他是个愚蠢的乡下人，但实际上他是深藏不露，一直憋着股劲儿——只不过他还不确定要把这股劲儿用在谁身上，那个家伙。”

“那有点牵强附会吧？我希望他只是说的醉话。”

“等他清醒的时候，我会再跟他谈谈。总之，我不想再谈他了。我现在担心的是，萨沙可能等不及你去看他就会睡着了。要不是听说火车上有伤寒症流行……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那怎么可能。我这一路上过来挺舒服的，一

点儿都不挤，跟打仗前一样。不过，我还是想先冲个凉，过会儿再仔细洗个澡。你要走哪边？我们不从客厅穿过去吗？”

“哦，我忘了，你肯定还不知道。父亲和我反复思量之后，决定把一楼的部分地方捐给农业协会。反正，咱们的地儿挺大，这样冬天还能节省一点暖屋子的柴火呢。楼上我们住着还是太大了，所以就把地方捐了出去。他们现在还没过来接收，不过图书馆资料、植物标本、种子等物品已经先搬了过来。我只希望不会引来耗子，毕竟，楼下堆着那么些谷物。不过他们保持得还是挺干净的。对了，现在我们不说‘房间’了，用‘居住空间’代替。来，这边走。你走得太慢了，都跟不上我的脚步。我们从后面的楼梯上。知道吗，跟着我，我带你走。”

“我很高兴你们捐了那些房间。我曾经待过的医院也是一所私人住宅，是别人捐出来的。里头有数不清的套房，地上铺的都是镶木地板。盆栽棕榈树总喜欢往外头钻，晚上从窗子里伸进来跟鬼影似的。一些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兵还曾被吓得尖叫——当然，他们的精神状态本身就有点不正常——所以，我们不得不把那些盆栽棕榈树移开。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有钱人以前的生活方式还真有一些不健康的地方，很多东西都太过了。太多的家具，太大的空间，太多的装饰，太多的套房。现在我们能减少一些房间，我很高兴。我们应该再多捐一点地儿出去。”

“那个包裹里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刺出来了，看着像是鸟喙。哦，原来是一只野鸭子！真可爱！你从哪儿弄来的？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现在这样一只野鸭子值不少钱呢。”

“火车上的一个人送给我的礼物。我待会儿再详细跟你说，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现在我要怎么做？把野鸭子带到厨房吗？”

“当然。我会让纽莎马上给它拔毛，清洗干净。他们说这个冬天的日子会很难熬，饥荒、寒冷什么的。”

“没错，到处的人都这么说。就刚刚，我透过火车车窗往外头望，心里想，这世间还有什么比宁静的家庭生活和稳定安心的工作更好的呢？其他的事情，不受我们的掌控。照这情形，确实会有许多人要挨饿受冻了。有些人想出去，他们说要往南边走，去高加索地区，或者更远的地方。我自己当然不会愿意那么做。一个成年男人应当和自己的祖国同甘苦，共命运。在这儿，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儿了。不过，你不一样。我希望你不需要受这些煎

熬。咳，要是我们没走几步又这样站着聊半个小时的天，恐怕我们永远也上不了楼啦。”

“等等。我忘了跟你说了。有件事儿要告诉你，这可是个大新闻。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回来了。”

“什么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

“就是科里亚舅舅。”

“冬妮娅！怎么可能！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他之前住在瑞士。之后一路辗转伦敦和芬兰，到了这儿。”

“冬妮娅！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见过他了吗？他在哪儿？我们现在能不能马上去见他？”

“别这么着急。科里亚舅舅现在跟人去了乡下。他答应后天回来。他变了许多。你可能会失望的。科里亚舅舅在彼得堡待了一段时间，现在变得共产主义化了。父亲整天跟他吵。不过，我们这样走一步停一步怎么行？来，快点走。所以，你也听到了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熬的消息——贫困，危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也是这么看的。不过，那又怎样呢？我们一定能熬过去的，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边走边看，反正也不止我们这样。”

“他们说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可能柴火、水以及电的供应会完全中断。到时候拿着钱也没用。总之，就不会再有物资的供应。我们怎么又停下了！过来这边。有人跟我说，安柏特有上好的铁炉子卖。挺小一个。可以烧旧报纸来做饭，我已经拿到

了地址。我们要在那些人离开之前，搞一个炉子来。”

“没错。我们的确要去买一个。好主意。不过，现在科里亚舅舅来了呀，想想，是科里亚舅舅。我没办法控制自己。”

“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我们要在二楼清出一个地方，大概两三间房留作客房，另外再给我们自己、父亲、萨沙和纽莎分别留出一间房，其他的房间就都捐出去。我们要设一个隔间，另外再装上门，相当于隔出一个公寓。我们要把那些铁炉子放在中间的房子里，烟管从窗子出去。我们洗衣服、做饭、娱乐都在一个房间里头。这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能源，谁知道我们熬不熬得过这个冬天呢。”

“我们当然能熬过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你的

主意很好，另外，我们还得办一场乔迁庆宴。到时候把那只野鸭子煮了，邀请科里亚舅舅过来。”

“棒极了。我再让戈登带几瓶酒来。反正他有办法从实验室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搞到酒。就这个房间，行吗？把行李箱放下，去把你的食盒拿过来。我们还可以邀请杜多罗夫和舒拉·史勒辛格一块儿过来参加乔迁宴。你不介意吧？还记得卫生间在哪儿吗？记得往身上洒点儿消毒水。我先过去看看萨沙，让纽莎下来，等我们好了我就叫你。”

3

对日瓦戈而言，莫斯科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小儿子。萨沙出生没多久，他就参军入伍了。所以，他对儿子几乎没什么了解。

临行前的一天，冬妮娅还在医院，日瓦戈去看她。他已经穿上了军装，马上就要离开莫斯科。日瓦戈是在给婴儿喂奶的时刻到医院的，结果护士没让他进去。

日瓦戈便在候诊室里等着。当时，从走道尽头的育婴室里传来十多个婴儿的哭声。几个护士连忙跑了出来，生怕新生儿着了凉。护士们给小婴儿穿上了厚厚的衣服，一手抱一个，抱到孩子的母亲身边。

“哇哇——”小婴儿们哭起来都是同一个声

调，不带一点情绪，仿佛完全是身体反应。不过，有一个哭声和其他的声音不一样。尽管那个小婴儿也是“哇哇”地哭，他也未必比其他婴儿哭得悲惨，但那哭声更为深沉，似乎带有某种刻意的愠怒的敌意。

尤里·安德雷维奇决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亚历山大，以纪念岳父。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那天听到的哭声与众不同的就是他儿子，也许是因为那哭声显示出了一种性格，而那恰恰预示了那个孩子未来的性格和个人命运。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他的孩子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包括名字——亚历山大。

日瓦戈想得没错。事实证明，那确实是萨沙的声音。那也是日瓦戈了解的关于儿子的第一件事。

再有，就是日瓦戈还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冬妮娅曾经给他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活

泼、好看、胖胖的小家伙，嘴巴弯得跟丘比特之箭一样。小家伙站在毛毯上，看上去有点罗圈腿，拳头上举，仿佛在跳舞。当时的萨沙还只有一岁，正在学步的时候；现在孩子已经两岁了，开始牙牙学语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拿起行李箱，放到窗户边的牌桌上，把行李一件件拿出来。他在心里回忆，这间房过去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可他想不起来了。冬妮娅肯定是换了些家具或墙纸或者其他装饰什么的。

其实，那间房过去是安娜·伊娃诺夫娜的储物间。以前，安娜会把一些烂桌子烂椅子和旧报纸什么的放到这里头。安娜把家谱也收在这间房里，夏天的时候，还会把一箱箱冬天的衣服搬到这里头。安娜还活着的时候，这间房里的杂物都堆到了天花板上，并且从不允许小孩子进去。只有在圣诞节或

复活节的时候，许多的小孩子来参加派对，整个二楼全会对他们开放，这间房才会开门。然后，小孩子们就在里头玩扮强盗游戏，他们躲在桌子底下，用软木塞涂黑脸，装成强盗的样子。

日瓦戈医生边整理行装边想着这些，然后他走下楼梯，去门厅拿柳条篮。

厨房里，纽莎蹲在炉子旁，拔了毛的野鸭子放在一张报纸上。日瓦戈拿着柳条篮走进去的时候，纽莎惊了一跳，她很害羞，脸红得跟苹果似的，慌忙拍掉围裙上的鸭毛。纽莎恭敬地跟日瓦戈打招呼，并提出帮他拿篮子。日瓦戈医生谢过她，说他自己拿就行，然后就上了楼。这时，冬妮娅也隔着几个房间在那头喊：“尤拉，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于是，日瓦戈走进房间，那是他和冬妮娅以前

学习的地方。婴儿床里的小男孩儿跟照片上一样好看，并且神似尤里·安德雷维奇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日瓦戈，两个人简直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

“这是爸爸，爸爸，好孩子，来跟爸爸挥挥手。”冬妮娅说道。她将婴儿床摇低了一点，好让日瓦戈亲吻孩子。

不用说，萨沙肯定会有一点害怕和抗拒，但他还是任由这个胡子拉碴的陌生男人抱起了自己。然后，他挺直身体，一只手紧紧扯着妈妈的裙子，另一只手生气地拍打日瓦戈的脸。过了一会儿，萨沙好似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慌忙往母亲怀里钻，不由得哭了出来。

“别哭，别哭。”冬妮娅责备道，“你可不能这样，萨沙。你这样让爸爸怎么想？他会觉得萨沙

是个坏孩子。来，亲爸爸一个。别哭了，傻孩子。”

“让他去吧，冬妮娅。”日瓦戈医生说，“别怪他，你也别生气。我知道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觉得这是个不好的预兆——可这是无稽之谈。孩子有这样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事，毕竟他从来都没见过我。明天兴许他就能好好看下我，到时候我们可就分不开了。”

不过，走出屋子的日瓦戈心情难免沮丧，心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接下去的几天，日瓦戈医生深刻体会到了自己的孤单。当然，他不怪任何人。这都是他自找的。

他的朋友们变得格外忧郁，乏味。所有人都变了，从外表到内心的想法，一切都跟过去不一样了。印象中那是多么鲜活有趣的一群人啊，肯定是他过去高看了他们。旧秩序让那些衣食无忧的人得以在牺牲他人的情况下活得精彩有趣，而那时候大多数人也都是痛苦地过活。在那种社会里，人太容易将特权阶级的愚蠢和懒惰当作所谓的个性。可一旦底层阶级站了起来，上层阶级失去了原本享有的那些特权，于是就迅速黯淡了下去。他们不想要独立的想法——显然，这些人中从来就没有人有过独立的意识！

现如今，尤里·安德雷维奇唯一感觉亲近的就是

他的妻子，他的父亲，两三个同事，以及另外几个还未沾染上浮夸习气的普通士兵。

日瓦戈返家几天之后，有野鸭子和伏特加的乔迁庆宴如期举行。不过在此之前，他就已经跟到席的人一一见过了面，所以那场晚宴并不算一场团圆宴。

在那种饥饿的年代，一只肥鸭子算得上难得的山珍海味，不过没了面包，这美味始终有点打折扣，甚至更加让人心里不得宁静。

戈登带来了一瓶酒，酒是用药瓶装着，上头塞着一个玻璃塞。安东尼娜舍不得放下酒瓶，不时地用水兑点酒喝。人们发现，有酒狂喝海喝的时候反倒不觉得什么，难的是一次喝一点一次喝一点，让人备受折磨。

不过最让人难过的是，这个派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揭露出了很多的东西。在那种特殊的时候，住在对面街上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大吃大喝的。那些人只能沉默地躺在黑暗中，忍受肚子的饥饿。商店已经完全空了，至于打猎喝酒这种事，莫斯科的人已经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事实证明，只有和周围人相近的生活，能和其他人的生活无缝连接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快乐若不能分享，便不成其为一种快乐。莫斯科城里再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有野鸭子和伏特加，所以日瓦戈医生家的野鸭子和伏特加甚至都不再称其为野鸭子和伏特加。这是最令人烦恼的。

宴席上的宾客也因此生出了许多的愁思。以前的戈登多愁善感，又不善于表达，那样其实也挺好的。戈登曾经是日瓦戈医生最好的朋友，念中学时

很多人都喜欢他。

可现在戈登的性格变了，让人难以接受。戈登扮演了一个乐天的人，他开玩笑，讲笑话，不时地大喊，“真有意思！”或者“多么有趣呀！”——以前你从来不会从他嘴里听到这些话，因为那时的戈登从不曾把生活当作一种娱乐。

杜多罗夫还未到的时候，戈登大讲杜多罗夫的婚姻，他以为这样能惹人发笑，而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些事。当然，尤里·安德雷维奇从来没有听过。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还不到一年就和妻子离婚了。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参军入伍就是一个错误。服役期间他老是开小差，还经常因为在街上忘记向上级军官敬

礼而被惩罚。所以，退役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多罗夫每次看到军官都会不自觉地举手敬礼，并且还老以为自己肩上还戴着肩章。

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杜多罗夫其他方面的行为也很古怪。听人说，有次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等船的时候，杜多罗夫结识了两名年轻女子。那两名女子是两姐妹，恰好跟杜多罗夫等的是同一条船。杜多罗夫似乎以为他面前站了许多的军人，或许也是因为在部队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总之他说自己爱上了年轻的妹妹，并且当场向那名女子求婚。

“有意思吧？”戈登有些得意地说。不过这时候杜多罗夫恰好走到门口，他的故事也就不得不中断。紧接着，杜多罗夫进了屋。

和戈登一样，杜多罗夫也跟过去不一样了。以

前的他鲁莽冲动，没什么脑子，现在却成了一名严肃的学者。以前上学时，他曾因为帮助政治犯逃跑而被学校开除，那时候他还去上过几所艺术学校，可最后却成了一名人文学科学生。由于战争的影响，他比其他同学晚毕业几年。现在的他通晓俄国历史和一般史。杜多罗夫甚至还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伊万国王时期的土地政策，另一本主要是对德圣茹斯特的研究。

派对上，杜多罗夫跟任何人说话都是一副温和的样子，他的声音略微嘶哑，好像是感冒了。双眼恍惚地盯着远方的某个定点，就跟那些正发表演讲的人一样。

快入夜时，舒拉·史勒辛格兴冲冲地来了，派对也变得更为嘈杂和欢乐。杜多罗夫曾是日瓦戈上学时候的好伙伴，但在好几次问问题的时候，他都是

称日瓦戈为“您”，而不是惯用的“你”。杜多罗夫问日瓦戈，是否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战争与世界》和《长笛》。

由于周围的声音太过嘈杂，杜多罗夫好几次都没听清日瓦戈医生的回答。于是，过了一会儿，他再次问道：“你读过《长笛》吗？”

“我已经回答你了，伊诺克提。你自己没听见，这不怪我。算了算了，我再说一次吧。我一直都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某种程度上说，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风格。或者说，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写诗的人物——一个反叛的年轻人，好像是《少年》里头的人物。多么有生气的一个人啊！并且他的叙述方式是一针见血，决不含蓄！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勇敢地做自己！”

当然，那晚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属科里亚舅舅。安东尼娜误以为他没在城里，实际上他是跟日瓦戈同一天回来的。科里亚和日瓦戈已经见过几次面，每次都相谈甚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阴沉的晚上，天上飘着毛毛细雨。尤里·安德雷维奇去科里亚舅舅住的旅馆里见他。当时，除了当地有名望的人介绍，旅馆其实已经不再接收旅客入住。不过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名气本就很大，在莫斯科也还有许多的老朋友。

旅馆看上去就像是被遗忘的精神病院——楼梯和过道上空空如也，里头狼藉一片。

透过屋里的大窗户，可以看到外头的广场。旅馆前头的广场看上去是那么荒凉，那么阴森，像是噩梦里的背景。

对尤里·安德雷维奇而言，这场会面是意义重大且刻骨铭心的。因为他要见的是自己童年时代的偶像，是他钦佩万分的老师。

白头发的科里亚舅舅看着还是很迷人，身上的外套剪裁合体，更显得英俊。与同年龄的人相比，科里亚舅舅显得年轻英俊许多。

诚然，岁月也在科里亚舅舅身上留下了痕迹，身形没有以前那么挺拔。但尤里·安德雷维奇从来没想过用这种标准来评判科里亚舅舅。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谈论政治时的云淡风轻让日瓦戈医生感到十分惊讶。尼古拉伊比当时绝大多数的俄国人镇定自信。这让他显得跟周围人很不一样，也让人有点尴尬。

不过刚开始团聚的几个小时里，两人之间肯定

不止谈论政治。许久未见的激动让两个人又哭又笑，他们抱住彼此的脖子，热烈的谈话时而被激动的沉默打断。

尼古拉伊和日瓦戈医生的会面如同两个艺术家的会面，尽管他们是关系密切的亲戚。他们追忆共同的过去，同时也迫不及待地告诉对方分开的这些日子里各自的遭遇。当他们谈论对创造性思想真正重要的东西时，两人之间其他的关系似乎消失了。他们忘记了彼此的年龄和辈分，只剩下一种原始力量、精力和原则的对抗。

在过去的十年里，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没有机会如此酣畅自由地谈论创造性写作的困难。尤里·安德雷维奇也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刻睿智，引人深思的观点了。

惊叹充斥在两个人的谈话之中，聊到激动处，

他们会兴奋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惊讶于对方敏锐的洞察力；或者沉默地站在窗子边轻拍窗台玻璃，感动于彼此之间的完全理解。

日瓦戈医生和尼古拉伊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情况。之后日瓦戈又同舅舅见过几次面，可他感觉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却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了，变得他都不认识了。

他觉得尼古拉伊只是一个莫斯科的过客，并且他也尽力在扮演这种角色。不管是他称作家乡的彼得堡，还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对他而言似乎都只是一个经过的地方而已。他享受做一个社会明星和政治人物，也许在他的想象中，大会前夜的莫斯科一定会有巴黎罗兰夫人——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式的政治沙龙。

尼古拉伊召集他的女性朋友到莫斯科后街的公

寓里头，温和地打趣她们和她们丈夫的落后与狭隘。他卖弄自己从报纸上读来的那些东西，就跟他之前卖弄教会禁止的书籍一样。

听说，尼古拉伊放下了自己的年轻爱人，未完成的生意以及一本在瑞士写到一半的书来到莫斯科，就是想亲身感受这场革命的暴风雨，如果他能幸运活下来的话，接着他就会回到他的阿尔卑斯山去。

尼古拉伊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他经常提及两个和他意见一致的左派社会革命者，一个是用米罗沙卡·帕默尔这个名字做笔名的记者，还有一个是塞尔维亚·科特利，他出版了许多的时事小册子。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你说的这些东西让人害怕。”日瓦戈医生不无责备道，“你和你的米罗沙卡，干吗来蹚这一浑水呢？还有那个莉迪亚·帕

克里。”

“是科特利。”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纠正道，“是塞尔维亚·科特利。”

“什么帕克里或帕特波利，谁在乎呢？一个名字而已，又不会改变什么。”

“的确都一样，只不过恰好取了科特利这个名字而已。”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不耐烦地坚持道。接着，就有了下面的这番对话：

“我们这是在争什么呢？如果还得费劲去证明这个，那也太让人脸红了。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几百年来，人们连最艰难的生活都熬过来了。随便你拿哪本历史书来看，不管是怎么叫的——封建主义、农奴制、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这些都不是自然的产物，也并不公平。这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

事实，现在世界已经准备好迎接俄国的革命，这场革命将给俄国的人民带来新生的曙光，让一切恢复正常。

“你很清楚，说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必须得寻求事物的本质。我并不是说，最后现有的社会制度一定会分崩离析，但那又怎么样呢？尽管过程让人不安，但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这不过是时间问题，早晚的事，你如何能反驳呢？”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要说的也不是这个。”日瓦戈医生怒道，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许多，“你崇拜的那个帕特波利和米罗沙卡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反正，我不明白你的逻辑是什么？这完全就是说不通的事儿。对了，我让你看样东西。”说着，日瓦戈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出几份报纸，激动地指着

上头几篇争议颇大的报道。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的时候做点动作来缓冲，譬如翻抽屉找报纸之类的，这样一来他就有借口引入他想要说的那些事了。在寻找某样丢失的东西时，日瓦戈医生会变得特别健谈——比如说在灯光昏暗的衣帽间找一只雪地靴子，或者站在浴室门口找毛巾，而毛巾就搭在他的手臂上，或在他递一个很重的餐盘，或给朋友倒酒的时候。

尤里·安德雷维奇喜欢听他的岳父说话，他喜欢岳父那种老式的莫斯科口音，尤其喜欢“r”的发音。

亚历山大·亚力山德罗维奇的上嘴唇连同一撇弯曲的胡子往上突，领带也跟着拱起来。嘴唇和领带之间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这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被他打动，让人信任他。

开派对的那天晚上，舒拉·史勒辛格来得很晚。她是刚参加完另一个聚会直接赶过来的，所以身上还穿着套装，头上戴一个工人帽。舒拉风风火火地闯进房间，轮流跟每一个人握手，突然就开始抱怨和控诉起来。

“冬妮娅，你怎么样？哦，亚历山大，你好。你得承认，你这个人真不厚道。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他回来了，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而我竟然是最后一个被告知的。好吧，我想可能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先不说这些了，他在哪儿？让我看一眼他，你们这些人跟堵墙似的把人都围住了。哦，你好吗？我读过你的书了，可我一个字都没看明白，不过我知道那是一本好书。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你好吗？尤诺奇卡，我马上就回来，我得好好跟你谈谈。你们好吗，年轻人们？哦，格戈奇卡（这是格罗梅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热烈崇拜所有的社会

风云人物），你也在这儿。所以你们已经开始吃了？好吧，等我待会儿过来赶上你们。哦，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见到。要是你们知道现在正发生着什么就好了！你们去看看真正的民众集会，工人和士兵们聚集在一起。你们试试跟他们说一个关于打仗关于胜利的字，他们一定会带来胜利的。我刚听了一个水兵的演讲——尤诺奇卡，要是让你听了，恐怕你只会骂人！哦，那真是太有激情了！完全是一心一意！”

舒拉的话一次次被打断，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呼喊。她坐到尤里·安德雷维奇身旁，拉起他的手，把自己的脸贴向尤里的脸，在满场喧嚣的背景之下在尤里耳旁大声说话，就跟戴了扩音器似的。

“尤诺奇卡，有一天让我带你走吧。我会让你

看到真正的人民。你只需要，你只需要跟安泰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一样抬起脚而已。为什么你要这样看着我？现在的我是一匹老战马，你不知道吗？我是左派。我曾被抓到监狱去过，我不顾一切地战斗。哦，不知道你现在会怎么想？我们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人民。我刚从他们中间来，刚刚我就身处他们中间。我正在为募捐一座图书馆给他们的事四处奔走。”

舒拉喝了一点酒，显然已经有点醉意。不过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头也是晕乎乎的。他不知道舒拉是怎么到了另一个房间，而他自己则站到了一张桌子上，出人意料地想要做演讲。好一会儿，他才让周围的人安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米沙！格戈奇卡！冬妮娅，我该怎么办，他们不听我的！女士

们，先生们，且听我说几句话。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正在酝酿，在我们被风暴波及之前，这是我对你们的祝愿——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失去彼此，不要失去我们的灵魂。格戈奇卡，你等会儿再欢呼，我还没说完。你别再说话了，找一个角落，认真听我说。

“战争已经到了第三年，人们已经相信前线和后方迟早有一天会是一样。我们所有人都会身陷血的海洋，那些想躲避战争的人更容易深陷。革命就是一场洪水，将会席卷一切。

“革命期间，跟我们当时在前线一样，你们一开始会以为生活就此戛然而止，再没有私人生活，这个世界只剩下杀戮和死亡。如果我们某天还能活着看到关于这段时期的编年史和回忆录，我们一定会意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

其他人一个世纪也未必经历的事。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奋然起身并主动投身革命，或者说一切都只不过是打着人民的旗号而已。这样重大的事件并不需要戏剧化的情节来证明它的存在。哪怕没有证据，我也会相信它的存在。对一个大事件寻根问底是很无聊的事，因为大事件发生的本身就没有具体的缘由。你会发现，纠结大事件的缘由就跟寻找一场家族争斗的源头一样——两个人互相扯头发，摔盘子，然后又绞尽脑汁想要弄明白是谁先动手的。但事实是，这一切找不到源头，就跟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宇宙的源头一样。这一切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它一直就存在着或者是从天而降的感觉。

“我也认为，自从有了这个世界，俄国就注定要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惊讶很长一段时间，但一旦醒来，我们会永远失去这一半的记忆。我们会忘记哪些事

发生在前哪些事发生在后，我们也不会再去寻找缘由。我们会被一种新的秩序包围，而那种秩序是那样熟悉，如同地平线上的森林或头顶的云团一样。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东西。”

日瓦戈医生还说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渐渐的，他的头脑也清醒了过来。跟之前一样，他不太能听得清人们说的是什么，回答也是云里雾里。他看得出大家喜欢他，但这并不能帮助他摆脱那压抑他许久的悲伤。于是，他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能给我这样热情的回应，我很高兴，不过我并不值得你们这样的欣赏。匆忙地给予爱并不是一件好事，哪怕慢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关系。”

闻言，在场的人均大笑鼓掌，认为这是日瓦戈医生故意为之的谦虚。日瓦戈不知道该如何逃脱这

场灾难，尽管他努力想要活得更好，活得更开心，但他知道未来并不受他掌控。

宾客们开始散场。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些许疲倦，他们打着哈欠，拉着下巴，看着就像一群马。

临走之前，他们掀开屋里的帘子，并推开了窗户。天近破晓，湿漉漉的天空上飘着脏乎乎的豆绿色的云朵。“看来我们在屋子里聊天的时候，外头已经下过一场暴雨了。”有人说。闻言，舒拉补充说，“我来的路上就刚好碰上下雨，不过我还是过来了。”

街上空荡荡黑漆漆的，只听得树叶的滴水声和被淋湿的乌鸦断断续续的啾啾声彼此应和。

这时，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好似有一把锄头拖过了天空。接着，一切归于静寂。然后，又

先后四次响起了雷声，好似那是秋天里成熟的土豆先后四次被人用铁锹从松软的土里刨了出来。

暴雷让房间里的烟雾和灰尘消散了一些。突然间，生命的元素变得清晰了，就跟电流、空气、水、对快乐的渴望、土地、天空一样，可以被看见，可以被理解。

道别的人们让街上喧闹了好一会儿。他们在屋子里头已经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而到了街上，他们仍是余劲未消。随着人群越走越远，说话的声音也渐渐小了，直至再也听不见。

“哦，好完了。”尤里·安德雷维奇说，“我们上床睡觉吧。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爱的只剩下你和父亲了。”

5

秋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转眼间九月份已接近尾声。不可避免的革命越来越近。冬天马上就要来临，一种骚动的气息悬浮在空气中，也让所有人津津乐道。

往常这时候人们都应该准备过冬，要储备食物和木材。但在那种物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候，物质变成了空洞的东西，营养和能量补给取代了食物和木材的地位。

城市里的人们跟面对未知的孩子一样无助——那种未知性让人们将各自已经形成的习惯抛到了一边，只剩下忧伤和孤寂。尽管这种未知性同样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的创造物。

到处的人们继续欺骗着自己，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人们依靠习惯的力量勉强生活，跌跌撞撞地前行。但日瓦戈医生看清了生活，他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出路的。他认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将被毁灭。前头只有无尽的苦难在等待，甚至是死亡。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死亡也就一天天拉近。

如果不是因为刻意用忙碌的生活来麻痹自己，日瓦戈医生很可能会被逼疯。妻子、孩子、挣钱、每天的例行公事——这些是他的救赎。

日瓦戈医生意识到，自己在未来这个恐怖的大机器面前不过是一个侏儒。他担忧未来，同时又对它充满爱意，并且内心深处还隐隐地为它骄傲。每一次看周围的树，头顶的云，走在街上的人，正在泥泞中龃龉前行的莫斯科，日瓦戈医生都感觉是最后一次——他已经做好了为大义献身的准备，可惜

面对现状却无能为力。

每当穿过俄国医学会药房附近的安柏特大街时，日瓦戈医生都喜欢望一眼天空，看看那些走在马路中间的人。

日瓦戈医生重操旧业，仍然在原来的医院工作。医院也没有改名字，还是叫圣十字医院，尽管圣十字医院协会已经解散。这么久以来，也没有人给医院取一个新的名字。

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分配到各个营地。在那些思想迟钝的温和派看来，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在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人看来，日瓦戈医生又不够革命。所以，他不属于任何一边，比温和派进步，又比革命派保守。

除了负责日常的工作之外，医院负责人还让日

瓦戈医生负责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所以，他的手上过了无数的调查问卷和统计表。死亡率、生病率、员工薪资、员工的政治进步程度以及参与选举的积极程度、燃料、食物、药物的短缺量，所有这些数据都得由日瓦戈医生进行核查和报告。

日瓦戈还是坐在以前靠窗的位置上，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大小形状不一的图表。日瓦戈医生将那些图表推到一边，有时候除了记录治疗工作外，他也会涂鸦些文字，比如“民众不再是自己，而成了未知世界的一部分”等。

金秋的明媚阳光时常给办公室的白色墙面涂抹一些温暖，不过圣母升天节之后，每天早上就开始打霜了，山雀和喜鹊也开始往日渐凋零的森林里钻。那段时间，天空显得特别高远。而在明净的大气层之上，一股来自北方的寒流正在酝酿之中。因

着天气的影响，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更清晰了。远处的声音伴着回响传来，让人听得分明；地平线显得分外开阔，似乎要让人看到几年以后的生活。幸好这些稀薄空气一天之中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不然人肯定会受不了。秋天的日子日渐其短，通常是在薄暮时分，空气的稀薄程度达到最高。

此刻，办公室里一片亮堂。秋天的落日光芒洒满整片空间，如同某种俄国苹果一样饱满多汁，晶莹剔透。

日瓦戈医生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思考一边在纸上写字。突然，几只平常都很安静的鸟儿从高高的窗户前飞过，在日瓦戈摇动的手上，在棱角分明的桌子上，在地板上，在墙上投下一片黑影，之后又同样悄悄地消失在视线里。

这时，医院的解剖医师走进办公室。以前这位

解剖医师身材很胖，但现在瘦了许多，皮都耷拉在身上。

“枫叶的叶子都快掉光了。”他说，“之前你还在感叹那柔弱的枫叶怎样坚强地经受住了风雨的摧残，现如今一场早霜就让它们全数凋零。”

闻言，日瓦戈医生抬起头。原来，刚刚那神秘飞过窗前的“鸟儿”实际上是酒红色的枫叶。树叶从枝头飘然而落，落在医院的绿色草地上，看着就像橘色的星星。

“窗户纸还没贴上吗？”解剖师问道。

“没有。”尤里·安德雷维奇回了一句，又继续写自己的东西。

“现在不是该贴了吗？”

沉浸在工作中的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回答。

“塔拉斯卡走了，真是遗憾呀。”解剖师又说，“他能做许多许多的事，给靴子打补丁呀或缝衣服呀，反正什么都能做。并且，不管你想要什么，他一定能有法子帮你弄到。现在他走了，我们就只能自己来贴窗子了。”

“现在没有油灰。”

“你可以做一些呀，我教你方法。”说着，解剖师就给日瓦戈讲了如何用亚麻籽油和粉笔做油灰，“行吧，我先不打扰你了，我想你还有事在忙。”

说着，解剖师就走到另一个窗子边，开始忙活装在瓶子里的一些标本。“你这样会伤眼睛的。”过了一会儿，解剖师又说，“现在天都快黑

了。反正办公室里也没有灯，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我再忙二十分钟左右。”

“他的妻子是这儿的一名护士。”

“谁的妻子？”

“塔拉斯卡的妻子。”

“我知道。”

“但没有人知道塔拉斯卡去哪儿了。他全国各地到处走，去年夏天他来看过两次妻子，现在好像是在某个村庄里。听说，塔拉斯卡想过新的生活。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士兵，现在你走到街上，上到火车，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说到塔拉斯卡，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好像就没有他做不

成的事。不管做什么，他总要做到最好。在军队里也是一样，他拼命学习搏击和射击技能，最终成为了一名神枪手。他的枪法和手上功夫都是一等一的好！塔拉斯卡家里有很多的奖章，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为了表彰勇气，而是因为他总是能完成任务。不管做任何事，他都会带着充沛的激情去做，所以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明白一把火枪能为一个人带来什么——那带给他力量，让他与众不同。塔拉斯卡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一种力量。军人跟其他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以前，也有过军人变成土匪的事发生。你试试夺走塔拉斯卡的枪，看他会怎么样啰！后来，就有了‘将刺刀对准主人’的标语，塔拉斯卡照做了。塔拉斯卡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你要听马克思主义，我还能跟你讲很多。”

“这是最真实的一种故事，直接取材于生活。你明白吗？”

解剖师继续弄自己的试管。

“你是如何跟那个炉子专家相处的？”过了一会儿，他问。

“你把他介绍过来，我真的很感激。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们会聊很久的黑格尔和克洛斯。”

“那是自然！他在海德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炉子怎么样？”

“情况不是很理想。”

“还是在冒烟？”

“从来没听过。”

“他修不好火炉烟囱。烟囱应该跟烟道连接。

他是让烟囱从窗子穿出去吗？”

“不是，烟囱是跟烟道连接的，但还是往外冒烟。”

“那就有可能是他没有找到正确的通风口。哎，要是塔拉斯卡在就好了！不过我想你最后肯定能搞定的。莫斯科也不是一两天就建成的。修理火炉可不像是弹钢琴，这是个技术活。你过冬的柴火准备好了吗？”

“我上哪儿去弄呀？”

“我介绍教堂的看门人给你。他可是偷木材的高手，砍几段篱笆，然后做成烧火木。不过你得跟他砍砍价。不，最好去搞点灭鼠药。”

说着，两个人走入衣帽间，穿上衣服后，一起走出门。

“为什么要灭鼠药呢？我们又没有臭虫的困扰。”

“跟那没关系，我现在说的是木头。我说的‘灭鼠药’是一个做木头生意的老女人。她买下了所有废弃的老房子，然后用那些木材来取暖。路上黑，你小心别摔着了。如是以前，我闭着眼睛都能带你走遍这个地方，就连哪儿有块石头我都一清二楚，因为我就出生在这附近。可自打他们树篱笆开始，我就很难找到路了，即便是在白天。这儿的一切好像都变得陌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些特别的地方也因此显露了出来。我想你肯定不知道，那边其实隐藏着几栋皇家住宅，里头还有圆形的花园桌和已经腐烂了一半的长椅。有一天我恰巧经过那样一个地方，是一个三岔路口附近的荒野，我遇见了一个拄着拐杖探路的老女人——她看上去像有一百岁了。‘你好呀，老人家！’我对她说，‘你

是在找钓鱼用的虫子吗？’ 当然，我这是跟她开玩笑，可老太太却当了真。 ‘不是的，我不是在找虫子。’ 她说， ‘我找的是蘑菇。’ 没错，咱们的莫斯科城都快变成森林了。我已经能闻到腐烂叶子和蘑菇的味道。”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在塞雷布里安雷和莫尔察诺夫卡中间，对吗？我也常在那儿碰到古怪的事情，要么就是碰到一个有二十年没见的人，要么就会找到某样东西。他们都说那儿是个危险的地方，也难怪，那儿有许多的小径可以通向斯莫莱恩斯基附近的强盗窝。你还没反应过来在哪儿，他们就已经把你抢光光然后消失不见了。”

“你瞧那些路灯，根本就不亮。难怪大家都把路灯叫作‘受伤的发光物’。小心点儿，别磕着自己。”

6

日瓦戈医生确实在那个地方有许多奇遇。一个寒冷漆黑的晚上，也是十月暴动前不久，他偶然遇见一个昏倒在小路上的男人。那个人手臂前伸，头靠在一块路边石上，双足踩在臭水沟里。男人不时地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原来他受到了攻击，被人抢劫了。男人的头多处受伤，流了很多的血，不过大致检查之后可以确定头部没有大碍。

日瓦戈医生连忙赶到安柏特的要点，打电话叫了一辆医院用作救护车的马车来，然后将受伤的男人送到了急救室。

后来才知道，那个男人原来是一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日瓦戈医生一直治疗并且照顾他，直到这名领导人痊愈。后来的很多年里，领导人都是日瓦戈医生的保护伞，好几次帮他解决了大麻烦。

7

按照安东尼娜的计划，他们全家人最终选择在顶楼的三间房里过冬。

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周日，雪云让天空变得十分阴沉。日瓦戈医生那天刚好不用上班。

一大早日瓦戈一家就开始了生火，可火炉只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烟。纽莎本就被湿木头烧出来的浓烟呛得眼泪直流，而对火炉一无所知的安东尼娜还老是给她一些可笑的建议。日瓦戈医生当然知道安东尼娜的建议不可行，他试图阻止妻子，但安东尼娜却用手搭上他的肩，将他推出了房间，
说：“你别管这个。你只会火上浇油。”

“要是有油就好了，冬妮娅，那炉子一下子就能烧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油也没有火。”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也没这个心情。”

炉子生不起火的问题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原本，每个人都想在天黑之前做完自己的事情，这样晚上就能好好休息。可现在晚饭得推迟，家里又没有热水，其他的一些计划也就不得不因此搁浅。

木头冒出来的烟越来越多。一阵强风吹过，将烟雾全都吹进了屋子。强风刮起一股黑烟尘，好似鬼故事里魔鬼现身的样子。

最后，尤里·安德雷维奇把所有人都赶到另外两个房间去，然后打开窗户最上面的一块玻璃。接着，他又把炉子里的木头取了一半出来，并用碎木头和桦木架起剩下的湿木头。

一股清新凛冽的空气从打开的窗子里透进来。

窗帘被风吹得在飘飞，书桌上的纸也被吹到了地上。大厅里的一扇门被风吹得直响，大风还跟烟雾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圆木腾的一下烧了起来，咔嚓咔嚓直响。炉子终于点着了。炉子的铁皮满是红色的点，就跟痨病患者的皮肤一样。屋子里的烟渐渐淡去，很快就消散不见了。

屋子里忽的一下变得亮堂了。尤里·安德雷维奇按照解剖师教给他的方法修理了窗子，所以屋子里有一股温暖的油灰味道。炉子边还堆着一堆待干的木材，其中枞树枝的气息十分凛冽，而山杨木的味道闻着有点厕所的味道。

这时，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突然闯了进来，就跟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一样，让人措手不及。

“他们在街上打起来了。”尼古拉伊大声嚷道，“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部队打了起来。现在全城都是小规模的战斗。我还是好不容易才来到这儿的，两次险些丧了命——一次在博尔沙街角，还有一次在过尼凯特斯基大门的时候。现在你可不能直接从城中穿过去，你得绕道走。快点儿，尤拉！穿上你的衣服，我们走。你一定得去亲眼瞧瞧，这是会改变未来的历史大事件呀。一生只有一次的大事。”

不过话是这么说，尼古拉伊还是在日瓦戈医生家待了好几个小时。他在日瓦戈家吃了晚饭，到快走的时候，硬是要把日瓦戈医生拽出去。而就在这时，戈登也跟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一样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带来了一样的消息。

不过几个小时过去，事情的态势有所改变。戈

登讲了很多新的细节，他说现在双方火力都在加大，还有路人被流弹射死。据他讲，现如今交通已经瘫痪，哪条路都不能走。他能穿过来实在是一个奇迹，现在路已经被切断。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不愿相信戈登的话，慌忙冲了出去，可没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说，外头子弹横飞，连屋角的砖石都被打了下来。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所有路都被封了。可就在那个星期，萨沙又着了凉生病了。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不能让他在火炉旁边玩。”尤里·安德雷维奇责备道，“你让他突然间受热比受寒冷更糟糕。”

萨沙觉得喉咙痛，还发了烧，并且他特别害怕呕吐。当尤里·安德雷维奇想检查他的喉咙时，他使劲推开父亲的手，咬紧牙齿，不住叫喊，咳嗽。跟

他讲道理和恐吓都对他不起作用。不过，过了一会儿，萨沙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日瓦戈医生连忙趁这个机会将一根调羹塞进儿子的嘴巴里，并卡住儿子的舌头。他发现萨沙的喉头已经泛红，扁桃体也肿了，上头还起了许多白点。

过了一会儿，日瓦戈医生用同样的办法从萨沙的喉咙里取了一个病体样本，因为他家里有显微镜，所以能对其进行检查。幸好，萨沙得的不是白喉症。

可生病后的第三个晚上，萨沙突然一阵紧张的抽搐。他的体温迅速升高，并且无法呼吸。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办法减轻儿子的痛苦，让他更不能承受的是眼睁睁看着儿子受苦自己却无能为力。安东尼娜觉得儿子就要死了。他们轮流抱着萨沙在房间里走，因为这似乎能让萨沙舒服一点。

萨沙需要牛奶、矿物质水或苏打水，可街上仍是战火纷飞的景象，枪炮声不绝于耳。就算尤里·安德雷维奇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战区，他也没办法在附近的街上找到可以给他这些东西的人。除非对抗结束，不然城市里的所有人都没办法正常生活。

不过，对抗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不断有流言传来，说工人军占据了上风。现在只剩下小部分政府军还在坚持，不过政府军内部的沟通已经被切断。

士兵占领了赛夫特塞夫广场，并不断朝莫斯科中心逼近。那些曾跟德军浴血奋战的士兵和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小伙子坐在街上的战壕里，他们开始跟住在附近的人套近乎，每当有老百姓过去他们还会跟对方开玩笑。这一地区的交通渐渐得到了恢复。

三天之后，被困在日瓦戈医生家的戈登和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终于得以解放。日瓦戈其实很高兴萨沙生病期间能有这两个朋友在，冬妮娅也原谅了他们在家里造成的混乱。不过，戈登和尼古拉伊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报答日瓦戈一家对他们的照顾，因为日瓦戈一直陪着他们闲聊。而连续三天的闲聊也让尤里·安德雷维奇筋疲力尽，所以戈登和尼古拉伊的离开也让他很高兴。

8

日瓦戈医生收到了客人们都安全到家的消息。不过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有几条街道仍然是封锁的状态，所以日瓦戈医生还是不能去医院上班。一想到医院未完成的工作和放在办公桌里的手稿，日瓦戈就坐立不安。

人们只有在清晨才会从家里出来，在家附近的地方买一点面包。若是看到有人拿着牛奶瓶经过，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围上去，问那个人是从哪儿弄来的牛奶。

莫斯科城仍时不时地会响起枪声，街上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空荡荡的。据说交火双方正在谈判，而交火的激烈程度就能反映出谈判的结果是好是坏。

十月底的一天，大概晚上十点钟，尤里·安德雷

维奇想到一个同事家坐坐。而从他家到同事家需要穿过一条人烟稀少的街道，日瓦戈医生走得很快。那天刚好落下了冬天的第一场小雪，雪花被风吹得纷纷扬扬。

一路上，日瓦戈医生转了很多的小道，以至于他自己都数不清。雪越下越大，风也越刮越猛，暴风雪很快就给田野铺上了一块白毯，而铺在城市上方的白毯则因着建筑物的高低不平而起伏不定，好像是在城市里迷了路。

心灵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混乱其实有一些共同点，只不过是程度的区别罢了。最后一波枪声在城市里四处回响，死亡枪声激起的气泡在地平线升了又破，破了又升。而雪花在尤里的脚边、在湿漉漉的街道和人行道上旋转，消融。

一个卖报纸的小男孩儿腋下夹着厚厚一捆最新

出版的报纸，边跑边叫“卖报啦，卖报啦，最新的报纸啊！”日瓦戈医生刚好在一个十字路口和卖报的小男孩儿迎面而遇。

“给我一份报纸，不用找了。”日瓦戈医生要了一份报纸。小男孩儿抽出一张被雪水沾湿的报纸放进日瓦戈医生手中，转身走开，很快便消失在风雪里。

日瓦戈医生走到一个路灯下，他停下脚步，扫了一眼新闻的标题。新闻上说，彼得堡政府公开宣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俄国正式确立苏维埃政权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除此之外，报纸上还刊登了新政府的开国宣言和几则相关的电报电讯。

暴风雪拍打着日瓦戈医生的眼睛，不一会儿，报纸上就落满了纷扬的雪花。不过日瓦戈医生没有继续看下去并不是因为暴风雪，而是因为他被这个

伟大的时刻深深地感动了，他需要时间来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

日瓦戈医生想找一个能躲避风雪并且有亮光的地方，再仔细翻看一下报纸上的新闻。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又到了那个充满魔力的地方，也就是塞雷布里安雷和莫尔察诺夫卡的交界处，后头有一栋带玻璃门和敞亮大厅的的五层高楼。

日瓦戈医生走进大楼，在楼梯边找了一个有亮光的位置，读起报来。

头顶有脚步声传来，日瓦戈医生听到有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但那个人不时地停下脚步，似乎在犹豫要不要下来。一瞬间，那个人似乎改变了主意，奔跑起来。随着某处的门打开，从上面传来了两个声音——受回音的影响，日瓦戈医生也分辨不

出那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接着，就听见门砰的一声响，那个人飞快跑下楼梯，并且这一次的脚步更加坚决。

尤里·安德雷维奇看报纸看得专注，所以也没想抬头去看，可当那个陌生人突然在楼梯口停下脚步时，他不由得抬起了头。

只见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站在他面前，年轻人头戴鹿皮帽，身穿鹿皮大衣，好似在西伯利亚过冬似的。年轻人皮肤黝黑，有一双吉尔吉斯人特有的小眼睛。他的脸流露出一种贵族气质，但又明显给人一种躲躲闪闪的感觉，难以捉摸。

年轻人显然是把尤里·安德雷维奇误认成了其他的人。他看着日瓦戈医生，迷惑又羞涩，好似他认识日瓦戈医生，但又不知道该开口说什么。为了不让他误会，尤里·安德雷维奇故意冷冷地看了年轻人

一眼。

年轻人不解地移开了视线，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才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玻璃门。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雷维奇也跟着离开了。新闻报道充斥着日瓦戈医生的脑海，他把年轻人和本打算去拜访的同事都给抛到了脑后，这会儿便打算直接回家。可走到半路上，他又被一件平常小事吸引了注意力。

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日瓦戈医生被路边的一堆木头绊了一下。特殊时期，一个类似于指挥机构的地方就设在路边的房屋上，日瓦戈想政府很可能是把城郊倒塌房子里抽出来的木料拉过来给这些人取暖。木料一部分拖到了院子里，一部分留在外面。一个身背火枪的卫兵就守着这堆木料，他在院

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有时也会走到街上来看看。

有那么一下，刚好卫兵转过头并且风扬起一阵雪花挡住了灯光，尤里·安德雷维奇当机立断，他蹑手蹑脚地从木料堆底下抽出了一根大木梁。日瓦戈医生艰难地将木梁放到背上，靠着墙根走，最终安全地把木头背回了家。

这根木料算得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因为日瓦戈医生家里的木头正好快用光了。木梁被劈开，堆成一个小堆。尤里·安德雷维奇烧起炉子，沉默地蹲在炉子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把手扶椅搬了过去，坐在炉子旁烤火。

尤里·安德雷维奇从大衣的内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亚历山大。

“看看这个。”

说完，尤里依然蹲在炉子前面侍弄着炉火，自言自语。

“这手术做得多漂亮呀！你拿出一把匕首，灵巧地一刺，就把所有作疼的腐烂物给剜了出来。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你制服了那作威作福了几百年的怪兽，并将其置于死地。

“这种无畏的态度，这种看穿事物本质的方法，其实并不陌生，并且在俄国很是普遍，它跟普希金的‘不妥协’理想有所相似，也跟托尔斯泰‘实事求是’的态度相近。”

“你说普希金？等等，你先让我看完这一段。我没办法一边听你说话，一边看报纸。”亚历山大误以为他的女婿日瓦戈医生是在跟他说话。

“真正天才的是这个。无论你让谁接受创造一

个新世界，开启一个新时代的任务，他首先都会让你把旧有的一切打扫干净。他会等待几百年，等一切都清理干净，再开始创造新的世界，谱写新的篇章。

“可现在，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直接跳过这一步。这次的新事物、这次对历史的颠覆，是直接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根本没有考虑日后的发展路途。它跳过了开头，直接从中间起步，也没有任何的时间表。革命就在工作日的第一天开始，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候开始。这真是太天才了。只有‘真正的伟大’才会这样忽略时机。”

9

冬天如约而至，并且完全应验了之前的猜测。跟接下来的两个冬天相比，这个冬天还没那么恐怖，尽管它同样充斥着黑暗、饥饿和寒冷。之前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生活似乎被人强行从你手中夺去，你无法反抗。

三个艰难的冬天，一个接一个，不过这并不只是发生在1917年和1918年——在此之后也同样存在。这三个连续的让人受尽煎熬的冬天仿佛融成了一个，很难再把它们分离开来。

旧的生活和新的秩序没有接上，中间留出了一段。一年之后爆发了内战，此时旧生活和新秩序甚至都不是公开的敌对状态，但它们之间却断了联系。两种生活各自对立，无法调和。

选举遍布全俄国——行政机构，各种委员会，政府办公室，公共服务。地方权力交到了军队手上，意志坚强的人纷纷穿上了黑色的皮夹克，手拿钢枪惴惴不安地走上了自己的岗位，他们很少刮胡子，甚至很少睡觉。

他们能识出那些还残留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以及跟前政府有瓜葛的人，他们毫不怜悯地同那些人说话，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这些人完全按照计划来安排所有的事情，一个又一个公司，一个又一个组织走向了共产主义之路。

圣十字医院现在改名叫第二改革医院，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变了。医院的一部分职工被解雇，另一部分人也因为工资太低而主动辞职。其中就包括一些追逐最新潮流，油腔滑调的医生们。其实他们这

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却自我安慰这是为了反抗，以此凸显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日瓦戈医生没有离开医院。

一天晚上，日瓦戈医生和冬妮娅有这么一场对话：

“记得星期三要去医生公会一趟，咱们可以从那儿领两袋冻土豆来，到时候我告诉你具体时间。我们得一块儿乘雪橇去，不然弄不回来。”

“没问题，尤诺奇卡，我有的是时间。天色不早了，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呢？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一会儿，你一个人不可能做完所有事情的。”

“现在有传染病，大家又都这么累，抵抗力就更低了。你和父亲的情况都不太好，我们得想点办法。要是我能想出办法就好了。我们连照顾自己都

成问题。你真不睡觉吗？”

“现在不睡。”

“我不担心自己，我有九条命，可要是我万一生病了你肯定会很敏感，是吗？到时候你一定不能让我待在家里头，要立刻把我送到医院去。”

“不能说这种话。你一定会没事的，别乌鸦嘴。”

“记住，现在已经没有诚实的人了，也没有值得交的朋友，专家什么的就更加少了。如果发生什么事，除了皮楚扎金谁也不要相信。当然，那得在他还在这儿的时候。真不睡吗？”

“不。”

“薪水太少了，所以他们都走了，事实证明他

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和情绪。你在大街上碰到他们，甚至都很少握手，他们顶多抬一下眉毛：‘你为他们工作？’——‘是的。’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说我为我们的贫困而自豪，并且我尊敬那些把我们推到这一地步的人。’”

10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俄国人的餐桌上只有水煮的小米和青鱼头做的汤，青鱼的肉自然得做成第二道菜。另外还有一种用粗小麦或大麦做成的荞麦粥。

安东尼娜有一个当教授的女性朋友，她教会了安东尼娜用一种荷兰锅烤面包。安东尼娜想着可以拿一部分的面包去卖，换一点钱买个壁炉，把那个只冒烟不发热的铁炉子换掉。

安东尼娜的面包做得很好，但她却没挣着钱。所以，日瓦戈一家人还是得忍受可恶的铁炉子的折磨，煎熬不已。

一天早上，尤里·安德雷维奇去医院上班了，安东尼娜套上一件破烂的大衣——衣服已经破烂得不

成样子，哪怕是在稍微暖和一点的天气穿着它也会被冻得发抖——出门“打猎”。家里只剩下两根圆木了。冬妮娅在附近的大街小巷里穿了半个多小时，偶尔能见着一个来自莫斯科附近村庄的卖蔬菜和土豆的农民。卖菜的农民不敢去主道上卖，怕被抓走。又走了一会儿，安东尼娜找到了目标。那是一个身材强壮的年轻男人，拉着一个玩具似的雪橇，男人跟着安东尼娜小心翼翼地进了院子。

雪橇里头装的是一些桦树木头，小小薄薄的一根，就跟照片里十九世纪老式农村用的木头似的。安东尼娜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桦木，并且木头太新了，并不适合烧火取暖。但在那种时候，冬妮娅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也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年轻的农民抱了五六捆木材到客厅里，作为交换，他取走了冬妮娅带镜子的小梳妆台。他把梳妆

台搬到雪橇上，打算把这当作礼物送给他的新娘。冬妮娅还想着从他那儿买一些土豆，只是这个年轻人的要价相当于一架钢琴的价钱。

尤里·安德雷维奇回家后，对于妻子的交易什么也没说。其实，自己把梳妆台砍了当柴烧显然更划算一点，只是他们狠不下这个心。

“桌子上有你的一封信，看到了吗？”冬妮娅说。

“是医院送来的信吗？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说是有一个病人，需要我马上过去。我当然会去，只是需要先休息一会儿。那个病人的家离这儿挺远，在凯旋门附近，具体地址我已经知晓。”

“他们有提到报酬吗？你最好再确认一下。一瓶德国产的白兰地或者一双袜子都行！你知道那都

是些什么人吗？那是一群无耻的人。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有多难熬，我猜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吃香的喝辣的呢。”

“我知道，是一个供应商病了。”

供应商、特许权获得者、授权代理商——这些不过是政府给小商人安的名号而已。政府取缔了私人交易，只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偶尔授权给一些人进行商业活动，并对那些人的商品交易收费。

其实那些人以前未必是做生意的或者经营一家公司——以前做生意的人都还没缓过神来。这是一种新型商人，是由于战争和革命的原因才从底层社会上来的。

日瓦戈医生喝了一大口热水和掺了点牛奶的糖水，转身出门，朝病人的家走去。

大街上覆盖着厚厚的雪，有些地方的积雪甚至有窗子那么高了。街上偶尔可以见到几个沉默的鬼影一样的人，手上拿着点吃的东西或者用雪橇拖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的人。

旧商店的标志仍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已经跟新的供销社没有关系。商店里空空如也，大门紧锁，窗子也被封上了。

商店之所以大门紧锁，空无一物，并不是因为没有货物提供，而是因为上层改革措施在包括贸易在内的很多方面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并未实际践行。

11

日瓦戈医生走进一所位于布雷斯特大街街尾的房子。

那是一栋类似于碉堡的石头建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场院，三个木楼梯连接场院的两边。

当天，租住该楼的房客们刚好在进行一场会议，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市议会的女性代表参加。会议进行到一半，军队的人突然闯了进去要求检查武器许可证，并说没有许可证的武器全部没收。租户们不得不回到各自的公寓等待搜查，但主持会议的人让市议会的女性代表不要离开，并向她保证说搜查工作不会花费多长时间，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日瓦戈医生抵达的时候，搜查工作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不过他要去的那间房还没有接受搜查。日

瓦戈医生被一名拿着枪的士兵拦在露台上，后面是搜查队队长听见动静跑过来，并同意在日瓦戈医生给病人做完检查后再搜查。

房间主人给日瓦戈医生开了门，房主是一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年轻人的气色不好，眼睛里充满悲伤。一连串的麻烦事让他心力交瘁——妻子的病，马上要进行的搜查，还有他对医治和医生的畏惧。

为了节约时间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决定尽量简单地交待下情况。只是年轻人心里越急，说话就越是不连贯。

屋子里的陈列既有昂贵的家具，也有廉价的摆设，似乎是匆匆忙忙买下来用以应对通货膨胀的。其中有成套的家具，也有单独的物什。

年轻人认为妻子生病是因为受了精神打击。他

言语混乱地解释道，一切是因为他们最近买下的一个古董钟表。表已经坏了，可他们却以为那是某个钟表大师的代表作品，从而花了大价钱买了下来。说着，年轻人将日瓦戈医生带到隔壁房间，并把买的古董表给他看。现在，他们甚至怀疑坏了的表是否还能修好。一天，那只坏了好几年的表突然自己又开始走了，并且连续响了好几分钟的铃，之后就又停了。年轻人的妻子被吓坏了，认为那就是为她敲响的丧钟。现在，她的精神变得很不正常，不吃也不喝，并且连丈夫也不认识了。

“所以，你觉得这是受了精神打击？”尤里·安德雷维奇狐疑地问，“我现在可以去看看她吗？”

说着，年轻人带日瓦戈医生走到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陶瓷吊灯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床的两边分别放着红木床头柜。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蜷

缩在床的边缘，女人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她一直把毯子往上拉盖着下巴。看到日瓦戈医生和丈夫走进屋子，女人从被单下伸出一只手，冲他们招手，松垮的袖子直垂到腋窝。女人没有认出丈夫，好似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女人开始用低沉而悲哀的声音唱歌，唱着唱着，她开始哭泣，呻吟，好似一个找不到家的小孩儿。日瓦戈医生走到床边，女人连忙背过身，不让日瓦戈医生碰她。

“我该先对她进行检查。”日瓦戈医生说，“不过也没关系，很显然她是得了斑疹伤寒，并且病得不轻。可怜的人，她一定很难受。我的建议是，你最好把她送到医院。我知道在家里你可以给她需要的一切，不过患病的前几周最好还是去医院接受治疗和检查。你家里有车吗？当然，出门之前得多给她穿几件衣服。我会给你开一个住院的条子。”

“我尽量，不过您确定真的是斑疹伤寒吗？太可怕了！”

“恐怕是的。”

“听着，我知道要是让她去医院，我很可能会从此失去她——您能不能就在这儿帮我照顾她呢？您如果有时间就尽量过来，只要能治好我妻子的病，不管您要什么我都愿意给您。”

“不好意思，我已经跟你说了，她需要的是长期的医疗看护。照我说的办，我真的是为了你好。现在先去想办法弄一辆车来吧，我给你开个条子。我想最好还是到会议间去开条子吧，因为开住院条需要盖章，还有其他几道手续。”

12

房客们披着披肩穿着皮毛外套，一个个回到冰冷的地下室。地下室之前是一个批发鸡蛋的地方，现在被临时用来召开会议。

地下室里头放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由于椅子不够坐，大家便把之前装鸡蛋的筐子翻转过来，排成一排当长凳坐。房子另一边的鸡蛋筐都快堆到天花板了，角落里有一堆被打碎的鸡蛋，被解冻的蛋液缓缓滴落。耗子们在鸡蛋堆里穿梭，偶尔也会跑到地板中间来，又迅速返回。

每次有耗子跑出来，一个胖女人就会嚎叫着跳上一个鸡蛋箱，拉高裙摆跺着脚上时尚的高跟鞋，用粗重的声音大声叫喊道：

“奥莉娅，奥莉娅，你这个地方到处是老鼠。

走开，你这可恶的畜生。哦，看它，它听得懂我的话，它对我生气了。啊啊，它要爬上来了，它会跑到我的裙子底下，我好害怕！先生们，你们不要看我这边。哦，不好意思，我忘了现在该称你们同志，而不是先生。”

胖女人的羊羔披风披在肩上，盖住三层下巴，丰满的胸部和大肚子。她曾在一些小商贩中很受欢迎，可现在她已经胖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有个人曾试着对她说点尖酸刻薄的话，好让她安静一点，只是这根本伤不了胖女人。

“别叫了，克拉普吉纳，你这样我们怎么讨论？”议会代表说。女代表被选作会议主席，坐在办公桌后头。

女代表对这栋房子和其中的许多住户都十分了解。召开会议之前，她跟费提玛大妈有过一次私下

谈话。费提玛大妈是这栋房子的守门人，她曾跟丈夫和孩子们住在地下室，可现在她身边只剩下的一个女儿，不过，现在她已经带着女儿搬进了一楼的两间房子里。

“对了，费提玛，你的情况怎么样？”女代表问道。

费提玛抱怨说她没办法一个人料理这么大一栋房子和这么多住户，关键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帮她。因为住户们本是轮流打扫院子和过道的，可是他们却没有人做到。

“别着急，费提玛，我们会解决这个事的。不然，你以为我们这个委员会是干吗的？那些人已经没了希望。让罪恶得到庇护，让道德低下的人耀武扬威？不，我们会把他们开除，另外再选一些人出来。另外，我会让你做女管家，只要你不惹麻

烦。”

费提玛请求离开，但女代表不听她的。

女代表环视一周，认为在场的人足够多了，她要求大家肃静，并简单地发表了一下感言，宣布会议开始。女代表批评委员会的内部松散，并标明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选举出一个新的委员会，再进行其他事项。

最后，她说：“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子。坦白说，这是一栋很大的房子，用来开旅馆都没问题。现在有许多代表来城里参加会议，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安置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把这栋房子征用过来作为一个苏维埃旅馆，专门接待外面来的贵客。旅馆的名字就叫提沃兹恩旅馆，以此纪念提沃兹恩同志，我们大家都知道，先前就是提沃兹恩住在这儿的。有没有反对意见？那好，此项决议即

时生效。当然，你们也不用着急，有一整年的时间来找新的房子。我们会给工人重新安排住处，至于其他人，则必须自己找地方住了，期限是一年。”

“我们都是工人，我们所有人都是！”人群大叫起来，其中一个声音说：“现在是新俄国了，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们别一块儿喊，一个一个来，不然我先回答谁的问题？这跟民族平等有什么关系，瓦尔德金？看看克拉普吉纳，她的民族总没有问题吧。但我们还是得把她逐出委员会呀。”

“是吗？你们试试，你们试试把我逐出去，我会让你们好看！你们这些混账！”克拉普吉纳尖叫着，用想得起的最难听的话骂女代表。

“真是个女魔鬼！”守门人也愤慨起来，“你

就不懂一点廉耻吗？”

“费提玛，你就别蹚这浑水了，我能照顾好自己。”女代表说，“你给我住嘴，克拉普吉纳，我很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住嘴，我告诉你，不然我马上把你交到革命机关，让你以后再也喝不成酒。”

日瓦戈医生走进屋子时，正是里头最人声鼎沸的时候。他问站在门口的一个男人，谁是委员会成员。那个男人抬起手放到嘴边，用压过所有人的声音喊道：

“加利乌林娜！过来这边，有人找你。”

日瓦戈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见一个微驼的老妇人走了过来，和她的儿子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过，日瓦戈医生没有立刻表明

身份，而是说：“你们这儿有个病人染了斑疹伤寒。”并把病人的名字告诉了老妇人，“现在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疫症扩散。另外，病人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去。我将开一个住院单，而这需要你们房屋委员会确认通过。所以，我想知道，要怎么样做到这个？”

加利乌林娜老妇人以为日瓦戈医生是问“怎么把病人弄到医院去？”于是答道：“这儿刚好有一架来接德米纳同志的马车。德米纳是议会代表，人很好。放心，我会跟她说的，让那个病人坐她的车去医院。你别着急，医生同志，我们肯定能把她安然无恙送过去的。”

“很好。不过，我其实是想问到哪儿可以办完手续。不过要是这儿有辆马车的话……恕我冒昧，请问您是不是加利乌林上尉的母亲？我们曾在同一

个连队。”

加利乌林娜闻言惊讶不已，脸色刷的一下白了。她紧紧抓住日瓦戈医生的手，“到外面来，”她说，“我们去院子里谈。”

走到门外，加利乌林娜飞快地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你小点声说话。可别毁了我呀，尤苏普卡走上了一条错路，这个你自有判断。他是什么人？他只是一个学徒，一个工人。他必须要明白——现如今身家越简单越好——这一点瞎子都能看得出来，没有人能否认。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不好，但这却是尤苏普卡犯下的罪孽，上帝也不会原谅他的。尤苏普卡的父亲是一名二等兵，死在别人的枪下。有人说他的整个脸血肉模糊，手脚断成几截。”

说着，加利乌林娜的声音有些哽咽，她平复了

一下心情，继续说道：“过来，我给你把那辆车叫过来。我知道你是谁，他会在这儿待几天。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你认识拉拉·古伊沙尔。那是个好姑娘，我记得她，她曾到这儿看望我们。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现在谁还能说得准呢？毕竟，当家做主的人抱成一团也是很自然的事。可放在尤苏普卡身上，这却算是一种罪孽。来吧，我们去叫车。我敢保证，德米纳同志一定会同意的。你知道德米纳同志是谁吗？就是奥莉娅·德米纳，以前是个女裁缝，替拉拉的母亲干活。现如今她摇身一变，成了议会代表，她就是从这间房子里走出去的。来，跟我走。”

13

夜幕降临。黑暗包围了一切，只有德米纳的口袋手电筒发出一点亮光，照亮前方四五步路的范围。灯光随着人的走动而不断跳跃，在黑暗中更让人不知所措。黑暗包围着他们，他们将那栋拉拉熟悉的房子留在了身后，房子里的人全都认识拉拉——小时候，拉拉经常到这儿来。他们说，拉拉的丈夫安提波夫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没有手电筒，您看得清路吗，医生同志？”德米纳是一个喜欢让人领情的人，“要是看不清的话，我把我的手电筒借给您。您知道吗，小时候我很喜欢拉拉这个姑娘。当时她妈妈开了一个裁缝店，我就在她妈妈的裁缝店里做工。今年我还见过她一面呢，经过莫斯科的时候她有过短暂停留。我说，‘你要去哪里，傻瓜？就留在这儿。跟我们住一块儿。我们会给你找个工作。’但她没有

同意，执意要走。算了，这是她自己的事，让她自己决定好了。她嫁给帕沙只是出于头脑的判断，并非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自打跟帕沙结婚以来，她就疯了。之后她就走了。”

“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小心——地上滑。都不知道跟他们说了多少次了，不要把脏水脏油倒在门外，可这就是对牛弹琴。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说的‘觉得’是什么意思？我应当觉得什么？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就住在这儿。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她——她那个参军去了的弟弟，好似已经被人枪决。至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过去的老板——我会把她救出来的，这一点我可以担保。好了，我也该进去了，再见。”

之后，日瓦戈医生和德米纳道别。德米纳小电

筒的亮光射在狭窄的石头门处，然后往上游移，照亮脏兮兮的墙面和阶梯，与此同时日瓦戈医生却是在一片黑暗中离开的。日瓦戈的右手边是萨多瓦伊·凯旋门大街，左手边是萨多瓦伊·卡内特纳大街。再往前走，这两条大街就会被石头森林切断，就跟西伯利亚或乌拉尔地区那些无法通过的森林一样。

回到家，日瓦戈医生才感受到光明和温暖。

“你怎么这么晚？”安东尼娜问道，“你不在家的这会儿，发生了一件大事。”未等日瓦戈医生接腔，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是莫名其妙。昨天父亲不小心摔烂了一个闹钟——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这让他很难过，因为那是我们唯一剩下的钟了。他想把闹钟修好，一遍一遍地尝试，可还是徒劳无功。于是乎父亲把闹钟拿到街角的钟表匠那儿，可他要价要到天上去了——三磅面包。我不知

所措，父亲也是束手无策。然后，大概是一个小时之前，你能相信吗，屋子里竟然突然响起了一阵很尖锐很响亮的铃声，我们都被吓得魂都没了。竟然是闹钟发出的铃声！你能想象吗，闹钟竟然自己又好了。”

“看来我得斑疹伤寒的时候到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笑着说。然后，他便把女病人和那个古董挂钟的事告诉了冬妮娅。

14

不过，日瓦戈医生得斑疹伤寒却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在此期间，日瓦戈一家人经受了无比严峻的考验。家里什么都没了，一家人只能饿肚子。日瓦戈医生去找他曾经救过的那位共产党高官，就是那个先前被人抢劫的人。这名高官竭尽所能地帮日瓦戈医生，但内战才刚刚开始，所以他很少在莫斯科。另外，他觉得那种时候人们的肚子挨点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自己也经常饿肚子，只不过没让人知道而已。

尤里·安德雷维奇想跟布雷斯特大街的供应商联系上，问他要一点医疗费。可当时，那个年轻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被日瓦戈医生治好的年轻人妻子也是杳无音讯。日瓦戈医生过去瞧病的时候，加利乌林娜不在家，现如今大多数住户都是新面孔，德米纳也到前线去了。

一天，日瓦戈医生收到消息说他分到了一批木头，不过他得自己去维达瓦火车站去搬。日瓦戈沿着长长的麦石查斯卡伊大街往家走——眼睛不离装满木材的马车，这可谓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他注意到大街上的场景同以往不一样，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左摇右晃，脚也迈不动步子。日瓦戈医生知道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并且很可能是得了斑疹伤寒。没过一会儿，日瓦戈医生就栽倒在地，马车夫只好把他从地上拖起来并抛到木材堆上，送他回家。而日瓦戈医生一直都不知道他那天是怎样到家的。

15

日瓦戈医生一连病了两周。他梦见冬妮娅把那两条街搬上了他的书桌，萨多瓦伊·卡内特纳大街在左边，萨多瓦伊·凯旋门大街在右边，桌子上的灯也点亮了。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两条大街，因此，他也就能在灯下写字。日瓦戈医生在纸上奋笔疾书。

日瓦戈写下了他很久以前就应该写并且一直想写却没有写的东西。现在那些东西突然出现在脑海，他急切地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是，一个男孩儿不时地过来打扰。男孩儿有一双吉尔吉斯人的小眼睛，身穿一件没有扣扣子的鹿皮外套，里头的皮毛都翻了出来——这是乌拉尔地区或西伯利亚的穿衣传统。

日瓦戈医生确切地知道那个男孩儿就是他死后的灵魂，简单说，男孩儿代表的就是死亡。不过，

如果他能带给他写诗的灵感，如何还能算作死亡呢？死亡如何会这么有用？死亡怎么可能帮人？

日瓦戈的诗描写的对象既不是埋葬也不是复活，而是埋葬与复活之间的这段时日。他给这些诗取名为“混沌”。

他一直想要描述，连续三日的黑暗加愤怒，遍是蠕虫的大地如何攻击那没有死亡的爱的化身，石落如雨，犹如海边的滔天大浪，吞没一切——三天之内，那黑色的飓风吞噬大地，凶猛来袭，然后悄然退去。

日瓦戈突然想起两句话：

一句是——靠近你，我们很高兴。还有一句是——是时候醒来了。

靠近他，抚摸他，便是地狱，是消融，是腐

蚀，是死亡；同时，靠近他又是春天，是喜悦，是生活。是时候醒来了。是时候苏醒并起来了。是时候站起来，是时候复活了。

16

日瓦戈医生的病情日见好转。一开始，他就跟个弱智儿似的，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日瓦戈什么都记不起来，也看不出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的关系，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惊讶。妻子每天喂他吃白面包、黄油和甜茶，给他喝咖啡。日瓦戈忘了这些事并不存在，他喜欢这些味道，就跟他喜欢诗歌或童话一样，而这在康复期其实也是正常现象。不过，日瓦戈医生很快就恢复了神智，开始正常的思考。

“你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他问妻子。

“是格拉尼亚给我们弄来这些的。”

“什么格拉尼亚？”

“格拉尼亚·日瓦戈。”

“格拉尼亚·日瓦戈？”

“没错，就是你的弟弟艾夫格拉夫，在奥姆斯克的那个。你的堂弟。你生病的这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来。”

“他是不是穿一件鹿皮外套？”

“没错。这么说，你见过他。这段时间，你几乎一直是昏迷不醒的。他说曾在某间屋子的阶梯上撞见过你。他认识你，想跟你说话，不过你显然怕他怕得要死！他崇拜你，你写的每一个字他都拜读了一遍。这些东西全是他给我们搞来的！大米、葡萄干、白糖！现在，他回去了。他想让我们也到他那儿去。他是一个奇怪的小伙子，有点神秘。我想他肯定跟那边的政府有某种关联。他说我们得离开一两年时间，离开大城市，‘回归田园一段时间’，他是这么说的。我想起了克鲁格或许是个合

适的地方，他说这是个好主意。到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种蔬菜，并且那里四面八方都是森林。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等死，那不是跟牛羊这些畜生一样吗？”

那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带着全家人前往瓦利吉诺庄园。庄园离尤里安提镇很近，位于遥远的乌拉尔山区。

第七章　开往乌拉尔的火车

1

三月的最后几天，天气开始变得暖和。严寒之后，总会有一股暖流出现，让人误以为春天就要来了。

日瓦戈一家人急于收拾行装，离开莫斯科。为做掩饰，他们告诉房客——大街上的房客比麻雀还要多——公寓要进行大清扫，以迎接复活节。

尤里·安德雷维奇反对搬离。他觉得这只会是白忙活，所以没有参加任何准备工作，但家里其他人却对此热情高涨。且眼看一切就要准备妥当，日瓦戈觉得，是时候认真讨论下这件事了。

日瓦戈把妻子和岳父叫到一块儿，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并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你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吗？”发表完反对意见之后，日瓦戈这样问他们，“你们还是坚持要走吗？”

“你说，我们接下来的几年里确实得准备熬苦日子。”妻子说，“但只要土地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就有可能在莫斯科附近分得一块儿菜地，但我们如何能熬到那时候？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可你却没有说。”

“靠着那一点不确定的希望不是疯了吗？”冬妮娅的父亲也支持她的意见。

“好吧，你们赢了。”尤里·安德雷维奇说，“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一去是两眼一抹黑，去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曾在瓦利吉诺庄园住过，母亲和祖母已经过世，祖父克鲁

格哪怕还活着也是会被人抓起来当了人质。

“你们都知道的，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祖父做了一笔十分荒唐的交易。他以另一个人的名义——至于是银行还是个人，我不是很清楚——把他名下的森林土地和工厂以及其他一些财产都变卖了。你们知道，现在那个庄园的所属人是谁吗？我并不是说在意它是谁的财产，哪怕失去了那个庄园我也不在乎，但我想知道现在究竟是谁在掌管它？是谁在打理它？森林里的木材都砍下来了吗？工厂还在开工吗？最重要的是，现在那儿当权的是谁？或者说，等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当权的是谁？

“你们就想靠一个老管家米库力特辛来帮我们渡过难关，但谁能保证他一定还留在那儿？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呢？话说回来，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对他还有其他的了解吗？之所以记住了他的

名字，还是因为祖父发这个音的时候总显得十分吃力。

“不过，我们现在争论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也只能同意。当前最紧要的是弄清楚长途旅行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既然决定了就去做，再往后推也没有意义。”

2

尤里·安德雷维奇去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打听消息。

火车站里排了很多队伍，人群沿着连接两边木头栏杆的旋梯前行。石头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穿灰色军大衣的人，那些人咳嗽，吐痰，四处张望，并且说话的声音特别大，拱形的天花板下面回荡的都是他们的声音。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得了斑疹伤寒，情况稍一好转，便叫人从医院里赶了出来，因为医院实在是人满为患。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雷维奇自然明白这么做的必要性，不过他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可怜的人，也没想到这些人只能把火车站当成避难所。

“您得先预约。”一个穿白色围裙的工作人员

告诉日瓦戈医生，“然后，您得每天来问情况，看有没有火车。现在火车班次特别少，所以上不上得了车完全是靠运气。当然（说着，工作人员用大拇指揉了下食指和中指），要是能给点儿面粉或者其他东西……您知道的，火车没油就跑不起来，另外（他又轻轻拍了下自己的后背），没有一点伏特加的话，您也走不远的。”

3

就在那期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几次被高等经济委员会请去当参谋，尤里·安德雷维奇也治好了一个重病的政府高官。两个人也因此而得到了当时最好的报酬——几张能让他们从第一个新开的物资中心分得物品的票证。

物资中心原来是一个军营的仓库，距离西蒙诺夫修道院很近。日瓦戈医生和岳父穿过修道院和营地场院，过了一条低矮的石头门，进到一个拱顶的地窖里头。地窖有一点坡度，越往下越宽，一个大柜子横在地窖的两边。大柜子后面站着一个工作人员，负责称重计量，不疾不徐地按照票证份额分发物品。每发一样东西，工作人员就会用粗铅笔在票证上画掉一样，有时也会转到后头拿一些新的物品出来，补充供给。

来的顾客并不多。“容器。”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票证说。日瓦戈医生和岳父连忙递出几个大小不一的盆子，瞪大眼睛，看着工作人员往里面盛满面粉、谷物、通心粉、白糖、板油、肥皂、火柴还有一些用纸包着的高加索奶酪。

两个人被工作人员的慷慨折服了，他们没有耽搁一秒，只是急忙将这些东西放到包袱里，然后把包袱扛到肩上。

日瓦戈医生和岳父出了门，两个人都是神情恍惚。这不仅是因为从天而降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是有用的。他们没有白活，一想到回家之后迎接他们的将是冬妮娅的赞美和感谢，他们觉得自己当之无愧。

4

日瓦戈医生连续几天出入政府办公室，一是为了办理过关证件，二是为了注册房屋，这样等他们日后回到莫斯科也就还能住到自己的房子里头。而与此同时，冬妮娅则忙着整理家里的东西，收拾行装。

冬妮娅在三间已经正式归到日瓦戈家族名下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哪怕是最小的物件，她也得衡量多次，才决定是否要将它放到行李里带走。带的行李里头只有一小部分东西是为了个人使用，剩下的都是用作一路上的打点和头几周安家的费用。

春天的微风透过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新烤面包的香味。院子里有公鸡在打鸣，孩子们也在那儿玩耍。房间里的空气越流通，柜子里堆放的冬衣的霉味就越呛鼻。

至于说一个东西是选择带走还是留下，冬妮娅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这套理论是通过根据先前已经离开并跟留下来的朋友写信交流得出来的心得发展而来。此时此刻，这一理论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在冬妮娅脑海里格外清晰，她甚至还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声音正穿过屋外麻雀的叽喳声和孩子的吵闹声，一遍又一遍地将这一原则在她耳边重复。

“裙子应该带几件？”冬妮娅暗忖，“但他们会在中途检查行李，除非把裙子叠得跟衣服一样，不然会很危险。带材料、纤维织物、上衣这些比较好，尤其是外套。不要箱子，因为那儿不会有行李工。要保证带着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并且要打包得小一点，这样哪怕是女人或孩子也能提动。盐和烟的用场很大，但在路上的风险也不小。钱物要换成小面额的。过关文件是最不安全的东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5

临行前的一天，天降大雪。雪花漫天飞舞，掀起一阵白色的旋风，落在黑色的大地上，掩盖一切。

行李全都打点好了。屋子和留在里头的东西都交给了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他的妻子料理。老人是艾格罗夫娜的亲戚，先前是一名售货员，去年冬天曾帮助安东尼娜用一些旧衣服和家具换得土豆和木头。

马克尔是个让人无法信赖的人。以前他曾被选作军队俱乐部的负责人，当时他并没有说前主人剥削他，只是说主人让他变得无知，并且故意不告诉他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事实。

安东尼娜最后检查了一遍房子，钥匙——插进

孔中打开屋子里的抽屉和橱柜，然后又锁上，最后进行了一次盘点。

屋子里的桌椅都推到了墙边，窗帘也拉了下来，而角落里还有一堆包袱。窗外的暴风雪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冬天的残酷，也让他们忆起了过往的悲伤。尤里·安德雷维奇想起了他的童年和母亲的死，而安娜·伊娃诺夫娜则悄然浮上安东尼娜和父亲的心头。他们都感觉这或许是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留在这房子里过夜，从此以后或许再也不能回来。尽管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但他们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三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头，不愿彼此打扰，只是各自回忆这些年来在这所房子里渡过的时光，然后拼命挡着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

尽管如此，安东尼娜在陌生人面前还是尽量保持仪态。她不停地跟那个即将帮她打理屋子的老妇

人说话，说他们夫妇帮了她的大忙。未免给人留下不知感恩的印象，她不断说着好话，并走到隔壁房间给老太太拿了好几件礼物——衬衫、长棉布和丝绸。在这个离别的夜晚，带白格或波点图案的布料跟窗外被白雪覆盖的大街一样，默默注视着里面的一切。

6

破晓时分，日瓦戈医生带着家人出发。通常这个时间其他房客都还在睡觉，但有一个特别喜欢社交场合的人——赛沃洛特妮娜——则是一嗓子把所有人喊醒：“注意！注意！同志们！快起来！格罗梅科家的人要走了。快来跟他们道个别！”

于是，人们一股脑儿地拥到后廊——前门还上着锁，并围成一个半圆形，好似在拍照似的。大家打着哈欠，穿着破烂的大衣在风中瑟瑟发抖，匆忙套在光脚上的毡毛靴让他们有些站立不稳。

即便在那样物资缺乏的时日里，马克尔还是搞到了一些啤酒，并且成功地把自己灌醉了。瘦骨嶙峋的他站在那儿，好似一具挂在横梁上的尸体，看着随时都可能倒下。马克尔坚持要帮日瓦戈医生把行李扛到火车站，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时，他显得

很是恼火。日瓦戈他们最后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他的热情送行。

天光还未大亮，风已经小了些，不过雪却下得比前一天晚上更大。大片雪花纷扬地落下，覆在地上，好似犹豫着要不要消融。

几个人走到安柏特大街时，天色亮了一些。而大雪犹如一块舞台剧幕布，直接覆盖着街道。雪花幕布飞扬的角缠住过往行人的双腿，以至于人都失去前行的感觉，觉得自己停在原地。

街上除了旅人再无其他人影，不过没过多久，街上驶来了一辆落满雪的马车。车夫也是满身白雪，看着好似被面粉团里抹了一圈似的。日瓦戈医生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在那种高度通货膨胀的时代里，再多的钱也没有先前的一个戈比值钱，让马车夫将妻子和岳父送到了火车站，而他却选择

了独自步行过去。

7

日瓦戈医生发现安东尼娜和她的父亲排在一支队伍的后面，而队伍的前后都是木栏杆。纽莎和萨沙在队伍外头走动，偶尔回一下头以确定是否要跟大人们一起行动。孩子们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煤油味道，因为他们的脖子、手腕和脚踝处都涂了煤油，以防虱子的叮咬。

队伍往前移动，一直到站台的入口处，但乘客们实际上还得走上半英里才上得了车。由于清洁工人手不够，火车站污秽不堪；受垃圾和冰雪的影响，站台前方的轨道也不能用了，火车只能停在远处。

安东尼娜向丈夫招手，待日瓦戈走近，她大声告诉日瓦戈要到一个地方盖章才能通行。

“让我看看他们在上头写了什么。”日瓦戈医生回来后，安东尼娜对他说。于是，日瓦戈把一沓纸递过木栏。

“你这是特等车厢的印章。”站在安东尼娜后面的一个男人说。

站在前面的男人则更为直接。他似乎是那种特别注重细节的人，熟悉并且接受世界上所有的规章制度。

“这个印章，”他解释道，“能让你在特等车厢找到一个位置，也就是客车车厢——如果这列火车上有客车车厢的话。”

顿时，整列队伍都参与了进来。

“确实是客车车厢！这种时候哪怕你能在餐车找一个位置，都应该谢天谢地！”

“别听他们的。”另一个人说，“我来解释，这其实很简单。现如今只有一种火车，通常是由军队车厢、犯人车厢、牛羊车厢和客车车厢组成。为什么要误导人家呢？”说着，他转向人群，“空谈算不得数，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你们至少要把话说清楚，也好让人家听个明白清楚呀。”

“你们已经解释了许多。”男人继续吼道，“你们都说这个印章能让他上到特等车厢！跟人解释一件事之前，你们得先看看这个人。长这样一张脸的人能上到特等车厢吗？特等车厢里坐的都是些水兵。水兵目光敏锐，并且随身带枪。你看看他，他像什么？特权阶级？不，比那更差——他是医生。他抽出枪——那么就再见了。”

如若没有其他的事情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谁也不知道日瓦戈医生的事情会让人们的同情泛滥成

什么样子。

一度，人们透过轨道上巨大的玻璃窗好奇地往外看，玻璃窗带有穹顶，绵延数百码的距离。只有穹顶尽头的落雪才能看清，由于中间隔的距离太远，纷扬的雪花看起来好似静止了一样，如同面包屑穿过流水落在游鱼身上。

突然，只见一群三三两两的人影沿着轨道往远处走去。一开始人们以为那是铁路工人在干活，没想到那些不速之客竟然上了车，并且火车还开始往外冒烟。

“打开门，你们这些流氓。”队伍里有人喊。人群骚动起来，后面的人使劲儿推着前面的人向前。

“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把我们锁在了这儿，

现在却有人想法子跃过队伍上了车。开门，你们这些浑蛋，不然我们就把这铁门砸了。来，大家加油，我们把这个门给它推倒。”

“那群笨蛋，嫉妒个什么劲儿呢。”先前那个同安东尼娜说话的男人说道，“那些都是征召入伍的士兵，是从彼得堡征来的劳力。他们原本是要被送往沃洛格达的，可现在却要送到东边的前线去。这些人可不是自己愿意走的。他们被控制了，而他们的使命就是挖战壕。”

8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但日瓦戈一家人离开莫斯科还没多远。车窗外是冬天凋零的景色。轨道、田野、森林、村庄——全都为白雪覆盖。

日瓦戈他们很幸运，在车厢角落的上铺找到了几个位置。他们一伸手就能触到车顶，并且位置紧邻着车窗。

安东尼娜从来没有坐过这种车。第一次是尤里·安德雷维奇托她上去的，并为她推开了沉重的滑门，不过后来安东尼娜学会了自己上下。

在安东尼娜看来，车厢俨然是一个轮子上的猪圈，稍微一点动静就好似要散架了似的。随着火车变速或变换方向，他们已经连续颠簸了三天。三天来，火车车轮吱吱直响，好似敲鼓一样，不过也没

出什么意外。看来，冬妮娅的担心有些多余。

这列火车共有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一家人坐在第十四节车厢。靠乡村火车站停下时，只有前面、中间或后面的几节车厢会进到站台。

水兵们坐在前面的车厢，普通乘客在中间，而劳工们占据了车尾的后八节车厢。后面的八节车厢里挤了将近五百个人，各人的年纪、身体状况和职业都各不相同。

说起来那也是一道奇观了——彼得堡富有且聪明的律师、股票经纪人同马车车夫、装修工人、搓澡工、鞑靼乞丐、试图逃跑的疯子、商店老板、教士挤在同一节车厢，剥削阶层和被剥削阶层的人身处同一境地。

律师和股票经纪人坐在矮凳上，袖子紧贴着炉

火，彼此讲故事、开玩笑、逗乐。这些人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亲戚，而那些亲戚们正想办法解救他们。最不济，他们还能花钱打点，争取推迟出发。

而其他一些人，穿的则是高筒大靴和不系扣子的大衣，或者干脆赤脚穿一件破烂的长衫和长裤，他们有的留了胡子有的把胡子剃得精光。这些人挤在沉闷车厢半开的门边，身体紧紧贴着车皮或储物柜，眼神忧郁地望着窗外的农夫和村庄，跟谁也不说话。没有人会帮他们。他们也没有可以希冀的东西。

他们所在的这几节车厢挤了太多被征的劳工，不得已有些人只能挤到客车车厢去，而日瓦戈他们所在的十四车厢也挤进了一些劳工。

9

途中无论火车在哪儿停站，安东尼娜都要小心翼翼地坐起身，以免头碰到火车车顶。同时，她还会透过微开的车门往外张望，看外头的风景是否值得她下车去走走。通常这得由火车站的规模和停靠时间长短而定，另外还要看外头是否能进行一些以物换物的交易。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火车缓缓减速，原本在打盹儿的冬妮娅也被晃醒了。火车进站时颠簸的次数表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火车站，并且火车会在这儿停靠很长一段时间。

冬妮娅用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整理头发，并从包袱最底下摸出一条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和车轮的绣花毛巾。

与此同时，日瓦戈医生也醒了过来，他第一个从上铺跳下来，并在下面接应妻子。火车站警卫室和照明路灯在车窗外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是被积雪压弯了腰的树枝。树枝弯腰的方向正好朝着火车，好似在表达欢迎之情。还未等火车停稳，水兵们就跳到了雪地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火车站一栋建筑的角落——通常会有一些农妇在那儿偷偷卖些食物。

水兵们身穿黑色制服，帽子上的飘带随着他们风驰电掣般的奔跑在风中飞舞，这也让其他人下意识地给他们让路。

角落里，来自附近村庄的姑娘们和女人们见这些当兵的过去了，高兴得跟中了彩票一样。她们排成一条长列，靠着火车站的墙边卖一些黄瓜、土奶酪、熟牛肉以及还冒着热气的煎饼。每个人头上都

裹着一块头巾，头巾底部则扎在羊皮大袄里头。结了婚的女人们被水兵们的玩笑逗得面红耳赤，与此同时，她们又害怕这些海员，因为现在打击投机倒把和自由市场的人正是他们。

不过，女人们的不安和紧张很快就消散了。火车停稳以后，普通乘客也加入了队伍，一下子交易变得热闹起来。

安东尼娜也跟着人群一边往前走，一边看出售的物品。她把毛巾搭在肩上，看着像是要到火车站后面的雪水里洗把脸似的。几个女人大声叫道：“嘿，你的毛巾怎么卖？”但安东尼娜跟没听见似的，继续往前走，日瓦戈医生就陪在她旁边。

走到队伍尽头，他们看到一个戴黑底红花披巾的女人。女人看见安东尼娜肩上的毛巾，双眼顿时放起了光。她仔细打量着安东尼娜，然后挪到安东

尼娜身旁，露出自己手上的东西，热切地小声说：“看看这个。我敢打赌，你肯定好长时间没见过这种好东西了。很吸引人，对吧？别犹豫太久，不然好东西就被人家换走了。你把毛巾跟我交换，我换一半给你？”

安东尼娜没听清最后一句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夫人？”

女人意思是说把野兔劈成两半，用其中的一半跟安东尼娜换她的毛巾。女人把野兔举高。“我是说，我愿意用一半的野兔肉跟你换毛巾。你盯着它看做什么？这可不是狗肉。我的丈夫是个猎人。是野兔肉，绝对没错。”

于是，两个人达成了交易。她们各自都认为自己占到了便宜，安东尼娜隐隐感到一种羞愧，觉得

自己骗了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也对这桩交易甚为得意，高兴地向她的同伴炫耀，然后踏着雪道往远处的家里赶。

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起了骚动。只见一个老女人在那儿叫喊："嘿，你给我站住！你想去哪儿？你还没给我钱！你个骗子，什么时候付钱给我？瞧瞧他，贪婪的猪。你在这儿叫他，他却头也不回。站住！站住，那位同志，我叫你站住！天啦，我被抢劫了！小偷，站住！他往那边去了，就是他，抓住他！"

"哪一个？"

"那一个，胡子剃得精光，正在咧嘴笑的那个人。"

"是那个袖子上有洞的男人吗？"

“没错，就是他，抓住他，那个浑蛋！”

“那个衣服上打了补丁的？”

“是的，是的。哦，我被人抢了。”

“发生什么事了？”

“那边那个家伙从这儿买了一些牛奶和馅儿饼，吃完之后就走了，钱也没给，所以老太太正哭喊呢。”

“怎么能那样呢？怎么没人去追他？”

“追他？他全身都是弹药，搞不好还被他追杀呢。”

10

十四车厢有几个被征劳工，一个名叫沃罗纽克的列兵看着他们。其中有三个男人格外突出——一个是普洛克·卡里托诺维奇·普利图列夫，他曾经在彼得堡的一家官方酒馆里当会计——所以车上的人都称呼他为会计；还有一个是瓦塞·布利金，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曾跟着一个铁匠当学徒；另外一个是克斯托耶夫·阿姆斯基，一个头发灰白的革命主义者，他曾在旧军团的劳工营待过，现在又要到新的劳工营去。

这些征来的劳工原本互不相识，不过渐渐地也彼此熟悉了起来。原来，会计和学徒瓦塞还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而该趟火车刚好会经过他们的家乡。

普利图列夫来自马尔密戈，头发卷卷的，脸上有很多的麻子，五短身材，长相甚为可怖。他穿着

一件灰色的毛衣，腋下都被汗水浸黑了，而且毛衣很不合身，更显得他丑陋不堪。普利图列夫有时会沉默地坐上好几个小时，跟一尊雕塑一样。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只是不时抓挠手上的疣子，直到出血为止。

去年秋天的一天，在去内夫斯基的路上，他无意闯进了位于利特内大街街角的一个军事基地。基地的人问他要身份证明，结果发现他拿的是一个四等证明，而这种身份证明通常是发给无业游民的。所以，他被扣押了起来，基地里还有很多其他由于同一原因被扣押的人，他们都被人看守了起来。他所在的这个小组原本跟上个小组一样，预计派到前线挖战壕，中途取道莫斯科。

普利图列夫在卢加有一个妻子，战前他就是在那儿工作。妻子打听到了他的不幸遭遇，心急如焚

地跑到沃洛格达——一个必经的交通枢纽去找他，但普利图列夫所在的这个编队没到那儿去，妻子只能是白跑一趟，从此也失去了他的音信。

在彼得堡的时候，普利图列夫跟一个叫派拉加·尼罗夫娜·提亚瓜诺娃的女人住在一块儿。被抓的时候，他正要跟那个女人道别，打算从另一个方向跟她碰面，但最后他只能目送那个女人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之中。

提亚瓜诺娃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有一双漂亮的手。她把头发扎成一个长辫，喜欢不时地将长辫甩来甩去，还伴着一声声叹息。现如今她也在队伍里，因为后来她主动提出要陪伴普利图列夫。

人们很难理解，女人如何会被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男人吸引，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事实。靠前的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个叫奥格里科娃的年轻姑

娘，她也是普利图列夫的朋友。奥格里科娃骨瘦如柴，睫毛是白色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挤上车的。也许是出于嫉妒，提亚瓜诺娃一直叫她“喷射器”“奶嘴”这种很侮辱人的外号。这两个女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彼此也尽量避开对方。奥格里科娃从不去其他车厢。所以也不知道她跟普利图列夫是怎么认识的。也许只是因为在人群中远远地看了一眼，她就爱上了相貌丑陋的普利图列夫？

11

瓦塞的故事与众人不同。他的父亲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于是母亲就把他送到彼得堡的叔叔那里学习打铁。

瓦塞的叔叔在阿普拉克新大街开了一家铁器店。去年冬天的一天，瓦塞叔叔被当地的共产党叫去问话。结果走错了门，瓦塞叔叔竟然阴差阳错地走到一个选劳工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黑压压的全都是被征来的劳工。过了一会儿，一些士兵走进来将他们围住，并将他们带到赛美诺夫军营过夜。第二天早上，瓦塞叔叔就跟其他劳工一起被送上了去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些人被抓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他们的家人纷纷赶到火车站来送别。其中就有瓦塞和他的婶婶。瓦塞的叔叔请求守卫（也就是沃罗纽克，此时

恰巧也在第十四车厢）给他几分钟时间，让他跟妻子道别。守卫不同意，说要么就押一个人，不然谁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回来。于是乎，叔叔和婶婶就把瓦塞交出去当人质，沃罗纽克也同意了。瓦塞进到了劳工的队伍，他的叔叔被放了出去。而那是瓦塞最后一次见他的叔叔和婶婶。

骗局被揭穿时，没有一点防备的瓦塞伤心地号啕大哭。瓦塞瘫在沃罗纽克的脚边，亲吻他的双手，请求沃罗纽克能放他一马，但对方不为所动。沃罗纽克不放瓦塞走，并不是因为他残忍冷漠，而是因为那种困难时期政府的各项政策都执行得十分严格。守卫得确保劳工一个不少，不然就是自己掉脑袋。瓦塞就是这么当了劳工的。

至于合作主义者克斯托耶夫·阿姆斯基，无论是在前沙皇的统治下还是在现政府的统治下，他都受

到同伴的尊敬。阿姆斯基不停地跟看守长官说瓦塞被抓完全是一个错误。长官承认这确实是一个误会，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等抵达目的地之后再说，并且他承诺到时候会尽全力帮忙。

瓦塞长相英俊，看着像是从皇宫画像或上帝天使画像中跑出来的人物一样。他十分单纯，并且没有一点骄矜之气。瓦塞最喜欢的就是坐在长辈们脚下，抬头仰望他们，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听他们发表各种意见或讲各种故事。每当看到他因用力控制泪水或放声大笑而面部肌肉抖动时，你都想爱怜地摸摸他的头。

12

日瓦戈一家人邀请克斯托耶夫共进晚餐。克斯托耶夫坐在角落的位置上，津津有味地啃着野兔腿。克斯托耶夫怕冷，所以换了好几个地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让他觉得舒服的地儿，“这就好多了。”他说。克斯托耶夫把骨头啃得干干净净，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然后用手帕把手指擦干净，谢过日瓦戈一家人，然后说：“你们靠着的这个窗子呀，得把它封紧一点儿。不过说回我们刚才的话题，日瓦戈医生，我得说你错了。烤兔是个好东西，不过就此推断农民的日子好过，那就有失偏颇了。”

“哦，可别这么说。”尤里·安德雷维奇表示异议，“你看看这些火车站。林子里的树没有被砍，篱笆完好无损。还有那些可交换物品的市场，那些女人！多棒啊！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地方的人仍然在

继续他们的生活，总有一些人过得开心。并不是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凄惨。这样想，很多事就能说通了。”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可惜不是。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些想法的？到离铁路五十英里的地方去看看，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会发现那儿到处都是造反的农民。反谁？你或许会这么问。他们既反红军也反白军，谁当权就反谁。你可能会说，啊，这是因为农民天生就是政权的敌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请允许我对此提出异议。农民其实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比你我更清楚，只是他们要的东西跟当权者给的东西不一样。

“革命开始之后，农民们觉得自己做了几百年的梦就要实现了——他们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任何人，也不亏欠任何人。

结果，农民却发现革命不过是换了一批人来压迫而已，而且压迫的程度更严重。所以，你能想象那些村庄有多骚动有多不安宁吗？可你刚才还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不，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我亲爱的伙计。不过就我来看，你现在似乎还不想知道那些事情。”

“好吧，我承认，我确实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知道那些让人焦虑的事情，让自己受更多折磨？历史与我无关。我只想把现在这段痛苦的时日熬过去，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忽略掉那些事实？你说，我的想法和现实不符，但请你告诉我，现如今俄国的现实在哪里？在我看来，现实实在太过吓人，所以它藏起来了。我希望自己能被说服——农民们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可如果这只是一个幻想，我又该怎么办？我要靠什么活下去？我还能信仰谁？并且，我必须要活下去，因为我还有家人。”

说完，日瓦戈医生做出一个绝望的手势，转身走开，让岳父接过话去。日瓦戈的头无力地靠着铺板，眼神呆滞地看着下面。

下面，普利图列夫、提亚瓜诺娃、瓦塞和沃罗纽克在一起聊天。火车开近普利图列夫的家乡时，他出神地念叨着回家的路，念叨着火车站，念叨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他还叫出了家乡常用的几个姓氏，引得瓦塞情不自禁地重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好似他们来到了一个童话般的场景。

“你在德伊·福德下车？”他高兴得发狂，“看，我们的火车站！没错！然后再转去布伊斯基，是吗？”

“没错，你是走布伊斯基那条路。”

“我就说嘛——布伊斯基——布伊斯基村。我

当然知道，你从那儿的主道转到小道上，然后右转，再右转。然后就能到我们的瓦雷特尼基了。你走的路肯定不在河边，对吧？你知道佩尔加河吗？哦，你肯定知道！那是我们的母亲河。你沿着河走，一路向前，然后顺着悬崖转到右边，那个悬崖可真是陡峭！老实说，站在上面往下望让人直发晕。悬崖下面有一个码头，没错吧？我的母亲就住在那儿，还有我的两个小妹妹。阿伦卡和阿里什卡……提亚瓜诺娃婶子，我的母亲跟你有点儿像，不过她比你更年轻更漂亮。沃罗纽克叔叔，求求你，沃罗纽克叔叔，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请求你放了我……沃罗纽克！”

“怎么了？叔叔，叔叔，我不是你的叔叔！你希望我做什么？我是疯了吗？如果我把你放走了，那我就死定了。阿门，他们肯定会整死我的。”

提亚瓜诺娃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温柔地抚摸瓦塞那带一点红色的头发。她不时地俯下身子微笑，好似在对他说：“别傻了。你怎么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沃罗纽克说这样的话？别着急，有点耐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3

火车过了中部之后，一路向东，古怪的事情也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火车穿过了一个到处是军乐队的动乱地区，还经过好几个刚平息动乱的村庄。

火车动不动就停下，然后就有全副武装的军人上来检查乘客的文件和行李。

有一次火车大半夜的停车，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任何其他动静。尤里·安德雷维奇心想是不是发生车祸了？于是，他好奇地走出去看。

外头漆黑一片。火车无缘无故地在轨道中间停下，四周都是田地，铁轨的两边分别种着一排枞树。除了日瓦戈医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好事者也出来了，在雪地里跺着脚。他们告诉尤里·安德雷维奇，什么事都没有，只是火车发动机出了点毛病，

还说这一片地方很是危险，应该先让手摇车过去检查一番。乘客们已经派代表去跟车长说了，必要时还可以给点贿赂。听说水兵们也插了一手，他们自然是所向披靡。

车头的雪有时会被某种光照亮，像是篝火的亮光。凭着这点亮光，日瓦戈医生看到几个人影正往火车头那边跑。

冲在最前面的应该是工程师，他跑到跑道的最前端，跃过缓冲栏，眨眼就消失在黑夜中，仿佛被大地吞噬了。跟在后面的水兵们也是一样——风驰电掣往前奔跑，眨眼便消失不见了。

受好奇心的驱使，包括尤里·安德雷维奇在内的几位乘客也都跑过去看。

跑到缓冲栏那头，整条轨道一览无余，而眼前

的情景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工程师站在雪地里，积雪直没到腰间，其他人则是站成一个半圆将工程师围在中间，好似猎人围住猎物一样。跟工程师一样，积雪同样没到了他们的腰间。

“多谢，同志们，你们真是来得及时呀。”工程师吼道，“多么精彩的画面，水兵们拿着枪追杀同伴，只因为这个同伴说火车必须停下。你们做我的见证人，乘客同志们，你们可以看看这是个什么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打开危险的闸门。该死的混蛋，你们以为我是担心自己吗？去你的。我是为了你们才这么做的，为了确保你们安然无恙。我让自己陷入这种麻烦的境地，还换不来一声感谢！开枪啊，开枪啊，怎么不开枪呢？我人就在这里。乘客同志们，你们做我的见证人，我可没逃跑。”

这时，人群中传出一个略显犹豫的声音：“冷

静点，老伙计……他们不是认真的……我们不会让他们……他们肯定不是认真的……”另外一些人也附和道：“没错，加福里尔卡，你要挺起胸膛来，别让他们欺负你！”

一个红头发的大汉首先跳出来，他的头很大，以至于整张脸看起来都是平的。大汉转过身面对乘客，然后用深沉平静，不慌不忙的口吻说话。跟沃罗纽克一样，他说话带一点乌克兰口音，而他的沉着跟整个场景显得十分不协调。

“你们刚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伙计们，外头风大，你们小心别冻着了哟。不如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去，好吧？”

人群渐渐退散。大汉跳到工程师面前说：“工程师同志，你疯完了吧。快把腿从雪里拔出来，我们还得回去呢。”

14

第二天，为防脱轨，火车以蜗牛的速度行进。轨道上满是未扫净的雪末，旁边则是一片火烧后的废墟。尼扎尼·凯尔梅斯——映在烧得焦黑的背景中，火车站名字仍依稀可辨。

火车站前方有一个荒凉的村庄，皑皑白雪覆盖其上。村子同样被大火毁于一旦，最后面一幢房屋的外墙被烧得焦黑，旁边的一栋房子则往下陷，角落的木料都掉了下来。街上到处散落着破烂的雪橇、篱笆、锈迹斑斑的铁制品和油漆斑驳的家具。煤灰让原本洁净的白雪也变得污黑不堪，烧得只剩一半的圆木从雪层下焦黑的土地里伸出来——所有这些都证明，这儿起了一场大火，证明这儿的人曾多么努力地想要把火扑灭。

其实，那个地方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荒凉，街

上仍有几个人在游荡。火车站站长从废墟里钻出来，卫兵们跳下火车，跟他寒暄：“全被烧了？”

“你们好，欢迎你们的到来。是的，我们遭遇了一场大火，但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

“我不明白。”

“那还是别明白了。”

“你说的不是斯特尼科夫吧？”

“没错。”

“为什么？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做，是我们的邻居们犯了事。你看到那边的村子了吗？尼扎尼·凯尔梅斯属于乌斯特·奈姆迪斯克村——只是因为这样。”

“那他们犯了什么事？”

“七项死罪——解散农民委员会，这是其一；拒绝提供马匹给红军，这是其二；不接受搬迁动员，这是其三。大概就是这样。”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他们就被炮火扫荡了？”

“一点没错。”

“是一列装甲火车进行攻击的吗？”

“当然。”

“太悲剧了。我真心同情，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

“其实这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又收到一个新

的消息，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坏消息——你们必须得在这儿逗留几天。”

“开玩笑吧！我还要把这批人送到前线去呢，战情紧急。”

“我没有开玩笑。暴风雪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铁轨上全都是积雪，没有人可以去清理。半个村子的人都怕了。我让留下的人去清理积雪，但人手还是不够。”

“该死的。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得想办法把积雪清理干净。”

“雪有多深？”

“还不算太坏，要看情况。积雪最严重的是中间那两英里，会有点棘手。前面是一段森林，估计

积雪不会太多。至于这边的开阔地带，大风还是能吹散一些雪的。”

“该死，真是让人头疼！那我去动员那些乘客。”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不能让水兵和红军下来扫雪。火车上有一整支劳工队伍，包括其他乘客在内，大概有七百人。”

“够了，够了。一拿到铁铲，我们就开始干。光靠着七百人还是有点不够，所以我会到隔壁村子里去请求帮助。放心，我会搞定的。”

“天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觉得我们搞得定吗？”

“当然。他们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哪怕要拿下一座城市也没问题，更何况这只是一小段铁路呢。别担心。”

15

清理轨道上的积雪花了三天时间，日瓦戈一家人甚至包括纽莎在内都参加了清雪。而这是他们旅途中最高兴的三天。

乡村的雪景，如诗如画，宁静又迷人。让人不禁想起普希金笔下的故事和阿克萨科夫的风景描写。废墟以及那些留下来的神情疲倦的村民们，更为那场景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还有，他们害怕跟人交谈，尽量避开火车上下来的人，哪怕是村民们自己在一块儿也基本上不说话。

扫雪的人被分成几队，劳工和普通乘客也被分了开来，分别派武装士兵看守。

几个扫雪队在不同的地块儿同时干活，堆起来的雪将人都挡住了，直到最后再一起推掉。

干活的人全都待在外头，只有睡觉时才会回到火车里面。外头天寒地冻，由于铁铲数量不够，所以轮班的时间不长，这让大家很高兴。

日瓦戈所在的这一段铁轨风景很好。东边是一个山谷，群峰连绵起伏，与地平线融为一体。

山顶有一座小房屋，四面八方的风都吹向它。夏天住在那所房子里一定很舒服，可惜现在是冬天。

飘雪落在每一个角落，覆盖地面所有的凹凸。春天，山上融化的积雪会蜿蜒而下流进铁轨下面的水道，不过冬天的座座山峰就跟一个个穿了厚衣服的孩子一样，只有头露在外面。

不知山上的小屋有没有人住，日瓦戈暗忖，或者那是一座空屋，终有一天会变成废墟？曾经住在

那儿的人遭遇了什么？他们逃到国外去了吗？还是被当地的农民杀了？又或者，他们很受欢迎，所以以技术专家的身份住到了那个地方？如果他们住在那儿，是否幸免于难？

山顶的小房子唤起了日瓦戈内心的好奇心，但他只能死死压抑住。在那种时代，疑问纷至沓来，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阳光照在晶莹的白雪上，闪闪发光，让人睁不开眼睛。日瓦戈把铁铲重重地铲进雪里头，丝毫没有受到阻挡。铲起来的雪那么晶莹剔透，一颗颗好似钻石。日瓦戈不由想起小时候，他也曾在自家院子里玩耍——戴一个裹头的帽子，身穿黑羊皮大衣，只留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小日瓦戈用雪堆立方体，堆金字塔，堆冰激凌，堆碉堡，堆穴居人的城市。那时候的日子多么富有激情呀，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不过，露天扫雪的这三天也让日瓦戈感受到了那种愉悦。也难怪，晚上工人们能吃到热腾腾的新鲜烤面包，没有人知道面包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面包皮松脆美味，闪着诱人的光泽，四周咬起来松松脆脆，面包里头还藏有巧克力碎块儿呢。

16

大家渐渐爱上了这个沦为废墟的火车站。因为在大雪封路的山里，在一场不知前路如何的旅行中，人很容易对一个为其付出时间的地方产生感情。它的样子，它的坐标，一切的细枝末节都深深印在了每个过路人的记忆里。

每天傍晚，旅客们按时回到火车上。如同那东升日落的太阳，每次都会在发报员窗户外头的桦树后面落下。

那个地方的墙已经陷下去了，不过面朝窗户的那个角落还尚完整。咖啡色的墙纸，带圆形通风口的壁炉，办公室物品清单仍挂在黑框的墙上。墙纸隐隐透出一种暖棕色的光，好似房子倒塌的那一刻，落日照亮了屋里的一切。桦树的影子也倒映在墙上，宛如女人的丝巾。

办公楼后面有一条通往候车室的门，门上还贴着一张公告。那公告似乎是二月革命爆发之初贴上去的，或者更早一点。公告上写着：

生病的旅客暂时不要奢望药物和绷带，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特此公告。

助理医师

乌斯特·奈姆迪斯克区

当铁轨上的最后一堆雪被清理干净，铁轨完整地映入人们眼帘，它像一把出鞘的箭飞向远方。铁轨两边是大家齐心合力铲出来的积雪，堆成一座座小雪山，被森林包围。

目之所及之处，只看见一群群的人手拿铁铲站在轨道上。这是他们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出现，所以每一个人都被惊住了。

17

有消息说，尽管天色已经不早，但火车将即刻启程。尤里·安德雷维奇和安东尼娜走到外头，再一次欣赏他们亲自打扫出来的干净的铁轨。轨道上已经没了人。日瓦戈医生和妻子注视着远方，偶尔说几句话，站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车厢。

在回车厢的途中，日瓦戈医生和冬妮娅听到两个女人在激烈地争吵。他们马上认出争吵的就是奥格里科娃和提亚瓜诺娃，并且那两个人走的方向跟他们一样，都是从车头往车尾的方向走；只不过那两个女人是靠火车站那一边走，而日瓦戈跟妻子走的是靠森林的这一边。一节又一节的车厢把他们挡了开来，奥格里科娃她们很难跟日瓦戈夫妇并排走，反正不是走到他们前面去，就是落在后面。

奥格里科娃和提亚瓜诺娃似乎处于一种躁动不

安的状态，并且她们好似没力气了。这并不难看出——一开始两个人都是尖着嗓子叫喊，渐渐地声音小了一些，直到变成耳语般的轻声；另外，她们连走路都走不稳了，东倒西歪，好似脚底踩了棉花一样。提亚瓜诺娃好似想追赶奥格里科娃，说不定一追上就是一顿拳头。她不断用难听的话咒骂奥格里科娃，而小声骂出来的脏话让人更觉得不堪入耳。

“你个贱货，臭不要脸的婊子。”提亚瓜诺娃尖叫着，“就看到你在招蜂引蝶，勾引男人。难道勾引了我那个老笨蛋还不够吗？你非得打一个小伙子的主意，哦，天啊，他还那么年轻。”

“这么说，瓦塞也是你的丈夫喽？”

“你个让人恶心的贱女人，我会给你找个丈夫的！你再敢多说一句话，我就宰了你，我说到做到。”

“哦，哦，你管好自己吧。说话，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我想看你死，你个作死的贱人，不要脸的婊子！”

“我就是这样的，不行吗？对，跟你这么高雅这么尊贵的女人一比，我当然是贱人，是婊子！真是田螺不知屁股臭，真正下贱、无耻、卑鄙的人是你。啊，救命啊，救命啊！她要杀了我！你们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孤儿，救救我这无助的姑娘吧！”

“这边走。”安东尼娜催促丈夫道，“我听不下去了，太恶心人了。她们肯定越说越离谱。”

18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无论是天气，还是风景。火车穿过了平原，进入了山区。一直呼号的北风也渐渐小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暖和煦的南风。

这里地形崎岖，树木都长在山坡上。铁路从山中穿行而过，火车也只能穿山越岭。翻过一个岭，再过一个坡，如此循环往复。

火车轰隆隆地驶进森林深处，速度慢了下来，好似是由古老的森林领着往前面走。森林这个领路人还不时地回一下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不过，森林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森林深处仍是一派冬天的景象，安静宁和。只是不时地会听见树枝唰唰地摆动声，摇下枝头的积雪，好似要把扼住它喉咙的手甩开一样。

走到这儿，尤里·安德雷维奇也不再觉得困了。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躺在床上，睡了醒，醒了睡，或者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听别人说话。其实，又有什么值得听的呢？

19

尤里·安德雷维奇冬眠期间，春天的气息愈来愈浓厚，冰雪融化。先是从他离开的那天起，莫斯科的雪水开始消融；然后一路走，在乌斯特·奈姆迪斯克扫了三天的雪。不知不觉中，皑皑的白雪便化作了淙淙的春水。

一开始，冰雪是静悄悄地融化，秘而不宣，从里面开始往外渗透。时过境迁，眼看这事情已经藏不住了，大自然便大方地向人类表演了它的奇迹。春水变得汹涌，森林也开始骚动，万物都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大自然给了流水很大的空间，它可以冲刷岩石，可以注满湖泊。森林里融化的雪水汹涌澎湃，还冒着一丝丝热气。流水穿森林而过，碰到还未融化的积雪时会稍稍放慢一点步子，悄悄地淌过去或

者干脆喷流而去。大地吸满了水。高大的古松甚至可以从云层里直接吸收水份了，而松树的根部会冒出一圈泡沫，好似喝酒的人胡子上沾了一圈儿泡沫似的。

天空沉醉在春天的气息里，被春天的香气吹得醺醺然，而一朵朵湿气缭绕的云更添了一些沉醉感。低一点的云好似毡毛一样垂在森林的上方，雨水降落，冲净地上最后一点脏雪。

尤里·安德雷维奇醒了，他伸了个懒腰，用单手支着下巴，出神地望向窗外。

20

火车驶近一片矿区，房屋越来越多了，火车站也越来越多。很多的人在小站上上下下，一些快要抵达目的地的人也不再蒙头睡觉，而是四处溜达。火车上空出了许多位置——门边或中间车厢都有——一些人凑到一块儿低声谈论只有他们本地人才知道的事情。

过去的三天里，尤里·安德雷维奇从那些当地旅客那儿听到——白军在北方越来越占据上方，并且已经控制甚至即将占领尤里安提。另外，如果他没听错的话，白军的统领恰好是他的老朋友加利乌林——最后一次跟加利乌林见面还是在梅流赛艾沃。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些事他对家人只字未提。

21

午夜刚过，尤里·安德雷维奇醒了过来，他心里隐隐有一种喜悦。不过，那喜悦还不足以让他失去控制。火车停下了，皎洁的月光笼罩着安静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建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黑暗被照亮了，似乎有某种微妙但又强大的东西预示着这儿将会有恢宏的景色出现。

日瓦戈看到人们沿着站台行走，只是偶尔小声交谈几句，人影经过车窗有若鬼魅。日瓦戈医生为那些沉睡的旅客而伤悲，因为他们浑然不知即将到来的战争。

不过日瓦戈医生弄错了。这个站台上有人低吼有人跺脚，跟其他火车站的站台并没有两样。不过，火车站旁边有一个瀑布。瀑布给这个夜晚带来了一丝清凉和自由的气息，这也让他的睡眠更加香

甜。其实正是因为外头太吵了，日瓦戈医生才会生出这种沉寂的幻觉。

日瓦戈医生并不知道这是个幻觉，但他从中得到了安慰，很快就睡着了。

两个男人在日瓦戈下铺聊天。

“唉，火车开动了吗？怎么这下子这么安静了？”

“你是说，那些卖东西的小贩？”

“没错，就是那些卖吃的的小贩。”

“这种事吧，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其他人就会跟着偃旗息鼓。听说，这片地区会被罚款。”

“罚多少？”

“四万。”

“你骗人！”

“我干吗骗人？”

“四万——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说的不是四万卢布，而是四万蒲式耳（相当于35.2升）粮食。”

“这一招真是高明呀。”

“四万蒲式耳来自最佳产地的粮食。”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这个地方的土地本来就很肥沃，刚好在玉米带上。从这儿开始，沿着雷恩瓦这条线一直到尤里安提，都是村庄挨着村庄，港口挨着港口，家家户户都是做生意的。”

“你小声点儿，会把别人吵醒的。”

“行，行。”男人打着哈欠道。

“要不咱也睡觉吧，似乎火车真的开动了。”

不过，事实上火车还是停在原地。只是后面又来了一辆火车，轰隆隆的响声甚至盖过了瀑布的流水声。之间一辆老式快车以全速冲过平行的一条轨道，它轰隆着前进，留下一溜尾气，消失在远方。

谈话继续。

“我们被骗了。看来我们这辆车是走不了啦。”

“是一辆装甲快车——肯定是斯特尼科夫。”

“肯定是他。”

“在镇压反革命这件事上，他跟一头凶残的野兽无异。”

“他应该是在追格雷耶夫？”

“格雷耶夫是谁？”

“赫特曼·格雷耶夫。有人说他在尤里安提附近组织了一支军队，控制了那儿的港口。那个杂种，他离死期不远了，赫特曼·格雷耶夫。”

“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也许是格雷耶夫王子。我不大记得清他的名字了。”

“没有这么一个王子。你说的肯定是阿里·库班，肯定是你弄错了。”

“也许是库班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

22

临近破晓，尤里·安德雷维奇再次醒来。他做了一个美梦，那种喜悦和自由的感觉仍残留在他的心间。日瓦戈看到火车还是停着的，他想也许还是在昨晚的那个火车站，也许是又到了一个新的站。此时，瀑布的声音再次传来，日瓦戈想也许就是昨晚的瀑布，也许不是。

日瓦戈医生马上又躺下了，就在他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隐约听到外头有奔跑的脚步声和口令声。克斯托伊跟卫兵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彼此对骂。空气里的喜悦气氛比之前更浓了。似乎有某种新的之前没有的东西在空气中飘荡——某种神奇的春天一般的或白或黑甚至都没有实质的东西。那感觉好似五月飘雪，白色的雪花落在黑色的大地上，使得那黑色更黑了。那是某种透明的黑白物质——“野草莓”。尤里·安德雷维奇决定继续睡他的

觉。

23

第二天早上，安东尼娜说：“尤拉，你真的太特别了，真的，你简直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有时候一只苍蝇飞过都可能惊醒你，然后你就辗转反侧到天亮也睡不着；可昨晚外头那么喧闹，你竟然睡得那么熟，我连叫都叫不醒。普利图列夫和瓦塞逃掉了，想想吧！还有提亚瓜诺娃和奥格里科娃也逃了。你能想象吗？事情还没完呢，沃罗纽克也不见了。我跟你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也逃了。你听到了吗？反正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也不知道是分开逃还是一起逃的——这成了一个谜。当然，我能理解沃罗纽克——他如果发现其他人都逃了，那他也只能逃掉，不然只有死路一条。但其他人是什么想法呢？难道他们真的是出于自愿走的，还是因为有人对他们做了什么？这么说吧，如果是那两个女人出了事，那究竟是提亚瓜诺娃杀了

奥格里科娃，还是奥格里科娃杀了提亚瓜诺娃？没有人知道。卫兵队队长都快疯了，满火车乱窜，大吼大叫。‘不准开车。我以法律之名命令你，不准开车，直到我把逃掉的人抓回位置。’而军队长官则说：‘我要把剩下的人尽快送到前线去，要我等你抓到人，想得美！’然后，两个人都把怒气撒在克斯托伊身上。‘你，堂堂一个工会主义者，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竟然让一个无知愚昧的小兵喽啰把你蒙了，惹出这么一个大乱子。你真是个废物。’而克斯托伊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道，‘犯人还得看着他的卫兵，是吧？要真有那么一天，母鸡都会上树了。’我当时使劲摇你，‘尤拉，’我叫，‘快起来，有人逃跑了。’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恐怕就算有人在你耳边开枪，你也会听不见……其他事情我待会儿再跟你细说……看，父亲，尤拉，快看，这景色真美呢！”

透过打开的车窗，目之所及一片春光明媚，春水尤其淌得欢快。某些地方的河水都溢了出来，漫上了岸。上铺的视线毕竟有所限制，看过去火车跟漂在水里似的。

只是隔一段距离就会有蓝色的铁皮隔断，看着不那么流畅。整体看来，晨曦下的火车车皮光可鉴人，闪闪发亮，跟融化的黄油一样——像是厨师用羽毛在馅儿饼表面涂了一层黄油。

天上的白云倒映在水里，田野、山峰、葱茏林木也倒映在水里，宛如水上一个世界，水下一个世界。

而这滔滔流水间竟还露出一小块陆地，上面生长着两棵树，与世隔绝一般。

“看，那儿有一群鸭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

罗维奇叫道。

“哪里？”

“小岛附近，靠右边一点。该死，它们飞走了。恐怕是被我们吓到了。”

“没错，没错，我看见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嚷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得跟你谈一次。改天……一定要谈一次。至于逃走的几个人，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我相信也没有人被谋杀。他们不过是追寻自由去了，就跟这春水一样。”

24

不眠之夜结束了。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山峰、丛林、峡谷——但看上去又显得那么不真实，好像是人编造出来的。

林子里长了几株野草莓，新叶直往外窜。那野草莓长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下面，很是险峻。

尽管瀑布和火车站离得不远，但也只能从丛林上方的峡谷高处看到。瓦塞很想站上去，去体验那种喜悦和恐惧共存的感觉，不过他实在有些走累了。

周围再没有比瀑布更好看的了，没有什么可与之媲美。这种独一无二让瀑布更为迷人，它好似有了生命，像是一条飞龙或长了翅膀的天使，由上帝安放在这乡村僻野之处。

瀑布飞流而下，中间处碰到一块岩石，顿时一分为二。上半部分几乎是静止状态，下面两道水柱则是飞水四溅，好似在不断调整位置一般，摇晃个不停。

瓦塞把羊皮大衣摊开在丛林里，躺了上去。天更放亮了些，一只大鸟从山上飞下来，绕着林子飞旋，最后在瓦塞旁边的一棵松树上停了下来。瓦塞出神地望着大鸟的深蓝色喉咙和灰蓝色的胸脯，轻轻用乌拉尔语叫出大鸟的名字——ronzha。过了一会儿，瓦塞爬起身，从地上拾起羊皮大衣然后披到肩上，接着穿过一片空地走到同伴身边。

“哦，派拉加大婶。天啊，你该有多冷啊！我都能听见你牙齿打战的声音。你在看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跟你说，我们得走了，得找一个村子落脚。村里的人肯定会帮我们躲藏的，他们不会伤

害自己的同类。再这么下去，我们肯定会饿死的。我们已经整整两天没吃过东西了。沃罗纽克叔叔肯定又惹了什么乱子，人家可倾巢出动来抓他。大婶，我们得赶紧离开。说直白点，我们得用跑速才行。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大婶，你已经两天没说过一句话了。天啊，你担心太过了，不骗你。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你又不是故意要把奥格里科娃阿姨推下火车的，你只是想把她拖到一边，然后她不小心掉下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当时是她自己从草地里爬起来——我亲眼所见——然后就跑了。她和普洛克·卡里托诺维奇肯定会追上我们的，我们会会合的。现在关键是，你不要这么担心了，说句话呀。”

提亚瓜诺娃站起身，拉起瓦塞的手，轻声说：“好吧，我们走吧，小崽子。”

25

火车又开始爬坡了，周围的树被震得嚓嚓直响。河岸下方是一片林子，不过树林的顶端还没到铁轨的高度。再往下，则是一片田野。春潮已经退去，草地上都是泥沙和小块儿的木头，木头定是从某个更高的地方冲下来的。

河岸下方的新林仍跟冬林一般荒芜。只有一些新芽点缀在丛林间，好似蜡滴一般，但彼此并不协调一致。有些地方新芽格外多，有些地方的新芽则显得很是凌乱——无论如何，茂盛、凌乱、肮脏都是生命的象征。在这青山绿水间，相信生命之火很快就会燃烧起来。

其中一棵桦树的枝干伸展得尤为厉害，好似一个受伤的烈士做最后的挣扎，又像是开了弓的箭。一走近，就能闻到桦树那浓烈的树脂味道——树脂

常用来制作油漆。

铁轨往上延伸，没过多久火车就行到了树木被冲下的地方。在铁轨的一个转弯处，倒着一棵大树，四周都是砍木头的碎屑和小木片，中间还有一堆砍好的木料。火车突然刹了车，在山的转弯处停了下来，火车自己也弯成了一个大大的弓形。

火车引擎轰隆轰隆地响了一会儿，不过哪怕没有这些信号，乘客们也都知道火车突然停下是为了那些木头。

客车车厢的门旋的一声打开了，里面的人潮水一样拥了出去。只有水兵还在前面几节车厢里坐着没有出来——他们什么事都不参与。

并不是所有木头的尺寸都合适，有些木头太大了，只有再将它们劈开。对于火车动机组的人来

说，锯子一直是必备物品，这下也主动献出来了。每两个人用一把锯子，日瓦戈医生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在其列。

水兵们把头探出窗外，咧着嘴笑。这群水兵的组合其实也有些奇怪，其中有中年工人，也有刚从海军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看起来他们好似是混入了父辈们的圈子。这些年轻的水兵喜欢跟老兵们开玩笑，这样也就能不去想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很快就要经受严峻的考验。

而那些忙着捡木头的人聚在一起，也是玩笑不断。

“嘿，爷爷！我年纪太小了，不能干活，再说奶奶也会心疼我的。”

“嘿，玛瓦，别把衣服脱了，你会感冒的！”

“嘿，小姑娘，别到森林里去，不如来当我的妻子吧！”

26

空地上有几个栈桥。尤里·安德雷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其中一个栈桥旁，二话不说便锯了起来。

在被冰雪覆盖了六个月之后，走进春天的大地万物复苏。森林散发出一种潮湿的味道，前一年的落叶散落四处，如同一个丢满信件、账单、邀请卡却多年无人打扫的房间。

“别走那么快，你会累着自己的。”日瓦戈医生说，他放慢了步子。“不然，我们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回荡着其他各处传来的锯木头的咔咔声，有些声音隔得很远，听着像是远处的一只百灵鸟正扯开喉咙歌唱；有时也会突然静默了下去，过

了一阵，只听见一只大黑鸟嘶鸣长空，犹如催促人们开工的哨子。就连飘上高空的火车头蒸气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好像是某户人家煮牛奶而冒出的热气。

“你之前想跟我说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道，“还记得吗，那天我们经过一个小岛，一群野鸭子从旁飞过，当时你说想跟我谈一次话……”

“哦，是的……不过，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是在想，我们已经越走越远了。这片地方现在是动乱不已，也不知道等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会是怎样的光景。也许我们得提前商量一下应对的办法……当然我不是把话说死了——这只是以防万一，在春天的林子里用五分钟来决定我们的未来，这听着也实在太滑稽了。另外，我们对彼此十分了解。你、

我、冬妮娅，还有其他很多跟我们一样的人，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在于意识程度的深浅而已。这也正是我现在想探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应当提前商定某些特定情况下我们各自的应对方式，以防日后彼此红脸，或让对方感觉尴尬。”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这么说，我很高兴。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你还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大雪夜，你拿着那份印有新政府成立公告的报纸给我看吗？你还记得，当时的用词是多么坚决多么不妥协吗？人啊，只有一门心思地往前冲，才能走得远。但只有构思这些想法的人才能保持其最初的那份纯粹，并且也只限于公之于众的那一天。接下来，政治诡辩会将这种纯粹的理想和激情击得支离破碎。我能对你说什么？我不熟悉他们的哲学，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甚至没有人问过我，我对所有这些生

活和制度的改变是否满意。但我还是选择了相信，即便不是自愿选择，我的行为还是让我背上了某种卸不掉的责任。

“冬妮娅一直问我，我们是否赶得及去种下这一季的蔬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乌拉尔的土壤或气候是什么情况。乌拉尔的夏天太短了，所以我都不知道那儿的农作物是否能应时成熟。

“但毕竟，我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地来到这里，也不是为了种几棵蔬菜。现在，我们最好诚实地面对一切，我们的目标并不一致。我们想过最新式的生活，共享老克鲁格的财产，分割他的工厂和机器。我们不会帮克鲁格复兴这个财富王国，跟其他同境况的人一样，我们会将这些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大家为了养家糊口，也会对集体财产做出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凭着原来的协议将庄园拿回

来，哪怕你给我一堆金子，那无异于在大街上裸奔或不会数数那么愚蠢。不，俄国的私有财产制时代已经结束，其实，我们格罗梅科家族早在十年前就失去了这种贪婪的激情。”

27

车厢里又热又闷，人在里头很难睡着，以至于日瓦戈医生的枕头都被汗水浸湿了。为了不吵到其他人，日瓦戈医生小心翼翼地从上铺爬下去，并推开车厢的门。

湿热的气息迎面扑来，日瓦戈医生感觉自己好似被困在了地下室的蛛网中："该死的，明天肯定会晒得不行，所以现在才一丝风都没有，空气才这么沉闷压抑。"

火车进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火车站，也许是某个交通枢纽。除了沉闷之外，车上的人还生出了一种空虚和冷漠，好似火车已经迷失，已被人遗忘一样。火车应该是停在火车站最远的一端，交错的铁轨将它和火车站其他建筑隔得很开。哪怕说此刻地面开裂，火车站瞬间沦陷，火车上的人也是浑然

不觉。

远处传来两个微弱的声音。

从日瓦戈医生的身后传来一种有节奏的拍打声，也就是火车开来的方向。那声音听着好似是有人在洗衣服，又或者是风吹旗帜的声响。

前头也有响动，站在最前面的日瓦戈医生不由凝神细听。“远距猎枪：”日瓦戈医生仔细辨认那低沉持续的声响，心里已大致有了判断。

“没错，我们到前线了。”日瓦戈医生摇了几下头，从车厢里跳下去。他往前走了几步。最后两节车厢往前走了一会儿，火车最终停下；其他车厢的套索也解开了，被火车头拉走。

“所以这就是他们昨天被锁的原因。”日瓦戈暗忖道，“他们已经有了感觉，我们一到达他们就

会被抛弃。”

日瓦戈医生绕着第一节车厢走了一圈，他想穿过铁轨去寻找火车站的主体部分，但一个拿着枪的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要去哪儿？有通行证吗？”

“这是什么火车站？”

“这个你不要管。你是谁？”

“我是一名医生，来自莫斯科。我的家人和我还有其他乘客都在这列火车上。这些文件能证明我的身份。”

“去你的文件。我可没傻到大晚上的还来看文件。现在起雾了，你看不到吗？我不需要文件来了解你是哪一种医生，你们医生中有很多人用十二英

寸的枪对准我们。你要是再往前走，我就一枪把你了结。趁你还没死，赶紧回去。”

“他肯定是把我当成其他人了。”日瓦戈心想。显然，跟一名拿枪的卫兵争论也是无益，最好是按他说的去做。于是，日瓦戈医生转身，朝另一边走去。

现在，枪口对准了日瓦戈医生的背后。他背对的正好是东方，此时太阳已经在薄雾的烘托下缓缓升起来了。太阳穿过飘浮的晨雾，如同一个裸露的人从热气蒸腾的浴室中走出来一样。

日瓦戈医生走回火车，并经过最后面的几节车厢。他的双足在柔软的沙地里越陷越深。

之前那平稳的击打声越来越近。此时火车停在一个山坡上，地面往下倾斜。日瓦戈医生停住了脚

步，他试图辨认前头那模糊的影子——晨雾让那影子显得巨大无比。日瓦戈又往前走了一步，只见一艘船从黑暗中显露了出来。原来，日瓦戈前面是一条宽阔的河，河水平稳而缓慢地拍打舶岸的渔船和岸边的码头。

河滩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谁让你在这乱转的？”日瓦戈又碰到了一个拿枪的卫兵。

“这是什么河？”尤里·安德雷维奇问道。不过，他已经在心里打定主意不再多问。

卫兵没有回答，而是把哨子放在了嘴里，打算叫人过来。就在这时第一个拦住日瓦戈医生的卫兵走了过来，显然他一直悄无声息地跟着日瓦戈医生，此时便成了三人的对峙。

“毫无疑问，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只什么鸟。‘这是哪个火车站？’‘这是什么河？’显然来者不善。你说呢？我们是直接把他带到码头，还是先送回到火车上？”

“我看先带回火车吧。看他们老大怎么说——你的证件呢？”卫兵朝日瓦戈医生吼道。然后他一把抓过日瓦戈医生的文件，回过身朝同谋的另一个人喊道：“你盯着他。”接着，他便同第一个盘问日瓦戈的卫兵朝火车站走去。

因为中间隔着一段距离，日瓦戈没能认出这第三个人其实是一个渔民。他原本是躺在河滩上，此刻却咕哝着坐起来，并对日瓦戈医生说：

“他们愿意把你带到你们管事的人面前，这实属幸运。这或许能保住你一条命，但你也怪不了他们，他们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现如今，是

他们当家做主，也许长远来看这会是最好的结果，但现在还说不定。你看，他们也会犯错误。奉某个大人物的命令，他们在抓人，反正一直在抓。现在，他们是怀疑你就是他们要抓的人。他们想，就是他，他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我们总算抓到他了。但这显然是个误会，他们错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一定要坚持面见管事的人，不要让那两个人对你做任何事。很不幸，他们满脑子只有政治意识。上帝保佑我们。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把你解决了。所以，要是他们说‘跟我来’，你就不要去。你一定要坚持见到长官。”

尤里·安德雷维奇从渔民那儿得知，这条河就是著名的雷恩瓦水道，河边的火车站属于拉兹维列——尤里安提城郊。渔民还告诉他，就位于河流上游几英里的尤里安提，此时已经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手里。拉兹维列之前也有麻烦，不过现在似乎已经

解决了，而火车站之所以会这么安静，是因为市民都被严格地管控了起来。日瓦戈医生还了解到，被军队首长斯特尼科夫当作办公室的专列刚好也停靠在这个火车站，而刚才那两个卫兵就是去报告斯特尼科夫。

这时，迎面又走来一个卫兵。跟另两个卫兵不一样的是，这个卫兵的枪挂在身后，枪托拖在地上，有时还会把枪拄在身前，好似这把枪是一个需要他扶持的朋友一样。这个卫兵把日瓦戈医生带到了斯特尼科夫面前。

28

两列并排停靠的车厢里头传来笑声和响动声，卫兵向守卫说了通关密语，将日瓦戈医生带了进去。不过他们一进去，里面的人就安静了下来。

卫兵领着日瓦戈医生走过狭窄的过道，进到宽敞的中部车厢。里面干净而舒适，穿着整齐体面的人沉默地做着自己手头的事情。此前，日瓦戈医生对斯特尼科夫——一个让人恐惧又让人自豪的无党派人士——有着完全不同的想象。

毋庸置疑，斯特尼科夫活动的中心地位于别处，离军事前线较近。这儿可能只是他私人的地方，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和休息的地方。

因此，这种寂静更像是在蒸气熏腾的浴室，穿着拖鞋的侍者沉默地在旁伺候。

办公室其实是由一节餐车改装而成，里面铺有地毯，还摆了几张书桌。

“稍等。”一个坐在门边的年轻军官说。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打发一个守卫离开，用枪托摆弄着钉在地上的一块铁皮。此后，似乎所有人都忘了日瓦戈医生的存在，不再理会他。

日瓦戈医生站在门口，他看到自己的文件就摆在房间那头的一张书桌上。桌旁坐着一个比其他人都年长的人，看着像是旧时代的那种上校。日瓦戈想那个人可能担任的是军队统计员之类的工作。只见他一边嘟囔，一边查阅书籍，研究地图，检查、对比、裁纸、粘贴，忙个不停。“看来天气会更热。”绕着房间里的窗子走了一圈之后，年长的军官开口道。他的语气听来让人觉得，这似乎是绕着窗子绕了一圈后被迫得出的结论。

此时，一个通信兵正趴在地上修理一条坏掉的电线。当年长的军官走到门边时，趴在地上的通信兵立马站起来，给他让道。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穿皮夹克的抄写员，打字机的墨盒被卡住了，抄写员正试图修好它。年轻军官走到女抄写员旁边，从上面检查墨盒被卡住的原因，电工则趴到桌子下面检查。年长的军官也加入了进去，四个人便都忙着摆弄那台墨盒被卡住的打字机。

见此情景，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好了不少。这些人肯定清楚他接下来的命运，日瓦戈想，如果知道他马上就要被处死，这些人应该不会表现得如此冷漠，只一心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谁说得准呢？”日瓦戈又想，“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漠不关心？枪一开，人就死了，他们却在这儿平静地预测天气。也许，是因为他们见了太多

的死亡，所以已经麻木了。”

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日瓦戈医生把目光投向对面的一个窗户。

29

日瓦戈医生站在那儿，他望见了轨道的边缘，望见了火车站所在的山丘，也望见了拉兹维列的郊区。

三个没有上漆的木楼梯连接着站台和火车站主体建筑。

轨道尽头有一块很大的墓地，很多没用的火车发动机就丢在那儿。残留着烟囱的火车头看上去就像是及膝靴的顶端，或者说像一个巨大的鸟喙，在满地狼藉的包围中惨喘。

下面埋葬的是火车，上面葬的则是人。凹凸不平的轨道，斑驳的铁皮屋顶，市郊的商店广告牌，在那青天白日之下在那冒着热气的清晨，像是一幅古老且被人遗忘的画。

在莫斯科生活了那么久，尤里·安德雷维奇都忘了其他城市还有那么多的商店广告牌和幕墙。其中一些标志幕墙巨大醒目，尤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也能很容易看清。那些广告牌悬在一层楼房屋的窗户外头，挡住了大部分屋子，仿佛一个乡下小孩儿拿父亲的帽子挡着脸。

雾气最先从西边消散，东边还有一些雾气飘浮，旋转，看着好似是舞台上隔开两边的幕布。

在拉兹维列上方的一座山上——也许相隔一两英里——坐落着一座大城市，跟省会城市的规模差不多。阳光给那座城市涂抹上了温暖的色彩，而距离让它的轮廓变得更加简洁而清晰。城市位于山顶，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绵延而上，中间的位置有一座大教堂，像是画中被遗弃的修道院或阿索斯山。

“尤里安提。”日瓦戈医生在心里兴奋地叫喊，“那就是安娜·伊娃诺夫娜和安提波娃护士曾跟我提过无数次的城市。真没想到我会在这样的情境下见到它，这太神奇了！”

这时，军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打字机上移开了，他们似乎都望着另一个窗户的外头，日瓦戈医生也跟着望了过去。

原来，是一群在押的犯人走上了火车站的阶梯。其中还有一个身穿校服并且头上受了伤的年轻小伙子。有人对那小伙子的伤口进行了紧急处理，但仍有血渗到绷带外面，并且他不断地用手抓挠自己那汗津津脏兮兮的脸。小伙子走在队伍的最末尾，两侧各有一队红军士兵，吸引了很多目光。这不仅是因为他那坚毅的目光，英俊的面容和过小的年纪，让人诧异的还有他与两个同伴滑稽的动作。

卫兵们要求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偏偏往相反的意向做。

小伙子头上仍戴着校帽，不断地往下滑落，但他不但没把帽子脱下握在手里，反倒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把帽子推回去，扯动头上的绷带和伤口。走在他身旁的两个卫兵看不下去，连忙去帮他。

就在这看似荒唐的场景中，日瓦戈医生却看到了很重要很深刻的东西。他好想冲出去，对那个小伙子说出自己心里汹涌的话。他想对他大吼，对铁路上所有的人大吼——只有打破桎梏，才能得到拯救。

想到这儿，日瓦戈医生不由移开了视线。这时，斯特尼科夫大步走了进来，他走到屋子中央站定。

他，一个阅人无数的医生，却是从来没有见过气场这么强大，性格这么坚定的人。真不敢想象，这世界上竟有这样强大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面前的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他就是意志力的化身。仿佛只要有他在，一切都会变得确定、真实、完美——英俊的脸庞棱角分明，冷峻气质显露无疑；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本是沾满了泥巴的及膝长靴看着却让人觉得跟上了油一样；还有身上的灰色哔叽上衣明明是皱了，但就是会让人猜想那是否是刚制成的最上等亚麻布衣。

这就是睿智和淡定的力量，无论什么情况下，他始终保持理智和冷静。

尤里·安德雷维奇想，斯特尼科夫也必须这样，因为上天赋予了他过人的天赋，他不能辜负。这种天赋体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上，也许这可算作一种模

仿的天赋。在那种年代里，人们喜欢把其他人当作榜样——或者是模仿历史上的英雄，或者模仿在前线或大街上因英勇斗争而功成名就的人，又或者是在群众中富有威信的人，或者模仿被人广泛赞誉的同志。

看到一个陌生人在场，斯特尼科夫礼貌地将他可能有的惊讶或愤怒隐藏起来。他只是跟下属交谈几句，好似日瓦戈医生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说：“恭喜。我们把他们赶走了。这场仗更像是一场游戏，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俄国人，只是犯了糊涂——他们不愿妥协，我们只能采取武力。他们的领导者还曾经是我的朋友，他的出身甚至比我更算得上无产阶级。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他帮了我很多，我一直觉得自己欠他的。而现在我很高兴，我们把他和他的部队打得退到了河的

那边，甚至退得更远。古里安，快一点儿把线接好，我们需要电话，不可能只靠通信员和电报来处理这些事。你知道现在有多热吗？不过，我还是睡了一个小时的觉。哦，是的！”然后，他转向日瓦戈医生这边，想起他还得处理跟眼前这个男人相关的一件无稽事。

“这个人？”斯特尼科夫一边打量日瓦戈医生，一边想，“胡扯！他跟我要找的人一点都不像。饭桶！”然后，他对尤里·安德雷维奇说：

“不好意思，同志。他们错把你当成了另一个人，是我的卫兵搞错了。你可以走了。快把我们这位同志的身份文件拿来，在哪儿？来，这是你的文件。那个，我能看一眼吗……日瓦戈……日瓦戈……日瓦戈医生……莫斯科……到我的车厢待一会儿，可以吗？这是我秘书的办公室，我在隔壁的车厢。这

边走，我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30

斯特尼科夫究竟是谁？

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还能拥有这样的地位，斯特尼科夫定是能力过人。但以前的斯特尼科夫其实是一个无名小卒，尽管他出生在莫斯科，可大学一毕业他就去省城当了一名教师。后来战乱之中又成了俘虏，先是被报失踪，后又被误认为牺牲，直到前不久才从德国俘虏营放出来。

他的推荐人和担保人是提沃兹恩——一个拥有先进政治观点的铁路工人——小时候的斯特尼科夫曾在提沃兹恩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拥有任命权的人被斯特尼科夫折服了——在那样混乱无序且政治极端主义盛行的时代，斯特尼科夫仍拥有革命的热情，并且他仍保持真诚。他的热情发自内心，并非为了模仿某个人，而这种热情跟他此前的经历息息

相关。

斯特尼科夫用杰出成就证明了任命者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特尼科夫的战史包括尼扎尼·凯尔梅斯和乌斯特·奈姆迪斯克的清剿行动，包括镇压古比索夫农民因粮食征收而起的暴动，包括解决抢劫粮食的第14步兵团。他还制服了斯坦卡·拉兹恩——一个试图在塔卡图伊城发动叛乱并投靠白军的士兵；除此之外，斯特尼科夫还摆平齐克恩·乌斯的兵变，不过一个忠诚的指挥官不幸在这场兵变中丧命。

在上述所有的行动中，斯特尼科夫对敌人都是采取偷袭策略，并且迅速果决地对敌人进行了审讯、判刑和执行。

斯特尼科夫让许多原本动荡不安的地方重新得到控制，除此之外，他还四处招兵买马，成功重组了自己的队伍。有鉴于此，征兵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红军招待中心通宵开放更是家常便饭的事。

后来，来自北方白军的压力越来越大，革命情况也越来越危急，斯特尼科夫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他狠抓军事、战略和执行，三管齐下，而这些措施可谓是立竿见影。

斯特尼科夫对坊间流言也略有耳闻，知道很多人都叫他刽子手拉兹斯特尼科夫。但他并不以为意，没有什么事能动摇他的决心。

斯特尼科夫是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工人，但由于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运动而被抓进监狱。那些年斯特尼科夫没参加革命运动，一是因为他太年轻，二是因为他还在学校念

书。当时穷人家的孩子更加看重学习，并且普遍比有钱人家的孩子学习更努力。因此，小斯特尼科夫当时没有受到革命狂潮的影响，反而是积累了大量知识。拿到人文学科学位之后，他又自学了科学和数学。

后来，斯特尼科夫参加了义务军，并被派往前线。之后不幸被捕，1917年听到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之后，他从俘虏营逃了出来，回了家。斯特尼科夫身上有两种特质，两种激情——一是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纯粹的道德感和公正意识。可以说，他是一个满怀热忱且让人尊敬的人。

不过，斯特尼科夫并不是那种能在科学领域有所突破的人。尽管他很聪明，但他在探知未知世界方面有所欠缺。毕竟，科学研究除了严密的逻辑演绎之外，还需要灵感。

如果说斯特尼科夫想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除了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他还需要学会打破原则。除了宏观把握之外，他还得注重细节，并能把每一件小事做成大事。

从小，斯特尼科夫就树立了许多崇高的理想，他把世界看作一个大舞台，认为所有人都能展现最好的自己，都会守规则。哪怕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他还是不觉得是自己把世界秩序看得太过简单了。斯特尼科夫心中的委屈与愤怒越积越多，他也是凭着这股怨懑之气，来平衡生活和破坏生活的黑暗力量，并力图成为生活的赢家。

失望激怒了斯特尼科夫，而革命给了他反抗的机会。

31

“日瓦戈。”走进房间后，斯特尼科夫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日瓦戈……做生意。我想，或者是上层……哦，是莫斯科的一名医生……要去瓦利吉诺。这有点奇怪，为什么你要离开莫斯科，去到那样一个小地方呢？”

“个人喜好而已。我想寻找一个安静避世的地方，过与世无争的日子。”

“哦，哦，多么浪漫！瓦利吉诺？这附近的地方我都很熟悉。那儿曾经是克鲁格家族的庄园。你不会刚好是他的亲戚吧？甚至是庄园的继承人？”

“怎么这么问？这跟是不是庄园的继承人没有关系。尽管，我的妻子确实……”

“啊，我说吧！不过你要是还怀念过去白军政

府统治时的生活，那恐怕就要失望了。你来晚了。我们已经清理了那一片。”

“您还在拿我开玩笑？”

“那么，一名医生，一名军医，我们现在正打仗，所以这件事跟我有关。你是一个逃兵。绿军(1)现正在林子里寻找避难所呢。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曾受过两次伤，所以已经被认定为伤兵。”

“那你需要提供一份人民教育部或医疗部出具的证明给我，证明你是俄国公民。而不仅仅是‘同情者’或‘绝对忠诚者’。亲爱的先生，现在是天启时间，我们都在等待最后的判决。天使们都得挥舞起火剑，把野兽赶到深渊，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者和忠诚的医生。不过，我刚已经说过会

放你走，我说话算话。不过你要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一定会再见面，并且会有一场不同的对话。等着看吧。”

不管是威胁，还是挑衅，尤里·安德雷维奇都不为所动。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从你的角度来看，你当然是对的。但你希望我跟你讨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跟一个想象的控诉者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说到现在还没有结论肯定说不过去。不过我只能简单概括。所以要是你真的给我自由，就让我带着答案离开；如果并非真心想放我走，那就再斟酌吧。面对你，我没有借口好找。”

这时，两个人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看来，电话线路已经修好了。斯特尼科夫拿起听筒。

“谢谢，古里安。现在，请你派个人过来护送

日瓦戈同志回他乘坐的火车上去。听着，我不想有任何差错。另外，把拉兹维列的交通示意图呈给我。”

日瓦戈离开之后，斯特尼科夫马上拨通了火车站办公室的电话。

“他们带来了一个学生，记得把帽子按在他的头上，他头上包扎了绷带，露出来很不雅——”“好的，好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找个医生给他瞧瞧——”“当然——”“另外，从现在开始，你直接对我个人负责——必要的话，还可以提供食物给他。没问题。那我们说说正事吧……我还没说完，先别挂。该死，还有人在打电话，占线了。古里安！古里安！他们把我的电话挂了。”

不过，斯特尼科夫暂时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可能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他想，“跟我们作对，现在他也长大了。”于是，斯特尼科夫开始回想不当老师的这些年，回忆那个小伙子会否是他的学生。想得出神的斯特尼科夫望向远方的地平线，试图寻找他曾在尤里安提住过的区域。要是他的妻子和女儿还生活在那儿，该是怎样的情景啊！他能去找她们吗？为什么现在不去呢，就这一刻？是的，他应该去找家人，可他如何能找到呢？他们已经各自属于不同的生活。而他，得首先看穿这新的生活，然后才能回去那旧的生活。有一天，他会这样做的。有一天，但这一天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

(1) 绿军多为农民组成，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

日瓦戈医生（下）

·帕斯捷尔纳克卷·

【苏联】B·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幕娟◎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第八章　抵达

1

终于要到目的地了，但日瓦戈医生乘坐的火车还是排在其他几列火车的后面，所以跟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马上要抵达另一个终点，日瓦戈一家人觉得他们同莫斯科的联系——在此之前始终保持完整的联系——在这个早晨开始瓦解，并且即将结束。这儿是另一个地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自然有它自己的规则。

相比首都莫斯科的人，这儿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尽管火车站所在区域的平民已被清离，四周也都是红军站点，但当地一些乘坐火车的人还是想办法到了轨道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

是“渗透”。他们挤进车厢，一窝蜂地穿过拉开的滑门，在火车里头来回走动，并最终在路堤上三五成群地站定。

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彼此认识，他们一看到彼此，就使劲招手并叫出对方的名字，待到走近再彼此问候。他们的谈吐和衣着、食物和礼仪跟莫斯科的人全然不同。

“他们靠什么生活呢？”日瓦戈医生不禁想。他们有什么兴趣，有哪些物质资源，他们如何克服时局的艰难，如何规避法律？

很快，这所有的问题都通过一种生动的方式得以解答。

2

拖着长枪或把长枪当拐杖的卫兵跟在日瓦戈医生身后，将他送回车厢。那天天气闷热。大太阳炙烤着火车轨道和车皮。地上的黑焦油泛出了黄色的光，好似金黄的叶子。

卫兵用枪托在沙地里划出一道犁沟，刚好靠着轨道的枕木。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他说，“现在是春耕的时节——燕麦、大麦、小米——是最好的时候。不过，种荞麦还是有点太早。刚过来的路上，我们看到阿库里纳那一片已经种下了荞麦。不过，我的家乡不在那儿，我来自莫申科，属于塔姆波夫政府管辖。对了，医生同志，要不是因为这儿爆发了内战，再加上那些反革命作乱，你以为这种时节我还会浪费时间在其他事情上吗？阶级战争如同一

只乱蹦的黑猫，把我们这些原本在一起的人隔开来，看看它都做了些什么！”

3

车里有人伸出手，想拉日瓦戈医生一把。

“多谢，我可以的。”

尤里·安德雷维奇跃身上了车，站稳脚步后，他首先就抱住了妻子。

“终于回来了！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她说，“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安然无恙回来的。”

“你们知道？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什么都知道。”

“什么意思？”

“是那些卫兵告诉我们的。不然，我们怎么受得住这种打击？要知道，父亲和我都快疯了。现在

父亲睡着了，在那边，不要叫醒他，他之前太激动了。车上又来了几个新乘客，我待会儿介绍给你认识，不过你先听听大家在说什么吧——他们都在恭喜你，幸运地逃脱——喏，他来了。”冬妮娅突然转过头，把自己的丈夫介绍给一个乘客认识，那个乘客坐在客车车厢的后面。

“我叫萨姆德威亚托夫。”陌生乘客自我介绍道，同时他把头上的软帽取下，高举过众人的头顶，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萨姆德威亚托夫。”日瓦戈医生暗忖，“叫这种名字的人应该像俄国旧歌谣里的人一样，浓密的胡须，身着工作服，腰缠金属皮带。不过这个人却是留着灰白色的卷胡子，让你不由得猜想他来自当地的艺术俱乐部……”

“斯特尼科夫吓到你了吗？”萨姆德威亚托夫

问，“要说实话。”

“没有，为什么会被吓到呢？我们还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得说，他的个性真的很强。”

“这个我应该想得到。有人跟我讲了他的情况。他并非这儿的人，和你们一样，他也是莫斯科人。就跟我们生活里所有新奇的东西一样，他们同样是从首都莫斯科过来的——我们自己创造不出。”

“尤诺奇卡，这是艾菲穆·艾菲莫维奇，是个百事通。”安东尼娜又说道，“他听说过你和你的父亲，他还认识我的祖父——他认识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我想你肯定见过那个学校老师安提波娃了，是吗？”冬妮娅状似不经心地问道，而萨姆德威亚托夫同样漫不经心地问：“安提波娃怎么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听到他们的对话，并未说什

么，冬妮娅接着说道：“艾菲穆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尤诺奇卡，他会看着你的。所以有他在的时候，你可得管好自己的嘴巴。”

“真的吗？这我可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他是艺术家呢。”

“我父亲开了一个旅馆。”萨姆德威亚托夫说道，“他有七辆三驾马车在路上跑。不过我去上了大学，没错，我确实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尤诺奇卡，听听艾菲穆告诉我的事情吧。说到这儿我要冒昧地说一句，艾菲穆·艾菲莫维奇，你的名字还真是拗口！——听着，尤诺奇卡，我们真的算是非常幸运。我们不能在尤里安提换车——大半个城都付之一炬，桥也断了，没办法过去。我们现在乘坐的这列火车也会改另一条线，那条线刚好是我们到托费亚纳亚的必经之路。很棒吧！这样一

来，我们就不用换车，不用把行李搬来搬去了。另外，出发前我们还得在城里逛几个小时。艾菲穆·艾菲莫维奇告诉我的就是这些。”

4

安东尼娜说得没错。一列列车厢时而解开，时而套紧，因为很多路线都堵了车，火车只得不停地换轨。

远处的城市一部分被绵延的山村挡住了，只是不时能见着高楼的房顶，工厂的烟囱，还有屹立在地平线上的钟楼。城郊的部分地区也被烧着了，烟雾蔓延空中，好似一匹匹巨马啸西风。

日瓦戈医生和萨姆德威亚托夫席地而坐，两人的双腿荡在两边。萨姆德威亚托夫不停地指向远方，给尤里·安德雷维奇讲解所见之物。火车不时地紧急刹车，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萨姆德威亚托夫干脆凑到日瓦戈医生耳边，重复之前说的话，喊得他嗓子都哑了。

“那间房子曾拍过电影，‘巨屋’，也被付之一炬了。军官学校的学生之前还守过一段时间，不过后面也投降了。不然，这场仗还不会结束。你看到钟楼上的那些黑点了吗？那是我们的人，正咒骂着捷克人。”

“我没看到呀。隔这么远的距离，你怎么还能看清楚？”

“那是艺术家的聚集地，可可里基，也被大火吞噬了。有很多商店的克洛德耶沃中心还在那头。我之所以关心这个，是因为我家的旅馆也在那儿。幸运的是，这场火并不算太大，不会扩散。到目前为止，商业中心还没遭受多大损毁。”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我说城中心，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大教

堂、图书馆这些地方……说到我这个名字，萨姆德威亚托夫，其实是断章取义过来的，本来应该是德米多夫。”

“我还是听不清。”

“我说萨姆德威亚托夫取自德纳托。他们说我们其实是德米多夫家族的分支，就是德米多夫·圣·德纳托王子家族。不过，这可能也只是一个家族传说。这个地方叫斯佩克谷地，有很多的避暑别墅和游乐园。很奇怪的名字，对吧？”

火车行至一片阡陌纵横的田野。在火车上的人看来，路旁的电报杆好似一个穿着七层皮皮靴的巨人，大步奔向地平线；飘着丝带的公路则与铁路相得益彰。蜿蜒的公路一下子消失在天际，一下子又在某个转弯处出现，然后再次消失。

“那是我们最有名的公路，横穿西伯利亚。那些被流放的人还曾经歌唱过它，不过现在成了游击队的大本营……你会喜欢这儿的，毕竟它并非一无是处。你会习惯它，会喜欢上这座城市各种神秘古怪的事物。就拿我们的水管来说，女人们会排着队在十字路口取水，那是属于她们的冬日聚会。”

“我们并不住在城里。我们要到瓦利吉诺去。”

“我知道，你的妻子已经告诉过我。不过，你办事总得到城里来吧。我一看到你妻子，就知道她是谁。她完全继承了克鲁格家族的外貌特点——那眼睛，那鼻子，那额头——跟她祖父一模一样。这里所有的人对她祖父都是记忆犹新。”

田地里有许多圆形的红色油桶，木制的公告板上挂着巨幅的广告。其中一幅广告吸引了日瓦戈医

生的目光，上面写着：

莫勒&维奇金，插秧机，收割机，唧唧复唧唧。

“那家公司很不错。他们生产的农业机械实属一流。”

“我听不清，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那是家好公司。听得见吗？一家好公司。是做农业机械的，是个公司。我父亲还曾经是那家公司的股东。”

“你不是说他开着一家旅馆吗？”

“这个没错。但那并不代表，他就不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呀。我父亲在投资方面相当精明，他还投了‘巨人’公司呢。”

“听起来，你还挺为此自豪的。”

“为我父亲的精明？那是当然。”

“可你不是无产主义者吗？”

“天啊，这跟我是不是无产主义者有什么关系呀？难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非得是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吗？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科学，是一种关于现实的理论，一种历史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跟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的人谈论这个话题，可得冒点风险。不过，我还是得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都不确定，不能称其为一种科学。科学需得更平衡更客观。我觉得，再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以自我为中心更偏离现实的理论了。所有人只在乎如何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来证明自己，至于当权的人，他们只热切地想要创造

一个不错的神话，所以不顾一切地罔顾事实。政治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不喜欢那些罔顾事实的人。”

萨姆德威亚托夫听了日瓦戈医生的话，只当他是开玩笑的。所以，他还是面带微笑地听着，并没有反驳他。

火车仍在转轨。每次要打“走”的信号，一个腰带上挂着牛奶罐的老妇人——她是值班的转轨员——就会弯下腰，移动控制杆，将火车送回去。火车缓缓驶离之后，老妇人便坐下身，对着远去的火车挥动拳头。

萨姆德威亚托夫注意到了这细微的举动，却以为那老妇人是对着他挥舞拳头。“她为什么要那么做？”他想，“她的脸看着有点熟悉。难道是图特塞娃？不可能是格拉莎，她看着年纪要大许多。不管怎么说，她跟我能有什么过节呢？我想，肯定是

因为社会动乱，铁路上的事务也是一团糟，那个老东西日子不好过，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哦，去死吧！我干吗为她费脑筋呢？”

过了一会儿，老妇人挥动手中的旗帜，对火车驾驶员叫喊了几句，便让火车经过信号站，驶进空地。不过第十四节车厢经过老妇人身边的时候，她却对着两个坐在地板上聊天的男人吐出了舌头。萨姆德威亚托夫想：“她肯定是又发神经了……”

5

城郊的风景，圆形的油桶，电报杆和广告牌逐渐消失在天际，取而代之的是满目的森林和低矮丘陵，以及不时掠过眼前的蜿蜒公路，萨姆德威亚托夫说：

“我们回到座位上去吧。我很快就要下车了，你再过两个站也要下了。可千万别坐过站了。”

“看来，你对这个地方相当熟悉呀？”

“了如指掌。方圆百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你知道的，我是一名律师，已经干了二十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总是得四处跑。”

“即便现在也是？”

“当然。”

“但这种时日，还能有什么官司呢？”

“任何事都可能。故人争端，商业纠纷，合同纠纷。总之，我忙得不行，没有一点闲工夫。”

“但这些活动不是都取缔了吗？”

“名义上当然是这样。但实际上，人们还是得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事又是彼此排斥的。现在说是要执行私营企业公有化政策，但苏维埃政府需要燃料，地方经济委员会需要交通运输。大家都想活下去。这是一段过渡期，理论和实践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时候，大家尤其需要像我这样精明且掌握资源的人。不过，傻人有傻福，我父亲常说，聪明有聪明的好处，傻也有傻的福分。现如今，半座城的人都靠我来保命。可能就这一两天，我会到瓦利吉诺去处理一件跟木材有关的官司。不过，现在还有其他事务缠身，暂时过去不了。去那

儿只能骑马，这么不巧，我的马又刚好瘸了一条腿。不然，我也不会上这个烂车，就是一堆破铜烂铁。你看慢成什么样，还好意思叫火车呢！在瓦利吉诺生活，你应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跟米库力特辛也很熟。”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去那儿，去那儿是想做什么吗？”

“多少能知道一些。我想，大概是想着叶落归根回归土地吧。你想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没错吧？”

“怎么呢？听起来你似乎不怎么认同呀。”

“这种想法有点天真有点傻，但又何妨一试呢？祝你好运。只是我自己不相信而已。乌托邦，就跟艺术那些东西一样，都是虚的。”

“你觉得米库力特辛会接受我们吗？”

“他不会让你进门的，说不定会用扫帚把你赶出去，他这样做也没错！他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呢。工厂开不了工，工人们都跑了，没有生活来源，连饭都吃不饱。现在，你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哪怕是杀了你，也是情有可原的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却不否认生活现实——这简直是疯了，是一个可笑的噩梦。”

“没错。但这却是历史的必然，这个阶段必须要熬过去。”

“为什么说是必然？”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明白呀？你是从火星来的吗？贪婪的资本家和吸血鬼把饥寒交迫的

工人逼得走投无路，你觉得那种生活还能继续吗？更不用说以各种名义实施的暴政和独裁了。难道你不理解人民的愤怒是正当的，他们只是渴望公平，渴望真理吗？或者，你觉得这种彻底的变化能通过杜马，通过议会手段实现？我们只需动动嘴皮子，无须专政，沙俄政府就会给我们民主与自由？”

“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哪怕再争论上一百年，也不会说到一块儿去的。我曾经也有很多革命思想，但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通过残忍的暴力得到，只能以善制恶，以善得善’。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说回米库力特辛——如果等待我们的是这样的结局，那我们何苦再去碰钉子呢？看来，我们应该打道回府。”

“胡说。首先，米库力特辛又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其次，米库力特辛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可

以说是太过善良了。他一开始肯定会拒绝会抗拒，但之后一定会妥协让步的。他会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你，跟你分享最后一块面包皮。”然后，萨姆德威亚托夫给尤里·安德雷维奇讲起了米库力特辛的故事。

6

“二十五年前，米库力特辛从彼得堡来到这儿。他曾是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后来被驱逐出境，并受到了政治监视。米库力特辛到了这儿，在克鲁格家找到了一份管家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当时我们这儿有四姐妹相当出众——比契诃夫戏剧里的角色还多一个——分别是图特塞娃、艾格里皮娜、阿芙多提亚、格拉菲拉和塞拉菲玛。年轻小伙子们纷纷追求，米库力特辛后来娶的就是四姐妹中的老大。

“没过多久，两人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崇尚自由的父亲，给儿子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里贝尔斯，昵称里瓦卡。里贝尔斯渐渐长大，尽管性子有些野，但天赋异禀。战争爆发那一年，里贝尔斯刚好十五岁。他篡改了出生证明上的生日，并志愿去前线打仗。身体本就不好的母亲如何能承受得

了这种打击？她一病不起，再也没有起来过。前年，恰好是在革命爆发的前夕，里贝尔斯的母亲去世了。

“战争结束后，里贝尔斯身挂三枚奖章以英雄上尉的身份荣归故里，而他在前线自然已被灌输无产阶级主义思想。你听说过‘森林兄弟’吗？”

“没有，恐怕没有听过。”

“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故事也就没多大意义了，至少会失掉一半的意义。其实，你盯着窗外的公路看，也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时代，公路还有什么特别的吗？游击队，参加游击队的是哪些人？其实就是内战时革命军的主心骨。这支军队之所以会这么厉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组织推翻了革命时期的权力组织；二是普通士兵在最后一场战役后拒绝听令旧的权力组织。在这两个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就有了游击队。其中大多数人是中层农民，但也不尽然——还有贫下中农，被解除僧职的僧侣，富农的后代。除此之外，参加游击队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身份证明的流民，因故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另外还有相信了自由和遣送回国等允诺的德国及奥地利俘虏。这支部队的其中一股势力被称为‘森林兄弟’，而森林兄弟听令于‘森林人’。说到这名‘森林人’，其实就是里瓦卡——里贝尔斯·阿瓦凯耶夫奇——米库力特辛的儿子。”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故事还没讲完呢，米库力特辛在妻子过世之后，又娶了一个女人。他的第二个妻子名叫艾莉娜·普鲁克罗夫纳，才刚从学校毕业，就走上了婚礼的圣坛。艾莉娜本性天真，但有时候她还

得故作天真；尽管她已经很年轻了，但她还是要装得年纪更小，装成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一朵纯洁的百合花。每次一看到你，她就会对你提出各种问题，跟盘问似的：‘苏瓦洛夫什么时候出生的？计算三角形等式三角。’若你回答不上来，她就欢欣雀跃。不过，接下去的几个小时你还是会被她缠住。

“那个老头自己也很古怪。他原本是要去当一名水兵，修读的也是水上工程学。他的胡子总是剃得干干净净，烟斗从不离口，说话的声音低缓而友善。跟所有抽烟的人一样，他的下颌也有一些抖纹，眼神略显冷漠。哦，我还忘了一个小细节——他也是社会革命党成员，还曾被选作党代表参加议会。”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现在是父子对立的情

况吗？政治敌人？”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不过实际上，森林人游击队并不攻击瓦利吉诺。咱们继续讲故事。话说剩下的图特塞娃三姐妹——米库力特辛的小姨子们——直到今日仍住在尤里安提，并且都未嫁人——岁月流逝，过去人见人爱的漂亮姑娘如今也是人老珠黄。

“年纪最大的阿芙多提亚是公共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她肤色黝黑，模样俊俏，但特别地害羞，稍微被人一说就脸红得跟个苹果似的。阿芙多提亚在图书馆工作的时日并不快乐。图书馆安静得跟古墓一样，那可怜的姑娘患上了慢性感冒——不停地打喷嚏，看着好似随时会掉进地底下似的。精神极度敏感。

“老二格拉菲拉·塞维利诺夫娜是家里的福星。

她驾驶技术一流，工作认真，从不挑剔自己的工作。里瓦卡，也就是森林人，跟她其实挺像的。今天她还是个女裁缝或在一个袜子厂里工作，但明天你可能就发现她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个理发师。你看到那个火车转轨的时候对着我们挥动拳头的老妇人吗？我想，那说不定就是格拉菲拉跑到铁路上工作去了。不过，我不能很确定，因为那个转轨员看着太老了，比格拉菲拉实际的年龄大出不少。

“再说到最年轻的塞拉菲玛，这可是全家人的心头病，总是给人惹麻烦。塞拉菲玛上过学，喜欢读书，以前还迷过诗歌和哲学。可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受了一些言论和游行的影响，她开始相信宗教，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精神也有点不太正常。其他姐妹去上班的时候，只好将她锁在屋子里，哪曾想她自己从窗子跳了出去。到了街上，她便聚集过路行人，宣扬迷信思想，说世界末日就要

来临。好了，我就要到站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你到下一站也该下车了，最好提前做好下车准备。”

萨姆德威亚托夫下车之后，安东尼娜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但我觉得他是上帝派过来帮我们的，肯定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很有可能，亲爱的冬妮娅。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家似乎都认得出你是克鲁格的孙女，这儿的人又对克鲁格印象深刻。即便是斯特尼科夫，我一说‘瓦利吉诺’，他就语带讥讽地问我们是否是克鲁格家族的继承人。

“我担心，我们离开莫斯科是为了避免麻烦，到了这儿恐怕会更被人家怀疑。既然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现状，那怨天尤人也是没有用的。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低调一点，不要引起旁人过多的注意。大体上来说，我对整个形势不太乐观……不过我们已

经快到终点站了，还是先去叫醒其他人，做好下车前的准备吧。”

7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站在托费亚纳亚火车站的站台上，一遍遍地清点人数和行李，以防有东西落在火车上。尽管已经踏实地踩在了站台的地上，但那种担心下错车的焦虑还是在安东尼娜心里挥之不去。火车已经停稳了，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但不知怎的安东尼娜就是感觉耳边还是火车那轰隆隆的巨响。所以，她没办法正常地观察、聆听或思考。

还未抵达终点的乘客热情地跟他们挥手告别，但安东尼娜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她也没有注意火车已经渐渐远离，直到她看到眼前一片片绿色田野和轨道上方蓝色的天空时，才反应过来火车已经走了。

火车站是用石头砌成的，入口的两边各摆着一

条长椅。日瓦戈一家人是唯一在托费亚纳亚火车站下车的旅客。他们将行李放到地上，在门口的一条长椅坐下。

他们被火车站的沉寂、空荡和整洁惊住了。这儿竟然没有成群结队叫卖的摊贩，没有推推搡搡的旅客，实在有些古怪。看来，历史还没有影响到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它并未跟首都莫斯科一样，陷入一种野蛮的状态。

火车站设在一个桦树林子里头，火车缓缓驶近时，一个个车厢便会隐入森林的黑暗中。此时，婆娑的树影拂过他们的手和脸，拂过地面和火车站建筑的墙面及屋顶，拂过站台那干净又潮湿而泛黄的沙地。林子里略显阴冷，就连树林里鸟儿的叫声也透出一种寒冷的气息。无辜的鸟儿如往常一般地叫着，叫声在整个林子里回响。林子里有两条路——

一条是铁路，还有一条是乡间小路——都掩映在树影里，高大的树枝好似长袖一样在路的上方摆动。突然，安东尼娜的眼睛和耳朵打开了。她一下子回过了神——鸟儿的叫声，森林的静寂，流动的空气。她甚至都在心里准备好了演讲词："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安全抵达了这里。知道吗，那个斯特尼科夫当然能假装大度，然后等我们一下车就指示火车站的人把我们给抓了。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会这么慷慨，这里头有诈。"但看到眼前这迷人的画面时，安东尼娜说出的却是另一番话："好美啊！"她叫道，此后也不再能说出旁的话。安东尼娜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不由得大哭起来。

听到安东尼娜的哭声，一名穿着火车站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老头从旁边的屋子里出来，并朝日瓦戈他们走来。他用手微微碰了碰头上的红顶帽以示招呼，并礼貌地问：

“这位女士需要镇静剂吗？火车站的药箱里还有一点儿。”

“哦，不用了，谢谢您。她过一会儿就好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道。

“看来，是由于旅途劳累和过度焦虑所致，再加上这热得死人的天气。要说我们这么高的纬度，不该有这么高的温度呀。估计，尤里安提的不幸事件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在火车上看到了那场大火。”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们应该是从俄国中部过来的？”

“从俄国的心脏。”

“哦，是莫斯科来的！那这位女士如此神经紧

张，就有点让人费解了。他们说，莫斯科可是一栋完整建筑都不剩了呀，全毁在了炮火中。”

“情况也没那么坏，人们总喜欢夸大其词一点。不过，我们确实见过很多房子都化成了灰烬。这是我的女儿，那是她的丈夫，那是他们的小儿子。另外，这个是他的护士，纽莎。”

“你们好，你们好。认识你们我很高兴。萨姆德威亚托夫打电话来说，来自莫斯科的日瓦戈医生将带着家人过来，他要我尽力行方便。看来，他说的就是你了，对吗？”

“哦，不是，日瓦戈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在那儿。我是一名化学教授，名叫格罗梅科。”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很高兴认识你。”

“这么说，你认识萨姆德威亚托夫了？”

“谁不认识他呢，他可是个神人！要是没有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恐怕我们这些人早就死了。他要我尽可能地帮你们，我说没问题。既然我答应了，自然就会做到。所以，要是你们需要弄匹马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对了，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我们想去瓦利吉诺。离这儿远吗？”

“瓦利吉诺！我刚刚就在想你女儿似乎跟一个人很像，这就怪不得了！原来，你们是要去瓦利吉诺。这就说得通了！这条路还是老克鲁格和我一起修起来的呢。我马上就去弄马，待会儿再叫个人驾车，乘马车过去——多奈特！多奈特！先把这些东西放到候车室里。弄匹马来怎么样？你们先到茶室喝杯茶，待会儿再商量。今天早上巴克斯还在这儿转悠呢，要是他还没走就好了。告诉他们，有四个

人要到瓦利吉诺去，是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对了，他们的行李很少，这也得说。话要说清楚。姑娘，作为长辈，我能给你一点建议吗？不管你跟伊万·俄奈斯托维奇究竟有多亲近，别人问起的时候，你可得小心回答。你不能随便跟人说这些话，怕惹祸上身。”

听到巴克斯的名字，日瓦戈他们惊得面面相觑。他们都还记得安娜·伊娃诺夫娜讲过的那个神奇的铁匠，说是他给自己打了一副金刚不坏的铁衣。反正，安娜曾给他们讲过好多有关他的奇闻逸事。

8

牵来的马是一匹刚生完小马崽的母马，车夫则是一个垂耳的老人，顶着一头蓬乱的白发。反正老人全身都是白的——他那用桦树皮做的鞋子也许是没有时间涂黑，身上的亚麻衬衫和裤子则因为穿得太久而泛出了白色。

小马崽个子小小的，鬃毛打着卷，黑炭一样的颜色，就跟一个上了漆的玩具，跟在母马的后面踢腾着那软软的腿儿。

日瓦戈他们爬上马车，一路颠簸个不停。不过，他们的心是平静的，梦马上就要成真了，他们的长途跋涉马上就要结束。落日慷慨地照着大地，似乎也想延长这辉煌的时刻。

马车时而驶进树林，时而穿过开阔的田野。每

次马车穿过森林，车轮不小心碰到某棵大树的树根时他们就会被震得跳起来。日瓦戈他们只得皱着眉头弯腰弓背，紧紧贴着彼此。每次来到开阔地带，车夫就把马车驾得飞快，老车夫的帽子似乎都要飞起来了。而日瓦戈他们也终于能坐直身子，舒一口长气，舒服地坐一会儿。

这是一个多丘陵的山村。并且，每座山都不一样。远方的山巍峨壮丽，好似骄傲的黑影，沉默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田野对面的山则相对平缓一些，那柔缓的线条仿佛在安慰他们，给他们希望。

所有的一切都让日瓦戈他们赞叹不已，尤其是老车夫跟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俄国的古老谚语，鞑靼格言，本地奇闻，还有他自己的逸事。

每次看到小马崽落在了后头，母马就会停下来

等它赶上。只见小马崽欢悦地奔过来，步伐优雅，但一走近马车，它的动作就笨拙了许多。它的两条长腿紧紧地靠在一起，使劲往外伸脖子，并把头伸到母马的身子下面。

“不过，我不确定。”安东尼娜转过头面向丈夫，不过她说得很慢，因为马车太过颠簸，她担心颤动的牙齿会不小心咬到舌头：“这会是母亲跟我们说的那个巴克斯吗？你还记得安娜跟我们说，那个铁匠巴克斯在一次打斗中给人开了膛，于是给自己做了一副铁衣？铁人巴克斯。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否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呢？这个巴克斯又是否跟安娜讲的巴克斯是同一个人？”

“不会，当然不会。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不过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母亲还说，她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了上百年。不过我

们不要讲这么大声，可别伤害了那个老人的感情。”

“他听不见的，他是个聋子。哪怕他听见，他也不会明白——他有点头脑不正常。”

“嘿，菲奥多·奈菲奥迪奇！”老人叫唤他的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自己的马取一个男人的名字，尽管所有人都看得出那是一匹母马。“这该死的天气！热得死人！我诅咒这魔鬼！说的就是你，你这笨手笨脚的。”

有时，老人会突然唱起以前的老歌来，那歌是在克鲁格以前的一个工厂里作的。

再见了，我的办公室，

再见了，我的拍杆。

主人的面包发臭了，

可我只想喝水。

一只天鹅游过海岸，

在水里跳舞。

让我摇摆的不是酒，

而是要去参军的瓦尼亚。

可是我，玛莎，我不会迟疑；

可是我，玛莎，不是傻瓜。

我会去赛利亚巴城，

我要去为塞特里克哈工作。

“哦，你这该死的畜生，瞧瞧那只吃腐肉的秃

鹭。我抽它一鞭子，它就咬我一口。哦，菲奥多·奈菲奥迪奇，你真决意要去吗？——那个森林是一个针叶林，没有边际。里面的游击队也是不可胜数，森林兄弟就在那里头——哦，菲奥多·奈菲奥迪奇，你又停住不走了是吧？”

就在这时，老人猛地转过头，直直地看进安东尼娜的眼睛里。

“姑娘，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你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姑娘。我要是连你都认不出来，那可真算是我瞎了！我当然认得你！只是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跟格里格夫[(1)]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不会是他的外孙女吧？还有谁比我更熟悉格里格夫家的人呢！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他工作。我给他做过各种各样的活——在矿场里当木工，给他拉绞盘，料理马厩。马儿，快点跑！怎么又停下

了，跟没长脚似的！天使啊，难道你听不见我在跟你说话吗？”

“哦，你刚刚问，我是不是那个铁匠巴克斯。小姑娘，你真是个傻瓜，两只眼睛长这么大，却是这样地傻。你们说的巴克斯，名叫帕斯坦诺戈夫，铁人帕斯坦诺戈夫，不过他五十年前就进坟墓了。我的名字是麦克霍诺辛。我跟帕斯坦诺戈夫教名一样，但姓氏并不一样。”

然后，老人又自说自话地把米库力特辛的故事讲了一遍，而这些事情萨姆德威亚托夫已经跟他们讲过。老人称呼日瓦戈他们为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他说老板的第二任妻子名字就叫米库利奇娜，第一任妻子是个“天使”，一个“白白的小天使”。里贝尔斯当了游击队的首领，知道他自己的名声还不为莫斯科的人知晓，并且那儿的人也没听

过“森林兄弟”时，他简直不敢置信。

“他们没有听过？他们没有听过‘森林人’？那莫斯科的那些人长耳朵是干什么用的？”

很快，夜幕降临。人影被拉得越来越长，投射在前方。马车驮着他们穿过一片平坦荒芜的地方。那儿四处都是高高的藜属植物或柳草，也有顶着花簇的蓟草。杂草的影子投射在地上，犹如鬼魅一般，注视荒芜的平原。

再往前，平原的尽头是绵延的山脉。高耸的山峰犹如一堵堵墙横在道路的两边，山的那边也许是峡谷，又或者是溪涧。远远看去，似乎有一座堡垒横在天空之下，而脚下的路就是通往那堡垒的入口。

就在那最高的山峰上，矗立着一片一层楼高的

白色楼房。

“看到那座山上的监视哨了吗？”巴克斯问，“那就是你们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那下面是一个水沟，我们这儿的人都称其为‘沙特马’。”

这时，从山上传出两声枪响，枪声在山谷间回荡，经久不绝。

“那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游击队员想射杀我们，老爷爷？”

“上帝保佑你，不会的！游击队，怎么可能？那是斯泰帕尼齐在驱赶‘沙特马’水沟里的野狼呢。”

9

日瓦戈一家人跟米库力特辛第一次见面是在主人房的院子里。那让人痛苦的一幕是以沉默开始，以喧闹结束的。

当时，艾莉娜·普鲁克罗夫纳正从树林里出来，穿过院子往家里赶。落日的金色余晖照在艾莉娜的金色长发上，更显柔美动人，瘦长的金色影子在树与树之间晃荡。艾莉娜穿着一条轻盈的裙子，走得热了，便用手帕擦拭脸颊。她把草帽反挂在背上，束带则横在脖子上。

艾莉娜的丈夫米库力特辛正从山谷的那一边赶过来接她，身上还背着一把枪。不过，米库力特辛背这把枪出来是想给它修理一下，因为他注意到枪出了点问题。

突然，巴克斯驾着马车过来了，打破了这原本平静的见面。日瓦戈一家人的出现，让米库力特辛倍感惊讶。

日瓦戈他们从马车上下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则忙戴上帽子，试图解释。

米库力特辛愣在了原地，双方的沉默持续了好几分钟。反正，当时的场面尴尬至极，不仅是直接牵涉其中的人，就连萨沙、纽莎和巴克斯他们也是不知所措。这种折磨人的尴尬甚至连同拉车的母马和那黑毛的小马崽，金色的落日都感受到了，还有那绕着艾莉娜·鲁克罗洛夫纳嗡嗡飞舞并最终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飞虫。

最后，还是米库力特辛打破了这种沉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永远都不会懂。你们想怎么样？你们以为这儿遍地是面包？你们为什么要来折

磨我？究竟是为什么，你们要来这儿？”

“我想，你是否应该考虑到你对斯特帕诺维奇的责任？”

“尤诺奇卡，你别插嘴。是的，你说得对。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负担？”

“哦，皇天在上！你误会我们了。我们真的无意冒犯你，或者打扰你的生活。我们要的只是很少一点东西，我们不过是想在那空置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找一个角落落脚，然后再要一块因为没有人愿意要眼看就要荒废的空地，这样我们就能在上面种点青菜。再趁没人的时候，从森林里弄一车木头出来。难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很难以接受吗？”

“这不过分。只是世界这么大，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呢？况且，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

们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

“因为我们听人讲过你，但愿你也听过我们，这样我们也就不算是完全的陌生人。”

“啊！所以是因为克鲁格喽！因为你们是他的亲人！可你们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提起这一茬呢？”

“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正因为你跟克鲁格有亲戚关系，这时候你才不应该来找我们。”

“尤诺奇卡，别插嘴。不过，我妻子说得也没错，你们真来的不是时候。”

那会儿，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来得及把萨姆德威亚托夫描述的米库力特辛跟真实的他进行比对。在那种尴尬的时刻，日瓦戈医生也基本上忘了萨姆德威亚托夫的描述。后来，事情渐渐告一段落，他才突然想起萨姆德威亚托夫描述的米库力特辛和真实

情况是多么相像。不过，艾菲穆·艾菲莫维奇对米库力特辛的性格描述不是很完整，尤里·安德雷维奇自己又做了一些补充。

斯特帕诺维奇是用波兰语的方式发“l”这个音，所以听着就跟“w”似的。事实上，斯特帕诺维奇从来都是烟斗不离口，而他之所以会是这种发音其实是因为脸上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每次思考或说话的时候，他老想着矫正那东西。

斯特帕诺维奇五官端正，看着和常人并无区别。他经常把头发撩到背后，大踏步地往前走。夏天，老喜欢穿一件带丝质流苏的衬衫。要放在旧时候，像斯特帕诺维奇这种人，很可能会变成伏尔加河上的海盗，但如今，他却摇身一变，梦想家成了教师。

米库力特辛的青年时代全部献给了解放和革命

事业，他只害怕不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到来，或者说害怕革命的胜利是以太多的牺牲和流血换来的。现在，革命成功了，结果却是完全超乎他想象的。但他生来就是无产阶级，也曾亲身参与成立工厂委员会，将工厂移交给工人，所以骨子里的想法很难改变。因此，米库力特辛选择了远离红尘，远离工人，在这偏远的山村过与世无争的日子。没曾想竟碰上日瓦戈一家人找了过来，这不是荒唐吗？克鲁格家的这些不速之客似乎是命运派来跟他开玩笑的，是故意整他，而他根本玩儿不起。

“这没道理。你知道这会让我置于何种险境吗？我一定会被你们逼疯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非得来这儿？我真不明白，怎么着都不明白。”

“如果你不在这儿，你知道我们又会陷于何种

境地吗？”

“等会儿，尤诺奇卡。我妻子说得很对。你们没来，事情就已经是一团糟了，现在再加上你们，简直是不得了。都乱套了，乱成一锅粥。我现在是到了悬崖边上，进退两难。我的儿子是红军那边的，是个共产党员，受到人民爱戴；而我又被选作党代表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结果谁都不高兴，我连个能诉苦的人都没有。现在又是你们！要是因为你们，给我招惹来一支火枪队，那我可真是敬谢不敏了！”

“哦，天啊！冷静点吧。你这是怎么了！”

过了一会儿，米库力特辛变得温和了。

“哦，把你们拦在院子里也没什么用，我们还是进去说吧。当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但现

在是两眼一码黑，也只能等船到桥头自然直了。我们不是土耳其士兵，也不是粗鲁的异教徒，所以还是先给你们找个住处——就住我书房的隔壁吧。稍后，我们再看能让你在哪儿落脚，或许能在园子里找个地方。现在先进屋，巴克斯，把那些东西也搬进来，帮客人一把。”

巴克斯按米库力特辛说的办，只是嘴里嘟囔着：“天啊！他们的行李这么少，跟朝圣者似的！只有一些小包袱，连个箱子都没有。”

10

夜凉如水。日瓦戈他们洗掉一身风尘，女人们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萨沙原先一直天真地期待会有人热情地在门口迎接他们，结果弄这么一出。他觉得很难过，因为没有人注意他，他的希望落空了。萨沙看到小黑马没有进屋更加失望，所以父母厉声呵斥他别吵时，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他担心自己会被送回那个卖婴儿的店子——萨沙一直相信自己就是父母从那个婴儿店里买来的。萨沙是真的很害怕，所以他想跟周围的人分担这恐惧，但他的这种行为却意外地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歇下，大人们似乎比往常更匆忙，全都沉默地做着自己的事。萨沙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憋了一肚子火。冬妮娅费了好大劲才让他吃了东西上床睡觉的。最后，萨沙终于睡着了。于是，米库力特辛的女仆乌斯提尼亚过来带纽莎到她的房

间里去，给了她一些东西吃，还给她讲这屋子里的秘密。安东尼娜、日瓦戈医生和亚历山大则被米库力特辛请去喝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雷维奇最先来到走廊上，呼吸一丝新鲜空气。

“这儿的星星真多呀！”亚历山大不禁感叹道。

夜色如墨，两个人尽管只隔了几步远，但还是看不清彼此。身后的窗子透出一点灯光，斜斜地射入山谷里。渐渐地起了雾，灌木、树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都被这夜雾掩盖。日瓦戈和亚历山大往旁边走了几步，因为屋子里透出来的一点亮光反倒让周围显得更黑了。

“明天，我们首先得去看看米库力特辛准备让

我们落脚的房子，如果还过得去的话，我们就得马上动手修理。另外，一把房子的主架搭出来，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打床。他不是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土豆苗吗？”

“他是这么说过。他还答应给我们一些其他的种子，这可是我亲耳听到的，作不得假。至于他准备让我们落脚的地方，其实穿过这个园子的时候就看到了。你知道是在哪里吗？就是连接主建筑的那个房子，因为杂草太高了，你可能没看见。尽管这栋主楼是石头砌的，但那却是一个木头房子。我还指给你看过呢，记得吗？我之前还想着在那个地方种菜呢。我觉得，那儿以前应该是个花园，至少远看上去像是花园，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以前种花的土壤肯定很肥，我猜那块地现在还是挺肥沃的。”

“这个不好说，我们明天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不用说，那个地方现在肯定是杂草丛生，土坚如铁了。这个房子肯定还有个菜园，也许我们能在那儿种菜。看这情形，今晚肯定得打霜。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安全地到这儿了——这已然是万幸，我们得感恩才行。这是个好地方，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也不错，尤其是米库力特辛。他的妻子有点做作，也许是因为她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我想，她说那么多废话且故意装傻，应该是想转移我们对她长相的注意力，以免给我们留下太差的印象。另外，她忘了取帽子，就那样把帽子挂在脖子上走，应该也是有意为之。”

“好了，我们该回屋了，不能让人觉着我们不礼貌。”

正当日瓦戈医生和岳父穿过黑漆漆的书房往餐

厅走，安东尼娜却已经在挂灯下方的圆桌旁坐下，陪着主人米库力特辛喝茶。

走到半截，日瓦戈医生看到有个房间的窗子开得有墙面那么大，俯瞰整个山谷。早先天还有点亮光的时候，日瓦戈医生就曾留意到站在这儿可以看到山沟和平原的景色，但巴克斯对此不以为意。窗子旁立着一张手工雕刻的桌子，也有半个墙面那么大。桌子上横放着一杆枪，但前后左右仍有许多空间，这就显得桌子更宽了。

现如今再次经过，房间的广阔视野，桌子的巨大尺寸还有房间的宽敞和精美装饰不由勾起尤里·安德雷维奇的羡慕之情。所以，走进餐厅后，日瓦戈医生对米库力特辛说的第一句话就跟这有关。

“你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呀！多么漂亮的书房，在里头工作感觉一定很好吧，定是灵感泉涌。”

“喝酒还是喝茶？味道浓一点还是淡点？”

“尤诺奇卡，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立体镜，是斯特帕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

“他到现在还是没有长大，也没有安家，尽管他为苏维埃政府从科姆齐那儿夺得了一个又一个地方。”

“什么科姆齐？”

“就是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跟红军作战，想要重建议会制度。”

“我们这一整天听到的都是对你儿子的夸赞。你肯定很为他自豪吧。”

“那些是在乌拉尔拍的照片——也是他的作品，照相机也是他自己手工做的。”

“哇，很棒啊！是用沙卡林做的吗？”

“哈哈，你在开玩笑吧，当然不是！我们这儿地处偏远，上哪儿弄沙卡林呢？不过，那确实是上等的糖。你没看到我在你的茶杯里放了糖吗？”

“当然！我看照片去了。这是真的茶，对吗？”

“肯定呀！这是茉莉花茶。”

“你究竟是怎么弄来这东西的？”

“我们认识一个魔术师一样的朋友。他算是一种新型的公众人物，左翼人士。这个朋友也是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官方代表。他把我们的木材运到城里，通过他的朋友关系给我们弄来面粉和黄油。把那个糖罐递给我，塞瓦卡。对了，你现在能告诉我格里博耶多夫是在哪一年过世的了吗？”

“我想，他生于1795年，至于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还要茶吗？”

“哦，不了，多谢。”

“这儿有个东西要给你们。但你要先告诉我《奈梅亨条约》的签署日期和签署国。”艾莉娜说。

“亲爱的，别折磨他们了。他们这一路风尘仆仆，还没缓过神来呢。”

“那我换一个问题。你知道透镜共有多少种吗？图像成真、图像反转、自然成像或逆转成像分别是什么时候？”

“你怎么会了解这么多的物理知识？”

“尤里安提有一个很厉害的科学老师，他既教男校，也教女校。我都不能用语言形容出他有多好。他简直是一个奇迹，讲解科学原理的时候，他的话浅显易懂，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对了，他叫安提波夫。他妻子也是一名老师。我们这儿的女生都对他着迷了，都爱上了他。但他后来志愿当兵去了，结果死在战场上。有人说造成我们苦难的斯特尼科夫就是死而复生的安提波夫。但那当然只是谣传，这不太不可能吧？不过，谁知道呢，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

---

(1) 老人是这么称呼克鲁格的。

第九章　瓦利吉诺

1

到了冬天，尤里·安德雷维奇的时间多了起来，他开始写日记。

他写道：

去年夏天，多少次我曾想对图特彻夫说：

美丽的夏天，迷人的夏天！

这是大自然的魔力！

可是，我想问你，

它如何就这样从天而降了呢？

为着家人和自己从日出忙到日落，亲自修建可以遮风挡雨的屋顶，种下将带来丰收的种子，这是何等的快乐。就跟鲁滨孙·卡索一样，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己成为自己的造物主。一次一次，让自己重生。

你头脑里的新想法层出不穷，奈何手上的事情停不下来；你在心里确定一个能通过体力劳动完成的目标，一心等待成功的喜悦来临；你连续六小时不停地挖土或捶打，烈日快要把你的身体烤焦——但你的心里是快乐的。这些转瞬即逝的想法、灵感、理论没被写到纸上，而是被你遗忘，其实这并不是损失，相反还是一种得

到。城市里的隐居者用浓黑咖啡和烟草来激发自己的想象和灵感，但他们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会让人上瘾的毒药，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我只能是这样了。我不会再宣扬托尔斯泰的苦行主义和回归土地的思想，也不再研究社会主义及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我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非在个人有限经历的基础上创建理论。我们只是一个特例，不适合用推论演绎的方法来讨论。同样，我们的经济也是混合的。我们自己种东西——土豆和蔬菜——但这只是一部分我们需要的东西；其他的所需只能依靠别的方法得到。

另外，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非法利用土

地。我们把法律撇到身后，掩饰我们的行为。从林子里砍下来的树木其实也是偷来的，不管那些林子是算作政府的财产还是克鲁格家曾经的财产，都不能成其为借口。由于米库力特辛的宽容，我们做到了这一切（他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一样）。并且这一切都是安全的，因为我们远离城镇，因为我们这些非法行为暂时不会为人知晓。

我已经不再行医，当然我也不再告诉别人我曾经是一名医生，因为我不想限制我的自由。但总还是有一些人听到风声说瓦利吉诺住着一名医生，所以他们长途跋涉来找我，给我带一只鸡或鸡蛋，或者是黄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不管我怎么说，他们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给我当作报

酬，因为他们觉得免费的行医肯定效果没那么好。只有付出了东西，人们才会对结果有所期待。所以说，我偶尔的行医也能给家里带来一点收入。不过我们的主要收入还是靠萨姆德威亚托夫——米库力特辛家也是。

萨姆德威亚托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看不透他。他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甘心为尤里安提的苏维埃政府效力。借助政府给他的权力，他本可以不花一分钱地征用瓦利吉诺的木材，并且他知道我们对此无法反抗；另一方面，只要他想，他完全可以中饱私囊，并且没有人会说什么。他无须贿赂任何人或跟任何人分享任何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这样照顾我们呢？他帮助米库力特辛，帮助这个地区所

有的人——比如说托费亚纳亚火车站的站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萨姆德威亚托夫奔波四处，给我们这些人弄来需要的东西。他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通晓共产主义理论，并且对这两个话题都能侃侃而谈。我感觉，如果他不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这么复杂——尽管这毫无必要——他也许会乏味而死。

2

过了一会儿，日瓦戈医生又在笔记本上写道：

我们住在一个木头房子里，有两间房，就在大房子的后面。安娜·伊娃诺夫娜小的时候，克鲁格把家里的一些特殊下人安排在这里头住——裁缝、管家和退休的奶妈。

刚来的时候，这里真是破败不堪，不过我们很快就把房子修整一新。在几个能工巧匠的帮助下，我们还在两个房间里修了火炉。管道也重新弄了，供热状况比先前更好。

原先这里有个花园，后来草长莺飞，花园渐渐地也就没了踪影。不过现在是冬

天，万物凋零，在白雪的勾勒下，花园的轮廓又显了出来。

我们很幸运，秋天天气温和，阳光和煦。这就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在冰冷雨季来临之前，给土豆苗挖好坑。不算我们还给米库力特辛的，最后我们还收了整整二十袋土豆呢。我们把收来的土豆放在地窖的一个大缸里，并用旧毛毯和干草盖上。冬妮娅做了两大桶腌黄瓜和泡菜，也都放在地窖里头。新鲜的包菜则是两棵两棵地挂在横梁上，沙地里埋着胡萝卜、甜菜、白萝卜，阁楼里还储存了不少的豆子。至于棚子里的烧火木，那是用到明年春天也不打紧。

我喜欢冬天地窖里的温暖气息。早晨

一推开门，那种混合着泥土、根茎、食物和雪水的味道就扑面而来，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而微弱跃动的光打在手上，带给你无比静谧的享受。

你出来，那儿还是黑漆漆的。门吱嘎一声响，或是你打了一声喷嚏，又或是脚踩积雪咔嚓咔嚓响，只见野兔从远处的包菜堆里迅速跳起，很快就没了踪影，只留雪地上错落的脚印让人遐想。不远处，猎犬开始吠叫，而它们这一叫就得很长时间才能消停。公鸡的打鸣已经结束了，默默地待着，也没其他的话好说。这样，天就破晓了。

除了野兔的脚印，无垠雪原上还有山猫踩出的花印，从这边横到那边，好似穿

线的珠子。山猫走路的姿势跟家猫差不多，也是一只爪子在前，一只爪子在后，他们说一只山猫晚上能走上十几英里的路。

我们特意给山猫设了陷阱，但经常是山猫没抓到却捕到了野兔。早晨起来一看，野兔的身子一半在雪里面，一半在外面，已经冻僵了。

起初，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春夏季，我们只能逼自己撑下去。现在有了秋天的丰收，在这冬天闲适的夜里，我们总算能真正地放松一阵子了。真得多谢萨姆德威亚托夫，是他给我们弄来了煤油，我们晚上才能支起煤油灯。女人们在一旁缝缝补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和我则坐着看书，兴起时还会大声读出来。屋子里的炉火烧得火热，而我作为指定的司炉，得负责及时地关上阀门以免浪费柴火。有时候炭木挡住了火苗，我就会把它移出来，扑灭余火然后使劲扔到雪地里去。扔出去的炭木好似火炬滑过夜空，细碎的火花照亮雪白而沉睡的草地，在晶莹雪花中嘶嘶作响，直至完全熄灭。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战争与和平》，《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普希金的其他诗作，还有俄国翻译的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克莱斯特的短篇故事。

3

春天临近，日瓦戈医生这样写道：

我想冬妮娅是怀孕了。我跟她这样说，她不相信，但我对此很确定。凭我这么多年的行医的经验，单从初期妊娠症状我就能准确判断，无须进一步的证明。

怀孕的时候，女人的脸部会有一些变化。这并不是说女人变丑了，而是她的外貌不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时候的女人是受她肚子里的孩子控制，她不再是一个人。失去对外表的控制确实让女人的容貌微微受损，脸色暗沉，皮肤粗糙，眼睛里闪着和平时不一样的光——这种光不是女人通常要的那种吸引人的光芒——好似她自己应对不了这些事情，于是忽视了自己

的容貌。

冬妮娅和我从未有过间隙，而这一年的共同劳作让我们比以前更加亲密。我看到了她的能干、坚强和不知疲倦，也看到了她处理事情的机敏，她是那种从来不会浪费时间的人。

在我看来，母亲孕育生命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情，这是母爱的体现，也是人类得以传承的根本所在。

怀孩子的时候，每个女人都会产生一样的孤独感，好似她被人遗弃了，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世界上。这种重要的时刻，男人往往表现得很冷漠，好似他与整件事情毫不相干，好似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女人独自孕育后代，将孩子放进摇篮中，给他温暖与安全。女人就这样沉默而充满爱怜地，哺育抚养自己的孩子。

人们要求圣母‘向她的儿子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赞美的话在嘴边流连：‘我的灵魂与上帝同在，我真心地赞美上帝，赞美我的主。上帝一视同仁，无论贫贱，爱护我们所有人。’母亲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才说这些话的。上帝会这样夸赞她：上帝就是你的荣光。所有女人都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对于每一个生为人母的女人来说，上帝与她们的孩子同在。伟大人物的母亲肯定熟悉这种感觉，其实，所有女人都是伟大人物的母亲——子女们最后没能变得伟大，这并不是她们的错。

4

我们每天都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品，读诗。萨姆德威亚托夫昨天过来，给我们带来了礼物——好吃的食物和点灯的煤油。然后，我们谈论了很久的艺术。

我一直觉得艺术并非一个类别，也不是各种概念和现象的总概括。相反，我觉得艺术是一种相对集中并且有严格限制的事物。它是一种贯穿所有艺术作品的理念，是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力量，是经由艺术作品体现的真理。我从来不觉得艺术是一种形式，相反，我觉得它更像是隐藏起来的内容。在我看来，这是再清楚明显不过的事。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到我的骨髓里，但我却很难向别人表达或者就此给出一个定义。

文学作品有多种方式吸引读者——主题、对象、情境、人物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艺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罪与罚》动人至深，不仅仅是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故事，而是因为它的艺术性。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俄国艺术——我想，这都是上千年积累而成的艺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想法，一种关于生命的表达，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无法分割。如果某部作品包含艺术也包含其他元素，那艺术元素将是其中最重要的，会成为这部作品的精华、主旨和灵魂。

5

感冒，咳嗽，也许还有点发烧。整天气喘，感觉喉咙里卡了东西。我身体不舒服，是心脏出了问题。初期症状跟母亲的病情相似——母亲一辈子都受这个病的折磨。真的是这样吗？这么快就发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房间里有轻微的木炭味儿，还有生铁的味道。原来是冬妮娅在烫衣服，她时不时地把煤炭从炉子里移出来，再将铁钳放进去，张开的铁钳好似一副牙齿。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但我也说不清楚。也许还是身体作祟吧。

为了庆祝萨姆德威亚托夫给我们带来

肥皂，我们必须一天洗两次澡，萨沙则是一整天都在外面疯玩。此刻，我在这儿写字，跨坐在长凳上的萨沙模仿起萨姆德威亚托夫的样子，假意说愿意用雪橇搭我一阵。

等身体一好起来，我就去镇上的图书馆，我要详细了解这个地方的地理和历史。他们说图书馆有人做过几笔重要的捐献，并且捐献的书籍相当之好。我想写作，但我必须抓紧时间。春天眨眼就到，到时候我就没时间写作或看书了。

头疼一天比一天更甚。睡眠情况也不好。我经常做那种很混乱的梦，可梦一醒来就记不清了。所有那些梦境都到了我的意识里头，经常在深夜把我惊醒。是一个

女人的声音，我经常在梦里听见，那声音仿佛是从空中传来的。我记得那个声音，并且经常听见，于是我在心里回忆所有认识的女性朋友——我想记起是谁用那种深沉、低缓、略带沙哑的声音说话。但我把所有人想了一个遍，也没想出是谁。起先我想那可能是冬妮娅的声音——也许因为我习惯了她的声音，所以就听不出她的语气。我试着忘记冬妮娅是我的妻子，试图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判断。结果证明，那声音也不是冬妮娅的。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谜。

关于梦境，人们通常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在我看来，事实也许是相反的。

很多时候都是你不甚留意的东西——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某句不带感情说出的话或听来的不以为意的事情——它们会在夜晚出来，变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这些被你忽视的东西构成你的梦境，像要弥补你白天对它们的忽视似的。

6

一个清冽寒冷的夜晚。目之所及的一切，都透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睿智而完满的光芒。大地、天空、星辰，所有这些都被雾凝在了一起。树影倒映在小径上，那么清晰，好似刻上去似的。你觉得，你看见许多黑影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大路。斗大的星星悬在树林的上空，在树枝的掩映下，好似蓝色的灯笼。小的星星则散落在整个天空，好似开满夏日田野的雏菊花一样。

我们还是讨论着普希金。有时候，我们会讨论他早期在学校写的一些诗歌，那时的他便已是才华横溢。

说到长诗，普希金的野心超不过阿尔扎马斯的文学圈子。他想赶上成年人的脚

步，想用神话、夸张手法、假装的享乐主义和世故成熟打动他的叔叔，并形成通行世界的智慧。

可当普希金不再模仿奥西恩（传说中的爱尔兰诗人）和帕尼，并改变诗路，他就拥有了一个不同的未来。

空气、光、生命的喧闹、现实照进了普希金的诗歌，犹如照进一个打开的窗子。外面的世界，日常的事情，名词构成了他的诗句，并剔除语言里模棱两可的东西。不同的事物化作一行行带着韵律感的诗句，跃然纸上。

普希金有名的四音步句，好似就是衡量俄国生活的一个标尺，好似它渗透进了俄国所有人的生活里。就跟你画下双足的

轮廓或双手的大小，来确定手套或鞋子是否合身一样。

捏克拉索夫后来的三音格和长短格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俄国口语和日常对话中的深意。

7

不管是作为一个医生，还是作为一个农民，我都希望自己能做好份内的事，与此同时也能守住一些根本的东西，能有时间写科学论文或文学作品。

每个人生来就是浮士德，渴望体验并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世界。浮士德最后成了一个科学家，其实是因为前人以及他同时代人犯下的错误。科学进步反映的是斥力法则，每一个进步都需要错误的理论或实践来推动。而浮士德最终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又是多亏了他老师的启蒙和引导。这表明，艺术进步反映的是吸引力法则，是对受人敬重的前辈的模仿和欣赏的结果。

是什么阻挡我成为一名医生和作家呢？我想，并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或游离动荡，而是无所不在的浮夸习气——比如“未来之光”、“建设新世界”、“人类的火炬手”等说辞。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你可能会想“多有想象力呵，多形象！”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的浮夸，因为它只是为想象而想象，算不得真正的创作。

只有经过天才修饰后的东西才能算作伟大。说到这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普希金。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赞美诚实的劳动、责任、日常生活！现如今，“资本主义”或“小资”已然成了贬义词，但普希金早在《家谱》中就已含蓄表达过他的批评，当时他骄傲地宣称自己属于中产阶

级，而在《奥尼金的旅行》中，我们可以读到：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我最大的愿望，是过上安宁的生活，

再有一大碗蔬菜汤。

纵观俄国文学界，最让我喜欢的就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等人的俄国式天真，我喜欢他们在这种跟人类终极目标或自我救赎一样大的话题上能有所保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曾想过这些事情，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谈论这些事情显得浮夸做作。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永不停止寻找生活的意义，并且为死亡和收支

平衡努力准备。至于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则是始终关注身为作家当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事情，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他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把生活和工作看成自己的私人事情，与其他任何人无关。也恰恰因为这，他们的个人遭遇才能让我们有所共鸣。而他们的作品就好像从树上摘下来的青苹果，会自己成熟，慢慢变软直至饱满多汁。

8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冰雪融化，空气中飘浮着馅儿饼和伏特加的味道，像是在过忏悔节。柔和的阳光照着森林，睡眼朦胧的松柏在微风中抖动身上的松针，好似在眨眼睛一样，一个个水坑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山村懒洋洋地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翻过身，转眼又睡着了。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描写了春天的景象。奥涅金离开了，房子也变得破败；莱斯基的坟墓就在山脚下的溪边。

那春天的情人——夜莺，

唱了整个晚上。

野玫瑰含苞待放。

为什么说是“情人”？其实，这个形容用得自然又贴切——夜莺就是春天的情人。另外，春天需要夜莺的美妙歌喉，让它变得更加动听。我在想，不知夜莺的这个绰号是否取自奥迪柯满提的强盗儿子——家喻户晓的俄国民族史诗（主人公儿子的名字叫南丁格尔，与夜莺同音）——而不仅仅是因为相似的发音。那首歌多么好地形容了他呀！

应着夜莺的口哨，

和着那狂野的呼喊，

青草地颤动了，

花朵张开了花瓣，

黑暗的森林俯首在地，

善良的人们从此长眠。

我们是在早春时节来到瓦利吉诺的。树木很快就换上了绿装——有赤杨、坚果树，也有野草莓——尤其是米库力特辛房子下面的休玛峡谷。没过多久，夜莺就开始了歌唱。

仿佛是第一次听见那美妙的歌声，我不禁再次想夜莺的歌声和其他鸟叫声有什么区别。似乎大自然是突发奇想，没有一点过渡，忽的就给了夜莺这婉转而特别的歌声——变幻多端，极富力量，空谷回

响。屠格涅夫也曾描写过这风笛一样动听的歌声。其中有两个形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那经久不绝的重复着的布谷—布谷—布谷声，让园子里滴露的青菜颤抖地喜悦。还有一个形容是——布谷—布谷，两个简单的音节，像在命令又像在请求：“起床！起床！”

9

春天到了。我们开始为春耕做准备。我没有时间再记日记。写作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我只有到来年冬天才能有时间继续写。

前几日是忏悔节，刚好赶上春潮。一个生了病的农民滑着雪橇穿过一片又一片的泥泞地，来到我的院子里。起先我不肯给他检查。“我已经不再行医了。”我说，“我这儿没药，也没任何医疗器具。”但那个人坚持要我给他看，“帮帮我吧。我的皮肤出了毛病，很痛苦，请你可怜可怜我。”我能怎么办呢？我又不是铁石心肠。于是，我让他脱掉衣服，一番检查下来，我确定他得的是狼疮。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瞥到窗台上放着一瓶石碳

酸——别问我这是打哪儿来的，包括石碳酸在内的几样东西是我的必备物品，而这些东西都是萨姆德威亚托夫替我搞来的。紧接着顺着窗子的视线往外看过去，竟看到院子里还停着一驾雪橇。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另一个病人的，没想到竟是我的表哥——艾夫格拉夫。他先前没打任何招呼，忽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好似从天而降。家里人都忙着招待他——冬妮娅、萨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过了一会儿，我也加了进去。我们问了艾夫格拉夫好多的问题。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而艾夫格拉夫和往常一样躲闪着我们的问题，他时而微笑，时而耸动肩膀，尽跟我们打哈哈。

艾夫格拉夫在我们家停留了两个星期

左右，他经常去尤里安提，然后突然间又消失了，好像钻到地下了似的。在我们家的那段时间，我感觉他的影响力甚至比萨姆德威亚托夫更大，他的工作和人际联系更加神秘。艾夫格拉夫现在在做什么？他担任了什么职务？他的权力如何会变得这么大？他答应要帮我们改善生活，这样冬妮娅就能有多一点时间陪伴萨沙，我也就有时间给人看病和写作了。我们问他如何做得到，但他只是笑，没有回答。不过，艾夫格拉夫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确实，诸多迹象表明我们的生活正越过越好。

这太不可思议了。他是我的表哥，我们姓一样的姓，但我竟然对他一无所知。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闯进我的生活，带

给我希望，解决我所有的困难。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得有这样一个人，一种神秘未知的力量，会不期而至救你于水火之中。而我生命的救世主就是艾夫格拉夫，我的表哥，他就是我的天使！

至此，尤里·安德雷维奇的日记就停下了。此后，他也再没记过日记。

10

尤里·安德雷维奇坐在尤里安提镇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看着借来的书。阅览室开了几个窗子，大约能坐下一百个人。供人阅读的长桌子排成一排，直排到窗子边。图书馆日落闭馆，因为春天整座城都不供电。日瓦戈总会在天黑之前离开，从没超过吃晚餐的时间。他把米库力特辛借给他的马寄放在萨姆德威亚托夫的旅馆里，看一早上的书，然后下午再骑马回瓦利吉诺。

去图书馆看书之前，尤里·安德雷维奇其实很少去尤里安提。因为他也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对这座城市也不甚了解。渐渐的，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挤进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有些当地人坐在他的旁边，有些则坐得稍远些。日瓦戈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喧哗的十字路口，好似不只镇上的人挤了进来，就连房屋和街道也到了这小小的阅览室里头，他也借

此了解这座小城。

其实，透过窗户，他也能看到真实的尤里安提，并不需要想象。阅览室中间最大的窗户前头，有一桶热水。看书看累了的人便会走到没人的地方吸根烟，或者打点热水喝。喝完水，大家通常会在窗子边站一会儿，欣赏镇上的风景。

来阅览室看书的人大致有两种。绝大部分是当地知识界的一些老人，剩下的就是一些出身不高的人。

前一种大部分是女人，穿着打扮较为寒酸，因为各种原因显得面容憔悴——也许是饥饿所致，也许是黄疸，又或者是水肿——且身体臃肿。她们是图书馆的常客，并且跟图书管理员有私人交情，在阅览室就跟在自己家一样随便。

其他一些人看上去则要好得多，衣着也更光鲜，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给穿上了。这些人小心翼翼地进来，好似走进的是庄严的教堂；他们的动静比其他人更大，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规则，而是因为他们太过小心，越是不想发出声音就越控制不了自己的步伐和声音。

图书管理员和他的两个助手坐在讲台上，正好跟窗户相对，一个高脚台把他们和阅览室里其他的人隔了开来。其中一个管理员助手样子凶恶，披一件羊毛披巾，夹鼻眼镜总是戴了取取了戴，显然这只是她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另一个管理员助手穿一件黑色的丝质衬衫，似乎心脏不太好，因为她呼吸或者说话总得用手帕挡着，反正就没见她把手帕拿开过。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跟大多数读者一样，也是脸

部水肿，皮肤松弛，气色晦暗得像腌黄瓜或灰雾一样。这三个人轮流向新到图书馆的人解释规则，整理图书，有时也会处理一些报告或其他的文书工作。

窗子外面是真实的尤里安提城，窗子里面是一个想象的城，日瓦戈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把它们联系到一起。四周都是水肿的脸，好似所有人都得了甲状腺，不知怎的这总是让日瓦戈想起初到尤里安提的那天，看到的那个负责火车转轨的胖女人。尤里·安德雷维奇记得下火车的那一刹那看到的城市远景，当时萨姆德威亚托夫站在他的身侧，跟他说着什么。他试图把这些东西联系到一起，变成一幅画，而他就在这画面的中央。但他不记得萨姆德威亚托夫当时跟他说什么了，最终，也只是一场徒劳。

11

尤里·安德雷维奇坐在阅览室离门较远的一端。他的前面放着几份关于当地土地调查的报告和当地人物志的参考资料。除此之外，尤里·安德雷维奇还要了几本关于普加乔夫叛乱的历史书，但穿丝衬衫的图书管理员隔着手帕轻声跟他说没有人能同时看这么多书，所以他得先把几本书还回去，才能把他感兴趣的历史书给他。

所以，尤里·安德雷维奇看书比以前更快也更认真，因为他想把那些真正需要的书挑出来放到一边，再用那些不好的书来交换想要的历史书。他快速浏览每本书的指南和每章的题目，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心无旁骛。周围其他的人也并不打扰他。尤里·安德雷维奇先前就仔细观察过坐在旁边的人——左右两边的人都深深印在他脑海里，不用抬头就知道是哪些人坐在那儿，并且他感觉到哪些人

永远不可能在他之前离开，这就跟窗外的房子和教堂永远静止一样。

不过，太阳不可能静止。阳光一开始照在最东边的角落，现在已经移到了南边的窗户，直射进离南边窗户最近的看书的人的眼睛里。

得了感冒的图书管理员从讲台上下来，走到窗子边。白色的窗帘打了褶，从而让照进来的阳光柔和一些。管理员放下阅览室所有窗子的窗帘，除了最后一个窗子——因为那个窗子还没照到阳光，仍隐在一片阴暗中。管理员走到最后一个窗子旁，拉开最上面的横梁帘子，接着就不停地打喷嚏。

在图书管理员接连打了十多个喷嚏之后，尤里·安德雷维奇突然反应过来她原来就是米库力特辛的小姨子，是萨姆德威亚托夫曾经提过的图特塞娃姐妹中的一个。跟其他读者一样，日瓦戈也抬起头，

望向她的方向。

此时，日瓦戈才注意到阅览室里微微有了些变化。阅览室来了一个新人，坐在离窗子最近的地方。尤里·安德雷维奇立刻认出那就是安提波娃。安提波娃背对着他，低声跟打喷嚏的图书管理员说着话，而那个管理员就斜倚在她身上。一番谈话之后，女管理员似乎好了一些。她很快就不打喷嚏了，并且看着也没先前那么战战兢兢了。女管理员感激地看了安提波娃一眼，然后把之前一直挡在嘴边的手帕收进口袋，走回讲台后面的位置。看着快乐又自信，并且脸上还有了微笑。

阅览室里有几个人都注意了这个感人的小细节，她们也都露出了微笑，似乎对安提波娃很满意。从这些小事上，尤里·安德雷维奇看出安提波娃在这个镇上相当有名并且很受喜欢。

12

一开始，日瓦戈医生只想走过去，跟安提波娃打招呼。但不知怎的他突然害羞了——这跟平时的他很不一样——以前跟安提波娃相处的种种也一下子浮现在他的脑海，让他移不开脚步。他决定不去打扰她，也好让自己安心看书。为了忍住不往安提波娃那边看，日瓦戈医生甚至还把椅子移向了一边，这样他几乎是背抵着桌子。他努力地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不仅手里拿着一本书，膝上还摊开了一本。

但日瓦戈还是做不到专心致志地看书。突然，他想起来去年冬天在寒夜里梦见的声音正是安提波娃的声音。这个发现让他一下子蒙了，下意识地拉开椅子往安提波娃那边看，就连坐在旁边的人都被惊了一跳。尤里·安德雷维奇开始打量不远处的安提波娃。

尤里·安德雷维奇是从后面看，所以只看得到安提波娃的背影。她穿着一件束腰带的小格子衬衫，全神贯注地看着书。她像个孩子一样，头微微垂在右肩上。有时安提波娃也会停下来思考，或是看着天花板或是直视前方，然后再次用手撑起下巴。看到精彩处，她还会把书上的词句摘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只见笔尖在笔记本上快速流转。

尤里·安德雷维奇再次留意到许久之前他在梅流赛艾沃就发现的细节。“她不喜欢享乐，也不想打扮得漂亮。”日瓦戈暗想道，“她讨厌女人天性里的东西，好似是故意要把自己往丑里整，当作对自己的惩罚一样。不过这种故意的不修边幅，反而让她更具魅力。

“她总是能把事情处理得很漂亮！就说阅读吧，她看书不会让你觉得这是人类最高雅的行为，

而是让你觉得这不过是最简单的事情，是动物都会做的事情。就跟从井里取水或削土豆皮一样简单。”

这些想法让尤里·安德雷维奇得到了安慰。他的灵魂达到了少有的平和状态，思想也不再跳来跳去。他只是止不住地微笑。其实，安提波娃的存在对他的影响跟对那个紧张的女图书管理员的影响是一样的。

尤里·安德雷维奇不再担心椅子的角度也不害怕分心，他带着平和的心情又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书，这次甚至比安提波娃来之前更加专心。他快速翻阅了面前的一堆书，挑出其中最需要的，甚至还抽出时间阅读了书中最重要的两篇文章。然后，他觉得这一天的工作差不多了，便收起桌上的书送回高架台。这时的尤里·安德雷维奇很自然地想到，自

己专心致志地工作一早上了，花点时间跟一个老朋友打个招呼见个面也不过分，他应当允许自己做一两件高兴的事。可当他站起来环视阅览室时，却发现安提波娃已经走了。

安提波娃还回去的书还放在台子上，就在他还的那摞书的旁边。原来，安提波娃看的是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她肯定是想提升自己的政治修养，再继续去当老师。

尤里·安德雷维奇看到安提波娃还的书中有一本夹了张字条，上面写的是她自己的地址。于是，他把字条拉了出来，惊讶于自己的发现："商人大街，带雕塑的房子的正对面。"尤里·安德雷维奇于是问旁边的一个读者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带雕塑的房子"在尤里安提就跟莫斯科的"大教堂"或彼得堡的"五角大街"一样，是一个地标性的概念。

“带雕塑的房子”指的是一栋黑色的钢结构建筑，饰有门廊和缪斯高举圆盘，缪斯手拨七弦素琴和头戴面具的雕像。这栋房子是一个商人于上个世纪建造的，当时被用作私人剧院。房子的继承人把房子卖给了商人协会，这也是“商人大街”名字的由来，相邻的地方也都以这栋房子作为标志性建筑。现在，这栋房子归镇党委会使用，房子一楼原本贴着许多旧时的大字报和标语，现在全都改成了政府宣言和政令。

13

那是五月初一个寒风凛冽的午后。尤里·安德雷维奇完成了当日的工作任务，便想在图书馆周围走走，突然他改变计划，决定去见见安提波娃。

那天的风很大，扬起的灰尘吹得尤里·安德雷维奇睁不开眼睛。好几次他都不得不别过头，闭上眼睛，等扬尘过去了再继续往前走。

安提波娃住在商人大街的转角处，正对着那栋带雕塑的黑灰色房子——这也是尤里·安德雷维奇第一次见到这所房子。房子确实名不虚传，只是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房子的顶楼挂了一圈的女性神话画像，画像有半个真人那么大。一阵大风扬起漫天的灰尘，恍惚间，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画像里的女人全都活了过

来，站在阳台上隔着栏杆俯视他。

去到安提波娃住的房子有两道门，一条是从商人大街进，还有一条是从巷子的转角进。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注意前门，便从侧门转了进去。

刚跨进大门，一阵大风就把地上的垃圾卷上了天，在尤里·安德雷维奇和院子中间竖起一道屏障。透过这变幻的屏障，日瓦戈医生隐约看到院子里是完全是一番鸡飞狗跳的景象，一只母鸡还被公鸡追得飞到了他的脚边。

扬尘落定后，日瓦戈医生看到安提波娃就站在水井边。她打了两桶水，正要把那水担到肩上。安提波娃的头发用一块手帕随意地包着，应该是为了避免落上太多的灰尘；她还用一只手把被风吹起的裙子按到膝盖下面。安提波娃开始担着水往屋子的方向走，这时刚好又起了一阵大风，将她头上的手

帕吹散，直飞到篱笆的另一端，那儿还有许多母鸡在咯咯咯咯地叫着。

尤里·安德雷维奇连忙追过去，拾起手帕，走到安提波娃面前。安提波娃并没有太大的反应，甚至都没有一丝惊讶，只是叫了一声：“日瓦戈！”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

“你怎么会在这儿？”

“先把你的水桶放下，我来替你挑。”

“我从不会在中途停下脚步，做任何事都不会半途而废。如果你也是来看我的，那就请这边走。”

“还有谁来吗？”

“我怎么知道？”

“不管怎么说，这水还是让我来挑。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袖手旁观你一个弱女子干活呀。”

“这算什么干活呢？别管我了。我还怕你把水洒到台阶上呢。你还是先告诉我谁带你来这儿的吧。你来尤里安提都一年多了，从来都没见你来找过我，这会儿怎么突然找过来了呢？”

“你怎么知道？”

“没有不透风的墙呀。况且，我还在阅览室里看见过你。”

“那你怎么不叫我？”

“别告诉我你当时没看见我。”

安提波娃的身子被肩上的水桶压得微微有些晃动，她走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前面，穿过一个低矮的拱形门廊。然后，她快速把水桶放到地上，并将肩上的扁担卸下，直起身，用一块小手帕擦干手。

“这边，我带你穿过这条小路到前厅去。那边亮堂一点，不过还得等一会儿。我要先把水提到后边去，再稍微收拾一会儿。放心，不会耽搁太久的。这个楼梯设计得好吧——都是铸铁的阶梯，镂空风格，站在上面就能看到下头的一举一动。这本就是一个老房子，打仗的时候还被炮弹震了一下，你看那边的石块都松了。看见那块砖上的裂缝了吗？凯特恩卡和我要是出门，就会把钥匙放在那个地方。你要记得我跟你说的。要是有天你过来了我不在，就可以自己拿钥匙开门进来，直到我回来。你看，就在那儿，不过现在不需要用它。你等我从后门绕过去，再从里面给你开门。我们现在唯一的

麻烦就是屋里的老鼠太多了，成群结队的，打都打不完。你看那墙根，都是坑坑洼洼的老鼠洞，我已经尽可能把看得见的老鼠洞堵上了，但还是没有多大用。也许某天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呢？墙脚和地板之间的裂缝需要修补，对吗？行，你先在大厅里等一会儿，想点事情。我不需要太久的，过会儿我叫你。”

尤里·安德雷维奇趁着等待的间隙，打量起四周斑驳的墙面和铁楼梯来。他对自己说：“在阅览室的时候，我看到她专心致志地在看书，以为看书对她而言就跟做其他体力活一样轻松。没想到反过来同样成立，她挑起水来也和看书一样轻松而认真。总之，她做每件事都是那么优雅，好似从小就受过很好的训练，现在做起事情来自然是水到渠成了。这种优雅，体现在她弯下腰的一刹那，在她扯动嘴角微微一笑的瞬间，在她用手撑住下巴的时候，也

体现在她的谈吐和思想中。”

“日瓦戈！”安提波娃在上面叫。

于是，尤里·安德雷维奇上了楼。

14

“把你的手给我，按我说的做。我们得穿过这两个黑漆漆的房间，这里头摆满了家具，一不小心就可能撞上什么东西，伤到你自己。”

“确实，这里就像一个迷宫。我都找不到路，怎么会是这样？是因为房子在翻新装修吗？”

“哦，不是的，没有那回事。这个房子是别人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真正的主人是谁。我原本在学校有一栋房子，后来镇房委接管了学校，就把这个房子的一部分分给了我和凯特恩卡。房子的主人离开了，却一件家具都没带走。我不想要别人的东西，便把留下来的家具搬进了这两个房间，我还把房间的窗户封住了，以免里头的家具被太阳晒坏。别松开我的手，不然你会迷路的。这边右转，就能走出迷宫了，这就是我家的房门。再走两步就有光

了，注意脚下。”

尤里·安德雷维奇跟着安提波娃走进房间，透过面朝门的一个窗户看出去，他被眼前的景色惊住了。窗子正对着院子和一片低矮的房屋，远处就是河滩。牛羊在河边吃草，远远望过去，好似一朵朵棉花。那儿还立着一块熟悉的牌子：“莫勒维奇金，插秧机，收割机，唧唧复唧唧。”

这不由让日瓦戈医生想起初抵尤里安提的情景，他开始跟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讲述那一切。日瓦戈医生忘了曾听人说过斯特尼科夫可能就是拉拉的丈夫，把在火车上跟斯特尼科夫的打交道的事情也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而这件事恰恰给拉拉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你见到了斯特尼科夫？”拉拉急切地问，“我不知道怎么说，但这真的很神奇。你们两

个好似注定要见面。以后我再把事情详细告诉你，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他的印象肯定还不错？”

“没错，我对他总体的印象挺好的。不过，他肯定讨厌我。在那之前，我们坐的火车曾经过几个毁于他手的村庄。当时我想他肯定是一个残忍的军人或极端革命分子，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跟你对他的想象不尽相同，也算一件好事。严格来说，他不属于任何一类人。如果非得把他归类，那只能等他死了。可如果不把他归类，就意味着他身上至少有一部分东西是人类必须要有的。他超越了自己，或许还能永垂不朽。”

“他们说，斯特尼科夫不是共产党员。”

“是的，我觉得他确实没有加入共产党。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相信他的下场肯定不好。他会为自己作过的恶而备受折磨。那些制定规则的革命者让人害怕，不是因为他们是穷凶极恶的罪犯，而是因为他们跟失了控的机器或脱轨的火车一样，随时可能带给人致命的危险。斯特尼科夫跟其他人一样已经陷入疯狂的状态，只不过他的疯狂并非源自理论，而是来自他曾经遭受过的磨难。我不知道他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但我能确定的是，他一定有秘密。他为布尔什维克党效力只是偶然，现在共产党需要他，便愿意忍受他的一切，而他又刚好走了一条相同的路。等政府一利用完他，就会头也不回地把他抛弃，百般蹂躏，就跟其他开国功臣一个下场。”

“你这么认为？”

“我很确定。”

“难道他就没有退路吗？不能逃跑吗？”

“他能跑去哪儿呢，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放在以前，在沙皇的统治下他或许还能逃跑。可现在你想都别想！”

“那太糟糕了。你这么说，我都有些同情他了。你知道吗，你变了。以前你对革命的态度要温和许多，没这么严厉。”

“你说到重点了，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任何事都有它的限制。随着时间的过去，某些东西本应确定下来。可结果，那些积极革命的人除了制造动乱和破坏，其他什么都不在行，他们对一切都不满意。对他们而言，过渡性的世界有如世界末日。他们没有学习过其他的东西，除了闹革命之外一无所知。你觉得这种看不到尽头的准备工作为何会是徒劳？因为这些人并不具备真正的能力，他们是一群无能的人。人们生下来就有权利活着，而不是为了

活着做准备。生命本身就是生活的体现，是生活的馈赠，无比珍贵！所以，为什么要上演这种滑稽的闹剧，幼稚天真的桥段？好了，现在该我问问题了。我们是在动乱爆发的那天早上抵达尤里安提的，你身涉其中吗？”

“我得说是的！当时我们被火包围了，那种情况下房子竟然没被烧毁实在算得上一个奇迹。不过，我刚刚也跟你说了，房子被震了好几下。哪怕到现在，也时不时地有炮弹从天而降，落在院子里。抢掠、炮火等让人很是惊恐——每届政府刚成立时都得经历这种痛苦。不过我们总会习惯的，这也不是第一次。毕竟，白军统治下的生活更加恐怖！谋杀，敲诈，勒索——那可真的是一团乱麻！不过，我还没告诉你最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加利乌林，他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重要人物——是个什么政府首长。”

“我知道。我听说了。你见过他了吗？”

“经常见面。你不知道我成功救下了或帮助隐藏了多少人，而这一切都多亏有他。坦率地讲，他表现得勇敢又正义，不跟中尉、警察那些小人物似的，懦弱虚伪。不幸的是，执行规则的恰恰是那些伪善的小人，而不是这些正直勇敢的人。加利乌林帮了我很多，愿上帝保佑他。你知道的，我跟他是老朋友了。小时候，我经常去他长大的那栋房子，那里绝大部分的住户都是铁路工人，所以童年时我就见惯了贫穷。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革命的态度和你不同。因为，革命跟我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我了解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不过说到加利乌林，那个门房的儿子，他竟然成了白军首领——甚至还是个将领！我家里没有人参军，所以我弄不清军衔。至于工作，我现在是一名历史老师……反正，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实不相瞒，我帮助了许多人。我曾去拜

访加利乌林，并跟他谈起了你。不管是哪个政府，我都有朋友和认识的人在里面——与此同时，我也因此经历了许多的悲伤和失望。只有在无聊的书本里，人们才会简单粗暴地被分成两个群体，并且彼此互不相干。在现实中，一切都是混着来的！难道你不觉得人一辈子被迫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处于一个位置，支持一样的东西，其实是件很可怜的事吗？——啊，你来了！”

这时，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女孩儿走了进来，头发扎成利索的马尾辫。她那双小眼睛透出狡黠顽皮的光，只见她走到屋角，放声大笑起来。其实她知道母亲有客来访，在外面应该就能听到里头的声音，但她觉得还是得装作惊讶的样子。小女孩儿向日瓦戈医生行屈膝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目光里有不符年龄的成熟。

“这是我女儿，凯特恩卡。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

“以前在梅流赛艾沃的时候，你给我看过她的照片，没想到现在竟长这么大了！”

“我以为你出去了呢。都没听到你进来的声响。”

“我从墙上的洞里拿了钥匙，那里头有只好大的老鼠——有这么大！把我吓得一蹦三尺高，魂儿都没了。”

小女孩儿做了个夸张的表情，双眼圆睁，嘴巴一嗡一张，跟离了水的鱼似的。

“你再出去玩会儿。我把叔叔留下来吃晚饭，到时候叫你。”

“多谢，我真想留下来，但自打来镇上看书起，我都是六点钟准时回家吃晚饭，从来没迟过。我从这儿回家还得三四个小时。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早就过来的原因。恐怕，我过会儿就得走了。”

“你还可以再待半个小时。”

“好的。”

15

“既然你跟我如此坦诚，那我也就不隐瞒什么了。你碰到的斯特尼科夫其实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提波夫——我之所以去前线就是为了找他，后来听到他战死的消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

“你跟我说这些，其实我并不讶异。我对此有所准备，先前就听过有关的流言，不过当时不太相信。我毫无顾忌地跟你说起他，也是因为这个。我见过他。你跟他是怎么联系上的呢？你们又有什么共同点？”

“这是事实。斯特尼科夫就是安提波夫，我的丈夫。我们有一样的信仰。凯特恩卡也知道这些，并且为父亲感到骄傲。跟所有革命者一样，斯特尼科夫只是安提波夫的假名。反正因为一些原因，他

得用假名生活。

“是他占领的尤里安提，是他轰炸的我们。他知道我们就在这儿，却从来没有找过我们，就是为了隐藏他的真实身份。当然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哪怕他来问询我的意见，我也会让他这么做。你可能认为，我能保住自身安全并且苏维埃政府愿意给我一个地方安家，说明他暗地里在帮我。但他曾经到过这儿，却忍住没看我们一眼——这简直是不敢想象！对此我难以接受，这不正常，这是古代罗马人才有的品质，现在早被摒弃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会让自己受到你观点的影响。我们考虑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想我们能理解彼此；但要是说到对大事件的看法，对生活的态度，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说到斯特尼科夫……

“现如今斯特尼科夫在西伯利亚，你刚才说得

没错——我也听说他遭到了控罪，这让我心都冷了。现在他在那儿担任一个最重要的职位，跟可怜的加利乌林成了你死我活敌人——而他们曾是童年挚友，也是对德战争时的兄弟战友。加利乌林知道斯特尼科夫是谁，也知道我就是他的妻子，但他还是愿意大度地帮我，不把这些说出来——尽管他听到斯特尼科夫的名字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没错，他现在是在西伯利亚。但他曾在这儿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你之前见他的那节车厢里。我一直希望能巧遇见他。有时他会去总参谋部，就是曾被科姆齐——议会军——当作总部的房子。巧的是，参谋部的入口正好是在加利乌林与我见面的地方。我经常去那儿找他帮忙救人或阻止某件恐怖事件的发生。比如，当时军校出了一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一名老师不太受欢迎，学生开枪射击了他并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拥护者。也

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针对犹太人。当时，只要你从事脑力劳动并且住在城里，那你一半的朋友都会是犹太人。在那种大屠杀的环境下，任何凶残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不仅为此感到难过、愤怒和耻辱，还觉得自己被撕裂开来，好似我们的同情是来自大脑而不是心灵，与此同时我们也饱尝这种不真诚的恶果。

“奇怪的是，这些人曾把人类从盲目崇拜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其中也有很多人曾献身于解放事业，可他们自己竟然不能从一种失去意义的陈旧事业中挣脱出来。如果他们对犹太人有更好的了解，就不会这样狂妄自大，把原本跟自己紧密相关的人推开。

“当然，灌输给他们这种无用而恐怖的态度的力量，那种让人羞愧的自我否定的隔离感只会给他

们带来灾难。不过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源自一种内在的衰老，是历史数百年来疲惫的表现。我不喜欢他们在黑暗中发出的充满讽刺的口哨声，不喜欢他们乏味且平庸的长相，不喜欢他们缺乏勇气的想象。这就跟老人谈论衰老或病人谈论疾病一样让人厌烦。你觉得呢？”

“这个问题我还没怎么想过。我有一个朋友，米沙·戈登，他的想法跟你差不多。”

“我以前常去这个地方，希望能在他进出的路上碰见他。沙皇时代，政府首脑通常会在那栋房子里有自己的办公室。而现在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投诉看见了吗？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漂亮的地方。前头的广场贴的是木地板，广场对面有一个花园，里面种满了枫树、山楂树、金银花。门外的街上，总是会站着一排人。我以前也在那儿站着等。当

然，我从没进过那扇门，也没说我就是他的妻子。毕竟我们的姓都不一样。你可别天真地以为，哭诉一顿就打动得了他们！他们的方式跟我们大不相同。你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帕维尔·菲拉波托维奇·安提波夫——先前是一个政治流亡犯，一名老工人——离这儿也很近。就住在公路上的某个地方，他是流放到这儿了。老安提波夫的朋友提沃兹恩也在那儿。他们都是本地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你能相信吗，帕沙连他父亲都没见，也没告诉他自己的身份。而他的父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安提波夫若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就只能这么做，不能和父亲妻子子女见面，谁都不能见。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他们的自制力简直强得不像人类。

“即便我证明了是他的妻子，那也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在这样的时局下，妻子又有什么重要

的呢？工人阶级，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一个妻子，不过是一个两足动物而已，不会比一只虱子或跳蚤重要！

“他的助手曾出来问过大家各自想见他的原因是什么，并让一些人进去了。不过问到我的时候我没有告知自己的真名，也没有说具体为什么事，只是说私人事情。我知道，自己这样只是浪费时间。助手只是耸耸肩，狐疑地看我一眼。反正，这么久我从没见过他。

“我想，你可能觉得他不爱我们，已经忘了我们，是吧？不，你错了。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正是因为他爱我们才会这样做。他不能忍受自己两手空空地回来。他想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载誉而归，把他的桂冠放在我们的脚下。让我们狂喜，让我们目眩！他就是个孩子。”

这时，凯特恩卡又进来了。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一把抱起她，惊了一跳的小女孩儿马上咯咯地笑起来，并紧紧抱住母亲。

16

尤里·安德雷维奇骑马赶回瓦利吉诺。脚下的路他已经走了千百回，已经熟悉到不再意识到它的存在，不用看路也能认路。

很快，他就到了森林的交叉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瓦利吉诺，而另一条路就是通往萨克马河边的小渔村瓦塞列夫斯克耶。交叉路口旁立着一块广告牌，上面仍然是农业机械的广告。跟以往一样，尤里·安德雷维奇也是黄昏时分抵达这个交叉路口。

自打那天和拉丽莎重逢之后，这两个月尤里·安德雷维奇都是在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家过夜。尤里·安德雷维奇跟家人说，他在城里有正经事要做，晚上就住在萨姆德威亚托夫的旅馆里。他早就称呼拉丽莎为“拉拉”，并且经常使用的是“你”这种亲密的称呼，不过拉拉仍然是叫他“日瓦戈”。尤里·

安德雷维奇背叛了冬妮娅，而他在这份感情里更是越陷越深。这很让人惊讶，简直是难以想象。

尤里·安德雷维奇爱冬妮娅，敬重冬妮娅。对他来说，冬妮娅温和的精神世界重要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来维护她的尊严，比维护他父亲甚至他自己还要虔诚。如果谁敢伤害冬妮娅的自尊，他会亲手把那个人撕碎。可如今，他自己却成了刽子手，成了伤害冬妮娅的人。

在家的时候，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罪犯。家人的宽容信任和他们一如既往的深情，对他而言无异于精神折磨。他经常聊着聊着，就想到自己的罪恶，然后深陷痛苦挣扎之中，再也听不见身边人说的话。

如果是在用餐时发生这样的情况，食物就会堵在他的喉咙，他不得不放下调羹，把餐盘推开。尤

里·安德雷维奇喉咙哽咽，强忍眼泪。

“你怎么了？”冬妮娅不解地问，“你肯定是在城里听到了什么坏消息。有人被抓了吗？还是被枪决了？你告诉我，不要怕我伤心。跟我说说，你心里会好过一些的。”

因为更喜欢另一个女人，就要变得不忠诚吗？不，尤里·安德雷维奇无从比较，也没有选择。对于他而言，“自由恋爱”等想法，“关于爱的合法要求”等词语是完全陌生的。要他说出这种话，无异于自取其辱。他从来没有“播种过野燕麦”，也不认为自己是拥有特殊权利的超人。日渐一日，他被良心的折磨压得要崩溃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有时候他也会这样想，但也只能寄希望于某种未知的大事件来改变现状，解决他的问题。

现在尤里·安德雷维奇也不这么想了。他决定快刀斩乱麻，回家给一个交待。他决定要跟冬妮娅坦白一切，请求她的原谅，并且永不再和拉拉见面。

既然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得由他自己来把一切理清楚。尤里·安德雷维奇想让拉拉明白，跟她断绝联系是为了她好。那天早上，尤里·安德雷维奇跟拉拉说，他想跟冬妮娅好好过下去，所以他们以后不能再见面。不过现在他感觉自己当时把话说轻了，可能拉拉还没有完全明白。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也看得出日瓦戈医生的痛苦，不想再为难他。她试图用平和的心情跟他对话。他们选在一个空房间里谈话，还未张口，泪已经落了下来。但拉拉并没有察觉到脸上的泪水，就跟马路对面的石头雕像感受不到雨水的冲击一样。她柔声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管我。我

没事的。”拉拉的这番话确是真心，并非虚情假意。她不知道自己脸上挂着泪水，便也没去擦它。

一想到拉拉有可能误会自己的意思，并且自己可能给了拉拉错误的希望，尤里·安德雷维奇就恨不得马上回头，把没说的话说清楚。他想用一种更恰当的方式同拉拉告别，但尤里·安德雷维奇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继续前行。

日薄西山，林子里也越来越冷，越来越黑。空气里都是潮湿的树叶的味道，成群的蚊子在空中飞舞，嗡嗡叫着，好似在悲伤地叙述着什么。蚊子不断落在尤里·安德雷维奇满是汗的脸上和脖子上，惹得他不停地拍打。这拍蚊子的声音与马蹄声相映成趣——马在半湿的泥地里飞奔，不时能听到溅起的水声与干叶的断裂声。而远处，落日似乎永远不会落下，夜莺也开始了歌唱。

“布谷—布谷！”它嘤嘤叫着，像是复活节前夕的召唤：“醒来吧，我的灵魂，你怎么还能沉睡呢？”

突然，尤里·安德雷维奇被一个简单的念头击中了。他在急什么？自己又不会反悔，反正他肯定会跟冬妮娅坦诚一切，但谁规定说非得是今天呢？到现在，整件事他跟冬妮娅还是只字未提，那为什么不等下次回家再说呢？他还要进城跟拉拉谈一次，诚恳而深入地谈一次，以弥补各自承受的痛苦。这简直是太棒了！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一想到能再见拉拉一次，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心就跳了起来。他迫切期待着跟拉拉的相见。

城郊的那所木房子，那条石板路……很快就要见到她了。再过一会儿，他就走下木板路，上到大街上。在那所木房子里发生的一切犹如书页在眼前

翻过，不是那种用食指一页页地翻过，而是大拇指按着书角快速翻过。速度快得让人无法呼吸。拉拉的房子就在街道的最后，天上还飘着几朵雨云，总体已经晴朗了许多。此刻，路旁的房屋看起来都可爱了许多，因为路的尽头有拉拉！他真想——亲吻它们！那些只开了一个窗户的小屋子，屋顶是向下的，好似戴了一个鸭舌帽。屋子里的灯光映射在石子路上，好似一颗颗诱人的草莓！而拉拉的房子就在那清朗的天空之下！在那儿，他会再次从造物主的手里接过那让人目炫的美丽尤物。那个美丽的身影会来替他开门，会靠近他，清幽的光芒如同浪潮一样将他扑倒，好似在黑夜的沙滩朝着大海飞奔而去……

尤里·安德雷维奇拉紧缰绳，身子前倾，双手搂着马的脖子，将脸埋进马那温暖的皮毛中。马儿明白这种爱抚是对它力量的夸赞，兴奋地奔跑起来。

马儿快速飞奔，马蹄几乎都不着地。除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和马蹄声，尤里·安德雷维奇似乎还听到了叫喊声，但他以为那只是自己的想象。

突然，尤里·安德雷维奇近处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他忙坐直身体，勒住缰绳。狂奔的马儿被突然勒住，不由踉跄了几步，再加上枪声的惊恐，只想往后逃。

尤里·安德雷维奇前方正是一条分岔路。

莫勒&维奇金　机械播种机　插秧机

广告牌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三个骑在马背上的全副武装的人挡住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去路——一个是头戴学生帽身着短上衣的年轻小伙子，身上挂着两条子弹带；一个是身着军官外套头戴皮帽的骑兵；还有一个是打扮古怪身材肥胖的男人，

穿一条类似于裙子的裤子，头上戴一个宽檐帽，帽檐直遮到额头。

“别动，医生同志。”戴皮帽的骑兵喊道，他是三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只要你听从我们的命令，我们就保证不伤害你。可要是你敢轻举妄动，就别怪我们的子弹不长眼。我们部队的医生被枪杀了，所以现在要把你征过去当我们的医生。下马，把你的缰绳交给这个小伙子。我再次提醒你——要是你敢逃跑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是森林人，米库力特辛的儿子里贝尔斯吗？”

“不是，我是他的首席联络官。”

第十章　公路

1

公路沿途散布着许多的城镇、村庄和哥萨克人聚居点。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邮路，也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一条公路。它像一把匕首穿城而过，像是分面包一样把主道沿途的各个城镇分开来。至于村庄，公路更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切割，左右两边都是大大小小的村庄。成排的房子或是远远地建在公路后面，或是公路绕房子一圈，形成一个大弧面或急转弯。

很久以前，科达特斯克伊还没通铁路的时候，邮政、运货都是通过这条公路。一车车的茶叶、面包和生铁走的是一条路，在押的犯人走的则是另一

条路。被流放的人徒步前行，镣铐随着脚步一摇一晃，咣当直响——那都是些让人闻风丧胆的亡命之徒。而他们周围就是黑暗的密不透风的树林。

住在公路边的人亲如一家。友谊和婚姻把一个个村庄和城镇连接在一起。科达特斯克伊就位于公路和铁路的交界处，开了几家发动机修理店和其他几个与铁路维修相关的店铺。穷人们则挤在破烂的房子里，听天由命。懂技术的政治流放犯多从事重体力劳动，逐渐成为熟练的技工，并在当地安家。

之前在铁路沿线拉起来的苏维埃政府，早就被推翻了。有段时间，这个地方曾受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管辖，不过现在又落到了科尔查克将军的手里，他自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2

公路延伸至一片开阔地，接着便是一条上坡路，所以坡上的视野相当开阔。远远望过去，公路似乎没有尽头，只是缓缓向上延伸，直至与地平线相接。不过当疲倦的马和旅客驻足歇息时，才会发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到了山顶。再往上，便是一座横跨科扎玛河的桥。

河的那边是一个更大的陡坡，坡上立着沃德维申斯基大教堂，远远就能望见教堂的红砖墙。公路环教堂所在的山坡而上，呈“之”字形穿过城郊地区。

当公路延伸至城镇的中心地带，便再次绕过教堂，因为教堂的绿漆铁门恰好俯瞰中心广场。拱形门标志的周围刻着一圈金字：

欢呼，赐予生命的十字，不可战胜的虔诚。

适逢圣周——复活节前一周，四旬斋刚要结束，冬天也已步入尾声。路上的积雪已由白转黑，不过房顶仍然是白皑皑的一片，如同戴了白色的高帽。

男孩子们爬上钟楼去看那撞钟人，俯瞰四周，一栋栋房子犹如挤在一起的小盒子小箱子。从上往下看，人也成了黑点，一个个朝家门走去。根据走路的姿态，有些人哪怕站在高高的钟楼上也还是认得出。他们不时停下来读那“至高无上统治者”在墙上张贴的布告公文，说是要挑选三个年龄段的人。

3

当天夜晚，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天气突然变得异常暖和，跟时节很不相宜。天空下起了毛毛雨，那么细那么轻，看着好似未等落到地上就会被风吹走。不过，这只是幻象。事实上雨下得很大，地面的积水汇聚成河，泛着黑乎乎的光，残留的积雪也被冲刷干净。

缀满花苞的苹果树奇迹般地穿过了花园的篱笆，叶子的滴水有节奏地打在木板路上，整个城都听得见。

一只名叫托米克的小狗被拴在摄影师的院子里过夜，不停地尖叫狂吠。加卢新院子里的人也许是被这叫声吵得不耐烦了，便也唧唧喳喳地说起话来，引得镇上的人差不多全醒了。

城镇的下区正有三车货物运到了商人柳贝诺夫那儿，但柳贝诺夫拒绝接收，说这是搞错了，他从没有订过东西。拉货的人争辩说时间已经这么晚了，请求柳贝诺夫先签收货物，但柳贝诺夫不仅恶言相向还把拉货的人连同货物赶了出去，不愿再开门。这些动静，镇上其他的人也是可以听到的。

清晨七点，教堂传出低沉的钟声，但声音很小。钟声与空中飘浮的细雨交织到了一起。钟声从教堂传出，在空气中下沉并消散，如同一团被河岸拍碎的泥土，最终在春水中下沉溶解。

时值星期三濯足礼的晚上。在雨帘的掩映下，又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教堂院子里一根根摇曳的蜡烛几乎照不清人脸，有时只是照见某个人的额头或鼻子。那是前去参加弥撒的斋戒队伍。

过了约莫一刻钟，教堂的木板路上传出脚步

声。原来是杂货店老板娘加卢新娜打算回家了——尽管仪式才刚刚开始。加卢新娜的脚步时快时慢，有时快跑有时又放慢脚步甚至停下休息。她在头上系了一条头巾，皮毛大衣敞开着，没有扣扣子。教堂的空气太沉闷了，加卢新娜感觉自己都要晕过去了，所以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不过现在，她又为自己不能坚持到最后而感到羞愧，因为这已经是第二年她没有在四旬斋期间进行斋戒了。但最让加卢新娜忧心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前两天张贴出来的动员令，因为那将影响到她那可怜的生病的儿子——泰廖什卡。加卢新娜努力不去想这些，但每个转角都有的黑底白字公告都毫不留情地提醒着她这个事实。

加卢新娜的家就在街的转角，不过走到户外她感觉就好多了，所以也不急着回到那同样不透气的房间。

加卢新娜心里挂着事儿，自是烦恼不安。她之前也想过这些事情，但直到天亮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此时在这大街之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她突然就觉得这些事情也能承受了。加卢新娜就这样在教堂和广场之间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

时近复活节，家家户户的人都去教堂了，只有加卢新娜一个人在街上晃荡。难道她不是一个人吗？尽管还有喀秋莎跟着，但那不算。话说回来，喀秋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谁又能够真正看明白谁的心思呢？也许喀秋莎是朋友，也许她是敌人甚至是隐藏在暗处的对手。丈夫瓦拉斯说喀秋莎是他的前妻跟另一个男人生的女儿，后来提出要收养喀秋莎。但也许喀秋莎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呢？或者她是另一男人的女儿？你怎么能看透一个男人的心呢？不过，喀秋莎还算乖，暂时没什么让人不满的。认真说来，喀秋莎头脑聪明，长得漂亮，举止

也大方得体，比她那个傻儿子泰廖什卡和丈夫好多了！

在这圣周的最后几日，喀秋莎也没去参加教堂仪式。街上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闲逛。

丈夫瓦拉斯经常去公路上给那些新招进来的士兵做演讲，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对自己的傻儿子却是不管不顾，任其受苦！

泰廖什卡也在大聚餐前夕离开了。他去了库特尼的一个亲戚那儿玩，想把烦恼抛到脑后。那可怜的孩子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每读一年书学校就要让他留一次级，现在他已经念到八年级，但学校却把他踢了出来！

哦，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哦，天啊！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简直让人难以承受，她真的想放

弃了，都不想再活下去。如今的这些痛苦是什么造成的？是革命吗？不，不是革命！造成这一切苦难的是战争。是战争把俄国男人的花朵打没了，现在只剩下一些腐烂的残花败叶。

父亲的那个时代跟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加卢新娜的父亲是一个承包商。冷静，睿智。家里有一大片的土地。加卢新娜的两个姐姐帕利亚和奥莉亚更是一双人见人爱的姐妹花，聪明漂亮，完全就是她们那美丽名字的写照。那个时候，经常有能干的木匠来拜访父亲，其中就有几个很杰出的小伙子。一度，她和姐妹们还用六种颜色的丝线绣出了小伙子的脸。要知道，当时她们三姐妹的绣工可是全省数一数二的！那个时候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富庶，体面——教堂仪式，舞会，人们的言行举止——一切都让人感到喜悦。家里也都是一些勤劳朴实的人，没有那么多歪心思。那个时候的俄国如同一个

待嫁的大姑娘，有勇气的男儿纷纷来求爱，为她奋不顾身勇敢站出来，这跟现如今的混战很不一样。现在，一切都失去了原有的光辉色彩，全俄国只剩下平庸的市民，律师和犹太人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一句话。老瓦拉斯和他的朋友们以为，凭着祝酒、演讲和良好的愿望，就能换回曾经的光辉岁月。但这种方式，能赢回失去的爱人的心吗？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4

加卢新娜边想边走，早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穿过广场，眼看就要走到市场了。从她现在站的位置看过去，她的家就在街道那头的左边。不过每次走到门前她又会改变主意，转身走进跟教堂相邻的巷子里。

克雷斯托夫德维申斯克的市场跟一望无际的田野似的，望不到边。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上也开始挤满农民的货物推车。交易市场一边的尽头是艾莱尼斯凯亚大街，另一边则形成一道弧线，沿途布满一两层楼的建筑物，多用作仓库、办公室和作坊。

加卢新娜记得，以前还没打仗的时候，总有一个戴眼镜着长袍的憎恨女人的人在卖皮草、燕麦和干草、手推车轮和马具。通常，男人会郑重其事地

在他那开了四扇窗户的铁门外头坐下，然后翻阅手中的小报。

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小窗下面，可以看到几对雕龙画凤的婚烛和装在硬纸盒里的花束上落满了灰尘。而小房子的后头没有家具也没有货物，除了一堆箱装的蜡。其实附近上千卢布的大生意都是由附近一个资产百万的蜡烛生产商的不知名代理人完成的，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

加卢新的大杂货店就在这一排上铺的中间，开了三个窗子。杂货店那裸露的裂片一般的地板每天早中晚都得用茶叶擦洗一次——加卢新和他的助手们整天茶不离手。而加卢新娜作为一个新近结婚的少妇，通常都是坐在那收钱。加卢新娜最喜欢的颜色是淡紫色，就是某些大日子教堂修道士进行仪式时所穿教士服的颜色，是含苞待放的丁香花的颜

色，是她最好的一条天鹅绒连衣裙的颜色，是心爱的一对水晶酒杯的颜色。那是幸福和记忆的颜色。待字闺中的时候，俄国在她看来也是那紫丁香一样的颜色。加卢新娜喜欢坐在收银台旁，是因为坐在那儿可以看到黄昏给店里镀上一层淡紫的颜色，混着焦油、白糖和罐装紫色黑加仑糖果的芳香，与她的回忆和想象相得益彰。

木材场旁边的街道转角处，有一座古老的灰色木屋。木屋四面皆空，看着就像一辆废弃的马车。灰色木屋是两层楼，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入口。每一层都分成两部分，楼下一层靠右是扎尔肯德的药店，左边则是一名公证人的办公室。住在药店楼上的是老裁缝施穆雷维奇一大家子人；老裁缝家对面住的人就更多了，从事的工作也各不相同——有修表的，有补鞋的，还有雕刻师卡米斯基带着两个摄影师扎克和史特达克，后两个人是工作搭档。

由于一楼住的人太多了，摄影师的年轻助手布拉扎恩和马吉森便在木材场的一间黑屋子住下了。此时黑屋子的窗子隐隐还透出些红色的灯光，看来两个人还在忙活。小狗托米克蹲在黑屋子的窗户下面，不时吠叫几声，整条艾莱尼斯凯亚大街都听得到。

“他们应该是在打包东西。”加卢新娜经过灰色木屋旁时这样猜测道，“这里住的都是些可恶的乞丐。”不过，她转念又觉得，丈夫对犹太人或许有些太过残忍。毕竟，这些人也没重要到能影响俄国的命运。要是你问老施穆雷维奇为什么俄国会是如今混乱而动荡的局面，他肯定会扭曲那张丑陋的脸然后挤出一个狞笑，说：“那都是雷柏察卡的诡计。”

哦，这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些人重

要吗？他们是俄国的不幸？不，俄国的不幸是城里人。这不是说俄国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城市。只是城市里的人多半受过教育，而那些乡下人却没有，他们羡慕城里人受教育，于是也想依葫芦画瓢，可惜最终成了东施效颦。

或者，事实与此相反，也许无知才是最大的问题？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能提前知晓所有事情，而其他人则像是在黑暗的森林中，对外界一无所知。只有咳嗽时才知道不咳嗽的嗓子有多清爽，只有掉脑袋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念帽子。而现在，哪怕是学富五车的人日子也是不好过。饥饿把那些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赶出城！这一切真是太让人费解了！即便是神仙，恐怕也理不出个头绪！

不过，乡下人却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看看她的那些亲戚就知道，赛利特维恩斯、沙拉布里恩

斯、帕恩菲尔·帕里克还有内斯特兄弟等。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挣得生活，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公路沿途的新农场不可不谓是赏心悦目的风景。四十公顷的开垦土地，满目都是羊、马、猪、牛，谷仓里的玉米够吃三年！还有那让人惊叹的农业机械，他们甚至还会请人帮忙收割。科尔查克正想法子讨好他们，想要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这一边；另一边的军队也没闲着，想方设法要把这些农民拉入森林军的队伍。他们从战场回来，大家都想跟随他们，愿意听从他们的教导。不管有没有肩章，只要你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肯定有人需要你，你就可以靠自己的双足踩在大地之上。

走到现在，也是时候回家了。一个女人在大街上游荡到这么晚，毕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要是在自己的花园里走，就没什么问题。不过现在花园里泥泞不堪，跟沼泽地似的。不管怎样，加卢新娜觉

得自己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

回去的路上，加卢新娜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头，只是始终理不清头绪。进门之前，她先在门廊前面站了一会儿，把另外几件事情在头脑中捋了一遍。

加卢新娜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从首都莫斯科流放过来的政治犯，其中有提沃兹恩、安提波夫、贵族“黑旗”瓦多维奇科、本地锁匠“疯狗”葛申尼——她对这些人多少有些了解。那都是些头脑狡猾的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曾给当时的政府造成过很大的麻烦，现在他们肯定又在策划新的阴谋。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跟机器打交道，人也变得跟机器一样冷酷无情。他们经常在夹克底下套一件毛衣，四处晃荡，抽烟的时候连烟蒂都舍不得扔；他们只喝热水，因为害怕得病。可怜的瓦拉斯真是

在浪费时间，这些人一定会把一切都推翻，没有人能阻挡他们。

接着，加卢新娜又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算得上一个好女人，有独立的思想，聪明并且守礼；一句话来说，她是个好人。但如今这种环境下，她身上的这些特质在这儿根本就不被人欣赏——她知道，在其他地方其实也不会被欣赏。加卢新娜忽然想起一首歌，一首关于老女人塞特提乌里克哈的歌。这首歌上不得台面，但乌拉尔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首歌，加卢新娜这会儿只能记起开头的两句：

塞特提乌里克哈卖了她的马车，

买了一架俄式三弦琴……

接下去的歌词更加低俗露骨。想到这儿，加卢

新娜无奈地叹口气，转身进屋。

5

加卢新娜未等在大厅里脱下大衣，便直接朝卧室走去。她的卧室正对着外头的花园。入夜，窗子里外的影子彼此重叠。窗帘在墙上和地上投射的耷拉的影子，跟窗外花园里的树在地上投下的轮廓模糊的影子并无两样。花园里的黑暗仿佛天鹅绒一般温暖，冬天即将过去，从地里透出的春天的深紫色气息笼罩一切。而房间内外的这两种黑暗和寂静自有其相似之处，里头略显沉闷的黑暗也因即将到来的节日宴席的深紫色气息而变得柔软温暖。

画中的圣母马利亚似乎从银色的镶框中伸出手来，握住这黑夜的柔软与温暖。石榴红的灯在金色支架的衬托下，倒显得跟墨一样黑了；星星点点的光被玻璃分割开来，打在卧室的地毯上。

加卢新娜脱掉大衣取下头巾，脚下不由踉跄了

两步，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肩下一侧像是有针在扎似的。她恐惧地哭了起来，小声念着：“万能的上帝，仁慈的马利亚，救救我们这些在人世间受苦受难的人……”念着念着，加卢新娜已是泪流满面。疼痛稍微减退之后，加卢新娜便想把身上的裙子脱下来，却被背后的钩子钩到了手指。这一个激灵，钩子也从手中滑了出去，之后再怎么摸都摸不到。

这时，喀秋莎醒了过来，走进她的屋子。

“母亲，你怎么不开灯呢？要我拿盏灯过来吗？”

“不，不用了。我看得见。”

“我来帮你把裙子脱下来吧，母亲。可别累着自己。”

“我真是笨手笨脚，脱个裙子都脱不下。那些

裁缝也真是的，都不知道把拉钩缝在好拉的地方。我真想把这些拉锁都扯下来，扔到那些笨裁缝丑陋的脸上去。”

“教堂里的人唱歌唱得真好！现在这么安静，我们在屋子里也听得到。”

“赞歌是唱得不错，但我人不太舒服，我的姑娘。我身上又痛了，这儿，这儿，全身都痛。真是让人讨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试一下顺势疗法，上次斯塔多比斯基不是帮你减轻了疼痛吗？”

“可他总是让你做一些无法完成的事情。他是个怪人，况且，他已经离开了。我跟你说，他走了，离开这儿了。他也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这些人都赶在节日之前离开——就跟马上就会有地震来

袭似的。”

“那么，找那个匈牙利医生来怎么样，就是那个战犯？他的医术也不错。”

“也行不通。跟你说，城里现在没人。凯雷伊和其他匈牙利人站到了另一边。他们已经把他拉入红军的队伍。”

“不过，母亲，你还是想事情想太多了，总搞得自己心绪不宁。像你这种情况，就应该静心安养，别想那么多事。你还记得那个曾帮你驱除病痛的士兵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哦，你真把我当无知的傻瓜了！你肯定在我背后唱‘塞特提乌里克哈’了，是吗？”

“母亲！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这太让人伤心了，你真该感到羞愧。要是你不说起那个女人的名

字，我都不记得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这是很憋屈的。”

“她有那么多名字，我怎么知道你想的是哪一个。有人叫她库巴里克哈或梅德韦迪克哈或扎里达里克哈，我也不知道她还有多少个名字。不过，她也不在这儿了，她逃了，失踪了。他们把她关在凯扎木斯克监狱，专门要她给人流产，并制作某种药丸粉末。不过没过多久，她就从监狱里出去，听说是去了远东的某个地方。我跟你说，现在大家都跑了——瓦拉斯、泰廖什卡，还有你的帕利亚阿姨——你那位善良的帕利亚阿姨。除了我们两个笨女人，城里已经没有一个诚实的女人，我不是在开玩笑。反正，现在是没办法就医了。要真发生什么事，连一个医生都找不到。他们说尤里安提有一个医生，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有名的教授，是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可正当我想派人去请他

过来时，红军却横插一脚……你还是赶紧去睡吧，我也争取睡着。另外，你的那个学生布拉扎恩，他是不是喜欢你？何必拒绝呢？——看，我一说到他，你的脸就红到耳朵根了。我之前给了他几张照片要他处理，估计他今天一整晚都得干活了，可怜的孩子。他们晚上不睡觉，也搞得别人睡不着。那条叫托米克的狗吠个不停，整个镇都听得见它的叫声，外头苹果树上的乌鸦也让人不得安宁。哎，看来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你在烦恼些什么呢？别这么多愁善感。年轻人喜欢漂亮姑娘，这是很正常的事呀！”

6

“那只狗怎么老是叫唤呢？去看看它怎么了，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瞎叫唤呀！等等，里多察卡，动作要轻一点，别惊着它了。我们得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然就得找警察来了。乌斯提恩，你留在这儿，还有你塞沃布鲁依。这点事用不着你们过去。”

里多察卡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不过他没听到游击队首领的话，仍喋喋不休地说着：

“照他们的抢掠政策——强拉壮丁、暴力打击、开枪杀人、严刑拷打——针对西伯利亚地区资本主义军团的这些东西肯定会让那些容易轻信的人看清事实。更让人愤恨的是，这些政策并非只针对工人阶级，事实上它还针对已经饱受折磨的农民。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的农民必须明白，只有跟城

市里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统一战线，只有跟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农民们联合起来，他们才能有出路……”

终于，里多察卡意识到游击队长在跟他说话，这才打住话头，用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脸，疲倦地闭上水肿的眼睛。

“休息一会儿。喝杯水。”站在他身旁的人说。

原本心情焦虑的游击队长，这才舒缓了些。

“这都在乱七八糟地说些什么？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窗户和瞭望塔上的信号灯都已准备就绪，用个形象点的说法，我们的眼线布满全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讨论那份报告。里多察卡同志，你继续说。”

两个摄影师住的大谷仓里原本堆了一些木头，后来他们把木头移到一边，这次非法集会就在旁边一块清出来的空地进行。谷仓门口则用能抵天花板的圆木挡住，作为掩护。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里头的人也能从地下通道逃出去，地下通道通往修道院后面的一条小巷子。

说话的人面如菜色，满脸络腮胡子，秃顶的头上戴一个黑棉帽子。他呼吸急促，汗流满面，似乎很不舒服。他一次又一次地把烟蒂放到煤油灯上点，贪婪地吸上几口。男人身子前倾，一双近视眼紧张地看着散落面前的文件，好似在嗅它们的味道似的。接着，他还是用那疲倦的平缓的声音说：“只有通过苏维埃共产党，才能让城市和农村的穷人站到同一战线。不管你们愿不愿意相信，现在西伯利亚的农民也开始为西伯利亚工人许久之前就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努力。他们共同的目标就

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通过武装暴动，建立属于农民和工人士兵的苏维埃政权。如果想跟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和哥萨克人做斗争，起义者必须要倾尽全力，全方面发动攻击。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说到这儿，男人再次停顿，抹了一把脸，慢慢地闭上眼睛。这时，一个人站起来并举手，示意他有话说。

对于男人的发言，游击队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乌拉尔地区游击队队长——却是一种略带挑衅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他好几次都粗暴地打断男人的话。你很难相信，这么年轻的一个士兵——就是一个刚成年的毛头小伙子——竟然掌管着整支军队，并且底下的人对他敬畏有加，言听计从。他用一个骑兵的外套裹着自己的手脚，半躺在椅子上，

露出上尉军服肩膀处的黑色补丁，而肩章也移到了旁边一点的位置。

游击队长的两边各站了一个年龄差不多大小的保镖，身着白色羊皮大袄，露出灰色的卷曲的羊毛边。从两个保镖那冷峻的表情就能看出，他们对游击队长是绝对的服从，愿意不计一切地为他做任何事。他们没有参与讨论，也对讨论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只是沉默，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

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有些站着，有些则是坐在地板上。坐着的那些人斜靠在圆木砌成的墙上，双腿伸直，或者用膝盖戳着下巴。

房间里还有几个是有身份的客人，端坐在椅子上。来人都是老工人，也是参加1905年革命的老兵。其中就有提沃兹恩，他性格孤僻了许多，跟在莫斯科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还有他的

朋友老安提波夫，安提波夫总是同意他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些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不轻易发话，只是沉默地听别人讲，神情严肃。他们已经被政治阴谋搞得渐渐失去了人性里最光辉、最柔软的东西。

屋子里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人，比如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标志性人物“黑旗”瓦多维奇科。这个瓦多维奇科是个一刻都不得停的人，他总是坐下又站起，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走到屋子中央才停下。瓦多维奇科是个大胖子，头大，嘴巴大，头发跟狮子毛似的。他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是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梦想家。

由于瓦多维奇科的好脾气，也可以说是身宽体胖，他从来都不会注意或计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所以他对正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敏感，总是闹误会，还经常把对手的观点当成自己的，别人无论

说什么他都表示同意。

坐在瓦多维奇科旁边的是他的朋友斯伟里德，是个矿井管理员。尽管他不用下井挖煤，但敞开的黑衬衣的衣领还是显示出他朴实的个性。斯伟里德喜欢把手绞成十字，放到脑后，或者用手挠抓胸部。他算半个布里亚特人，目不识丁，但古道热肠。斯伟里德的头发很少，胡子更是稀疏可见。而蒙古人的脸部特征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脸上总是挂着悲天悯人的微笑。

说话的那个人是中央政府派过来的，身负军事任务来西伯利亚考察，调研这片广袤的地区。其实，他对听自己说话的这些人并不感兴趣。不过作为一个从小就在众人目光中长大的资深的革命人士，他对面朝自己而坐的这位年轻首领很是喜爱。他不仅能够原谅对方的粗鲁——他把这看作革命者

的真性情——甚至还喜欢他的这种傲慢，就跟纯洁的姑娘往往会被情场老手的傲慢而吸引一样。

这位游击队长正是米库力特辛的儿子，里贝尔斯。发言者是合作劳工运动会前成员克斯托耶夫·阿姆斯基，曾经也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分子。不过，他近来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详细阐述自己的错误。因此，共产党不仅吸收他为党员，还很快就委派了这个任务给他。

选择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他只是一个士兵——这一方面是作为对他多年来支持革命的奖励和在沙皇政府统治下所受折磨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合作党的前成员，他了解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想法。就完成这个任务而言，上级更加看重他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了解，而不是他的军事能

力。

政治信仰的改变也让他的外表打扮和行为做出了相应的改变，甚至让人难以辨认。没有人记得，以前他是光头还是满脸胡子。不过，也许那一切也都只是伪装而已。党内有严格的规定，绝对不能泄露自己之前的身份。而他现在的化名就是贝雷迪或者里多察卡同志。

还未等克斯托耶夫说完，瓦多维奇科就急忙表示他同意对方说的每一句话，这让屋子里起了一阵小骚动。待大家安静下来，克斯托耶夫继续道：

“为了与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民运动步调一致，我们需要跟这一地区党组委管辖区域内的所有游击队建立联系。”

接着，他说到了关于秘密会议地点、暗号、联

络方式的具体安排，并详细交待了其他事宜。

“联络站必须弄清楚白军储存武器、食物、装备的地方，以及存放大笔钱物的地方，还有白军的防守情况。

“还有很关键的是，相关的安排得做到细致化，比如游击队人员的分派，首脑，无产阶级原则，秘密工作，与外界的联系，对当地群众的行为态度，革命军事法庭，对敌占区破坏活动——比如，对桥梁，铁路线，汽船，驳船，火车站，配备技术设备的工厂，通讯站，矿井，食物供给线等的破坏。”

听到这儿，里贝尔斯坐不住了。克斯托耶夫说的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根本没说到点子上，显得十分业余。

“我们受教了。”他说，“我一定会记在心里。我想我们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安排，不然就会失去红军的支持，对吗？”

“你们当然得接受。”

“我亲爱的里多察卡，可是你的想法和安排如此幼稚，我该怎么办呢？要知道，我的军队——包括炮兵和骑兵在内的三支部队——已经和敌军战斗了几个月，哪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呢？”

“真是岂有此理！”克斯托耶夫在心里暗忖。

这时，提沃兹恩打断了他们的争论，因为他也不喜欢里贝尔斯那种粗暴无礼的口吻。

“不好意思，党代表同志，我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我已经把它们写下来了，如果您不介意的

话，我读出来，好跟您核实一下——优先吸收曾在前线打过仗且在当时士兵组织成员的老兵进委员会。委员会最好吸收一或两个N．C．O和一个军事技术人员。我写的这些对吗，党代表同志？”

“没有问题，一字不差。”

“那就恕我直言，我觉得寻找军事专家这一点让人很是不安。我们这些1905年参加革命的工人已经失去了对军人的信任，因为他们之中总会存在那么一些反革命因素。”

房间里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够了！确定方案吧！让我们确定一个方案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我跟大多数人意见一样。”瓦多维奇科用低沉混浊的声音说道，“说好听一点儿，民间组织应

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应当是自下而上的制度，这跟种在地里的植物必须扎根土壤是一个道理。你们不能自上而下来推行，那样行不通。杰克宾独裁就是犯的这样一个错误，热月政变分子镇压了议会革命也是这个原因。”

“没错，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斯伟里德附和瓦多维奇科的话，“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我们本应提前考虑这些问题的，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斗争，为我们的既定目标而努力。既然已经开始了，又如何回头呢？汤已经做好了，再难喝我们也得喝下去。我们既然上了同一条船，就由不得人再抱怨后悔。”

“决议！决议！”屋子里的人都叫喊起来。他们各自发表了一些意见，但那些意见大多是些没用的废话。最后，一直到天破晓，会议才结束。大家

各自回家，一如以往地谨慎。

7

公路边上有个地方风景如画。帕扎恩卡河将库特尼和马尼这两个村庄分开来，一个沿着陡坡往下延伸，一个则是分布在山谷里。库特尼村特意为新兵举行了一个欢送派对；而司特思上校管辖的马尼村医委会在复活节假期之后，继续对外开放，处理该地区的各项医疗检查和处方治疗。山上的民兵和哥萨克人闻讯都赶了过来，等着看病。

这年的复活节来得特别晚，春天又来得特别早。天气很是暖和，却连一丝风都没有。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和酒水，供站在库特尼某条大街上的士兵享用，大街离公路有一段距离。新兵们排排站立，不过队伍并不笔直；地上铺满了白布，远远望过去，大街好似一条长长的略有弯曲的软管。

村民们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款待新

兵。主要还是复活节宴席剩下来的一些东西，两条烟熏火腿，一些小面包，两三个大的帕斯克哈蛋糕。桌子上还有一碗碗的腌蘑菇、腌黄瓜、德国泡菜，一盘盘切成块的自制面包，一碟碟或粉红或淡蓝的复活节彩蛋。

破碎的蛋壳散落在桌子周围的绿草地上，粉色或淡蓝色的外皮与白色的内壳相映成趣。年轻的小伙子穿着粉色或淡蓝色的衣服，漂亮的姑娘也是穿的粉色或淡蓝色的裙子，头顶，粉红色的云朵飘浮在蓝蓝的天空上，悠然自在，好似天空就是属于它们的。

瓦拉斯·加卢新穿着一件粉色的上衣，丝质腰带别在腰间，他快速跑过公路上方的一个陡坡，在桌子前站定，开始了他的演说：

“小伙子们，现在没有香槟，我就以自酿的伏

特加酒敬你们。年轻的人们今天就要出发了，你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程和幸福的生活。新兵同志们，我真想多敬你们几杯酒。不过，现在听我说！在你们面前的是一条保护祖国母亲的路，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让我们大好的河山支离破碎，血流漂橹。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和平地镇压革命，但共产党那些人，拿着外国资本主义给的钱，用武力强行把我们的国民代表大会解散了——这可是人们最大的希望所在呀！——现在又大肆杀掠，俄国大地血流成河。年轻的人们，要知道，你们身上肩负的是俄国军队的荣誉！我们这些人失败了，欠英勇战士们一个说法。因为除了红军之外，德国和奥地利也再次扬起了头。孩子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加卢新已经喊得声音嘶哑，但他还是坚持要说下去。他举起手中的伏特加酒杯，啜饮了一口。这并没有给他带去欢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喝葡萄酒。不过一想到这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做出的牺牲，他的心

里就油然生出一种满足感。

“你老爸真是一个演讲的好手，米柳科夫跟他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葛申科对他的朋友泰廖什卡·加卢新说。葛申科坐在泰廖什卡的旁边，声音已显出一些醉意，同桌其他的人也大都醉了。

“他当然是个好人！不过，我想他这样拼命工作，肯定不会是平白无故的。但愿你老爸能用演讲给你换来免服兵役的命令。”

“我真替你惭愧，葛申科！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让他给我免除兵役试试！我跟你肯定会是同一天收到入伍通知单，绝对不会错。我们会在同一支连队服役。那群浑蛋已经把我从学校开除了，母亲为此伤心欲绝，要是我现在再不去参军……至于父亲，他当然知道怎么演讲。每次，他都能说出大家想听的话，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以前并没

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

“你听说桑卡·帕夫努特金的事了吗？”

“听说了。他的病真那么严重吗？”

“没有救了，必死无疑。这也得怪他自己。我警告过他不要去的，可他就是固执己见。”

“那现在他怎么办？”

“哎，真是悲剧。他想自杀。不过现在他到马尼村看病去了，我想他们应该会替他治疗吧。他说自己曾参加过游击队——‘为了报复社会’，他说。”

“葛申科，要知道你现在说的是一种传染病。不过，哪怕你不去，也有可能患上另一种病。”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想你只是根据个人经验才这么想的。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并不是身体本身产生的疾病，而是一种秘密病毒。”

“葛申科，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鼻梁骨。你个骗子，作为朋友，你怎么能跟我撒这样的谎呢？”

“你冷静点儿，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去帕扎斯克过复活节了，在那儿碰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访问学者，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跟我谈到了个性解放。我喜欢他说的那些东西，让人受益匪浅。我也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那个人跟我说，我们自己就有一种内心力量。他还说，性别和个性都是‘动物性电力’的体现，你觉得呢？他真是个天才……不过，他说得太多了，我还没消化完全。人们总喜欢大嚷大叫，让人脑袋疼。我忍受不了啦，泰廖什卡，我跟你说，我

真的无法再忍受了。”

“你说的‘电力’，我也曾听人说过。我曾经还想从彼得堡订购一个电架，货到付款那种，那是我在广告上看到的——增加你的活力，广告上是那么写的。不过，后来又爆发了一场革命，我也就没再想这回事了。”

泰廖什卡还没说完，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爆炸的巨响，当时那些酒醉半酣的人还在嗡嗡地说着话。有那么一会儿，嗡嗡声停止了，一片静寂。不过紧接着是更大的喧闹，更多的混乱。有些人干脆从位置上跳起来，还有一些人则是连站都站不稳。一些人想踉跄着走到别处，却被脚下的桌子凳子撞倒，摔得鼻青脸肿，这又引来一阵咒骂声。女人们更是尖叫个不停……世界似乎再也寻不回一点清静。

瓦拉斯环视四周，想找出引发喧闹的罪魁祸首。一开始他以为刚才的动静是在村子里，也许就在离这些桌椅不远的地方。瓦拉斯脖子上的青筋都显出来了，脸憋得通红，他咆哮道：“是谁在捣乱？谁在制造麻烦？刚刚是谁扔的手榴弹？要是让我抓住，我一定亲手抽他几鞭子，哪怕是我的亲生儿子。同志们，我不会允许任何人跟我们开这种玩笑。我们一定要对村子实行警戒。找出肇事者，一定不能让他溜了。”

一开始大家都还听瓦拉斯讲，不过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马尼村办公楼上空飘出来的黑烟吸引了过去。紧接着，所有人都往山谷那边跑，争先恐后地想知道山谷里头的马尼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办公楼起火了。几个新兵——其中一个还光着脚，身上也只套了件裤子——从那栋楼里飞奔出

来，其他几个村医委会的公务人员也跟着跑了出来。哥萨克人和民兵身体前倾踩住马鞍，挥动手中的马鞭，可身下的马却是像蛇一样左扭右歪，在村子里乱窜。许多人都跑到库特尼村的大街上，他们身后响起的是教堂的警报钟声。

一件件麻烦事接踵而至。黄昏时分，得知肇事者已离开，马尼村的司特思上校带着一群哥萨克士兵跑到库特尼村，将村子团团包围，开始一一对房屋和农场进行搜查。

此时，一半以上的新兵都已是烂醉如泥。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或是脑袋耷拉着趴在桌子上。等他们醒过来，知道马尼村的民兵就在村子里进行大搜查时，天都已经黑了。

几个年轻人蹑手蹑脚地抄近路去到最近的谷仓，彼此推搡，从墙上的一个狭窄地洞爬出去。黑

暗中，他们也认不出这个谷仓究竟是谁家的；不过谷仓里有鱼肉和煤油的味道，似乎是村子里某个商店老板的仓库。

这几个年轻人并不觉得惭愧，也不知道这样躲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傻的事。其中大多数人只是出于本能逃跑，因为他们喝醉了酒，脑袋并不太清醒。不过也有几个人开始担心，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被人知晓。那种大环境下，他们知道任何事都可能和政治扯上关系。在苏维埃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流氓行为被看作图谋不轨的信号；而在白军控制的地区，同样的行为却会被扣上“赤化”的帽子。

而他们发现，谷仓里原来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并不是最先逃跑躲藏的人。于是，狭窄的谷仓里挤满了人，既有库特尼村的村民也有马尼村的村民。库特尼村的村民已喝得烂醉，有人打鼾，有人磨

牙，有人说梦话，还有人头晕脑涨。谷仓里一片漆黑，空气沉闷，且恶臭难闻。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处，最后一个进来的人用石头和泥土堵住出口。过了一阵，打鼾声和磨牙声终于消停了，地下谷仓陷入了完全的沉寂。醉酒的人们已睡熟，只有一个角落还有人在窃窃私语，那是泰廖什卡和葛申科还有柯思卡紧张地抱在一起，柯思卡是个好争辩的人，也是来自马尼村的身材魁梧的刺儿头。

“别说这么大声。”柯思卡说，“你会把我们全都害惨的，你个魔鬼。难道你听不到，司特思的人正把这儿翻个底朝天吗？他们已经到了街尾，可现在又绕回来了。他们就在那儿，屏住呼吸，不然我就勒死你们……幸好，他们跑过去了……你们这些魔鬼躲在这儿做什么？笨蛋，你们为什么要躲起来？谁会动你？”

“我听到葛申科叫了一声‘躲起来’，我就跟着爬进这儿了。”

“葛申科躲起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家里人卷入了麻烦，被当局严重怀疑。他们有亲戚在科达特斯克伊的铁路线上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别乱动，镇定一点，你个笨蛋。这里到处都是人，你要是乱动，很可能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灭顶之灾的。难道你闻不到那臭味吗？你知道司特思为什么要搜查村庄？其实他是在找从外面帕扎斯克来的人，这才是他的目的。”

“怎么会这样，柯思卡？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这都是桑卡惹出来的事。我们都是新招入伍的士兵，原本裸露着身子排成排等医生过来检查。轮到桑卡的时候，他怎么都不愿意脱衣服。其实进

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醉了。工作人员礼貌地跟他说一定要把衣服脱掉才行，人家甚至跟他用了‘您’这样的尊称。可桑卡还是倔强地摇头。‘我不会脱衣服的。’他说，‘我绝不会让其他人看到我的私处。’好似他很害羞一样。接着，他就悄悄摸到工作人员身边，并一拳打中了人家的下巴。不管你信不信，还没等你反应过来，桑卡就弯下腰掀翻了办公室的桌子。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打翻在地，叮里咣啷地响，墨水瓶和新兵花名册也掉在了地上！然后司特思就咆哮着进来了：‘我不会姑息故意闹事的人，这儿可不是让你们闹革命造反的。我会教你们如何在一个办公的地方做到遵纪守法，是谁在惹事？’

“只听桑卡叫道：‘同志们，拿上你们的东西。我们上当了。’接着，他便朝窗户走去，并一拳打碎窗玻璃。我拿上我自己的东西，也跟着他跑

了出去，边跑还得边穿衣服。桑卡跑上大街，跟一阵风似的。我就跟在他后面跑，另外还有其他一两个人也跟着跑了出来。我们都是有多快跑多快，司特思的人就叫喊着追在我们后头。可如果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说得清。”

“那个炸弹又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怎么回事？”

“我是说，炸弹是谁扔的？我也不知道是炸弹还是手榴弹，总之爆炸了。”

“天啊！你不会以为是我们扔的吧？”

“不然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肯定是其他什么人。有人看到我们这些闹事的人跑上大街，肯定就动心思

了：‘为什么不趁乱做点事情呢，反正又怀疑不到我头上，有人背黑锅。’ 肯定是某个政治人物，很可能是从帕扎斯克来的那些政界人士，那个地方都是些这样的人……嘘，别说话。”

这时，街上传来说话的声音，并且那声音越来越靠近，脚步声也越来越响。

“别吵了。你们骗不了我的。”只听外头传来上校那带着彼得堡口音的喊声，“我敢肯定，刚刚那儿有人在说话。”

马尼村的村长奥特威亚扎斯提恩是一个老渔民，他说：

“尊敬的长官，您多想了。村子里怎么会没人说话呢？毕竟又不是在教堂里。说不定是其他在家的村民们在说话呢。毕竟，人又不是开不了口的动

物。或者，是魔鬼把某个睡梦中的人摇醒了呢。”

“少来这一套！别把我当傻子！你说得没错，就是魔鬼！告诉你，你们要是不放聪明点，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要是我不整下风，估计接下来你们都得投靠了共产党那边。”

“哦，上帝仁慈，尊敬的上校先生，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村里都是些大字不识的庄稼汉，连祈祷词都看不懂，他们没事鼓捣布尔什维主义做什么！”

“你说得好听，等我抓到人，你就没办法狡辩了——这个商铺从上到下都搜了一遍吗？里外都要找，要搜得细致些，柜子下面也要搜。”

“是，上校。”

“我一定要找到桑卡、利亚比克和柯思卡，活

要见人，死要见尸。哪怕上天入地，也得找到他们。还有加卢新家的那个小娃娃。我可不管他老爹做过多少爱国的演讲，还指不定他背后有什么阴谋呢。一个商人成天做演讲，这本身就不合理，谁敢保证他不是别有所图？所以怀疑他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收到消息，说加卢新一家窝藏政治犯，并在他们的房子里秘密举行非法集会。先把那几个惹事的毛孩子找到。我现在还没决定要怎么对付加卢新，可要是让我找到证据，我一定二话不说把他处死，以儆效尤。”

搜查最终无功而返。待他们走远了，柯思卡悄声对吓傻了的泰廖什卡说：

“听到了吗？”

“嗯。”泰廖什卡只能颤抖着应一声，连声音都变了。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森林。我不是要一直待在那儿，不过我们得等事情平息了再出来。放心，我们一定还能回来的。”

第十一章　森林兄弟

1

自打尤里·安德雷维奇被游击队抓了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其实，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自由并未受到太大的限制，关押他的地方四面没有墙，也没有守卫，甚至没有人盯他的梢。游击队经常换地方，尤里·安德雷维奇也得跟着他们换。其实，游击队并没有固定说要经过哪些地段或在哪儿驻点，那都是混在一起的。

表面上看来，日瓦戈医生并未被羁押，好似他仍享有自由只是自己未好好利用它罢了。但他的这种不自由是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他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困住了。表面上看来这种力量并不存

在，好似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他的臆想。但事实上，尽管日瓦戈医生未戴镣铐也没人看管，但他确实是不自由的——哪怕表面上看来这都是他个人的想象。

日瓦戈医生三次尝试逃跑，可每次都被抓了回来。游击队尽管没有惩罚他，但他知道自己是在玩火，三次失败之后，他也不敢轻易再尝试。

游击队首领里贝尔斯·米库力特辛很喜欢日瓦戈医生，他喜欢有日瓦戈医生的陪伴，甚至还让日瓦戈在他的帐篷里睡觉。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这种被迫的陪伴令人十分厌恶。

2

这段时间，游击队多半是向东移动。有时这是为了把科尔查克从西伯利亚西部赶走，有时是因为白军在后头追击，威胁要让游击队四面楚歌，所以游击队只好往东边逃。很长一段时间，日瓦戈医生都没能明白这种微妙的东西。

游击队多与公路平行移动，并且不时会利用公路来达成战略目的。公路沿线的村庄城镇是被红军还是白军控制，得根据交战的规模来判断。单从表面，很难判断出特定情况下某个特定村子是被哪一支力量控制。

农民军经过村庄或小城镇的时候，其他一切都会显得不那么重要。马路两旁的房子似乎都沉入了地底下，骑手、马匹、枪支和叫嚣着的大块儿头火枪手似乎都比房子高了。

一天，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镇，日瓦戈医生接到命令要去接受一批英国医疗物资。那原本是卡帕尔将军控制下的白军医疗站，而后落到了游击队的手里。

那是一个黯淡的下着雨的午后，世界仿佛只剩下两种颜色——有灯光的地方是白色的，没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黑色的。而日瓦戈的心情也是同样的惨淡，并未因这黑白的半色调而变得柔和。

马路已经被频繁经过的军队轧得不成样子，成了一条满是淤泥的河道。途中只有几个地方算得浅滩，几座房子立在那上面，每栋房子相距几百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瓦戈医生在帕扎斯克遇见了派拉加·提亚瓜诺娃——从莫斯科到尤里安提的路上，他们曾乘坐同一辆火车。

一开始提亚瓜诺娃认出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

还反应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对方。当时，日瓦戈医生察觉到对面街上有个女人一直盯着自己看，隔着淤泥大路，两人像是站在一条河的两岸。女人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要是日瓦戈还认得她的话就跟他打招呼，要是日瓦戈认不出了那她也就装作不认识。

最后，日瓦戈医生还是想起了她，连同想起那节挤满人的火车车厢，想起了那些被征的劳工和看守他们的人。而对面那个辫子斜搭在肩头的女人，让他瞬间想起自己的家人。旅途中经历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在他眼前浮现，那一张张亲爱的脸，那一个个让他思念无比的人，此刻全都在记忆里出现。

日瓦戈医生冲提亚瓜诺娃点点头，然后走到街上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那儿有一些石头，他想涉石过街，去跟提亚瓜诺娃打声招呼。

提亚瓜诺娃跟日瓦戈医生讲了许多过去这两年中发生的事情。她跟日瓦戈提起瓦塞——就是那个长得好看却被非法征兵跟他们同一车厢的小伙子，也讲述了自己跟瓦塞母亲瓦雷特尼基住在一起的日子。提亚瓜诺娃说那一段日子很开心，但村里人总把她看作外来者。那些人误会她跟瓦塞有私情，逼得她离开村子，不然就要把她打死。后来，提亚瓜诺娃就跟她结婚的姐姐奥尔加·加卢新娜住到了一起。有传言说，曾有人看到普利图列夫把她带到帕扎斯克。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她就困在这小镇上，辛苦地工作。

与此同时，她的朋友也遭遇了许多不幸。瓦雷特尼基因私藏食物而遭到报复性抢劫。听说，瓦塞的房子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个家人还不幸在大火中丧生。而她的姐夫瓦拉斯·加卢新，不是坐牢就是被枪决了，外甥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姐姐已经饿

了好几天，可还是得在一个农民亲戚家做帮工以维持生计。

巧的是，提亚瓜诺娃在帕扎斯克医院找了一份助手的工作，但现在听说医生将被军队征用。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将因此而生活无望，但医生对此也是无能为力。提亚瓜诺娃现在正要去收拾她的东西离开。

医生的马车在商店后门停住。大包小包、皮箱、柳编篮子一个个提了出来。

其他员工只能绝望地看着，就连马厩里那匹瘦小的母马都被他们的悲伤情绪感染了。雨渐渐地小了，天空放晴了。乌云散开，落日也从云底探出头来，在院子里洒下一道道亮光，施下肥料的田地也因此而闪闪发亮。微风吹拂，地上沉重的污泥是怎么也吹不动的。路上的积水泛起一阵涟漪，偶尔还

能照出朱红色的人影。

军队沿着街道前行，碰到水深的坑，就绕过去。被征用的物资当中还有一罐可卡因，因为游击队首领最近对可卡因上瘾了。

3

日瓦戈医生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冬天有斑疹伤寒，夏季有痢疾，并且一年四季都是伤兵不断。随着战事的扩大，这一数字只会越来越大。

尽管游击队遭遇众多挫折，并节节败退，驻扎地仍有许多人加入进来。其中一些是游牧民，一些是被队伍落下的敌军士兵。进入游击队十八个月后，人数已经比先前翻了十倍，差不多达到了里贝尔斯曾在地下会议上吹嘘的数字。

尤里·安德雷维奇手下有了几名新医师和两名助手，都是之前的战犯——凯雷维是一名匈牙利通讯员，曾在奥地利军队里当过军医；此外还有克罗特和安哥拉，他们曾接受过一定的医疗训练。跟凯雷维讲话，日瓦戈医生通常是用德语，而跟后两个人讲话则是用的俄语。

4

根据红十字国际会议的规定，军事医疗人员不得参加军事行动。不过有一次，日瓦戈医生还是被逼无奈打破了这项规定。当时他在一片田地中行医，没想到被敌人包围了，日瓦戈医生只得和其他游击队员一样开枪自卫。

跟敌军交火的地方就在森林的边缘，离前线相当近。日瓦戈医生趴到地上，挪动到连队的通讯台旁。他后面是一片森林，前边是一片田野，而开阔地面的另一边则是攻击猛烈的白军。

白军步步逼近，日瓦戈医生甚至能清晰看到他们的脸。白军多是些年轻人，是从首都莫斯科过来的一批满怀报国激情并志愿参军的年轻人，年龄较大的一些老兵则躲在后头指挥。进攻的步调是由这些年轻人定下的，他们大多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甚

至是高中还没毕业的学生。

日瓦戈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一半以上的脸都让他感觉熟悉。一些人让他想起以前的同学，他想会不会是他们的弟弟呢？还有一些人则让他不禁猜想，或许曾在某个剧场或某条街上见过？对于日瓦戈医生而言，那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英俊脸庞似乎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跟他无关。

这些年轻人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之后，以饱满的激情和无尽的勇气投入了战争，只是这种激情和勇气完全不合时宜。他们昂首迈步，腰杆挺得笔直，不奔跑也不伏地，连掩护地都不屑找——尽管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掩护地。只见，游击队的子弹唰唰地朝那些年轻的躯体飞过去。

空旷田野的中间立着一棵已经死去的树，它也许是被雷电劈中也有可能是经过了一场大火，或者

是被先前的炮火打中而死。每一个前进的志愿兵都盯着那棵树看，以抵挡内心想回头寻找掩护的想法。然后，他们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昂首向前。

游击队的弹药出现了短缺，于是，上头命令只能在清晰瞄准目标之后进行短距射击。

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火枪，他趴在草地上看着他们越走越近。此时，他心里只有对那些疯狂且行将就死的孩子们的同情。日瓦戈甚至真心希望他们的进攻能取得成功。他们可能来自跟他一样的家庭，有着一样的精神世界，接受过一样的教育，甚至连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会是一样。

日瓦戈医生突然想从地上爬起来奔跑，放弃隐藏，以此换来内心的安宁。但那样做很危险，太危险了。如果他高举双手奔跑，两边的子弹都可能打到他，可谓腹背受敌——游击队这边会因为他的背

叛而惩罚他；白军那边则会误会他的举动，以为他是要进攻。日瓦戈医生清楚这种情形，他以前就经历过。他深度考虑逃跑计划的所有可能性，最终还是作罢。尤里·安德雷维奇只能屈服于这种内心分裂的痛苦，他趴在草地上，脸贴近土地，不做任何防卫地冷冷地看着其他人的战斗。

不过周围打得热火朝天，自己不受一点影响是不可能的。这已经不是忠诚于游击队或自我防卫的问题，而是必须得顺势而为，见机行事。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做个局外人，无异于痴人说梦。你得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拿起枪，双方打得热火朝天，而子弹不会长眼，日瓦戈和其他士兵一样，都是子弹攻击的目标。所以，他必须要拿起枪打回去。

所以，当尤里·安德雷维奇旁边的话务员突然身子抽搐然后扑倒在地的时候，日瓦戈医生连忙爬到

话务员身旁，取下他的弹药和枪，再挪回之前的位置，一下一下扣动扳机开枪。

可是出于怜悯，日瓦戈医生又没有办法对那些他欣赏又同情的年轻人下手，所以他只是傻傻地对着空气开枪。他专门选没有人挡住的时候对着横在中间的那棵枯树开枪，枯树再次烧起来了。总之，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反击。

尤里·安德雷维奇瞄准目标，微微调整间距，然后缓慢地扣动扳机。但他并没有一下子扣到底，好似只是假装发射子弹，反倒是期待子弹会自己飞出去。跟之前在林子里打猎一样，尤里·安德雷维奇的枪法还是很准，他故意打在枯树下面的枝干上，直打得断枝四处飞散。

可是，只听砰的一声响，尽管他尽量避免伤人，但时不时地仍会有年轻莽撞的士兵在紧急时刻

撞到他的枪口上。其中有两个士兵受了伤，另一个也倒在树旁，奄奄一息的样子。

最后，白军首领知道强攻无用，下令撤退。

游击队也死伤大半，只剩下几个人。游击队的部分主力已经先行出发，其他队员则忙着在其他地方突围。为了避免被白军看出他们的虚弱，游击队这边也是强忍追击的想法，任他们逃离。

安哥拉和其他两名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跑了过来。日瓦戈医生让安哥拉照顾伤员，他自己俯向话务员，期望躺在地上的话务员还能有一丝呼吸，也好对他进行急救。但当他脱下话务员的外衣听心跳时却发现，话务员的心跳已然停止了。

所有牺牲的游击队员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丝线做的护身符。医生将那护身符取下，看到里面塞了

一张纸条。那纸条折了好几折，缝在布里面。

日瓦戈医生用手指将那布条扯开，看到纸条上写的是《第九十一首赞歌》中的选段。说是祈祷词选段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只是形式一样，里面的内容却大不相同。斯莱弗沃尼克教堂的祈祷词被直译成了俄语。

赞歌里原本有这么一句：

那些居住在最圣洁最秘密的地方的人

而此处却改成了：

身居高处的人

你不要在夜里感到恐惧

也不要害怕白天如箭的光阴

这句话也缩成了：

别害怕战争的弓弩

赞歌里写：

那些知道我名字的人

此处改成：

那些把我名字放在后面的人

此外还有：

我会在困境中陪伴他

改成了：

我会把他从黑暗中解救出来

士兵们认为这些祈祷词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保

佑他们不被子弹击中。之前参加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就带着这样的护身符，过了几十年，一些犯人把这些护身符缝进自己的衣服里。当晚上要进行审讯的时候，他们就默默跟自己念叨这些祈祷词。

尤里·安德雷维奇放下话务员，走到另一个年轻白军的尸体旁。年轻人长着一张英俊的脸，脸上还透出些天真纯洁的气息，好似忘记了所有的苦难。“我为什么要杀了他？”日瓦戈医生在内心拷问自己。

日瓦戈医生解开年轻人的衣服，看到有人——也许是他的母亲——在年轻人的衣服内侧绣了他的名字和姓氏——赛力奥扎·拉恩塞维奇——字绣得有些草，但还是能看清。赛力奥扎的上衣有个开口，里头放着一根十字架链子和一个小盒吊坠，还有其他一些类似于鼻烟盒的小金属盒，盒子有些凹

痕，似乎曾被钉子敲打过。这时，又从里面掉出一张纸条。日瓦戈医生打开纸条，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跟之前一样的《第九十一首赞歌》，只是这次是原文，并且全写在了纸上。

就在这时，赛力奥扎突然发出一声呻吟。他还活着。后来证明，赛力奥扎只是被吓晕了，另外受了一些轻微的内伤。是母亲送给他的护身符救了他。可是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失去意识的年轻人？

此时，打扫战场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没能到达总部的犯人和受伤的敌兵都将被当场刺死。

日瓦戈医生想，就游击队目前的情况，队员的流动性那么大，上面的人应该也不会认识所有人。所以，以新入伍队员的名义把拉恩塞维奇保下来也

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尤里·安德雷维奇脱下死去的话务员的上衣，在安哥拉的帮助下，把拉恩塞维奇跟话务员掉了一个包——尤里把这一切告诉了安哥拉。

此后，日瓦戈医生和安哥拉一直照顾赛力奥扎，直到他恢复健康。尽管赛力奥扎恢复后表示他还是会回到科尔查克的部队，继续跟红军作战，日瓦戈医生还是决定放走他。

5

到了秋天，游击队员占领了福克斯的一片森林。那是一个陡坡上的林子，三面都是水流湍急的小溪，流水哗哗的响。

前一年的冬天，这个林子还在白军手里。当时，白军还在邻村村民的帮助下建了防御工事，但第二年春天离开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把防御工事摧毁。现在，这些沟壕和通讯设施都为游击队所用。

日瓦戈医生跟里贝尔斯·米库力特辛住同一个防空壕。里贝尔斯已经连续两晚上拉着日瓦戈医生说话了，害得他两晚上都没睡觉。

“我在想，我那敬爱的父母，尤其是我那令人尊敬的父亲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天啊，我真是讨厌这种无聊的问题。”日瓦

戈医生没好气地想，他叹息一声，“不过，他跟他父亲还真是一个样。”

“从我们之前的谈话来看，你跟我父亲似乎很熟。你以前对他印象还不错，亲爱的先生，就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里贝尔斯，明天我们得开一场选举前期会议。还得进行一系列的医学实验，劳杰斯和我仍然得亲力亲为搜集实验数据，所以我明天得去找他。而我现在已经连续两晚上没睡觉了。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聊？我真的困得不行了。”

“好吧，不管怎么样，你就告诉我你对那只老鸟是什么看法吧。”

“首先，你父亲还很年轻，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称呼他。好吧，我干脆告诉你好了。我曾经

告诉过你，我很不擅长区分社会主义的不同方面，我也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区别。而正是因为有你父亲那样的人，才会造成俄国如今的混乱和动荡。他是一个革命型的人，天生就喜欢革命。就跟你一样，他代表的是俄国生活的动乱法则。”

“这是褒还是贬？”

“我再次请求你，换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另外，我真觉得你吸食可卡因有些过量了，我得警告你，我们剩下的可卡因也已经不多了。你明知道，可卡因本来是用作医疗止痛的，吸食太多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巨大危害，而我得对你的健康负责。”

“你昨晚又一次打断了学习研讨会。知道吗，你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社会意识了，就跟个目不识丁

的农妇或顽固的资产阶级似的。更何况你还是个医生，还读了那么多书，我相信你肯定还能自己写东西。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我没办法解释。显然读书写作都帮不了我。你可以为我感到遗憾。”

“为什么要假装谦虚呢？如果你不用这种讽刺的语调说话，而是认真去体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你肯定不会这样目空一切的。”

“上帝啊，里贝尔斯，我没有目空一切。我对你做的教导工作满心敬佩，我还读过你写的那些讨论笔记。我知道你在提升士兵道德水平方面的想法，并且我很认同。你所说的都是关于士兵对人民军队，对同伴，对老弱病残，对女人应该有的态度，关于荣誉与仁善——这跟杜克哈勃的教诲差不多。而这种托尔斯泰主义的东西，其实我很熟悉。

我的青年时期也是满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现在又怎会来嘲笑你们？

“不过，首先我得说，自从十月革命以来，让社会更美好的这种论调就没办法再唤醒我的激情。其次，这还只是一些想法，离实践还远着呢，而仅仅是口头上的理论就造成了这么多的流血杀戮，所以我不知道一旦付诸行动还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最后——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我听到人们大肆谈论重塑生活的时候，我就失控且绝望了。

“重塑生活！说这些话的人根本就不了解生活，他们从来没有真心感受过生活的呼吸和心跳——不管他们曾见过多少世面有过多少经历。因为他们只是把生活看作一堆原材料，可以任意由着他们的喜好对其进行加工和改造。但生活从来就不是材料，从来都不是可以被塑造的物质。我可以告诉

你，生活是一种会自我更新的原则，它是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不断调整的，根本就不是你我那些浅显的理论能够驾驭和阐释的。”

“可是说到我们的会议，如果你一直跟我们伟大的人民群众保持接触，你就不会是现在的感觉，就不会这样悲伤。我知道你的这些悲伤从何而起。你看到我们被人打得节节败退，你看不到前头有希望。可是我的朋友，一个人永远都不要惊慌。我可以告诉你更坏的事情——只限于你我之间私下的谈话，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开——不过我想还是算了，我还有一点理智。我们遭受的这些挫折只是暂时的，科尔查克最后一定会失败。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等着看吧，路遥知马力。所以，别垂头丧气的，打起精神！”

“真是无语。”日瓦戈暗忖，“一个人怎么可

以这么顽固，这么天真！我费了这么多时间跟他说，可我们两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截然不同。他用武力把我制服，强迫我违背自己的意愿，与此同时竟然还以为我会为他的受挫而难过，为他的成功而开心！一个人怎么会盲目至此？对他而言，宇宙的命运也比不过一场革命的胜利来得重要。”

尤里·安德雷维奇没再说什么，只是耸耸肩，呼吸也因为激动而变得急促。而这个小细节并未逃过里贝尔斯的眼睛。

“你在生气，伙计，那你就错了。”他说。

“没错。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要告诉你，你的这些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明白吗？‘永远不慌’‘口是心非’‘功成身退’——这些谁都会说的大道理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不管你怎么做，我都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承认你们是俄国的解放

者，是最闪亮的一道光。没有你们这一切都会失去，人们会陷入痛苦和物质的深渊，但我还是不会站到你们的阵营里。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人，你们都可以去死了。

“你崇拜的那些人以各种格言谚语作为指引，但他们却忘了一条最重要的——‘你可以把马强拉到河边，却不能硬按下它的头喝水’——他们已经把解放他人的生活当成一种习惯，却从来没有问过这种解放，这种给予是不是对方需要的。我想，你肯定觉得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你的军营和连队更好的地方了。也许我应该感谢你把我抓来，感谢你把我从我的妻子、儿子、家、工作，以及一切我珍视并且让我的生活有意义的人和事物中解放出来！

“坊间有传言，说是有一群不知名的人——不是俄国人——袭击了瓦利吉诺。卡梅诺德沃斯基对

此也没有否认。他们说你的家人和我的家人成功地逃了出去。一些脚蹬皮靴，头戴皮帽的神秘战士冒着严寒穿过雷恩瓦河，从容地射杀了瓦利吉诺的每一个活着的人，然后又以同样神秘的方式消失了。对此，你有所耳闻吗？这是真的吗？”

“胡扯。纯属造谣。无稽之谈。”

“假如你真如教导士兵时自我标榜的那么善良且慷慨，那就放我走吧。我要去找我的家人，尽管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请你闭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让我清静会儿，因为我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如果你非得说下去，那我只能选择充耳不闻。算了，不说了，敢问我有权利睡觉吗？”

尤里·安德雷维奇在床上躺下，脸埋在枕头里，尽量不去听里贝尔斯辩解的话语。里贝尔斯再次强

调来年春天就能把白军消灭，想以此来抚慰尤里·安德雷维奇。里贝尔斯说：“内战很快就会结束，和平、自由、繁荣的生活指日可待，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敢为难你了。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要有耐心。反正，已经受了这么多磨难，做出了这么大牺牲，也等了这么长时间，再等几个月又有什么关系？况且，现在让你走，你又能去哪儿呢？所以，我是为了你好，才不让你独自一个人离开的。”

“怎么跟放留声机似的，喋喋不休呢！”尤里·安德雷维奇愤恨地想，“他真的收不住话。这些年来一直对着一个人唧唧歪歪，难道他就不觉得羞愧吗？他怎么能一个人自言自语这么长时间？这个该死的浑蛋，日以继夜地说。天哪，我真是恨死他了！上帝做证，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亲爱的冬妮娅，可怜的孩子！你们在哪儿？

你们还活着吗？上帝啊，我走的时候冬妮娅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她是怎么熬过分娩的？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亲爱的人啊，你们遭遇了些什么？冬妮娅，你是我永远敬重的女人。拉拉，我不敢念出你的名字，因为我怕我的生活从此不安。哦，天哪，天啊！——那个讨厌的该死的浑蛋还在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哪天他再这么说，我就宰了他！我一定会宰了他。”

6

骄阳似火的夏天过去了。福克斯森林的西边赫然立着一所白军建造的木制碉堡塔楼。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尤里·安德雷维奇被安排去跟劳杰斯见面，商讨重要事项。见面的地点就在那座碉堡塔楼附近，尤里准时抵达会面地点，但劳杰斯迟到了。趁着等待的间隙，尤里·安德雷维奇来回察看白军留下的土木工事，甚至还爬上瞭望塔，透过空机枪壳的细缝眺望河流那边的山峰。

一到秋天，针叶科树木和落叶科树木就有了明显的区别。郁郁葱葱的松柏树立在那儿好似一堵绿色的墙，而多叶落叶科树木则是一派万紫千红的景象。火红或酒红的树叶让那碉堡看起来宛如中世纪坐落在森林中的金顶宫殿。

日瓦戈医生脚下的土地——不管是人工挖出的

沟壕还是森林小径上的车辙——都相当的坚实，随处可见一堆堆的柳树叶子，弯弯的柳叶打着卷儿，团成一团。除了这棕色的略带苦味的叶子的味道之外，秋天还有其他的许多味道。日瓦戈医生贪婪地吸一口气，把那混着霜打苹果、干柳枝、潮湿泥土的气息深深地吸进身体里。九月的森林飘浮着蓝色的雾气，好似一场刚熄灭的大火的烟雾。

劳杰斯走到了日瓦戈医生身后，但日瓦戈并没有察觉。

“别来无恙，伙计？”劳杰斯用德语问候道。接着，两个人开始商讨正事。

“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关于把私酿伏特加酒的士兵送上军事法庭的事情；其次，是关于战地救护车和药品重新分配的问题；最后，是我对治疗精神疾病的几点建议。亲爱的劳杰斯，我不知道你是

否会认同我的观点，但依我个人的判断，现在很多人都处于疯狂的边缘，而这种现代形式的疯狂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待会儿再具体说。我现在得先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军营里发生了叛乱，有人同情那个酿造伏特加酒的人。另外，这些士兵都担心他们的家人。你知道的，很快会有一个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和父母的护卫队过来，所以许多游击队员都想等到跟家人见面之后再离开。”

“我知道。我们得等他们。”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其他几个重要职位的前夕，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我想唯一的候选人就是里贝尔斯了，不过有些年轻人想把瓦多维奇科推上去。

有个团队支持瓦多维奇科，那些人在精神上跟我们很疏离，而跟酿伏特加的人——库拉克丝和鞋匠生的儿子，从科尔查克那边逃过来的丧家之犬——却是关系亲密。总之，那群人闹事闹得特别厉害。”

“你觉得那些闹事的人会怎么样？”

“我想他们应该会被判决枪毙，然后缓期执行。”

“好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吧。先说战地救护车。”

“没问题。不过，我首先得说，对于你在预防精神病学方面的建议，我并不意外。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广泛蔓延的精神疾病的考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直接跟当代的暴动相关。军营里就有典

型的例子——帕恩菲尔·帕里克，以前在鞑靼军队当二等兵，他有着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并热衷革命。他的问题就在于担心自己死后家里人会受苦，甚至会落入白军的手中，所以要求我们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相信他的家人就在这一批随护卫队过来的人中，但我的俄语不够好，很难准确地问他问题。你可以找找安哥拉或卡梅诺德沃斯基，应该给帕恩菲尔做一个检查。”

“我跟帕恩菲尔很熟。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在军营里碰见。他皮肤黝黑，性格暴躁，额头很窄，对吧？我真不知道你在他身上看到什么优点。他总是喜欢极端的措施、规则或执行。反正，我就觉得他是个很反叛的人。好吧，这件事我尽力解决。”

7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的日子，而这样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一周。

军营还是跟以往一样喧嚣不已，各种声响好似从远方传来的海浪声。其中有脚步声，人语声，伐木声，砧骨声，马嘶声，犬吠声和乌鸦的叫声。一群群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男人露出雪白的牙齿，带着微笑在森林里奔走。那些认识日瓦戈医生的人会向他点头示意，其他的人则是无动于衷地从他身旁经过。

这些士兵拒绝离开福克斯森林的军营驻地，他们要等到家人赶上来见一面才肯离开。可现在逃亡刻不容缓，各项准备工作也是迫在眉睫。而士兵们只是满心欢喜地修理营地里各种破烂的东西，等着迎接家人的到来。

林子中间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军队常在那儿举行会议。原本绿油油的草地也被踩秃了一块，当天上级决定召开会议，说是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林子里的许多树还没有落叶，仍是一番枝繁叶茂的样子。午后的太阳落在森林的后方，阳光透过树梢和叶缝照在地上，好似一面面透明的绿色玻璃。

连队长官卡梅诺德沃斯基在帐篷外的一片空地上烧文件，他手中拿着一份卡帕尔将军的作战记录和他自己的履历文件。扬起的灰尘落在文件上，卡梅诺德沃斯基忙用手拍掉。火焰映着后头的落日，跟树叶一样变成了透明状。红色的火焰在落日的余晖中消失不见，只有一阵阵热浪袭来，才让人知道有火在燃烧。

林子里四处都是成熟欲滴的浆果——酢浆草好

似颜色亮丽的流苏，砖红色的木果鲜嫩诱惑，还有那成簇的白紫相间的嘉莲属植物，煞是好看。蜻蜓挥舞着玻璃般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中飞舞，跟火焰一样也变得透明了，而树叶在风中悄然舞动。

从小时候起，尤里·安德雷维奇就很喜欢黄昏时分的森林。每当这种时刻，他就感觉自己也被阳光射穿了，变成了透明而美丽的生命。好似有一种生命的活力注入进了他的胸腔，穿过他的躯壳，然后长出一双翅膀。也许每一个喜欢生命的孩子都曾有过这种想象，而这种想象会逐渐渗透进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性格，所以此情此景会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唤醒他们心中那份原始的渴望。森林，落日余晖，目之所及的一切似乎都化身成一个同样原始而不可得的女孩儿的一部分。日瓦戈医生闭上眼睛，他在心里轻唤拉拉的名字。此时，生命的全部意象，上帝脚下的所有土地，一切被阳光照射的空

间都在他的眼前展开。

可是，人还是得回到现实。俄国正经历十月革命，而他只是游击队的一名俘虏。想到这儿，日瓦戈医生变得心神恍惚起来，然后他起身向着卡梅诺德沃斯基的篝火走去。

“在烧你自己的记录？还没烧完吗？”

“东西太多了，几天都烧不完。”

日瓦戈医生用脚轻轻踢了踢旁边的一堆文件。那是白军和总部的通信文件。日瓦戈突然想到，里头可能会提到拉恩特塞维奇。不过他翻了一下，却只看到用密码写的一些无聊且过时的信息。日瓦戈医生不禁又踢了下另外一堆文件。事实证明，这不过又是一些无聊的游击队会议记录。最上面的一张纸上写着：“加急。要求重新选举征兵局成员。考

虑到对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特西的指控还未找到真凭实据，苏维埃希望……”

这时，卡梅诺德沃斯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日瓦戈医生。

“这是你们医疗单位的行军装备。陪同游击队家人过来的护卫队很快就要到了，今晚营队内部的纠纷应该就能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动身。”

日瓦戈医生瞥了一眼纸，抱怨道：

“可你这次给我的交通工具比上次还少，何况这次还增加了那么多伤兵。有意志力的伤兵可以自己走，但这样的人少之又少。重伤员又该怎么办？难道那些铺盖和装备都不要了？”

“这个你得自己想办法应付。我们做事情得根

据具体情况来嘛。对了，还有一件事，这是我们共同的请求——你能去瞧瞧我们的一名意志坚定，为解放事业献身的士兵吗？他的身体似乎出了点毛病。”

“你是说帕里克吗？劳杰斯跟我说了。”

“没错。去看下他，给他做个身体检查。”

“他是精神出了问题？”

“我想是的。他说总能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响，那显然是幻觉。另外，他还失眠，头痛。”

“好的，我现在就去看下他吧，反正我这会儿也没什么事。会议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他们正在过来的路上。不过那又有什么打紧呢？你看，我也没去。就算没有我们，他们也

能解决这个事的。”

“那我就过去看帕恩菲尔了。你别看我现在还睁着眼睛，其实我困得不行。里贝尔斯昨晚又拉着我讲他的那一套哲学，我真是烦了。对了，我能在哪儿找到帕恩菲尔？”

“你知道垃圾堆那边的一个桦树小林子吗？”

“嗯，大概知道。”

“空地上有一些给指挥官们住的帐篷，我们安排了其中一个帐篷给帕恩菲尔住。他的家人就要到了，跟护卫队一起过来。你到那儿就能找到他——在其中一个帐篷里——鉴于他如此忠于革命，上级决定升他为营长。”

8

在去找帕恩菲尔的路上，日瓦戈医生就感觉身体疲惫不堪，连步子都迈不大动。这是连续几天晚上都没睡觉的结果，这会子疲倦集中爆发。他其实也可以回到沟壕去，躺下睡一觉，但他又不想待在那儿，因为里贝尔斯随时可能回去，到时候肯定又会对他造成干扰。日瓦戈医生走到一块林间空地上，地上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落叶在地上形成格子的图案，而阳光照在上面，宛如一张金黄色的地毯。这种重叠且相互交叉的光亮很是有催眠的效果，好似有人在你耳边重复地唱一个单调的旋律，日瓦戈医生觉得头更加地晕乎了。

日瓦戈医生顺势在铺满落叶的地上躺下，手臂就搭在一棵树根处的苔藓上，头就枕在其中一只手臂上。日瓦戈很快就睡着了。慵懒的阳光和树影打在他的身上，同样形成格子的光影。所以躺在地上

的日瓦戈医生跟周围万花筒般的光线和树叶俨然融为了一体，就跟变了个帽子戏法似的，他突然就消失在了视线中。

可没过多久，正是渴望睡眠的那股力量又将他唤醒了。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直接的原因才能起作用，超过这个限制，它反而会起反作用。日瓦戈的意识并没有休息，相反因着那对睡眠的渴望反倒变得活跃起来。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脑子里打转，他的思想就跟一个上了发条的发动机一样，转个不停。内心的混乱让他感到焦虑，也让他恼怒。

“那个该死的里贝尔斯。”日瓦戈愤慨地想，“他就跟嫌这个世界还不够把人逼疯似的，非得用他那所谓的友谊和喋喋不休的话，把一个正常的人逼成疯子。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他。”

这时，一只斑点蝴蝶从空地那头迎着阳光飞过

来，它不时地扑腾翅膀，好似一张折来折去的彩色的纸。日瓦戈医生睡眼惺忪地望着那飘飞的蝴蝶。那蝴蝶选了一个跟它本身花纹相近的背景，在一棵布满棕色斑点的松树枝上停下，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跟尤里·安德雷维奇一样它马上就消失了。在光影的变换中，蝴蝶消失了，尤里·安德雷维奇也消失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的意识转到了他较为熟悉的一些问题上——他曾在很多医学案例上间接地触碰到那些问题——关于意志力和目的性是否是人类进化的高级形式；模仿力和保护色；适者生存法则；还有自然选择是否是人类进化和意识成熟的唯一路径。哪些东西是主体？哪些东西是客体？该如何界定它们？日瓦戈医生觉得，达尔文跟谢林相近，而刚才飞过去的那只棕色蝴蝶也跟现代画作和印象派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尤里·安德雷维奇想到了创

造、创造物、创意，还有创造的天赋及模仿这些问题。

渐渐的，尤里·安德雷维奇再次睡着了，可没过多久他又醒了过来。旁边有人压着嗓子在轻声地谈话，把他惊醒了。尽管只是不小心听到了几个词，但他立马反应过来谈话跟一些秘密和不可告人的阴谋有关。由于环境的遮掩，阴谋者没有察觉到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存在。而尤里现在一动不敢动，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他丧命。尤里·安德雷维奇凝神屏息，竖起耳朵听对方的谈话。

日瓦戈医生听出了其中几个声音。正是游击队里的几个人，比如葛申科、桑卡、柯思卡等，还有平常总跟在他们后面的泰廖什卡·加卢新——除了年轻一无是处，每次闹事都躲在最后面。扎克哈尔也在那儿，这个人性格更加阴险，其实他也卷进了伏

特加酿造事件，现在之所以没有控告他是因为他供出了事件的主谋。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最感到惊讶的是，塞沃布鲁依也在那儿，他是游击队首领的贴身保镖之一。要知道，这个受人喜爱且以口风紧而出名的保镖还有一个“赫特曼的耳朵”的绰号。可如今，他似乎也在这阴谋之中。

阴谋策划者正跟敌军的高级代表谈判。敌军代表说话声音很小，根本就听不清，尤里·安德雷维奇只能根据偶尔出现的沉默推测出是代表在说话了——表面看上去像是谈话被中断，或是有人耳语。

说话最多的是酒鬼扎克哈尔，没过一会儿他就会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诅咒叫骂。他似乎就是这阴谋的罪魁祸首。

“你们听着，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要是你们当中有人敢说出去——

看到这把刀了没有？——我一定会亲手把他碎尸万段。听清楚了没有？你们很清楚，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掉。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退。既然已经做了，就得做到底。所以，这次我们得玩个大的，要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想要活捉他。听说，他们的老大古勒沃伊要来。”其实他说的是加利乌林——但扎克哈尔没有发准音，其他人连忙纠正他。“这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机会可谓千载难逢。这是对方的代表，他们会把具体情况跟你们说。他们说，我们得把他活捉。代表同志，现在你把其他事情交待一下。”

接着应该就是敌方的代表说话，而尤里·安德雷维奇一个字都没听到。不过从停顿的时间长度来判断，他应该是详细叙述了阴谋的具体安排。接着，又是扎克哈尔说话。

“听到了吗，伙计们？瞧瞧，他可真是个好家伙。我们为什么要付钱给他？他甚至不能算作一个健全的人——类似于弱智，僧侣或隐士。别笑了，泰廖什卡。你个笨蛋，我让你笑，告诉你，他就是一个隐士。你们要是听他的，他会把你们全都变成僧侣。他跟你们说了些什么？不是咒骂，也并非酒后的胡言乱语，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关于女人。你们怎么能那样过活？今晚我们就要把他抓了。我知道他一定会来，到时候我们一块儿扑上去。没什么难的，小事一桩。难的是，对方想要活捉。他们说，要把他捆起来。好吧，要是那样行不通，那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对付他，我要亲手了结他。他们说会派人过来帮我们。”

然后，扎克哈尔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计划。不过他们是边走边说的，日瓦戈医生也不太能听清了。

“他们是想把里贝尔斯交给白军或者就地把里贝尔斯杀了。”日瓦戈医生既慌张又愤慨地想，忘了他自己也时常想让那个折磨人的里贝尔斯死。该怎么阻止他们？日瓦戈医生决定回去找卡梅诺德沃斯基，把这个阴谋告诉他，同时也要警告里贝尔斯。

可当他回到营地，卡梅诺德沃斯基已经离开。只有他的助手在看着那烧文件的火堆，以防引起森林大火。

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在他们动手之前，这个阴谋就宣扬了出去。当天，计划的细节就曝光了，策划阴谋的人也悉数被抓。原来，塞沃布鲁依扮演的是内奸的角色。这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格外恶心。

9

消息传来，游击队队员的家人再有两天时间就能抵达营地。游击队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然后迅速启程。尤里·安德雷维奇也去找了帕恩菲尔·帕里克。

尤里·安德雷维奇在帕恩菲尔帐篷的入口找到了他。帕恩菲尔的前面有一堆很高的桦树树枝，是他把那些桦树枝砍下来的，但还没来得及把树枝的树皮刮掉。一些树枝承受不住重量，倒了下来，尖的那一端直接插进潮湿的土地。帕恩菲尔把其他树枝拖到旁边的一个地方，另外架起一堆。夹在树枝堆中间的树看着好似是从空中长出来的，彼此也互不相近。好似是因为它们延伸的手臂触到了帕恩菲尔，彼此重叠的绿叶挡住了他回帐篷的去路，才被他砍下树枝来的。

“这是为我最尊贵的客人准备的。”帕恩菲尔解释道，“我的妻子和儿子。帐篷太低了，会有雨飘进来。所以我砍下这些树枝，想重新搭一个房顶。”

“帕恩菲尔，你真不该相信他们的话。谁听过，女人和孩子能在军营的帐篷里住呢？这是不可能的事。你的老婆孩子只能在外头的马车上过夜，而你也只能尽量抽出空闲时间去跟他们见面，他们不可能会允许你的家人住在帐篷里的。不过我此次前来并非为了这件事。他们说，你最近瘦了，吃不下睡不着的，是真的吗？我这样看着，你一切都还好呀。不过确实需要去剪个头发了。”

帕恩菲尔本就是个壮汉，又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这使得本就宽大的额头更显得大了。变厚的额骨就像是一个圈或铁环压在太阳穴上，更给人一

种恐怖狰狞的感觉。

革命之初，人们担心这场革命会跟1905年的革命一样很快就过去，成为受教育的上流阶层拿出来当作茶余饭后谈资的历史小篇章，无法触及社会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人们尽可能地把革命声势造大，尽可能地搞破坏，定要搞得天翻地覆方可罢休。

一开始，像帕恩菲尔·帕里克这样不需要任何怂恿本就对知识分子阶层和官员阶层心存愤恨的人，都被看作革命激情高涨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备受器重和青睐的。他们的一些残忍行为被看作阶级意识强烈的表现，他们的粗暴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坚定性和革命意识的体现。凭借这样的特质，帕恩菲尔有了一定的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共产党首长也格外推崇他。

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看来，这个神情忧郁，不善交际且心胸狭窄的大汉，是个不太正常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堕落的人。

“进到帐篷里再说。”帕恩菲尔说。

“不了，干吗要进帐篷里呢？在外面就挺好的。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进去。”

“好吧。随便你。反正，这里头又脏又乱。我们就在那边的树下坐一会儿。”

于是，尤里·安德雷维奇和帕恩菲尔在一棵小桦树底下坐定，帕恩菲尔跟尤里·安德雷维奇讲起他自己的故事来。

“他们说人这一生几句话就能说完。但我的故事很长，说上三年可能还说不完。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

“好吧，我尽量试一下。我的妻子和我当时都很年轻，她主内我主外，日子过得挺不错的。我们还生了几个小孩儿。可是后来，他们把我强行征到军队里去了，他们派我去打仗。哦，说到战争，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医生同志，你应该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吧？后来，就开始闹革命，我觉得总算看到了生活的曙光。士兵们的眼睛打开了，不仅德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一些俄国同胞同样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叫嚣着：‘参加革命的人们，放下你们的武器，回家去吧，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诸如此类。医生同志，这些东西你自己应该也经历过，就不用我多言了。再之后就是内战，我参加了游击队。现在，我必须要放下很多东西，不然这一切永远都不会结束。经过这一切，你猜我现在明白了什么？那个该死的寄生虫，他从俄国前线拉来了两支斯塔沃洛帕尔斯基的军队，第一支还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军。我又不是个三岁的孩子，你说对吗？难道

我不明白吗？难道说我没对这支队伍尽力吗？医生，我们有麻烦了，大麻烦。那个浑蛋就是想往我们身上倒脏东西。他想包围我们。

“可我还有老婆和孩子。要是他爬上了高位，我的老婆孩子该如何逃离？他们是无辜的，跟这一切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我知道，他不会管这些的。他会用绳子把她捆起来，把对我的愤怒发泄在她身上，他会把我的老婆孩子折磨得半死，将他们碎尸万段。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不睡觉？一个人可以有钢铁般的意志，但这样的事情能让你的意志瞬间崩溃，几欲发狂。”

“帕恩菲尔，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我看不透你。这么多年来你远离家人，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可你并不着急。现在你再过一两天就要见到他们了，感受到的却不是即将和家人见面的快乐，而是

满怀的焦虑，就跟他们马上就要死了似的。”

“那是以前，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白军的浑蛋，他想把我们生吃掉。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不是担心自己。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我又不能把老婆和孩子带去另一个世界，对吗？他们还会活在这世界上，最终肯定会落入那个恶魔的魔爪中。他会一滴一滴地榨干他们的血。”

“这就是你看到妖魔鬼怪的原因吗？他们说，你这段时间老是看见那种东西。”

“医生，我还没跟你说完，最重要的事情还没告诉你。现在，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就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我愿意亲口跟你说这些，但你一定不能背后跟人说。

“我杀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说我手上沾

满了你们这些人——当官的，小资产阶级的鲜血。但我从来没有为此担心过，那些人的鲜血在我看来就跟水一样。我不在乎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在乎自己杀多少人，杀过就忘。但有一个小家伙却总是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我杀了那个小伙子，我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他当时逗我笑，我杀他只是为了开一个玩笑。真的，没有其他原因。我是个傻瓜。

“这件事发生在二月革命期间。当时在凯雷恩斯基的领导下，我们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发动了一场暴乱。之后，我们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前线。于是，他们派来一个年轻人，一个特别会鼓动人心的人，想说服我们回去。‘为了胜利而战。’那个年轻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得很好，但他在我们看来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嫩得很。‘为胜利而战’——这是他的口号。他跳上一个水桶，大声呐喊着口号，水桶

就放在铁轨旁的一个高台上。他跳了上去，想让自己的呐喊被更多人听到，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水桶里。你是不知道那个样子有多滑稽，我笑得肚子都痛了！当时，我手上拿着一把枪，我放肆地大笑，停都停不下。似乎他摔下去是故意要逗我笑的。然后，我把枪瞄准他，并扣动了扳机，他当场死亡。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好像是有人在后面推我一样。

“这就是我的梦魇。我每天晚上都能看见那个火车站。那幕场景当时让我很高兴，可现在我为此感到难过。”

“是不是梅流赛艾沃镇附近的比利乌齐火车站？”

“我记不清了。”

“你当时是不是参加了扎布希诺的反叛军？”

“也记不清了。”

“那你打仗是在哪里？是在西部前线吗？你是不是在西部？”

“好像是的。可能是在西部。我记不清了。”

第十二章　花楸树

1

带着游击队家人、孩子和财物的护卫队紧跟在游击队主力之后。马车后头就是一群群的牛，主要是奶牛——起码有几千头。

随着女人们的加入，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她是一名战士的妻子，名叫扎里达里克哈或库巴里克哈。她既能当兽医，暗中也是一名女巫。库巴里克哈头上戴着一个煎饼似的小帽，身穿豆绿色的皇家枪团外套——这是英国军队提供给最高统治者的衣服之一。库巴里克哈告诉众人，这件衣服是她用囚犯的帽子和衣服改制而成。她说，之前科尔查克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把她给抓了，而且苏联红

军把她从凯扎木斯克监狱放了出来。

游击队换到了一个新的营地。原本只要把周围的环境勘察一番并找到合适过冬的地方，他们就应该搬离这个营地。结果，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却不得不在这儿过冬。

这个新营地和之前的营地十分相似。周边都是茂密的森林，密不透风。其中一边是望不到尽头的公路。早先还在搭帐篷的时候，尤里·安德雷维奇相当清闲，他往几个方向探索了周边的环境，发现人很容易在森林里迷路。途中遇到的两个地方让他的探险增加了难度，也让他印象深刻。

一个位于针叶林的边缘，一出营地就是。那儿的林子因着秋天的缘故，叶子都落光了，所以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所有的风景。唯独其中有一棵很大的孤独的铁锈色的花楸树，叶子依然挂在树梢。花

楸树长在一个小高地上，旁边就是一片泥泞的低矮沼泽，它那大红色的浆果映着秋日的天空，好似盾牌一样守护整片大地。羽毛明丽如秋日早晨的小鸟——红腹灰雀和大山雀——落在花楸树上，啄食最大的果子。它们不时地伸长脖子，头往后仰，以把果肉吞进肚中。

小鸟和大树之间似乎有某种亲密的联系，好似那花楸树已经注视小鸟很长时间，原本拒绝让它们栖息。不过最终出于同情，大树还是让步了，并像一个奶妈似的解开自己的衬衫扣子给小鸟们喂乳。

“好了，好了。”大树似乎在微笑着说，“吃吧，吃饱点儿。”

另一个地方就更让人难以忘怀了。那是营地另一边的一个陡峭高地。从上往下看，你会觉得内壕的底部跟顶部有点不一样——内壕下面看着像是有

一条小溪或是一片长满杂草的野地。可实际上，下面和上面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高度差的原因，森林的树好似沉了下去，于是乎树顶好似到了你的脚下。像这种地方，迟早会发生一次大塌方的。

巨大的森林仿佛是在向白云攀升的过程中忽的摔倒了，连着翻了几个跟斗，要不是它奇迹般的在最后一刻抓住救命稻草，很可能就会掉进万丈深渊——所以，它才会是如今这种模样。

不过，真正让森林里的这块高地与众不同的却是其他的原因。高地的边缘有许多的花岗岩巨石，看起来就像是史前的石桌状墓碑。当尤里·安德雷维奇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确信这绝对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出自人类之手。那很可能是古代异教徒的据点，曾有许多不知名的崇拜者到此祭拜和举行宗教仪式。

一个阴冷的早晨，参与伏特加酒阴谋的十一名元凶和两名男护士将在这个地方被处以死刑。

包括游击队长贴身保镖中的一个核心人员在内的二十个最忠诚的游击队员，将那些等待受刑的人带到现场。他们将策划并实施伏特加酒阴谋的人围成一个半圆，举起手中的来复枪，逼得罪犯们退到石台的边缘。那儿已是无路可退，后面是悬崖万丈，前面又是十来个拿着枪的游击队员——他们必死无疑。

由于长时间的审讯、关押和严刑拷打，他们已是一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就跟鬼魂一样恐怖。

从被抓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缴了械，所以行刑前也没人想到要再去搜他们的身。这样的搜身看着是多余且无用的，是对行将就死的人的嘲讽。

可现在，走在瓦多维奇科旁边的拉扎尼特斯基——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对着护送罪犯的游击队员开了三枪，并迅速将枪口对准塞沃布鲁依。拉扎尼特斯基的枪法很好，不过可能是由于太过兴奋，他的手抖了一下所以就打偏了。被攻击的游击队员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拉扎尼特斯基，并对他开枪。拉扎尼特斯基的手枪里还有三颗子弹，不过他也许是为自己的偷袭失败而懊恼或者是忘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他竟然掉转枪口，随意开枪。第四枪不小心打伤了一个待行刑的罪犯帕奇科里亚。

帕奇科里亚疼得大嚷大叫，在他脚边抓挠。离他最近的两个人帕夫努特金和格拉扎迪克把帕奇科里亚拉起来并钳住了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至于被已经意识不清的同胞乱枪射死。帕奇科里亚的一只脚受伤了，他只能一蹦一蹦地跳到悬崖的边缘，不

停地尖叫。他那凄厉的尖叫声让人听来毛骨悚然，极具感染力。好似这尖叫声是最后的信号，所有人瞬间失去了控制。接下去的场景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最后，是那些等待受刑的人求饶，祷告，咒骂……

年轻的加卢新还戴着他那黄边的校帽，他把帽子取下，跪倒在地，跟着其他人一步步向最嶙峋的一块石头爬去。他们不停地以头磕地，口中不住叫嚷着，好似得了失心疯一样：

“原谅我，兄弟们。我很抱歉，我不会再那么做了，请你们放我走吧。别杀我。我的人生还没开始，我还想再活几天，我想再见一次我的母亲。请你们让我走吧，兄弟们，请原谅我。只要你们放过我，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哪怕是要我舔你们的脚指头。哦，妈妈，救救我，救我！”

这时，躲在人群中的一个人嚷道：

“好兄弟们，善良的同志！这可能吗？我们曾一起并肩作战，参加了两场战争。我们曾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而努力！兄弟，让我们走吧，请你们可怜可怜我们。我们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这一辈子都感激你们的不杀之恩。放心，我们一定会证明这一点的。你们是聋了吗？为什么你们不回答？难道你们不是基督教徒吗？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

又有一些人对着塞沃布鲁依吼：

“犹太佬！你这个谋杀基督教徒的罪人！如果说我们是背叛者，那你比我们的罪行更严重十倍，你个浑蛋，但愿你被送上断头台。你谋杀自己并肩作战的兄弟，要知道你曾经发过誓要和我们共进退，可你背叛了我们。去吧，去亲吻你的森林人的

脚后跟吧，那个魔鬼。总有一天，你也会背叛他的！你也会背叛他的！”

即便是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瓦多维奇科仍然保持冷静。他把头高高扬起，白色的头发在空中飞舞，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对拉扎尼特斯基说：

“别作践自己了！你们的反抗根本没用。这些刽子手，这些人永远都不会理解你！不过，你们不要失望，历史会证明一切。子孙后代自会评断我们的功过，我们是在世界革命胜利前夕以烈士的姿态为革命献身的，我们是为理想而死。革命精神永存！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朽！”

连着二十声枪响，一半的罪犯倒下了，其中大部分直接死亡。剩下的也被另一次齐射打倒在地。加卢新，那个年轻的男孩儿，在地上抽搐的时间最

长，可是最后，他的身体终于还是一动不动了。

2

游击队仍没放弃去另一个地方过冬的想法，他们想去更靠东的地方。他们派人去实地勘察公路那边的乡村，沿着瓦特斯—凯扎姆斯克水道往前走。里贝尔斯经常不在军营里，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日瓦戈医生独处。

不过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游击队最终发现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遭遇了最大的一次挫败。白军决定一次性摧毁挡在游击队前头的不规则森林，于是派重兵包围了他们，并从四面八方层层逼近。按那种态势发展下去，一旦白军收紧包围圈，要消灭游击队就相当于瓮中捉鳖。幸好白军的包围圈较大，再加上日渐临近的冬天让针叶林密不透风，所以敌人前行得比较艰难。

不过，游击队再想移动也是天方夜谭了。他们

只能硬着头皮冲破包围圈，才有可能占据有利军事阵地。可惜，当时游击队并没有一个可供执行的确定方案。游击队员一个个心急火燎，慌张不安。下层军官们甚至连作战的信心都没有了，这种情绪又直接影响到他们下面的士兵。高层军官们则是忙着晚上开碰头会，各自献计献策，想合力制订出可行的突围方案。考虑到当前的位置是在针叶林的中心地带，更有安全保障，游击队最终决定放弃迁移军营的想法。他们具备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大雪会把道路封住，这样白军就更难在针叶林里前行，尤其是白军中也有许多老弱病残的兵员。目前游击队最紧急的任务是，深挖沟壕，并储备物资。

营队军需官比西乌林报告说军营里的面粉和土豆严重短缺，而牛的数量十分充足，所以他建议把冬天的主食换成牛奶和牛肉。

冬天的衣物也出现了短缺，许多游击队员都是半光着身子应对天寒地冻的环境。营队里所有的狗都被绞死了，有经验的人打算用狗皮给那些没衣服穿的人做一些狗皮夹克，里外都能缝上皮毛。

日瓦戈医生指出，交通工具有过剩的情况存在。因为上次迁移的时候，一些伤员是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过来的。当然，马车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

日瓦戈医生唯一剩下的药物就是奎林、格拉伯的盐和碘。碘是结晶碘，所以用来包扎或进行手术之前得先把结晶碘放到酒里溶化。大家现在开始后悔之前把伏特加酒全部付之一炬，他们让那些也参与了伏特加酒案但罪行较轻的人修补酿酒桶或者做出一个新的酿酒桶。当然，新生产出来的酒仅限于医药使用。这个消息在军营里传开的时候，大家都

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并不住地摇头。不用想，肯定又会有人喝酒误事，到时候指不定惹出什么乱子。

制作出来的酒几乎是百分百纯正的，很适合来溶化结晶碘。酒也可以用于奎宁的染色，这在寒冷天气治疗斑疹伤寒时有它的用处。

3

日瓦戈医生决定去看望一下帕恩菲尔和他的家人。过去的这个夏天，帕恩菲尔的老婆孩子就在露天的灰尘漫天的大马路上生活，跟难民没有什么区别。曾经历的那些恐怖事情把他们吓破了胆，而他们觉得未来还会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无止境的奔波和逃窜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印记。帕恩菲尔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有着淡黄色的头发，在阳光的照耀下褪成了亚麻色。他们的眉毛竖起，淡色的眉毛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孩子们毕竟还小，脸上不至于留下太多生活的印记，相比之下，母亲的脸就显得沧桑多了。压力和恐惧让帕恩菲尔老婆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脸上始终凝着一种充满防备的痛苦神情。

帕恩菲尔把全部的心力都花在他们的心上，有时候他甚至会因为孩子而在工作上分心。让日瓦戈

医生惊讶的是，帕恩菲尔竟然能用他那锋利斧刃的一个小角为孩子们雕刻出精致的玩具兔、乌鸦和玩具熊。

家人的到来让帕恩菲尔一下子振奋了精神，他的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不过现在由于有了家庭的牵绊，帕恩菲尔就变得有些不好管理。于是，上级决定派人把帕恩菲尔的家人护送到离营地有一定距离的一个地方，并在那儿给他们安排一个房子，免得再跟难民似的在大马路上生活。但这个计划更多的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行动。日瓦戈医生觉得这个计划永远都得不到执行，而这也让帕恩菲尔的精神萎靡了下来，他以前的幻觉又回来了。

4

冬天真正到来之前，营地里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焦虑，不安，迷惑的情绪，充满危险的外部环境，许多古怪的事件。

白军按照计划完成了包围。白军由瓦特辛将军和奎德里和巴萨里格率领，这几个人是出了名的纪律严明和作战勇敢。军营里的难民和包围圈后面村子里的普通村民对他们更是闻风丧胆。

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白军没办法缩小包围圈，所以游击队并不需要为此过分担心。另一方面，游击队这边也没办法采取主动攻击。游击队员们意识到被动接受这种困境，其实会无形中激发敌军的士气。不管身处包围圈里面的游击队多么安全，他们还是得想办法进行一些突击，哪怕只是做表面功夫。

因此，游击队派出一支强兵集中优势力量袭击包围圈的西边一段。在几天的艰苦战斗之后，游击队战胜了白军，并突破了白军的后层防线。

这次突围为针叶林中的游击队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许多的战争难民也通过这条新路拥进营中。其中有些人并不是游击队员们的亲戚。农民们被白军的惩罚性措施搞怕了，周围村庄的农民全都逃离家园并加入游击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作他们自然的保护者。

不过从游击队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想摆脱这些人的，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地方来安置这些新来的陌生人。游击队派人去跟这些难民们商谈，并将它们悉数安排到齐立木卡河沿岸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子名叫德瓦里——意为大农场，因为它的农场全在木材场的周围。游击队把难民们安置在这个

村里过冬，并给他们送去了生活必要物资。

不过，安排完这一切之后，还是有麻烦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这让游击队的队长也觉得乏力，毕竟他也不能每件事都处理妥当。

随着白军的日渐逼近，那些突围的游击队员此时已经没有办法返回针叶林深处。

另外，女性难民更是让人难以应付。人在针叶林里本来很容易迷路，再加上她们的刻意闪躲，那些被派去带回难民的人经常是空手而归。那些女难民一窝蜂地拥进森林，砍树，修路建桥，储备各种生活物资。

所有这些都跟游击队队长里贝尔斯原本的想法相去甚远，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5

这也是里贝尔斯跟斯伟里德发脾气的原因。他们俩站在公路旁边的一个地方，离针叶林的一处边缘很近。几个军官站在公路上，争论着是否要把沿路的通讯线剪断。这一切自然得由里贝尔斯来做最后的决定，不过他忙着跟斯伟里德谈话，只是打手势要那几个军官再等一会儿。

斯伟里德对于瓦多维奇科被射杀一事深感震惊，因为瓦多维奇科唯一的罪就是因为他在军营里的影响力跟里贝尔斯一样大，里贝尔斯认为他造成了军队的分裂。斯伟里德原本希望瓦多维奇科能离开游击队，回去过他自己独立的生活。但这一切明显不可能。瓦多维奇科做了自己的选择，他不愿离开森林里的兄弟，结果却被当作背叛者被处死。

天气糟糕得让人难以想象。凄厉的北风呼呼地

刮，压在人头顶上的乌云如同在天上飘浮的烟灰。暴风雪说来就来，一点都不给人反应的机会。不一会儿，地上就会铺上一层厚厚的白雪，如同一床厚厚的冬被。可用不了多久，这白雪又会完全消融，露出黑如煤炭的大地，在黑色的天空下闪耀。在接踵而至的雨水的冲击下，黑色的大地愈发地膨胀。大地已经没办法再吸收更多的水。然后乌云会跟窗子一样忽的打开，天空突然就亮了，整片大地也随之闪出冷冷的白光。地上那些不能被吸收的水则形成一个个水坑，闪耀着同样的白光。水蒸气在松树林上空飘浮，好似尘烟。松树林的松针十分地防水，就跟油布一样。雨滴挂在电线杆上好似珍珠，一颗接一颗，永不掉落。

斯伟里德是派去跟那些女难民见面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上级，想把因矛盾的命令而导致的混乱报告上去。斯伟里德觉得那

些命令根本就没办法执行，他要把女性群体中那些恃强凌弱的暴行，那些让人绝望的情形告诉命令的制定者。那些年轻的母亲们徒步跋涉，身上背着一捆捆重物，还得带着小孩子。没有奶水的年轻母亲们由于害怕长途的旅行，甚至会疯狂地抛弃自己的孩子，把包袱里的玉米粒倒在地上，转身回头。她们觉得与其被慢慢饿死，还不如快一点死掉，免得受折磨。落在敌人手上总好过被森林里的野兽撕成碎片。

另外一些坚强的女人可谓是勇敢和自控的典范，哪怕是男人也不一定比得过她们。斯伟里德还有很多的事情想跟里贝尔斯说。他要提醒里贝尔斯，新的叛乱可能为期不远，甚至这一次未知的叛乱会比此前的叛乱更加危险。但心情焦虑的里贝尔斯已经剥夺了他发言的权利。里贝尔斯不断地打断斯伟里德的话，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朋友们正在公路

上冲他招手叫喊，还因为过去的两周里斯伟里德已经多次给出这样类似的警告，所以里贝尔斯早已铭记在心。

“给我一点时间，队长同志。我不善言辞，那些话就卡在我的喉咙里，说不出来。我要说的是，希望你能去难民营看看，要那些女人停止她们疯狂的行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或许会在女人间爆发一场内战？”

“斯伟里德，你继续去做你的事。你明白我要什么。别搞砸了就行。”

“现在有个女魔头扎里达里克哈，反正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谁。她说：‘我是女通风口（通风口和兽医发音相似，此处为斯伟里德的口误），你们让我去照看牛吧……’”

“你是说兽医吧？”

“没错，就是能给牛看病的兽医。不过她现在并没有照看牛群，而是成了一个异教徒的魔鬼似的母亲。她给牛群做弥撒，还怂恿煽动那些年轻的女难民：‘你们遭受的痛苦只能怪你们自己。’她说，‘这就是你们不顾一切追寻红军的结果。赶紧停止吧。’”

“你说的是什么难民——是我们军营里的难民，还是其他的？”

“当然是从外面来的那些难民。那些陌生的新的难民。”

“我不是下了命令让他们到德瓦里村吗？他们怎么没去？”

“德瓦里！你这个问题提得晚了。知道吗，你

说的德瓦里村已经被烧了，木材场和房子全都没了，只剩下一堆灰烬。他们千辛万苦地去到那儿，却一个活人都没看到。一半的难民都被逼疯了，他们叫喊，嘶吼，直接回到白军那边，另一半则往我们这边来了。”

“但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天气里穿过针叶林的呢？”

“你以为锯子和斧头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不是派了一些人护送他们过去吗？多多少少也帮了他们一点儿。他们说，那些难民就这样一棵树一棵树地砍，砍出了一条长达二十英里的路。除了修路，他们还自己搭桥。要知道，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女人！就算换成我们去做这些事，恐怕也得一个月，可她们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

“了不起，二十英里长的路呀！不过，你在高

兴什么？那不正中白军下怀吗？一条通往针叶林的大路！现在他们只要拿着大炮就能来了！”

“我们得赶紧派人去守那条路。”

“我只能说谢谢你，真是谢谢你了。”

6

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子一天比一天短，没到五点天就黑了。临近天黑，尤里·安德雷维奇往军营赶，刚好经过里贝尔斯和斯伟里德几天前谈话的那个地方。不远处的山地和花楸树是营地的边界，远远的他就听见库巴里克哈那略带挑衅的声音，她把那个“兽医对手”叫作“牛群的治愈者”。库巴里克哈唱着小曲儿，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还带点刺耳的尖声。从周围传来的笑声来判断，应该有一大群男人女人正听她唱歌。没过一会儿，歌声停止了，林子里突然变得寂静。日瓦戈医生想，刚才的那些人肯定都散了。

没想到，库巴里克哈再次唱起了歌。这次唱的歌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声音轻柔，好似在自言自语。尤里·安德雷维奇沿着沼泽地上的脚印小心翼翼地前行，这时，他倏的停下了脚步。库巴里克哈唱

的似乎是一首很老的俄国歌曲，因为他没有听过这首歌，又或许，这是她自己编写的歌？

古老的俄国俚曲犹如被水坝挡住的流水。表面上看着那流水已经不流动了，但在深处那水流却在不断地冲击大坝。表面的平静无疑是暗地汹涌最好的伪装。库巴里克哈把歌曲唱得阴柔婉转，歌词不断的重复，逐渐凸显出歌曲的主题。有时，主题会直接地用歌词体现出来，让听者感到惊讶。这就是歌曲表达的悲伤。歌曲似乎想通过本身的词句，疯狂地阻止时间的流动。

库巴里克哈一半在唱，一半在朗诵：

好似一只在荒野奔跑的野兔，

在这荒野一般的世界里，

白雪皑皑，满目苍茫，

他奔跑着，那只大耳朵的野兔，跑过一棵花楸树。

他向花楸树抱怨：

难道我就不会害怕吗？他问。

一颗胆小的心，微微地颤动着。

我害怕，他说，路上野兽的脚印，

野兽踩出来的路，还有那饿狼的肚子。

哦，花楸树，怜悯我吧！哦，美丽的花楸树，

请别把你的美丽交给狡猾的敌人，

那邪恶又贪婪的敌人。

请把你那诱人的红色浆果抛到风中，

让它随风而去，落在这荒野的世界里，落在皑皑的白雪上。

把它们抛到空中，抛到我的家乡，

抛到街道的尽头，最后一所房子，

街道最后面的房子，最后的一扇窗户。

她曾把自己关在里面，

我亲爱的，我永远深爱的人啊，

请你把我的爱告诉她，

把我热诚而温暖的话带给她。

我是一名战士，因战争而凋零，

我是一个漂泊他乡的可怜人，

我想念家乡，

我要挣脱这痛苦的锁链，

我要去找我的红色浆果，

去到我深爱的人身边。

7

帕恩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娅带着生病的奶牛去找库巴里克哈。奶牛跟牛群分开了，用一根绳子拴着系在树上。阿加菲娅坐在奶牛前腿旁的树墩上，库巴里克哈则坐在奶牛后腿边的挤奶凳上。

其他的牛挤在旁边的沼泽地里，被三角枞树的黑色森林围住。枞树有小山丘那么高，高枝和低枝呈宽度递减的态势往上延伸，最下面的低枝好似一个人坐在地上的大屁股。

奶牛多半是黑白点相间，是西伯利亚地区很常见的一个瑞士品种。它们也疲倦了，那种疲倦并不会比奔波劳累的主人少。由于空间太小，奶牛你推我搡，跟疯了似的。母奶牛似乎忘了自己的性别，争着抢着要跳到其它奶牛的背上，并把先前在上面的奶牛扯下来，公牛似的咆哮怒吼。被团团包围的

小母牛好不容易才从下面钻出去，跑进森林，尾巴在空中一摇一摆，引得树枝阵阵乱颤。而牧牛的人——多半是老人和孩子——则尖叫着跟在它们后面跑。

冬日天空上的乌云好似是被森林的高树收紧了包围圈，或黑或白的云也开始撤退，并跟奶牛一般毫无章法地重叠。

站在远处好奇的旁观者不知怎的惹怒了库巴里克哈，她用憎恶的眼神从头到脚上下打量旁观的人们。不过跟艺术家一样，库巴里克哈觉得承认他人的旁观让她觉得尴尬其实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她假装并不在意他们的存在。日瓦戈医生则是从奶牛群的后方注视着库巴里克哈，所以库巴里克哈并不知道他的存在。

这是日瓦戈医生第一次仔细打量库巴里克哈。

她还是戴着平时戴的英国帽子，豆绿色大衣的领子皱巴巴的。骄傲和激情让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眼睛里燃出了年轻的火花，让人感觉她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穿的是什么。

真正让日瓦戈医生惊讶的是帕恩菲尔妻子的变化。他甚至有些认不出她了，在过去的这几天里，她好似老了十岁。阿加菲娅那圆鼓鼓的眼睛好似随时都会从眼眶里跳出来，脖子就跟鹭鸶的脖子一般瘦长。阿加菲娅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

“亲爱的，这只奶牛都不下奶了。”阿加菲娅说，“我之前以为它怀了小牛崽，但它到现在还没下奶，也没产下小牛崽。”

“为什么你会觉得她是怀小牛崽了呢？你看她的乳房上有一道炭疽热的印子。我会给你一些草

药，然后你把药涂在奶牛的乳房上。当然，我也会给它施一点魔法。”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我的丈夫。”

“我会把他喊回来，这样他就不会乱跑了。那很容易。不过他会整天黏着你，你也将没办法摆脱他。还有麻烦吗？”

“让我心急的不是他乱跑，那倒没什么。不幸的是，他努力要抓紧我和孩子们，但现实让他伤透了心，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觉得他们会把军营分开，然后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再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去。最终我们会落在巴萨里格的人手中，而他又不在那里，所以没人会出头保护我们。他觉得我们会饱受别人的折磨。我明白他的想法。我现在害怕的是，他会因此而过分焦虑，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生命。”

“我会记着这件事的。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结束你的这段悲伤。你的第三件烦心事是什么？”

“我没有第三件烦心事了。就这两件——我的奶牛和我的丈夫。”

“亲爱的，你真是可怜。看看残忍的上帝对你做了些什么吧！像你这么善良的人真是难找。你的内心只有两份悲伤，其中一份还是因为深爱的丈夫。好吧，我们马上开始。如果我帮你治好了奶牛的病，你打算拿什么谢我？”

“你想要我拿出什么？”

“我想要一条面包和你的丈夫。”

围观的人群哄笑起来。

“你在开玩笑吧？”

“开得太过了，对吧？那行，言归正传，我不要面包了。我们就以你的丈夫为交换筹码。”

哄笑声更大了。

“它叫什么名字。我不是说你的丈夫，是说这头牛。”

“美丽。”

“一半以上的牛都叫这个名字。好吧，但愿上帝保佑它。”

库巴里克哈开始给母奶牛施法。一开始，她确实是在给奶牛治病，但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分神，并教给了阿加菲娅一整套的巫术。尤里·安德雷维奇听那咒语听得出神，仿佛他又回到了刚到西伯利亚的那一天，他在巴楚河边静静地听那汹涌的流水声……

库巴里克哈说：

“马盖斯塔身子，出来吧，成为我们的客人。请你星期三过来，把这些害虫带走，把一切脏东西带走，把那炭疽的疤痕带走。那母奶牛的乳房患了细菌病。站直了，美丽，尽你的义务，别让主人生气。像座山一样笔直挺立，让牛奶如河水一样奔腾下来。别怕，别怕，拿出你的勇气，把那炭疽热丢到一边。巫师说，你要像上帝一般坚强勇敢。

“瞧，阿加菲娅，你得明白这一切——下达命令和阻止的咒语，你还要知道用于逃跑和自卫的咒语。比如现在，你看向那边，对自己说：‘那儿有个森林。’但那儿真正有的是邪恶与正义的交战——那战争跟你的男人与巴萨里格人的争斗并没有多大区别。

“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你沿着我指的方

向看过去。亲爱的，你看错了边，你要用你的眼睛，而不是你的后脑勺，顺着我指的方向。没错！现在，你觉得那是什么？你以为那是两根被风吹得交织在一起的树枝？或者一个鸟巢？不，你猜错了。那个是魔鬼的杰作，那是魔鬼给他的女儿编的花环。他听到有人靠近，被吓跑了，所以那花环只做了一半；不过再过几个晚上，花环就会编成，等着看吧。

“或者，再拿你的红旗举例。你以为那是一面旗子，对吗？不，那不是旗子。那是死去的女人的紫色手帕，用来招引世人。为什么要招引？那些女人们冲年轻的男人挥动手帕，冲他们点头媚笑，年轻的男人就来了，然后——被杀，接着她就能造成饥荒和瘟疫。就是这样。但你还是会相信她。你觉得那只是一面旗子。你觉得它是在说：‘来吧，世界上所有贫苦的无产阶级。’

“阿加菲娅，你得了解一切，了解所有的事情。你要看清楚每一只鸟，每一块石头，每一根草。比如那只鸟，那是燕八哥。而那一只大型动物是贝吉獾。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假如你对某个人产生了爱意，你就告诉我。不管他是谁，我都会让他对你俯首称臣——哪怕是游击队的头目‘森林人’，只要你喜欢，科尔查克或伊万·萨雷维奇也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你认为我在跟你吹牛？其实不然。我跟你说吧。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狂风卷着暴雪在田野间你追我赶，我就会把一把匕首插进这样的一根雪柱，直至整把匕首淹没其中。等我再把匕首拉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血红色。你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哦，你还是以为我在吹嘘。那你告诉我，风雪做成的雪柱如何会流出血来？亲爱的，这是因为那暴风雪并非是真正的风和雪，那其实是狼人。

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小孩儿，所以在田野中嚎叫着四处寻找小孩儿的踪影。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匕首刺进风雪，最终会流出血来的原因。有了这把匕首，我就能割来任何一个人的脚印，然后把那个人的脚印用丝线缝进你的裙子，这样不管那个男人是谁——科尔查克或斯特尼科夫，或他们推出来的新的沙皇——都会亦步亦趋地跟着你的脚步。你别以为我在撒谎！别以为那风雪是在对你说：‘来吧，全世界贫穷的无产阶级’。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也就是说只要那个男人迈出家门，石头就会跟大雨似的砸在他的头上。或者跟一些人看到的一样，人能骑马奔过长空，马蹄直接踢到房屋的屋顶。或者跟一些古老的先知们说的那样：‘这个女人身上有刺，那个女人身上有花蜜，而另一个女人身上可能是貂毛。’骑士打开女人的

肩膀，如同打开一个化妆匣，用剑刃从里面挑出玉米或松鼠或蜂巢。”

有时候，我们都会突然感受到一种深沉而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永远都会包含怜悯的因素在其中。我们爱得越多，爱的对象在我们看来就更像是受难者。拿一些男人来说，他们对一个女人的感情或许是任何方式都无法计算的，只存在于一个不真实的完全想象出来的世界中。这样的男人甚至会嫉妒女人呼吸的空气，嫉妒自然规则，嫉妒她出生时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尤里·安德雷维奇怀疑，库巴里克哈最后的那些话是某部编年史的开篇之语，不是《诺夫哥罗德》就是《艾帕缇耶沃》，只不过由于后世的人口口相传，那些话的顺序或原本的意思改变了。那么，他为什么曾那样彻底地臣服于传奇经典？为什么这种

垃圾，这种荒唐的话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好似它们曾真实发生过一样？

拉拉的左肩被切开了。如同将一把钥匙插进一个保险箱的锁孔中，剑刃打开了拉拉的左肩，她深藏在灵魂中的秘密也随之暴露在日光之下。陌生的城镇，街道，房屋，乡村田野如同电影画面一样呈现在眼前，一幕接着一幕，纷纷在日瓦戈医生的眼前展现。

他是多么地爱她呀！她是那么地美丽！正如那句话说的“他一直想着她念着她梦着她”。是什么让她如此让人着迷？那种东西有具体的名称或者能被分析吗？不，绝对不能！拉拉的可爱是自然天成的，是造物主的恩宠。她天生就有一种美丽，而她把这种上帝赋予的美丽深深地融进了灵魂中，好似一个小孩儿洗过澡后会用床单紧紧地裹着身体一

样。

此时此刻，他身上发生什么事了，他在哪儿？哦，他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森林里，跟游击队在一起。他和那些游击队员一样被白军包围了，他们将面临共同的命运。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可笑的遭遇！日瓦戈医生脑海里和眼前的情景再次变得混乱而模糊。这时，天不但没有跟他期待的一样下起雪来，反倒飘起了毛毛细雨。好似一面巨大的旗帜横过城市的街道，一个巨大的模糊的让人震惊的头的影像突然出现在森林的上空，从森林的这边直延伸到森林的那头。有如群魔在雨中乱舞，随着雨越下越大，它们也变得更加疯狂。

“现在去吧。”库巴里克哈对阿加菲娅说，“我已经对你的奶牛施法，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请你向圣母马利亚祷告，因为她是光明的化

身，是善良的使者。”

8

针叶林西边边界打起来了。不过针叶林太大太密，所以战争的规模一下子并没有扩大，如同巨大王国边界上的小规模交火一样。位于针叶林中心的营地挤满了人——尽管有很多人已经前去打仗，但剩下的人似乎更多。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远处交火的声音只是偶尔才会传到营地。突然，森林里传来几声枪响。那枪声一声接一声，并且似乎是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没过多久零星的枪声瞬间变成枪火齐射齐鸣。人们连忙往各自的帐篷或马车跑去，一场大暴乱眼看就要开始了。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次假警报。出于好奇，越来越多的人奔去枪声传来的地方。

一个男人躺在地上，流血不止，人群将他团团围住。男人的右手和左腿都被砍断了。凭着剩下的一只手和一只腿，真是难以想象他是如何爬回营地的。被砍断的手和脚就捆在他的背上，下面是一块小木板。木板上写着一段话，多是些辱骂的话语，看来是有人想以暴制暴——一个跟森林人兄弟会没有多少联系的组织。上面还说，除非游击队愿意在规定的时间内放下武器并向瓦特辛将军的军队投降，不然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被砍断手脚的男人由于失血过多已是奄奄一息，他用颤抖的声音讲述了瓦特辛审讯队队员对他的残忍折磨。他原本是要被处以死刑的，但那些人没有绞死他而是砍断他的手脚，并把他送回营地，从而在游击队中制造巨大的恐慌。那些人扛着他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离营地很近的地方才放下他，并命令他自己爬回营地。他们往空中开枪，一是要

引起游击队的注意，二是逼迫男人往营地爬。

奄奄一息的男人连嘴巴都很难张开了。为了听清楚他小声的嗫嚅，围观的人纷纷弯下腰。只听见他说："同志们，要小心啊。他已经突围了。"

"看来真得加强戒备。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我们肯定会抓住他的。"

"一定要小心，他们布下了陷阱。他想打你们一个措手不及。我知道……我撑不了多久了。我在流血，马上就会死了。"

"休息一会儿。别说话。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男人又开口道："那个魔鬼想从我这里套话。他说：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不然我让你死得很难看。但我能跟他怎么说呢？我说我只是一个逃兵。

我想逃回到你们这里。”

“你一直在说‘他’，那‘他’究竟是谁呢？”

“让我喘口气……我再告诉你们。我指的他是赫特曼上校，是瓦特辛那边的人。你们肯定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样子。整座城市哀鸿遍野，他们把人扔在滚水里活活烫死，把人切成肉条。他们抓住你的脖子把你推进一个地方，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哪儿，只知道里面一片漆黑。你慢慢的摸索——好久之后才明白你被关进了一个笼子，货车车厢上的笼子。笼子里有四十个人，全部只穿了内衣裤。笼子的门不时被拉开，并把站在最前面的人拉走。就跟人在鸡笼里捉鸡一样，钳住他的喉咙，一把拖走。我敢向上帝发誓，有些人是被他们绞死的，有些人被枪毙的，还有一些人被严刑拷打。他们打得你皮

开肉绽，还往伤口上撒盐，朝你身上泼热水。如果你被打得吐了，他们就逼着你把吐出来的东西吃进去。至于孩子和女人——哦，天啊！简直是不忍卒睹！”

说完这些，男人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咿咿呀呀地号了几声，话还没说完就归天了。围观的人立刻脱下帽子，在胸前用手指画十字，以示哀悼。

当天晚上，更可怕的一个消息在营地里传开了。

帕恩菲尔当时也在围观的人群中。他看见了被砍断手脚的男人，听见了他的话，一字不落地读了木板上威胁的话语。

他原本就担心自己死后家人会饱受苦楚，这种担心在这个晚上达到了最高潮。他想象着敌人把他

的家人百般凌辱，想象他们那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似乎还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和无助的呼救声。帕恩菲尔在绝望的痛苦中，亲手杀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他要结束他们的苦难也要结束自己的苦难。帕恩菲尔用自己曾给孩子们做玩具的那把斧头砍死了三个孩子和妻子，而他的两个女儿和儿子曾是他的最爱。

让人更惊讶的是，帕恩菲尔并没有马上自杀。他在想什么？他还在期待什么？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显然他已经陷入了癫狂的状态，没有人能救他。

就在里贝尔斯、日瓦戈医生和军队其他成员商讨该拿帕恩菲尔怎么办时，他在军营里四处游荡，头低垂，暗黄色的眼睛闪出邪恶的光芒。帕恩菲尔的脸上有一种不像人类的狞笑，这种笑容一直挂在

他的脸上。

没有人为帕恩菲尔伤心。所有人都避着他。有人说应当把他处以死刑，不过他们还没商议出具体的办法。

在这世界上，帕恩菲尔已没有其他事好做。凌晨时分，他跟一只得了狂犬病的丧家之犬一般逃离了军营。

9

严冬步步紧逼，一场场冰霜接踵而至。冰雾形成众多不连贯的图形，它们或静止，或移动，然后消失不见。冬日的太阳也不再是平时温暖和煦的模样，而是变得面目可憎，像极了一个变形后的怪物。大红色圆球般的太阳挂在森林上空，如同在梦境或童话中一样，它洒下红黄色的光芒，就跟蜂蜜一般黏稠，涂抹在树梢，再在半空中被冰霜凝固。

人走在路上，已经踩不出什么脚印。人们往四面八方走去后脚掌轻轻地从冰雪上滑过，每一步都发出嘁嘁喳喳的声音。而人们那裹着大衣戴着头巾的身体好似是飘在半空中的，跟神人一样。

相熟的朋友碰到了往往会停下来交谈一会儿，他们的脸紧挨在一起，脸被寒冷的雾气冻得通红，胡子跟冰丝瓜络似的挂在脸上。每个人一张口就会

哈出一大口热气，还未等话说完，热气已经在空中凝结。

日瓦戈医生沿着前人踩出来的小路往前走，迎面碰见了里贝尔斯。

“你好，陌生人！今晚来我住的地方吧。去我那过夜，我们好好谈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是通讯员回来了吗？还是瓦利吉诺的消息？”

“暂时跟你我的家人都没关系。不过，这个消息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必须得及时离开，不然我们肯定会听到不好的消息。我们今晚商讨一下。我等你。”

当天晚上，日瓦戈医生走进里贝尔斯的帐篷，他还是重复着那个问题：“你听到什么关于我家人

的消息了吗？请你告诉我。”

“你就是目光太短浅。就我所知，他们现在很安全，并且毫发无伤。不过最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来，先吃点冷牛肉。”

“不了，谢谢。说吧，别转移话题。”

“你确定不吃一点？好吧，你就尝一口。尽管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面包和蔬菜。现在坏血病肆虐，去年秋天我们真该让那些女人多捡一些坚果和浆果。好了，言归正传，现在革命的情形已经好了起来，我的预言就要成真。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科尔查克的军队全线后退。这绝对是一次彻底的崩溃。现在你明白了吗？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还记得你之前是怎么呻吟的吗？”

“我什么时候呻吟过？”

“一直都是。尤其是在我们被瓦特辛步步紧逼的时候。”

日瓦戈医生想起去年秋天叛乱者被枪杀的事情，还想起了帕恩菲尔杀死了自己的妻儿，当时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似乎永无终止。白军和红军针锋相对，一个比一个更残忍。日瓦戈医生的鼻子和喉咙里都是鲜血的味道，这让他感到窒息，让他恶心，让他头晕目眩，但那不是呻吟，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但他该怎么跟里贝尔斯解释？

帐篷里点燃了火把，插在金属支架上。火把散发出一种木炭的味道。一支火把燃尽，灰烬掉落在下面的一碗水里。于是，里贝尔斯又点燃了一支新的火把。

“看到我烧的是什么吗？现在我们没有煤油了，木头又太干，烧得太快。确定你不吃一点牛

肉？说到坏血病，你怎么还不给我们普及一些坏血病的知识并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再折磨我了。关于我的家人，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目前报告中还没有给出定论。不过最新公报上还有其他消息，我还没跟你说呢。内战已经结束了。科尔查克的军队被一举歼灭。红军的主力部队目前正在追击他，据说他往东逃窜了，沿着铁路线往海边走。有鉴于此，我们也得趁热打铁，把被打散的白军残余势力一举消灭。目前，俄国南部的敌人已经全数被歼灭。怎么，你怎么不高兴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你高兴吗？”

“我很高兴。但我的家人在哪里？”

“幸运的是，他们不在瓦利吉诺。卡梅诺德沃

斯基不是曾跟你讲过一件疯狂的事情吗？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四处都在传有神秘的陌生人闯到瓦利吉诺，烧杀抢掠把村子毁灭殆尽吗？我一直觉得那是无稽之谈。不过村子确实被毁了。瓦利吉诺确实出事了，好在他们全都及时逃出去了。根据我的线报，当时只有几个年迈的老人没能逃出去。”

“那尤里安提呢？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那儿是谁做主？”

“这又得说到另一件荒唐事了。我觉得不可能是真的。”

“什么事？”

“他们说白军依然占据着那里，但这显然不可能。我可以向你保证，到时候你自己亲眼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说完，里贝尔斯又点燃一个火把，并将一张残破的地图摊开在桌子上。他跟日瓦戈医生讲解地形，并不住用手上的铅笔在旁边做标注。

“看，这些区域的白军都已撤退——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一片的白军都被赶走了。你在听吗？”

“我在听。”

“所以白军不可能占领尤里安提附近的地方，因为他们的通讯已经被我们切断，不可能逃过被俘虏的命运。不管他们的最高指挥者多么无能，这一点最基本的认识还是会有的。你干吗穿外套呢？你要去哪儿？”

“我要回去一会儿。这儿的烟雾太多了，熏得我头晕。我就想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日瓦戈医生走到外面，把帐篷入口处一张木凳子上的雪推掉，默然坐下。他的手撑在膝盖上，然后支着头。

针叶林，营地，在游击队过的这十八个月全被他抛在了脑后。他忘记了这一切。此刻，日瓦戈医生脑海里只有对于最亲爱的人的回忆。他猜想他们的命运，一幅又一幅恐怖的画面出现在他眼前，让他不寒而栗。

他想见冬妮娅冒着风雪走进一片田野中，怀里还抱着萨沙。冬妮娅用毛毯裹着萨沙，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前行。她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往前挪移，但暴风雪还是将她打倒了。冬妮娅摔倒了，但她又挣扎着爬了起来，可是体力严重透支的她连站都站不稳。狂风毫不留情地扑向她，大雪残忍地想要吞噬她。哦，她有两个孩子，当然更多的精力是

花在小的身上。冬妮娅的两只手都不得空，恍惚间，她好似成了齐立木卡村那些因为悲伤和压力而崩溃而发狂的女人中的一个。

冬妮娅的两只手都不得空，旁边也没有人能帮她。萨沙的父亲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他走了，永远地走了，离开了他们。他算个什么父亲？一名真正的父亲会这么久地离开自己的孩子吗？那冬妮娅的父亲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哪儿了？还有纽莎？还有其他的人，都去哪儿了？最好不要再问，最好不要再想。

日瓦戈医生站起身，转身朝帐篷里走去。突然他的脑海中又蹦出了新的想法，原本他是想回去找里贝尔斯的，这会子却又改变了主意。

许久之前日瓦戈医生就为逃跑做了准备，他藏了一双冰鞋，一袋饼干，还有其他必需的物品。他

把那些东西埋在营地外头一棵高大松树的积雪底下。为了确保需要的时候能准确找到那棵树，日瓦戈医生还在树皮上做了记号。打定主意之后，日瓦戈医生不顾漫天飞舞的大雪，转身朝那棵树走去，他要挖出树底下埋的宝贝。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月光皎洁而明亮。日瓦戈医生很清楚营地哪个地方会有卫兵，所以很容易就避过了他们的巡查。但当他走到那片有花楸树的空地时，远处一个士兵叫住了他，并踏着滑雪板飞快地滑向他。

“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你是谁？说出暗号。”

“兄弟，你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军医日瓦戈。”

“不好意思，日瓦戈同志，我没认出你来。实在不是有意冒犯，不过我真不能让你再往前面走

了。命令就是命令，我们都得服从。”

“随你的便。暗号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打倒一切武装分子’。”

“很好。你走吧。不过这么晚了，您怎么还要出去呢？有人生病了吗？”

“我口渴，睡不着觉。原本想出来透透气，顺便抓一把干净的雪吃吃。走出来看到这儿有棵花楸树，心想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冰冻的浆果，便想摘一些来吃。”

“这可不是绅士会做的事，谁会想着大冬天的来摘浆果呢！我们已经打了三年的仗，可你们这些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愚昧无知。好吧，去摘你的果子吧，你个疯子，我可不管你。”

说完，卫兵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直起身子踏着冰

鞋走开了，只留冰鞋和冰面的摩擦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回响。

日瓦戈医生循着脚印走到花楸树底下，毕竟他刚才是那么跟卫兵说的。一半的花楸树都被白雪覆盖了，另一半是结冰的叶子和浆果，其中有两根树枝笔直地伸向日瓦戈医生。这让日瓦戈医生想起了拉拉那强有力的白手臂，他一把抓住那落满雪的树枝，往自己怀里拉。好似回应似的，那花楸树晃动起来，晃得白雪落了日瓦戈医生一身。日瓦戈医生难以控制内心的情感，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我一定会找到你，我心爱的人，我的花楸树，我的血肉。”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日瓦戈医生趁着夜色穿过了针叶林，走到那棵做了记号的树下，然后挖出他先前埋下的东西，悄然离开了营地。

第十三章　带雕塑房子的对面

1

商人大街沿山而下，位于尤里安提上部的房屋和教堂能俯瞰它的全景。

街道拐角的地方有一座带雕像的深灰色房子。屋基下方的巨大四方形石块上贴满了新近的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群过路人站在人行道上，沉默地看了半天。

新近融化的冰雪，使得空气格外干燥，寒霜也多了起来。尽管前几天的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现如今天已经亮了许多。冬天刚刚过去，它留下的空荡便由黄昏时分的白光来填满。那明亮的光让人不

安，好似是遥远地方传来的召唤，让人情不自禁地加强防备。

白军前几天离开了尤里安提城，向苏联红军投降。炮火、流血和战争焦虑总算告一段落。但这同样让人不安，让人加强防备，如同随着冬天过去而日渐变长的春日一般。

其中有一张政令贴在墙上，借着黄昏的光，能清晰看到上面写着：

符合条件的人能办理到工作证　每人50卢布

办理地址：尤里安提苏维埃联合会食品办公室十月大街5号137号房间（即先前的公务员大街）

没有工作证或工作证填写有误或恶意

欺骗的人将按照战时最严苛的管理制度依法严惩。

工作证正确使用办法详见今年的I.Y.I.K86号公令这一公令将会张贴在尤里安提食品办公室137号房间的墙上

另一张政令上则写着：城里食品供应充足。

上面还说，除了个别资产阶级为了打乱分配制造混乱而囤积粮食之外，粮食分配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结尾的话是这样：

关于囤积粮食，一经发现，当场枪决。

第三条公告上则写的是：

不属于剥削阶层的人有资格加入消费

者协会。具体详情可去位于十月大街5号137号房间的食品办公室咨询（即先前的公务员大街）

对于之前当兵的人，政府还给出了以下的警告：

任何没有交出武器或在未经正式许可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武器的人，将依法严惩。请到位于十月大街6号63号房间的尤里安提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了解新许可的相关规定。

2

这时，一个长相粗犷且憔悴不堪的男人挤进了队伍，站在房子前面阅读公告。男人满身尘污，肩上扛着一个袋子，手里还有一根拐杖。他那杂乱的长头发中倒是没有白发，唯独有不少的白胡子掩映在深黄色的胡子间。原来，这个男人就是尤里·安德雷维奇。他的皮毛外套可能是在路上被人抢走了或者是他自己拿外套去换了食物。此时，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褴褛的短袖外套，这衣服根本就不能保暖。

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袋子里只剩下一些面包屑残渣，那还是附近村子的一个人出于怜悯给他的，那个人还给了他一块板油。其实，尤里·安德雷维奇抵达尤里安提已经有一会儿了，只不过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从城郊的铁轨跋涉到商人大街的这个角落。他实在是太虚弱了，过去这几天的长途跋涉已然让他筋疲力尽。尤里·安德雷维奇时不时地停下脚

步，甚至想双脚跪地亲吻尤里安提城的石板路，因为他曾以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尤里安提城目之所及的一切都让他的心里充满喜悦，就好像跟一个久违的老朋友见面一样。

尤里·安德雷维奇一半的旅程都是跟着铁路线走的。他循着走的那段铁路线基本上已经没用，上面满是积雪，也没有人去管。尤里·安德雷维奇经过了一列又一列被白军弃置的火车，因为缺油因为大雪的缘故，那些火车只能静静地立在那儿。被大雪覆盖的火车一列接一列，绵延数英里。其中有一些火车成了携带武器的士兵据点或是逃亡罪犯或政治流民的藏身之处——总之都是那个时代的流浪者——不过其中大多数列车最终成为了那些冻死或病死的人的太平间或坟墓，当时铁路沿线伤寒症肆虐，一个又一个村庄的人倒下。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确切地验证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人能吃人。流浪者一看到其他的流浪者便心生恨意，很多人因为害怕自己被杀便先下手为强把陌生人杀了。那个时候，就连吃人的事情都不在少数。人类文明的法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丛林法则才是王道。就连做梦，都跟史前穴居人做的那些梦相同。

尤里·安德雷维奇不时能看到孤单的身影沿着沟渠踽踽前行或偷偷窜上他前头的道路。他尽可能地避免跟那些人打照面，不过其中有很多人看着都有些眼熟。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那些人他全在游击队里见过。大多数时候是他自己弄错了，不过有一次他确实没有看错。某天，尤里·安德雷维奇看到一个男孩儿迎着大雪飞快地跑进一列弃置的火车，休息片刻之后，然后又飞速奔回原来所在的位置——那个年轻人确是森林兄弟会的成员。那个年轻人正

是加卢新，而大家都以为他被枪决了。事实上，他当时只是失去了意识，并受了一点伤而已。清醒过来之后，加卢新悄悄地爬离行刑的位置，并在森林里藏了起来直到他身上的伤康复。尤里·安德雷维奇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往家里赶。一路上，加卢新都是用的化名，终日在被雪掩埋的火车里藏身，一看到人就跑。

这些场景和遭遇带有某种超自然的诡异，好似它们真实的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只不过投影在地球上而已。只有自然才会对历史真实，而在现代艺术中，自然也好历史也好都会以伪装的形式呈现。

途中，尤里·安德雷维奇不时能看到安静的深灰色或深玫瑰色的黄昏，苍青的桦树在余晖中摇摆，格外好看。灰白色的冰水在黑色的溪流上面流动，而这流水时常把两岸的积雪弄黑。再过一两个小

时，尤里安提的夜幕也会降临——严霜，透明的灰白色天空，好似柳枝一般柔软。

日瓦戈医生原本是想来看贴在带雕塑房子上的公告，但他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往街对面的三楼房间的窗户瞟。那个房间里有之前的住户留下来的家具。此时此刻，寒霜让窗玻璃的四角变得透明，日瓦戈医生隐约能看见里面的摆设，屋子里面的白色石灰已经不在了。这意味着什么？是之前的住户回来了吗？还是拉拉搬了出去，又有新的人搬进来并对屋子重新摆设了一番？

这种不确定性简直要让日瓦戈医生施狂。他快速穿过街道，走进大门，然后爬上那让他倍感熟悉和亲切的楼梯。在军营的时候，他曾多少次想起这铁铸的楼梯呀！透过天窗，日瓦戈看到了地下的杂物堆放室，看到里面的破椅子、旧水桶和锡盆都堆

放在一起。这些东西仍在那儿，和先前一模一样。日瓦戈医生简直对这楼梯生出了感激之情，感激它如此忠实地保留着过去的记忆。

大门口原本是有门铃的，不过早在日瓦戈医生被游击队抓走之前，那个门铃就坏了，不能再响铃。日瓦戈医生正准备敲门，却发现门上挂了一把挂锁。门锁用两个圈套着挂在雕饰精美的旧橡木门板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放在以前，这种破坏性行为是不可想象的。哪怕要挂锁，也一定要挂一把合适的锁；如果锁跟门不相配，一定会请锁匠来修理。这个小细节其实很好地体现了事物大体上的恶化，日瓦戈医生觉得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尤里安提的生活肯定已经大变样。

日瓦戈医生直觉地认为拉拉和凯特恩卡不在家。或许她们已经离开尤里安提，或许她们已经死

了。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最坏的消息。为了一探究竟，日瓦戈医生决定去找那藏在墙洞里的钥匙，先前那里面总是有很多的老鼠，每次都把凯特恩卡吓得不行。日瓦戈医生先是用手敲了敲墙面，以免把手伸进去时真的摸到老鼠。其实，他对能在里面找到钥匙根本不抱希望。洞里塞了一块砖头，日瓦戈医生把那砖头拿出来，用手摸了进去。哦，真是奇迹！里面除了放着一把钥匙外，还有一张纸条！那是一封长信，写了整整一大张纸。日瓦戈医生拿着信走到露台的窗子边。真是奇迹，简直不可思议！那封信竟然是写给他的！日瓦戈医生迫不及待地摊开信纸：

天啊，我真是太高兴了！他们说你还活着，曾有人在尤里安提城附近见过你，那个人立马就跑来告诉我了。我以为你是直接回瓦利吉诺了，所以我带着凯特恩卡

去那儿找你。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把钥匙放在老地方。等我，你不要走。你会看到我现在仍住在前面的房子里。公寓基本上已经空了，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变卖一部分家具。我留了一些食物，多半是煮土豆。你把炖锅上面的重物搬开，别让老鼠进去了。哦，你能看到这封信我真是太高兴了。

日瓦戈医生把信一口气读到底，并未注意到信的背面还有字。他把信按在唇上，将它叠起来，连同钥匙一起放进口袋。日瓦戈医生在感受巨大喜悦的同时，又觉出一种锐利的刀扎似的疼痛。如果说拉拉已经去过瓦利吉诺，而她在信中又对那儿的情况只字未提，肯定就表示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瓦利吉诺了。这不仅让他感到焦虑，同时也让他倍感难过和悲伤。她为什么在信上只字未提？为什么不说一

下冬妮娅他们过得怎么样或者他们去了哪里？

此时，天已经快黑了，而他还有很多事情得趁着还有点亮光去做。其中最紧急的就是要去看张贴在大街上的那些布告和政令。在那种时候，忽视政令可不是一件小事，有时甚至会因此而丢了性命。日瓦戈医生没有进屋也没来得及放下自己身上的包，他直接下楼穿过街道，走到那面贴满各式各样公告的墙边。

3

墙上张贴的有报纸文章、集会演讲和政令公告等。尤里·安德雷维奇快速浏览标题。“财产征用、评估及纳税办法”“工人阶级控管制度”“工厂委员会”等大标题赫然在目，这些都是新政府取代原先政府之后公布的最新管理办法。尤里·安德雷维奇想，不用说，这是为了提醒众人这一新统治势力永不妥协的本性，以免人们被白军统治太久从而忘了这重要的一点。不过这种单调的循环的重复让尤里·安德雷维奇不免头发晕。这些公告是哪一时期发布的？是第一次动乱时贴出来的，还是白军叛乱之后红军再次重建时公布的？去年是否就已经在策划？还是说前年？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人生经历里，只有这一次永不妥协和意志坚定的话语才让他的心里充满激情。因为这种冲动的激情，是否他的余生就得年复一年地听这些永不改变的，尖锐刺耳的，疯

狂的呼喊和要求？而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口号会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毫无意义且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一时的冲动，而永远被束缚？

这时，日瓦戈医生的眼角扫到一段演讲：

关于饥荒的报告直接揭露了当地政府的不作为。现在有明目张胆的虐待，有大规模投机倒把的活动，而我们的地方工厂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只有大范围调查尤里安提和拉兹维列的工业区，只有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只有把投机倒把者抓一个杀一个，才能把我们从这饥荒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这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日瓦戈医生心想，“人们早就不知道面包是什么滋味了，现在还

来说这种话！按照先前的政令，资产阶层和投机打把的人，不是应该早就被取缔了吗？而农民和普通小市民根本就不存在！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记得他们曾制订的那些计划和颁布的措施吗？要知道那些措施早就把人们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到底是些什么人，能这样不知疲倦，几十年如一日地叫嚣着这些早就不存在的话题，是什么人这样无知这样盲目？”

日瓦戈医生越来越觉得天旋地转。头一偏，他就栽倒在人行道上，失去了意识。待他清醒过来，周围的人都帮着扶他起来，并主动提出可以带他去他要去的地方。日瓦戈医生谢过那些热心的人，只是说他穿过街道就到家了。

4

日瓦戈医生再次爬上那铁铸的楼梯，掏出钥匙打开了拉拉的房门。露台上仍有亮光，跟他刚才出去的时候差不多。他很高兴，太阳没有急着下山。

门吱嘎一声响，让里面起了一阵骚动。久无人居的公寓早就成了老鼠和爬虫的天下，日瓦戈医生一推开门，迎接他的就是叮叮当当一阵乱响。老鼠迅速爬过柜子，有些跳到地板上，四散奔逃。屋子里的老鼠已经多得数不清。面对这些让人憎恶的老鼠，日瓦戈医生感觉一阵恶心，同时又觉得无助。他决定先在一间门尚完整的小房间里过夜，这样至少能拦下一些老鼠。

日瓦戈医生转到屋子的左边——他以前并未到过——穿过一条黑漆漆的过道，走进一个开有两个窗户且面对大街的房间。窗子对面正好是那栋带雕

塑的灰色建筑，一群群的人背对着他，聚精会神地读着上头张贴的公告。

房间里跟外面一样亮堂，又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春日黄昏。明亮的光线让房间看着好似成了街道的一部分，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拉拉的卧室——日瓦戈医生此时所在的房间——比外面的街道更加寒冷。

那天下午当日瓦戈医生越来越靠近尤里安提城时，他曾突然感觉身体虚弱，当时他以为是生病了，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此刻，屋子内外一样的光亮又让他感觉兴奋。日瓦戈医生跟窗外的行人感受着一样的寒冷，这让他感觉和那些人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好似他已经融入了城里的整体气氛，和这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变得亲近了。这种亲近感赶走了他内心的恐惧感，他不再去想自己是否生病的事。春日黄昏的明亮，无所不在的光是一个好兆

头，预示着未来的希望将得以实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会得到想要的一切，会跟他所爱的人团聚。到时候，一切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日瓦戈医生想象着跟拉拉重逢的喜悦，而那种喜悦同时也证明其他的希望是有可能实现的。

狂喜的心情和控制不住的内心骚动取代了之前身体的疲惫。事实上，相比之前身体的虚弱，这种内心的骚动更是生病的前兆。尤里·安德雷维奇坐不住了，他还想去外面转一圈。

日瓦戈医生想趁着日落之前剪一个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要剃掉。其实刚才穿城而过的时候，他已经留心寻找过理发店。但他之前熟悉的一些理发店多半已经空了，另一些理发店则是改头换面做了其他生意，而少数几个还在营业的理发店又没开门。可惜他自己没有剃刀，其实剪刀也可以。尽管

他把拉拉的梳妆台翻了个底朝天，可匆忙中他还是没有找到可用的工具。

日瓦戈医生突然想到斯帕斯克大街上有一家裁缝铺，要是那家店子还开着的话，他就能过去借一把剪刀来。想到这儿，日瓦戈医生马上出了门。

5

日瓦戈医生记得没错。那家裁缝店果然还在那儿，店的前门面向大街，上面开着一个一个大窗户。女裁缝们能边干活边看到过往的行人。外头的行人也能一眼看到店里的情景。

裁缝店里挤满了做裁缝的女人。除了专业的女裁缝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懂裁缝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想要到这儿谋一份差事，从而按照灰色建筑墙上公告上的要求去办理工作证。

这些人很容易就能跟专业的裁缝区分开来。裁缝店只做军服，比如带衬垫的裤子、夹克和杂色的皮毛外套，那都是用不同品种的狗皮做成的，就跟尤里·安德雷维奇曾在游击队里看到的那样。这种工作其实更适合皮毛商去做，业余裁缝做起来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在她们把僵硬的缝边推进缝纫机时，

动作显得特别笨拙。

尤里·安德雷维奇敲了敲窗户，打手势示意他想进去。里面的女人同样打手势回应，裁缝店不接受私人定做衣服，但尤里·安德雷维奇还是坚持。女裁缝们示意要他走，不要打扰她们，说她们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做。其中一个女人做了一个茫然的表情，她举起手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同时用眼神询问日瓦戈医生究竟想干什么。日瓦戈医生用两个手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里面的人还是不明白。他们觉得日瓦戈医生是个粗鲁无礼的人，故意模仿她们的动作取乐。日瓦戈医生站在裁缝店外面，夸张地做着手势，好像一个疯子。女孩子们都咯咯地笑起来，挥手要他走。最后，日瓦戈医生想到还可以绕到裁缝店的后面，穿过院子再去敲店的后门。

6

一个表情严肃的老妇人开了门，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看着像是首席女裁缝。

“你可真是讨厌啊。就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吗？好吧，你说吧，究竟想怎么样？”

“我想要一把剪刀。你们惊讶，我只是想借一把剪刀剪下头发和胡子而已。让我在这儿剪也可以，我剪完之后可以立马把剪刀还给你们，用不了多久的。我会很感激你的。”

老妇人脸上满是一副惊讶和不信任的表情。显然，她怀疑日瓦戈医生的来意没这么简单。

“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原本想找个地方剪下头发，可镇上找不到一家开放的理发店。所以我就想自己来剪，但我又没有剪刀。所以，你能行行好

借一把剪刀给我吗？”

“好吧。我来替你剪好了。不过，我警告你，要是你想耍花样——比如故意想改变外貌，从而伪装自己躲过政府的搜查——就别怪我们举报你。我们可不会为了你而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哦，天啊！你可真是想多了。”

于是，老妇人让日瓦戈医生进了门，并将他引到一个比储物柜大不了多少的偏房。然后，老妇人让日瓦戈医生在椅子上坐下，并在他身上披了一块布。老妇人把布扎在日瓦戈医生的脖间，就跟理发店里理发那样。接着，女裁缝走出房间，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把镊子、一根皮带和一把剃刀。

“我这一辈子做过各种各样的事。”老妇人注

意到日瓦戈医生的惊讶，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我曾当过一段时间的理发师。之前打仗的时候我在部队当过护士，就是那时学的理发。现在，我们先把胡子剪短，然后再用剃须刀剃。”

“您能帮我把头发尽可能剪短一些吗？”

“我尽力。怎么像你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要假装无知呢？好似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按公历计算时间一样。今天是十七号，而理发师们每逢带七的日子就会休息。”

“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不然，我何必假装呢？”

“别乱动，待会儿刮伤你就不好了。所以你刚到这儿？那你是怎么来的呀？”

“走路来的。”

“沿着公路？”

“一半是沿着公路走，一半是沿着铁路走。我都数不清这一路上看见了多少列火车，反正那些火车都埋在了雪里。有豪华火车，特殊专列，反正你能想到的火车我全都看见了。”

“这点胡子要剃掉吗？好了，剃完了。是家里的事吗？”

“天啊，怎么可能！我之前为一个合作组织工作，在那里当巡查员。后来他们把我派去东西伯利亚，没想到我就困在那儿了。你知道的，那儿根本就坐不到火车。我没办法，只有走路。我整整走了六个星期。这一路上我看到了遇到了太多的事情，这一下子说都说不完。”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说。看来我得好好教

教你了。你先看下你自己，这儿有面镜子。你把手从布下面伸出来，拿着这面镜子。行吗？”

“我觉得头发还不够短。您能帮我剪得更短一点吗？”

“要是再剪短可就没这么好看了。我刚说了，你什么都不要说，最好闭嘴。什么合作组织，什么豪华列车，什么巡察——把这些都忘了。现在不是说那些的时候，你可能会因此惹来一大堆麻烦呢。你最好假装自己是名医生或者教师什么的。好了，胡子已经剪短了，现在我们来把它剃干净。还真是，剃一下胡子，看起来像是年轻了十岁。我先去烧壶开水。”

“她可能是谁呢？”尤里·安德雷维奇不由想。他有种感觉，觉得自己跟这个老妇人有某种关系——也许曾见过她或听说过她，或者她跟某个熟悉

的人相似——但他就是想不起来是谁。

没过多久，老妇人提着一壶热水回来了。

“现在我们来刮胡子。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最好什么都不要说。沉默是金。这是永恒的真理。你说的那些什么专列呀合作组织呀——最好想点其他的事情，说你是个医生或老师。想想风景什么的。这种时局，你还想让谁印象深刻呢？我弄疼你了吗？”

“有一点。”

“我知道刮伤了一点，但这也是没办法。亲爱的，你得有点耐心。你的皮肤不习惯剃刀，况且你的胡子又那么粗。放心，用不了多久的。好了，现在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们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了。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麻烦和痛苦。你是不知

道白军统治下发生的那些事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曾有个人讨厌一个少尉，后来他就派士兵在树林里伏击他，伏击的地方离克拉普尔斯基的房子很近。他们抓住了少尉，卸下他的武器，并押着他到拉兹维列去。那个时候的拉兹维列就相当于今天的契卡（苏联秘密警察组织）——一个行刑的地方。你为什么要那样晃动脑袋呢？是我刮到你了，是吗？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但你躲也躲不了哇。你的头发太硬了，跟猪鬃似的。对了，刚才说的那个少尉的妻子都疯了。‘科里亚！科里亚！我的科里亚怎么了！’听说那个女人疯了似的跑出去，直接去找了加利乌林将军。当然，这也只是个说法而已。她是没办法直接找到加利乌林将军的，听说隔壁街有个人知道怎么找到他。那个人很善良，但又很敏感，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愿意为群众出头。反正，你是想象不到这里发生了什么的，私刑、暴政、各种嫉妒的戏码。就跟西班牙小说似

的。”

“她说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拉拉。”尤里·安德雷维奇心想。不过他故意保持沉默，并未询问太多细节。老妇人刚刚用西班牙小说来形容荒唐的一切，再次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想到了什么——也许就是它的荒唐与不相干——但他还是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

“当然，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必须得承认，调查、拷问、枪毙这些事仍然存在。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这是一个新的政府，它才刚刚获得权力，还未站稳脚跟。我们家加上我一共是四姐妹，全都是工人阶级。所以新政府拉拢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一个姐姐死了。她的丈夫是个政治流亡犯，曾在本地的一家工厂当经理。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是农民军的首领——他可真是

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知道她是谁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终于想起来了，“她就是里贝尔斯的小姨，米库力特辛的小姨子，就是那个被当地人奉为传奇的女人，理发师——女裁缝——转轨员——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过尤里·安德雷维奇决定不说出来，这件事自己知道就行了。

“我的外甥从小时候起就很亲人。他是在工厂长大的，从小就在工人阶级间生活。也许你曾听过瓦利吉诺厂？哦，看看我做了什么，我真是个傻瓜。你一半下巴的胡子剃干净了，另一半却还是胡子拉碴。怪我，光顾着说话去了。你怎么不制止我呢？这会儿车床也干了，水也冷了。我再去把水热一下。”

过了一会儿，她端着热水盆回来了。尤里·安德

雷维奇问道：“瓦利吉诺，就是城郊那个离这儿数英里的地方吗？那儿应该挺安全的，能躲过这些动乱吧？”

“唉，其实也不是特别安全。某种程度上来说，那儿的情况比我们这里更加糟糕。听说有人派了一伙武装分子过去，没人知道他们是谁。那些人讲的都不是我们这边的话。他们挨家挨户地搜，见人就开枪，烧杀抢掠一空后就走了。听说，尸体就丢在雪地里。当然，那时还是冬天。你的头别动了，我差点割伤你。”

“你刚说你的姐夫也住在瓦利吉诺。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在那儿吗？”

“没有。上帝还是仁慈的。我姐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刚好出去了。至于他们现在在哪儿，没有人知道，唯一确切的就是他们确实逃走了。听说那儿

还有几个从莫斯科来的人。那几个人离开得更早。其中较年轻的一个男人是个医生，也是一家之主，但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当然，这也只是道听途说。也许那个医生早死了，‘失踪’不过是留点希望罢了。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医生肯定已经被枪杀了。那家人不停地寻找，但那个医生始终没有再出现。与此同时，较为年长的一个男人接到政府命令回莫斯科去了。那个男人是个教授，一名化学家。我听人说，政府专程派人来把他叫回去的。你怎么又开始动来动去呢？真想让我割断你脖子呀！亲爱的，我给你理这个发，你可真是值了。”

所以，冬妮娅他们是回莫斯科去了！

7

“去莫斯科了！去莫斯科了！”这已经是尤里·安德雷维奇第三次往回走了，他在铁楼梯上每爬一级，就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一次。推开房门，迎接他的仍是四散奔逃的老鼠。尤里·安德雷维奇很清楚，不管他现在多么累，他也没办法在这种环境下睡着——除非把这些惹人厌的老鼠全都赶走。晚上要想安然地睡一会儿，首先就得把那些老鼠洞堵死。幸好，卧室里的老鼠洞比其他地方少一点，地板的情况也好一点儿。不过他还是得抓紧时间。天越来越黑了。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惊喜的是，厨房的桌子上竟然放着一盏灯，也许那是特意为了他的到来准备的。有人把灯从灯架上取了下来，里面还有一半的煤油，旁边还有一盒火柴。尤里·安德雷维奇想，最好还是省点火柴和煤油吧。后来，他又在卧室里找了一盏小油灯——油灯里还窝着一只小老

鼠，里头的油也被老鼠折腾得只剩一点点了。

屋子有些地方的墙角线并没有跟地板接起来。尤里·安德雷维奇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用碎玻璃把屋子里的老鼠洞堵起来。门也装好了，一旦关上，老鼠就进不来了。

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荷兰式炉子，炉子檐是倾斜的，都快触到天花板了。厨房里还有一捆木头。尤里·安德雷维奇决定从那儿取几根木头来，他单膝跪地，从木头捆儿中抽了几根出来，放在左手臂上。尤里·安德雷维奇把木头抱到卧室里，放在炉子旁边，再把头探到炉子里面看它是否还能用。他原本想把门锁上，但后来发现门闩是坏的；于是他用报纸把门楔牢，然后悠然自得地点燃炉子。

就在尤里·安德雷维奇往炉子里添柴火的时候，他注意到有根木头上刻了个十字，另外还有两个字

母——K．D．。这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感到十分惊奇。以前，如果木料被工厂退回来，那些木料就会当柴火卖掉；而在劈成段之前人们会在上面刻两个大写字母，标示木料的来源地。

“K．D．”代表的是瓦利吉诺的库拉比什地区。

这个发现让尤里·安德雷维奇十分不安。拉拉的屋子里有这些圆木，就表示她跟萨姆德威亚托夫有所联系。萨姆德威亚托夫给拉拉弄来这些木头，又给他和他的家人弄去他们需要的东西。尤里·安德雷维奇一直不太愿意接受萨姆德威亚托夫的帮助。现在他对萨姆德威亚托夫的感情除了亏欠的尴尬之外，又多了一种新的复杂的情绪。

尤里·安德雷维奇知道，萨姆德威亚托夫帮拉拉绝不仅仅是出于好心。一想到萨姆德威亚托夫平时

随便的作风，再想到拉拉身为一个女人的鲁莽，他就觉得很生气。他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

干燥的库拉比什木头一扔进火里就烧起来了，咔嚓咔嚓直响。而尤里·安德雷维奇内心嫉妒的小火苗也随之熊熊燃烧起来。

尤里·安德雷维奇心里备受折磨，一下子担心这个，一下子又担心那个。他没办法摆脱这些怀疑，想法也一直不停地变化。想到家人的时候他会高兴一点儿，但一想到拉拉和萨姆德威亚托夫，嫉妒的火焰又让他黯然不已。

“所以你们到莫斯科了，我亲爱的人们？”老妇人的话让尤里·安德雷维奇确信了冬妮娅他们的安全，“所以，你们再次长途跋涉回了莫斯科，而这次我缺席了。你们一路上是怎么熬过去的？为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会被召回？他要回去重新

执教吗？你们怎么找到房子？哦，我真是太傻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房子还在不在。天啊，这一切真是太艰难太让人痛苦了。要是我能够不再想这些事情就好了。现在想也想不出个答案。冬妮娅，我究竟是怎么了？我觉得我生病了。我们会怎么样？冬妮娅，你现在怎么样？冬妮娅，亲爱的冬妮娅。还有萨沙，他怎么样？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好吗？我自己呢？为什么你们要把我扔下？哦，信念之光永存！为什么我们要分开，我心爱的人儿啊？为什么你们要离开我身边？不过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们会团聚，对吗？我会找到你，哪怕翻越千山万水，我也一定要找到你。我们会再见面，重新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吗？

“为什么大地不干脆把我吞噬，为什么我总是忘记冬妮娅当时肚子里还怀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生下来了吗？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忘记了。她是怎

么熬过分娩的痛苦的？也许孩子就出生在回莫斯科的途中？拉拉应该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可现在这儿又出来一个听闻过他们的陌生人，一个女裁缝，一个理发师。而拉拉又在信中对他们只字未提。她如何能这么粗心、这么冷漠？同样古怪的是，拉拉也从来没有提及她跟萨姆德威亚托夫认识的事。”

尤里·安德雷维奇重新打量四周。屋子里的摆设都是先前房子的主人留下的，那个人早就消失了。房子里没有拉拉的东西，也没有拉拉的一丝气息。墙上挂着的也是陌生人的照片。尽管这样，尤里·安德雷维奇还是觉得照片里陌生男女的眼神让他很不舒服。屋子里陈列的家具似乎也透出一股怨恨的气息。他突然觉得这间屋子好陌生，不想再在里面待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之前他老记挂着这栋房

子可真是太傻了，他气愤自己竟然傻到相信走进这所房子就等于走进了思念拉拉的心。这种想法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都会觉得很傻！萨姆德威亚托夫是那么地强壮、务实、有能力、英俊，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那么讨人喜欢，而他呢？为什么拉拉非得喜欢脆弱的他，接受他那含糊的、不切实际的爱情呢？难道她需要的会是这种混乱和纠结吗？难道她会喜欢这样的自己吗？

对他而言，拉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该怎么描述呢？哦，这个问题他能回答。

一个春日的黄昏，空气中是四散的嘈杂的声音。孩子们在大街上玩闹追打，好似是为了展示这片辽阔的土地还有那么一些生命力。而这辽阔的大地就是俄国，是他那无可媲美的祖国母亲。世人知道的俄国是一个威名远扬，有牺牲精神，顽固，夸

张，疯狂，不负责任，备受喜爱，辉煌，饱经磨难，未来不可测的。哦，活着真好！活着，并且热爱生命，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哦，从来没有这样感谢过生活，感谢生命本身。

在日瓦戈医生心中，拉拉正是这样的。你无法与生活和生命沟通，但拉拉是生活的代表。生活的样子，生命那不可说的原则在拉拉身上，都能清晰地体现出来，任何不可说的东西都会变得可说。

而刚才对拉拉带着怀疑的抱怨和责备其实并不是真的，绝对不是真的！拉拉是完美的，完美无瑕。

想到这儿，日瓦戈医生的眼睛里充满欣赏和后悔的泪水。他拉开火炉的门，搅动里面的火灰，然后再把点燃的木头塞进去，屋子顿时暖和起来。日瓦戈医生就让火炉门那么开着，他在火焰边坐下，

感受着火影在他身上跳动，暖热的气息直扑他的脸和手。这温暖和光明让他清醒了过来。此时此刻，他无可救药地想念着拉拉，渴望一切能把他与拉拉拉近的东西。

于是，日瓦戈医生从口袋掏出那皱巴巴的信。因为信是折着的，所以他很容易就能看到信背面的字。之前他把那些字漏掉了，这时才发现那后面其实还有字。日瓦戈医生把信展平，借着跳跃的火光心情激动地读起信来：

“你肯定知道你们家人的遭遇。他们如今在莫斯科。冬妮娅生了一个小女儿。”后面的几句话被拉拉画掉了，再往下：“我之所以把这几句话画掉，是因为这只是我的傻话。如果我们还能再见面，我再跟你说那些话。我得出去了，我得去

弄一匹马来。要是没办到，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凯特恩卡真是太难了……”后面的字句俨然是模糊的，无法辨认。

“她从萨姆德威亚托夫那里搞来马。”尤里·安德雷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跟萨姆德威亚托夫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的话，她就不会提这件事了。”

8

炉子烧热以后，尤里·安德雷维奇把烟囱关上，然后找了一些东西来吃。这一番忙活之后，他感觉特别地困倦，于是和衣在沙发上躺下，并且很快就睡着了。老鼠在墙后面和门后面吱吱喳喳，不过那影响不了他。尤里·安德雷维奇接连着做了两个噩梦。

尤里·安德雷维奇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在一间带玻璃门的房间里头。房间的门是锁上的。他抓着门把，努力把门拉向自己这边。而另一边是他的小儿子萨沙，穿一身剪裁合体的衣服，头上戴一个帽子，正在使劲地敲门，哭着喊着要进来。萨沙的后面像是有一个瀑布，瀑布的水不断溅到萨沙的身上和紧闭的门上。瀑布飞流直下的声音震耳欲聋。那水或许是从爆了的水管里流出来的——那个时候经常发生这种事，或者是这条门堵住了某个乡间峡谷

汹涌的流水，挡住了那千年一遇的寒冷和黑暗，所以才会有这种瀑布的效果。

流水的喧哗吓坏了小萨沙。他哭得更起劲了，但尤里·安德雷维奇还是能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唇语喊："爹的。"

尤里·安德雷维奇简直心都要碎了，他好想把儿子揽到自己怀中，用力地抱紧他，带着他离开这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尽管尤里·安德雷维奇泪流满面，但他的双手始终拉着门把，把那孩子挡在外面。他为了一个不是孩子母亲的女人，为了一个随时可能从另一扇门进来的女人，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挡在了外面。

尤里·安德雷维奇在满头大汗满脸泪水中惊醒。"我发烧了，我生病了。"他想，"这不是斑

疹伤寒。这是由极度疲惫引起的一种危险疾病——跟任何一种严重感染一样，接下来是生是死就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我现在太困了，我没办法思考。”很快，尤里·安德雷维奇又睡着了。

接着，他的梦境又来到一个黑乎乎的冬日早晨，一条喧哗的莫斯科街道上。从早晨的人流量，响铃的推车和照着积雪街道的黄色灯光来看，那应该是在革命之前。

尤里·安德雷维奇梦见一所开有很多窗子的大公寓，窗子全开在房子的同一边，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全部拉着垂到地的窗帘。

公寓里面，人们横七竖八地躺着睡觉，每个人都是和衣而睡，就跟旅行的人一样。而房间里面跟火车车厢一般脏乱，到处都是吃了一半的烤鸡腿和鸡翅膀，还有其他吃剩下的食物随意散落在油腻腻

的报纸上。很多朋友、亲戚、拜访者、无家可归的人的鞋子全放在这间公寓里，原本晚上的时候他们的鞋子是要移开的，但此时那么多双鞋子全都摆在地上。穿着裙子的女主人拉拉匆忙系上围裙，快速而沉默地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忙着手上的杂务。而他就亦步亦趋地跟在拉拉后面，笨拙地说一些不相干的话，连他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了。可是拉拉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认真听他说话，只是不时困惑地看他一眼或者发出一两声独特的银铃般的笑声。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唯一表示亲密的方式。他为这个女人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但她却还是这般遥远这般冷漠，却又这样地让人着迷。他喜欢这个女人胜过一切，跟她相比，任何人任何事似乎都失去了价值。

9

哭泣的不是尤里·安德雷维奇自己，而是某种比他的肉体更强大的东西，用那明亮的带着磷光的话照亮黑暗。灵魂在哭泣，所以他也哭了。他同情自己。

“我病了。”半睡半醒间，尤里·安德雷维奇意识到这一点，“我一定是得了某种伤寒症，只是书上没有对这种病症的记载，学界也没有人对它有过研究。我得自己去找点东西吃，不然我会饿死的。”

可当他试图用手肘撑起身体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动弹。也许他是晕过去了，也许是睡过去了。

“我在这儿躺了多久？”尤里·安德雷维奇再次

幽幽地醒了过来，他问自己，“我睡了几个小时？还是几天？我倒下的时候还是早春。可现在窗子上结了那么厚的冰霜，房间里也是这么地暗。”

老鼠在厨房里的餐盘上爬来爬去，或是沿着墙边爬，有时重重地落到地上，发出让人讨厌的吱吱声。

尤里·安德雷维奇又睡着了。再次醒来时，他发现外面落满雪的窗子闪着一种粉红色的光，好似装在水晶酒杯里的红酒。尤里·安德雷维奇分不出这究竟是破晓还是黄昏。

尤里·安德雷维奇一开始思考，就能听到很多嘈杂的声音，这让他感到害怕，他觉得自己就要疯了。他为自己的遭遇而悲伤地哭泣，无声地抱怨上帝将他遗弃了。

“哦，永恒的光，你为什么要把我抛下，抛在这黑暗的地狱里？”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并非精神错乱，他原本穿在身上的衣服不见了，而是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汗衫；他记得自己原本是躺在沙发上的，可这会儿身下却是一张新床。一个女人坐在他旁边，身子俯向他，头发里混着他的泪水的味道——这是拉拉。尤里·安德雷维奇再次因为狂喜而晕厥过去。

10

尤里·安德雷维奇之前抱怨上帝将他抛弃，但此时他的上帝就在他的床边，用那一双洁白的强壮的女人的手臂抱住他。尤里·安德雷维奇高兴得脑袋嗡嗡直响，他陷入了一种飘忽的看不到底的狂喜中。

在过去的日子里，尤里·安德雷维奇活得不可谓不辛苦。修房子、照顾病人、思考、学习、写作等。要是能停下做这些事情，不再挣扎不再思考该多好，回归自然。成为自然的宠儿，被她那仁慈的，奇妙的，美丽的双手环抱。

尤里·安德雷维奇很快就恢复了。拉拉每天给他喂东西吃，照顾他，为他忙前忙后。她那轻柔的话语，可爱的样貌，仿佛还在耳边在眼前。

尽管他们已经尽量减少了对话，但每次对话仍

然非常有意义，跟柏拉图的对话差不多。

除了两人共同的东西之外，就连挡在他们和世界其他人之间的隔阂也成了联系他们感情的纽带。他们同样排斥现代人的悲剧情结，不喜欢教科书式古板的赞美，同样反感让人不舒服的激情，以及那些被无数艺术或科学领域的工人颂扬或实践的无聊理论。

他们的爱是伟大的。大多数陷入爱河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爱的本质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而这也是让他们与众不同的一点——爱的激情如同一缕春风吹过平淡的生活，让他们不断进一步地认识对方发现自我。

11

“你当然得回到你的家人身边。等你病好了，我就不会也不能再留你了。不过咱们还是得看看时局，你看我们成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员，所以已经没办法抽身。为了保持我们的忠诚，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你是不知道在你生病的这段日子里，尤里安提城的变化有多大。我们的物资都送到莫斯科去了，而我们自己却一无所剩。现在这儿不通邮，人也不能坐车，因为所有的火车都用来运面包了。跟海达暴乱之前的情况一样，现在尤里安提城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而奇卡就专门压制不满的声音，搞得大家现在是敢怒不敢言。

“你还这么虚弱，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怎么能走呢？你真以为你能走路回家？永远都走不到的。等你身体再养好一点，或许还有可能。

“好了，我不给你提建议了，不过换作我是你，我现在就暂时先找份工作。发挥你的专长——他们喜欢医生，或许你能在本地的医疗服务中心谋一份差事。

“你得做点什么了。你的父亲原本是个百万富翁，结果自杀了；你的妻子是当地一个地主和资本家的女儿；至于你自己，原本参加了游击队，却又半路逃跑。这怎么行得通呢？你离开了革命部队，这就等于是做了逃兵。不管什么情况下，人也不能懒散渡日。当然，我自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也得找点事情做。我现在就如同生活在火山上，随时都可能被火焰吞没。”

“这话是什么意思？斯特尼科夫呢？”

“我现在的情况这么艰难，恰恰是由于他。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他有很多的敌人。现在苏联红军

胜利了，那些地位高且知道很多内情的无党派人士自然就成了当政者的眼中刺肉中钉。如果只是驱逐而不被杀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事了，当然苏联红军网开一面也是为了不落人口实。这种情形下，帕沙最容易受到攻击，他的情况最危险。知道吗，他已经去东部了。我听说他自己逃了，躲了起来。现在苏联红军正对他进行搜捕。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我不想哭，要是再说下去，我肯定会忍不住号啕大哭的。”

“你很爱他，是吗？仍然很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尤诺奇卡。他是那么正直，勇敢，优秀。我已经犯了一个错，这倒不是说我真的伤害了他，那样说也不尽然。但他是那样的杰出，那样正直，那样伟大——跟他相比我简直是一无是处。我错就错在这儿。不过请你现

在不要再谈论这个了。改天我再跟你说，我答应你，改天我一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

“你的冬妮娅多么美丽贤淑呀，就跟波提切利（文艺复兴早期著名的意大利画家）一样。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刚好在。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不过，现在我们也不要谈这个话题吧！

“我刚说了，我们都得找一份工作。每天早上我们出门工作，到月底我们就能领上几亿卢布。知道吗，以前我们都是用的西伯利亚纸币。可在你生病的这段时间，他们宣布那些纸币统统无效，所以我们现在一分钱的现金都没有了！你想想这有多可怕！不过，我们总会熬过去的。现在，他们说有一火车一火车的新纸币到了，至少有四十车。那些纸币印得很大一张，有蓝红两种颜色，可以分成邮票大小的正方形。蓝色的正方形券每张值500万卢

布，红色正方形券每张价值1000万卢布。听说那些纸币印刷质量特别差，用着用着颜色就褪掉了。”

“是的，我见过那种钱。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前，那儿流通的就是这种货币。”

12

“你怎么在瓦利吉诺待了那么久？那儿还有人吗？我以为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成了一片废墟。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待那么久？”

“我跟凯特恩卡在清理你的房子。我以为你首先就会回瓦利吉诺去，而我不想让你看到家变成那个样子。”

“变成什么样子了？情况真有那么糟糕吗？”

“到处都是垃圾，残垣破壁，不过我们都收拾好了。”

“你这话说得太隐晦了。我感觉你还有事故意瞒着我。好吧，随你的便，你愿意说就说，我也不逼你。跟我讲讲冬妮娅吧。她给我们的小女儿取了个什么名字？”

“玛莎，为了纪念你的母亲。”

“多跟我讲一点，把他们的事全都告诉我。”

“哦，现在不方便。我刚才说过，现在我一说到这些就会哭。”

“那借给你马的萨姆德威亚托夫呢？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你觉得呢？”

“确实，很有意思。”

“我跟他很熟。我们住在瓦利吉诺的时候，他经常在我们那儿出入。当时我们人生地不熟，好多事情都是他帮着我们办的。”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

“你们肯定是很好的朋友吧。他也那样热心地

帮助你吗？”

“他确实很热心。要是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能想象到！我想你们肯定有某种不成文的协定吧。他是不是老跟在你后面跑？”

“当然，确实是那样！”

“那你喜欢他吗？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的。我没资格问你这样的问题，是我越界了！我向你道歉。”

“哦，没有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问我们究竟有哪种协定，是吗？想知道我们之间是否有除了友谊之外的感情？当然没有。他真的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欠他太多了，但哪怕他给我金山银山，哪怕他把命都给了我，我对他的感情也不会超

过友谊的界限的。我一直都不喜欢他那样的男人，我跟他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是那种机智、自信、专横的人——在应对实际的生活方面，这些特质或许很重要；但说到内心感觉，我觉得再没有比这种大男子主义更糟糕的东西了！他当然不会是我理想的爱人！更何况，他总是让我想到另一个人，想到另一个更让我厌恶的男人。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全是他的错。”

“我不明白。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子？此时此刻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告诉我。在我眼里，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儿。”

“尤诺奇卡，你怎么能跟我开这种玩笑！我是跟你说认真的，你却故意说这种话来拍我的马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吗，我的心里有个东西已经碎了，我的生命已经是破碎的了。我太早地接触

了真实而残酷的生活，这是我的命，我注定要从最坏的那一面来发现生活——扭曲的一面——透过那个老浑蛋的双眼。对他而言，这世间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所欲为。”

“我想我明白了。我还以为是其他什么事情。说到这儿，我能想象你小时候受的苦，那种苦很可能是你当时那个年纪的孩子承受不来的。我也能想象你被生活欺骗后的震惊，以及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愤怒。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想说的是，你不应该让过去的不快变成你现在不快的原因。哪怕是为了爱你的人，为了像我这样的人，你也应该活得快乐。一想到在你那样痛苦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你身边，我就恨不得掐死自己。这事说出来很奇怪，我觉得我有时候真的会很妒忌——非常地妒忌——那些还没有我好的人，那些跟我没有一点共同点的

人。一个那样的对手，会在我的心里激起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想，要是一个我理解并且喜欢的男人跟我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我其实并不会感到愤怒，也不会把他看作情敌，我只是会觉出一种悲剧般的兄弟情谊。当然，我肯定不是说想要把我爱的女人跟另一个人分享。但我会放弃她，这样我所受的痛苦就不再是因嫉妒而起，我就不会那么地愤怒。假如说吧，我认识了一个艺术家，他跟我做一样的事情而且比我做得更好，这种情况下我并不会对他生出任何嫉妒的想法。我很可能会放弃那件事，并不会想着要去模仿他；而如果他比我做得更好，那我再做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这跟我们现在说的事不一样。如果你没有一点毛病，或者从来没有做过错事，那我反倒不会这么爱你。我不喜欢那些从来没有摔过跟头或者看起来完美无瑕的人。因为他们再好，也好得没有

生命力，或者说他们的那些好对我而言并没有价值。因为他们还未完全领略生活的美丽。”

“我现在就是在想这种生活的美丽。我觉得，只有想象力丰富并且保持一定天真的人才能真正领略这生活的美。而我恰恰缺少这种东西。如果一开始我没有经历那些事情，没有透过别人的眼睛那么扭曲地看待过生活，或许我的人生观会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也不是全部的原因。正因为从一开始我领略的就是生活的丑陋，那种自私的虚无感深深植入了我的心中，所以当我后来嫁给一个真正伟大的男人，一个爱我并且我也深爱的男人时，我的婚姻就注定会是一个悲剧。”

“在你跟我谈论你丈夫之前，我先打断一下。我并不嫉妒他。我跟你说过，我只会嫉妒比我差的人，对于跟我一样的人我只会欣赏。你先跟我讲讲

另一个男人吧。”

“哪个男人？”

“那个毁掉你生活的恶魔。他是谁？”

“他是莫斯科一个相当有名的律师，先前也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去世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当时他在经济上给了我母亲很大的帮助。他没有结婚，又很富有，自然很讨女人的喜欢。我觉得这么说无疑是在美化他，其实他是一个很乏味的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

“那倒没必要。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还曾经见过他一次。”

“真的吗？”

“那是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当时你的母亲喝毒药死了。那天已经是深夜，你跟我那个时候都还在上学。”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你是跟另一个人一起。你们站在过道的阴影里。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记忆，不过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那一定是在梅流赛艾沃。”

“科马洛夫斯基当时也在那儿。”

“他也在吗？很有可能。我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其实也并不稀奇。那个时候我们倒是经常能看到彼此。”

“你怎么脸红了呢？”

“因为从你嘴里听到科马洛夫斯基的名字让我觉得很奇怪。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所以

有些惊讶。”

“当时我是跟一个同学一块儿过去的，这些事还是他告诉我的。他认出了科马洛夫斯基，说是以前见过他一次。我说的同学名叫米沙·戈登，我那个传说中是百万富翁的父亲在旅途中自杀的时候，他刚好在场。他们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他说父亲故意从前进的火车上跳了下去，当场死亡。当时陪在父亲身边的就只有科马洛夫斯基，那个时候科马洛夫斯基担任他的私人律师。米沙告诉我，科马洛夫斯基一直怂恿父亲喝酒，把他的生意搞得一团糟，让他到了破产的边缘，还把他逼到了自杀的绝境。我父亲之所以会自杀，我之所以会成为孤儿，全部是因为科马洛夫斯基。”

“这不可能！这太让人惊讶了！这是真的吗？所以他也是你的仇人，是毁掉你生活的恶魔！我们

有着共同的敌人，这让我们的关系又近了一步！这一切一定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

“科马洛夫斯基是我这辈子永远疯狂嫉妒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并不爱他——我讨厌他。”

“你真那样了解自己吗？人的天性，尤其是女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变幻莫测并且充满矛盾的。也许正是因为你对他的憎恨，反倒让你对他比对任何出于你自由意志而爱的男人多了一分服从。”

“这么说太可怕了。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好像真是这样的——尽管这很不正常。但这样真是太恐怖了。”

“你别恼。别听我乱讲。我就是想说，我嫉妒

那种黑暗的意识不到的东西，嫉妒那种不正常且深不可测的东西。我嫉妒你在上厕所时看的文章，嫉妒你身体上的汗水，嫉妒你在空气中呼吸到的细菌——那可能会进入你的血液，对你造成伤害。我嫉妒科马洛夫斯基，因为他就像一种传染病。某天也许他会把你带走，就跟死亡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让人难以理解，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爱你，疯狂地爱着你，爱得不能自已。”

13

“再跟我讲讲你的丈夫吧——‘一个跟我一样悲剧的人’，莎士比亚是这样说的。

“莎士比亚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在梅流赛艾沃找他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不少关于他的事了；当时我听说他的人抓了你，还把你带到了他的火车上。我可能跟你说过——或者只是我以为我跟你说过——我曾远远地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刚好坐进车里。可你能想象当时有多少士兵围着他吗？我看到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英俊、诚恳、刚毅的脸庞，他是我见过的最诚恳的一个人；还是那么地有男子气概，那么直率的性格，从来不会伪装。但除此之外，我感

觉他身上又有那么一点不同，那让我感到担心。

“好似他的脸上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而那种东西让他整张脸显得毫无生气。好似一个活人的脸转而成了某种规则的代表，某种思想的反映。察觉到这一点时，我的一颗心都沉了。我知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把自己交给了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但那种力量是致命的残酷的，并且那种力量最终一定不会放过他。我觉得，他身上已经烙下了一个印记，而那就是他生命的封印。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也许我是受了你的影响，你当时不是跟我描述了你跟他见面的场景吗？唉，说起来除了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其实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你的影响！”

“跟我讲讲革命爆发之前你跟他的生活吧。”

“很早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最

喜欢的就是纯粹的事物。而他，俨然就是纯粹的化身。我们基本上算是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他、加利乌林，还有我，我们三个人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打小他就喜欢我，以前一见到我他就几乎要晕倒。也许我不该这么说，这听起来像是我在自夸。但我说的是事实，一点都不夸张。当时他对我的态度就是一个孩子带有一点天真的纯粹的感情，他试图掩饰这种感情，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不过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他内心的想法。我们时常见面。你跟我有多相似，他跟我就有多不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把心许给了他。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决定，等一长大，我就要嫁给他。所以说，其实我早就在心里把自己许配给了他。

“你也知道他是多么地天赋异禀！他的父亲是一名火车信号工人，或者是一名协管员——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反正是普通的工人。而帕沙凭借自

己的聪明和勤奋，在古典学和数学这两个领域都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知识！老实说，这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如果你们如此相爱，那究竟是什么毁掉了你们的婚姻呢？”

“啊，这个我很难说清楚。我尽量跟你解释。不过我这样一个普通妇道人家向你这种聪明人来解释生活，听着还真是有些奇怪。但我尽量，尽量对包括你我在内的俄国家庭的破碎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其实，这跟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同的人或许性情不同，不同的婚姻相爱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是造成悲剧最主要的原因！所有的传统和习俗，所有我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所有跟家和秩序相关的东西，都在这场大暴乱和社会重建中毁于一旦。简单说，战争和动乱把那种人性的生

活方式给摧毁了，剩下的只有赤裸的灵魂。而人的灵魂并没有改变，还是那么地寒冷和孤独，于是人本能地在自己身边寻找温暖——但周围的人也是一样地寒冷而孤独。你和我就跟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最早来到这世界上，而在开天辟地之初我们连蔽体的衣物都没有——到了最后，我们也是一样地赤裸和无家可归。你我也是最后记得这个世界千百年来所创奇迹的人，为了纪念那些消失的奇迹，我们活着爱着，我们哭泣，我们拥抱。”

14

拉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以更加平静的口吻说：

“我跟你说，如果斯特尼科夫能再次变回帕沙，如果他能停止内心的愤怒和反叛，如果时间能倒流，如果还能有奇迹，还能让我看到我们家里那闪亮的窗子，看到灯光下帕沙的书桌和书——哪怕是世界末日，哪怕要我跪倒臣服，我也会。我的内心渴望着这一切，我一直都能听到过去的召唤，忠诚的召唤。不管多么珍贵的东西，我都可以牺牲，哪怕是你。哪怕是我们的爱情，我们如此自由，如此偶然，如此水到渠成的爱情。哦，原谅我！我不是真的要放弃。这不是真的！”

说完，拉拉扑进日瓦戈医生的怀里，呜呜地抽泣。不过她很快就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擦干眼泪

说：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召唤，你才要回到冬妮娅身边？哦，天啊，我们真是活得太痛苦了！我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该怎么办？”

拉拉的情绪又激动起来，待平复情绪之后，她接着又说：

“不过，我还没回答你问的，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幸福这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是后来才想清楚答案的。跟你说，并不只是我们的故事是这样，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一样的命运。”

“我的爱，告诉我，你怎么能这么聪明？”

“我跟帕沙是在战争爆发两年前结的婚。当时我们正意气风发地想要创造自己的生活，建设自己的家，可没过多久战争就爆发了。我一直都觉得，

战争是一切灾祸和不幸的根源，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流落至此的原因。我现在还能清晰回忆童年的时光。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接受了和平的表象。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应该听从理智，应该按良心行事。杀人这种恶劣的事只是个别现象，是不正常的。谋杀只会发生在戏剧里，报纸上和侦探故事里，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

“可就是在这样和平而天真的梦里，流出了鲜血和眼泪，有了全民的疯狂，有了时时刻刻的合法甚至备受赞扬的杀戮。

“我觉得人应该为这种残忍和无知付出代价。你肯定比我记得清楚，国家分裂之初一切是怎样瞬间崩塌的——火车、生活物资、家庭基础，还有道德标准，所有这些都在一瞬间分崩离析。”

“你继续说。其实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什么。你把这些事情都看透了，听你说话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也正是从那时候起，谎言开始占据俄国的大地。最大的不幸，一切邪恶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自己的观点失去了信心。人们觉得遵循自己的道德感是一件落伍的事，他们应该和其他人一起唱赞歌，按照别人定下的生活标准而活——殊不知那些标准恰恰是要人命的。接着，就刮起了一阵讲大话做表面功夫的风，一开始是推翻俄国沙皇帝制，然后就是革命。

“这种社会恶习犹如瘟疫一般传遍全国。这阵浮夸风影响了当时的一切人和事，没有什么能幸免于难。我们家，当然也受到了影响，渐渐地开始出现问题。我们改变了过去跟人交往时那种自然轻松

的状态，开始讲套话讲空话。谈话充满了浮夸，虚假，伪装的气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在某些国家大事上有一些聪明睿智的独到见解。而像帕沙那么有洞察力，那么相信自己，把现实和表象分得那么清的人，怎么会发现不了生活的错误呢？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帕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错误地把时代精神，社会和宇宙共有的恶当成了个人的本国独有的东西。他听着那些陈词滥调，听着那做作的话语，以为是他自己落伍了，是他自己不行。我想你肯定不相信，这种琐碎的小事竟然会对我和帕沙的婚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你想象不到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也想象不到因为这天真的想法他做出了怎样的愚蠢决定。

“其实没有人逼迫他去参军打仗，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我们的负担，

觉得我们要摆脱他。这就是疯狂的开始。由于一种年轻人特有的自尊心和虚荣，他把小事当成了大事，并且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事件的发展让帕沙感到生气，他觉得历史不应该这么书写。一直到今天为止，他还在试图改变这一切。这就是让他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就是这种愚蠢的野心，把他逼上了死亡的绝路。天啊，我该如何拯救他！”

“你对他的爱真是太纯洁太深厚了！继续吧，继续爱他。我并不嫉妒他。放心，我不会拦着你的。”

15

夏天来了又走，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日瓦戈医生的身体也康复了。在计划回莫斯科的同时，他又做了三份临时的工作。货币的快速贬值让普通俄国人很难收支平衡。

每天天刚朦朦亮，日瓦戈医生就离开了住处，沿着商人大街往前走。途中，他会经过一个很大的电影院，电影院之前属于乌拉尔哥萨克军队，现在已经改名叫“红军排字”。城市大街转角处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公告。日瓦戈医生穿过广场，转入布亚诺夫卡大街，从后门进入到他所工作的军区医院的住院部。这是他的主职。

从拉拉的家到医院的大部分路都有林荫笼罩，途中会经过一些带尖顶精美装饰的大门和雕花窗子的小房子，总是让人不禁猜想那里面究竟有什么。

房子紧挨着医院，并且自带花园，在一个商人妻子格雷戈里亚多娃的名下。房子的表面装饰着闪亮的正方形瓷砖，就跟莫斯科古老的伯维尔房屋一样。

一周总有那么三四次，尤里·安德雷维奇会到位于米斯基大街的尤里安提医疗中心参加理事会会议。

尤里安提城的另一端有一座妇科医院，是萨姆德威亚托夫的父亲为了纪念自己因难产而死的妻子而修建的，如今那所妇科医院已经改名为罗莎·卢森堡医院。尤里·安德雷维奇经常会就基本病理学和一到两个其他的可选主题发表演讲，普及医学知识。

这天，日瓦戈医生回去得很晚，又饿又累。回到家，他看到拉拉还在忙着家里的琐碎家务，忙着做饭洗衣。这是拉拉居家的一面——袖子高高地挽了起来，裙子扎在裤腰上——但让日瓦戈医生惊惧

的是，他发现哪怕是不修边幅的拉拉对他也有着无可抵挡的吸引力，甚至那种吸引力比拉拉踩着高跟鞋穿着华美礼服参加舞会派对来得更大。

拉拉做菜洗碗，用肥皂水擦洗地板，或者整理亚麻布。拉拉在做菜洗碗整理家务的同时，还不忘教育凯特恩卡。或者抽空翻一下书，学习最新的政治思想，从而尽好一个政治老师的义务。

日瓦戈医生跟拉拉和她的女儿越亲近，就越不敢把她们看成自己的家人，他也愈加严格用家庭的责任来控制想法和行为，以及信仰被推翻的痛苦。这种克制，其实没有一点冒犯拉拉或凯特恩卡的意思。与此相反，他的这种态度正是由于对她们的尊重。

不过这种分裂的思想对日瓦戈自己而言，肯定是痛苦是折磨。而他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痛苦，就像

一个人会逐渐习惯还未痊愈的伤口时常会被再次撕开一样。

16

又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雷维奇对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说：

“看起来我会被逼辞掉工作。事情总是这样，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一开始，一切都很好。‘加油，我们欢迎勤奋努力的工作，我们鼓励新的想法。什么让我们最高兴呢？那就是你工作，努力，坚持。’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说的鼓励想法只是一句空话，只是哗众取宠地讨好革命者和军队势力而已。我真的厌烦了这一切。并且，我也不擅长这些东西。

“我想，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许是对的。当然，我不是他们那一边的。只是我很难接受

到最后他们成了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我却是无知与蒙昧的牺牲品。你听过尼古拉伊·韦德尼亚皮吗？”

“当然！早在我遇见你之前就听说过他，塞玛·图特塞娃经常提起他，她可是这个尼古拉伊·韦德尼亚皮的追随者之一。惭愧的是，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我不是很喜欢纯哲学的作品。相比而言，我更喜欢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把哲学加入到生活和艺术中，但纯粹的哲学在我看来有些奇怪且较为空洞。哦，不好意思，我又跟你扯那些没用的了。你继续说。”

“没有，没有。相反，我的观点和你是一样的。说到我的舅舅韦德尼亚皮，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受到他的影响才变成今天这样的。我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我太过相信直觉。所以你知道讽刺的是什么吗？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诊断医生，

确实，在诊断疾病方面我鲜少出错。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他们欣赏我的医术，却又极度讨厌我的直觉。

“还有，我很为模拟性这一问题着迷，比如生物改变颜色以适应外界的环境。我想这种生物现象对研究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有启示意义。

“我试图在我的演讲中涉及这一论题。然后，他们便都异口同声地冲我喊：‘理想主义，神秘主义，歌德的永恒自然法则论，新古典唯心主义。’

“我该跳出来了。当然在他们把我扔出医院之前，我会一直待在那儿；但我一定得辞去医学院和医疗中心的工作。我不想让你担心，可我现在真觉得，要是继续做那两份工作的话，他们随时都可能将我逮捕。”

“天啊，尤诺奇卡。幸好，现在还未到那一步。不过你是对的，小心点总是有好处。我观察到，每次有新势力上台都会经过几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理性、批评精神、反对歧视等精神通常能取得一定胜利。

“接着就是第二个阶段。政府开始强调那些反革命人士及其跟随者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怀疑越来越多——告密、阴谋、仇恨。你说得对，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相关的证据很容易就能找到。就拿最近的事来说吧，本地革命委员会从科达特斯克伊那儿接收了两名新成员——两名出身工人阶级的政治犯提沃兹恩和安提波夫。

“他们都跟我很熟——事实上，其中一位还是我丈夫的父亲。可自从他们来了之后，我每天都在

担心凯特恩卡和我自己的安危。他们什么都做得出，安提波夫不喜欢我。我觉得，他们很可能打着革命公平的旗号把我甚至把帕沙除掉。”

没过多久，这番话果然应验了。革命委员会趁夜对住在布亚诺夫卡大街的格雷戈里亚多娃寡妇家进行了搜查。据说，从格雷戈里亚多娃家搜出了一大堆武器，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反革命组织。许多人都被抓了，而这股搜捕风还在蔓延。听说，有些反革命组织成员穿过河逃跑了。“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人们议论道，“偷渡过这一条河，可还有那么多河呢？就拿阿姆河来说吧，要是真的游过去你会发现自己到了中国！那条河辽阔无比，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连空气都带着恐怖的味道。”拉拉说，“安全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肯定会逮捕我们。可

是凯特恩卡会怎么样呢？我是一个母亲，我不能让这种不幸发生，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哦，我真是快被逼疯了。”

“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办法。不过，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难道有本事扭转这股恐怖潮吗？这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命？”

“我们肯定不能逃跑，因为现在已是无处可逃。但我们能躲起来，隐藏在大背景中，以此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我们到瓦利吉诺去。我一直都对那儿的房子放心不下。那儿荒凉偏僻，所以在那儿生活就不会这么惹眼，危险自然也就减少了。并且，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我觉得到那里过冬也是挺好的。在他们抓到我们之前，或许我们还能多活一两年的时光，这也是好的。另外我们还是能找萨姆德威亚托夫，让他成为瓦利吉诺和尤里安提城的纽

带。也许他会愿意帮我们躲藏。你觉得怎么样？没错，那儿确实没人了，空空如也，至少我三月份去的时候是这样。有人说在那儿看见了许多狼，这挺让人害怕的。不过你不觉得提沃兹恩和安提波夫这样的人，其实比野狼更可怕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不是一直催我去莫斯科吗，叫我不要推迟了这件事？现在事情反倒简单了。我已经去火车站问过了，显然他们现在不再担心做黑市生意的人。所以身份证明查得没那么严，他们很少再对旅客开枪——他们也累了。

“可我寄到莫斯科的信一直没有回音，这挺让我担心的。我得去那儿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一直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我怎么能按照你的建议到瓦利吉诺去呢？你也肯定不能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住呀。”

“那当然不行。你要是不去，我也不可能去。”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回莫斯科去吗？”

“是的，你应该去。”

“听着，你听我说，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都到莫斯科去，三个人一块儿去。”

“去莫斯科？你真是疯了！我到莫斯科能做什么呢？不，我得留在这儿，我得在这附近。帕沙最后肯定会回到这附近。我得等他回来，这样他要是需要我的话就能随时找到我。”

“那好吧，我们说说凯特恩卡。”

“我跟塞玛商量过她的事了——塞玛·图特塞娃，她有时候会来看看我。”

“嗯，我知道。我经常看见她。”

“你可真是让我讶异。换作我是你，我肯定早就爱上她了。真不知道你们男人是怎么想的！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漂亮，优雅，聪明，博学多识，善良，并且头脑清醒。”

“我刚到这儿的那一天，她的姐姐给我剪了头发——格拉菲拉，那个女裁缝。”

“我知道。她们都跟大姐住在一块儿。就是那个名叫阿芙多提亚的图书管理员。她们几姐妹都是勤奋老实的人。我曾想过，要是你跟我都被抓了，是否能让她们帮着照顾下凯特恩卡。不过我现在还没决定。”

“除非真的是没有其他办法了。祈祷上帝，不要让我们走到那一步。”

“他们说塞玛有一点古怪——说她神经有点问题。确实，她是有点跟别人不一样，但那只是因为她太聪明，太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了。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十分地有才华。她跟你一样，都是很有见识有想法的人。我想，要是把凯特恩卡交给她来带，我倒是挺高兴的。”

17

日瓦戈医生又一次去了火车站，结果又一次地空手而归。一切都没有定论。他和拉拉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天气阴冷刺骨，眼看第一场雪就要落下来了。乌云在天空中翻滚，彼此层叠，透露出冬日肃杀的气息。

尤里·安德雷维奇回到家，却发现拉拉有客拜访——塞玛。两个人与其说是在谈话，不如说是塞玛正对着拉拉发表演讲。尤里·安德雷维奇不想打扰她们，另外他自己也想独自待一会儿。所以拉拉和塞玛在一个房间里说话，尤里·安德雷维奇则进了另一间房，两个房间只有一墙之隔。隔着放下的窗帘，尤里·安德雷维奇能清晰听到隔壁两人的对话。

“我做我的针线活，不过亲爱的塞玛，你不要介意这个。我在听你说呢。我参加过一些关于历史

和哲学的讲座，而你的思维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况且，听你说话真的是一件很轻松很愉悦的事情。过去这几天我们都没怎么睡好，因为担心凯特恩卡的事。我知道，作为一个母亲，保证孩子的安全是我最基本的职责。可照现在的情形，我随时都可能出事。我知道我应该冷静理智地想对策，但我真的不擅长这些——这让我感到很难过。现在再加上失眠的折磨，我真觉得很是郁闷。不过听你说话能给我一些安慰，更何况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雪。要知道在下雪的时候，听一席聪明睿智的话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下雪的时候，每次用眼角扫窗台，你都会感觉似乎有人穿过院子推门进来，这个你有注意过吗？你接着说，亲爱的塞玛，我听着呢。”

“我们刚说到哪儿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怎么注意拉拉的回话。他更

想听塞玛说的话：

“其实像‘文化’‘新纪元’这些词也不是不能用，只是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有太多不同的方式。这些词的意义相当模棱两可，所以我就不喜欢用。我尽量用其他的词来替代。

“我觉得，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上帝之身，一部分是著作之身。在人的精神发展的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成功都是通过千百年来事无巨细的著作而得以标记。埃及有这样一些著作，希腊也有，旧约新知的理论也算一部分。而最后一种就是到目前为止仍未被超越的给无数人启示的基督精神。

“为了让你明白基督精神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新鲜事物——当然是你所不知道的，并且我会以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进行表达——我想从祷告文中抽出

几个选段——只是删减的很短的几段文字。

“大多数祷告文都把旧约和新约的概念搅在一块儿，比如说人们认为火焰中的荆棘[(1)]、出埃及记、火热熔炉中的青年、乔纳与鲸鱼是可以跟圣灵感孕说和耶稣复活相提并论的。

“这种比较其实就鲜明地反映出，旧约代表的是古老的事物，而新约代表的是全新的事物。祷告文中有许多文章都把圣母马利亚的母爱跟犹太人远渡红海相比较。比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红海就像一位纯洁的新娘。’然后又说，‘以色列人横渡红海之后，就再也没有后来者能通过；基督耶稣诞生之后，世界就永远留下了纯洁。’这就是说，在犹太人穿越红海之后，红海就不能再为人通过；而圣母马利亚诞下耶稣基督后，仍跟以前一样纯洁无瑕。祷告词把这两件事放在了一起，进行比较。这

究竟代表什么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都被认为是奇迹。而在每个纪元中——古老原始的纪元和之后更为发达的后罗马纪元——究竟什么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奇迹呢？

“在第一个奇迹中，公认的领导人族长摩西用魔力把水分到两边，让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通过，直至最后一个人顺利通过红海水面再次合拢，把接踵而至的埃及人全都淹死。这个故事体现的是古老的精神——听从魔力的指示，罗马行军的伟大，民族和领导人。一切都是可见的，可听的，却又无法抵抗的。

“在第二个奇迹中，我们多了一个纯洁的女孩儿——一个古老世界中谁也不会注意的普通人——她秘密诞下了一个小孩儿，并抚养他长大，而这个小孩儿最终成了上帝，成了‘宇宙的造物主’。这

个孩子的出生不仅像历史记载的那样违反了人性法则，它还违背了自然法则。她能生下这个小孩儿不仅是一个自然分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奇迹，是一种启示。而从现在开始，生命的基础就是这种启示。《新约》努力把这种启示塑造成生命的基础，用独特的事物跟平凡的事物进行对比，并谴责一切的压迫。

“这是多么重大的改变！一个独立的事件，一个按照古老标准属于完全不重要的事件，如何就变得跟整个人类的大迁徙一般重要了呢？在上帝的眼里，它为什么会是如此重要？因为这是通过上帝的眼睛进行评断，因为它就发生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才会如此神圣如此特别。

“这个世界变了。罗马已经走向了尽头。靠人多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终结。而通过武力强加给人

们的义务，分裂的民族制度也全部取消。领导者和民族都已归属过去。

“独立和自由的学说取代了他们。独立的个人生命重演上帝的故事，而这个生命故事蕴含了宇宙的辽阔。就像一段关于盛宴通告的祷告词所写，亚当试图成为上帝，可他失败了；而现在上帝创造人，这样亚当自然也就能创造上帝了。”

“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塞玛说，“我现在想说个题外话。就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对于女性的保护，反对资本力量而言，我们的革命时代实属一个奇迹，这也是一项永垂不朽的功绩。但如果从对生命的解读和幸福哲学来看，这一切却像是一个玩笑，像是对过去的拙劣模仿。如果所有这些关于领导人和民族的歌颂能够重现历史，它很可能会把我们带回那个牧羊部落和宗族制的圣经时代。幸好，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再说一下基督耶稣和圣母马利亚——这可不是《新约》中的原话——而是圣周的某一天我从祈祷词中听来的。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其实哪怕我不说，你也明白这些；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些事情，这可不是在对你说教。

“你知道的，‘激情’这个词在斯拉夫语种首先是受难的意思，基督的激情就是‘基督受难’的意思。近期俄国的祷告词还把这个词引申为‘贪婪’和‘邪恶’的意思。比如，我的灵魂被‘激情’奴役了，我成了一个野兽。还有比如，如果去不了天堂，那也让我们先掌控自己的‘激情’，诸如此类。也许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但我确实不喜欢这种压抑情绪和身体欲望的言辞。失去了诗意的表达，这些话听起来格外地无聊。我一直觉得，这很

可能是一堆胖教士瞎编出来的。我并不介意他们自己是否会破坏规定，欺骗众人，或他们是否按着内心真实地生活——因为我关心的不是他们，而是这些文字背后真正的意义。所有这些忏悔都把身体看得太重要了，这其实很让人反感。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把某些肮脏，无足轻重的事情抬到一个不正常的高度。哦，原谅我用这样的表达。

“我总在想，为什么非得在复活节的晚上在耶稣复活前夕提及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我不明白这个中的原因，但这让我想到，生命在逝去的那一刻或许就意味着新的开始。这其中包含着多少真正的‘激情’，又有怎样不妥协的率真。

“至于这究竟是跟抹大拉的玛利亚（从良的妓女）有关或还是跟其他名叫玛利亚的女子相关，目前尚无定论。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向上帝请求：

“‘放下我的罪恶，犹如我放下自己的头发。’这就是说：‘我放下我自己的头发，请上帝也这样宽恕我的罪恶。’难道还有什么说辞比这更能确切而具体地表达渴望被宽恕的愿望吗？

“而在同一天的祷告词里，对此还有更为具体的描写，这也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它确实是跟抹大拉的玛利亚相关。

“她再次确切地表达对过往的忏悔，说每个晚上都会因为过去那些可耻的习惯而身心备受折磨。‘因为晚上就是欲望燃烧的时刻，是那黑暗的罪孽现身的时刻。’她请求耶稣接受她悔恨的眼泪，并为她真诚的叹息而感动。她请求用自己的头发来把上帝最为纯洁的双足擦干净——这让耶稣想起夏娃在天堂里饱受恐惧和耻辱的折磨时，也曾把自己的头发当作庇护。‘让我亲吻您那纯洁的双

足，用我的眼泪擦洗它们，然后用我的头发擦干，就跟夏娃害怕天堂的寒冷时也会把自己藏进头发的波浪里一样。’ 说完头发的事情之后，她又叹道：‘谁能明白我罪孽的深重或您宽恕的仁厚？’ 这是上帝和生命，上帝和个人，上帝和女人之间的故事，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切和平等！”

18

尤里·安德雷维奇从车站回来，已是疲惫不堪。那天刚好他放假，平常他都会睡到很晚，把平时欠的觉都补回来。尤里·安德雷维奇半坐在沙发上，偶尔伸展一下身子。尽管他是带着睡意听塞玛的话，但塞玛的这些想法还是让他感到兴奋。“毫无疑问，她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尼古拉伊舅舅那儿学来的。”尤里·安德雷维奇想，“不过她确实是很聪明，很有天赋。”

尤里·安德雷维奇站起身，走到窗户旁。窗户正对着院子，隔壁房间的窗户也是对着院子的，所以此时拉拉和塞玛的对话就听得更为清楚了。

天气越来越糟糕，院子也渐渐暗了下来。两只喜鹊从街上飞过，扑腾着翅膀想要寻一个落脚的地方，羽毛在风中抖动。喜鹊在垃圾桶的盖上停了一

会儿，然后又落在篱笆上，落在地上，最后在院子里来回地走动。

“看见喜鹊，就说明大雪很快就要落下来了。”尤里·安德雷维奇想。与此同时，隔壁房间的塞玛也提高了音调：

“喜鹊报喜。看来，你会有客人来或有信来了。”

话未落音，门铃还真响了——前几天尤里·安德雷维奇刚把门铃修好。拉拉掀开帘子，快速穿过门厅去开门。尤里·安德雷维奇听见她跟塞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说话。

“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没错，她在这儿呢。”

“不，我不是来找她的，不过我确实可以和她

一块儿回去——如果她也打算回去了的话。我来这儿是送一封信给你的朋友。算他运气好，我现在刚好在邮局工作，才拿到了这封信。我都不知道这封信究竟经过了多少人的手，信是从莫斯科寄过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五个月。他们找不到地址，最后才想起来问我，我当然知道尤里·安德雷维奇住在哪儿——我曾给他剪过一次头发。”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整整有十几页信纸，而信封已经在路上被弄得稀巴烂了。邮局的人还曾把信打开过，这才知道信是一个叫冬妮娅的人写来的。还未等日瓦戈医生反应过来，这封皱巴巴的信已经到了他的手中——他根本就没注意到是拉拉把信递给他的。开始读信的时候，他还意识到自己是在尤里安提，在拉拉的房间里；可渐渐地随着越读越深入，他便忘记了这一切。塞玛走出来，跟日瓦戈医生礼貌地打了声招呼，然后就告辞了。日瓦戈医生

也下意识地回应，但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手中的信上，并未注意塞玛离开了屋子。渐渐的，他越来越彻底地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以及周围是些什么人有些什么东西。

“尤拉，”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写道，“你知道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吗？女儿的受洗名是玛莎，以此纪念你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

“现在一切都变了。米柳科夫、基赛维特、库斯科夫和包括你舅舅尼古拉伊、我父亲在内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现在全被驱逐到了境外。

“这可真是一场厄运，尤其是你又不在这儿。不过我们还是得接受这一切，并且感谢上帝这次流放得还算温和，因为在这样的时局里，我们的命运原本可能会更糟糕。如果你在这儿，肯定也会跟我们一起走。可你现在在哪儿呢？我把这封信寄到安

提波娃家，我想要是她见到你的话一定会把信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了我们能以家庭身份获得出境许可证的消息，而这种不确定性让我倍感折磨。当然这得先找到你再说，愿上帝保佑。我仍然相信你还活着，并且一定会找到。我的心里仍然满满的都是对你的爱，这颗爱心是这样告诉我的，而我选择相信。也许等你再次出现，俄国的政局会缓和许多，你也有可能获得独立签证，到时候我们就能一家团圆了。不过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并不相信还有得到这种幸福的可能。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一直都努力想要正视这发现背后的意义，想要理解它，为它正名。我看进自己心里，回忆我们曾在一起的日子，并从各个方面发现自己，可我找不到开始，我不记得这一切的厄运究竟是怎样降临到我头上的。我感觉你看错了我，你对我有一些不

好的看法，好似是通过一面扭曲的镜子在看我。

“至于我，我爱你。要是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就好了！我爱你身上所有与众不同的东西，爱你的好也爱你的坏，爱你性格的所有特质。你的性格很复杂，有众多特质混合在一起，这让我觉得亲切；你的思想照亮了你的脸，而你的才能和聪明则完全能替代缺失的意志力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我知道再没有男人能比你更好了。

“不过你听着，你以为你就了解全部吗？即便你不让我感到亲切，即便我不这么喜欢你，我还是会相信我是爱你的。出于对相爱失败之后的屈辱且毁灭性的惩罚的恐惧，我在潜意识中就已经丢掉了我不爱你这种想法。可你跟我都不曾知道这一点。有时候我的心会跟我捉迷藏，因为爱情的失败犹如谋杀，而我无力对任何一个人做这样的事。

“现在一切都还未决定，不过我们很可能去巴黎。我知道你小时候曾在那里待过，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也是在那儿长大的。对了，父亲向你问好。萨沙长大许多了，他算不得英俊帅气，但身体很强壮，每次一说起你他就会悲伤地掉眼泪，久久不能恢复心情。哦，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那么，再见吧。让我为你在胸前画一个十字，保佑你能平安喜乐，也为这无尽的分开，考验，未知，为你那漫长而黑暗的道路祈祷。我这不是在责怪你，真的不是，你想怎样过就怎样过，只要你过得好我就高兴。

“在我们离开乌拉尔之前——这注定是一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地方——我认识了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我很感激艰难的时候她能时常陪在我身边，并帮助我熬过分娩的痛苦。我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好人，但我跟她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人。我天生就喜

欢过简单一点的生活，并且会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她总是会把事情变得复杂，制造出许多的混乱。

“照顾好自己，我得就此打住了。他们已经派人来取信，我也该赶紧收拾东西了。哦，尤拉，尤拉，我亲爱的人儿，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你究竟有什么遭遇？你是否觉得我们再也不可能见面？现在我给你写这封信，你能明白这背后的意思吗？你明白吗？明白吗？他们在催我，就跟催命似的。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雷维奇抬起恍惚，悲伤，满含痛苦的双眼，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

外面下起了雪。风把雪刮得飘到一边，速度越来越快雪也越积越厚，好似它是要追赶什么似的。而尤里·安德雷维奇只是出神地望着窗外，好似他看

的不是雪，而是冬妮娅写给他的信；好似那飘扬的不是雪花，而是黑字之间的白色空格，那洁白的无尽的空格……

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不自觉地呻吟一声，并抓紧自己的前胸。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晕倒了，于是踉跄着走到沙发边，毫无意识地倒了下去。

---

(1) 《出埃及记》中记载的故事。

第十四章　回到瓦利吉诺

1

冬天来了。尤里·安德雷维奇从医院回家，一路上狂风大雪。走到门廊处，刚好和拉拉迎面碰上。

“科马洛夫斯基来过。”拉拉用低沉而粗嘎的声音说。她神情恍惚，看着好似刚受了打击一样。

“在哪儿？这儿吗？”

“不，当然不是。他今天早上来过了，说今晚再过来一趟。我估计他很快就到了。他想跟你说几句话。”

“他为什么来呢？”

“我不是很明白他的话。他说打算去远东，然后这次是专程来看我们的。尤其是想来看看你和帕沙。他讲了很多跟你们两个人有关的事情。并且坚持认为，我们三个——你、我，还有帕沙——正面临极大的危险。而这种情况下，只有他才能救我们，如果我们按他说的办的话。”

“那我就在外面待着。我不想见他。”

闻言，拉拉掉下了眼泪。她差点扑倒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脚下，不过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

“看在我的份儿上，请你不要走。”拉拉请求道，“我不是害怕单独跟他相处，只是那种滋味也确实不好受。请你不要让我单独和他见面。另外，他确实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也许他真的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你讨厌他是很正常的，不过请你暂时把这种感觉放到一边。不要走，好吗？”

“亲爱的，你是怎么了？别这么难过，你想要怎么样做呢？腿别软，赶紧站起来，高兴一点。你真的得摆脱这种感觉——你这一辈子都怕他。你知道的，我会在这儿，陪着你。要是有必要，我不介意亲手杀了他。”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夜幕降临。天地之间一片漆黑。早在半年前，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拉就把屋子里原有的鼠洞给堵住了，不过他还是留心观察看有没有新的鼠洞出现，以便及时解决后患。他们还在家里养了一只大猫，只是这只猫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动不动地思考着，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屋子里仍有老鼠，不过它们看起来收敛了许多。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一边等科马洛夫斯基，一边把黑面包切成几块，并在桌子上放上一个装了几个煮土豆的餐盘。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拉决定在老

餐厅里接待科马洛夫斯基，他们现在仍在那儿用餐。大而重的橡木桌子和餐具柜是原先装饰的一部分。桌子上放着一瓶蓖麻油，里面插着一根灯芯，拉拉他们就把这当作便携式照明灯。

十二月的一个夜晚，科马洛夫斯基满身白雪地出现了。他的帽子、大衣、胶鞋上全都是雪，进屋的时候甩下一身的雪水。科马洛夫斯基的胡子上也是雪，这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小丑——要知道过去他一定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科马洛夫斯基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西装上衣，下配一条褶皱的条纹裤子。在跟主人打招呼之前，他先用了一段时间梳理头发，并用一块手帕擦干胡子和眉毛。然后，他沉默而严肃地伸出两只手——一只是跟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握手，一只是伸向尤里·安德雷维奇。

“我想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科马洛夫斯基对尤里·安德雷维奇说，“我跟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这个你可能知道。他是在我怀里去世的。我总忍不住要看你，想看看你跟你的父亲是否相像。不过我觉得你跟他不是很像。你父亲是一个性格豪爽，随心所欲的人。你肯定像你的母亲更多一些。我知道她性格相当温柔，也是一个爱幻想的梦想家。”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让我见你一面。她说你有话想跟我说。我想见见也无妨，不过这并非我主动的选择，另外我也不觉得我跟你称得上老相识。所以我们能开门见山吗？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很高兴和你们两个人见面。我什么都明白，所有的事情。请原谅我的直接，不过你们俩确实很般配，简直是天作之合。”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你一下。请你不要管这些和你一点不相关的事情。我们可没有乞求你的同情，你恐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

“别生气嘛，年轻人。也许你的性格还是随你的父亲。他以前也老是这样发脾气。哦，我的孩子，如果你们愿意，我愿向你们献上我最真诚的祝愿。可糟糕的是，你们确实还只是孩子——不仅是你们的说话方式——无知且欠缺考虑的孩子。给我两天时间，我对你们的了解估计会比你们对自己的了解还多。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走在了悬崖的边缘。除非你做点事，不然你享受自由的时日甚至是你能活命的日子都是屈指可数。

“尤里·安德雷维奇，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的确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但没有人像你这样公开地轻视共产党的生活方式或思想。你为什么非得玩火

呢？这我真是想不通。你的存在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嘲讽，对世界的欺凌。如果你的过去是一个秘密倒也还好，可偏偏又有那么多从莫斯科来的人对你知根知底。本地的神父都不喜欢你们，而安提波夫和提沃兹恩同志又忙着扩大势力，准备把魔爪伸到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和你身上。

“不过，你是一个男人，尤里·安德雷维奇，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有权利跟你自己的生活赌博——只要你喜欢。可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并没有你那么自由，她是一个母亲，还得顾及孩子的生活，她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做事。

“我这一早上都试图让她认真地对待当下的情形。可她就是不听我的。你看能否帮着劝说一下？她没有权利拿自己女儿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也不能完全置我的建议而不顾。”

“我活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任何人，即便是跟我很亲密的人。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可以选择听你的也可以选择不听。这是她的自由，是她一个人的事。另外，我其实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建议’是什么。”

“哦，真是不骗你，你愈来愈让我想起你的父亲——一样地倔强和难缠。好吧，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你。不过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说来话长，所以你得对我有耐心，不要打断我说话。

“现在上面正在酝酿大的变动。不瞒你说，我这个消息绝对可靠，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打算走更民主的路线，尊重法律，相关规定应该很快就会出台。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很快就会被取缔的刑罚机构肯定会在完蛋之前进行一次大清算，而他

们将比之前更加残忍。你已经被列作清算目标之一，尤里·安德雷维奇。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我这是跟你说认真的——我自己亲眼见过那份名单。所以，你一定要趁现在想办法，不要坐以待毙。

“不过这还不是重点，下面我就开门见山了。

“那些仍效忠于临时政府和被夺去武装的宪政派的政治力量目前正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省集结，包括杜马代表在内的几个重要人物打算在那里聚首会晤。其中有俄国旧地方自治会的几名重要成员和其他几个名人、商人和资本家。那些打算跟苏联红军对抗的残余军事力量也在那儿集结。

“他们打算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苏维埃政府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当前来看在西伯利亚红军和外部世界之间设一道缓冲线并不是件坏事。共和国将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在莫斯科方

面的强力要求下，其中一半以上的职位都得由共产党员担任。如果说苏联共产党这边满意了，他们就会让共和国成立。这个计划完全是透明的，不过这倒也给了我们一点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得好好利用这个计划。

“早在革命开始之前，我曾处理过梅库洛夫斯、阿克哈罗夫兄弟还有海参崴[1]其他几家银行和商业公司的事务。他们知道我，还曾经派使者代表影子内阁来邀请我出任未来政府法律部长一职。这一切当然是秘密进行，不过也是苏维埃政府私下同意的。我接受了这项任命，所以现在正在赴任的途中。我跟你说这些其实是苏维埃政府暗中默许的，只是没有公开说明，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可以带上你和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等到了那儿，你就很容易坐船去国外跟你的家人团聚

了。你知道的，他们被驱逐出境了。这件事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大轰动，到现在为止，莫斯科仍在对这件事议论纷纷。

“我答应了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要把斯特尼科夫救出来。作为一个被莫斯科方面认可的独立政府成员，我可以很容易地在东西伯利亚找到他，并把他带进我们的自治区。要是斯特尼科夫没能成功逃脱，到时候我就提出用莫斯科政府看重的被联合政府关押的犯人来交换他。”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原本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科马洛夫斯基的话，不过当她一听到跟日瓦戈医生和斯特尼科夫安全有关的安排时，她就不由得竖起了耳朵。拉拉的脸微微有点红，她说：

“你看，尤诺奇卡，这对你跟帕沙都意义重大吧？”

“亲爱的，你太相信人了。你不能把这个半吊子的计划当成既定的事实来考虑问题呀。我这不是说维克托·科马洛夫斯基是故意在欺骗我们，但到目前为止他说的东西都还只是空中楼阁。就我而言，”说到这儿，尤里·安德雷维奇转向科马洛夫斯基，“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事情的兴趣，但你应该不会想着要我把我的命交到你手上吧？至于斯特尼科夫，那还得等拉拉三思之后再做决定。”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拉拉说，“我们是否跟他走。你很清楚，如果你不跟他走，那我是肯定不会跟他走的。”

闻言，科马洛夫斯基拿起尤里·安德雷维奇从医院里带回来的稀释酒精开始喝，又吃了几个煮土豆，渐渐的便有些醉意了。

2

天色渐晚。每次灯芯闪烁的时候，屋子都会被照亮；然后火焰渐渐熄灭，屋子又再次被黑暗所笼罩。主人家已是睡意朦胧，他们想私下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再去睡觉，可科马洛夫斯基就是待着不走。科马洛夫斯基的存在无疑让人感觉压抑，就好像那堵沉重的橡木板门和窗外十二月的黑色天空一样。

科马洛夫斯基并没有望着拉拉和日瓦戈医生，而是越过他们头顶，愣愣地看着远处的某个地方。他那模糊且拖长的声音一刻不停，让人感觉特别无聊和冗长。科马洛夫斯基的兴趣逐渐转到了跟远东有关的话题上，他开始解释蒙古利亚的政治重要性。而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对这一话题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也没怎么听他说，这就使得科马洛夫斯基的话显得更为聒噪和无聊。他

说：

“西伯利亚——就是一个新的美洲大陆，很多人都这么叫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是孕育俄国未来的伟大的摇篮，是我们通往民主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计量器。另外，我们的远东邻居——外蒙古——也有着很大的创造奇迹的潜力。你们对此有所了解吗？看，你竟然毫无羞耻地打起了哈欠眨起了眼睛，要知道蒙古利亚有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众多不被人知的矿藏。外蒙古是一块还未被开发的土地，中国、日本和美国都对它虎视眈眈。这些国家都跃跃欲试，想要把外蒙古占为己有，而这明显会伤害俄国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的对手都知道的利益，分割这一远东地区一定会触及俄国利益。

“中国借喇嘛和其他宗教人士的手，侵略封建

神权统治的蒙古利亚。而日本则依靠当地王族的力量。苏联红军目前跟蒙古利亚牧人合作成立了一个革命协会。我自己很想看到一个兴旺发达的蒙古利亚，一个能自由选举政府的国家。我想你会感兴趣的一点应该是，一踏过蒙古利亚的边界线，世界就在你的脚下了——你可以跟小鸟一样自由飞翔。”

科马洛夫斯基的这些话刺激着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的神经。最后，她终于受不了了，突然伸出一只手毫不掩饰自己憎恶情绪地说：

“天晚了，你该回去了。我很困。”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不礼貌，难道这么晚了你还要把我赶到大街上吗？恐怕我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对这个地方不熟，更何况外面是一片漆黑。”

“这一点你早就应该想到的，而不是在这儿一坐再坐。没有人要你留到这么晚。”

“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客气呢？你甚至没问过我是否有其他的地方可去。”

“这个问题我一点都不关心。你肯定能照顾好自己。如果你是想让我邀请你在这儿过夜的话，那么我得告诉你，我不可能让你跟我们睡同一个房间，至于其他房间，里面可全都是老鼠哟。”

“我不在乎。”

“那就随你的便吧。”

3

“亲爱的，怎么了？你已经连续几晚上没睡了，而且茶不思饭不想的，整天跟个幽魂似的到处荡。你肯定是有心事。究竟怎么了？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别把自己憋坏了。”

“你们医院的那个看门人伊扎特又惹事了——他跟楼下的洗衣妇有奸情。这件事被我知道了，所以他就用另一个消息跟我交换，让我别把他的事说出去。‘这可是高度机密。’他说，‘你的朋友恐怕得进监狱了，随时都有可能。然后就可能轮到你，可怜的家伙。’‘你怎么知道？’我问他。‘哦，这事千真万确，我是从一个在党内工作的朋友那儿听来的。’当然，他说的在党内工作其实就是在执行委员会工作。”说完，两个人一起大笑。

“他说得没错。”尤里·安德雷维奇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是时候撤了。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究竟该往哪儿走呢？回莫斯科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太惹眼，我们肯定会被人盯上。要想逃走，就一定得是神不知鬼不觉。亲爱的，我觉得我们得按照你之前的想法，回瓦利吉诺去，暂时消失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在那儿待一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

“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哦，我真是太开心了！我知道你有多不喜欢这个想法，没想到现在竟然愿意这么做。不过我们不能在你的房子里住，因为你肯定没办法面对那空空如也的房间，很容易就触景伤情，想起过去的事情。我知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不能践踏别人看重的东西。我不愿意让你牺牲，让你受委屈。反正你之前住的房子已经毁得不成样子了，我

在想我们是否能住到米库力特辛的房子里去。”

“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也很感激你能这么体贴。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都想着要问你但又总是忘记。科马洛夫斯基怎么样了？他还在这儿还是已经走了？自从我跟他吵了一架并把他赶出去之后，我就没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管他呢！你还想他做什么？”

“我是在想，也许我们当时不应该那么直接地拒绝他的提议——我是说不应该我们两个全部拒绝。毕竟，我们两个的处境不一样。你还要考虑你的女儿，即便你想跟我同甘苦共命运，但你还是没有权利让你的女儿一起，对不对？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冬天去偏僻的瓦利吉

诺，我们可能会面对没有食物，没有力气也没有希望的绝境——这的确是一件很疯狂的事。但我的爱，为什么不呢？就让我们疯狂一次，如果我们除了疯狂什么都不剩的话。就让我们再次抛开自尊，请求萨姆德威亚托夫借我们一匹马。我们去找他，或者找那些仰仗他的做投机倒把生意的人，从他们那儿赊来面粉和土豆，毕竟我们现在的信用还不错。我们到时候再请求萨姆德威亚托夫多宽限我们一些日子——除非他需要用马了，再来找我们。就让我们过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吧。走，我的爱人。让我们用一周的时间砍来能让一个贤惠主妇用够一年的木材。

“哦，我得再次请你原谅我这混乱的表达方式。我真希望跟你说话的时候，不要显得这么傻。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是事实。不管你怎么说，死神现在确实已经在敲我们的门了。我

们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至少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逃离，让我们享受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哪怕最终不得不分开我们这一段时日也要一起渡过。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跟我们珍视的一切告别，告别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告别我们曾想象过的生活，告别我们的希望和良心，告别彼此。我们将再次说起曾在深夜说过的悄悄话，那像太平洋一般壮丽的悄悄话。亲爱的，你陪我渡过最后一段生命肯定不是偶然。你就是我的天使，你从童年时和平的天空开始出现，一直守护着我穿过战争的天空。

“初见你的那天晚上，你还是一个身穿深棕色校服的姑娘，半掩在旅馆房间的阴影中。那时的你跟现在一模一样，一样美得让人屏息，让人惊叹。

“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想要给这种迷恋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而那种摇曳的光芒，那种遥远的回

响，之后一直贯穿我的一生，并开启了我理解世界的大门。

“你从房间的阴影中走出来，穿着校服裙，好似一个美丽的幽灵。当时的我还很小，我对你一无所知，不知道你是谁，只是心里突然就悸动起来——我觉得这个瘦瘦的女孩儿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子。如果能让我轻碰一下她的指尖，我想一定会有火花闪现，而那火花要么会把我当场烧死要么就会让我的余生充满悲伤和想念的魔力波浪。我热泪盈眶，我的心里在号啕，在呐喊。我为还是男孩儿的自己感到难过，也为还是女孩儿的你感到难过。我一直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爱一个人，感受这种爱的能量是这么地痛苦，那么一个激发这爱情的女人会有多痛呢？

“我说了，这种问题足以把人逼疯。而这正是

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和衣躺在床上。她感觉身体不太舒服，所以缩成一团，用一块披巾盖在身上。尤里·安德雷维奇坐在她的旁边，轻声地说着话，有时会停顿很长时间。拉拉有时候也会用手肘支起身子，下巴戳在手腕处，定定地望着尤里·安德雷维奇，双唇微微分开。有时候，拉拉还会把头埋进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肩膀，掉下喜悦的眼泪。说到最后，拉拉从床上下来，双手环着尤里·安德雷维奇，幸福地在他耳边轻声唤：

“尤诺奇卡！尤诺奇卡！你真是太聪明了！你什么都知道，尤诺奇卡，你就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哦，上帝，请原谅我的轻狂。哦，我真是太幸福了。我们走吧，亲爱的，我们一起走。等到了瓦利吉诺，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日瓦戈医生认为拉拉指的是怀孕的事——而那也可能是她自己搞错了——于是他说：“我知道。”

4

一个阴沉的冬日早晨，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离开了尤里安提城。那是一个工作日，大街上的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其中有很多熟悉的脸。家里没有打井的女人们在老水井前面排着队，她们的水桶和扁担就放在旁边的地上。日瓦戈医生小心翼翼地绕过她们，寻找萨姆德威亚托夫那匹烟熏黄的马。街上的陡坡处，不断有雪橇滑下来，泥水溅在了旁边的人行道上，有时还会溅到灯柱和路边石上。

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拉赶上了正在街上走的萨姆德威亚托夫，但他们头也不回地从萨姆德威亚托夫身旁过去了，以至于后者都还没太反应过来他们是谁，更不用说跟他们说什么话了。又走了一会儿，拉拉他们又重遇了科马洛夫斯基，不过仍然是快速从他身旁跑过，连招呼也没打。

格拉菲拉·图特塞娃隔着一条街对他们大吼：“那些人真是胡说！有人说你们昨天离开尤里安提了。是去找土豆了吗？”然后，她打手势说听不到拉拉他们的回话，最后也只能悻悻地挥手作别。

经过塞玛身边的时候，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拉稍微放慢了一些，但刚好碰上一个急速陡坡，根本没办法停下，马不断地扯着缰绳。塞玛用好几条披巾把自己从头到脚包了个严严实实，看起来就跟一块木头似的，她跳到马路中间，跟拉拉和尤里道别，并祝他们旅途顺利。

“等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一定要好好聊一次。”塞玛对尤里·安德雷维奇说。

终于，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拉把尤里安提城留在了身后。尽管日瓦戈医生也曾在冬天走过这条

路，但他绝大多数的印象还停留在夏天，所以有点认不出路。

他们把一捆捆的食物和其他包袱塞进雪橇前面的干草堆里，并用绳子捆住。尤里·安德雷维奇要么是跟当地农民一样半跪在雪橇板上要么就是盘腿坐着，而他的脚上还穿着萨姆德威亚托夫的毡毛靴。

冬天的中午一般是天色最亮的，好似天永远不会黑似的，尤里·安德雷维奇也赶紧趁着中午加紧赶路。马拉着雪橇在平原间滑行，仿佛一把开了弓的箭。只是路上凹凸不平，雪橇也跟风暴中的船一样东倒西歪。拉拉和凯特恩卡身上都捆着厚厚的皮毛大衣，所以她们基本上不能动弹。有时候碰到转角或者雪橇碰到某块石头，拉拉和凯特恩卡就会跟球一样从干草堆的这一边滚到那一边，这让她们自己都忍俊不禁。时而日瓦戈医生会故意开玩笑似的撞

到路基，把她们轻轻地甩到雪地上。这样子走了几码的距离后，尤里·安德雷维奇便会停下马，拉正雪橇，然后被拉拉和凯特恩卡两个人大笑着又捶又打。

“我让你们看看我当时被游击队带走的地方。”走了挺远一段距离后，日瓦戈医生对拉拉和凯特恩卡这样说道。可结果他却没有兑现，因为冬日的萧条让一切都改变了模样，森林里落叶飘零，四处都是荒芜一片，日瓦戈医生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方了。

“就是这儿。”尤里·安德雷维奇突然大喊，但他那不过是把莫勒维奇金竖在田野里的广告牌错当成了他在被抓的那个森林里看到的广告牌。当他们经过第二块仍树在萨克马十字路口密林里的广告牌时，发现严霜已经让广告牌上原本闪亮的花边模糊

不堪，整个林子看着也是灰黑色的一片。所以，他们终究还是没有找到当时被抓的那个地方。

待他们终于抵达瓦利吉诺，天还是亮的。由于日瓦戈医生之前住的房子在最前面，所以他们也就索性在那房子前面停下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拉拉他们强盗一般风风火火地闯了进去，因为天很快就要黑了。不过屋子里面已经是漆黑一片，最终尤里·安德雷维奇还是没有看到屋子究竟损毁到什么程度。他记得的一些家具仍在屋子里，瓦利吉诺已被遗弃，所以也没人再来修复这些东西。他在屋子里面没看到一件私人物品，不过冬妮娅他们走的时候他没在场，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带走了多少东西。这时，拉拉说道：

“我们得加紧一点儿，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可不能站在这儿发呆。要是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

就得把马牵到谷仓里去，要把食物搬到过道里，还得动手清理这几间屋子。不过我是不太赞成这样，这个一开始我们就商量好了的。要是我们住在这里，你肯定会很痛苦，那么我也就会过得痛苦。这是什么房间，是你们的卧室吗？哦，不是，是育婴房。这儿还有你儿子的摇篮呢。凯特恩卡住这个房间肯定会小了。不过，你这个窗子倒是很不错，墙上也没有开口，还有那个炉子也砌得很好——我上次来就很喜欢。所以你要是坚持住在这儿——尽管我不是很同意——我还是愿意脱下大衣，马上开始收拾。咱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炉子烧起来，至少要让它连续烧上二十四小时。亲爱的，怎么了？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等一会儿。我还好。不好意思……也许，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米库力特辛的房子。”

接着，三个人便走出了房间。

5

米库力特辛家的房门上了锁。尤里·安德雷维奇用螺丝和撬木把锁扭了下来，这次他们还是很快地进了屋，并且是衣服、帽子、鞋子都没脱，就进了内屋。

一进屋，他们就被房间里几处地方的整洁惊住了，尤其是米库力特辛的书房。肯定前不久还有人住在这儿，但那会是谁呢？难道是米库力特辛家的人？他们去了哪儿？又为什么要在门上挂一把挂锁？另外，要是米库力特辛家的人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那怎么只有几处地方是干净的，而不是把整间房都打扫干净？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有外人闯了进来，但那可能是谁呢？不过，日瓦戈医生和拉拉对这个神秘的闯入者并不是很担心。他们也没打算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很多被抢掠的房子，有很多的流亡者。“一些白军军官还在逃呢。”他们不约

而同地说，“要是那个神秘的闯入者来了，我们再做安排。”

尤里·安德雷维奇再次站在了米库力特辛书房的门口，而这书房仍是那么地宽敞与舒适，窗边也仍摆放着大大的桌子。他再一次觉得这种俭朴的环境才能让人耐心且心安地工作，从而有所成就。

院子里还有几处附属建筑物，马厩的旁边就是谷仓。不过马厩的门也都锁上了，尤里·安德雷维奇这会儿也懒得去撬锁，毕竟也不是那么急着用。马可以暂时让它在谷仓里过夜，因为谷仓的门比较好打开。尤里·安德雷维奇解开马的缰绳，并从水井里打了一些水给它喝。他原本想喂一些带来的干草给马吃，只是这一路上那干草堆已经被马蹄踩得一片狼藉。幸好，谷仓里还有许多的干草。

三个人和衣躺下，用皮毛外衣当毯子，很快就

睡熟了——就跟玩了一天的孩子睡得那么香甜。

6

从一起床开始，尤里·安德雷维奇就总是盯着那靠在窗边的桌子看。他用手指不舍地抚过桌子上的笔墨，但他还是把写作这件事推到了晚上，心想等拉拉和凯特恩卡上床之后再开始写。况且白天他也没有时间，尽管说只有两间房要收拾。尤里·安德雷维奇满心期待夜晚的来临，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这件事。可以说，写作的激情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扉。

他觉得还是得先写点什么。作为开头，他想写下一些原来没来得及写的想法，以帮助自己进入状态。然后他又想，要是拉拉和他能熬通宵的话，到时就又有一些新的重要的东西可写。

“你忙吗？你在做什么？”

“添柴烧火，还是添柴烧火。怎么了？”

“我想要一个盆，这样就能把这些亚麻布洗洗了。”

“要是我们继续这样烧火下去，不出三天木头就会用完的。我得去先前的树林里看看，那儿或许还有一些剩木材，不去看怎么知道呢？要是有的话，我就带一些过来。至于你说的水盆，我明天再去找。我确定曾在某个地方见过，只是这会儿忘了是哪儿。”

“我也见过，只是这会儿也想不起来。肯定是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不然我也不会忘记。算了，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要知道我可是热了许多的水来洗东西。到时候用剩下的水来给凯特恩卡和我自己洗衣服就可以了，你的衣服也可以让我来洗。等我们收拾好这一切，晚上睡觉前就能洗个热水澡

了。”

“谢谢你。我先去拿我的东西。对了，我已经照你的想法，把那些重型家具从墙边移开了。”

“很好。既然找不到水桶，那我就先用洗碗盆来洗衣服。不过洗碗盆里有很多的油腻，得先好好擦洗一遍。”

“等炉子的柴火一添妥，我就去抽屉里找找看。以前总是能在书桌和衣柜里找到一些东西——肥皂、火柴、纸、铅笔、钢笔、墨水这些。桌子上煤油灯里的煤油还是满的，我想米库力特辛家肯定没有煤油，一定是有人从其他地方弄来的。”

“咱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多亏那个神秘的闯入者，就跟天外来仙一样。哎呀，我们又忙着聊天去了，看，我的水又滚起来了。”

说完，两个人便在房间里来回穿梭，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手一刻都停不下来。有时候还会撞到彼此或绊倒在凯特恩卡身上——凯特恩卡总是在他们的脚边转。她好奇地四处乱跑，所以一下子又挡了道；还未等大人们责备她，她就先哭了起来。凯特恩卡假装冻得身子发抖抱怨屋子里太冷了。

“现在这些小孩儿真麻烦。”日瓦戈医生心想，“这都是流浪生活的牺牲品，是一群邪恶的小流浪者。”然后，他大声对凯特恩卡说：

“姑娘，别哭了。你不可能会冷的，这炉子都已经烧得通红了。这是在胡扯。”

“炉子可能已经热了，但我感觉还是冷呀。”

“那你就只能耐心地等到晚上了。我再把火烧大一点儿，你刚也听见你妈妈说了，要给你洗个舒

服的热水澡的。现在你先去一边玩会儿。”尤里·安德雷维奇从冰冷的储物室里把里贝尔斯小时候玩的玩具全拿了出来，并扔在地上。其中有些玩具尚还完整，有些已经残缺不堪，里面有石块，有火车，还有火车头，四方形的黑板和用来玩游戏的带图画和数字的骰子和计数器。

“尤里·安德雷维奇，这些东西会让你想到什么？”凯特恩卡大人似的问道，“这些不是我的，而且这都是给小婴儿玩的玩具，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可下一秒，她就坐在了玩具堆中间，并忙着堆叠玩具，说是要给妮卡——她从城里带过来的洋娃娃——建房子。凯特恩卡用玩具堆出来的房子可比她自己曾住过的房子好多了！

拉拉在厨房里看着凯特恩卡：“看，这是她对

家庭生活的本能。这表明，没有什么能毁掉一个人对家对秩序的渴望。孩子们比我们诚实多了，他们不畏惧真理。但我们这些成年人就生怕自己落在了时代后面，所以会背叛那些自己原本最珍视的东西，违心地夸赞那些不喜欢的东西，并对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事物点头。”

“喏，水桶给你。”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从漆黑的大厅里走出来，“这个水桶肯定被人动过了，我刚去找的时候，看到它就放在天花板漏洞的下面接水呢。我想，它应该从去年秋天就放在那儿了。”

7

为了准备晚餐，拉拉拿出带过来的一些生活用品，并做了足够三个人吃三天的饭菜。她做了特别美味的土豆汤和烤羊肉，还有炒土豆。凯特恩卡吃得肚子都要被撑爆了，她咯咯地笑着，做各种调皮的事。后来，吃饱喝足的她蜷缩在沙发上，还拿了拉拉的披巾盖在身上，很快就睡着了。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烧了一天的炉子，又热又累，跟女儿凯特恩卡一样想睡觉。当然，她也为自己成功的晚餐而高兴，所以并不急着清洗盘子，而是在旁边坐着休息一会儿。确定凯特恩卡已经睡熟之后，她把身子俯到桌前，手支着下巴，说：

“只要我们这一切的辛苦不白费，只要我们能得到一点回报，我就心甘情愿。你一定要时刻提醒我，我们来到这儿是为了在一起生活。你要让我把

持积极的情绪，不要让我胡思乱想。因为严格说起来——如果诚实地看待这一切的话——恐怕你也说不好我们现在是对是错。要知道，我们可是闯入了别人的家，并理所当然地在里面安了家，现在又跟个疯子似的忙进忙出，把这当作一个舞台背景，而不是真实的生活。是的，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不是真的，一切都是‘假装’，用孩子的话说，这是一个三岁孩子玩的游戏——滑稽且幼稚。”

“可是亲爱的，当初坚持要来的不也是你吗？难道你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反对的吗？”

“我当然记得，你说的我不否认。所以现在错全在我。你对这个提议左思右想也没什么问题，但我总有头脑发热的时候嘛。你走进房间，一看到你儿子的摇篮，就几乎要晕倒。那是你的权利，我不说什么，可为什么还不准我担心凯特恩卡，不准我

思考未来。是不是在我对你的爱面前，什么都得让路？”

“拉丽莎！你冷静一点儿，好好想想吧，现在回去也还来得及。我一开始就说过，让你考虑一下科马洛夫斯基的计划。我们现在有马了，只要你想，我们明天就能直接回尤里安提去。科马洛夫斯基还在城里，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他了——不过我想他应该没看到我们。我想我们肯定能找到他的。”

“我都还没说什么，怎么听起来你就生气了呢。请你告诉我，我真的错了吗？也许留在尤里安提城真比来这儿好。如果我们真想自救，那就应该有一个更明智更全面的计划；也许想了一通之后会发现，最合适的计划还真是听从科马洛夫斯基的提议。尽管科马洛夫斯基是个让人恶心的男人，但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消息灵通，并且是个办事能力很

强的人。我们在这儿的危险其实是最大的。你想一想——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出了事都不会有人知道。就算晚上大雪把我们埋了，也不会有人在早晨把我们挖出来！我想那个给了我们一些方便的神秘来客，也许就是一个强盗，说不定他随时会闯进来抹了我们的脖子！你有带枪在身边吗？我想没有！看吧，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你的这种考虑不周全，悲剧的是我也被你传染了。我都没办法正常思考。”

“那你究竟想怎么样？你现在想让我怎么做？”

“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只要让我一直忙就行了，反复提醒我，我是你爱的奴隶，而思考或争论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哦，我告诉你吧。你的冬妮娅和帕沙真是比我们好一千倍还不止，但这并不是重

点。重点是，爱也是一种天分，跟其他不可多得的天分一样。无论爱多么伟大，如果没有上天的保佑，爱情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跟我，就如同曾在天堂学了接吻的人，后来被派到人间，来验证学得怎么样。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和谐——没有限制之别，没有程度之分，一切都是平等的，万事万物都是快乐，万事万物都能称其为精神。但在这种爱的照拂中，也许随时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就是某些幼稚，不受限制，不负责任的东西。这样的爱其实是一种任性且破坏力很强的元素，它站在家庭欢愉的对立面。所以，我对此而感到害怕且不信任，其实也是必然的结果。”

说完，拉拉双手环抱住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脖子，泪流不止。

“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不一

样？你有翅膀可以飞翔，可我只是一个女人，我的翅膀只是用来保护下一代的。”

尤里·安德雷维奇被拉拉说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以免自己情绪失控。

“我们现在躲在这儿，确实不是个办法。你说得对。但这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只可惜现在大环境是这样，人人自危，疯狂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事情也会慢慢地尘埃落定。也许某天，他们会再次开始出书立著。

“我也是这么想。你说我们能不能跟萨姆德威亚托夫达成一个协议——当然，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好处——他出资让我们在这儿住六个月，条件就是我花时间来写一本书，可以是关于医学的教科书，

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或者诗集也行。或者由我来翻译一些有名的经典作品，我对语言很擅长。那天我看到了一则广告，说是彼得堡的一个大出版商专门是做翻译作品的。我敢肯定这种翻译著作肯定能赚钱。而我自己也很乐意做这样的事。”

“哦，你还真是提醒我了，其实今天我也在想类似的事。不过我真是对我们在这儿的未来没有信心。相反，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我们很快就会从这儿离开，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落脚之处，我在想，能否请你帮我一个忙？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你能不能花上几小时的时间把你曾读给我听的那些诗歌写下来？估计其中一半的诗歌你已经忘了，剩下的一半也没有写下来，我担心有一天你会把它们全忘了，到时候恐怕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8

天黑之后，他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拉拉还帮着凯特恩卡洗了一个澡。洗完澡后的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神清气爽，他在窗子前的书桌旁坐下，背对着正帮凯特恩卡洗澡的拉拉。拉拉身上裹着一条浴巾，身上香皂的香味若隐若现，头发则是用另一条毛巾包住，她把凯特恩卡抱上床并给她盖好被子。尤里·安德雷维奇提前品味着专注工作的快乐，用一种愉悦而闲适的心情看着周围的一切。

拉拉也爬上了床，一开始她只是假装睡着，等她真正睡过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拉拉和凯特恩卡的睡衣跟挂在床头的刚洗过的亚麻衣很像，衣服上都缀着花边。即便是在那种困难的时候，拉拉还是想办法给衣服上了浆。

夜晚的沉寂将尤里·安德雷维奇包围，带着快乐

和生命的气息。淡黄色的灯光轻轻柔柔地照在白色的纸上，也给墨水盒里的墨水镶上一道亮边。外面，打霜的冬夜为一层淡蓝色所笼罩。为了看得更清楚，尤里·安德雷维奇走到隔壁又黑又冷的房间，看向窗外。满月的光芒照在一片皑皑白雪上，好似蛋白或白色油漆一般光洁闪亮。那个冬夜的美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心得到了一种平和。他返身走回温暖明亮的房间，开始动笔。

尤里·安德雷维奇写得行云流水，哪怕是在外在的表现上，他也试图让写下来的文字保持独特性。他不断地修改写下来的东西，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复写，内容也跟原来的版本越来越不同。记忆最深的那些诗在他脑海里有着最确定的模样——《圣诞星辰》《冬夜》，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作品。不过那些作品后面还是被遗忘或者遗失，再也找不回来。

以这些过去的诗作为开始，尤里·安德雷维奇继续之前未写完的作品。他深入精神世界，循序渐进地写，不过对于完成这部作品他并不抱任何希望。然后，他暂时掩卷，开始写一首新的诗。

写了两三节并且也创造了几个意象之后，作品渐渐攫住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心，他开始感觉到灵感的靠近。这种时刻，决定艺术作品的几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被反转了。这时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艺术家试图表达的思想状态，而是他用来表达的语言。语言，是美丽与意义的载体，语言本身便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并完全转化成音乐——这并非单就响亮度而言，而是从其内在的力量来判断。所以，就像大河中汹涌的水流打磨水里的石头或冲击轮船一样，言语借由其自身的法则、标准、韵律和其他数不清的形式进行极富冲击力的创造。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只是现在人们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自然它也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

到这时候，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作品最主要的部分不是由他来完成的，而是由一种超越他自身并指引他的强大力量完成了，也就是宇宙思想的运动、现代历史阶段和未来的诗歌。同时，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完成这项运动，唯一需要的载体就是他自己。

这种想法让他暂时从自责，对自己不满，妄自菲薄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尤里·安德雷维奇抬起头，打量四周。

他看到雪白的枕头上有两张沉睡的脸。人、干净的亚麻布和干净的房间、夜晚、白雪、星辰、月亮，这一切事物体现出来的纯洁气息让他的心里涌起一阵激情，让他的心雀跃不已。“天啊，天啊！”他轻声叫道，“所有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

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赋予我这么多东西？你让我感受到你的存在，让我进入你那神圣的世界，沐浴在星辰皎洁的光芒之下。你知道吗，你这些慷慨的赠予让我的眼睛里有了永恒的喜悦的光芒。”

凌晨三点，尤里·安德雷维奇从书桌前抬起头。他从那遥远的梦境中回来，回到了现实，内心变得更快乐，坚强和平和。突然，夜幕下乡村的宁静被一声悲哀的长嚎打破。

尤里·安德雷维奇走进隔壁没有灯的房间，透过窗子往外面望，不过就在他忙着写作的时候，窗玻璃上已不知不觉地结了一层厚霜。他卷起前门的窗帘，披一件大衣在身上，匆匆走了出去。

尤里·安德雷维奇被月光下白雪的光芒耀得眼花，一开始他什么都看不见。然后，那高远的嚎叫声再次响起，尤里·安德雷维奇察觉到水沟那边的空

地边上有四个长长的影子，如同素描画一般细长。

原来是几只排成一排的狼，它们的头高高扬起，鼻口对着尤里·安德雷维奇所在的房子，或朝着月亮或朝着窗子上月光的倒影嚎叫。不过一直到它们转过头并好似狗一样跑开，尤里·安德雷维奇这才反应过来那是几只狼，而那几只狼好似猜得透他的想法似的。还未等尤里·安德雷维奇反应过来，狼已经跑开了。

“这可真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尤里·安德雷维奇想，“狼窝是不是就在附近？也许就在水沟那边？哦，真是太可怕了。萨姆德威亚托夫的马还在谷仓里呢！那几只狼一定是嗅到了马的味道。”

尤里·安德雷维奇决定暂时不将这件事告诉拉拉，以免她担心。他转身往回走，把两间房之间的

间门关上，并用毛毯和衣服堵住墙上的洞，这才走回书桌旁。灯光一如之前地明亮，好似在跟人打招呼似的。不过此时尤里·安德雷维奇已经没有心情再写东西了。他没办法静下心来，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狼和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以及种种复杂的情况。另外，他也确实累了。

这时，拉拉醒了过来。

“煤油那么珍贵，你怎么还亮着灯？”拉拉用带着睡意的声音说道，“过来，在我旁边坐一会儿。我跟你讲讲我刚才做的梦。”

于是，尤里·安德雷维奇吹灭了灯。

9

又一天过去了。他们在屋子里找到了一个儿童用的雪橇。凯特恩卡的小脸蛋红通通的，她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循着尤里·安德雷维奇给她修出来的弯道滑下去，兴奋地大叫。在此之前，尤里·安德雷维奇已经用铲子把道上的雪压紧，并在上面洒了一些水。凯特恩卡不断爬上土堆的最高点，抓着雪橇上的绳子从上面滑下，而她脸上的笑一直没停过。

天气已经十分冷，尽管还有阳光，但空气中满是寒气。中午的雪看起来是黄色的，就跟黄昏的天色一般，混着橘色和蜜色。

拉拉前两天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洗洗涮涮，所以屋子里到现在还是潮乎乎的。水气布满窗玻璃，上面还挂着一层霜，墙纸上也是一道道的黑水印。屋子里又黑又闷。尤里·安德雷维奇负责扛木头和打

水，并继续清点屋子里的东西，不时还真能有新的发现，他尽力帮拉拉做着那些杂七杂八的家务琐事。

忙乱之中他们的手偶尔会碰到一块儿，这时他们就会放下手上的事情，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用心感受片刻的温柔和深情。待这种时刻过去，他们会突然想起凯特恩卡已经一个人在外面待了很久或者马还没喂食喂水，然后便匆忙跑出去，试图弥补自己的缺失。

尤里·安德雷维奇一直都睡不够，他总感觉头晕沉沉的，身上也是到处都痛。每天，他都期待着晚上的到来，这样他就能继续之前的写作。

在尤里·安德雷维奇昏昏欲睡的时刻，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那时候的他浑然不觉周围的事物，脑袋里也是一片空白。而这种笼罩一

切的朦胧感，其实是预示着最后的确定画面即将出现。这就好像是打一份草稿——白天的无精打采是为了夜晚的精神抖擞做准备。

尽管尤里·安德雷维奇感觉疲倦，但事情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人和事，都较之前有了不小的调整和改变。

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他想要继续留在瓦利吉诺的梦将无法实现，他和拉拉随时都可能天各一方。最后，他一定会失去心爱的拉拉，失去跟她共同的生活，甚至失去生命本身。尤里·安德雷维奇内心感到不安，但最折磨他的还是每天都要无奈地等待夜晚，他渴望表达心中的悲伤，把所有人都感动得落泪。

那几只狼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渐渐地那已经不是站在月光雪原上的狼，而是成了一个主

题，成了毁灭他和拉拉并将他们从瓦利吉诺赶走的邪恶力量的象征。

这种关于邪恶力量的想法在他心里越来越强烈。一到晚上，朦胧中那几只狼就化身成了史前巨兽或让人害怕的怪兽，成了山谷里的巨龙，贪婪地想要喝他和拉拉的血。

夜晚再一次降临，尤里·安德雷维奇点亮桌子上的台灯。拉拉和凯特恩卡比前一晚睡得更早些。

那天晚上尤里·安德雷维奇写的东西主要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清晰的抄写——诗歌的改良版——写得工整而漂亮。而新写的东西则是龙飞凤舞一样，随处可见空格和省略，字迹模糊不清。

尤里·安德雷维奇仔细辨认着涂鸦一样的文字，这一次他失望了。昨晚这些文字曾让他感动落泪，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可以写得这么好。可现在同样的文字在他看来，却变得让人沮丧，并且特别地牵强附会。

尤里·安德雷维奇毕生的梦想就是要严谨地写作，并且要在简单平凡的形式之中蕴含伟大的寓意。他喜欢含蓄的表达方式，想要让读者或者听者在不察觉的情况下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尤里·安德雷维奇始终追求质朴的表达方式，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离理想还这么远的时候，他伤心了，失望了。

昨晚，尤里·安德雷维奇试图用简单到天真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感受，用摇篮曲一般直白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爱、恐惧、渴望与勇气交织的感觉。可现在看着这潦草的文字，他发现昨晚写的东西缺乏一个连贯的主题把不同的线连接起来，所以显得十分涣散。于是，尤里·安德雷维奇把他之前写的东西画

掉，开始用同样诗意的语言写圣乔治亚的传说和恶龙的故事。一开始，他把字写得很大很工整，但韵律的不规则，意思的不连贯让他心烦意乱，让他觉得自己写得特别做作。尤里·安德雷维奇索性不再管韵脚，把诗歌分成四节，就跟把散文中没用的话去掉一样。这项工作并不简单，但起码让他的精神振奋了一些。事实证明，改过之后的诗确实生动了一些，但还是显得冗长啰唆。尤里·安德雷维奇逼着自己再进行改动，尽量把句子改短。改过之后的诗成了三音格，这顿时赶跑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的睡意，让他兴奋不已。灵感一下子就来了，稍微一想便能找到最恰当的字眼儿来表达。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诗很少会让人想到具体的画面。在他的诗里，你仿佛能听到嘚嘚的马蹄声，这就跟你能在肖邦的钢琴曲中听到马的从容漫步一样。你会看到圣乔治亚策马奔腾，跑过辽阔的草原，然后你目送着他离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直至消失在远方。尤里·安德雷维

奇狂热地写下脑海里的每一句话，那些话好似是自动蹦出来的，根本不用思考，并且总是在最恰如其分的时刻出现。

这时，拉拉从床上起身，并朝书桌走过来，但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注意到。穿着长睡衣的拉拉显得比真实的她更高更瘦。拉拉走到尤里·安德雷维奇身旁，把尤里吓得脸色苍白惊恐不已，然后她伸出手，低声说：

“你听到了吗？外面有狗在叫。我想，至少有两只。哦，真可怕！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们挨到天亮，到时候我们就离开，我们离开这儿！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劝说之下，拉拉总算平静了一些，并再次进入了梦乡。尤里·安德雷维奇走到外面。这次，狼群比前一晚离得

更近，消失得也更迅速，尤里·安德雷维奇还是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往哪个方向走的。那些狼站在草丛里，尤里·安德雷维奇也没数清究竟有多少只，不过他直觉地觉得这一晚的狼来得更多了。

10

这是他们来到瓦利吉诺后的第十三天。这些天一切如常，并未发生什么新鲜事或古怪事。狼群消失了几天之后，再次在晚上出现。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仍误以为那是狗，并觉得这是厄运的征兆，恐惧的她一如往常地提出第二天就走。焦虑让拉拉失去了以往的平和和冷静，这对于一个不习惯表达内心情感的女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

相同的场景一次又一次重演，所以当那天早上拉拉再次开始打包行李时，他们在瓦利吉诺待的这十三天好似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屋子里还是潮湿而黑暗的，不过这一次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天气其实没先前那么冷了，天上压得很低的乌云层层叠叠，随时都能落下雪来。尤里·安德雷维奇已经连续熬了很多夜，无论是精神还是身

体都是疲惫不堪。尤里·安德雷维奇双腿无力，脑子也是混乱不清。他被冻得瑟瑟发抖，不住搓着自己的手，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等着拉拉做决定，然后再决定接下去他自己要做什么。

拉拉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那一刻，她甚至愿意付出所有，用这混乱的自由换一份工作，不管多么辛苦，那样他们至少能过上体面，诚实，安稳的生活。

这一天，拉拉跟平常一样一起床就整铺，打扫，做早餐。然后她开始打包行李，并让日瓦戈医生去把马牵出来——这一次她是打定主意要走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表示异议。现在尤里安提城正是风声最紧的时候，这时候回去无疑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但留在这个荒无人烟，处处是危险的地方也是一样地疯狂。

况且，谷仓里的干草已经所剩无几了。当然，要是决定留下，日瓦戈医生也可以想办法再弄些食物和柴火来，只是为了一件不确定的事儿奔波确实也是不值得。所以，尤里·安德雷维奇没有反驳，直接去套马。

可尤里·安德雷维奇并不擅长做这种事。萨姆德威亚托夫曾教过他要怎么做，但他老是忘记。不过，他最后还是成功地把马套好了，只是动作稍显笨拙了些。尤里·安德雷维奇把马轭套在马杆上，把金属皮带的两端打个结，然后一条腿跨过马背，再将马脖子处的绳子拉紧。最后，尤里·安德雷维奇牵着马走出前廊，然后将它束在其中一根门廊上，走进屋里去叫拉拉。

拉拉和凯特恩卡已经穿好了衣服，东西也都打包好了，只是拉拉的情绪十分不好。她绞着自己的

手，眼泪眼看就要掉下来了，并请求尤里·安德雷维奇再坐一会儿。拉拉在一张椅子上躺下，接着又起身，不连贯地尖声唱起歌来，歌声之中夹杂着她的自言自语：“你想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心里好乱。现在天色有点晚，我们可能走不成了，天或许很快就黑了，说不定到时我们会被困在森林里头。你觉得呢？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照做，只是我自己做不了这个决定。好似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要离开，要做最好的选择。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你不说话呢？我们已经浪费半天时间了，也不知道这半天究竟做了什么。也许明天我们会更理性更小心一点儿。你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我们再待一个晚上，怎么样？明天我们早一些起床，天一破晓我们就动身。怎么样？现在你先去生火，留在这儿你可以多一个写作的夜晚，这是不是很好

呢，亲爱的？哦，天啊，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你怎么不说话？”

“你把事实夸大了。现在离天黑还早着呢，时间还很早。不过就按你的意思，我们再留一个晚上。只是你要平复一下心情，别这么郁闷不安了。过来，我们先把外套脱下，再把刚才打包的东西拿出来一些。另外，凯特恩卡说她饿了。我们得弄点东西吃。你刚说得对，其实没必要走得这么突然，我们都没做好准备——哦，你别难过了，别哭。我待会儿就把炉子点燃。不过在我生火之前，我得先把门边的雪橇拿过来，另外还要从木棚里把仅剩的一些木头拿过来——我们的木材快用完了。你别哭。我很快就回来。”

11

走出门，尤里·安德雷维奇看到路上有几道雪橇的痕迹，通往他之前住的房子。那是尤里·安德雷维奇前两天拉柴留下的，雪地上满是脚印和雪橇印，一片狼藉。

早上起一直阴沉的天空这下也放晴了，天气又冷了起来。原来的那个小花园就在木棚的正对面，好似是故意出现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眼前，好让他想起一点什么。那个冬天的雪下得很大，打谷场上的积雪很厚，显得旁边的过梁和木棚都变得矮了。从房顶挂下来的冰柱几乎要伸到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头顶，好似一个巨大蘑菇的边缘。恍惚间，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雪地之上似乎悬起了一轮新月，射下白冷的光芒。

尽管还是午后，天也还没黑，但日瓦戈医生感

觉自己仿佛是站在深夜的黑色森林里。这是他灵魂里的黑暗，也让他倍感沮丧。头顶上的新月是一个孤单的意象，这或许表示马上会有分别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累极了，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他把圆木一捆捆地从木棚里抱到雪橇上，不过每捆抱的数量比平时要少一些。即便戴了手套，可在那样的天气抱结冰的木头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一通活干下来，可尤里·安德雷维奇并没有感觉暖和多少。他心里好似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并且再也不能修补。尤里·安德雷维奇诅咒自己不幸的命运，但他祈求上帝，能放过他爱的那个美丽、悲伤、谦卑、一心一意的女人。新月仍挂在谷仓的上方，它带来了光明却带不来温暖，闪出的光只让人觉得寒冷。

马突然把头转向米库力特辛房子的方向，并嘶叫起来。一开始还是怯怯地轻声叫唤着，之后就越

叫越大声。

“怎么了？”尤里·安德雷维奇暗想，“肯定不是因为恐惧。受惊吓的马不会这样嘶鸣，毕竟它不可能傻到因为嘶鸣而把狼群引到自己这儿来，所以马嘶鸣肯定是因为高兴的事情。估计它是想要回家了。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能走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往圆木上放了一些木头碎屑和打卷的树皮，又在上面盖了一层麻布，再用绳子捆紧，然后回过头，拉着雪橇往回走。

马再次嘶鸣起来，这一次是在回应远处另一匹马的嘶鸣。“那是谁的马呢？是不是瓦利吉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荒凉？”尤里·安德雷维奇从来不觉得会有客人来拜访他们，所以他压根就没觉得另一匹马的嘶鸣声是从米库力特辛房子的方向传来的。尤里·安德雷维奇拉着雪橇绕过几栋房子，由于积雪太

厚了，他并没有看到前面的入口。

尤里·安德雷维奇慢悠悠地走着——何必着急呢？——到了之后，他先把木头堆好，解开马，再将雪橇放回谷仓里去。然后他牵着马往马厩的方向走去，并把仅剩的几把干草放进马槽。

做完这一切之后，尤里·安德雷维奇往屋里走，只是他心里莫名地不安。只见前廊正前面放着一架空间宽敞的雪橇，一匹苗条的黑色马驹拉着它。而一个陌生人绕着马走来走去，偶尔会拍一下马，并察看它的距毛。

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传出来。尤里·安德雷维奇无意偷听，但他又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几个字，所以他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直至突然停下。尤里·安德雷维奇认出那是科马洛夫斯基和拉拉及凯特恩卡交谈的声音。显然他们是在靠门较近的屋子里说话。

科马洛夫斯基似乎在和拉拉争论着什么，从拉拉说话的语气来看，她似乎心情不佳。拉拉在哭，时而跟科马洛夫斯基剧烈地争吵，时而又同意他的看法。

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科马洛夫斯基是在谈论他，说他不值得相信——他好似听到了“一脚踏两船”这句话，所以没办法判断他是更倾心于拉拉还是更爱他自己的老婆。还说拉拉不应该把他当作依靠，不然最后只会落到一个流亡四方的结局。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走了进去。

不出尤里·安德雷维奇所料，拉拉和科马洛夫斯基确实是在靠右边的房间里说话。科马洛夫斯基穿一件及膝的皮毛外套。拉拉则是拉着凯特恩卡的衣领试图帮她系紧衣服，但她好似是找不到挂钩，所以气恼地要凯特恩卡别扭来扭去，但凯特恩卡反驳

道：“放松一点儿，妈妈，你会勒死我的。”尤里·安德雷维奇走进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穿好了衣服，准备离开。见他进来，科马洛夫斯基和拉拉都奔过来，异口同声地说：

“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好久！”

“好呀，尤里·安德雷维奇。尽管我们上次对彼此说了一些不礼貌的话，但我这次还是不请自来了。”

“你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刚才究竟去哪儿了？”拉拉再次问道，“现在你先听下科马洛夫斯基的建议，然后再快速做一个决定。我们时间不多了，得抓紧。”

“你们干吗都站着呢？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来，坐下。亲爱的，你干吗问我刚才去哪儿了？你

明知道我去拉木头了呀，然后又忙着照料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坐，别客气。”

“你看到他难道不惊讶吗？你看着一点儿都不意外似的。我们之前不是都后悔来了这儿，后悔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吗？现在他来了，就在你的眼前，可你却一点儿都不惊喜！不过最让人惊讶的还是他将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你告诉他吧。”

“我不知道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究竟是怎么想。但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已经故意放出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尤里安提城，好给你和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更多时间来考虑，以免你们草率地做出决定。”

“可我们不能再推迟计划了。”拉拉插嘴道，“现在是离开的最佳时机。明天早上……还是

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自己跟你说吧。”

“亲爱的拉拉，就一会儿，没什么关系。不好意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过你们干吗要穿上外套呢？还是先把外套脱了，坐下说话。毕竟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得细细考虑，急不得。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担心我们的谈话会涉及一些私人事情，要是谈得深了恐怕会让人觉得滑稽和尴尬。不过事实上，我从来没考虑过跟你走，但拉拉的情况不同。我们要考虑的东西不一样，说到底我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一直都劝她多考虑考虑你的提议。事实上，她心里也一直挂着这件事，想了一遍又一遍。”

“但只有你一起走，我才会走。”拉拉插道。

“跟你一样，我是真的不想分开，但我们或许得先把私人感情放到一边，必须做出牺牲。因为，

我是肯定不会走的。”

“可你还什么都没听呢，你不知道……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跟你说……明天早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显然觉得我带来的消息很震撼。我就不卖关子了，是这样，远东政府的官方火车已经抵达了尤里安提城。火车是从莫斯科开过来的，明天将开往东边。那是交通部的专列，一半的车厢都是卧铺。

“我肯定要随这辆火车一块儿走。并且，我已经让助手用我的名义订了几个位置，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卧铺走。要是错过这一次，以后再想有这样的机会就难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决定了就不会反悔，而你现在已经打定主意不跟我们走。但即便是这样，难道你就不能看在拉丽

莎·菲奥德罗夫纳的份儿上，再好好考虑一下吗？你刚才也听见了，她说你不走，她也不会走。所以，请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哪怕不去海参崴，至少也先离开尤里安提再说——以后的事我们以后再说。只是现在真的时间紧迫，我们得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我带了一个车夫过来——我自己不会驾车——而我的雪橇又坐不下五个人。不过我知道萨姆德威亚托夫的马在你这里，你刚不是说牵着马去拉木材了吗？就是说马还没解套？”

“不，我已经解下它的马具了。”

“那就请你用最快的速度把马套好。我的车夫可以帮你……不过转念一想，又何必这么麻烦呢？我们挤一下，应该也能坐同一驾雪橇过去的。只是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哦，上帝啊。你只需要打包旅途中最需要用的东西——抓到什么就拿什么吧。

现在已经没时间打包东西了，毕竟这关乎一个孩子的生命。”

“我真是不懂你，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你这么说，好像我已经答应你了似的。你走吧，祝你好运，要是拉拉愿意也可以一块儿走。你们不需要担心家里，我会把房子打扫干净，并在你走后锁好门窗。”

“你在说什么呀，尤拉？你干吗说这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要是拉拉愿意’，呵，这是什么话呀！你明明知道你不走我就不会走，我不可能抛下你自己做决定。所以，你何必说锁门窗这种话呢？”

“所以，你真这么固执？”科马洛夫斯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当然，得要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同意。”

“没问题。我们去厨房谈。你不介意吧，亲爱的？”

12

“斯特尼科夫被抓了，并且被判了死刑，枪毙。”

“这太可怕了！你确定吗？”

“别人告诉我的消息，并且我敢肯定这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不然她会疯掉的。”

“我当然不会告诉她。这也是我说要单独跟你说的原因。现在斯特尼科夫已经被抓住了，那她和她的女儿也是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你一定要帮我救救她们。你真确定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很确定。”

“可要是你不走的话，拉拉也不会走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样吧，那你帮我一个忙。你就假装你有可能改变心意，假装被我说服同意离开，不然她肯定不会愿意离开你——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尤里安提火车站。我们一定得让她相信你会一起走，哪怕不是现在，以后也会——到时候我再安排其他的机会。你得假装你愿意这么做，行吗？你只需要让拉拉相信这个，就请你撒一次谎吧。不过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你白白帮我这一次——我以我的尊严向你发誓，我一定会让你离开远东，并安排你去往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过现在至少得让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相信你愿意离开。你只需要让她相信这个。比如，你假装要去准备雪橇，然后催促我们赶紧动身。为了节约时间，不要再等你——就说你一准备好就会赶上来。”

“斯特尼科夫的消息太让我震惊了，我没办法

保持理智。刚才你说的话我都没太听明白。不过你说得对，既然他们已经打算解决斯特尼科夫，那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和凯特恩卡的生命也是危在旦夕。我跟她迟早都会被抓起来，到时候也得分开。现在由你来把她们带走，走得远远的，也总比那样子分开好。不过这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完全在你的计划之中。也许有一天我会彻底崩溃，我会咽下所有自尊，爬到你脚边请求你让我见拉拉，求你给我一条生路，求你给我的家人安排水路逃走，并接受你对我的一切安排。可现在你得给我一点时间考虑。斯特尼科夫的消息让我混乱不已。我很难过，很沮丧，都不能正常地思考。也许把我交到你的手中，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我的余生将不得安宁。可我现在已经晕了，我没办法思考，目前能做的就是盲目地同意你的要求，无奈地遵照你的意思……好吧，看在拉拉的份儿上，我现在就去告诉她我会把雪橇准备好，然后再追你们，当然实际上

我会故意落在后面……对了，还有一件事情——现在天这么黑，你们怎么走？路上崎岖难行，还得穿过森林，并且这附近有狼。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带了枪和子弹。另外，我还带了酒驱寒。你想喝点吗？我带的还挺多的。”

13

“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把她放弃了，我把她放走了。不，我得追上他们。拉拉！拉拉！

“可是他们听不见我的呼喊。狂风在呼啸，他们可能也在说着话。她有道理感到高兴和放松。她肯定不知道我是骗她的。

“拉拉应该在想——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真是太好了，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她那可笑的固执的尤诺奇卡最后终于妥协了，感谢上苍，我们将去往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那儿的人比我们更理智，那是一个讲求法律和民主的地方。哪怕他明天没上火车，科马洛夫斯基也会安排他坐一辆火车过来，要不了多久我们也可以团聚。他现在当然是在马厩，兴奋而匆忙地套马，然后全速追赶我们，争取能在我们进入森林之前赶上。

“她一定是这么想的。可我们都没能好好地告别，我只是冲她挥了一下手，然后就转过了身，用力把那伤痛咽下去，就跟咽下一块卡住喉咙的苹果一样。”

尤里·安德雷维奇站在走廊上，大衣披在肩头。他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屋顶下面的木柱，好似要在那上面上吊似的，眼睛定定地望向远方。尤里·安德雷维奇望着远处的一段上坡路，路的周围稀松种着几棵桦树。落日的余晖洒满大地，尤里·安德雷维奇知道拉拉他们坐的雪橇一定会从那儿经过。

“再见了，再见……”尤里·安德雷维奇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在那个寒冷的午后，他的声音几乎要被淹没，“再见了，我唯一的爱，我永远失去的爱人。”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看

到那雪橇箭一般地穿过水沟，经过一棵又一棵的桦树，然后减速。哦，他们在最后一棵桦树前停下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心里一阵狂喜，双膝打战。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晕倒，整个身体跟一块布一样柔软，好似那从肩头滑落的大衣。

“哦，上帝，难道你要把她还给我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天还没黑，他们为什么会停下？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不动？哦，不，结束了。雪橇又往前了，他们继续赶路。一定是拉拉想停下，最后看一眼他们的房子。也许是她想看看我有没有离开房子？有没有追赶他们？他们走了。”

要是运气好，要是他们经过山谷另一边的田野时——前两天晚上狼群站立的那片田野——太阳还没下山——天黑他就看不见他们了，他就能最后看

一眼拉拉了。

这个时刻终于来了。深红色的太阳仍像球一般挂在蓝色的地平线上，在平原大地上洒下菠萝色的光芒，而这光芒又被白雪贪婪地吸入。拉拉坐的雪橇突然出现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视线中，又快速消失不见。

“再见了，拉拉，我们来生再见。再见了，我的爱，我永远的爱。我不会再见你，永远永远都不再见你。”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铜红色的余晖迅速扫过大地，然后消失不见。远处淡紫色的薄暮天空也转成了深紫色，雾气让路旁的桦树变得模糊，也让紫色的天空忽的一下变成了粉红色。

尤里·安德雷维奇满心悲伤，心思也比平常敏感

一百倍。他觉得就连周边的空气也变得与众不同，世间独有；冬日的黄昏仿佛也因为同情而更多了一些生气，就像一个友好的见证人。好似此前从没有过这样的黄昏，而夜晚也是第一次降临，以安慰他的孤独和悲伤；好似包围那山谷的不再是地平线上绵延的山峰，而是一棵一棵有生命的树，它们拔地而起就是为了安慰他的悲伤。

尤里·安德雷维奇几乎要跟那一时刻所有的美丽事物挥手作别，如同跟一群朋友告别。在最后的暮色中，他喃喃地说着：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会没事的。”

此时，尤里·安德雷维奇仍站在走廊上，他转过身面对一条关着的门，背对全世界。

“我的太阳下山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在心里

反复地默念着，好似要把这些话深深地埋进记忆中。他已经没有力气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

尤里·安德雷维奇走进屋子。他的脑海里有两个声音，两段独白；一段是假装若无其事的干巴巴的话语；一段是感情汹涌的说给拉拉的话。

“现在，我可以回莫斯科了。”尤里·安德雷维奇想，“首先得想办法活下去。我不能强迫自己睡着，相反我要整晚工作，直到我累得倒下。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马上把卧室里的炉子生起来，今晚我不能让自己冻僵。”

与此同时，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内心还有一个声音——我要再跟你待一会儿，你是我无法忘却的快乐，我的手、我的脸、我的嘴唇忘不了你。我要把我的悲伤写下来，永远铭记。我会用满怀的柔情和悲伤来还原对你的记忆。我会留在这儿，直到把这

件事做完，然后我再离开。我将回忆你的一颦一笑，并将它们化作文字记录下来，就像经过暴风雨的大海会记录那曾经汹涌的波浪一样。浪潮卷起海草、贝壳、卵石和那最轻或最重的东西，然后沿着一条蜿蜒曲线把它们全摔在沙滩上。而那条曲线会不断向着远方延伸，延伸到最远的地方也就是浪潮最高的地方。是生活的浪潮把你带到了我的海岸上，哦，你是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来刻画你。”

尤里·安德雷维奇走进屋子，锁好门，然后脱下身上的外套。当尤里·安德雷维奇走进干净的卧室，想起拉拉早上那么匆忙地打包东西然后又把东西拿出来；当他看到那凌乱的床铺，东西掉得椅子上地板上都是时，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跪到地上，胸部紧抵着床沿，头埋进被单里，放声大哭。但没过多久，尤里·安德雷维奇就站起身，匆忙抹干脸上的眼泪，疲倦而心不在焉地打量周围。然后，他把科马

洛夫斯基留下的伏特加酒瓶打开，往杯子里倒了半杯酒，又往里面加了一些水和雪，然后大口大口地把这杯混着无助眼泪的酒喝了下去。

14

尤里·安德雷维奇莫名地心里不安，他渐渐地失去了理智。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奇怪的感觉。自从拉拉离开之后，尤里·安德雷维奇不再打理房子，也不料理自己，浑浑噩噩，不可终日。

尤里·安德雷维奇喝伏特加酒，写跟拉拉相关的事情——但他画掉的越多，笔下的拉拉就跟原型离得越远，跟那个带着女儿凯特恩卡长途跋涉的母亲拉拉渐行渐远。

他之所以要不断修改并且重写，是为了寻找最有力最准确的表达。但诗歌自有其内在的韵律和规则，所以尤里·安德雷维奇不能很自由地把自己的过往经历添加进去，以免冒犯或伤害到那些直接参与其中的人。结果，激情和温暖的感觉逐渐从他的诗里消失了，浪漫的病症被放大到一种更为广大也更

宁静的意象，个体被拔高到宇宙的高度。尤里·安德雷维奇并非刻意追求这种结果，但这种自发形成的广大意象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抚慰，这就像是拉拉在旅途中给他发来的信息，像是拉拉在远方对他的问候，像是拉拉出现在他的梦里并用手轻触他的额头，而尤里·安德雷维奇喜欢这种感觉。

与此同时，尤里·安德雷维奇也在为拉拉写挽歌。而这些年来，他其实断断续续写了很多有关自然、人和其他事物的文字，于是他把这些整理出来，想给它一个结尾。每当尤里·安德雷维奇开始写作，他就会有很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想法和感言。

尤里·安德雷维奇通过与植物王国类比的方式来思考历史，思考历史道路。冬天，大雪之下，林子里光秃秃的枝干显得十分凋零荒败，就像老人稀疏

的头发。不过再过一些时日，春天会让整个森林换一个模样。之前枯败的树枝会冲上云霄，叶子多得完全能把一个人掩住。这种转变发生的速度比任何动物都来得快，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么快，不过我们也还不能直接观察到植物的生长运动。森林没有变换位置，我们不能骗人说，这种变化就代表了它的运动。无论何时看过去，森林都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们看待永恒变化的历史，看待悄然转变的社会生活也是这个样子。

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子想的，只是他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否认历史是被拿破仑或其他任何统治者或是将军推动的，不过他也没有就自己的想法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单个的人无法创造历史。历史是看不见的，就像一个人永远看不见草的生长一样。战争和革命，国王和罗伯斯庇尔是历史的有机物，相当于发酵母的作用，但革命通常是

由一些思想坚定的狂热者发动，他们拥有认清并限制自己的天赋。这些人可以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推翻旧有的秩序，而因此造成的动乱可能持续几周或几年，但百十年来这种引发暴动的狂热精神一直备受推崇。

尤里·安德雷维奇为拉拉感到哀痛，同时也为梅流赛艾沃的那个夏天哀悼，那时候的革命好似从天而降。那个夏天，所有人似乎都变得疯狂；那个夏天，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表示对上级政策的支持而用生命去注解某一种理论。

尤里·安德雷维奇把这些想法记在了纸上，还写了一篇文章来验证他固有的观点——艺术永远服务于美，美丽是一种形式，而形式是通往有机生活的钥匙。没有人能在失去美的情况下生活，所以包括

悲剧在内的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用来表达存在的喜悦的。而这些想法和文字也给尤里·安德雷维奇自己带来了喜悦，一种悲情的喜悦，一种让他泪流满面，让他筋疲力尽，让他头痛不已的喜悦。

萨姆德威亚托夫来看尤里·安德雷维奇。他给尤里带来了更多的伏特加酒，并把安提波娃和她的女儿如何跟着科马洛夫斯基离开的事悉数告诉了他。萨姆德威亚托夫是坐铁路上的那种小推车过来的。他责怪尤里·安德雷维奇没能好好照顾马，所以把马要了回去。尤里·安德雷维奇希望还能把马借给他用三四天，但萨姆德威亚托夫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过答应一周之内会再来一趟，把他带离瓦利吉诺。

有时候，沉醉在创作中的尤里·安德雷维奇会突然想起拉拉，好似她就在他面前，并跟他温柔地说话，叙述离开他之后内心的悲痛。这就好像是回到

了童年，当年母亲过世的时候，尤里·安德雷维奇也觉得自己在鸟鸣声中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所以现在他对听到拉拉的声音并不意外，并且期待这能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尤里·安德雷维奇仿佛听见拉拉就在隔壁房间里喊：“尤诺奇卡！”

那个时候，尤里·安德雷维奇还出现了其他的幻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条恶龙把巢建在了他的房子下面，惊出一身冷汗。尤里·安德雷维奇睁开眼睛，只见山沟那边射出一道光，然后他就听见了火枪射击的声音。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尤里·安德雷维奇竟然又睡下了，并且第二天早上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15

过了一两天，日瓦戈医生终于说服自己一定要保持理智，哪怕是不想活了也可以找一种更迅速，更少痛苦的方式。尤里·安德雷维奇答应自己，等萨姆德威亚托夫一来接他，他就跟着离开。

黄昏时分，天微微还有些亮光，尤里·安德雷维奇听到雪地上有脚步声。有人迈着坚定的步伐不疾不徐地往他这边靠近。

奇怪了！这会是谁呢？萨姆德威亚托夫有马，他不可能走路过来呀，而瓦利吉诺已然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肯定是为我而来。”尤里·安德雷维奇心想，“可能是上头有了命令，要我回尤里安提城去。或者他是来逮捕我的。不，要是那样子的话，应该至少有两个人，并且他们也需要交通工具把我带回去。是米库力特辛。”尤里·安德雷维奇高

兴地想，他觉得自己认出了脚步声。陌生人摸索着坏掉的门闩，好像他知道上面之前挂着的是挂锁，然后大摇大摆地推开门，并把门在身后关上。

尤里·安德雷维奇背对门而坐。等他站起身转过脸，却发现陌生人已经进了门，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你想找谁？”日瓦戈医生脱口而出。对方没有回答，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陌生人有一张坚毅的英俊脸庞，穿一件皮夹克和皮毛裤子，脚上套着一双羊皮靴，肩上还横挎一把来复枪。

不过，最让日瓦戈医生惊讶的不是陌生人的到来，而是他那淡然自若的神情。显然先前他在屋子里找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留下的，也就是说这个人

曾在这个屋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另外，尤里·安德雷维奇觉得面前的这个人有些熟悉，好像之前在哪儿见过似的。而陌生人呢见到尤里·安德雷维奇，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惊讶。也许他已经知道这个屋子里有人住，甚至知道是谁住在里头。也许，他认出了日瓦戈医生。

“他是谁？他究竟是谁？”日瓦戈医生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天啊，我在哪儿见过他？似乎是五月的一个炎热早晨，不过谁还记得是哪一年呢？哦，我想起来了。拉兹维列车站。指挥员的车厢……意志坚定……正直，绝对的正直……哦，斯特尼科夫！”

16

两个人谈了好几个小时。尤里·安德雷维奇和斯特尼科夫热烈地交谈，尤其是彼此讲述在那些惶恐的日子里的绝望和疯狂。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下来。

除了那些日子经历过共同的紧张和不安之外，斯特尼科夫这么不停地说话还有一个私人原因。

斯特尼科夫不停地说呀说，尽一切可能把谈话继续下去，其实是为了不让自己孤独。也许他害怕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许是悲伤的记忆萦绕心头，也许是受自我否定的情绪的折磨，以至于他变得讨厌自己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因为他做了某个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决定，所以想通过跟日瓦戈医生谈话来推迟对那个决定的执行。

不管是什么原因，显然斯特尼科夫心里藏着一个重要的秘密，而那秘密成为了他沉重的负担，所以不管谈什么话题他都表现得热情洋溢，以此掩饰内心的焦虑。

这是革命时代特有的疯狂，每一个人都是表里不一，每一个人说的话和做的事都不尽相同。没有人敢说自己没做过亏心事。每一个人都内心有愧，都隐隐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一个未接受审判的罪人。所以只需一点点引导，人便会陷入自我折磨的深渊。人们沉迷在自己的臆想中，错误地控诉自己，这不仅是出于恐惧，同时也是出于一种破坏的冲动，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们沉迷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恍惚中，一种自我审判的激情中。

作为一个经常到访军事法庭的重要军队领导人，斯特尼科夫肯定听过或者看过各种各样的认罪

和审判。现在他有一种要撕下面具的冲动，他想要重新评估自己的生命，而在这种狂热的激情中，他自然会用扭曲的眼光看待一切。

斯特尼科夫的话说得很不连贯，一下子是说这件事，一下子又跳到了另一件事上。

“这一切都发生在赤塔市（苏联城市）附近……你有没有看到抽屉里和橱柜里带有异域风情的东西？所有那些都是苏联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区的时候，我们征用过来的。当然，那些东西不是我一个人带过来的。我身边一直都有可信的，忠诚的人跟着我，在这方面，上天可谓对我不薄。那些蜡烛、火柴、咖啡、茶、纸笔等，都是从军队的库房里拿出来的，有些是捷克生产的，有些是英国的，还有一部分产自日本。很零碎的东西，对吗？……‘你怎么看？’这是我妻子最喜欢说的话，我

想你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没决定是否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不过现在我还是对你坦白吧——我是来看她和我的女儿的。我听到消息说她们在这儿，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等我赶到这儿的时候，她们已经走了。我听到流言说你跟她关系密切，还听人提到了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号。这些年来我见过的人起码有几千个，但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想起我曾经还审讯过你。”

“所以，你后悔当初没有把我枪毙？”

斯特尼科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到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话。他沉浸在自己思绪里，继续自己的独白。

“自然，你们的事情让我嫉妒——我现在还是嫉妒。不然，你还想我怎么样呢？我是几个月前到这儿的，因为我在远东地区的藏身处被发现了。他

们想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并对我进行审判。如果被他们抓到，审判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可我没有犯罪。我想以后等时局好了，或许我还有一线希望能为自己辩护，挽回我的名誉。所以我决定在他们抓到我之前先消失一段时间，暂时躲起来，过隐士的生活，并且不断变换地方。也许没有那个骗得我信任和秘密的年轻骗子，我已经成功了。

“当时我正横穿西伯利亚往西边走，徒步前行，这样能避过很多人的耳目，但也让我饱受饥饿之苦。我要么是在雪地里睡觉，要么是在火车上——当时铁路线上有许多被雪掩埋的火车。

“后来，我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一个流浪汉。他说自己刚从游击队的枪口下逃出来——游击队员把他和其他一些判定有罪的人排成一排，然后用枪扫射。幸运的是，他只是受了一点伤，于是偷偷地

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并在森林里躲了好久直到伤口恢复。他说跟我一样，也是东躲西藏。反正，他的故事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不良不莠的人，有邪恶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他说自己曾因为脑袋不聪明，被学校开除了。”

除此之外，斯特尼科夫还在描述中增加了许多细节。日瓦戈医生也愈加地确定他知道斯特尼科夫口中的年轻人是谁。

“他是不是叫泰廖什卡·加卢新？”

“没错。”

“那他说的游击队和墙壁的事情就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话。”

“那个年轻人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对母亲孝顺。他的父亲被当作人质枪毙了，母亲也进了监

狱，很可能也会被枪毙。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便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把母亲救出来。他去了当地的契卡，并主动提出愿意为他们效力。契卡的人同意给他一次机会，条件就是要他说出重要的秘密。于是，他就把我的藏身处供出来了。幸好我逃得及时，才没被抓住。

“我历尽千辛万苦，才终于穿过西伯利亚平原，到了这个地方。这儿的人都认识我，不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我敢回到这里。事实上，他们把赤塔市找了个遍，却不知道我就躲在这荒山老林间的屋子里。不过现在这个消息又泄露了，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看，天又黑了，我不喜欢天黑，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办法睡觉了。你知道这有多折磨人吗？要是我还剩下一点蜡烛就好了——抽屉里的蜡烛好吧，上面可是涂了动物脂油的。我们继续聊。你能聊多久我们就聊

多久，聊一整晚都行。就让我们奢侈一回，亮上一整晚的蜡烛。”

“蜡烛都在那儿。我只开了其中的一盒。我一直都是用煤油灯的，那可能也是你留下来的吧。”

“有面包吃吗？”

“没有。”

“那你都是靠什么维生？哦，这可真是个愚蠢的问题！你当然是吃土豆了。”

“没错。我吃的是土豆。以前住在这儿的人很会料理家务，他们知道如何储存土豆，所以现在地窖里还有不少完好的土豆呢，没有一个烂的。”这时，斯特尼科夫突然把话题转到了革命上。

17

“也许革命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无法明白，因为你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要知道，除了你生活的世界外，还有一个由低矮平房、铁路、贫民窟和租住屋组成的世界。那儿只有肮脏、饥饿、拥挤、低人一等的工人，堕落的女人。而你所在的世界，则是由和蔼可亲的母亲，聪明的学生，富商的儿子组成的，是一个没有惩罚，厚颜无耻，邪恶的世界。面对穷人，面对那些被抢劫被欺负被引诱的人的眼泪，富人们只是大笑或者耸耸肩，那些可耻的寄生虫，他们从来不愿意辛苦做任何事，从不会给予这个世界任何一点东西，当然也没有东西留下。

“可对我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战役。我们可以为自己爱的人移山倒海，哪怕我们带给爱人的只有悲伤，他们也不会拿起爱的武器对付我们，因为

到最后我们受的苦比他们还多。

“不过在我讲这些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得离开瓦利吉诺，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那些人正向我逼近，而你要是还留在这儿，无疑会受到我的牵连。就凭你现在跟我说话这一条，他们就能治你一个通敌的罪名。除此之外，这附近还有很多野狼。前几天的晚上，我还被逼着开枪打死了一只狼，这才得以安全脱身。”

“所以那天晚上是你开枪。”

“是的，当然是我，你应该听见了。当时我正往另一个藏身处赶路，不过还没等我到那儿，就有诸多迹象表明那个地方已经被发现了。其他留在那儿的人很可能也被枪杀了，在这儿我也不能停留太久。我就待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就走……好，那我

就继续往下说了。

“当然，这种戴着花哨帽子开车追女孩子玩的寄生虫，也不仅仅是莫斯科或俄国才有。寻欢作乐的人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遍及世界的每一个城市。但十九世纪何以能保持和平，为什么那一段历史时期跟现在不一样？那是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年代。革命，年轻人甘心死在炮火之下，作家们绞尽脑汁要把富人们贪婪的嘴脸写出来，试图保住穷人们最后的尊严。马克思主义诞生了，它揭露了一切邪恶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成为了十九世纪最强大的力量。而那个时代的大街也是那样子，连同肮脏和英雄主义，连同邪恶和贫民窟，宣言和炮火。

“你不知道小时候的拉拉多么可爱，学生时代的她。你肯定不知道。她有一个同学就住在我们隔

壁的房子里，那里大多数的住户都是在布雷斯特铁路线上工作的铁路工人。不过现在布雷斯特铁路线已经改了好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在也是尤里安提革命法庭的成员——那个时候是一名铁路巡查员。我曾到那栋房子里去，经常见到她。那时候的她还是个孩子，可你还是能在她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到警惕和戒备，看到不安。那个时代的主题——所有的眼泪、凌辱和希望，所有积累的愤怒和自尊都体现在她的脸上，带着女孩儿的娇羞和自信的优雅。拉拉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很了不起，对吗？一切都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的。上天赋予了拉拉别人没有的天赋，那是她与生俱来的东西。”

“你说得真好。我也见过那个时候的拉拉，跟你说的丝毫不差。那个时候的她是一名女学生，也是一出真实戏剧的秘密女主角。她投射在墙上的影子是那么地无助，那么地戒备。我见到她的时候就

是那样，我记得的。总之，你说得很对。”

“你曾见过她，并且记得她？你当时在做什么？”

“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好吧。所以你看，十九世纪不仅爆发了巴黎革命，从赫尔岑开始一代代俄国人也开始流亡斗争。在推翻沙皇政府的事情上，有些人只是参与策划，有些人负责实施。世界的工人运动、议会和欧洲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全新的所向披靡的，让人觉得讽刺的制度及其留下的遗憾，全都有了结果——这也是列宁曾经说过的，而列宁的出现就是为了纠正一切的错误行为。

“随着列宁的出现，世界开始看到一个燃烧的俄国，发出了救赎人类悲伤和不幸的火光。不过，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这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因为拉拉，我努力学习，并成为了一名教师，后来跟她一起来了尤里安提城——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做这一切是为了她。为了拉拉，我啃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样如果她需要我的帮忙我就有能力帮她解决问题。结婚三年之后，为了赢回她的心，我决定参加战争。可就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不幸被俘虏了。当时大家都以为我死了，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以假的身份参加了革命。我要弥补拉拉曾受过的痛苦，我要让她忘记那些悲伤的记忆，让她无法再回到过去。而那期间，她和我的女儿就住在我的隔壁，她们就生活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我要多努力才能忍住奔向她们的冲动吗？那时候我想，还是等完成人生使命之后再见她们吧。可现在想想，那可真是傻透了。现在

只要能让我再见她们一面，要我付出什么我都愿意！只有有她在，我的世界才能有亮光。”

“我知道你很爱她。不过，你知不知道她对你的爱有多深呢？”

“不好意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你知道她有多爱你吗？她比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你，这些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她说的？对你说的？”

“没错。”

“不好意思，我知道这样问很冒犯，但你能不

能告诉我拉拉究竟都跟你说了些什么话？”

“可以。她说你身上有最优秀的品质，是她遇见过的最好的人，说你与众不同，天赋异禀。拉拉还说，要是能让她回到曾跟你一起住过的房子，哪怕要她爬着回去她也愿意。”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涉及了你的隐私也请不要见怪。你还记得她当时是在什么情境下说这些话的吗？”

“当时她正在收拾屋子，然后走到外面甩动地毯。” “哪条地毯？这儿有两条。”

“那一条，大的那条。”

“那对她来说太重了。你有给她搭把手吗？”

“当然。”

“你们两个人一人拉着一端，她尽量举高手臂，把地毯上的灰尘甩落。飘扬的灰尘让她不得不眯着眼睛，然后大笑？是不是这样子？哦，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接着，你们走向彼此，把地毯合拢接着再加叠一次，然后她跟你开玩笑做鬼脸，是吗？我说得对吗？”

两个人站了一会儿，朝不同的两个窗子走过去，望向不同的方向。过了一会儿，斯特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雷维奇身边，抓住他的手按向自己胸前，状似焦虑地说：

“不好意思，我知道我刚触碰了你藏在心底最深最神圣的话题。不过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愿意听的话。请你不要走开。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反正，我很快也得走了。想想吧——六年的分离，六年压抑的感情，你能想象吗？

可以前我总是想，我还未赢得全部的自由，等我赢得了自由，我就能回到我的家人身边去。可现在，我发现到头来我的付出和牺牲不过是一场空。他们明天就要把我抓走了。而你跟拉拉那么亲密。也许有一天你还能再见到她……我想说什么来着！我真是疯了。他们会把我抓走，不听我一句辩解。他们会冲我大吼大叫，冲我叫骂。哦，这一套我清楚得很！”

18

终于，尤里·安德雷维奇睡了一个好觉。这么多天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睡着。斯特尼科夫那天也在屋子里过夜，日瓦戈医生安排他在另一个房间休息。期间，日瓦戈医生醒了几次，或者翻个身或者是把被子拉高一点，然后再次沉入梦乡。到破晓时分，日瓦戈医生做了好几个万花筒似的梦，那些梦很短，但是内容详细且符合逻辑，以至于他都要以为那就是真的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梦见母亲画的那幅意大利里维埃拉的画忽然从墙上掉了下来，而他自己也被玻璃碎裂的声音惊醒了。尤里·安德雷维奇睁开眼睛。“不，不会有事的。”他想，“是安提波夫，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尼科夫，是他想吓跑那些山谷里的野狼。”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确实是那幅画，碎成了好几块掉落在地上。然后，尤里·安德雷维奇

又回到了梦境中。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雷维奇醒了，不过由于睡得太久他觉得头很痛。有那么一阵，他都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总算想起了：“斯特尼科夫在这儿。天已经不早了，我得赶紧穿好衣服。这个时辰他肯定已经起来了。要是还没起的话，我就过去把他叫醒，再煮点咖啡，跟他一块儿喝。”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尤里·安德雷维奇叫道。

没有人回答：“看来他还在睡，睡得可真熟呀，我得说。”然后，尤里·安德雷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到隔壁的房间。斯特尼科夫的皮帽还放在桌子上，但人却不见了：“他一定是出去散步

去了，可是怎么没戴帽子呢？还真是不怕冻。无论怎样，我今天要离开瓦利吉诺。可是我今天睡过头了，天色已经不早，哎，每次都是这样。”

然后，尤里·安德雷维奇走到厨房，拿起一只水桶往水井走去。可还没走几步，就看到斯特尼科夫躺在雪地上，雪花落满他的全身。斯特尼科夫自杀了。靠近斯特尼科夫左太阳穴的地方已是一片鲜红，白色的雪被红色的血染得通红。喷涌而出的血跟不断落下的雪混在一起，成了红色的珠子，远远看过去，就像是红色的花楸浆果。

---

(1) Vladivostok，俄罗斯一座城市，又名符拉迪沃斯托克。

第十五章　结局

1

日瓦戈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衰弱，相关的医学知识和技巧也渐渐生疏了，连同失掉写作的才能。有那么一个短短的时期，他从抑郁和颓丧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只是这种热情不久之后就消失了，他再次陷入了一种对自己和对外界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的状态中。早些年，日瓦戈医生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只是他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现在竟然发展到晚期。

日瓦戈医生于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去了莫斯科，那也是苏联时代最为混乱和歇斯底里的年代。他变得更瘦了，心思也更冷淡了，比从游击队逃到

尤里安提城时更不灵泛。旅途中，他再次把那些还有点用的衣物拿出来跟人交换，用它们换来面包和几块可以遮身的旧毛毯。就这样，日瓦戈医生的第二条皮毛外套没有了，最后抵达莫斯科大街的时候，他头上戴一顶灰色的羊皮帽，裹腿，身上穿一件扣子都掉光了的旧军队外套，就跟罪犯穿的制服似的。凭着这副装扮，尽管莫斯科的火车站和广场上有无数的红军士兵来来去去，但那些人都没能认出他来。

日瓦戈医生并非一个人，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长相英俊身穿旧军服的年轻人——他走到哪儿，年轻人就跟到哪儿。尤里·安德雷维奇去了几个地方的会客厅，那里有着他童年的回忆。而日瓦戈医生和年轻人在这几个地方都受到了欢迎——在对方巧妙地询问他们是否要先去洗个澡之后——当时斑疹伤寒仍在肆虐，并且对方把他的家人离开俄罗斯的情况

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他。

两个人都想尽量避开人群，不善交际的他们不想独自走进人群，担心自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而不得不开口说话。通常，当这两个瘦长的人出现在朋友聚会的场合，他们就会退到角落，沉默地渡过一整晚，不参加任何热烈的谈话。

日瓦戈医生衣衫褴褛，无论走到哪儿身边都跟着那年轻人，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追寻真理的农民，而他的同伴看着就好似一个耐心且盲目追随顺从的信徒。那么，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呢？

2

尤里·安德雷维奇最后一段旅途是坐的火车，不过此前他已经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

沿途经过的村庄看起来并不会比他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看到的村庄好。只不过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还是冬天，而现在已经到了夏末，温暖干燥的秋天眼看就要来临，这一点倒是方便他赶路。

日瓦戈医生经过的一半村庄都荒废了，田地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收割，好似刚经过敌人抢掠似的。而这全都是战争造成的——内战。

九月份的最后两三天，尤里·安德雷维奇走到了一条河边，他得沿河而上，而那是一段十分陡峭的河岸。河流在他的右手边，而他的左手边就是那辽阔的无人收割的土地，直延伸到天际。有时候前面

会突然出现一个森林挡路，里面大多种着橡树、枫树和李子树。林子绕着河流延伸形成很深的山谷，看着十分险峻，并且阻断了去路。

在那没有收割的田野里，成熟的麦粒撒得到处都是。尤里·安德雷维奇用手捧起一捧，想着哪怕不能煮着吃至少也能用这谷子熬点稀粥，于是他把一捧麦粒塞到嘴里，艰难地嚼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麦粒几乎让人无法消化。

日瓦戈医生从没见过颜色这么黑的黑麦，如同旧金子一样。通常，要是麦子及时收割的话，颜色要比这浅一些。

金黄色的麦田好似燃烧了一样，沉默地宣告着它们的沮丧。在辽阔寂静的天空之下，麦田面朝飘动的雪云，静静咀嚼着自己的悲伤。

一切都在缓慢地移动着——流动的河流，蜿蜒的道路，日瓦戈医生循着云的方向往前移动。就连黑麦地也不是静止的，里面好像隐藏着某种爬行的生命，让人不由想起一些可怕的东西。

日瓦戈医生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鼠疫。老鼠多得简直数不清。有时候到了晚上他被迫在空地上睡觉，那些老鼠会爬到他的脸上身上，甚至钻进他的袖子和裤管里。老鼠白天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跑，成群结队，吱吱喳喳，偶尔也会有几只被日瓦戈医生踩成肉泥。

脏兮兮的农家土狗一路跟着日瓦戈医生，那眼神似乎在说它要等到最佳时刻再扑过来，把日瓦戈撕成碎片。那些土狗以腐肉喂食，对老鼠也是丝毫不嫌弃，它们远远地注视着尤里·安德雷维奇，大摇大摆地跟在他的身后，好似在等待什么事情的发

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土狗从来都不进入林子，每当日瓦戈医生靠近树林，狗就会慢慢退后，摇动尾巴，然后消失不见。

那个时候，森林和田野形成强烈的对比。没有了人的看管，田地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小孩子，孤苦伶仃，凄惨不堪；而山峰和峡谷四周的森林却是郁郁葱葱，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让日瓦戈医生高兴的是，有时候他还能在林子里找到坚果，三四个一串，好似绑在了一起。那些坚果看着已经是熟透了的，随时都可能从树上掉下来。尤里·安德雷维奇把坚果踩碎或磕烂，迫不及待地把坚果肉放进嘴里。他把坚果装了满满一口袋，大包里也塞得全都是，那一个星期他每天都是吃的坚果。

在日瓦戈医生看来，田野好似是一个患了病的病人，而森林却是健康茁壮地成长。所以他觉得，

上帝肯定是住在森林里，而在田野回响的定是魔鬼那讽刺的大笑。

3

就在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来到了一个废弃且明显有火烧痕迹的村庄。村庄里所有的房子都排成一排，坐落在跟河相对的另一边。而连接村子和陡峭河岸之间的一段路还没修好。

村子里只剩下几栋房子还未完全被火吞噬，外墙被火烧得焦黑，里面已经是空无一人。其他房子则成了一片废墟，只有黑色的烟囱直指苍穹。

正对着河流的悬崖表面布满了蜂窝状的坑洞，村民们就在那里采石做路基，这也是这个村子的村民谋生的手段。村里的房子是排式分布，排尾的屋子是少数几栋没有倒下的屋子之一，它前面的地上还横放着三块未打磨完的石头。跟其他房子一样，这栋房子也没有人住。

尤里·安德雷维奇走了进去。当时还是下午，但他一进门就感觉从屋子里刮出一阵阴风。地上乱糟糟的全是干草和麦秆，墙上的贴纸在风中摆动，屋子里一片窸窸窣窣的响动。跟在野外一样，这个屋子里也全都是老鼠，吱吱喳喳，四处乱窜。

于是，尤里·安德雷维奇又退了出去。太阳在村庄后面的田野里落下。温暖的金色余晖照在河的对岸，反射在水里形成一道道金光，直达河流的中心。尤里·安德雷维奇穿过大路，在草地上竖着的一块磨石上坐下。

这时，河的对岸露出一个头发乱糟糟却面容英俊的头，然后是肩膀，然后是手臂。有人正从悬崖那边攀上来，他的身上还背着一桶水。那个人看见了日瓦戈医生，便停住了攀爬，只露出上身。

“你要喝点水吗？如果你不伤害我，我也不会

伤害你。”

“谢谢。我确实想喝口水。不过，你先过来吧，别害怕。我为什么要伤害你呢？”

背水的是一个少年，光着双脚，衣衫褴褛，且蓬头垢面。

尽管日瓦戈医生表现得很友好，但少年还是焦虑且怀疑地盯着他。莫名地，少年变得格外激动。最后，他放下水桶，朝日瓦戈医生跑过来，不过半道上又停住了脚步，小声说：

“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同志，不好意思，我能问下以前我们见过吗？是的！是的！我们见过！你是那个医生，对不对？”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了吗？”

“不认识。”

“我们曾坐过同一辆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的火车。他们征我去当劳工，我就跟那些劳工坐一块儿。”

原来是瓦塞·布利金。他一把扑到日瓦戈医生面前，亲吻他的双手，放声痛哭。

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就是瓦塞的家，瓦雷特尼基村。他的母亲已经死了。村子被毁的时候，瓦塞躲在采石场的一个洞里，而他的母亲以为他被抓去城里了，急得发了疯，最后投河而死——就是他们面前的这条河。而瓦塞的妹妹阿伦卡和阿里什卡听说流落到了另一个地方，但除此之外瓦塞就不知道其他的消息了。瓦塞决定跟日瓦戈医生一起到莫斯

科去，途中，他给日瓦戈讲了许多可怕的遭遇。

4

“去年冬天的玉米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我们才刚播完种，麻烦就开始了。那刚好是派拉加大婶离开之后的事。你还记得派拉加大婶吗？”

“不，我不记得有这个人。她是谁？”

“你竟然不认识派拉加？她也是跟我们坐同一辆火车呀！提亚瓜诺娃。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女人，喜欢直勾勾地看人的那个。”

“就是那个总喜欢扎头发然后又放下来的女人？”

“没错！扎一个马尾辫，没错，我说的就是她。”

“哦，那我想起来了。等会儿，我突然想起我

后来在西伯利亚的一座小城还见过她呢，我们在大街上碰到了。”

“你不是说真的吧？你竟然碰到了派拉加大婶？”

“瓦塞，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跟个疯子似的晃我的手？你再这么晃，我的手都会给你晃掉的。还有，你怎么跟个女孩儿似的脸红了？”

“哦，你快告诉我，她怎么样？告诉我。”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挺好的。对了，她还提到了你和其他几个人呢。她当时还跟我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难道是我弄错了？”

“没错，没错，她当然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的母亲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姐妹一样。她性格温和，做事又勤快，一双手相当灵巧。自从她来到我

们这儿，我们家就不知不觉地添了许多东西。可是村子里那些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人却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村子里有一个名叫洛特恩·哈拉姆的男人，他总喜欢当面奉承派拉加。可是哈拉姆又总是造谣诽谤派拉加，那真是个卑鄙的人。所以派拉加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这样哈拉姆就把气撒到了我身上。他造谣说我跟派拉加之间有奸情，话说得十分难听。最后，派拉加实在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闲语，决定离开这儿。而这，也就成了我们麻烦的开始。

“没多久，这附近就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个住在农场里的单身寡妇，平时总喜欢穿男人穿的那种带弹力带的鞋子。她养了一条恶狗，狗的脖子上系了一根长绳子，刚好供它在屋子里活动。女人给那条狗取名格兰。那个寡妇总是形单影只，一个人

里里外外地忙，从来也不要别人帮忙。可是，去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意外，谁也没想到冬天会来得这么早。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女人还没来得及挖坑种土豆。所以她跑到我们这儿来说，‘帮帮我。’她说，‘我会报答你们的，不管是给钱还是给土豆。’

“我说，‘那好吧，我去帮你。’可是当我去到农场的时候，却发现哈拉姆也在那儿，他竟然在我前面接了这份工作，而那个寡妇又没告诉我。算了，我当时也不打算跟他计较，所以就在一块儿干活。那时候的天气特别糟糕——雨雪交加，地上泥泞一片。我们挖啊挖啊，甚至在上面烧火，用烟气把土豆苗熏干。等我们忙完之后，女人大方地招待了我们。然后她让哈拉姆先走，却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多留一会儿或者待会儿再回去。

“于是，我后来又回去了一趟，然后她说：‘我不想把多出来的东西交给国家。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她说，‘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出卖我。你看，我对你毫不隐瞒。我本来打算自己来挖一个大坑，然后把土豆放进去的，没想到却碰上了这种情况。怪我拖得太久了，冬天都来了，而我现在一个人又做不来这事。所以，要是你愿意替我挖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于是，我就挖了一个坑，下面很宽上面很窄的那种，就跟个罐子似的。然后，我们生了一堆火，用烟雾把坑的里面烘干——这一切都是在狂风中完成的。接着，我们再把土豆移进坑里，上面盖着泥土。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当然，这件事我也从未对任何一个人提起，就连我母亲和我的姐妹都没说。

“可是，还没到一个月，农场就被人抢劫了。从布伊斯科伊来的人都说农场的门大开，整个地方都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踪影，格兰也挣脱了绳子，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到了过新年的时候。因为圣巴塞略之夜下了雨，高地上的雪都被雨水冲走了，底下的土便露了出来。这时格兰又回到了农场，并找出了那个埋土豆的地方，开始用两个爪子刨。它刨呀刨，刨呀刨，然后就刨出了那个老寡妇的双脚——脚上还穿着她平时穿的那种束带鞋——真是太恐怖了。

“大家都很为死去的女人难过。也没有人怀疑哈拉姆，这也不能怪他，对吧？这的确很难想到，大家都觉得哈拉姆没有那个胆量。要是哈拉姆杀的人，他肯定会逃得远远的。

“而村子里的富农对于寡妇的遇害相当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又有机会可以煽风点火一把了。‘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对你们的。’他们说，‘他们故意恐吓你们，这样你们就不敢把自己的粮食藏起来，不敢把土豆埋到地下。你们以为是森林里的强盗杀了她吗？可真是傻呀！你们继续照城里那些人说的办吧，到时候他们把你们全部的东西都拿走，让你们统统饿死。要是你们想求一条生路，那就听我们的，我们会教你们怎么办。等他们再来收你们用自己血汗种出来的东西，你们就说，我们今年收的麦子连自己吃都不够，怎么还会有剩的呢？如果他们要找麻烦，你们就把长柄草耙抡起来。任何跟我们村作对的人都得小心了！’接着，村里的老人们就开始召集众人开大会，而这正中哈拉姆的下怀。然后，他就去了城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他说，‘你们能怎么办？一群穷鬼聚在一起开大会，这正是我要的。就让你们等着被砍

头吧。’ 后来，他就去了别的地方，再也没有现身过。

“之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可以责怪。后来，他们就从城里派来了红军，成立了一个法庭。他们开始针对我，这也是哈拉姆搞的鬼——他告诉红军我曾逃过劳工役，私自逃跑，还说我杀了农场里的老女人，还搅得村子里人心惶惶。他们把我锁了起来，幸运的是，我想到其中一块地板是空的，然后从地道逃了出来。之后，我就躲在了采石场的洞里。村子被烧的时候我浑然不觉，我的母亲因为担心我而投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村子里的人把红军士兵安排在一所房子里，并给他们送去了许多的酒，里面的红军士兵一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红军士兵所在的房子突然着火了，火苗很快又蹿到了另一个房子里面，就这样一个一个连着烧。我们村

子里的人从大火一开始烧的时候就从家里逃了出来。而那些从城里过来的士兵——真的，没有人故意纵火，是偶然地失火——无一例外全都葬身火海。没有人要村子里的人逃跑也没有人说不准他们再回到被烧掉的房子，但他们都害怕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富农们散播谣言，说所有佃农都将被枪毙。等我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走了。我一个人都找不到，村子里的人都流浪去了别的地方。”

5

1922年的春天，日瓦戈医生和瓦塞抵达莫斯科。当时，天朗气清，和风暖日。阳光照着大教堂的金色穹顶，在广场上投下跃动的影子，而人行道的每个石缝里都有青青的绿草冒出来。

其时，对于私人公司的限制已经取消了，某些特定领域的贸易管理也逐渐放松。跳蚤市场的交易额大幅增长，而这也让投机倒把和收贿受贿活动越来越猖狂。这些交易没能创造新的财富，也没能让城市的风气扭转，但是却有不少人在这个买进卖出的过程中牟利。

几个现代私人图书馆的老板把书架上的书全都弄了下来，集中到一个地方。他们告知苏联政府，说他们想要搞一个联营书店。政府给他们批了地，甚至还把自革命开始就一直空着的鞋店和花店给了

他们。有了地盘之后，几个老板便把联营书店开了起来，卖了很多的书。

以前时局艰难的时候，教授们的妻子都会偷偷地做一些烤面包出去卖，现在她们已经能在一些单车修理铺或其他被征用或弃置的地方公开地叫卖。这些人接受了革命，也不再使用以前上流社会的那些话语。

尤里·安德雷维奇说：

“瓦塞，你得找点事情做。”

“我想念书。”

“这是当然。”

“还有，我想根据记忆中的印象，给母亲画一幅画。”

“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首先你得学会画画。你试过吗？”

“以前给叔叔当学徒的时候，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会用炭笔画点东西出来。”

“哦，那为什么不可以呢？来，我们试试，看能画成什么样。”

瓦塞并没有太多画画的天分，但他很想要进学校学习工业设计。在朋友的帮助下，尤里·安德雷维奇把瓦塞弄进了以前的斯托格诺夫学院。瓦塞先学了普修课程，之后又专修印刷、装订和书本设计。

日瓦戈医生和瓦塞共同努力。日瓦戈医生就不同的主题写小册子，瓦塞就把小册子装订到一起，并印刷出来，当作他在学院的专业训练。而正是在那段时期，日瓦戈医生的书进入了二手书店。

那些书记录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在哲学、医学、健康和疾病的定义、进化论、个体差异是有机体的生物基础、宗教和历史（跟他舅舅和塞玛的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些方面的看法，除此之外还有诗歌、短篇故事以及关于普加乔夫的简笔画。

日瓦戈医生用的文字通俗易懂，但写的主题却是相当宏大，绝非那种普及常识的书，因为日瓦戈旨在真正地提升人们的判断力。这些书在书店卖得很好。

那个时期，包括写诗和艺术作品翻译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成其为特长或专业。所有学科都开始有理论研究，各种学派层出不穷，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里·安德雷维奇充当了半数伪文学性组织的医学顾问。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里·安德雷维奇和瓦塞都

是彼此陪伴的朋友，两个人也住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老是从这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居无定所，日子相当艰苦。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雷维奇就去了他以前住的地方。但其他人告诉他，他的家人回莫斯科的时候并不是住在那里。尤里·安德雷维奇一家人离开莫斯科之后，尽管房子注册在他们的名下，但还是有其他的租户住了进去，并且没有划定屋子的所属人是谁。以前的邻居对尤里·安德雷维奇也是相当排斥，觉得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

马克尔也不在了。他去了另一个地方，听说是在弗拉尔城当房屋经纪人。房子本是由马克尔处置，但他还是更喜欢以前老门房住的房子，因为那房子是泥土地板，他觉得住着舒服。楼房里的水管和阀门很容易在寒冷的天气中爆开，但门房的房子

却总能保持温暖干燥，并且水也不会结冰。

好景不长，尤里·安德雷维奇和瓦塞的友谊生出了间隙。瓦塞已经成熟了许多，无论是想法还是言行举止，都跟那个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乡下男孩儿判若两人。他对革命的必然性和真理的自我辩证越来越感兴趣，而日瓦戈医生含蓄晦涩的语言在他看来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他觉得这是避重就轻的体现。

日瓦戈医生去找了好几个政府部门。他希望政府能给他的家人政治赦免，允许他们重新回到俄罗斯。与此同时，他也忙着为自己申请外国护照，以及办理允许他把家人从巴黎带回来。

使瓦塞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件事日瓦戈医生都办得毫不起劲。尤里·安德雷维奇过于匆忙并且过早地认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过于自信而且几乎

是毫不介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会有结果的。

瓦塞越来越多地挑尤里·安德雷维奇的错误，尽管尤里·安德雷维奇对于他的批评并不以为意，但他们的友谊还是渐渐地淡了。最后，两人终于友谊破裂，分道扬镳。日瓦戈医生离开了他们一起住的房子，搬去了弗拉尔城，因为马克尔在那儿还有一点势力，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地方住。那个地方由一个没人打理的浴室，一个带窗户的房间，废弃的厨房和后门组成。尤里·安德雷维奇搬进去之后，开始放弃行医，也不再料理自己，不再跟朋友见面，日子过得贫困潦倒。

6

那是冬季一个灰色的星期天。尽管上头明令禁止，但家家户户的房顶和窗户还是往外冒着细长的黑烟，用这代替了铁炉子的烟草。城市里的生活秩序还未回复。弗拉尔城的居民没有办法洗澡，身上都生出了疖子，很多人还得了感冒。

每个星期天，马克尔和他的家人都会留在家里。

他们围坐在一张很大的餐桌前，享受晚餐。而就在几天前分配面包的时候，这张餐桌上还摆满了住户们的面包券。他们把住户的面包券剪开，用夹子夹住，然后点数，分类，再按照等级和类别用纸包住或捆成捆，黎明时分送往面包店。到了早上，同一张桌子上就会堆满或大或小的面包，并按照每户人家的配额进行发放。当然，到了现在，那个定

额分配食物的年代已经成了记忆，食物定额分配已经由其他的控制形式取代。现在，马克尔一家人正津津有味地享受他们的中餐，大快朵颐。

宽大的俄国炉子几乎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它放在房间的中间，顶上盖着一床被褥，四个角耷拉下来。

进门处有个插口，那一处的水管没有结冰。房间两边摆满了长凳，长凳下面放的是马克尔一家人的行李箱子。左边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餐具架。

屋子里相当热，炉子已经烧得通红。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娅站在炉子前面，袖子已经卷到了手肘上面，她正用一把钳子夹着茶壶放到炉子上，并根据需要调整炉子间的距离。阿加菲娅那汗涔涔的脸一下子被炉子的火光照得通红，一下子又被蒸气熏

得雾气迷朦。阿加菲娅把茶壶推到一边，然后把身后的馅儿饼放上铁板，烤了一会儿再翻个个儿，换一面再烤。这时，尤里·安德雷维奇提着两个水桶走了进来。

“好胃口呀。”

“你随意，别客气。过来坐，跟我们一块儿吃点。”

“谢谢，我已经吃过了。”

“你吃的那些东西哪能算作晚餐啊。干吗不跟我们一块儿坐下，吃点热乎的呢？你可别看不上——这可都是好东西，烤土豆，馅儿饼配麦糊。”

“不了，谢谢，真的不用了……不好意思，我没关门，让冷空气跑进来了。我想多储点儿水，浴缸已经清理干净了，现在我正往浴缸里倒水。可能

我来来回回得走好多次，还请你们多担待，我会尽量快一点儿的。这样打扰你们真是不好意思，可是除了这儿我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打水了。”

“你随意。如果你问我们要止咳糖浆，那我们没有；可要是水的话，那就多的是。你要多少就打多少回去，我们不会收你一分钱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尤里·安德雷维奇走第三次的时候，马克尔的语气就有点变化了。

“我的几个女婿一直在问你是谁。我跟他们讲了，可他们就是不相信。你继续打水，别管我。只要别洒到地上就行了，你个笨手笨脚的！你看，门口被你洒得都是水。待会儿要是冻住了，你也不会拿撬棍来帮我们清理。门要关好，你个白痴，有风

进来。是的，我跟他们说你是谁，可他们不相信。你曾花了那么多钱！你学了那么多知识，可现在又怎么样呢？”

当尤里·安德雷维奇走第五第六次的时候，马克尔已经开始皱眉头了。

“只准再打一次，不能再多了。老伙计，任何事都得有个限度。要不是我们的小玛丽娜总是替你说话，不管你出身多么高贵，我都把门锁上了。你还记得我们的玛丽娜吗？她在那儿，坐在桌子最末的那个黑皮肤姑娘。哟，她都脸红了。‘别伤害他，父亲。’她总是这么跟我说。好像谁想故意伤害你似的。玛丽娜现在是中央邮政局的一名发报员——她懂外语。‘他已经很不幸了。’玛丽娜说。哦，她为你难过，她愿意为你赴汤蹈火。说得跟你变成这样是我害的似的！你真不应该跑去西伯利

亚，在那样糟糕的时期扔下自己的房子不管。那是你自己的错。看看我们——我们都是熬过了饥荒和白军的炮火的人，我们毫不退缩——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安然无恙地坐在这儿。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如果你能好好地照顾冬妮娅，她现在也不至于要流落国外。算了，这是你的事，我管不着。只是我很想知道，你要这些水干什么？建溜冰场吗？带着你和你的水赶紧走！我真是懒得跟你生气，你这个落水狗！”

在场的人再次哄笑起来。不过，玛丽娜看起来却很愤怒。她怒不可遏，出言讥讽其他人。玛丽娜的声音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感到震惊，尽管他自己也说不上是为什么。

“屋子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清洗打扫，马克尔。我得擦地板，还得洗很多的东西。”

这让马克尔的家里人感到惊讶。

“你说出这样的话就已经是很让人惊讶了，还想一个人去做？看来，接下来你是准备像中国人迎接新年那样洗东西了。”

“我让我的女儿过去帮你。”阿加菲娅说，“她可以帮你清洗，帮你擦地，帮你修理东西，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别怕他，亲爱的。你看他多么成熟了呀，连一只飞虫都舍不得伤害。”

“阿加菲娅·提科哈诺夫娜，你这话说得。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让玛丽娜帮我做这些杂活。为什么要让她为我弄脏双手呢？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

“你可以弄脏双手，我就不行，是吗？”这时，玛丽娜插道，“尤里·安德雷维奇，你怎么这么固执呢？难道我去看你，你真要把我赶出去吗？”

玛丽娜真应该成为一名歌手的。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温柔又不失力量。玛丽娜并没有说得很大声，但她的声音却格外有力，让人不得不听。玛丽娜的声音似乎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好似并不属于她。她的声音似乎是从背后或者是隔壁房间发出来的。玛丽娜的嗓子是她的保护伞，是守护她的天使。没有人会舍得伤害有这样一副嗓子的女人。

就是从这个提水的星期天开始，日瓦戈医生和玛丽娜之间建立了友谊。玛丽娜会经常去看日瓦戈医生，并帮他做一些家务。一天，玛丽娜跟日瓦戈医生待在一起，而那天晚上她没回自己的房间……就这样，玛丽娜成了日瓦戈医生的第三个妻子，尽管他还没有跟第一个妻子冬妮娅离婚，而他跟玛丽娜也没有正式登记。两个人很快就生了小孩儿。马克尔和阿加菲娅一提到他们的女儿嫁给了日瓦戈，就显得很失望。马克尔抱怨说，两个人都没举行一

个像样的婚礼，但阿加菲娅每次都会反驳：“你疯了吗？冬妮娅还活着，要是举行婚礼的话就是重婚了。”

“你可真是笨。”马克尔反唇相讥，“这跟冬妮娅有什么关系？她活着也是一样。她又不受俄国法律的保护。”

尤里·安德雷维奇有时候会开玩笑地说，他跟玛丽娜的爱情就是二十桶水，就跟一部由二十章组成的小说一样。

玛丽娜体谅日瓦戈医生的古怪脾气和行为，体谅他总是把屋子搞得乱糟糟的，也体谅他的那些情绪和胡思乱想。她无怨无悔地忍受着日瓦戈医生的唠叨，坏脾气和神经紧张。

玛丽娜为日瓦戈付出了太多太多。有一段时间

由于日瓦戈的过错，家里的经济变得十分拮据；为了不让日瓦戈这种时候一个人留在家里，玛丽娜甚至放弃了自己在邮局的工作——要知道玛丽娜的工作备受各方赞赏，可谓前途无量。为了配合尤里·安德雷维奇的一时兴起，玛丽娜会跟他一起做各种各样古怪的事情。为了生计，他们为很多人劈过木柴，其中尤其多的是靠做投机倒把生意富起来的一批人，以及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些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人有了钱之后便开始自己盖房。一天，穿着粘毛靴子的尤里·安德雷维奇和玛丽娜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以免鞋底的木屑弄脏别人家的地毯。他们当时正抱着木头穿过书房，那家的男主人全神贯注地在看书，并没有注意他们。交待他们做事并付工钱的都是那家的女主人。

“那头猪看得那么认真，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日瓦戈医生心想。只见那个学者不时还在书

页的空白处写上批注。日瓦戈抱着木头经过他身旁的时候，偷偷瞄了一眼。只见书桌上堆的一摞书，全是之前他写的小册子，由瓦塞印刷……

7

尤里·安德雷维奇和玛丽娜现在住到了斯皮里多诺夫卡大街，而戈登在附近的马来亚·布罗纳亚大街上有一所房子。玛丽娜和日瓦戈医生生了两个女儿，一个是五岁的卡普卡，还有一个是六个月大的卡拉扎卡。

1929年的初夏，天气十分炎热。附近的居民时常只穿着短袖互相串门。

戈登住在一栋奇特的建筑里，那儿曾经是一个时尚裁缝师的店铺。裁缝店分为两层楼，中间由一个螺旋楼梯连接，并且每层楼都是落地玻璃窗，正对着大街。两层楼的玻璃窗上都用金字印着裁缝的名字和职业。

现在裁缝店被分成了三部分。通过地板的分

隔，原来的两层楼被隔成了三层楼。一部分是客厅，带一个三英尺高的奇怪窗户，并且窗户上还残留着以前的金字。从外面透过金子的缝隙往里面看，只能看到里面人膝盖以上的部分。戈登就住在那个房间里头。当时除了日瓦戈，屋子里还有杜多罗夫、玛丽娜和孩子们——在外面是完全看不见孩子的。玛丽娜很快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剩下三个男人在屋子里。

三个男人开始毫无顾忌地海聊，聊当年的往事，聊过去和未来。就像那些还在学校里的少年，在夏日的午后惬意地聊天，以为友谊会地久天长。

为了让谈话自然地进行，必得有一个话多的人。而尤里·安德雷维奇充当了这个角色。

另外两个人总是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天生不善言辞。每当表达不出心中所想时，他们就会在屋子

里走来走去，大口大口地抽烟，手舞足蹈，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意思。——“你说的那个显然是不诚实，伙计！不诚实，是的，是的，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词，不诚实。”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夸张的表现，并不能体现出他们性格中的热诚和宽广，反倒是体现了智慧的贫乏。

戈登和杜多罗夫混迹在在文化学者中间，他们这一辈子跟许多好书，优秀的思想者，天赋异禀的作曲家，广为流传的好音乐打交道——当然并不总是好的，但他们并不知道品位平平其实是一件比没有品位更糟糕更不幸的事情。

杜多罗夫和戈登都不明白，他们指责日瓦戈，与其说是出于朋友的好心劝告，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自由去引导谈话的方向。他们跟日

瓦戈谈话，就像是坐上了一辆脱轨的火车，没办法控制自己去的地方。因为不能控制方向，他们就必然会撞车——这不过是迟早的事而已。而在他们对日瓦戈的说教中，火车一次又一次地脱轨。

其实，杜多罗夫和戈登隐晦的动机，做作的情绪和紧张的推理在日瓦戈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他鲜少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你们真是太普通了——你们和你们的朋友圈子，你们引用的那些名人名著，还有那些让你们俯首贴地的艺术作品！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是我的同龄人，并且也是我的朋友！"一个人如何能对朋友说这样的话呢？所以，为了照顾杜多罗夫和戈登的情绪，日瓦戈选择了顺从地倾听。

杜多罗夫之前也遭到了驱逐，前不久才刚回到莫斯科。他的公民权利得以恢复，并且也能继续在

大学里工作。

现在，杜多罗夫正在跟朋友们讲述他的那段流亡经历。他讲得很真诚，一点都不浮夸。这一次他不是出于惶恐的心理而说话，而是真正相信他自己所说的东西。

杜多罗夫说审判席上的辩论，在监狱里的经历以及出来之后的遭遇，尤其是跟检察官的私下谈话激活了他的大脑，让他得到了第二次政治教育，同时也拓宽了他的眼界，让他得以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

这些讲述之所以吸引戈登，是因为它们的平庸。他不断点头表示同情，认同杜多罗夫说的一切。最打动他的正是那些平凡的情绪和表达，他错把杜多罗夫在特定情境下的感觉当成了真实人性的表达。

杜多罗夫虔诚的陈词滥调正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而正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以及显而易见的伪虔诚，让尤里·安德雷维奇恼火不已。他想，不自由的人总是会把束缚他们的东西理想化。从中世纪起就是这样，之后的基督教会就一直利用人的这种特质。日瓦戈无法忍受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神秘主义，尽管这正是他们推崇至高的成就，甚至当时还被称为“时代的精神穹顶”。不过，日瓦戈医生还是没有说出这些话，以免伤到朋友的感受。

杜多罗夫的故事最吸引日瓦戈的是他对于狱友的描述——一个名叫波尼法提·奥莱特索夫的男人，他同时也是俄罗斯主教吉红的追随者。奥莱特索夫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名叫克里斯蒂娜。父亲的被抓和之后悲惨的遭遇对于小克里斯蒂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反启蒙主义的神父”和“剥夺公民权”这些词语在她看来，都是耻辱的标记。杜多罗夫说，

他感觉小克里斯蒂娜有一种天真的热诚，发誓某天要洗清家族的耻辱。克里斯蒂娜如此小的年纪就立下了如此大的目标，并且一天比一天坚定，这也让她成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拥护者。

“我必须走了。”尤里·安德雷维奇说，“米沙，你可别恼我。这儿太闷热了。我得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可这儿的窗子是打开的呀，你看，就在地板下面……不好意思，我们抽太多烟了。我们总是忘记，你是不抽烟的。其实屋子里变得这么闷也不是我的错，主要是这个窗子开得太不聪明了。你真该给我另外找个住处。”

“米沙，我真得走了。我们已经聊得够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你们知道，我这是真诚的感谢。我得了病，心肌硬化。现在我还不到四十，能

活的日子就不长了，这真的是让人唏嘘。”

“胡说！别说这种傻话。你肯定比我们都活得久。”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心脏病，但也不是必死无疑。有些人能熬过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疾病，我想它的发生跟道德秩序有关系。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过那种口是心非的生活，而你要是日复一日地表里不一——对不喜欢的东西表现得格外兴奋，对喜欢的东西又要格外克制——那么你的健康一定会受到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是虚构出来的，它是我们身体真实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灵魂也存在于我们里面的空间，就像牙齿是长在嘴巴里面的一样。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同样，过多地违反身体规律也一定会受到惩罚。杜多罗夫，听你说话让我觉得很痛苦，尤其是在你说如

何受到再教育并且在监狱里变得成熟的时候。这就好像是在听一匹马，讲述它如何挣脱自身。”

“我得为杜多罗夫说句话。”戈登说，“可能是因为你已经不习惯人类的这些简单表达，它们不再打动你的心。”

“也许是这样，米沙。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是让我走吧。我都快窒息了。我发誓，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等会儿，你这不过是在找借口而已。除非你给我们一个诚实且直接的答案，不然我们不会让你走的。你同不同意现在是你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并重新看待世界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做？第一，你得说清楚你跟冬妮娅和玛丽娜的情况。她们都是人，有血有肉的女人，并不是只存在于你大脑中的空洞思想。第二，像你这样的人白白浪费自己的才华是

会遭天谴的。你应该克服你身上的惰性，振作精神，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不要对谁都是一副高高在上，傲慢无礼的样子，你得干回自己的老本行，重新开始工作。”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一个回答。其实我自己最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接下来我肯定会有所改变。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且会很快。你们就等着看吧。我是说真的，现在事情已经有所改观了。我现在对生命重新燃起了激情，我想更好地活着，而活着就意味着你要往高处爬，往更好的地方走，并且为此付出努力。

“我很高兴你能为玛丽娜说话，米沙，就跟你以前总是维护冬妮娅一样。不过，我跟她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吵过架，我跟她们不是敌对的关系，

其实跟任何其他人都不是敌人的关系。你们一开始就指责我，是因为玛丽娜称呼我为‘您’，还叫我尤里·安德雷维奇；而我则是用‘你’称呼她，或者直接叫‘玛丽娜’——好像我乐意这样似的！可你们要明白，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是平等对待彼此。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另一件事。我收到了从巴黎寄过来的信。我的孩子都成长得很好，他们有许多跟自己同龄的法国朋友。萨沙将要小学毕业了，玛莎也很快要进大学了。你们知道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她的面呢。我有一种感觉，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尽管他们已经成了法国公民，但他们很快就会回到莫斯科，到时候所有事情都将有个交待。

“并且，冬妮娅和我的岳父似乎也知道了玛丽

娜和我们两个孩子的存在。我在信里并没有对他们提及这件事，但他们肯定是从别人那儿听到了消息。自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一个父亲，会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委屈和愤怒，觉得受伤。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和他的联系会中断五年之久。回莫斯科之后，以前我也跟他们通过信，可后来他们突然就停止给我写信了。

“不过最近，他们又开始给我写信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我写，冬妮娅也给我写，就连孩子们都开始给我写信。并且，信里表达了对我的关心和想念，十分温暖人心。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妥协了，谅解了我。也许是冬妮娅也有了别的男人，而这也是我真心希望的。我不知道。我也总是回信……不过，我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得走，不然心脏病就该犯了。再见。”

第二天早上，玛丽娜跑来找戈登，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没有人可以帮玛丽娜照看孩子，所以她一只手抱着裹在毛毯里的小女儿，一只手牵着卡普卡。

“尤拉在吗，米沙？” 玛丽娜惴惴地问。

“难道他昨晚上没有回家吗？”

“没有。”

“那他一定是在杜多罗夫家过夜了。”

“我刚从杜多罗夫那儿来。杜多罗夫现在在学校，而周围的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尤拉去那儿。”

“那他能去哪儿呢？”

玛丽娜把卡拉扎卡放到沙发上，开始不受控制

地号啕大哭。

8

整整两天，戈登和杜多罗夫不敢让玛丽娜单独一个人待着，他们轮流照看玛丽娜，同时也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日瓦戈医生。他们把想得到的日瓦戈可能去的地方全都找了个遍——弗拉尔城、赛夫特塞夫以及他曾工作过的地方。戈登和杜多罗夫还找了所有曾听日瓦戈提起过的朋友，或者他们知道对方地址的一些认识日瓦戈的人——但还是找不到人。

戈登他们没有到警察局报失踪。尽管日瓦戈有户籍登记，之前在警察局也没有案底，但他们还是觉得最好不要让当权部门注意到日瓦戈。因为就当时的社会标准而言，日瓦戈医生确实是个异类。他们决定，除非是到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让警察介入。

第三天，玛丽娜、戈登和杜多罗夫分别收到了

尤里·安德雷维奇寄来的信。尤里·安德雷维奇的信上说，他为自己造成的麻烦深感后悔，请求他们不要为他担心，并说不要再找他，因为找也是找不到的。

日瓦戈说，为了尽量彻底且快速地重建生活，他希望能一个人待段时间，集中精力思考自己的事。等他真正决定工作，并且确信自己不会再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就会现身，并且回到玛丽娜和孩子们身边。

日瓦戈医生在给戈登的信中夹了一张邮政汇票，说那是给玛丽娜的，并请求戈登帮着找一个保姆照顾孩子，好让玛丽娜能重新回去工作。日瓦戈解释说，之所以没有把钱直接寄给玛丽娜，是担心有人看到汇款单见财起意，给玛丽娜招来危险。

钱很快就取到了，并且数目远远超过大家的想

象。戈登按照日瓦戈的要求，给玛丽娜找了一个保姆。玛丽娜重新回到邮局工作，只是她还是很郁闷。不过她也早已习惯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古怪，最终也还是顺从了他的意思。戈登、杜多罗夫和玛丽娜还是想尽办法寻找日瓦戈，不过他们渐渐地也明白，日瓦戈说得没错，确实是找也白找。他们连日瓦戈的影子都找不到。

9

其实，日瓦戈医生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生活。那天，日瓦戈从戈登家里出来，临近黄昏的时候走到了布罗纳伊大街。他原本是要直接回家的，可还没走几步，就偶然碰上了他的表哥艾夫格拉夫，当时艾夫格拉夫迎面朝他走来。日瓦戈已经整整有三年没有见过这个表哥，并且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原来，艾夫格拉夫刚到莫斯科不久。和以往一样，艾夫格拉夫还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出现，对于问他的问题，也只是微笑着耸肩或开个玩笑带过。而另一方面，他问了尤里·安德雷维奇几个问题，立马就知道尤里在为什么事烦恼。两个人在蜿蜒曲折，拥挤狭窄的大街上边走边说，最后制订出一个可行的拯救计划。艾夫格拉夫觉得，尤里·安德雷维奇应该躲起来，消失一段时间。

艾夫格拉夫替日瓦戈在卡莫格大街找了一个房子，离艺术剧院很近。他还给了日瓦戈一大笔钱，供他生活。除此之外，艾夫格拉夫帮日瓦戈医生在医院谋了一个好职位，这样他就有很多的机会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协助他获得经费资助。最后，艾夫格拉夫还答应说，会解决流落在法国的冬妮娅和孩子们的事情。要么是让尤里·安德雷维奇过去，要么是让他们过来莫斯科。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艾夫格拉夫亲手操办。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位神秘莫测的表哥再次给尤里·安德雷维奇带来了新的生活。而日瓦戈还是不知道艾夫格拉夫的真实身份，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当然，他也没有试图解开这个秘密。

10

日瓦戈的房间朝向南边。房子几乎是紧挨着剧院，可以看到对面楼的屋顶。夏日的太阳挂在屋顶之上，而阳光中的建筑物在大街上投下一片片阴影。

对尤里·安德雷维奇而言，这个房间不仅仅是用来工作，也不仅仅是书房。那一段日子，书桌上成堆的笔记本已经不足以装下日瓦戈的计划和想法，那些装不下的念头和灵感就跟幽灵一般在空中飘着——像是没有画完的画，反过来挂在画家的画室中——卧室对日瓦戈而言，就是精神世界的宴会厅，是疯狂梦想的橱柜，是启示的储物间。

幸运的是，艾夫格拉夫和医院的谈判被拖了下来，这样尤里·安德雷维奇的新工作也就无限期地耽搁了下来。而这么一耽搁，日瓦戈就有了充足的时

间来写作。

日瓦戈开始把自己的早期诗歌进行分类，其中有一些是他自己记起来的，有些则是艾夫格拉夫给他找来的书面版本——其中有他亲自写的手稿，也有其他人的抄写稿。不过材料的混乱也让他浪费了很多精力，他很快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开始做新的事情。

日瓦戈随心所欲地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跟他第一次去瓦利吉诺时写的那些日记一样，随兴所至。也许是一首诗的开头，也许是中间部分，也许是结尾——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有段时间，日瓦戈甚至觉得他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哪怕他用缩写的方式，也写得没那么快。

日瓦戈很急。每当他的想象力停了下来，他就会在笔记本的空白处画画，以此来激活自己的想

象。而他画的总是森林里的木屑或者是挂有“莫勒&维奇金，机械播种机，收割机”这一广告牌的街道十字路口。

日瓦戈写的文章也好，诗也好，全都关于一个主题——城市。

11

下面这些文字，是后来在他的笔记本里找到的：

“1922年，当我回到莫斯科，我发现它已经成了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城市被毁掉了一半。革命开始后的最初几年就是这样，直至今天它还是这样。这儿的人口大量减少，没有人建新的房子，而旧的房子多半已是年久失修。

“不过哪怕是这样，莫斯科仍然是一座巨大的现代城市，而城市是启发真正的新的现代艺术的唯一灵感来源。

“象征派的作品把事物和想法混在了一起，这并不是一种典型的任意胡为。这是一种印象和观感的新秩序，直接取自生活。

“就像他们匆忙地在诗歌里描写画面一样，繁华城市里的街道也匆忙地从我们身边穿过，带着上世纪的人群和他们的有篷马车，或者是这个世纪初期的街车和地铁。

“这种环境下，永远都得不到田园生活般的简单舒适。哪怕这样尝试了，那也只是假装或幻想出来的，而不是真正来自乡村生活的启发，那不过是用文字堆砌出来的想象而已。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天生就是跟时代精神相适应的，自发并且自然，这是一种城市化的语言。

“我住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莫斯科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烈日炙烤着大地。阳光从上面的窗子里透进来，带来云彩和街道的味道。那味道围着我转，让我的头也跟着转，它还让我通过写诗歌颂它让别人也跟着转。因着这个，莫斯科让我成

长，并且让我长成了一名艺术家。

“墙外面的街道，日日夜夜喧嚣不停，而这种喧嚣已经成为了现代灵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好像窗帘离不开窗杆一样。街道隐入了秘密和黑暗中，而在脚灯的照耀下，它开始发出红色的光。城市，在我们的门外和窗外不停地旋转，咆哮，这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开始。关于城市，我必须写下这些话。”

不过，日瓦戈没有留下相关的诗歌作品。也许那首名为“哈姆雷特”的诗能划到这一类？

12

八月底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雷维奇乘无轨电车从加塞特尼大街转角的一个车站到库德里恩斯卡以中转站去。这是他第一次去波特金医院上班，也就是著名的索尔达特克医院。日瓦戈医生只去过那里一两次，并且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可惜，日瓦戈医生运气不好。除了电车发动机坏了不说，还出了很多其他的麻烦。一下子是被马车挡在了前面，轮子卡进铁轨的卡槽里；一下子是电车的车顶绝缘出了问题，电流短路引起一阵一阵的火花。

电车司机跳到前面的站台上，手拿扳手绕着无轨电车走了一圈，然后蹲下修理位于后站台和轮子间的机械装置。

这辆倒霉的电车使得整条线路的交通都陷入了瘫痪，街上其他的电车也都被迫停下，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电车过来。现在队伍都排到了骑马学校的后面。坐在后面车的乘客都跑到前面的车里，希望能节约一点时间，还有不少乘客跑到最前面的肇事车辆上。那个早晨十分闷热，车里又那么拥挤，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大街上的人从这辆电车跳到那辆电车上，天上的深紫色雨云则偷偷地越爬越高。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尤里·安德雷维奇坐在左边的一个座位上，紧靠着窗户。他可以看到左边的尼基塔大街，音乐学校就在那条街上。尤里·安德雷维奇愣愣地看着窗外的人走来走去，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

这时一个白头发的老妇人，头上戴一个饰有亚麻雏菊和玉米花的草帽，身穿老式的淡紫色紧身裙

子，正步履艰难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老人一路走一路喘气，并用手上扁平的包袱扇风。由于穿了紧身的胸衣，再加上天气炎热，老人已是汗如雨下，她不停地用一块小蕾丝手帕擦拭汗湿的嘴唇和眉毛。

老人走的那条路刚好跟电车是平行的。每当电车在一个站完成修理并经过老人的身旁，尤里·安德雷维奇就看不到她；不过，当电车再次出现故障，老人又会重新出现在尤里·安德雷维奇的视线。

尤里·安德雷维奇想起以前在学校学的数学难题，题目问不同时间启动并以不同速度运行的火车，分别要多久抵达目的地，以及抵达的顺序是怎样。尤里·安德雷维奇试图想起以前解决这类问题的通用方法，但他却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相反，这倒勾起了他其他的校园记忆，以至于思绪变得更加复

杂。

尤里·安德雷维奇想象几个生活平行且相近的人，以不同的速度前进，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其中一些人能超过其他的人呢？尤里想到，在这个生活竞技场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相对论的东西，不过他还是没能想出答案，最终还是放弃了分析。

天上雷鸣电闪，而一开始就出毛病的电车还是困在路上，这次它又在库德里恩斯卡以山和动物园中间的地方停下了。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人再次出现在视野里，她慢慢走过电车旁，并继续向前。大雨落了下来，淋湿了大街，也淋湿了女人。一阵狂风把树叶吹得呼呼直响，掀动老人的帽子，吹动她的裙子——突然间，一切戛然而止。

日瓦戈医生感觉一阵晕眩。他从座位上站起，

拉动车窗的栏条，想要把窗子打开。但是不管他怎么用力，车窗还是纹丝不动。

车里的人冲日瓦戈大喊说，窗子是用螺丝固定住了的，但心脏突然疼痛且惊慌失措的日瓦戈医生并未意识到那些人是在朝他叫喊，或者说不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他继续尝试打开窗子，不断上下拉动皮条。突然，日瓦戈感觉心脏一阵剧烈的疼痛——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痛。日瓦戈感觉身体里面有一个东西碎掉了，他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也是致命的错误。就在这时，电车启动了，但还没走多远，电车再次停下。

凭借超人的意志力，尤里·安德雷维奇挤过拥挤的人群，朝中心街道走去。他一路跌跌撞撞，跑到了后面的站台。拥来挤去的人挡住他的去路，冲他叫喊。日瓦戈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感觉人又精

神了一些，心想也许一切还没结束，也许他又好了过来。

日瓦戈继续在人群里挣扎，想挤到更后面去，这也让他引来了更多咒骂。日瓦戈医生不顾其他人愤怒的叫骂，他一心想穿过人群。日瓦戈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然后咣当一声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

周围的人群骚动了，人们议论纷纷。几个人从电车上下来，围着倒在地上的日瓦戈。他们很快发现日瓦戈的呼吸和心跳都已经停止。人行道上也过来不少看热闹的人，看到地上的人并非被车轧死并且跟电车没多大关系，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人对此感到失望。人越围越多。穿紫色裙子的女人也过来了，她看着地上的尸体，听着周围人的议论，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她是一个外国人，但

她明白一些人是想把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拖到电车上，然后再送到医院去；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叫警察来。女人未等最后的结果出来，便走了。

穿紫色衣服的女人是瑞士人，名叫玛德莫伊塞勒·弗莱乌利，来自梅流赛艾沃，现在已经是个沧桑的老妇人了。连着十二年来，她都在给莫斯科的当政者写信，希望能返回自己的家乡，最近她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这次她来莫斯科是为了办出境签证，所以她当时正在去大使馆签证的路上。天气太热了，玛德莫伊塞勒一边走一边用取回的文件扇风——文件是用一根绸带系着的。所以她继续往前走，第十次超过路旁停着的电车，并不知道刚才看到的那个男人就是日瓦戈。

13

穿过过道的门，可以看到屋子的一角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具棺材，雕工看上去十分粗糙，其中较矮的一个角正对着门，那正是遗体的脚所在的位置。尤里·安德雷维奇曾在这张桌子上写作，屋子里没有其他的人，而他的手稿也已经被收进了桌子的抽屉。尤里·安德雷维奇的头下面垫着高高的枕头，身体则是拱着躺在棺材里头。

尤里·安德雷维奇的遗体旁放了许多的花，一整束一整束的白丁香，是这个季节很难找到的，还有插在花瓶和篮子里的仙客来和瓜叶菊。花挡住了大部分从窗外透进来的光，只有一点细碎的光透过花叶的间隙映在打了蜡的遗体的脸庞和手上，也映在棺材的边上。桌子上是一片花叶的影子，好似那花叶才刚停止颤动。

当时，火葬在俄罗斯已经相当普遍。为了能让孩子享受抚恤金，也为了确保他们能有钱上学，以及保住玛丽娜在邮局的工作，大家决定不再去教堂办理丧事，直接火化。这件事已经通知了相关的市政领导组织及其代表人。

在这个间隙，房间看着格外地空。旧的人已去，新的人还未来。也有一些人前来吊唁，偶尔会打破屋子里的宁静，他们踮着脚尖走进屋子来跟日瓦戈做最后的告别。一开始来吊唁的人并不多，没有人想到后面还会有这么多的人过来表达哀思。没过多久，一个不知名男人暴死街头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其中就有日瓦戈在不同时期结识的人，尽管他们后来失去了联系，也不怎么记得对方。除此之外，日瓦戈医生的诗作和科学著作也吸引了一大批不认识的人过来，他们想要来看看这个拥有天才的人，跟他见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在此期间，每当仪式停下来，屋子里的安静就变得格外地吓人，只有那些花能稍微弥补一下仪式和赞歌的缺失。

棺材旁的花开得绚烂，散发出迷人的幽香。也许是那些花也即将枯萎凋谢，它们争先恐后地散出自己的清香，把那香味弥漫进每一个角落，笼罩屋子里的所有人所有物。

植物王国其实是和死亡王国最相似的，人们很容易就能把两者联系起来。也许困扰我们许久的进化的秘密和生命的谜，其答案就藏在植物的世界中，就藏在那绿树红花中。玛丽·抹大拉没有认出从坟墓里出来的耶稣基督，“想象一下，如果基督是一名园丁呢……”

14

当尤里·安德雷维奇的遗体运抵卡莫格大街的公寓时——这是他登记入住的最后一处地方，朋友们也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深感震惊。他们直接从露台穿过打开的门进来，另外也把玛丽娜带了过来。玛丽娜的震惊和悲痛不言而喻，她瘫在地板上，不住地用头撞击大厅里的木箱子，一直到已经订做了棺材运来之前，遗体都是放在木箱子上的，客厅也进行了一番整理。玛丽娜泪流满面，时而低声倾诉，时而号啕大哭，经常说着说着就哽住了喉头，然后就成了高声恸哭。玛丽娜的悲痛伴随着无止尽的话，跟乡下的农妇一样，逮着谁就跟谁哭喊，哪怕是陌生人进来也一样。玛丽娜紧紧抓住遗体，等到要把遗体抬进房间清洗然后装进棺材的时候，她还是不肯放开。所有这些都是前天的事。而今天，悲痛已经减轻了一些，大家都微微露出些倦态。只

见玛丽娜沉默地坐着，对周围的人事和她自己都是半知半觉。

玛丽娜不分白天黑夜地守着棺材，从未离开房间一步。孩子要喂奶也是抱到房间里来，卡普卡和那年轻的保姆也是来来回回地不停穿梭。

戈登和杜多罗夫陪着玛丽娜，他们也是悲痛得不能自已。玛丽娜的父亲马克尔总会在玛丽娜身旁的长凳上坐下，低声呜咽，再用手帕大声地擤鼻涕。而玛丽娜的母亲和姐妹也是来来去去。

不过，有两个人却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是一男一女，跟死者的关系也未必比其他人亲密，他们并不是要跟玛丽娜或他的朋友比谁更悲伤。尽管这一男一女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还是享受到了特殊的权利，也没有人询问或质疑他们的这种特权。这两个人尽心尽力地操办丧事，从一开始就以

一种冷静的姿态处理各种事情，好似这能带给他们满足感似的。他们太过冷静淡定了，而这会给人留下一种奇怪的印象，好似他们不仅是参与了葬礼，同时也是死亡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日瓦戈死亡，只是说事情一发生，所有人都自发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不会把这看作惊天地的大事。吊唁者中很少有人认识他们，也有一些人在猜他们是谁，但也是没有头绪。

不过，每当这个长了一双吉尔吉斯人的小眼睛的男人带着神态自然的漂亮女人走进房间，包括玛丽娜在内的所有人立马会不自觉地从椅子上或凳子上站起来。他们跟商量好了似的一块儿走出门，挤进走廊和大厅，只留那两个人在房门半掩的房间里。就跟那两个人是专家，需要安静地完成某些跟葬礼直接相关并且十分重要的事情。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屋子里只有这一男一女，他们在靠墙的两把椅子上坐下，开始说话。

“艾夫格拉夫·安德雷维奇，你发现了什么？”

“火化定在今天晚上。再有半个小时，工人协会医学院就会派人把尸体带到他们那儿去。仪式定在四点钟举行。他的身份证件全是乱的，工作证件也过期了；以前他倒是有工会的卡，可后来不知怎的没有再去换新的，除此之外他还有好几年的税没交。这些事情都得一一处理，所以我才花了那么长时间。在他们把他带走之前——时间很紧，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先让你在这儿独自待一会儿……不好意思，有电话找我。我待会儿再回来。”

说完，艾夫格拉夫走进过道，跟日瓦戈医生的同事、同学、医院的下层工作人员，还有出版界的一些人挤在一起。玛丽娜双手抱着孩子，用肩上的

大衣把他们裹进自己的怀里——那天天气很冷，在旁边的木凳上坐下，等着再回房间去——就跟来探监的人等着守卫的批准。走廊上和大厅里挤满了人。前门是开着的，有更多的人在露台上站着，或抽着烟四处转。其他一些人站在通往一楼的楼梯上，他们离街道更近，所以说话也就更大声更肆无忌惮。

由于周围太过嘈杂，艾夫格拉夫不得不提高声音，他回答了对方一些关于丧事安排的问题，还说了日瓦戈猝死时的情形。然后，艾夫格拉夫走回卧室，谈话继续。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火化完成之后你先别走。我不知道你住在哪儿，可别一声不响地就消失了。我有事要请你帮忙，并且希望越快越好——明天或者后天——我会开始整理日瓦戈的作品。到时

候，肯定需要你的帮忙。你对他更了解，也许是最了解他的人。你之前提到，几天前才刚从伊尔库茨克回来，并且不会待多长时间；还说你这次回来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并不知道日瓦戈的近况。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明白你的这些话，不过我也不想要求你解释，但请你一定不要一声不响地就消失了，起码得让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因为我们需要整理他的这些手稿，所以要是能在一个房间工作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隔壁的房间也行。到时候我来安排，我认识这儿的房东。”

“你刚说不明白我的话。有什么好明白的呢？我到了莫斯科，在火车站检查了私人物品，接着便穿过一些古老的莫斯科大街，乱逛起来。现在一半以上的街道我都认不出来了，我都不记得自己究竟离开了莫斯科多久。我沿着库兹内特斯基大街走啊走，突然就看见了那熟悉的卡莫格大街。那是我的

丈夫安提波夫——他被枪毙了——以前念书时住的地方，而且他就是住在你跟我现在坐着的这个房间里。我想，我得进去看看。谁知道呢，也许以前的老住户还在，我想去看看他们。我是真的不知道一切已经变了——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一个熟识的人。直到两三天后，通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找到那儿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我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门大开着，四处都是人，屋子里摆放着一具棺材，有人死了。是谁？我走了进去，四处张望。我以为我疯了。我看到你在那儿，你也看到我了，对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

“等会儿，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我得插句嘴。我已经跟你说过，我跟我的表弟一直都觉得这个房间很特别——比如说，安提波夫就曾住过这

儿。但你刚才说的这些更让我惊讶。这个我待会儿再跟你说。关于安提波夫，也就是斯特尼科夫，内战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几乎是每天。后来也见了他两三次，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日后会跟我的家人扯上关系。不好意思，也许是我听错了，我刚听到你说——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他是被枪毙的。你应该听过他其实是自杀的吧？”

“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故事版本，但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但这是很确定的事情。日瓦戈说，安提波夫就在你们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住的那个房子前自杀的。那是你刚离开不久就发生的事。日瓦戈说，他一觉醒来，就在雪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是他亲手把安提波夫埋葬的。你听到的是怎样？”

“我听到的跟这不一样……所以这是真的，他真的开枪自杀了？人们都是这么说，可我就是不相信。而且就是在瓦利吉诺的那个屋子前？这不可能呀。这个细节，对我至关重要。就你所知，他们两个人之前见过面或者打过交道吗？”

“据尤拉说，他们当时聊了很久。”

“哦，天啊，感谢上帝，那就好了。”安提波娃缓缓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这真是太神奇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关于这件事，你能让我再多问几个问题吗？因为每一个细节对于我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说对吧？我现在心里很难过，等我平复下心情，冷静一下再说，好吗？”

“当然可以！当然！”

“你真这么想？”

“是的，毫无疑问。”

“哦，是的。我差点忘了。你还让我火化仪式完成之后不要先走。好，我答应你，我不会一声不响地消失。我会回到这儿，或者跟你去任何地方，只要你把相关的事情全都告诉我。我们一起整理尤诺奇卡的手稿。我会帮你，说真的，在这方面我确实能帮你不小的忙。哦，这其实也给了我很大的欣慰。我熟悉他的那些作品，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那些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我的血液里。你知道的，我也有事情想问你。我需要你的帮助。听说你以前是个律师？所以，你应该知道现行的所有习俗和规章制度吧？还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去哪个政府部门可以查询信息？很少有人能告诉我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看？

“我有一件难事，一件很坏的事情，需要你的指导和帮助。是关于一个小孩儿。不过这件事我们等火化完成之后，回头再说。哎，我这一辈子，似乎总是在找人。告诉我，如果要找一个小孩儿，一个由自己带大却最后成了陌生人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在某个信息集中的资源库找到与他相关的信息？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对流浪儿或失踪儿童的书面统计和记载，或者说类似的一些资源？不，现在不要告诉我，你现在先不要告诉我答案。我们稍候再说。我很恐惧，生活太可怕了，你觉得呢？我的女儿待会儿可能会来找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公寓里头。凯特恩卡很有音乐和表演天赋，她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别人的动作甚至模拟出整个场景，而且还会唱歌剧。她是个很棒的孩子。你觉得呢？我想让她去戏剧学校或音乐学院学习，不管是去哪儿，我都得给她申请到奖学金，这也是我现在没带她过来的原因。我想等我把这件事安排好

了，再回去。可是人事很复杂，你不觉得吗？你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解释清楚的。算了，这些事我们都以后再说。现在我要缓一会儿，我要平复下心情，不再说话，好好冷静一下。哦，我好像听到有人在敲门，都敲两次了。外面可能出什么事了，估计是殡仪馆的人来了。你让我再安静地待会儿，麻烦你先去开门，让他们进来。现在也差不多是时候了，你觉得呢？等等，等等。棺材旁得放一个踩脚凳，不然那些人肯定够不着尤诺奇卡。我试过踮起脚尖，但还是觉得很吃力。还有玛丽娜和她的孩子们，应该也得踩到凳子上才行，他们会需要的。另外，仪式上肯定会说：‘请行最后的亲吻礼。’哦，这让我怎么承受得了？太可怕了，你觉得呢？”

“我去让他们进来。不过在此之前，我还得做一件事情。你刚才说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还

提了那么多的问题——显然这都是你的困扰——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回答。不过有一件事，我想让你知道。无论任何事，我都可以帮你。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愿意帮你。还有，你记住——无论任何情况下，你一定一定不能绝望。心存希望，积极行动，这些是我们面对不幸时必须做的；而自怨自艾，绝望痛苦，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我先让那些吊唁者进来。你旁边就有一个踩脚凳，我去拿一个过来。”

但安提波娃并没有在听艾夫格拉夫说话。开门的声音，人群从走廊里蜂拥而至的声音，艾夫格拉夫指挥殡仪馆的人做事的声音——她全都听不见了。她听不见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也听不见玛丽娜的抽泣声，听不见男人的咳嗽，也听不见女人的哭喊。

一刻不停的喧嚣让拉拉感觉头晕目眩。她用尽所有力气撑住身体，这才不至于晕倒在地。她的心像是要炸了，头也撕扯着疼。拉拉低下头，沉浸在自己的记忆和设想中。拉拉躲进过去的回忆，感觉反倒像是看到了未来。那未来也许是她不能活着看到的，那未来或许会让她苍老几十岁，未来，她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夫人。拉拉觉得，她也许是触到了最深最深的悲伤。

“一个人都不剩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而唯一活下来的人才最应该死——我曾试过要杀他，可惜没能成功——那个跟我没有一点共同点的陌生人，那个不知不觉间便毁掉我生活的神秘人，那个魔鬼。真正跟我亲近的人，我真正需要的人，都没了。

“啊，又快到圣诞节了。记得那一年同样是这

个时间，同样是在这个房间，我跟帕沙秉烛夜谈，心里盘算着要把科马洛夫斯基那个禽兽亲手杀了。那时的帕沙还是个男孩儿，而尤拉还未走进我的生活。”

拉拉努力在记忆中搜寻那一年的圣诞节她跟帕沙的谈话内容，可是除了摇曳的烛光和窗玻璃上融化的一块冰霜，她再也想不起其他的什么。

拉拉如何能知道，面前躺在棺材里的尤拉那天晚上也看见了那烛光，并且莫名地记住了，而也正是从看见烛光的那一刻起，尤拉开始走向另一条人生道路？

拉拉思绪混乱。她想：“他没能在教堂举行葬礼，这太让人遗憾了。丧事办得这么隆重而庄严！大多数人死的时候都配不上这样的隆重，但放在尤诺奇卡身上就一点都不为过！他配得上这一切，他

用自己的生命注释了‘对死者的哀悼，就是哈利路亚的赞歌’这句话。”

此时，拉拉感到一阵的自豪和轻松。每次一想到尤拉，一想到他们在一起的那段短暂时光，拉拉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一刻，她享受自由，尽管尤拉已经逝去。拉拉不耐烦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她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拉拉想要在尤拉的帮助下进入一个开阔的世界，冲破禁锢住她的悲伤，再次感觉自由的喜悦——哪怕只有短暂的一会儿。拉拉觉得，这种喜悦就仿佛她跟着日瓦戈离开了，她利用这个机会毫不受阻地为他掉泪。拉拉突然生出一种迫切的愿望，她想要用自己饱含泪水的双眼去看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时，所有人都起身走出房间，只留她一个人在半掩着门的房间里头。拉拉走到摆棺材的桌子旁，迅速用手在胸前画一个十字架。然后她站上艾夫格拉夫替她搬来的踩脚凳上，

在日瓦戈的身体上轻轻画了三个十字，用自己的唇紧紧贴住日瓦戈那冰凉的额头和双手。拉拉感觉到日瓦戈冰凉的额头已经缩小了，就好像原本是张开的手现在握成了拳头，但她刻意不去注意这件事。有那么一会儿，拉拉就静静地站在那儿，没有思考也没有哭泣。拉拉对着棺材鞠躬，她愿意用自己的全部，用自己的头、胸、心、手臂，用自己的所有去保护躺在棺材里的这个男人。

15

拉拉呜咽着，身体不时地随着抽泣而抖动。她努力想要控制住泪水，但有时泪水还是会顺着脸颊淌下来，落在她的裙子上，手上和她紧靠着的棺材上。

拉拉没有说话，也没有思考。那些想法、远见、真理自由地在她脑海里穿梭，好似云朵飘在天空一样。那些日子，这就是带给他们快乐和自由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彼此理解，一点都不刻意，是那样温暖，好像两个人天生就心有灵犀似的。

此刻，这种理解让拉拉隐秘而模糊地了解了死亡，也让她在心里上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而这种准备驱赶了她心中所有的无助感。好似她已经活了二十次，曾无数次失去尤拉，曾无数次经历这样的悲痛，所以她在棺材旁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是

合时宜的。

哦，多么美好的爱啊，完全地自由，独特，跟其他一切事物都不一样！相爱的人，哪怕说句话，都像唱歌一般动听。

他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需要爱而爱，也不是那种“一时的激情”。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显示出他们应该相爱，那树，那云，还有头顶的天空，脚下的大地。也许他们周围的一切景物，在街上碰到的所有陌生人，路上见到的一切风景，曾住过的所有房屋，都为他们的相爱而高兴，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来得高兴。

啊，这就是联结他们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如此紧密的东西！哪怕是在他们最富有最幸福的时候，他们也能感觉到宇宙的崇高，感觉到他们自己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美丽宇宙的一个组成因子。

对他们而言，这种与整体的联结，就是生命的宽度。而超越大自然中其他事物的人类进化以及对人的崇拜，对他们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们觉得，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政治管理也是一样，业余得让人觉得可悲，并且一点意义都没有。

16

拉拉同日瓦戈告别，用的是日常生活中最直白的话。尽管她的用词较为生动活泼，也没那么正式，但总给人没有落地的感觉。就像是古老悲剧的和声或独白，又或者像诗像歌一样，或者其他一些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总之拉拉的话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性。但拉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真心，都是由于她内心巨大的伤痛。就是这样一些简单的话，拉拉却是说得泪流满面。

眼泪让拉拉的话变成了温言细语，就好似绿叶在风雨里的窸窣震颤一样。

“尤诺奇卡，我们终于还是再见面了。只是，上帝太过残忍，再次见你竟然已是天人永别。谁会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我没想到，真的想不到。哦，天啊！我的眼泪止不住了。想想我就觉得悲痛

不已。你走了，我的世界也就是末日了。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迷人，朴素美的魅力——是的，是的，这些都曾经是我们的。但实际生活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小问题——比如重建宇宙——这些事情，不，这些事情不应该由我们来想。

“一路走好，我最爱的人；一路走好，我的骄傲。你是一条汹涌奔腾的河流，我爱你白天的水花，也爱你夜晚的浪潮。

“还记得那天在雪地里我们是如何告别的吗？你怎么能骗我！你不走，我怎么能离开？哦，我知道，我知道，你逼着自己这么做，你以为这是为我好。可在那之后，一切都毁了。哦，天啊，我在那儿受了太多的苦，经历了太多伤痛！当然，你不会知道这些。哦，我做了什么，尤拉，我做了什么？你不知道，我犯下了大罪。但那并不是我的错。我

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知觉。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里只有折磨，尤拉。我的灵魂无法平静，后悔和疼痛将我的心一片片撕裂。但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说，我没有这个力气。每次一想到那些事，我就寒毛直竖，惊恐不已。你知道，我现在都不确定我是否还正常。不过至少，我现在还没跟那些人一样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我没那么做，因为一个女人要是喝上酒了，也就真的完了。你觉得呢？”

拉拉悲痛欲绝，她一边哭一边说。突然，拉拉猛地抬起头，扫视周围。她看到不少的人在屋子里进进出出，但也都是在忙自己的事。拉拉从踩脚凳上下来，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按住眼睛，像是要把最后一滴眼泪抹掉。

男人们走到棺材旁，把棺材抬起放到三块布

上。出殡仪式开始了。

17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在卡莫格大街待了几天。她帮着开始整理日瓦戈的文字作品，不过这项工作最后完成的时候她却不在。拉拉也跟艾夫格拉夫·安德雷维奇聊了很多，并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了他。

一天，拉丽莎·菲奥德罗夫纳走出门，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她一定是在大街上被抓了。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已经死在了某个地方，也许她已经被人遗忘，也许她去了北方。

第十六章　后记

1

1943年的夏天，库尔斯克暴乱和奥廖尔解放运动爆发之后，新近提拔为少尉的戈登和上校杜多罗夫返回了营地。他们一个是完成外派任务从莫斯科返回，另一个则是刚休完三天假回来。

两个人中途碰上了，还在一个名叫切尔尼的小镇上过了一晚。尽管那个小镇也是受损严重，但还不至于毁于一旦，紧接着大量的溃兵退进了这个“死亡地带”。

在一片残垣断壁间，戈登和杜多罗夫找了一个保存尚还完整的谷仓，并决定在那儿过夜。

他们没有办法睡着，所以就不停地聊天。最后杜多罗夫是在凌晨三点才睡着的，但还未等天破晓，很快就被戈登吵了起来。戈登把头往干草堆里头钻，跟在潜水似的，然后他把几件衣服卷成捆，笨拙地从干草堆上爬下来。

“你要去哪儿？现在还早呢。”

“我要去河边。我想去洗点东西。”

“真是疯了。我们天黑前得赶回营地。那个专门洗衣服的姑娘塔尼亚，会给你准备换洗衣服的。你急什么呢？”

“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衣服上都是汗，都快发臭了。我就快速地滤一遍，再摊开晾，这种天气应该很快就会干的。到时候，再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

“虽说是这样，可我还是觉得不太好。毕竟，你是个军官。”

“现在这么早，周围也没什么人，哪怕有人也都在睡觉。反正，我就躲到树丛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没有人会看到我的。你别说了，赶紧回去睡觉，不然可就没的睡了。”

“反正，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于是，戈登和杜多罗夫走到河边，途中经过一片白色的石头废墟。尽管太阳升得还不高，但地面已是相当地热。很多人睡在太阳底下，鼾声如雷，脸被晒得红通通的，满脸汗水。其中大多数都是失去家园的本地人，男女老少都有；还有少数几个跟大部队失散的红军士兵，正在追赶大部队的路上。戈登和杜多罗夫小心翼翼地从这些人中间穿过，以

免打扰到他们的睡眠。

“说话小声点，不然这儿的人都会被你吵醒，到时候我就别想洗衣服了。”

两个人压低声音说话，继续接着前一晚上的话题。

2

“这是什么河？”

“我不知道。也许是祖沙河。”

“不，不会是祖沙河。”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河了。”

“你知道吗，那件事就是在祖沙河旁发生的——我是说，克里斯蒂娜。”

“是的，不过应该是在河流的下游。他们说，那儿的一座教堂接受她成为圣徒。”

“那里有一栋古老的石头建筑，人们称其为‘马厩’。那栋建筑以前确实是索夫科兹家族的马厩——现在这个名字将被载入历史——一个很古

老的地方，四面高墙环绕。德国人把它变成了碉堡，并且修筑得固若金汤。‘马厩’是在一座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所以要想胜利，就必须要夺下‘马厩’。当时克里斯蒂娜凭借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智慧，混到德军内部并破坏了他们的战线，可惜后来不幸被活捉并被处以绞刑。”

“为什么人们都叫她克里斯蒂娜·奥莱特索瓦，而不是杜多罗娃？”

“你知道，我们当时只是订婚。原本是打算战争结束后的夏天马上结婚。后来，跟在军队里的其他人一样，我居无定所，四处奔波。我所在的连队一下子被派到这个地方，一下子派到那个地方。由于这样的奔波，渐渐我就跟她失去了联系。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关于她深入敌人内部并英勇就义的故事，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是从报纸上和团部

内参里知道的。有人说，他们后来在这附近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克里斯蒂娜的英勇事迹。我听说日瓦戈——尤拉的哥哥，日瓦戈将军——正在这个地方四处搜集与她相关的信息。”

“不好意思——我真不该跟你提起克里斯蒂娜的。我知道，一说到这个，你肯定会很难过。”

“呵呵。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不想再耽误你的时间。你赶紧脱下衣服，下水去吧。我就在河边上躺一会儿，嚼根草，想想事儿。说不定，我还能再睡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又开始对话。

“你是从哪儿学的那样子洗衣服的？”

“这是逼出来的。我很倒霉，被分到了最差的刑事部队——很少有人能活着从那儿出来。一开始

刚下火车的时候，放眼望去是一片白茫茫雪原，远处是一片森林。扛着来复枪的守卫把枪口对准我们，跟狼一样地嚎叫起来。几乎是同时，其他的人也围过来了。他们逼着我们往四边散开，形成一个很大的多边形，让我们背对着背，不能看见对方的脸。他们还命令我们跪下，让我们直视前方。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凌辱。连着几个小时，我们就那样跪在地上。等那些人走后，我们终于能站起身，才有人说：‘这就是你们的营地，看着办吧！’仔细一看，对方说的帐篷就是一根光杆子竖在雪地上，上面插着一张纸条，上面写：

古拉格（著名的集中营）92 Y.N.90

“我们的情况还好一点儿，比你幸运点。当然，我那已经是第二次服役了。另外，当时的规章政令都不一样，所以各方面的条件也就不尽相同。

后来，上面同意我官复原职，并且允许我继续发表演讲。动员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就把我提成了上校。”

“嗯……要知道，当时雪地上就一根杆子，上面是一块公告板，‘古拉格92　　Y.N.90。’一开始，我们的手都被冻得开裂，还得自己去找木材修房子。最后，不管你信不信，我们还真的把营地建起来了。并且，监狱、栅栏、牢房和瞭望塔应有尽有，全是靠我们一土一木搭起来的。之后，我们又开始做伐木工人的工作，到处砍树。我们自己套马，八个人坐一个雪橇，冒着严寒大雪去森林里拉木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他们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之后，突然就传来了消息。说可以志愿去前线参军打仗，如果能活下去的话，就能重新得到自由。自那之后，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战斗，长途跋涉，日复一日的炮火。他

们把我们的连队称为‘敢死队’。基本上，我那个连队的人都已经死了。至于我为什么会活下来，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你相信吗，跟集中营的恐怖相比，打仗真的不算什么——这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原因。”

“哦，可怜的兄弟。你真是受了不少苦。”

“在那儿你可不仅是学到洗衣服，你能学会所有事情。

“知道吗，那是件很好的事情。这不仅是跟你在集中营的那段日子相比，哪怕是跟你三十岁的日子相比，甚至是跟无忧无虑的大学时光相比，战争的经历都是很有价值的。战争带来新的空气，像是一场暴风雨，洗净一切。

“我想集体化是个错误，并且不会成功，只是

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为了掩饰失败，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恐怖主义手段，通过宣扬利己主义的思想，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以此麻痹和愚弄民众。这也就是叶卓夫[(1)]时代会那么恐怖的原因——宪法的公告成了一纸空文，选举完全违背自由选择的原则。

“战争爆发之后，它带来真实的惊恐，真实的危险，让人们真正感到死亡的威胁。而跟建立在谎言之上的非人统治相比，战争反倒能打开局面，带给人新的希望。

“不仅是像你这样的人是这种感觉，集中营里的人也是这样想。绝对地说，不管是国内的普通民众还是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所有人都是深吸一口气，带着满怀的激情和喜悦投入了解放斗争中。

“战争有它的特殊之处，其实就相当于革命年代的链环。革命的直接影响已经过去了，而革命的

间接影响，也就是果实的果实，结果的结果，渐渐开始显露出来。不幸和磨难会磨炼人们的意志，让他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而这些优良的品质也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精英。

“尽管克里斯蒂娜在战争中壮烈牺牲，尽管我自己也因为战争而伤痕累累，尽管战争付出了太多鲜血的代价，可每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自我牺牲精神的光芒照亮了奥莱特索瓦的死亡，也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这也是我能承受这一失去的原因。

“你的苦难结束之后不久，我就被无罪释放了。后来，克里斯蒂娜到我所在的学校学习历史，成了我的学生。我之前就注意过她，那时我还在集中营，她还是个小姑娘，但人很聪明。你记得吧，当时尤拉还活着，我跟你们两个说过的。哎，她曾

经是我的学生。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兴起学生对老师的政治再驾驭。奥莱特索瓦激情满怀地投入了这项工作。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盯我盯得那么严。她的攻击性很强，并且有些事情明显做得不公正，以至于其他学生都有意见，为我说话。她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经常在墙报的内容里拿我开玩笑，给我取各种怪名字。后来，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意识到她的这种刻意刁难其实是对我爱的表现——一种由来已久且十分强烈的爱，而我对她也是情愫暗生。

“那一年，我们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没过多久，战争就爆发了。克里斯蒂娜跟很多其他大学生一起，被分到驻扎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连队，我所在的连队当时也是在那儿扎的营。我们的友谊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那时候，民兵队已经组建完成，克里斯蒂娜接受了伞兵的训练。当时德国人的轰炸机四处轰炸，我们损失重大。我跟你说过的，我们就是那时候订婚的，可还没过多久由于部队迁移我们就被迫天各一方了。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后来，战况渐渐好转，德国人投降了。受伤两次之后，我也调到了第七部队，因为那儿需要懂外语的人。后来的事你基本上也知道了。”

“塔尼亚，那个负责洗衣服的姑娘，是克里斯蒂娜的朋友。她们两个人是在前线结识的，她经常提起克里斯蒂娜。你留意过塔尼亚的笑容吗？跟尤拉很像。鼻子高挺，颧骨也很高，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我真没注意过。”

“她的绰号都很难听。塔尼亚·贝扎切雷戴瓦什么的，我想这不可能是她的姓氏，你说，别人为什么会给她取那样的名字呢？”

“这个，她跟我们说过的。她说是因为自己打小没有父母，后来就流落到俄罗斯一个十分偏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语言还比较原始，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意思是‘没有父亲’。后来，到了城市里，城里人把她名字的意思曲解了，所以才会给人这种感觉。”

3

没过多久，戈登和杜多罗夫就到了卡拉切夫城，那儿已经被夷为平地。他们是在卡拉切夫城追上先头部队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秋天，每天都是阳光灿烂，并且这种天气还将持续一个月。卡拉切夫城肥沃的黑土地在蔚蓝的晴空下闪着巧克力色或咖啡色的光芒。

主街是公路的一部分，笔直地穿城而过。街道的一边都是房子，只是多半已经在炮火中坍塌，果园里的树也是被炸得七零八落。另一边则是一所房子都没有，但炮火的痕迹也相对较少，也许是因为多半是空地，所以不是轰炸的重点目标。

有房子的那一边，可以看见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在废墟里翻找，从各个角落里掏出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并集中放到一个地方。其他人则忙着挖沟壕，并在上面盖上草皮，当作屋顶。

马路对面的空地全是白色的帐篷，挤满第二梯队的卡车和马拉的带篷大车，脱离营部的野战医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寻找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这里还有从后背连队来的男孩子，一个个戴着灰船形帽，背着捆成卷的大衣。这些年轻的男孩子身材瘦弱，面无血色，拉痢疾拉得虚弱不堪。他们偶尔会放下行囊，睡一小会儿，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向西边跋涉。

城市里在一般的地方还是余火未尽，远处设置为延缓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不时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铁锹把上休息一下，望向爆炸的方向。

天空里飘满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和火红色的烟雾，一开始是跟立柱喷泉一般直接上涌，然后便在空中懒洋洋地四散开来，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在废墟里挖东西的人休息一会儿，继续干起活来。

废墟对面是一块开阔的高地，被茂密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树木围着。古树和灌木丛把这片空地同周围的世界隔开，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院子，在树木浓荫的遮蔽下，变得阴凉和昏暗。

负责洗衣服的塔尼亚跟包括戈登和杜多罗夫在内的几名其他连队成员，从早上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等候派来接塔尼亚的车。团部委托塔尼亚把一些东西带走。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塞得鼓鼓的，放在地上。塔尼亚寸步不离地守着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边，唯恐失去上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等得实在无聊了，他们便开始听塔尼亚这个没见过多大世面但又多嘴多舌的姑娘，讲一些事情。后来，塔尼亚就讲到她跟日瓦戈将军见面的事。

“那是昨天的事。他们带我去见将军本人，我说的就是日瓦戈将军。当时他正在这一处打听克里斯蒂娜的事，想找到跟克里斯蒂娜有交情的人。于是，他们就把我带了过去。他们说，我跟克里斯蒂娜曾经是朋友。于是日瓦戈将军便要求跟我单独见面，后来他们就过来把我带过去了。说实话，日瓦戈将军一点儿都不吓人，他也没什么特别的，跟我们其他普通人一样。一双小眼睛，黑色的头发。反正，我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了。他安静听完了我的话，并跟我说谢谢。他还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儿来？当然，日瓦戈将军问我这些问题，让我觉得很害羞。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过是个

无父无母的乡下姑娘，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反正，大概就是说的那些话，具体也就不说了。但他一直鼓励我，他说，这没有关系，接受它就好。你别觉得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一开始我不太敢多说话，渐渐地我就越说越多，日瓦戈将军则在一旁不住点头。看到他点头，我内心最后一丝恐惧也消散了。确实，我有很多话要说。要是跟你们说，你们肯定不会相信的。你们会说，嘞，肯定是那个姑娘编出来的。日瓦戈将军也是一样。等我说完的时候，他站起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太不可思议了。他说，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他还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但我一定会再找你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会再派人去找你，我从来不知道竟还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不会让你就这样子的，只是现在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处理。谁知道呢，也许我会是你的舅舅，也许你将成为将军的侄女。我会送你去上大学，他说。不管你想去哪里，我都可以让你去。

我向上帝发誓，这真是他说的。也许他只是在开玩笑，在拿我寻开心。”

这时，一辆空的高头马车过来了，是那种波兰和俄罗斯西部经常用来拖干草的马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亚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请求他把他们拉到各自想去的地方，并且可以付给他钱。只是士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

塔尼亚和其他一些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身，爬上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刚才被打断的话又被捡了起来，塔尼亚继续讲她的故事。

“你跟将军说什么了？”戈登问，“能告诉我

们吗？”

“有何不可呢？告诉你们也无妨。”

于是，她讲了下面这个可怕的故事。

4

“没错，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有人说，其实我并非出身贫苦人家。我不知道是陌生人告诉我的话，还是我自己的记忆——反正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确实听说过我的母亲名叫拉丽莎·科玛洛娃，是俄国内阁大臣科马洛夫同志的妻子，听说科马洛夫现在躲在白蒙古利亚。不过我猜，科马洛夫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是的，我没读过什么书，从小就是孤儿，不知道自己父母亲是谁。也许我说的这些话在你们听来很好笑，但我只是说出我知道的而已，希望你们能站在我的角度想一下。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发生在西伯利亚的另一端，一个比哥萨克还远，濒临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红军占领白军的首府时，科马洛夫——就是那个部长——他把我的母亲和其他家人安排上了一辆特殊专列上，并命令火车开动。我的母

亲很害怕，她一步都不敢迈。

“这个科马洛夫并不知道我，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的母亲怀我的时候，她并未跟科马洛夫在一起，所以她很害怕科马洛夫会知道她怀孕这件事情。科马洛夫很讨厌孩子，他总是大嚷大叫，不停地跺脚。他总是说，孩子只会让家里变得乱七八糟，只会惹麻烦，我受不了他们。

“后来，红军到了我们所在的城市，我的母亲派人去纳格纳伊亚车站找一个名叫玛尔法的女人。那个车站离我们在的城市隔了三个站，头一站是尼佐瓦亚，其次是纳格尔纳亚站，下面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山口。我想，那个名叫玛尔法的女人应该是以前经常到城里卖蔬菜、送牛奶，所以，我母亲才会认识她。事情确实是这样子。

“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

想，可能是他们骗了妈妈，没有把某件事的真相告诉她。谁知道，他们是跟妈妈怎么说的呢。我想，他们肯定是说只要一两天的时间，事情就可以解决。妈妈并不想把我永远地送出去。把我交到陌生人的手里——母亲不可能会那样放弃自己的亲生孩子。

“不过，你们也知道带着个孩子会怎样。‘去找婶婶，她会给你姜饼吃，婶婶人很好的，不要怕她。’我就这样离开了妈妈。你们是不知道我后来哭得有多伤心，有多难过，有多想念妈妈——还是不要想起那些事好了。那个时候我真想把自己吊死，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可我差点就疯了。那个时候我就是那样子。我想，玛尔法婶婶领养我，肯定捞了很大一笔钱。

“玛尔法拥有一个不小的农场，里头养着马和

各种家禽，有很大一块土地可以种蔬菜——在那儿你想要多少土地就有多少土地——并且，由于房子属于政府，所以不需要租金。农场就在铁轨附近。有一段铁轨是铺在山上的，上山时十分地费劲，要是从俄国过去速度就会很快。秋天的时候，透过逐渐稀落的林子，你还能看到纳格纳伊亚火车站。

“那个叫瓦塞利的男人，曾经我叫他爸爸。他是那种善良且天性乐观的人，只是不太值得人相信，尤其是在他喝醉酒的时候。附近的人都知道他，因为他会对每一个碰到的陌生人掏心窝子。

“可我一直都没办法管玛尔法叫妈妈。也许是因为我从没忘记我自己的妈妈，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事实上玛尔法是个很糟糕的人。所以，我只叫她玛尔法婶婶。

“岁月流逝，时间过得很快，究竟过了多久其

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开始去火车上挥动旗子了，还可以把奶牛带回家，或者把马从马车上卸下来。玛尔法婶婶教了我纺织，至于其他的家务活，不用说全是我来做的。像拖地，打扫，做饭这种事情，完全不在话下。什么事我都做。哦，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当时还会照顾派提亚。我们的派提亚腿脚不便，他当时三岁，却完全不会走路，所以我就带着他到处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一想到玛尔法婶婶用那种仇恨的眼神看着我的双腿——意思好像是说，为什么残掉的不是我的腿——我就脊背发寒。玛尔法肯定觉得，要是残疾的是我而不是派提亚该多好，好像是我害得她的派提亚脚断了似的。你肯定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的怨恨和迷信。

“现在，我要跟你们说重点的事情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比，还不算什么。

估计，你们会听得寒毛直竖的。

“那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一千卢布只有一戈比的价值。瓦塞利大叔卖了一头奶牛，换回了整整两麻袋钱。瓦塞利大叔喝了一些酒，然后在纳格纳伊亚大肆宣扬他多么有钱，闹得人尽皆知。

“我记得那是一个狂风大作的秋日。大风掀翻了屋顶，好似连你整个人都要卷上天似的。火车没有办法上山，因为风刚好是迎面吹过去。突然，我看到一个老乞丐从山顶上下来，大风吹动她的衣裳，吹走了她的手帕。

“她一路走，一路呻吟，并且用手紧紧捂着肚子。那个女人请求我们让她进去避一会儿，之后我们就让她在长凳上坐下。哦，她嚷着，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的肚子在烧，我要死了。她祈求我们送她去医院，还说愿意给我们任何东西来报

答。于是，爹咂便套好了马车，把老女人移上马车，带她去了十一英里外的乡村医院。

“之后，我和玛尔法婶婶便都上床睡了，没过多久就听到马车驶进院子的声音。按理说，去医院不会这么快回来。但玛尔法婶婶还是点燃了煤油灯，穿上夹克，没等爹咂敲门就拉开门闩。

“她打开门，发现来人并不是爹咂，而是一个面目可憎的陌生人。那个人说，把你们卖奶牛的钱拿出来。我已经把你的男人杀了，看在你是个女人的份儿上，只要你告诉我钱放在哪儿，我就不杀你。要是你不给我，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并且，最好别让我等，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

“哦，天啊，还需要我叙述当时的情景吗？你们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被吓得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个人说瓦塞利大叔被他用斧头砍死

了，现在杀人犯又闯进了我们家里——我们知道他就是杀人凶手。

“我想，玛尔法婶婶就是那时候疯掉的。她一听到自己的丈夫被杀，内心一下子就崩溃了。只是，她知道自己一定不能让对方知道她的真实感觉。

“玛尔法先是扑倒在陌生男人面前。饶我一命吧，她说，别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钱。但那个男人不吃这一套，那个魔鬼，他很狡猾。后面实在没有办法，玛尔法便对他说，钱在地窖里，有一条秘道通进去，说可以为他把门打开。但那个狡猾的魔鬼看穿了玛尔法的心思，他说你下去，你知道路，你去把钱拿上来。我不管钱是放在地窖还是放在房顶，我只想拿到钱。不过你记着——别跟我耍花招，他说，不然你会后悔的。

“然后，玛尔法婶婶就对他说：愿上帝保佑你，你怎么会这么多疑呢？我倒是想下去帮你把钱拿上来，可我的腿脚不便，没办法爬下梯子。我可以站在上面，给你打灯。别担心，我让我女儿跟你一块儿下去，玛尔法说。她说的女儿就是我。

“哦，天啊，还需要我告诉你们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是什么感觉吗？我想，我完蛋了，我两眼一抹黑，双腿直打战，我觉得我一定会晕倒的。

“可那个魔鬼，他也不傻，他打量了我们一下，然后对着玛尔法挤眉弄眼，意思是说我知道你的把戏，你骗不了我的。他知道玛尔法不看重我，我不是她的亲生骨肉，所以他一把抓过派提亚，一只手拎着派提亚，一只手推开地道的门。给我们一点光吧，那个男人对玛尔法说，然后就下去了——带着派提亚一起踩着梯子下到地窖。

“我想玛尔法一定是吓傻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她疯了。那个男人带着小派提亚一下去，砰，她就把地窖门关上了，并用锁锁上。她搬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压在上面，还招呼我过去帮她，因为那块石头太重了。石头搬过去了，她人坐在上面，一副很得意的样子，那个疯女人。她一坐下，那个强盗男人就在地窖里大喊大叫，并拼命地拍地板。可是人在外面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地板太厚了，不过从语气也大概听得出来是这个意思——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把派提亚杀了。男人跟一头野兽似的咆哮，这吓坏了我们。现在，你的派提亚在我手上，那个男人吼道，但玛尔法什么都不管。她只是坐在那儿冲我眨眼睛，冲我笑，好似在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让开，钥匙在我这儿。我想尽办法想要让她清醒过来，我在她耳边大喊，要她赶紧开门把派提亚救出来；又拼命地推她，可是我推不动她，她太强壮了，我说的话她一句都不听。

“那个男人就在地窖里拼命地拍着地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玛尔法就坐在原地发愣，什么都不听。

“又过了一会儿——哦，天啊，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这件事我永生难忘。哪怕到我死的那天，我也没办法忘记派提亚那细弱的声音——派提亚在下面哭着喊着，呻吟着，那个魔鬼活活地把小天使般的派提亚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该拿这个疯女人，这个谋杀犯怎么办？当时我就在心里寻思，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就在这时，我听到了马嘶声，我想到马现在还在院子里，并且还没卸下来。是的，那匹马嘶鸣着好似在说，我们快点走吧，塔尼亚，找个好人来帮忙。我望向窗外，看到天已经快破晓了。没错，这是个好主意，我想。那说走就走，可就在这时，我

仿佛又听到树林里有个声音在说，等一下，别急，塔尼亚，我们想想其他办法。我这才知道，树林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听声音那好似是公鸡在打鸣。一列火车从下面穿过，我认得出鸣笛——那是经常从纳格纳伊亚出发的一列火车——他们都叫它‘推动者’——用来帮助其他火车上山。那是一列客货混合列车，每晚那个时候它都会经过。我听到了火车头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对我的呼喊。我凝神听着，心剧烈地跳动。我慌神了，我在想，这世间一切的生命包括火车头，是不是都是用俄语在跟我说话？

“哦，这么想不行，火车越来越近了，我已经没有时间思考。我抓起一个灯笼——当时天光还未大亮——沿着轨道跑，然后双脚叉开站在铁轨中间，上下挥动手中的灯笼。

“还用说吗？是的，我让火车停下了。受到风的影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跟爬行似的。火车停下了，车上的司机认得我，他从驾驶舱内探出头，冲我叫嚷了什么。可当时风太大了，我也没听清。我冲他喊，试图让他明白山上的信号房被抢劫了，谋杀，抢劫，什么都发生了。我对他说，叔叔，请你帮帮我们，我们家里有个杀人犯，我们现在很需要帮助。就在我说这些的时候，红军士兵一个接一个从火车上跳下来。原来，那是一列军车，上面的士兵全都跳上了铁轨。怎么了？他们问，他们不明白火车为什么会大半夜的在深山老林里停下，并且还停稳了。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他们说了。之后，红军士兵便把那个杀人犯从地窖里拖了出来。那个男人已经叫得嗓子都哑了，饶了我吧，好心人，求求你们，他说。别杀我，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但红

军士兵如何会听，他们把那个男人拖到铁轨上，并将他的手脚绑住，让火车直接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没有再回去，因为我害怕。我请求红军让我一块儿上车，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就离开了那儿。那之后，我四处漂泊，流离失所，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儿。毫不夸张地说，经历了童年的那些事情，现在我觉得真是太幸福太自由了！尽管，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罪恶和痛苦，但那都是之后的事情，这些我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说……那天晚上，一个铁路官员从火车上下来，专门过来接管政府财产，并决定如何处理玛尔法婶婶。有人说，她后来死在了精神病院，也有人说后来她又好了，从精神病院出来了。”

听了塔尼亚的故事之后，戈登和杜多罗夫在树下沉默地走了很久。车终于来了，跌跌撞撞地开上

了大路。戈登说：

“你猜到塔尼亚是谁了吗？”

“当然。”

“艾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戈登顿了一会儿，补充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理想最后都成了形式主义。所以，希腊才会败给罗马，俄国复兴成了俄国革命，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勃洛克[(2)]曾说：‘我们，是俄国苦难的孩子。’勃洛克说的这话，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子子孙孙，是一代代的知识分子；至于一时的恐怖，其实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转意成了真意，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这就是不同。”

5

也许过了五年，也许是过了十年，一个安静的夏日黄昏，杜多罗夫和戈登再次聚首。两个人坐在一扇打开的窗前，窗外是无边的暮色。他们翻着艾夫格拉夫整理出来的尤拉作品集——这本书他们已经无数次地读过，可以说每句话都记在了心里。两个人一边翻书，一边说话，偶尔沉默思考。书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便点亮了灯。

而莫斯科——作者日瓦戈的家乡，也是他渡过了大半生的地方——就在他们的脚下，在远处和地平线相接。在戈登和杜多罗夫看来，莫斯科已经不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而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角。等他们看到最后，天已经全黑了。

战争结束了，尽管胜利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带来轻松和自由，但在战后的日子里，自由的气息

已经四处弥漫，并且被赋予了历史性的意义。

戈登和杜多罗夫坐在窗前，对这两个老朋友而言，灵魂的自由已经达到了。未来的每一个黄昏都会流淌在他们脚下的这条街上，而他们自己已经走入了其中，成了它的一部分。想想这个神圣的城市，想想这个世界，想想这个故事中还活着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就觉得内心充满喜悦与平和，仿佛心里流淌着无声的幸福音乐，一直流向远处。而他们手中的书，似乎十分认同这种感觉……

---

(1) Yezhov，1936～1938年苏联秘密警察组织最高指挥者。

(2) 布洛克，俄罗斯诗人。

附诗

哈姆雷特

待骚动归于沉寂，

我缓缓踏上舞台。

伫立在门边，

凝神细听远方回响，

捕捉那关于未来的线索。

浓郁的夜色，将我定在原地，

透过千百只望远镜，凝望。

假若天父仁慈，

愿能移去我生命的苦杯。

我欣赏天主对于命运的严谨安排，

甘愿扮演生命的角色；

但如今剧情已然变换，

这一次恕我不能从命。

然而，命运的场景早已注定

一切终将落幕，无可改变。

茕茕孑立，虚情假意充满人间。

原来，活着并非一件易事。

三月

骄阳似火，热气熏腾，

溪谷如何抵得住这般炙烤？

早春的农事正繁忙，

全凭牧羊女一双健壮的双手操持。

积雪融化，

树枝露出淡蓝色的叶脉，

畜栏里热闹非凡，

翻飞的长柄草叉闪出耀眼光芒。

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夜，

屋檐上滴落的水，

连同挂在三角形饰物上的冰柱

共谱一曲流水潺潺之歌，在午后回响！

马厩牛栏门扉洞开，

白鸽在雪地上争食燕麦；

扑鼻而来的阵阵粪香，

添得一抹春日生机。

圣周

夜色仍笼罩人间，

时间还是这般的早。

数不清的星星挂满苍穹，

颗颗都想照亮大地。

若大地不受阻挡，

它将在梦中迎来复活诗篇。

夜色仍笼罩人间，

时间还是这般的早。

广场无边绵延，

从这边到那边，仿佛没有尽头。

待到黎明曙光乍现，

太平盛世仍会到来。

大地光秃一片，

未曾染上一抹夜色。

在这赞歌唱响的夜里，

为何不自在地敲钟，或应和。

从复活节前的三天，

到复活节的前夕，

河岸的积雪融化，

化成汹涌水流或宁静漩涡。

在这基督受难之日

森林也是光秃秃的一片，

松木昂首挺胸，站成一排，

好似祈祷的朝圣者。

在那附近的城镇，

树木也落光了叶子。

他们像是要进入教堂，

透过栅栏往里窥望。

他们的眼里露出恐惧神色，

惊慌之情显而易见——

花园的围墙塌了，

统治大地的规则亦受到巨大冲击——

上帝被埋葬了。

他们看到圣坛上有光闪耀，

看到黑披风和成行的蜡烛，

还有那哭泣的脸庞。

突然，一列朝圣队伍出现，

手捧十字架，身披寿衣，

朝他们走去。

两棵守护圣坛的桦树被迫避让，

躬身施礼。

朝圣者绕着教堂的院落，

沿着人行道的边缘行走，

将春天和春天的絮语，

从街道带进圣坛。

空气中弥漫着圣饼的甜香

和那春天的味道。

三月，白雪洒满门廊

像是分发给贫苦人民的救济物。

好似有人带来了宝盒，

打开，布施净尽。

赞歌经久不歇，直到迎来黎明的曙光。

悲怆而低沉的歌声，

渐渐飘向远方，

飘向那孤灯下的荒原。

午夜降临，

万物归于沉默。

于这沉寂之中，春天带来消息——

一旦晴好，便不会再有死亡，

这是复活的力量。

白夜

往日时光浮现在脑海，

想起那幢房屋就在彼得堡涅瓦河的边上。

地主的女儿降生在草原上，

那个地方叫库尔斯克。

你是那样的美好，吸引无数目光。

这一晚，你和我，

依偎着坐在你家的窗台上，

从高处凌空眺望。

街灯好似飞舞的蝴蝶，

清晨的寒气，挑逗我们的身体。

轻声曼语，我向你倾诉衷肠，

心儿飘向远方。

同样的情感拴紧你我，

那是对秘密的忠诚。

彼得堡在涅瓦河边依傍，

好似一幅全景图。

在这茂密的森林，

在这洋溢着春光的白夜，

夜莺婉转啼鸣，

歌声在无边的林海徜徉。

小小的黄口鸟儿放声歌唱，

哀鸣婉转，让人沉醉。

在这茫茫的林海，

夜莺的歌声让人变得不安。

好似一个赤足的朝圣姑娘，

白夜一步步靠近篱笆。

我们窃窃私语，

声音穿过窗棂，钻进她的耳朵。

在这絮语的回响声中，

在栅栏围就的园子里，

苹果树和樱桃树舒展枝条，

开出一树树白色繁花。

那树，好似幽灵一样，

把头探到路上，窸窣作响，

像是在跟白夜告别，

告别这见证一切的夜晚。

春天的泥泞小路

天空燃尽落日的余光，

在茂密的松林中，

一个人沿着春天泥泞的小径，

策马奔向遥远的乌拉尔田庄。

奔马长嘶，

应和马蹄声声，

流水潺潺，

一路陪伴左右。

骑马的人松开缰绳，

马儿漫步徜徉，

路旁泉水流淌，

哗哗啦啦，嘚嘚哒哒。

仿佛有人在大笑，或恸哭

马蹄下的砾石相撞。

树桩被连根拔起，

在漩涡中漂荡。

枝头夜莺欢唱，

宛如教堂报警的钟声敲响。

衬着天边燃烧的晚霞，

远山林木，墨色苍茫。

沟谷旁一株孤单垂柳，

像是埋葬情人的寡妇。

夜莺飞过七棵橡树，

一如从前的模样。

面对邪恶和绝望的爱，

前生写下的炽热情怀该为哪般？

在这深山老林之中，

夜莺要对谁开枪？

好似，他是森林中的魔鬼，

从流亡犯的营帐中逃出，

投奔游击队的队伍，

或步行，或扬马。

大地和天空，田野和森林

都捕捉到这独一无二的声音，

那声音里，疯狂混着痛苦，

幸福伴着忧愁。

解释

生活如故，毫无缘由，

一如此前那古怪的撕裂。

我回到从前古老的大街上，

在这相同的仲夏时光。

同样的人，同样的烦忧，

同样的是那温暖的落日余晖。

死亡的夜晚仿佛就在昨天

将一切定在洁白的墙上。

女人们披着破烂的棉布衣裳，

步履仓皇地前行。

夜晚是对她们的折磨，

在那阁楼的屋顶之下。

一个女人，拖着脚步

缓缓地出现在门口。

斜穿过庭院，

爬出狭小的地下室。

再一次，我编出种种借口

再一次，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我那善良的女邻居，绕过后院

独留我们二人，安静独处。

收回眼泪，不要

不要撮起你那肿胀的嘴唇。

因为那会勾起往日的伤痛

在那炽热的春天。

芊芊玉手，抚摸我胸间，

浓情蜜意自有一线牵。

来日定会再相见，

丘比特已射出了他的箭。

岁月流转，你嫁做人妇

过往艰辛统统忘却。

成为女人需要勇气；

倾倒众生，更是勇敢。

女人那迷人的双手，

俏丽颈背和圆润肩头，

让我满怀眷恋，

我的虔诚仰慕永世不休。

无论黑夜如何将我禁锢，

将我如何锁在渴望的圈中，

我定会奋力挣脱，

因为，那爱的激情正在向我召唤。

夏日之城

呢喃叮咛，

伴着步履匆匆。

青丝漫卷，

颈后一缕蓬松。

薄纱之下，

女人目光如炬。

蓦然回首，

辫梢飘拂扬动。

炎热夜晚，

预示夜来雷雨。

脚步沙沙，

人们匆忙回家。

电闪雷鸣，

回声响彻天际，

狂风大作，

扬起谁家窗帘？

万籁俱寂，

暑气熏腾不待；

闪电滑过，

扫亮暗夜无际。

待到破晓，

阳光继续灼热，

夜来骤雨，

留下漩涡无数。

菩提老树，

浓香繁花未落。

苦脸愁眉，

好似夏眠未觉。

风

我死了，你还活着。

大风，如泣如诉，

吹动房屋和森林。

一棵棵孤松，

站成无边林海，

通向无尽远方。

风摇大树，好似桨橹无数，

那船，在港湾沉浮。

不为一时豪气，

也非无名怒火。

这是深深的孤独，

为你谱一首摇篮曲。

酒花

常青藤缠绕绿柳，

下雨天忙往那树下躲。

雨衣披在你我肩头，

双手紧紧把你来抱。

哦，原来这不是常青藤

却是浓密的酒花一丛丛。

把那雨衣再撑开一些，

悄悄往那身下放。

初秋艳阳天

醋栗叶子粗厚繁茂，

笑声摇动房屋窗棂。

主妇们切切剁剁，

辣椒丁香往那卤汁里泡。

树林好似欢闹的小丑，

把笑声往田野里抛。

樟树在阳光下燃烧，

几乎要被热气烧焦。

这是一条通往山谷的小路，

这是一片古老的河堤沉木，

淙淙流水怜爱这初秋风景，

将一切奇谲风景收容。

世界原本简单又清楚，

绝非聪明人设想的糊涂。

好比水淹了苍翠林木，

一切都有其写好的结局。

阳光烧焦心爱的一切，

眨动眼睛也只是徒劳。

白色的秋天雾茫茫，

白雾蛛丝一般挂窗前。

庭院篱墙引出的小路，

消失在桦树林深处。

屋子里笑声伴着家务忙碌，

远处亦是欢声笑语一片。

婚礼

天光破晓，

贺客穿过庭院。

笑语欢颜，

来到新娘门前。

厚重毡布，

挡不住片语只言。

子夜以后，

或可得安闲？

睡眼惺忪，

人们迎来黎明。

手风琴响起，

众人告辞散尽。

口琴奏响，

如同手摇风琴。

击手拍掌，

伴送远方客人。

宾客畅饮，

似乎永不知停歇。

欢乐喧闹，

直抵新人床前。

在众人口哨呼喊声中，

新娘穿起雪白婚纱，

像一只白孔雀飞翔，

轻轻擦过你的身旁。

她的头高高扬起，

不时挥动纤细右手。

轻快的舞步踏出节拍，

如同骄傲的孔雀。

欢乐的喧闹掀动热情，

旋转的舞步跳出快乐。

然后，地狱打了个哈欠，

或是那洪水吞没了一切。

庭院醒了过来。

日常家务，一切如常

混着喧闹的你言我语，

和那一声声大笑。

笑声飞抵无边天际，

一道灰色滑过长空，

原来是成群的鸽子，

匆忙飞出樊笼。

像是突然记起，

养鸽人打开笼门，

让那充满渴望的生命，

前来参加婚礼。

生命本是短暂，

让我们融化自己，

混在所有人的心田，

作为对生命的纪念。

只有这婚礼的喧闹，

透过窗子飘向天空。

只有这首歌，只有一个梦，

只是一只灰色的鸽子。

秋

家中仆人各奔天涯，

亲朋好友天各一方。

还是那永恒的孤单，

充斥心间和大自然。

这荒僻的林中小屋，

只留你我厮守同住。

古老歌曲中的小路，

已被杂草淹没半数。

凝望你我的圆木墙，

如今也是满目忧伤。

我们不要任何阻挡，

宁愿死得公开坦荡。

夜深面对面来坐，

你缝衣来我捧书，

不知不觉天破晓，

不知何时唇碰唇。

满树秋叶尽情闹，

无所顾忌风中摇。

昨日悲伤还未了，

今朝又添新愁来。

如同烟雾四散秋风中，

只剩眷恋、渴望和叹赏，

把心埋进秋日絮语，

涌起激情或陷入疯狂。

像那林子掉光了叶子，

你也仿效着脱下了衣裳。

无论何时来到我怀抱，

总有一件绸衫遮身上。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死亡路上你带给我抚慰。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神话般的地方，

一个骑士沿着河旁，

穿过宽阔的草场。

他心思急切又慌张，

一心要去寻找战场。

透过草原的尘雾，

森林在前头闪耀。

不祥之兆萦绕心中，

骑士不安又慌张。

紧紧拉住缰绳，

千万不能掉进水坑。

但他顾不得这一切，

一路策马狂奔。

飞速地奔跑，

跑向山岗和树丛。

转过一座山丘，

又来到一条山谷。

半途遇林中草地，

再越险峻山峰。

眼前是一片洼地，

一条小径出没草迹，

循着野物足迹，

来到它们的饮水地。

像是聋人不听使唤，

也不顾内心情感，

他牵马走下陡岸，

让马儿畅饮一番。

溪边一个幽暗洞穴，

洞穴前方一片浅滩。

仿佛一股硫磺绿火，

照亮洞穴入口山岩。

骑士目之所能见，

只有那血色烟雾一片。

遥远的召唤声，

在茫茫林海中回荡。

骑士猛地直起腰，

快马加鞭越过山丘。

迎着召唤奔跑，

响应那遥远的呼喊。

骑士紧紧握着长矛，

他看到恶龙露出了头

和那巨大的尾巴，

还有坚硬的鳞爪。

恶龙张口一个哈欠，

喷出火光像是闪电。

身躯绕着美丽少女，

整整盘满了三圈。

巨蛇的脖子，

蜿蜒好似长鞭。

搭在少女肩头，

像是要将她整个吞掉。

按照当地的习俗，

凡是美丽的女子，

都要当做最好礼物，

敬献给森林怪兽。

少女的父老乡亲，

宁愿拿出房舍田庄，

作为姑娘的赎金，

向恶龙提出交涉。

恶龙缠着姑娘的手，

又紧紧缠着她的咽喉，

定要让这美丽的姑娘，

尝够无尽痛楚。

骑士仰头问天，

祈求上苍赐予他力量。

他要跟恶龙决一死战，

将美丽少女救出。

转眼已过百年，

沧海桑田，

岁月变换，

只是厮杀还在继续。

骑士头上的战盔，

战斗中被打得丁零。

忠实的马踩住毒龙，

与它同归于尽。

马和龙的尸体，

并列着倒在沙滩上。

骑士昏迷不醒，

少女亦是神志不清。

头上红日当空，

湛蓝的天万里无云。

这少女是大地之女？

还是王亲郡主？

幸福的眼泪，

淌在美丽少女的脸庞。

终于，少女的灵魂

安心地沉睡。

少女和骑士

他们的心依然跳动。

有时渐渐清醒，

有时重入梦中。

转眼又过百年，

沧海桑田，

岁月变换，

独留战斗依然。

八月

旭日忠实遵守诺言，

早早便在天边出现。

一道道红黄的光线，

从窗帘照到长椅前。

头下的枕巾沾湿，

是因着昨晚的梦。

梦见你们穿过森林，

前来与我告别。

三五成群，你们走在林中，

这当中不知谁忽然想到，

按旧历今天是八月六号，

而基督变容恰在今朝。

这一天，没有火焰的光

从基督变容的山上发出。

秋日显现上天的征兆，

普天下的人都受到感召。

你们跋涉过的地方，

是光秃荒僻的赤杨地。

但这墓地树叶上的颜色，

却似雕花糕饼上的姜黄。

天空万里无云，

摇动树顶的风也已平静。

远处的雄鸡一声接一声，

不断唱出报晓的啼鸣。

在这上帝的森林里，

到处都是死一样的静寂。

沉思中木然的脸庞，

比照我的身量掘出墓穴。

你们会听见，

身后传来平静的声音。

那是无惧死亡的我，

嗓音没有丝毫改变。

永别了，在这基督变容节

在这晴朗的日子！

最后，请用女性那温柔的手掌，

抚平我命运的创伤。

永别了，多年不幸的时光，

让我们就此分别。

女人变幻莫测的召唤，

我一生都在承担。

永别了，张开的宽阔翅膀，

勇敢地自由飞翔。

言语中现出世界的模样，

还有那应验的人间天堂。

冬夜

雪一直下，

天地一片洁白。

桌上燃起蜡烛一台，

燃烧着，燃烧着。

像那夏日的蚊虫，

挥动翅膀追逐亮光。

窗外雪花纷飞，

纷纷扑向门窗。

风雪在窗户玻璃上凝固，

凝成道道冰花。

桌上燃着蜡烛一台，

燃烧着，燃烧着。

烛光映照在屋顶，

又在地上投下影子。

那是手足交叉的影，

是交集在一起的命运。

砰，砰，两声轻响，

两只小鞋落在地上。

烛光摇曳，

烛泪滴落衣裳。

一切都消失不见，

风雪的夜只剩下白色。

桌上燃起蜡烛一台，

燃烧着，燃烧着。

一阵阴风吹来，

灯火混着白光摇动。

像是天使张开翅膀，

落下十字形的影子。

雪落满整个二月，

天地之间一片洁白。

桌上燃起蜡烛一台，

燃烧着，燃烧着。

离别

他透过门槛往里张望，

认不出这就是家。

她的离去像是逃亡，

只留下一地的凌乱。

房间里一片狼藉，

他不知为何会是这样。

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只觉头脑昏沉。

双耳一直嗡响，

这一切是否只是梦境？

为什么思绪翩飞？

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若因着那路上的白霜，

一个人看不清道路。

绝望和悲伤将会加倍，

好似被遗弃在无人的荒原。

他试图找到路途，

尽管浪潮朝他扑近。

沿海的小村庄，

是否也经历着汹涌？

芦苇被海水吞没了，

暴风雨又随之而来。

她彻底地消失了，

消失在他的灵魂深处。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

在那无法想象的日子中，

命运的浪潮将她送来，

投进他深深的生命。

经过无数艰辛和困苦，

绕过所有暗礁和悬崖，

她被命运推着上了岸，

来到他身边。

可现在，她逃离了，

也许这并非她本愿。

但这分离将他们吞没，

将悲伤刻入骨髓。

他看着眼前的一切，

在她离去的时刻。

梳妆台上的匣子，

装着的是满满的悲伤。

他漫无目的地游荡，

直到黑夜来临。

衣服散落满地，

像是曾被人打劫。

他拿起还未完成的刺绣，

上面插着一根针。

他突然看见了她，

低低地，低低地啜泣。

重逢

大雪封住了路，

埋住了幢幢房屋。

我伸出脚往外踏一步，

便看到你站在门口。

你倚门独立，

只穿着秋天的衣裳。

没戴帽子，未着冬靴，

显得冷静而淡定。

树木和篱笆，

隐没在飘扬的白雪中。

你独自站在墙脚，

在大雪纷飞中颤栗。

雪水沾湿了你的围巾，

流进你的袖口和衣领。

融化的雪花，

在你头上荡漾水光。

一缕淡黄色头发，

在你额边斜挂。

衬托着你的美丽脸庞，

和那弱风扶柳的身躯。

雪花湿了你的睫毛，

悲伤在你的眼里凝结。

你看上去是那样的美，

仿佛一块碧玉雕成。

你那美丽的身影，

将在我的心间永驻。

命运给你一只画笔，

在我心间刻画痕迹。

你那让人倾倒的美丽，

永远不会暗淡。

哪怕世界冷漠残酷，

又有什么关系？

白雪纷飞的夜晚，

好似有两个那么长。

我无法拉一条界线，

在你我之间割断。

你我是谁，从何处来，

有谁能说个明白？

我们一起回归尘土，

又何惧流言蜚语永存？

圣诞夜的星星

那是个冬天，

风自草原吹来。

山坡上的洞穴里，

一个婴儿正在受冻。

公牛用呼吸温暖他的身体，

奶牛抱成团挤在洞中。

还有那矫健的马，

用身体熨出温暖的气息。

牧羊人抖动皮衣，

甩掉身上的草屑和谷粒。

背靠着悬崖峭壁，

睡眼望着夜半的远方。

那是一片无边的旷野，

白雪覆盖了村庄和篱墙。

一辆马车屹然立在雪中，

星星在墓地上头闪动。

那星光仿佛触手可及，

落在打更人的窗台上。

小小的光在树梢闪烁，

照亮通往伯利恒的路。

漫天的星火燃烧，

好似来自天堂。

像是有人点燃了草垛，

又像是起火的谷仓。

星星向上腾飞，

带着炽热的谷草灰。

整个宇宙，整片世界，

都被这颗新星所惊动。

越来越炽热的星火，

像是背后有人在鼓动。

为着这无名的星火，

三名占星师紧急赶来。

骆驼驮着礼物走在身后，

一只比一只小。

它们小心翼翼，

迈着碎步朝山下走去。

这奇迹般的一切，

未来都将变换地出现——

所有的思想、梦想和世界，

博物馆和画廊的未来，

诱人的巫术和神奇的作品，

世间的圣诞树和孩子的梦想，

跳动的温暖烛火，

金属箔的耀眼和辉煌……

草原的风狂暴肆虐，

所有的苹果和金光菊摇曳风中。

赤杨林遮着了池子一角，

但树梢顶可以看见白嘴鸭的巢。

可以清晰看见悬崖的一边。

看见驴子和骆驼沿着池子前进，

牧羊人跟在一旁。

“让我们走吧，向神迹祈祷。”

说着，他们掀开身上的皮袄。

雪地疾走让人感觉温暖，

赤裸双足匆匆踩过大地。

越过宽阔草原和小屋，

借着星光牧羊犬看见了痕迹，

然后迎着烛光轻吠。

打霜的夜好似童话场景，

一个人出现在雪山上，

悄悄混进驼队。

牧羊犬警觉地放慢脚步，

提防可能会有的危险。

同样是这一条路，

几个天使也在行进。

他们的身影尽管被隐去，

但雪地上还是留着足迹。

曙光照亮红松的树干，

一群人出现在洞口。

“你们是谁？”玛利亚问。

“我们是牧羊人，是上帝的使者。

我们将为你唱赞歌。”

“你们不能全部进去。

请在这等待。”

黎明前的灰暗如同灰烬，

牧羊人和赶车人挤在一起取暖，

徒步的人同骑马的人斗嘴。

路上的车辙成了牲畜的水槽，

驴子和骆驼聚在一起嘶叫。

黎明驱散最后一颗星辰，

如同灰尘一般隐进苍穹。

术士受玛利亚的召请，

迈步走进神奇的岩洞。

他安睡在橡木马槽旁，

全身如月光普照般闪耀。

驴子和公牛的嘴唇，

代替羊皮袄给他取暖。

术士们站在阴影中，

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一个人碰了另一个人，

让他往马槽左边移动。

另一个人转身张望，

刚好看见圣诞夜的星，

把圣婴照亮。

黎明

原本是你主宰我的命运，

可战争让我们天各一方。

我等待了那么久的时间，

却始终没有你的丝毫音讯。

多年之后再听到你的声音，

我是如此地震惊和不安。

我整晚读着你的遗训，

这才渐渐清醒过来。

我想要走进人群，

同他们一起迎接黎明。

我愿将一切摔成碎片，

让所有人簇拥膝前。

我飞快地跑下阶梯，

好似初次得到自由。

我奔向积雪覆盖的街道，

踏上早就结冰的路。

到处都是袅袅的炊烟，

男人们匆忙赶向车站。

只不过几分钟时间，

城市就好像变了模样。

鹅毛雪纷扬落下，

好似帷幕挂在门前。

为了抓紧时间不迟到，

所有人都疯狂地奔跑。

我为这些人难过，

仿佛我就藏在他们的骨肉中。

我感觉自己像雪一样融化，

感觉和这清晨一般愤怒。

那些陌生人是我的一部分，

孩子，大树，家庭主妇。

他们战胜了我，

而我的胜利就在其中。

神迹

他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

心中充满预感的痛苦。

峭壁的树丛已被阳光烤焦，

附近小屋飘出阵阵热气。

苇丛在灼热的空气中一动不动，

死海泛不起一丝涟漪。

他尝过比海水更苦涩的味道，

一路上只有云彩作伴。

沿着灰尘漫天的道路前行，

他要去耶路撒冷寻找栈房，

门徒在那儿期待探望。

他深深沉浸在思绪中，

走过长满苦艾的田野。

独自伫立在那寂静之中，

到处都是昏沉与阴暗。

干旱和沙漠混杂在一起，

还有那泉水、溪流和蜥蜴。

前方不远处有一株树，

那是只有枝叶的无花果。

他问树：“你生来对人何益？

光秃的枝干有什么意思？

我又饥又渴，你却无花无果，

和你相遇真是晦气。

啊，你空有一副皮囊，

让你一生在此站立。”

这无花果树因受责而颤动，

好似被一道电流击中，

顷刻间化为灰烬。

总有自由而闲暇的时光，

让你深入自然规律的殿堂，

读懂枝干茎叶的文章。

但神迹终归是神迹，

而神迹即是上帝。

当遭遇困惑或遇到危机，

他会来得出其不意。

大地

春天无可阻挡地来到，

匆匆闯进莫斯科的住房。

橱柜后飞出的只只虫蛾，

曾经停留在件件夏装上。

快把裘皮收进木箱。

一排排盆栽的紫罗兰，

放在阁楼的木板上，

人的呼吸变得更顺畅，

满屋子飘散泥土香。

泥泞的街巷和半开的窗，

短暂的白夜和落日的光，

在莫斯科的河旁，

这是不能错过的景象。

你能听见外头的声响，

回荡在屋内的走廊。

或许那是四月的雨滴，

送来偶然得到的消息。

四月的雨流成一条河，

诉说着人间的痛苦。

那篱栅凝注了霞光，

让时间在这儿徜徉。

忽明忽暗的火光，

占据一切空间，

连空气也变得异样。

窗旁或道路上，

在那街道和工场，

柳枝嫩芽彼此催放。

远方是谁在雾中哭泣，

苦涩的气息来自何处？

须知这是我的使命，

为了这场景不被厌倦，

为了这土地不被城市占据。

正是这个原因，

朋友们与我在早春相聚。

而我们终会分别，

欢宴只能成为记忆。

就让那秘密的悲伤暗流，

温暖冷酷而残忍的生活。

苦难的日子

那是最后的七天，

他在耶路撒冷停留。

身后的人群高举橄榄枝，

迎面一片祈祷的呼喊。

日子一天比一天严酷，

怜爱已经逃离心间。

到处是横眉怒眼，

这已是最后一篇。

铅灰色的天，

在这城市的上空高悬。

法利赛人在寻找罪证，

想要将耶稣扳倒。

邪恶的力量进入神殿，

将耶稣交给贼人审判。

先前的歌颂和礼赞，

变成了诅咒和怒言。

外来的人聚成了群，

簇拥在殿门前，

推搡着向前，

所有人都等待着结局，

闲言碎语开始流传，

四面八方都是谣言。

天主想起了他的童年，

那是关于埃及的逃亡。

他想起了那片山坡，

和那无垠的荒漠。

撒旦在那儿给他诱惑，

应许给他世上的万国。

还提到了加纳的婚宴，

神迹曾出现在其间。

大海在迷雾中延伸，

他从容踏上小船。

穷苦的人聚在一起，

捧着蜡烛来到坟茔。

看到复活的他正起身，

留下惊掉魂魄的众人。

忏悔的女人

之一

死神入夜就要来临，

这是我将得到的报应。

荒唐放荡的过往记忆，

狠狠咬啮我的心灵。

我曾愚蠢而疯狂，

被男人玩弄于股掌。

在坟墓的寂静到来之前，

我只有不多的时间。

当生命走到尽头，

我愿坦承自己的生命。

啊，我的导师和救世主，

若不能进入永恒，

我还能去哪里？

受我引诱而来的人，

站在我的床前。

假如在众人眼中，

痛苦使我与你同在，

好似幼芽与母树不可分开，

那么罪恶、死亡和地狱之火，

又将意味着什么？

我的渴望无可比拟。

我主耶稣，我愿拥抱你的双脚，

用我的双膝将你支起。

我会把木十字架拥抱，

若是将你埋葬，

我将无知无觉躺在你身旁。

之二

人们在节日前清扫，

我只想远离这嘈杂与喧闹。

用一桶尘世的清水，

濯净主的双足。

我找不到你的软靴，

因为我的眼里噙满泪水。

还有那散乱的头发，

遮住我的视线。

我跪在主的面前，

用我的眼泪荡涤污浊。

取下脖子上的珠串缠绕，

将主的双足埋进发中。

我清晰地看到未来，

好似一切都已注定。

这一刻我能预言，

凭着女巫的本领。

神殿的帷幕即将落下，

我们都将退到一边。

大地会在脚下震颤，

也许是为对我的怜悯。

送葬的人重整队伍，

骑马的士兵各奔回程。

好似龙卷风袭来，

十字木架挣向天空。

我会倒在你受难的十字架下。

我会停止心跳，

紧咬双唇，

看着你张开双手拥抱众人，

在十字架两端平伸。

世界为何如此辽阔，

为何有这么多痛苦和力量？

世界真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房屋、河流和树林？

这三日最终将会过去，

将我死死钉在虚无中。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我的精神将会重生。

客西马尼的园子

遥远的闪烁星辰，

无心照亮蜿蜒的路途。

小路绕着橄榄山盘旋，

脚下是湍急的溪流。

草地在半途戛然而止，

后面便是银河。

银灰色的橄榄挂在树梢

仿佛要乘风而行。

远处就是那园子，

他吩咐门徒守在墙边。

“我的心万分悲痛，

你们要同我一起警醒。”

他从容地拒绝，

拒绝这统治万物的权力。

好似那只是一种赊借，

如今只愿和我们一样。

遥远的夜似乎就要燃尽，

变成一片虚无的空幻。

茫茫宇宙虚无缥缈，

只有这一处藏身的园地。

望着这昏暗的深渊，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他努力向天父祈求，

将这死亡之杯带走。

祈祷减轻了痛苦，

他起身走到园外。

门徒受不住困乏，

一个个倒在路边的草丛旁。

他唤醒众人：

“天父与你我同在，

你们却瘫倒在路旁，

人子已落在罪人手中。”

未等话音落下，

一群流浪的奴仆，

手持刀剑棍棒而来。

领头的便是那犹大。

彼得拔剑和暴徒对抗，

一人的耳朵掉在地上。

最后一言犹在耳旁：

“收起棍棒，暴力解决不了争端。”

难道不能请求天父，

派来天使相助？

不用伤我毫发，

仇敌便会四散奔逃。

生命的诗篇已经终了，

一切终将化为灰烬。

我以天主的名义起誓，

甘愿受这苦楚，堕入永恒。

我将进入坟墓，三日之后重生。

如同小船顺流而下，

你们亦在历史的长河里漂流，

穿过黑暗来接受我的审判。”